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七輯

民憲半月刊(一)

陳正茂 編



國史館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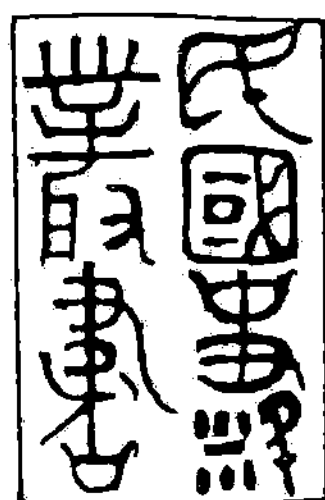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七輯
陳正茂 編輯

民憲半月刊 (一)

國史館印行



民

憲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七輯

民憲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八期

國史館印行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序言

一、「中青」成立簡介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於法國巴黎成立的中國青年黨（以下簡稱「中青」），在民國政黨及政治史上，無疑有其一定的歷史地位。「中青」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五四時代的「少年中國學會」之國家主義派，其後由於山東臨城劫案的發生，引起國際共管中國鐵路之議；兼以旅歐中共黨團的興起，為謀與之對抗，乃由曾琦聯合旅歐愛國青年如李璜、何魯之、胡國偉、張子柱等人於巴黎近郊之玫瑰城共和街所發起。其成立宗旨為：「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採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

二、重要經過階段（含主要代表刊物）

「中青」成立於民國十二年，迄今已屆七十年，此七十年中經過之歷程，約可分為十個階段，茲略述於下：

（一）海外建黨時期：從建黨日起，到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醒獅週報》在國內出版止。「中青」甫告成立，隨即與中共在歐洲展開激烈之鬥爭，雙方初以言辭展開唇槍舌戰，後且演成流血衝突之爭，故謂「中青」為中國最早之反共團體實不為過。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刊物為《先聲週報》。

（二）擴大宣傳及統一組織時期：從《醒獅週報》創刊起，至民國十四年十月十日發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宣言主張及簡約止。隨著國內外環境形勢的遽變，民國十三年起，「中青」黨務由海外轉移至國內，是年十月，「中青」於上海創辦了《醒獅週報》

為言論之機關，該刊之立論，主要在闡述國家主義之理論，兼亦嚴厲批判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之非。於此期間，「中青」雖然遭受國、共兩黨之夾擊，但仍能吸收廣大優秀之知識青年，黨務拓展甚速，茁壯亦快。

(三)反對聯俄容共及外人干涉中國政治教育時期：從民國十四年「五卅運動」起，迄於民國十六年七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止。此期間主要工作為極力糾正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之謬誤及提倡國家主義的教育，最終目標則希望收回外人在中國之教育權，表現刊物除《醒獅週報》外，尚有與「中青」關係頗深的《中華教育界》。

(四)反對一黨專政為民主政治奮鬥時期：從民國十六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起，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前止。北代統一後，中國國民黨主張訓政，高唱「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中青」深以此舉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則，故反對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及堅持民主政治之決心。此時期的主要代表刊物為《新路雜誌》。

(五)單獨抗日運動時期：從「九一八事變」起，至民國二十四年七月苗可秀殉國死難止。為「中青」提倡「野戰抗日」，組織義勇軍單獨抗日時期，主要代表刊物則為陳啓天所創辦的《民聲週報》。

(六)精誠團結及擁護抗戰時期：從苗可秀死難後起，到民國二十七年九月發表第九次全國代表宣言止。「七七」變起，「中青」體會到國難方殷，各黨派宜捐棄成見，共赴國難，故由左舜生主動致函中國國民黨總裁 蔣中正，取得諒解，不分朝野，精誠團結，共同抗日。此時期的主要立論刊物有《國論月刊》、《國論週刊》、《國防線半月刊》及《國光旬刊》等多種。

(七)促進憲政運動時期：從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第一次「國民參政會」召集起，到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集止。八年抗戰，「中青」始終與政府同甘共苦，一面協助政府抗戰到底，一面在抗戰中推進民主。此時期的主要刊物除《新中國日報》外，重要的有《國論半月刊》、《中青半月刊》和《民憲半月刊》。

(八)調停國共衝突促進全國和平時期：從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左舜生等六參政員訪問延安起，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以後。時值抗戰甫結束，國、共內戰卻有一觸即發之勢，然全國人心望治，「中青」以第三方面之身分，負責為調解國、共衝突而努力，惜功敗垂成。此時期的主要刊物有《青年生活半月刊》及《青年中國週報》。

(九)共同擔負國事時期：從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參加制憲國大起，至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止。此時期國、共內戰已起，中共竊國之心已露，政府一來需要戡亂，再來欲推行憲政，還政於民。處此艱困時期，「中青」始終扮演與政府共進退的角色，為反

共戡亂貢獻不小。此時期的主要刊物除《中華時報》外，尚有《中國評論月刊》及《風雲半月刊》。

(十)遷臺反共時期：從民國三十九年一月政府遷臺迄今，「中青」一則不幸發生黨務分裂；再則仍善盡在野黨職責，監督政府，維護憲法，貫徹反共國策，厲行民主法治制度。此時期的主要刊物，在香港有《自由陣線》、《聯合評論》，在臺灣則有《青年臺灣》、《民主潮》和《新中國評論》等。

三、蒐集經緯始末

編者爲已故「中青」史學家沈雲龍先生之門生，早在「政大」求學時，即對「中青」產生研究興趣。茲因彼時資料有限，故碩士論文乃以〈少年中國學會之研究〉爲題，雖非直接研究「中青」，但仍與「中青」略有淵源。雲龍師仙逝後，編者不僅沒有遠離「中青」，反而承蒙諸多「中青」前輩友人之提攜鼓勵，其中尤以李璜先生的知遇之恩，更令編者感激不已。職是之故，承李璜之託，編者一方面蒐集曾琦文章，欲編纂《曾琦先生文集》（現已由中研院近史所編印中）；再方面亦處處留心「中青」史料。初時因兩岸學術交流尚未開放，故所獲有限，其後兩岸學術交流頻繁，成果遂頗爲豐碩。其故何在？緣因「中青」追隨政府來臺之際，諸多大陸時期之重要史料文獻均未及携出，全部留在大陸，而港、臺、美、日各地，平情而論，存有「中青」原始史料鮮少，幸編者因緣際會，兩岸大通後，方有此便利，蒐集不少資料，而解決史料闕如之難題。經編者窮數年之力，復承甚多國內外友好之鼎力相助，編者現已蒐集之「中青」史料，計有《先聲週報》、《醒獅週報》、《新路雜誌》、《民聲週報》、《國論月刊》、《國論週刊》、《國光旬刊》、《國論半月刊》、《民憲半月刊》、《青年生活半月刊》、《青年中國週報》、《中國評論月刊》、《青年臺灣週刊》、《風雲半月刊》、《劇共半月刊》、《國防線半月刊》、《中青半月刊》、《國魂週刊》、《時代文學半月刊》、《探海燈週報》、《自由陣線週刊》、《聯合評論週刊》、《民主潮半月刊》、《新中國評論月刊》、《現代國家月刊》、《民主國家半月刊》、《全民半月刊》等。其中除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後之刊物較易尋獲外，其餘大體上均甚難於國內和大圖書館覓得；因此，編者遂透過各種管道從大陸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四川成都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江蘇無錫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室等地蒐集而來。

綜觀「中青」七十年的歷史，可謂集愛國、民主、反共於一身，就身爲在野黨立場而言，不愧爲中國國民黨之諍友；就對國

家而言，患難與共，耿耿孤忠。以如此的一個政黨，奇怪的是國人對其瞭解的不多，研究者亦少。有人只知譏其為「政治花瓶」；有人諷之以「泡沫政黨」；甚且有人還誤以為其乃近年在臺成立之小黨。就在編者數度前往大陸蒐集資料，目睹大陸研究民主黨派（包括「中青」）甚為興盛的今天，國人對「中青」及在野黨派瞭解之淺薄，實讓人感慨萬千！正因如此，才讓編者發憤欲蒐羅「中青」原始史料，編纂成冊，以供國人研究參考之願，此乃編者蒐集「中青」史料之經緯梗概及心路歷程也。

四、編輯綱要

國人對「中青」瞭解之淺薄，緣於所知「中青」史料之不多，既然編者擁有上述彌足珍貴之史料，何不公開於世，付梓發行。幾經交涉，蒙國史館朱文原先生初步之慨允幫忙；復承遲景德先生之精心審查，國史館原則上答應影印出版此批史料。今依照遲景德先生之審查意見，擬以史料價值、缺期情形及（影）印刷狀況三方面為編輯之考量標準。

封面設計：擬以各期刊特色，配以相關之照片圖案。

名稱：擬以《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名之。

版面：以十六開為主，力求版面畫一。

冊數：擬分十二輯，每輯再依照篇幅字數細分若干冊。

編輯順序：按史料之時間先後為之，缺期情形，則評量其史料價值而定；（影）印刷狀況，除若干些微史料較模糊者外，大體上均甚良好。

準此而言，茲將編輯綱要簡述如下：

第一輯——醒獅週報：《醒獅週報》為「中青」最具代表性之刊物，「中青」又稱為「醒獅派」，其故在此。《醒獅週報》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創刊，共行行二六六期，編者蒐集由創刊號至一九五期，約近五分之四，當中雖有些許缺頁，但可說仍甚齊全，此週報可謂研究「中青」必備之重要基本史料，按篇幅字數，酌情以四冊出版。

第二輯——新路雜誌：《新路雜誌》為李璜與張君勱所合辦，創刊於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一共只發行至第一卷第十號即停刊，編者蒐集有一至八號，恰好五分之四。本刊立論主要為批判共黨暴動路線之誤及中國國民黨一黨訓政之非，為一相當珍貴之

史料，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二冊出版。

第三輯——民聲週報：《民聲週報》為陳啓天於民國二十年十月，「九一八」國難發生後在上海所辦，該刊物主要言論立場為鼓吹「野戰抗日」及反對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總共發行三十八期，編者蒐集有二十三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四輯——國論月刊：《國論月刊》為「中青」繼《醒獅週報》後，最有深度內涵的刊物，內容包羅萬象，頗為可觀。該刊於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創刊，至盧溝橋事變後停刊，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十期，編者蒐集第一卷有十期；第二卷有六期，由於該刊份量頗多，按篇幅字數，酌情以兩期併為一冊，分八冊出版。

第五輯——國論週刊：《國論週刊》為《國論月刊》停刊後，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在成都出版，共有三十四期，編者全部蒐齊，內容以闡揚抗戰到底為旨；另有重慶版三期，可以附錄方式放於後面，本刊份量適中，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六輯——國光旬刊：《國光旬刊》為左舜生於抗戰初期，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長沙所辦，共發行十二期，編者全部蒐齊，內容以激勵民心士氣，報導抗戰消息為主，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七輯——民憲半月刊：《民憲半月刊》為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中青」於抗戰末期加入「民盟」後所辦之刊物，故該刊物頗具第三方面色彩，主要言論為鼓吹民主憲政，並對中國國民黨於戰後行憲有所期待及建言。《民憲》總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六期，編者蒐集至第二卷第二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二冊出版。

第八輯——青年生活半月刊：《青年生活》係「中青」於戰後，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七日在上海重新復刊之刊物，主要內容為報導戰後國內之消息，兼亦披露江浙一帶之人文動態，為一本綜合性之刊物，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十二期，編者蒐集至第二卷第五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九輯——青年中國週報：《青年中國週報》係「中青」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上海所辦，該刊取材多樣活潑，政論、藝文、小說、詩詞均有。總共發行五十期，編者全部蒐齊，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十輯——中國評論月刊：《中國評論》為徐漢豪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日於南京所辦，主要內容以有關政治、政黨、經

濟、軍事、外交之評論為重點，一共發行十期，編者全部蒐齊，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十一輯——青年臺灣週刊和風雲半月刊：時值政府戡亂失利，時局動蕩不安之際，「中青」與國家共患難，先後於臺灣發行《青年臺灣週刊》及在上海創辦《風雲半月刊》。《青年臺灣週刊》創刊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由朱文伯所發行；《風雲半月刊》創辦於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一日，由夏濤聲所負責。兩份刊物內容相似，主要以評論時事為主。《青年臺灣週刊》共發行十五期，編者擁有十四期；風雲半月刊一共只發行至第一卷十二期，編者全部蒐齊，唯兩份刊物篇幅不多，性質相近，酌情可合併一冊出版。

第十二輯——其他：包括《劇共半月刊》、《國防線半月刊》、《中青半月刊》，這些刊物因蒐集有限，篇幅不多，但又深具史料價值，故不擬按時間順序編輯，酌情量之，綜合為一冊出版。

綜而言之，此批珍貴史料，為編者窮多年之力，費盡千辛萬苦，得來委實不易，於國內可謂絕無僅有，倘蒙不棄，能由國家最高史政機關國史館影印出版，讓珠沉滄海終有重見天日之刻，此舉，相信不僅嘉惠士林，裨益學界，亦編者衷心能聊以告慰先師沈雲龍及李幼老（璜）知遇之恩也。

編者陳正茂謹識於臺北蘆洲

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編者說明

《民憲半月刊》創刊於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發行人爲時任「民盟」秘書長兼「中青」領袖的左舜生。其言論態度據左舜生在「努力與思索」代發刊詞所言：一向是就事論事，從事實去推敲，而不作空談原則的探討；一向是相忍爲國，共體時艱，而不作意氣之爭；一向是責勉政府，而不攻擊國家。在鼓吹倡導民主憲政之餘，從不盲目樂觀，也不粉飾太平，掩蓋事實。由其公平客觀的論政立場，這個半月刊，可以說是青年黨在戰時樹立民主憲政運動的一個旗幟，其對於民主理論的闡揚，也作了相當大的貢獻。《民憲》總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六期，編者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蒐集至第二卷第三期。因該刊頗具第三方面色彩，在抗戰末期深受朝野上下所矚目。

編者陳正茂謹識於臺北蘆洲

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民憲

第一卷 第一期

努力與思索（代發刊詞）

左舜生

確立中華民國對於四強系統之關係及其地位

張君勱

民主憲政的原則問題

陳啟天

憲政與婦女

張申府

討論憲章應有的態度

擇仁

革命時代與憲政時代

方堅

評憲章中中央政府有關各條之規定

陳一清

日本可能為憲政國家

龔德柏

改革僑務刍議

張禮千

蘇波問題之演變及其解決之道

孫寶毅

羅斯德特口中之德國防禦西歐計劃

抱貞譯

新書評介（三則）

舜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Academia Historica

努力與思索
(代發刊詞)

整個世界依舊爲戰爭所困擾，別忘了我們還在戰時！

戰爭與目的在爭取光榮的和平，這樣的一種和平究竟何時可以來到？假如我們不顧漸和一般通俗的見解，則我們只能很謹慎地回答：尚難預測。

中國人有一句老話：「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底抗戰快
到七年，經過了不少的危難和艱苦而其氣愈壯，可是對於這最
後十年的前途，我們却不能不警告國人：要各方警惕。

勝利是可寶貴的，「四強之一」的美譽是令人欣羨的，「和平建國」的瞻望，更是使人怦然心動的。可是，七年來的經驗昭示我們：國內外一切複雜的情況昭示我們；它教我們熱心地努力，加倍地努力；冷靜地思索，反覆地思索。

主席先生已警告國人：抗戰勝利後一年內必須實施憲政。這第一條帶政治性的問題，亦得用經濟方法去解決。

其次我想這層意思應該是今天解決一切內部問題的一個前提，我們最好是根據這個方針去設法，最好是本着這個方向去設法。國內是求，對外是求，國內有了一定的方法，有了相應的方針，我們想這個基本法處理對外的問題，便容易得

從容作伊始，我們想在這裏陳述我們幾點平凡的意思，希望對我國底言論自由運動有一點幫助。

一、爲實現理想忘了現實。推動世界的是人間一切一切

是就現實敷衍現實而拋棄了理想，但假如理想現實完全脫了節，則理想亦將流為空談。在最近的五十年間，我們看見兩位重視理想而又絕不忽視現實的著名人物：其一為維新運動而創立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其一則為推翻沙俄專制而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高尔基。他們兩位先生的先後相若，其處在一個極端專制的時代而思有以改革之相若，卒之兩位先生事業上的成就也大致相若，並且他們兩位皆及身有過一次政治上的交觀。因此，我們比較他們兩位固為理想家而又同時為現實主義者的若干事實，乃彌覺有深長的意味。

當中山先生以一介平民的資格，竟願要推測一二皇帝之二百餘年的皇統，其時他故鄉的親友，固只能以一哭以哀言之；即中山自身，也覺得及他之身，三足得走到這一步，所以說。（此皆照中山先生之自述自明）中山先生所倡導，三民主義，係以一宗教脫險以後護衛歐洲諸邦克己克己，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同盟會初在東京成立時，曾公推中山先生為「總理」，即仍為一部分的加盟者所不能了解，這還是一部分人，這部分人，雖勉強接受。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為之等，又有一人，又有一人，當代人物，亦仍以理想家視中山。可見先生之生命，是與國家，中山先生在他一部分同志心目中，固為一偉大的理想家。到了民國七八年之交，中山先生且曾於南京，曾於南京，曾於南京，雖，護法事業雖竟全功，而其時我國革命論已發見，結束，國內新思潮又已風靡一時，於是中山先生之生命，已告

容。他惟恐他底「建國方略」「三民主義」不易爲國人所瞭解，乃以「孫文學說」先之，以謀國人心理上之改造。從這種地方，我們又可看出中山先生是何等愛他自己底理想。可是，在革命實現以前，以及入民國以後，我却可舉出幾件事足以證明中山先生不只是一個理想家，而且是一個不忽視現實的人：一見於他在庚子以前願與康梁攜手；再見於民國元年以總統寶章；三見於十一年以後之接近蘇聯而繼以聯俄容共；四見於他臨到逝世以前猶扶病北上謀與段祺瑞張作霖見面，此何以故？以他要實現理想乃不得不運用現實故。但是，與康梁攜手以共謀中國的改革是可以的，康梁終於不能放棄保皇，則中山只好與康梁分家；袁世凱願意做中華民國底總統也是可以的，袁世凱要放棄諾言，背叛民國，則中山只好起而討袁；聯俄容共在當時自有其需要，但他却不肯無條件地抄襲蘇聯；與段張見面談話亦自有其苦心，但段祺瑞式的善後會議，他到底不能叫他的同志去附和。此何以故？以一個政治家爲理想而遷就現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故。我覺得我們要認識中山先生底偉大，必得從這些方面去細心體會一番。

列寧是一個天分極高的人，他在十五六歲時，即已開始閱讀馬克思底「資本論」。他畢生從事革命，亦畢生從事著作。「沒有革命的理論，即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這是他自建的信條，也就是他自己嚴格遵守着的信條。於一八九七到一九〇〇年間的三年間，他過着西伯利亞的流放生活，但他底心始終在「態度從容」，在那樣艱難的條件下，他依然繼續著，搜集材料，完成了他三十多種的作品，其時他還不過是一個二十八到三十一歲的青年。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他旅居瑞士，其時整個歐洲，正爲戰爭的火藥氣味所充滿，但列寧在當時

雖是窮得不得了，却依然不改他恬適與從容的常態，一面注重戰爭底過程，一面分析戰爭底起因及其可能的歸宿。而他那本「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名著，乃正脫稿於此時。（一九一六年六月）不僅如此，他在這樣一個舉世荒荒的時候，居然還有心情去研究黑格爾底哲學，凡黑格爾底著作如「邏輯學」，「歷史哲學」，「哲學歷史」，殆無不在他底研究之列，且旁及其他的哲家，做了多種的摘錄。像列寧這樣好學不厭的事實，這與中山先生在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以前，還在廣州那樣複雜而不愉快的環境，這能在親音山收復得有幾百種圖書以供他自己從事著作的參攷者，又有什麼區別？

列寧是這樣的艱難締造，建立理論，其最高的理想，不外要在世界上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解放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同時使世界上底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的重壓下抬起頭來。但我們必得認識：列寧這個人難道只是一個爲理想而空談理想的人物嗎？他一眼看定：沙皇底專制制度不獨，俄國即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因此他主張政治與經濟必須變革，下地同時解決，必須由黨去領導無產階級作武裝鬥爭，以顛覆俄國底君主制度，決不能贊同黨無產階級去作單純的經濟活動，而黨要作工人底領袖運動底「尾巴」，這是俄國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列寧之明白現實而能針對現實以求問題底解決，此其一。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寧到德國簽定了一個苛酷的布列斯特和平條約，當時托洛斯基布哈林這班人是極力反對的；但列寧必妥協爲之，這在他決不是對帝國主義有低頭，他實在是看明白了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如不爭取時間以充實國防底實力，蘇維埃政權即有崩潰之虞。這與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不顧英法美非難而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被德蘇兩國簽定了一個德蘇

決定，以爭取將近兩年底時間以充實自身底力量來應付這次國際變局，可說是異曲同工，後先一轍。列寧之瞭解現實而又能把握現實，此其二。到了一九二〇年之末，一九二一年之初，這個新興的蘇維埃國家，已遭受了三年國內外底夾擊，全國經濟簡直到了破產的地步，尤其為安定農民底情緒，不能不有一種切實的办法，否則是可以發生根本問題的。於是列寧乃移其應付軍事的手段，轉而應付經濟，而有所謂「新經濟政策」之產生。按當時新經濟政策底內容，與原來共產主義底理想，確實是有不小的距離的。但列寧應付現實計，乃不得不毅然行之，雖遭受着一般空想家底譏評，亦在所不惜。自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承其遺志，因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推行，其成績之良好，可以說距列寧當日所懸「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的理想，已經差不多完全達到了，否則決無應付「一次的大規模戰爭」。列寧之能理解現實，遷就現實，而無背於其理想，此其三。

綜上所說的事實，可見中山先生和列寧雖各懷抱崇高的理想，但一遇現實的困難，又莫不心慈手軟，不惜委曲折以出之，在今日回想起來，寧不足以發人深省？

要建立一個和平的，統一的，強大的，民主的國家，以與世界人類和平相處，這是今日我們全國人一致的要求，也就是全國人一致的懷抱。可是，我們要使這個理想圓滿地實現，無論何時，在戰後，在統一的過程中，在建設的規劃中，乃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所遭遇的將是一連串中的現實的困難。我們不應逃避現實，規避現實；我們必以正面對着現實去瞭解它，思慮它，委宛曲折地去努力解決它，遲急不得，更拖延不得，然後我們底理想才會不致成為一場美夢！

我們在本刊上發表的言論，將不會有任何非常可怪之說，我們雖有一面堅持理想，一面對着現實發言。我們底能力究竟能夠做到多少，所不敢知；但我們底方針必得向着這個方向指著。我們所要求讀者給予我們同情和贊助的，這是第一點。

二、為廣徵新知與師範我們先民底遺蹟。去今約五十年，中國一位文人而兼通官的張之洞，曾有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提倡，我們對於這種說法從未予以重視。因提倡者對於西學之為西學，其領域如何，一無所知；而今天的所謂中學，也早已異於五十年前的所謂中學了。在過去約半個世紀，中國學術界底維新與復古的兩種思潮，不是參伍錯雜，便是此起彼伏，曾演出過多少不必要的爭執，曾發生過多少不必要的戰爭，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似乎還隨時得見其一端一爪。其實世間決無可復之古，而今日所謂學術，亦初無國界與種別之分，中國人對於科學之必須迎頭趕上，且進一步謀所以自強其新知，這已經是天經地義，不必多費討論。然則我們為何還要說當我們將所知的時候，仍不可鄙視我們先民底遺產？這因為科學一部門（包括理論的與實用的，自然的與社會的）雖無國界與種別之差異，可是所以陶鑄一國家一民族之靈魂，文化，美術以及由其一國家或某一民族所居的土壤與歷史而形成的出於家的人生哲學，則甲國與乙國之間，究竟是有其差別的，而差法可以互易。我們覺得我們先民在「一方面」底遺產甚多，其所遺留給我們的遺產，實在是極其豐富。尤其是其文化遺產，是不忘的，便是由於我先民在「些方面」底成就，而「一方面」底陶鑄成了一種國民底根性，而其表現則最清楚者：

其一便是一種「寬厚宏博的氣象」。『道狹而志不相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依我我先民底垂教，我們中國人對於萬

話，且直接有貢獻於國家。晚近四五十年間，由海外僑民匯回內地的錢糧，或由僑商歸國所經營的實業，更直接補償了國家大宗的漏卮，潤澤了國內經濟界的枯涸。我略略研究過這一類人民生活，覺得他們大部是保存了中國從前那種勤儉儉實傳統的。這些事實，不願在這裏多說，下面所要說明的，乃是這類勤儉實業的精神在中國知識分子間的情況是怎樣的。我記得把「讀書人」與「寒畯」兩個人的「一個個辭底含義看成相等，這似乎是一國與兩界底未流，我先民底典故即從來不是這樣。凡同師弟間的問答，很少是全讀著作中心的，一部「論語」上而「學」字，大抵是指學做人，學做事，學明理，決不是專指讀書而言。因此「好學」必與「力行」相提並論，而「博學」當即「慎思」，則「辨」之後，必將以「篤行」，與言之，限定不「篤行」，則雖博學而無思則辨了，也沒有多大用處。顏回底「一箠以文」，這並不是說孔子專教他寫學生訓讀文章，做文章，凡「和飽底學生們說了一天的話，跑到這位姓顏的學生所住的窮巷去教訓，心裏覺得非常高興，這並不是因為看見他底學生在勤苦地研讀詩經的教訓詩，乃是否且顏回能把一五所學來的「一一見諸行事！孔子底這種教育宗旨，是何等的親切寄問。不可原定的溫家是如此，此外中國著名的學派如墨家法家也是極重實行的，更不必細說。將誤於清談，唐以來誤於詩文收士，宋元明約七百年間，誤於談天，談性，談心，談靜坐，最後更誤於試帖詩與八股文，於是學問與事功乃截然分開，而中國人才的表现，其已見於明証的記載的，自秦漢以迄晚清，乃一代不如一代，而外來的侮辱，也一代加強一代。顧亭林先生為清室開山，但多數的清儒只誤解了他底「博學於文」，忘記了他底「行己有恥」。亭林先生一生的行事是那樣的嚴正剛方

，「五能辦事」，何以多數的清儒只是那邪惡良，空留兩行？顏習齋先生爲清儒中興，儘管迂愚，可以當得起孟軻孔氏底心傳，何以自民學這第一代也生不出二流的？此種他，在談程朱可以沒有先說，並且猶疑地引到韓之江一而上海蔡氏開，而以宋濂，屬於一部門的，無論人言言言，無一不要求實事求是，從其種種空論而取的氣氛及標準變了，然而十年以來，雖有小變，以期應付一般社會度，以及嚴密字體而外，其餘一切政治以至教育，政府也反正是空虛的教育，而於國運的推展，更談不上與否問題的問題。與其如此，與其相爭，還不如是一存粹的一動而志願勵令全中國人民管理民權，都因循保守民權教義，大家來實行民主實行民主就好了，就大家來推行實行民主實行民主後再條理好手，為什麼一定要在學術上範圍子，以去長途客話而問世呢？我覺得這原來是問問白目的，是如平常最爲一般俗人所共知，用不着多加解釋，民權是民主，民權是民主，民權也還是民主，多去解釋即不是正確，不足信，所以要請其發揮其先民之精神，研究的精確，研究如何去實行，並且要實行到底，當然當於人心有

了。

其文藝價值，更可以證明中國人，在藝術方面，是極其發達的。不要感嘆一時西現象，以為中國人，都是會說西話，其藝術，國底光民，垂幾幾多，而中國人，對於之致力，乃是加倍的。從中國底詩歌，中國底音樂，（當然不是指時下的音樂）以及底文人，其以小品文，我們都可以領悟到一種純粹文學的氣息，這些東西所給予中國人這種品性的影響是很大的。中國人，在過去對於社會上一種原以找錢為目的的人去多找錢，不怎樣加以非難，（在今天當然也不可以）但對於從事學問或從事政治的

人而歡喜錢，則照例看不起。一個人要專心從事學問，原本無暇治生，但中國學者中的一派，却也不反對治生，甚至還有人認為學者治生為不可少。例如我上面提到的顧亭林先生，他便是一個一面治學一面又能治生的人，凡他生平足跡所到之處，如江北底淮安，山東底章邱，山西底雁門以北，五臺以東，都有他墾田的遺跡；還有人說從前那種山西票號底辦法，也是他所手創的。到晚年他卜居陝西底華陰，他底一位晚輩的親戚，看見他底年紀已經老了，勸他回到江蘇去，他寫信回答說：「使吾澤中有牛羊千頭，則江南不足懷也！」難道像亭林先生這樣偉大的人物，他還愛找錢嗎？這是因為他自己抱有一種不肯告人的空願，不願以私人生活之故，牽累了他底品格，所以他要自求解決，這正是澹泊清廉政的另一表現啊！說到中國底政治人物，凡中國史書上所表揚的那班「循吏」，自然無一不是以澹泊清廉作他們底基本立足點的，就是所謂「酷吏」，也不一定是貪吏，這因為所謂酷吏也者，他們是要以嚴法繩人，假如他們自己歡喜錢的話，他們便決不來了啊！諸葛武侯憑藉四川以圖中原，他對於當時的四川人却是嚴法以繩的，可是我們看看他對於當時的這個「天府之國」，他自己取了一些什麼呢？他在臨死以前，有一封遺表寫給後主，說他自己在外邊做事，一切生活所需都是取給於公家，自己並無私蓄，他死以後，成都還有幾百棵桑樹，可以留給他底子孫，他還有幾種乾淨淨淨的品物，所以中國人尤其是四川人至今還對他歌頌不已！明朝底張居正是多少有幾個錢的，但以他秉政之久，權位之大，我們看他那份抄家的清單，較之時代比他早一點的嚴氏父子，和比他後一點的魏忠賢，以及清朝的劉坤之類，也祇不算什麼了不得，可是仍不免為盛名之累，滿清對於漢人

在地方上作大官的是很忌刻的，當時在全國各主要地方設着防的將軍，其用意不完全在鎮壓老百姓，同時也在監視那鎮壓着地方官吏的漢人。例如太平天國時代，它在湖北用了一個胡林翼巡撫，同時便派了一位滿洲將軍去和他對立着。（這位將軍底大名我忘了）胡林翼選用他天才的政治手腕，想算他文應付過去；但駱秉章却和這位將軍弄得很不好，以致彼此互相參劾。後來駱死在總督任上，這位將軍奉旨前往弔唁，治喪，他看見駱秉章沒有攜帶眷屬，只帶着幾個家丁，就市販衣服和公服以外，別無長物！於是這位將軍感動得哭了：「原來是這樣的好人，我真對不起他！」四川底老百姓也感駱秉章死了，真有人痛哭，臨到他底靈柩運回成都，老百姓沿途擺着香案路祭，至今也還有人感念駱氏不棄。中國底老百姓是這樣能辨是非，能識好歹，誰說中國底人民是愚不肖？這說「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人民國以後，有三個人是澹泊清廉這一方面，也是使我們非常感動的：第一個是中山先生，他奔走革命數十年，及身見着他底事業有所成就，他做過中華民國底臨時大總統，也曾表示願接受做全國的鐵道督辦，後來做過大元帥，任過總裁，更終身做著國民黨底領袖，但他還始終只留下一所同志給他住的住宅和若干他自用的書牘，以遺留給他所親愛的夫人！其次是宋教仁先生，民國初年，他在北京任着國會裏一個少數黨底領袖，曾出任農林部長，最後他因他本銀行請子，要他隨便支用，他一不，不用不罷，老周又不領，於是支用少許，依然把指子支還，再其次就是梁啟超先生，他在廣東都督任內，所支公費與部下一律，每月只寄家用六元

，他死去不久，他底小姐和他底一位參謀長石階六先生底公子在上海結婚，內外各客一桌，一所弄堂房子底客廳便是禮堂，無任何可法目的婚禮；三四年前聽說松坡先生底夫人去世了，還幾乎弄得無以為葬哩！您以為他在雲南帶出的幾千個軍官可以戰勝全世界嗎？不，他底人格戰勝了袁世凱啊！我平日常說：個人願意多有幾個錢享樂享樂，這也可以說是人情之常，可是他更這樣做，當他在擇業的時候，最好不要擇幹政治，因為幹錢的路子很多，惟有拿從事政治作找錢的門路却萬萬不可。因為一個從事政治的人，不惟有機會近「權」，同時也替尋「名」，假如他除權與名之外還要有一「利」，這不只為諸議所不容，同時亦為造物所忌，一部二十五史會詳詳細細地告訴我們，凡利用政治地位找錢的人，其最後是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這裏不含任何的諷刺或迷信，我們以社會科學的見地是可以把這種事實解釋得清清楚楚的。據說今天的中國也還有人不免貪污，我們手無斧柯的書生或許對這種事實是無可奈何的，但我們要對那班政治清濁的先輩表示我們底景仰，以發揮我民族固有的美德，難道不是今天所需要，也是我們力所能及的嗎？

「言非一端，義各有當」，我們既主張在思想，學術方面培養民主的習慣，所以在本刊執筆諸同人底持論，在若干相反相成的方面，原無取於絕對的一致。但於廣吸新知之餘，不願忽視我先民底遺產，這却是我們二三十年一貫的作風，今後也不會有意義的改變。我們所要求讀者給予我們同情和策勵的，這是第二點。

三、為急於求治莫亂了必選的步驟。戰爭終於得結束，和平終於得到來，「民亦勞矣」，亂極思治，這不只是中國

人有此心情，凡愛好和平的人類，殆莫不有此心情。可是，望着勝利與和平到來的，整個世界有一大堆待解決的問題，每一個主要參戰的國家，也莫不各有一大堆待解決的問題。中國人對於解決世界問題的地位置與否，須視其自一問題的解決如何而定。進一步言之，中國在未來的和平世界其地位之被人重視是否一如戰時或光復之，必須視中國國內國際一切問題如何而定。關於這一點，即中國在未來和平世界其地位之被人重視與否，我們所設想的列於如下：

一、中國必須是一個和平統一的國家。
二、中國必須是一個和平統一的主權國家。
三、關於文化的增進，必須一面依據其國性而發揮其優良方面，一面廣吸新知，期於有計劃的逐漸達到與世界高度文化之國家底同一水準，而對人類是提供其有益的可資。
四、關於經濟的建設或開發，中國必須善用其豐富的人力，在無損國家主權的條件之下，覓取國際的合作，以期建立一工農繁榮的計劃經濟，一以求得民生問題妥善合理的解決，一以促進世界經濟底安定與繁榮。

五、中國必須建立必要的現代國防，以確保國家底獨立與主權底和平。

此等五大端，涉及政治，文化，經濟，國防各方面，而每一大端無不各有其複雜的內容。在甲乙丙丁之各端之間，又莫不各有其相生相克的連貫性。例如：欲實現和平統一，則必須民主，不民主或民主而成分不高，則和平統一之實現，必增加困難或減低其可能性。欲在中國實現高度的民主，則須視文化與經濟發展的情況如何而定。惟文化水準提高而可加強民主底精神方面，亦惟經濟條件是為始可加強民主底實質方面。

同時更要注意：這裏所說的提高，係指文化和經濟在提高的過程中，即得以民主的態度出之，否則即令提高，不獨於民主的實現無益，或反而成爲實現民主一種更有力的障礙！至於所謂現代國防，則完全是統一性的，一個不統一的國家，即根本上談不到國防；一個內部不能實現和平的國家，即根本上無暇從事於國防；同時，以國防建設之有賴於高度科學與重工業，便更可知國防底強度，必須視一國文化與經濟底進度以爲差。六十年前，中國初建海軍，赫德即警告嚴又陵說：「海軍者，一現代文明國家所開之花也，不着眼於根本，而徒着眼於枝葉，決無是處！」赫德是英國人，英國是海軍國，嚴又陵是在英國學過海軍的，赫德這幾句簡單的話，已洞見甲午一役底勝敗於幾先，以當時清廷底積弱，一般士大夫之糊塗，恐怕除掉嚴又陵還極少數人而外，真能了解這幾句話底意義的，實在沒有幾個人。即號稱略識外情的李鴻章且不足以語此，其他自然更不用說了。甲午以後的中國人，一方震於日本改革的速成，一方又不勝其嫉視而時欲攻其所短，於是中國人有幾句最歡喜說的話：「日本人是一個沒有創造能力的民族，舊的文化是抄襲中國，新的是抄襲西洋。」不錯，這幾句話並不是百分之百不合於歷史事實，可是我們也不可因爲日本是我們當前的敵人，即失掉了我們反省的良知。西洋人底船炮戰利，這是我們東方一開始與西洋人接觸，中國人與日本人即同樣的認識的，也可說中國人比日本人還認識得更早，可是日本人認識了這一點，便懂得問：西洋人底船何以堅？砲何以利？於是便發奮去學習別人底科學，而其時的中國人却還在搖頭擺腦地高誦八股，希冀揣摩着主考官底意旨，博得一箇正途出身。中國人由於這一個錯誤，於是在六十年前是忙着購船購砲，一直到六十年

後的今天也還是忙着購飛機購坦克！我相信，今天有少數的中國人已經懂得單靠購船購砲購飛機購坦克決不足以建立現代國防了，這因爲已經有人在提倡實用，提倡技術，而其對實用和技術所存的希望，便是要中國人也能自己造船造砲造飛機造坦克。可是別人底實用或技術其所以能夠有日新月異的改進或發明，乃是靠着在理論方面在那裏不斷的深造，假如我們只看見實用的一方面，忽視了理論的一方面，則比較六十年前所若干設施，猶是百步與五十步之差，求其有所創作依舊是不可能啊！懂得西洋人管理國家底方法良好，這是日本人比中國人略早一點的，因此在七十年前，他們已訂了一部管理國家底基本大法，這也是經過他們長期的奮鬥和多方的難處的，而底憲政，却至今還在座談的階級，而懷疑其結果者且大有人在。五四運動底前後，去今已二十五年了，當時明白的中國人已高呼着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可是到了今天，要在中國實行真正的民主，仍有待於全國人一致努力。

至於說到科學，拉戰以來我國大學的數目不惟沒有減少，而且略有增加，可是目前若干的新舊大學，天天在圖書儀器鹽的飢荒，究竟能有幾少研究學術的空氣，我們實在不能不說；回國的留學生，在科學方面路，成績的，人數也不算太少，但現在他們因爲迫於生計，已漸漸放棄了科學，而改爲經商，在轉移到外國人底中國所開辦的工廠中當公賬房。本來拉戰前中國已漸漸有若干研究科學的機關，近年來科學的無法培植，其現狀如何，似乎也無可進退之望。凡此若干的嚴重事實，我們底負責方面，大抵並沒有予以充分注意，否則若干已有成就的人才不能得到切實的教育，使之盡其所深造，却偏着錢造送大批不成就的尚未可成青年出洋，已有的大事

不會弄到不知何有錢創辦的大學；這實在是不可解的事實。

上面種種的說法，我們不過是舉例而言，我承認急於求治是今日無間朝野一致的要求，我們之所以要從事或提議，其目的在要求注意第一步驟」。這裏步驟兩個字，不是意存延宕或敷衍的人們所得藉口，其正確的意思是「腳踏實地」，是一計劃周詳，其包含着「用人與用錢的經濟」。反過來說，不是一束錢而結，不是一顯此失彼，不是憑着個人或少數人一時主觀上的一心與重利，而是必須依據着客觀的可能與必要而求其切實有效。老實說：我這個「步驟」觀念，是受着「們自己過去五十年一切失敗的教訓而學的，是受着我們底數人七十年來的苦戰尤其是受着蘇聯二十年來的磨練而學來的，這東西是由於我們所謂「迎頭」上一步一個重寶註腳。中國要建設，要起快建設，這是人有同心，但在計劃如何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得以前進民主的總度。實言之，要設立一個新中國與建設計劃，必須有方法集合全國人才的精粹，甚至有若干方面這要利用國外的專家來共同商量，以求得全國人民的一致贊助，同時也博得友邦人士之贊助。假如只由少數人關着門去瞎想，其結果長期有效，也許暫時引來山外有說者的譏諺。這是中國今後一個死活問題，我們必得謹慎而又謹慎。

這幾文字，我已拉拉雜雜地寫得不少，尤其最後這一段，我想說而未說的話還很多，甚至連所舉的事例，也經過刻意的選擇，只因爲我完全知道，以現狀論，實在這不是對什麼事都可暢所欲言的。

歸納在本文中三點主要的意見：所謂「爲實現理想莫忘了現實」，是說叫我們希望大家對於當前一切的問題，應多從事實上去觀察，千萬不要空談原則而流於惡氣，因爲一流於惡氣，

儘可以爭到各走極端，可是結果事無定準事實，並不因爲一爭即可得到適當的解決，俗言之，我們還是希望各方面逐漸趨向相忍爲國的精神。第二點所謂「爲民計」，所知莫如想我們先民喪遺產，這並不是我們想在保守與急進之間求得一種折衷，我們只是證明現在今天的一國，應該喚起大家有一種歷史的責任，我們相信中國歷史上有着許多政治人物，他們以態度，爲千古而當新的。最後一點所謂「爲急於政治變遷」，了必變的步驟，這並非我們深感過去五十年政治的失敗，而是想明白國則必當獨立規程，尋求條理，不致爲人牽制，而能自定其方針說來，我們對於現狀沒有無聊的意見，也並非我們對於現狀說，我們承認勞苦之當尊重，但增進其不平等之地位，我們希望儘管很大，但對於國家對於民族之不安，我們希望。我們在本刊底言論，大抵是由於一種不安的心態和苦衷而表達出來的一些真實的說法；對，希望國人垂注；不致爲人所利用而爲教。

二
八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確立中華民國對於四強系統之關係及其地位

張君勱

吾中國之發憤爲雄，有志自躋於強國之林，自今日追溯而上之，可謂第四次矣。戊戌百日維新爲第一次，民國成立爲第二次，北伐告成爲第三次。今則吾國爲四強之一之稱號，出諸英美政治家之口，載諸國際文牘之中，較諸以上三次，其周遭之形勢，有不可同日而語者矣。

以上三次之所以終敗，簡單言之，不外理解不透澈，心志不齊一，宗旨不堅定而已。戊戌政變，百日而廢，清廷母子不和，反演成宮廷悲劇，證之以當日反對之聲浪與義和團之排外，可謂舉國之中，對於世界趨勢與吾國所以自處者，茫然無知而已。自是清廷不保，辛亥革命，而有民國之成立。羣情翕然，謂政治上之日新月異庶幾遇之。然第一任大總統之袁氏，心懷叵測，始之以效忠民國者，終於帝制自爲，於是國家之陷於紛擾者十又數年。十三年北伐，出於國共之合作，其政見之近代化，遠過於清廷與袁氏之上，不幸中更變亂，始合終離，益以各方意見難於接近之故，卒不得不以兵戎相見。

東鄰視我之不足有爲，而九一八，而一二八，而華北自治，而八一三之戰起矣。由此言之，前二次之所以敗，由於蔽聰塞明，後一次之所以敗，由於心志不齊，宗旨不定。蓋每一政治運動之所以能期於有成者，理智之明晰一也，意志之齊一堅定二也。必此二者具而後吾國乃能成爲大國成爲強國。

雖然，所謂強國者果何解乎？其條件如何乎？其權利如何乎？其義務如何乎？舉要言之，不外乎地大物博，兵精財富。如俄如美，兼此三者而有之，如英倫則爲財富之國，如德則爲

兵精之國，如法則財富不如英，然駕其他國而上之，兵精不如德，然亦差勝於其他國家。此所謂強國之條件也。世界遇有大問題，大戰事起，所謂諸強國者或開會以圖排解，或互相對壘以武力決勝敗。舉法國革命以來諸強之地位與分合言之，所謂一八一五年之維也納會議，則奧、英、普、俄、聯合以抗革命的法國也。一八五三年哥里米亞亞戰起，則英、法、奧援土以抗俄之伸張勢力於巴爾幹也。及一八七〇年，普法戰起，則英俄兩國各處超然地位，聽兩國之自爲勝負而已。自是以後，德奧意訂三國同盟之約。其與之對峙者，爲一八九五之俄法同盟，及一九〇四年英亦加入，乃成三國協商之局。第一次大戰後，奧匈帝國已瓦解，俄以革命，德以新政之故，此三國退處於歐洲協調之外。其爲歐洲之強國者，獨爲英法意三國，其新興之國如波蘭如捷克則第二等國而已。時則遠東之日本，以參加對德戰爭之故，爲巴黎和會中五大強國之一，及華盛頓會議開會，日本駁毀與英美並駕而馳矣。如是十九世紀以來，歐洲所謂強國者，英則自有其久遠之歷史，俄則有其廣大之土地人民，法則有其路馬十四以來歐洲文化牛耳之地位，此其立國根據較爲深厚者也。至於奧匈帝國，以其包含人種複雜之故，終於潰裂而亡。德自一八七〇年以來，統一德意志民族，將代奧而興，然以窮兵黷武之故，一敗於一九一八，再敗於此次大戰之中，已難保持其爲大國之威望矣。吾人據今日之形勢觀之，歐洲之第一等強國，除英俄二國外，他如法德者，當視其戰後恢

復之能力如何，其餘若意、若波、若捷、若巴爾幹諸國，惟有俄門磅戶以圖自保而已。歐洲之外則有美國，一試其鋒於第一次大戰，再試之於此次戰爭之中，其他位介於兩洋之間，其資源豐富，其工業發達，其人口混合歐洲各族而富於朝氣，自與英俄兩國成爲世界上鼎足而三之勢矣。

吾國自簽字於聯合國宣言之日，羅斯福總統有歡迎吾國爲四強之一之語。其後俄京莫司科宣言，吾國追隨英美俄後，爲簽字國之一。開羅會議，許之以數十年來各項失土之恢復，是北美合衆國以及英俄同屬望於我國列於強大家之林，固已無疑義矣。然吾國之所以得此地位，由於吾國當局堅持抗戰不屈於敵人之故，謂爲外交上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可也，謂爲內政上之實至名歸不可也。蓋世界各大國之所以成爲強國，大抵由其勵精圖治之所致，國內確保和平，經濟足以自給，兵力足以致勝；如日本之因明治維新而制勝於中日日俄兩役之中，如德國因俾斯麥執政之後，三勝其隣國，其兵力固已稱雄中歐，而其工業與科學，亦駕人而上之。一九一七革命後之蘇俄，始爲各國所排斥，終以三個五年計劃之成功而爲英美所重視，今已驅其敵人於境外，而人莫之敢侮矣。可知內政上既善成效，而後外交上成爲強國，自爲程序之當然者，反之因戰時各國求友之故，同盟者以強國之名加諸我身，則因吾內力未充之故，而議者振振有辭。不獨外人如此，即吾國內之議者何嘗不以負虛名而受實禍爲深懼乎？

最近英國「經濟學者」週刊著文，題曰「何謂強國」。據路透社所傳如下：

最近「經濟學者」報根據統計方法，討論四大強國之比較的重要性。其題曰「何謂強國」。該報指出此次戰爭中，無一

小國能抵抗軸心國之攻擊，支持數星期以上者。

此文第一按人口，第二按國民所得，分各國爲若干類，同時告戒吾人勿以人口之多，勿以領土之廣，爲強國之惟一標準。其次謂國民所得一端，亦不足爲強國之正確標幟。何也，在若干國家中，其國民所得雖足以維持其民生計，如印度如中國是，除此而外，可藉貯以投諸事業中者，則爲絕無僅有之數。反之如英國者，據此次戰事經驗之證明，國民僅恃其所得之一半，已足爲餬口之需，其餘一半以之爲供給國家實現其政策之用。

該報又特指中國而論之，中國在現在聯合國同盟中，列爲四大強國之一。所以列中國爲強國者，有其他原因，非以其具有強國之地位故也。中國之加入戰爭，視其能聯合國爲特久，其受禍亦特甚。中國本非強國，然受強國之直接攻擊而不至敗亡者，只此一國而已。所以列中國於聯合國之內者，以之爲有色人種之代言人，自有其顯著之利益在也。

然中國不足爲強國，即在數十年之內，因戰後之解放，中國獲得內部團結，與經濟開發，猶不足爲強國也。以現時列中國於強國之中，遂視中國爲強國類之一個，而他國所以倚重之者，超過於其實力之所具，則將有危險隨之而來矣。

此篇文字，國中讀者深覺外人稱我爲強國者之反覆無常，因此胸中憤激者有之。吾人竊以爲根據吾國傳統哲學之見解，應深知積中形外與不患人之不己知之義，正不必其一名之或予或奪，而有所喜戚，倘更瞭解莊子名者實之實也之義，即有其實，亦且不樂於有其名，其所以逃名而遠禍之意，尤深遠矣。吾國所以得此強國之名號，由於吾國抗日努力之結果，以雲端坐椅俎之間，判決各國之是非得失，其爲禍爲福，未可知也。

今世之所謂強國，負有種種之義務，或與人聯盟，如第一次大戰前之德奧同盟，英日同盟，法俄英三國協商，或判決他國之是非曲直，如柏林會議解決波士之爭，巴黎會議之五強解決各國疆界之劃分，或因某國之內亂，各國共同出兵，如庚子拳變時之八國聯軍，如俄國革命後之各國干涉，凡此種種之參加，皆與各該國之兵力財力運輸力息息相關，其在實力不足之吾國，與其多管人家閒事反不如整飭自己之為得也。此所云云，非謂吾國應閉門閉戶不樂預聞外事之謂也。此次戰事之後，國際和平之大機，勢在必成，以吾國在戰事中之地位，自不能置身事外，所謂國際組織國際警察，自為吾之義所不容辭，然其所以參與者，有其一定界限，曰國際組織中各分子之共同義務，為吾國所應負擔而已。以云自命為四強之一，判斷歐美國家之是非曲直，如對俄波疆界之爭，或相波或相俄，不獨得罪於俄，亦未必有利於波，更如對意大利政府之承認問題，對法解放委員會承認問題，蘇俄與美英間，各有意見之異同，在吾國立場言之，自當從容靜候，俟其水到渠成之日有所表示可矣。所以舉此三者言之者，藉以明吾之所以列于強國者，自有限界，正不必以人之拉攏為可喜，反不若出之以謙讓永遠之態度，而人亦自知所尊重之者。由此言之，吾國對於四強系統之關係，自與美英俄大異，對於可參加與不可參加之事項，應惟悉分厚薄別之不嚴，豈有因稱觀之不克與人並肩，而遽示人以快快不平之色乎？

今日吾國之急務，決不僅在爭外交上之名號，爭國際間之地位。其第一要義，則闢自己內部之充實，國防也，金融也，財政也，農工商也，科學與其他學術也，力求其與他國並駕齊驅，此等事原不可一蹴而幾，然先以立志，繼以按步之上進，

必盡去民國以來連年內亂之局，而并心合力於政治上之安定與進步，此則吾國人所以立國於世界至少限度之必需條件也。方今戰事雖未了結，試閉目以思戰時與戰後之任務，（第一）戰時，（甲）反攻前軍隊之重整；（乙）軍火運道之開通；（丙）收復失地之戰略；（丁）兵役之補充；（戊）後方民食之維持；（己）金融物價之穩定；（第二）戰後：（甲）淪陷區收復後之善後事宜；（乙）中央行政延長至甲午失地及九一八失地；（丙）整頓陸海空國防；（丁）樹立國防工業；（戊）實現工業化計劃；（己）穩定金融至戰前水準。凡此十餘件大事，無一不需多方面之籌備，而後能期其有成。第一就國防言之，陸軍少師，海軍多少船艦，空軍多少隊，陸軍武器自給之計劃如何，鍊鋼廠如何，砲廠如何，現時全部陸軍人才應否重加訓練，參謀部之地圖如何，海外之軍事情報如何，空軍海軍方面之所應籌備者，亦與陸軍同。第二，就工業化言之，欲發展工業，不能離開鋼鐵，動力，機器，與工業所需之各種原料。工業約可分為製造工業，交通工業，與礦業。製造工業之要者為機器為動力機，次之如紡織，如化學工業。交通工業之要者為車軌，車輛，火車頭，及汽車等。礦業則有煤、鐵、油、與非鐵金屬之別。吾國所以從事於此者，其先後輕重之次序如何，就吾國言之，尤不能缺少技術人才之養成與資本之增加，不知今後政府對於國營民營之界限如何劃清，所需要之機器與資本如何籌劃，將借資于異國歟？抑依靠國民之所積蓄以成資本歟？由以上二例言之，可知戰後之行政，千端萬緒，其甲乙丙丁戊己之間，無一不互有關係，欲整頓國防，不能不增加稅收，欲增加稅收，非國民生產事業發展不可，欲發展生產事業，非金融安定，非法律有保障，非人民有企業心，官吏有操守不可。

。質言之，視乎吾國能否有良政治而已。

良政治者，一切國家活動與其事業發展之母也。何謂良，何謂不良，或因時因地而異，俄之所謂良，非即英美之所謂良，英美之所謂良，非即德日之所謂良，然有其斷然不疑之共同根據在矣。第一，內亂頻仍之國不能有良政治；第二主權不統一之國家不能有良政治；第三政權之更迭不能于和平狀態中行之者不能有良政治。所謂平和狀態中行之者，政府中之前任後任，依據國家基本法，從容揖讓以辦交代，如是非政府與人民共同遵守憲法，不能有良政治。此數者不論其為蘇俄與英美，無不事同一律，質直言之，國家應有秩序，而不應在混亂中過生活而已。

既有秩序矣，其為良政治之第二要素曰進步。吾人處此日新月異各國競賽之世界中，惟恐一刻一事之後人，今年之國防，應較去年進步，今年之工廠數目，應較去年增加，今年之科學發明，應較去年新異，今年之工業技術，應較去年改進。進步之問題，亦曰人人爭自磨礪，以求有所建樹，而國家所以識拔獎勵之者，惟以才不才為標準，而不應稍有褊袒以妨礙賢路。反而言之，夾雜或黨或派之私心，為黜陟進退之標準，則不免于不才者獲選，而才者被黜。而心力財力耗之于猜防之中者不可勝計，將何以達進步之目的乎？

凡此秩序與進步二者，猶人之二足，一直立而一前進，如車之二輪，兼有支持與馳驅之兩種作用，此即二者缺一不可之謂焉。近代國家一方實全國人民以服從政府，他方界人民以批評與進退政府人物之權利，是為言論自由，議會討論，選舉時對政府之信任或不信任。一方有中央政府以統一全國，他方則許人民以地方自治之權，俾得自處理其政務且收因地制宜之效

。一方則遵守法律為人民之義務，他方則議訂法律出于人民代表之自由討論。一方人民有不得反抗政府之義務，他方則人民有批評之權利，有思想之自由。一方保衛國家為人民共同義務，然他方對外宣戰與否，應視輿論之從違與議會之同意。一方強迫全國人民同受義務教育，他方則許大學以學術研究之自由。一方國防為保全國家之要具，從軍為人民之義務，他方國防經費之通過得人民同意，徵兵法亦經議會之同意。凡此兩方，互相夾輔，而後一方收全國統一之效，他方其全國人民咸覺我之意見已有一部分參加於其中，自能相安相忍，同戮一政府而為之效力矣。

近世之所謂強國，如英美等，不獨國基統一，秩序井然，且人民自由活潑，各處所長者，皆以立國方針上兼具秩序與進步之兩種要素也。如美國者，羅斯福總統一旦任滿，美人定能按其法定時日，于平和秩序中另選總統繼任，而不至如南美西班牙的共和國以武力為政權交替之手段者可知也。又如英國之總理更迭，鮑德溫去，張伯倫起，張伯倫去，邱吉爾隨之而興，決無如吾之民國初年之總理任命國會所可為總統所否，總統所可為國會所否者以致造成政局之紛擾又可知也。此種政權更迭行之於一種和平交讓之空氣中，吾人可名之曰政治之安定性，或曰制度的繼續性。英美賴有此安定性繼續性，故國家基礎日臻鞏固，國家事業日益發展，而不聞其有因部分裂自相殘殺以自消耗其國力與資源于紛爭之中也。反之有廣大之領土矣，不統一於一政府之下，而如昔日軍閥之據地自雄，將何以成其為強國乎？有強大之陸海空軍，不統一於一政府之下，而各自分裂以為奪取政權之資，又將何以成其為強國乎？國中資財蠶蠶之工商業，不成為一個國民經濟單位，而視之為有力者財源

之所自出，又將何以成其強國乎？由此言之，國家之建設，莫先於統一，而統一之關鍵，在乎秩序與進步二者之並存，或曰權力與自由之調劑，有此二者而後政治的安定性，庶幾能達到矣。

由此言之，吾國今後所以保持其在四強中之地位者，在一般人之意見，曰應有強大之國防，曰應有發達之工商。此二者雖是而未盡焉。甲曰日人之所以敢於侮我，由吾國陸海空軍之不具，苟其有之，則彼等且不敢奪取東三省，更何論乎黃河長江之腹地。吾人鑒于七年來戰爭之酷，與失土收復後之防守，惟有以精兵秣馬整頓國防為第一要務。乙更繼之曰國防之擴張，賴乎財富，故發展工商業，實為本中之本，現代軍備不離大炮飛機，砲廠飛機廠萬不可缺，而砲廠之製造，不離乎鋼鐵與機器，故工業與國防，謂為子母之相生可焉。況乎富力既充，然後人民有納稅力，而後能負擔一切國防費用，則所以富其民者正所以強其國焉。凡此甲乙之意，實出於身受戰時痛苦閱歷有得之言，其為吾國所當採取而必行之政策何待論乎？然所謂國防者亦曰軍權而已，所謂工商與金融等事，亦曰財權而已。此二權為天下之寶器，人人以為操之自我為快意，其所寄託之處，厥為政府，惟政府有憲法根據而為人民所信賴也，則軍權為國家之軍權，而非一派之軍權，財權為國家之財權，而非一派之財權，試問如英美兩國中，曾有何派何人，以其軍權為一派所私有者乎？更有何派何人以其財權為一派所私有者乎？軍權之使用，必出於人民之同意，財權之予奪，有法律為之保障，而後此二權自成為國民之公器，人人所共享受，相與擁護政府之不暇，更有何人必圖據為己有而後快者乎？如是國防擴張與工業發展之前提，即為根據憲法人民所共愛戴之政府之成立

是矣。

嗚呼憲法的政府，所以能使其國家有治而無亂，有平和討論而不至動武者，其關鍵在此而已。更為分析言之：（第一）以憲法為根據；（第二）時時詢諸民意，驗其從違；（第三）每年召集議會，以政策徵求人民同意；（第四）財用出入見諸公佈之預算；（第五）政府用人，一秉至公，其為閣員者有議會之信任，其為文官者，不分黨派，任之終身；（第六）更有獨立法院，為人民權利之保障。政府之組織與行動，能合此諸原則者，安有不為人民所愛戴乎？有此以憲法為保障之政府，以之擴張國防，則國防為全國人之國防，何至有爭奪之虞？以之整頓金融工商，其富力為全國可公有之富力，何至成為一部分人之私產，而互相攘奪？此二者逐年逐月繼續增高，國勢因之以發展，國基因之以鞏固，安有不為世界之強國者乎？吾人試問今日之國勢，視甲午如何，視庚子如何，視第一次歐戰如何，外交形勢之優勝，無有過于今日者矣。失土可以恢復，安定東亞之責任由我負之。可謂強國地位之外圍，既由盟國為之樹立矣。今後所應急者，反為吾國家內容之充實。其所以充實之者如何，曰國防，曰工業，曰科學，此其為立國之要端，固為人所共見矣。然此諸端之後，更有其根本之基本，是為政治的安定，是為憲法的政府。此則吾人願以在野黨之資格，與當局協力以求其實現者也。

（卅三年三月廿六日重慶）

民主憲政的原則問題

陳啓天

中國之有民主憲政運動，發端於甲午對日戰敗以後。到現在，已整整經過了五十年。在過去五十年中，民主憲政運動雖不無若干成就，但民主憲政的制度，迄今尙待完成，則爲公認的事實。這種運動何以經過了五十年還未完成？是不是由於我國人沒有政治能力？我想不是。因爲中國自建國以來，已有將近五千年的政治歷史。如果我國人真的沒有政治能力，便不能最早建立起國家，更不能使中國發展到五千年之久。不過我們試一回頭看看中國的政治歷史：西周以前，大體是神主政治。西周及春秋，大體是族主政治，即貴族政治或封建政治。戰國是由族主政治到君主政治的過渡時代。秦漢至清二千年中，大體是君主政治而兼軍主政治。以上種種政治，都是專制政治，可以統稱爲專制政治，或舊政治。我國人對於各種舊政治，都有自己創制的政治原則，也都有自己創制的政治制度，成爲歷史甚久的政治傳統。至於民主政治，即民主憲政，在中國政治歷史上有無傳統的根據呢？我們固然不可妄自菲薄，說中國政治傳統絕無一點民主政治的根源。因爲儒家的貴民思想，多少有點民主的意味；法家的法治思想，也多少與憲政有點相近。但是我們却不可過自誇大，說民主憲政的思想與制度，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換句話說，民主憲政的思想與制度，多是從外國輸入的。這種從外國輸入的思想與制度，與中國固有的傳統的舊政治，如族主政治，君主政治及軍主政治等，都截然不同，可以說是一種新政治。最先主張在中國實行這種新政治的人，

當推孫中山先生。他曾說：

余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故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爲民主。而二之決定，則以爲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而後可以開治。（見中國革命史）

中山先生不但主張中國必須實行民主憲政，并且爲實行民主憲政而奮鬥。他在清季所領導的革命運動，是爲實行民主憲政而奮鬥。他在民國以來所領導的討袁運動及護法運動，也都是爲實行民主憲政而奮鬥。其他近四五十年來一切參加政治革新運動的人物，也多多少少是爲民主憲政而奮鬥。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從事政治革新運動的人物，爲民主憲政運動已經流了不少的汗，出了不少的汗，總算受了極大的犧牲，付了極大的代價。然而民主憲政制度在民國元年開始建立以後，便漸次破壞無餘，至今尙未能建立起來。民國初元所建立的民主憲政制度，所以被破壞的主要原因，一般人多歸咎於袁世凱及北洋軍閥，固然不錯。但是我們再追究袁世凱及北洋軍閥所以敢於破壞新建的民主憲政制度之背後根源，即可以發現舊政治的傳統在暗中作祟，便是原來主張民主憲政的革命黨人也難免間有舊政治的傳統在暗中作祟的。所謂籌安會的六君子，有三個原是革命黨，便是一個鐵證。由此可知推翻舊政治的制度易，推翻舊政治的傳統難。要在舊政治的傳統之下，建立新政治，必須遭受種種波折。這是民國以來所以尙未走上民主憲政軌道的根本原因。我們既經知道這個根本原因，便須從這個根本原因

上想辦法，然後才能漸次建立起民主憲政制度。要想辦法根治這個根本原因，恐亦不易找着立奏奇效的急救辦法，只有逐漸創造新政治傳統以代替舊政治傳統。

關於新政治傳統，在過去五十年中，已經創造出兩大成就：第一大成就，是中華民國的名義已經確定，不能改變。第二大成就，是民主憲政的趨向已經確定，不能改變。今後所繼續創造的，不外將這兩大成就，逐步確切加以充實與擴大，使新政治傳統完全確立而已。要想確切充實并擴大新政治傳統已有的成就，我以為現在還須將新政治的原則，即民主憲政的原則提示出來，使一般人確切認識新政治與舊政治的差異究在何處。然後可希望一般人在共同認識之下，一面培養新政治風度，一面建立新政治制度。如果一般人，尤其是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對於民主憲政的原則，缺乏確切認識與共同認識，自難養成民主憲政的風度，也難建起民主憲政的制度。所以本篇以下要將民主憲政的重要原則，特提出一加研討。為使人易於確切認識起見，并將民主憲政的原則與非民主憲政的原則，即民主政治的原則與專制政治的原則，亦即新政治的原則與舊政治的原則，兩相對比研討。

第一、新政治是公人政治，舊政治是私人政治。我國舊政治從來着重私人。說得好聽一點，是着重人治。人治未嘗不好，但可惜所謂人，多是私人，而不是公人。私人是什麼人？即是一切有私關係的人。私關係愈多愈好，愈久愈好，愈深愈好，而不問其才能與成績如何。從漢上自皇帝，下至小吏，多半是用這般私人做「班底」，盡力壟斷一切。古語說：「一朝天子一朝臣，」即是說一朝天子有一朝天子的私人。又一古語說：「朝內無人莫作官」，即是說與要人沒有私人關係，休想作官。

。縱然僥倖作了官，也必為原有的私人排斥而去。如果偶爾有人能夠突破私人關係，而選用人才，便要被人推尊為聖君賢相，可見舊政治多是私人政治。政治原來是公事，需要公人來辦，才辦得好。所謂公人，是指一種有才學而確能公事公辦的人，不問其有無私人關係，也不隨私人關係而進退。新政治須力求這種人來辦，所以新政治勝於舊政治。只有新政治之下，才易於有公人進身與安於職位的機會，所以要用新政治代替舊政治。簡單點說，新政治是一種「天下為公」的政治。天下為公才能真正「選賢與能」。舊政治是一種天下為私的政治。天下為私，便只有任用私人了。這是新政治與舊政治在原則上的第一個大區別。

第二、新政治是公法政治，舊政治是私法政治。私法與公法兩個名詞，是從法律學上借用來的。但在此所說的意義，與普通法律學上所說的意義，却有所不同，這要請讀者注意。在普通法律學上，公法指憲法刑法等而言，私法指民法商法等而言。在此說的公法，則指法律的主旨，重在保障人民的權利；政府必須遵守之；私法則指法律的主旨，重在保障政府的權利，人民必須遵守之。換句話說，私法只以法自便，以法繩人，而公法則以法求公安，上下必須共守。依據這種意義的公法與私法分類，那麼舊政治上所用的法，則多是私法，而不是公法。從前有些人以為我國舊政治，不重法，不重法治。其實歷來的舊政治無一朝代不重法，不重法治。不過從前所謂法，多是私法，而不是公法；多是用法治人，而不是用法治己；多是用法保障統治者，而不是用法保障人民罷了。所以黃梨洲說：「三代以下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非法之法，前

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見明夷待訪錄原法篇）按黃氏所謂「一家之法」，即此所說的私法；所謂天下之法，即此所說的公法。舊政治重在用私法治國，重在用「一家之法」治國，強迫人民遵守，以遂統治者利欲之私。而新政治則重在用公法治國，重在用「天下之法」治國，上下一律遵守，以去統治者利欲之私。在新政治下所用的最要公法，是憲法或與憲法效力相同的約法，不過一部憲法或約法，是否真為公法，還要看他的實際內容如何。例如臨時約法，可算是一部公法。但袁世凱的新約法，在形式上雖是一部公法，而在實際上却是一部私法。因為新約法只是袁世凱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一家之法，常常因個人的起伏而興廢。天下之法，則不因個人的起伏而興廢。所以袁世凱一死，新約法便無人過問，而臨時約法却仍舊有人擁護呢！由此說來，新政治不僅是公法政治，而且是名實相符的公法政治。舊政治則澈頭澈尾只是一種私法政治而已。這是兩種政治在原則上的第二個大區別。

第三、新政治是公利政治，舊政治是私利政治。在從前的舊政治下，是由一個頭目，帶領許多隨從，奪取政權，以便壟斷一切利益，化公為私，化國為家。每個頭目的目的，都不外「打天下，做皇帝」以求能「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予取予奪」，「一悉天下以奉一人」。每個隨從的目的，也多不外「擊龍附鳳」以求能「升官發財」，「一子孫世享」。從前某政客發表世襲制時說：「北洋諸將惟欲擊龍附鳳，求子孫富貴。」這番話，可說是歷代舊政治的寫真，不僅北洋軍閥如此。因為舊政治多是如此，所以既是私利政治，又是創制政治與貪污

政治。雖偶有極少數的書生，想在舊政治下不剝削，不貪污，也苦於「獨拍不能成聲」。到最後，還是不免發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的嘆語。又有極少數的人，想用嚴刑峻法來肅清貪污，但結果也多無效。何以結果無效呢？不外由於舊政治的本身，原是貪污的。要肅清貪污，只在新政治之下，才有可能。因為新政治的本質，是為公利，是為民享，是為國利民福。至於個人從事政治活動，不過是為國家與人民服務而已。所以新政治，一面是公利政治，又一面是服務政治。在公利政治之下，難於貪污。在服務政治之下，不願貪污。所以貪污問題，便易於解決。我國最先倡導新政治的孫中山先生曾說：「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民衆謀幸福。因為不願少數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見民報紀元節演講辭）照中山先生的提示看來，可知革命以後的新政治，應是為民衆謀幸福的政治，即公利政治；要用革命推翻的舊政治，是專利政治，即私利政治。這是新舊兩種政治在原則上的第三個大區別。

第四、新政治是公理政治，舊政治是強權政治。照以上所說，舊政治既是由私人，用私法，以圖私利的政治，則利之所在，人均爭之，將何所持以求必勝呢？大概不外兩大法寶：第一是武力，第二是陰謀。陰謀必須附藉武力而使用，才易於發生效果。故最要的法寶，只有武力一個。武力萬能，是舊政治的基本意識。武力統一，是舊政治的基本政策。武夫走卒，是舊政治的基本人物。強者為王，是舊政治的基本理想。武力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戰爭。除武力與戰爭外，別無更緊要的事業，簡直成了一種武力政治，亦可稱為強權政治。在強權政治之下，沒有反對派生存的餘地。不投降，便殲滅。所以古語說：

「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對於反對派是寬大的態度，不過是一種假象，實從獨治。所以較強悍的渠魁，大多走「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路。強者爲王以後，反對派固絕無生存的餘地，即擁護者也未必都能安享富貴。因爲「狡兔死，走狗烹」也是歷代君主慣用的手段。擁護者在強者爲王以後，多半只有三條路可走，即不逃便辱，不辱便殺。例如劉邦成功以後，張良走逃的路，蕭何走辱的路，韓信走殺的路。功臣的下場，也幾乎與割據的羣雄差不多。故強權政治，又成爲一種最險惡而最殘酷的政治。強者爲王以後，凡與王有私關係而又非功高震主的人，都成爲特權階級，高高在人民之上。人民如不任特權階級予取予奪，便有一「兵刑」的威脅，此之謂「立威」。總之，強權政治要賴武力奪取政權，還要賴武力運用政權。武力一經衰弱，便要改朝換代，天下陷於大亂。我國近兩千年來的舊政治，大概不外如此。至於新政治，則與此種舊政治大不相同。新政治，也未嘗不講求武力，但只用之於對外國防，而不用之於國內政爭。武力超出於政爭之外，專門保障國防，爲全國人所一致尊崇。在新政治下，也有統治者，但不是特權階級，更不是固定的特權階級。人人平權，人人可以過問政治。人人可以爲統治者，同時又是被治者。在新政治下，也有競爭。但競爭不取決於武力與陰謀，而取決於主張與民意，取決於才能與成績，取決於法律與公理。新政治對於擁護者固不摧殘，對於反對派亦不殲滅。對於反對派，不但不殲滅，并且容許其生存活動，與自己同樣享有政治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權，以免其走出法治軌道以外。當反對派獲到多數的民意以後，即讓其上台，決不戀棧。當國家危急時，無論在朝在野，均須和衷共濟，一致對外。在野者既不可利用國難，推翻政府

黨。在朝者亦不可利用國難，消滅反對派。這種相互容忍的態度，需要彼此都用「國家至上」的精神，各自抑制黨派主義。如果不能如此，便必使政爭激烈化，而放鬆了共同的敵國。總之，新政治，在平時固只講理，不講力；在戰時，即對外作戰時，更只講理，不講力。所有的力，都要拿去對外作戰，決不濫用之於內爭。此之謂「槍桿一致對外」。新政治始終依據公理，解決國內問題，與舊政治的強權政治正相反對，故可稱之爲公理政治。借用舊名詞說，新政治是王道政治，舊政治是霸道政治。這是新舊兩種政治在原則上的第四大區別。

第五、新政治是民治政治，舊政治是官治政治。在舊政治下，君權無上，軍權次之，官權又次之，而人民對於政治，則只有義務，并無權利。君主統治人民，除用武力鎮壓外，還須一面以官治民，一面以官治官。官權雖次於君權與軍權，但其使命，是挾天子以令人民，是天子的代理人，故對於絕無權利的人民，官吏也有相當大的權力。地方官的主要任務是治民。治民的主要方法，是牧民。治民的主要目的，是催科。中央官的主要任務，是治官。治官的主要方法，是考察與參劾。治官的主要目的，在使治民的官吏盡力於催科。總之，在舊政治下，天高皇帝遠，人民只見全國是官，而官權又相當大，所以成爲一種官治政治。至於新政治，雖也有官，但官只是民的公僕。官在民之下，不在民之上。民權高於一切，官權隸屬於民權，且在民權監督之下。以民治民，以民治官，以官治事，這是新政治的三大要領。所謂以民治民，即通常所謂地方自治。關於地方政治，着重由人民自理。自治立法事項，由人民選舉的立法人員公議。立法不合人民公意，可由人民複決。人員不合人民公意，可由人民罷免。自治行政事項，由人民選舉的行政人

員辦理。辦理不合人民公意，可由人民做廢。人員不合人民公意，亦可由人民罷免。在地方自治範圍內，無論立法人員或行政人員，都仍是民，而不是官。一般的民，對於這兩種担任自治職務的民，可依照自治法規，隨時加以監督，使自治人員確實爲人民服務。所以說地方自治是以民治民。以民治民，只有民而無官，只有民權而無官權，故與官治政治完全不同，而是一種純粹的民治政治。或稱之爲直接民權政治。在新政治下，中央政治固不能如地方自治直接以民治民，固不能不以官治事，然亦必須以民治官。何以必須以民治官呢？因爲新政治原只認定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民權高於一切。如果不以民治官，則人民主權完全落空，與新政治的基本原則絕對衝突。所以要實施民主憲政，便必須以民治官。民主國家以民治官的必要方法，通常須有兩大種：第一大種，爲法定的民意機關，即以民選議會或國民大會，代表人民，監督政府。第二大種，爲法許的輿論機關，即人民得自由設立言論機關，如報章雜誌等，發表政治意見，批評政府設施。前一種機關，所以保障中央政治確爲民治政治，確爲民主政治，確爲民主憲政。後一種機關，所以保障中央政治確能隨時依民意而改進。這兩種機關，有一不具備，便不是民治政治；有一不健全，便不是完美的民治政治。在官治政治下，根本不承認民權，根本不尊重民意，既不設立法定的民意機關，亦不許自由的輿論機關，官要怎樣，便怎樣。如果官個個賢能，也未始不可爲國家與人民做點事。但可惜致之兩千年來的官治政治歷史，十個官難有一個賢而且能。真正賢而且能的人，不易插入官場，縱使倖插入，也以氣味不同，難於發展抱負，只有知難而退了。所以先儒說：「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又說：「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

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者，不可多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以屈，以挫，以訕。而貪婪退縮者，果曠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嘆者也。」這種浩嘆，何等沉痛。但是我們要知道，官治政治原來常依「人才反淘汰定律」而進行。何謂人才反淘汰定律？即在官治政治中，常是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常是獎勵貪惡懲罰賢能；常是壞人驅逐好人，正如格勒善貨幣定律一樣，常是一惡幣驅逐良幣。「賢能要在官治政治上抬頭，只有一點希望，即靠運氣；好比中百萬頭獎靠運氣一樣，真是千難萬難！要使人才不爲實際政治所淘汰，實非浩嘆所能爲力，只有一個好辦法，即是用民治政治代替官治政治。在民治政治之下，人才有自由培養的機會，又有自由發展的機會，不必走私路，亦不必相摧毀。誰能得着多數人民的信賴，便是誰在政治上顯身手。人才公平競賽，輪流主政，不思沒有機會。縱始終在野，也可效力輿論，促進政治。所以民治政治，又可成爲人才政治。官治政治，雖或標榜人才，不過其所謂人才，私人的意味多，公人的意味少。縱其爲人才，也須先爲私人，大變其質，何能顯身手？總之，新政治是民治政治，即民意政治與人才政治，舊政治是官治政治，即反民意政治與反人才政治。這是兩種政治在原則上的第五大區別。

第六、新政治是實踐政治，舊政治是虛偽政治。由以上五段看來，可知舊政治的真相，大抵不外一「私」字。人是私人，法是私法，利是私利，兵是私兵，官是私官，簡直成爲一團私。但是政治本來是公事，一團私的舊政治，如何能辦得下去呢？要勉強辦下去，除用私官私兵鎮壓外，只有用「假仁假義」來騙，這叫做「威德并用」。所以從前一個草澤英雄開始打

天下的時候，必定發佈極其動聽的檄文說他是弔民伐罪。有些人民聽信了他的話，「箝口塞聲，以迎王師」。但是新王即位以後，多半不過將舊的剝削者推翻，另換一批新的剝削者而已。有些書生恐新的剝削者佈滿上下以後，人民受不住，要造起反來，勸他們不要太剝削腐害了，這叫做「安民愛民」。在新的剝削者中，如有較聰明的分子，也接受那些書生的勸告，多少表示點「安民愛民」的樣子，藉使長期剝削，以成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但是長期剝削，只利於王室，而不利於官吏。官吏原是王室派到民間的短期催科人，不多剝削，便不能飽私囊；不大剝削，任期滿後便不能再剝削。機會難得，橫豎江山是皇帝的，擾民中飽又何妨呢？因此官吏擾民中飽，便成為常有的事。王室爲防止官吏過於擾民中飽，不得不定出許多「官規」來，要官吏遵守。又恐官規過於嚴格，沒有人肯代王室去催科，於是承認「陋規」也是官規。官吏對於陋規固竭誠歡迎，而對於官規則多設法規避，這叫做「辦公事」。辦公事的第一大祕訣，是勉求「公事」上說得過去，「而實際可不負擾民中飽的責任。所謂辦公事，又大多只限於辦公文。公文等因奉此，週到異常，無如實際不是那回事。報銷單據齊全，廉潔萬分，可是一行作吏，多能一生吃着不盡。一切公事，起於公文，也終於公文，轉了幾個圈子，沒有遇着挑剔，便算公事辦好了。因此公事成了公文，政治成了一「公文政治」。官樣文章，轉來轉去，既觸不着實際，又可可不負責任。在舊政治下，豈但公文多是假的，連講話也多是假的。所以一般人稱官吏的話爲「打官腔」。公文與講話既都多是假的，我們稱之爲虛偽政治，實不爲過。有的先哲看不慣舊政治的虛偽，想提出種種方法來矯正。例如儒家主張正名，法家主張循名責實，陽明主張知行合一

，然都很少奏效，是藥不對症呢？還是不可救藥呢？依我看來，舊政治演進到近代，已絕對不可救藥，雖有良醫，也莫可如何！原來舊政治之所以要「假」，實由於「私」。不私，便用不着假。要去假，須先去私。要去私，單靠說教勸告不夠，必須完全用新政治代替舊政治，使一切私無所假托。舊政治全是私政治，而不得不假公以行之，於是成爲虛偽政治。惟有新政治，才是公政治。人是公人，法是公法，利是公利，兵是國軍，官是公侯。一切皆公，故用不着假，故能實事求是的實踐，故能用科學方法去考驗。只欺騙，不實踐的人，在新政治下不易得到人民的信賴。既得信賴後，仍有輿論監督，與議會監督，使其不得不實踐。如果主政者，只有宣傳，毫無實踐，便要受人民的指責，不能繼續主政了。近代歐美行新政治的國家，雖也講求宣傳，但宣傳的背後確有實踐。實踐與宣傳的距離，也須相去不遠。所以新政治的宣傳，與舊政治的官樣文章不同。宣傳之後，即繼之以實踐。實踐以後，又復爲之宣傳。如此，則宣傳非欺騙，自然更爲人民所信賴了。總之，新政治，雖有宣傳，而仍重在實踐。所謂實踐，是用實事求是的方法，即科學方法，做出實際成績來，給人民考驗，所以是一種實踐政治，與舊日的虛偽政治截然不同。舊政治只有表面，而無裏面。新政治既有表面，又有裏面。舊政治表裏相反，新政治表裏相近。這是兩種政治在原則上的第六大區別。

總說起來，民主憲政的根本原則，共有以上所說的六種：——即民主憲政，必須是（一）公人政治，（二）公法政治，（三）公利政治，（四）公理政治，（五）民治政治，（六）實踐政治。這六種原則，正與我國歷史上的舊政治原則——即（一）私人政治，（二）私法政治，（三）私利政治，（四）強權

政治，（五）官治政治，及（六）虛偽政治，完全相反，所以可稱為新政治。若更簡約的說，新政治必須是公政治與真政治，而舊政治則只是私政治與假政治。舊政治既私而假，所以難有人治，也難有法治。惟有新政治，才是法治與人治合一的政治。因為他的本質，是建立在「公」與「真」兩個根本原則之上。中國原是一個舊政治歷史最久的國家，私與假的積習最深，雖與近代新政治國家競存，因有近百年的迭次對外失敗。孫中山先生有見及此，於五十年前，首倡推翻舊政治，實行新政治。因得於辛亥革命以後，「掃除積弊，建立民國。」不幸

新政治初建，即為袁世凱及北洋軍閥所破壞。而孫中山先生為實行新政治，與袁世凱及北洋軍閥奮鬥，至死不懈，實在不愧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大新政治家。現在繼承中山先生的遺志，以求改造中國政治的領袖，是蔣主席。蔣主席已於去秋，決定發動全國，準備實施憲政。這實在是中國政治前途的大曙光。時機難得，不可錯過。我們雖非國民黨員，願以至誠，呼籲全國各方，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協力推進憲政的實施，使新政治得在中國早日建立起來。那不但個人的暫時成功，而且是國家的永久成功了。

悼 亡 廿 絕 (一)

為亡妻宋靜芳女士作

慕 韓

外家梨棗記曾攜，竹馬同遊畫閣西，最是難忘阿母愛，邵湖風月勝連谿。
 少小橫遭憂患侵，全家半向粵江沈，歸來舉目誰青眼，獨有涓陽恩義深。
 紅杏園中滿國香，居然坦腹臥東床，謝公最小偏憐女，竟為黔婁理嫁裝。
 桃紅李白柳毵毵，辜負深閨夢未酣，堪笑元龍豪氣壯，一篙春水走江南。
 夢魂曾繞海西頭，風引舟迴願未酬，返棹家園重話別，吟鞭東指向瀛洲。
 海內爭傳寄妹篇，法京回首倍潸然，輾環四國歸來日，再別重逢已九年。
 烏髯舊事不堪論，遠望燈荒欲斷魂，若使著書無恙在，蘇髯應感魏城恩。

憲 法 與 婦 女

張 申 府

憲法上關於婦女規定應採的原則

一、男女絕對平等

二、不以性為資格——但對婦女所受歷史與自然的限制予以彌補的機會

三、保障生活的充實，以期養成高尚的人類美

我早年很喜歡談婦女問題或男女問題，而且很喜歡用驚人的題目，如「女子解放大不當」之類。有幾篇曾經印在我的一本「所思」裏，看過那本書的，大概都看過。其中有些意思，我曉得曾經很博得一些同情。現在我已老了，對於婦女問題或男女問題已不大感到興趣。但終覺有些意見仍願表示。而且深信其是，深信其為持平之論。並且相信，如果從事婦女運動的人肯採納它，一定容易達到她們的目的。就是因為我所持的是平情之論，而不僅僅是不平之鳴。

我的一個根本見解就是堅決相信：男女應該絕對平等，男女應該絕對平權，男女的不受生理限制而機會應該絕對一樣。或者說：男女對人類貢獻的機會以及為對人類作貢獻應有的準備的機會應該絕對平等。「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書經咸有一德篇)。這兩句對現在再好的話早已昭示在那兒了。

我認為：在關係國家一切人民而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國家的組織法，并且應是「衆人管理衆人事」的規則準則保證保障的憲法上，關於婦女的規定應以此男女絕對平等，一樣都得盡

其才力，為第一原則。「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民主政治可說是衆人管理衆人的事。因此所以民主的憲法應是衆人管理衆人的事的規則準則保證保障。」

固然男女的生理并不一樣，男女對於人類可有的貢獻也不一樣，但是一國的憲法主要關涉的乃是該國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其人民的生理。所謂絕對平等絕對平權本也并非完全一樣一樣的意思。民主，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民為主，或主權在民，或由民而治，民主的一個初步或準備原則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推而廣之，就是：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俗作權利，不當)。世界上最好的字典「袖珍牛津字典」在民主一詞下所下的注解就是如此的。假使在法律上男女還平等或不平權，那就太難乎其民主了！那豈不只是男子的民主，而非男女的民主或整個國家的民主或全國人民的民主了麼！我并不相信所謂人權。我只相信：民主的一個最後根據是人與人差不多，因此所以民主之下不容有什麼特權，尤其自賦的特權。

關於婦女問題或男女問題，如果我所信的僅止於此，那也就沒有什麼新鮮，并不必非表示不可。我的第二個信念乃是：男女都應忘了性(謂男女性別。以下我所說的性都是此意。不是說的男女間之某事，請讀者注意，不要誤會)。都不要不把性是說的女總放在心上，都不以男女的分別而歧視。都不要以性取，都不要以性予，也不要以性去。在無關生理的地方，既不要以性為一種限制，也不要以性為一種資格。尤其婦女，再不要

靠着性，靠着自己是女子，來要求什麼，在生理必要之外。我相信許多人會同意這個意見。但是我却還相信：假使只此而止，假使對這個原則不打一個折扣，不另有打點，那它其實是與第一原則抵觸的。

我固然堅信：至少在理想上，進步的婦女應該忘了性，忘了自己是女的，不拿性，不拿是女的，來要求什麼，而一般地只憑自己的能力學識經驗；不作一個所謂狹隘的女權論者，不要總是口口聲聲「我們婦女」「我們婦女」，也一般地對國家民族人民大眾擺在第一。但是對於忘了性，不以性（不以是女的）作要求的原則，我却同時相信：在今日實際情形之下，應該打一個雙重折扣，然後才能有合於男女絕對平等，才實現男女絕對平等。兩重折扣，一個是歷史的，一個是自然的。

過去，男女是太不平等了，太差得遠了。同時，在自然造成的生物中，男女的生理也太不一樣了，至少婦女有（主要的）生殖與（隨帶的）經期。假使把這些一切不管，而空言男女平等，而空訂條文男女平等，那男女一定平等不了。假使全忘了性，全不提及性別，那女子一定會吃虧。所以我常說男女平等以及一切其它人民一般自由權理（不是利，是義，是直，是應該的！），都是事實問題，而不僅僅是條文問題，想得周到，不面面俱到，是要吃虧的。可惜，也許我說的太簡單了，有些人全不懂。

假使把人類歷史，在現在新舊地作一個橫斷，把過去的一切都不管，把過去一切積下來的東西情形都不問；同時更把社會與自然，生活與生理，完全隔離開，而絕不因自然生理的不同有所規定。那麼，在這種情形下，就令訂定男女完全平等的條文，事實上一定是不會實現的。如果女的不在思想上已十分

進步，全不以性（不以是女的）作要求，那她一定不易有所得，就一般情形說。

這就好像兩個人，一個身體壯健沒有病過，一個久病初痊尚未復元，為圖平等的著名，完全一樣地生活行動，完全一樣地工作操勞。完全一樣地受教育上學校，久病剛好的人一點也不多吃些滋補品，或作些別的照顧之類。你想，那個久病甫愈的人是不是還是在吃虧或要吃虧？

今日的婦女所受的過去的影響，尤其壞影響，實在太多了。過去社會（其實就是男子）所給婦女的機會實在太少了，以致今日就給以與男子一樣的機會也不會利用。

我的意思只是說：要真正實現男女平等，必須顧及歷史，必須顧及自然，必須顧及生理，只忘了性別是不成的。為地補補其不足，必須補其不足，今日社會乃必須多給些以機會，必須對婦女特別優待些，對於婦女教育尤須多加注意。然後乃有真正平等之可期。（婦女給人類傳種本是人類的一個絕大貢獻呵！）

人類歷史是截不斷的。在自然與社會，生活與生理之間，也不能作斬然的劃分，認為有越不過的鴻溝。男女是要絕對地平等，男女之間是應忘了性，忘了他是男的她姓女的，在理想上是不該靠着性別有什麼要求。但在現實狀況之下，完全抹殺性別，實際上必於婦女有損。我認為憲法上必須注意到這一點，應該為婦女的機會別有所訂定，等到實際上男女真平等了，男女一樣地能利用平等的機會了，再修改也不遲。

不但在憲法上，就是其它社會各方面的生活中，國家其它各種的設施上，今日對於婦女都應該有所牽就，對於因應，以期漸漸男女步調諧調，而能力平等，縱然不可因此因廢舉而

致誤事害事。因此今日對於婦女有時要別有設置，別有打點，也屬事實之無可如何者。萬不可徒貪平等的美名而適實害。

要忘了性，也要不忘了性。或說：要忘了性，也不要太忘了性。這也是今日一條相反相成的道理，也是一個汰太之例，也同出於事實之當然。而所謂絕對平等本是說的原則，也可以說是在一切有關社會生活條件都一樣了的條件上。這樣子，所謂絕對的也就是相對的，也是不可以「太過」或「已甚」的。

同時，同樣根據歷史的理由，我也不能不希望今日婦女，尤其進步的婦女，肯把歷來的一切有關婦女的，或有關男女間的，思想，觀念，習慣，道德，都澈底檢討一番，切實重新估一回價，有所斟酌，有所軒輊，有所抉擇，有所取舍，有所揚棄。過去的社會（主要即男子）實在把婦女太害得苦了，以致許多本是對婦女有害的思想或習慣，至今許多婦女還會以為環寶，其實乃是壞包！就是有些在有些方面極進步的婦女今日也還不免充滿一腦筋的落後思想。這是歷史留下來的。這是由於社會限制。但這却是對婦女不利的。

在中國現代，在五卅以前與以後，婦女的情形以及男女間的關係，確已大不相同了。尤其近年的婦女，尤其近年的知識婦女，知識程度，一般言之，實已高得空前。但事實上，在思想情感與生活習慣方面，却仍大有澈底改進的必要。這固然有待於社會制度的更根本的改變，也未嘗不需要婦女本身更進一步的努力，更進一步的精進與猛進。而憲法上如開訂有有關的可以為保障的條文，似也未嘗不好。

舉一個小例來看。今日許多婦女還是體態輕盈，嬌娜多姿，華麗相向，不却脂粉。今日許多婦女不以不却脂粉為非，同時也有許多婦女不以不却脂粉為是。不却脂粉也許是今日許多

婦女各種各樣的生活所必需，也許是人生應有的點綴粉飾。究竟誰是誰非呢？這也許是一個末節，也許是一個無傷大體而實未必佳的末節。但無論如何，我相信：男女問題的解決一定離不開美。美與貞（即真。我在「家常話」中曾說：「真則貞，貞則真；不真則不貞，不貞則不真」）同是男女圓滿關係上斷不能缺。我也知道，有些婦女一定也不以此為然。這也且不管它。可是又什麼是美呢？「充實之謂美」（孟子盡心章）。人類的我一定有待於生活的充實。

因此我認為：這個充實生活以達高尚之美，也就正是訂定憲法時應該顧到的一點，尤其關於婦女。憲法本是會，也應該關涉到人的物質以至精神的生活的呵。好美是好的。如果好美而不高尚，那它的原因，最後一定是在生活上。我相信今日理想而有宏效的憲法一定對於人民生活的充實，訂有保障的明文。

我這些年最好說：哲學是講原則，講可能的學問（後一層乃前後相去正二百年，同同情於我而為我宣傳的渥爾夫「Chr. Wolff 1679-1754」與羅素「1872」同為哲學所下的界說），弄懂了哲學的人總好講原則，講種種色色的可能。猶之乎數學是最謹嚴精密，剖析豪釐，豪釐不苟的學問，一切學問都要作豫言，而數學是在作最近最一般最深入最微妙也最切實着實的豫言或豫言的模子的學問，與數學其實屬於同一類類的邏輯也在發見型式以系統整，體陳型式以待充實，於是弄慣了算術與邏輯的人也就總喜歡不苟而好作豫言，好表見實而非空的一般型式，而不輕於推。——啓迪與指導一切科學，為其方法，為其模範的數學與占卜算卦的數學，實在是這門的本家。——這箇東西也只是講的原則，但具體內容未嘗不就在裏邊

。雖只講的可能，但未嘗沒有孕育着現實的事實。

附記：濫用「性」字，嚴幾道早已呵斥過，我是極端同意。誰料今日用性字之濫，更遠遠過嚴幾道當時。像什麼可能性，重要性之類，都是新生的，我是絕對地不用，雖然好新莫過於我，雖然我也相信字義是社會的，是變的。本篇用性字，實出於不得已。根據「修辭立說」「辭達而已」之義，如果改易了仍可表達我的意思，我已盡量改易，或加注語，如云「是女的」之類。歐文S.至少已有三意，有時可譯為性別，可譯為男女（雌雄），有時却非以一性字譯不可。譬如「女性」，就不可改為「女性別」。可惜什麼性交，性慾，性病，性史，性學，性心理，性教育，性道德，性生活，性的問題，性的苦悶，性的壓迫，甚至性的自由，性的衝動等等，太流行了。（在也是由

我最先介紹來的以講性著名的賽羅乙德老夫的新學術「必解」中，用此性字作區別字，還多得很多。）其實，這些字本也不全是指的男女精精，有些就須解為男女或男女關係。譬如頭一個「性交」，如不解為「男女交」，而解為「交媾交」，豈不就「不詞」或不通了麼？只是這種的男女交，不待言，乃是一種特種的男女之交罷了。這些全弄清楚，是不容易的。總請讀者善喻，不要誤解為要。本篇中所不說不說的性，總是像篇中加注所說，是「是男的或女的」的意思，而無與於性交或性慾。袖珍牛津字典在S.下的兩個注解就是「是男的或女的」與「男的或女的」，集體來說」。

（三月十一夜起稿）

悼亡廿絕（二）

慕 韓

好客家風本祖傳，敢希北海醉翁賢，關中賴有同心侶，斗酒儲供賦百篇。
相攜遠難赴幽燕，三歲嬌兒絕可憐，一箇西河明欲喪，黃鳥天奪忍言玄。
將母甘攜愛子歸，沱江一棹去如飛，峨眉月照孤鴻影，流矢遙憐血濺衣。
烽火猶懷甲戌年，嘉陵江畔聽啼鵲，公轅墨翟俱陳迹，缺月欣看一度圓。
白河明月照離鸞，巫峽啼猿淚未乾，已是孤飛同獨鶴，金丸何事忍頻彈。
六詔溫泉沸若湯，蠅蟻江畔浴鴛鴦，升菴伉儷曾游泳，我亦安寧伴孟光。

討論憲章應有的態度

擇仁

近兩個月來，各地關於憲章的討論，情形頗為熱鬧，我們聽過不少議論，讀過許多文章，所得到的啓發，自然也不算少了。不過，在平心放慮或靜坐思時，我們總覺得不十分滿足，好像有什麼缺憾似的。這種感覺的原因，依筆者體會所得，似乎主要是由於諸位討論憲章的人士，在若干應該具有的根本上還沒有完全一致的緣故。這種根本態度的不一致，小則可以使憲章的討論不能普遍而熱烈的展開，大則可以阻礙憲政的推行。因此，筆者願意不揣庸陋，試一申論，以就正於國人。

第一、討論憲章，乃是對於憲章的檢討與論難，其目的在希望由此種檢討與論難中發現真理。所以討論憲章的人應該具備一種批評精神，這種批評精神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就批評的主體方面說，是一種誠實的，公正的，負責的，沒有成見的精神；在批評的客體方面說，是一種誠實的，公正的，坦然的，虛懷若谷的精神。我們對於憲章固然可以盡量地表示意見，但是我們提出意見，應該出於高尚的動機，應該從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應該有一種負責說話的態度，應該同時及慮他人的意見。不僅對於憲章提出不同的意見，應該本於這種精神，就是我們贊同憲章，頌揚憲章，也要本着這種精神。這種精神我們認為是批評精神的骨髓，沒有這種精神，一切在批評的名義下所提出的意見，只是自私，只是攻訐，只是毀謗。批評的客體，有時是人本身，有時却是人的製作品，而由人對他的

優劣負責任的。因此，批評的客體直接或間接地都是人。接受批評的人所應該具備的精神，也是高尚的動機，顧全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和虛懷若谷的襟懷。批評客體的這種精神，不僅是他本身不可以缺少的條件，而且也是使批評主體發生批評精神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他的重要性，決不在批評主體方面的批評精神之下。

這種批評精神，不但是討論憲章的人應該具備，而且也是一種學術精神，我們更可以大膽地說是民主政治的靈魂。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反對黨對於政府黨，不但有批評的權利，而且在政黨政治體系之下，也有批評的義務。反之，政府對於這種批評，不但應該接受，而且在必要的範圍內，也應該反駁。不過，在人民和政黨批評政府或政府辯駁批評時，都應該本於一種高尚的批評精神。我們正在推行民主憲政的前夕，我們希望大家注意養成這種高尚的批評精神。

第二、批評精神是討論憲章的根本態度，但單憑這種態度，我們未必便可以實現憲政的真理。憲法有他的目的，在討論憲章時，我們應該隨時將他的目的保持在記憶之中，作為表示意見的準據。自然，憲法的任務未必是單一的，而人們對於憲法任務的看法，也可能十分紛歧，不過，我們如果仔細分析起來，憲法的內容雖然十分龐大，但他必定有一個聯繫這些內容的中心點，這個中心點也就是實行全部憲法的關鍵。我們的五五憲章是一部三民主義的憲法草案，第一章總章是關於民族主義

的規定，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第三章國民大會，第四章中央政府，第五章地方制度，第七章教育，和第八章憲法的施行及修正。是關於民權主義的規定；第六章國民經濟是關於民生主義的規定。三民主義是具有連環性的三種主義，自然不能說那一種主義特別重要。不過，我們就各國憲政的發展和憲法的精神來看，則又不能不承認民權主義的實現是憲法的主要任務。民權主義下的政治，便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更命在於使一政權與一治權相調和，以期達到良好政治的目的。換句話說，便是使人民能夠直接或間接地控制政府，使政府對其本身立的一個「責任政府」和「法律上的責任」。用政治學的術語說，便是建立一個「責任政府」。

我們認為這樣一個責任政府的建立，是憲政運動的中心任務，同時也是憲政運動的最低要求。如果責任政府建立了，憲法其他部份的實施，一定可以逐步兌現。近來許多人討論憲草，大都圍繞着一些支節問題，而對於建立責任政府這個重點，反不十分重視，因而對於若干問題的討論往往不能抓着接處。例如，有人看見憲草第二章關於個人自由的規定採問節保障主義，便以為對於個人自由的保障，不如採憲法直接保障主義的可靠，而不憚舌鋒唇焦的辯論。一非依法律「這四」字應取消。其實，這是一種相當膚淺的看法。在理論上，議會固然可以訂立侵害個人權利的法律，但政府却往往在理論上，議會的直接的加害者。假如政府負責，原則不能確定，人民的代表機關和法院都無力控制政府，那末不論我如何急法，或法律保障個人權利，個人權利恐怕終難保障。憲法中大部分的規定，都要靠責任政府才能立才能實施。這是不加推究，便可以明白的事。孫中山先生為了實施這個原則，而發明權能分立的理論，使人民的權能能夠常常控制政府，使政府，實在是高瞻遠矚。現在若干人不免想這一個原則，似乎不是正常的現象。

第三、在討論憲草時，我們還要相當了解法律科學的性質。法律與邏輯是具有血緣關係的兩姊妹學問，假如正義，公利，習慣等是她的靈魂和肌肉的話，那末邏輯便是她的骨骼了。在

討論憲草時，如果我們不小心地把邏輯忘記了，一定會要誘出許多不必要的錯誤。舉例說吧，國民大會是否應該設置議會反對地，但是如果是如以「代議機關能否代表民意」，已經成為問題。為理由，來否定議政會的價值（參攷三民主義半月刊四卷四期薩孟武著評憲政期成會的五五憲草修正），則實在離開了討論憲草的本場了。假如我們純然從實際政治的觀點來看，憲法，恐怕不但議會不能代表民意，世界上又有那幾個議會能夠代表一民意呢？此外，有人主張憲草應另立一章規定政黨（參攷三民主義半月刊四卷五期），這種主張固然外國學者也曾經有過，但是他是否妥當，則是值得詳細研究的問題。儘管在事實上誰也不能否認現代的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但理論上似乎還不容否認民主政治便是全民政治這個大原則。五五憲草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我們如果在憲法上規定對於一部份人組成的政治團體，予以特殊的地位，理論上是否可以保持調和呢？

就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情勢看，政治理想和實際政治實在分不了家，只有法律差能算是政治理想的忠實僕人。這位僕人雖然沒有將政治理想十足地變成事實，但現代政治之所以遠能差強人意，還是要歸功於他的努力，我們如果以實際政治為理由，來否定憲法規定價值，我們不自覺地做了一個定命的悲觀主義者了。我們如果以為憲法對於支配實際政治的力量應該予以特殊的地位，不但破壞了憲法各種規定理論上的調和，實在也就否定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

政治現象是一種龐大複雜變化莫測的現象，政治現象的合理與否關係到一個國家和人民的盛衰榮枯。憲法是規定政治現象的準則，因此討論憲草是一種最不容易的事，同時也是一種最神聖的工作。他但要我們懂得政治理論法學體系，也不但要求我們對於實際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國際大勢等要有宏博的見識，而更重要的是他要我們有一種高尚的動機，一種純正的心靈。我們幸而生在這個轉變歷史的時代，我們應該懷着戒慎恐懼的心情，來討論這個轉變歷史的大文獻。

革命時代與憲政時代

方 堅

人類歷史中不斷有革命發生，然決無永久之革命時代。永久革命之結果：或則革命與演進同流，如此則與其謂之革命，不如謂之演化；或則永遠為混亂之局面，不足以言百世之基業也。大革命者，世界進化過程中之偶然風浪也，故演化為常，而革命為變。世界之進步，固非藉革命不為功，蓋革命乃代表一種創新之勢力，足以推翻舊時代者也。舊時代必須推翻，以其為世界進步之障礙。及障礙既去，社會即應循創新軌跡前進，非至另有新勢力之產生，則不需言革命。且革命者以破壞舊制度為手段，永久革命無異於延長破壞之時間，然既經革命以後，即不應有革命之對象，則此時期之破壞豈非無的放矢？則中山先生領導革命，初則以推倒滿清之專制為職志，既則以掃除國內軍閥官僚與打倒帝國主義為目標。故一旦軍閥官僚既去，帝國主義之壓迫已解，則革命即告完成。革命完成之日，乃實施憲政之治，憲法將為近代政治之常軌，故憲政時代與革命時代有大區別。憲法將為近代政治之常軌，故憲政時代與革命時代有全部吸收，以為新時代國民與政府行為之最高準繩。非至世界潮流與國內情勢大有變化，則無須修改憲法。非有特殊創新之偉大勢力產生，則不當言革命，此時而言革命者，反成違反憲法之舉。故國民可以因違反憲法而獲罪，決無因反對革命而獲罪者。

徵諸古今中外之歷史，一種新制度形成，而為社會之穩定力量者多則數千年，少亦數百年。現代民主制度之產生；若以北美合衆國成立為開始，亦有將近二百年之歷史。民族，民權，民生之遺教，其能長久支配中國之政治制度而形新中國之穩定力量，亦可以斷言。中國革命五十年矣，志士仁人所以肝腦塗地而不顧，全國同胞所以能忍受一切痛苦為革命之後盾者，莫不曰希望國家之長治久安也。而長治久安之道，非憲政而

何？故革命不可以久，而憲政應及早實現也。或曰革命尚未完成，故不能實施憲政。依吾人之意見，最初為民主憲政之障礙者為軍閥與官僚，及軍閥官僚既去，日本帝國主義乃成革命之對象，當前全國團結一致共同抗戰，不啻為一種革命事業，凡參加抗戰者，即為革命者，抗戰勝利之日，是革命大功告成之時也，此時而實施憲政，結束此漫長之革命過程，實為不可或緩者也，否則徒增痛苦與擾亂耳。

在革命時代國家無常軌，而舊勢力必須破除，故須用兵，在憲政時代，則國家有常軌，政權之遞嬗依據憲法所定之和平方法，全國人民與黨派立於平等之地位，無所謂革命與反革命之分，只有合乎憲法與違反憲法之別，則人民黨派間之衝突與摩擦可以大減。且武力鬥爭之事，為憲法所不容，其有以武力為公私鬥爭之工具者，則有國家之事，軍警彈壓之制止之不足以為亂源。口舌筆墨之間，人民可有冷靜客觀之評斷，不致流於偏險而不正，夫革命之意，志本極主觀，及此種革命之意志於憲法中具體化以後，乃有客觀之標準。故在革命時代不特各黨之間難得意見相同，步趨一致，即在一黨之內各派各人對於主義之理解亦往往相差懸殊，至真正之憲政實施而後，此種主觀上之差異自可無形減少。

吾人依據正常之邏輯法則，所能心安理得而知解之革命時代，誠一新時代及其制度之妊娠時期也。由懷孕而生子不免有痛苦，而生育者能忍受之，豈不以痛苦為時甚暫而子女之樂無窮？若有永久之難產，使有上帝主生命之權，則吾必以此為上帝之罪過。上帝真能為人類所擁戴者，豈不以其真如吾人之所期能縮短人類之妊娠時期至極小必要之限度乎？憲政時代降臨，然後人民有生生之樂，有真能助成之者，則真中華民國之救星也。

評憲草中中央政府有關各條之規定

陳一清

憲法上所規定之事項，應詳應略，爲剛爲柔，此在佈局設計中，均足表現技術之精彩。尤其關於同種類同性質之各部門，應詳一律要詳，應略一律要略，假使此處詳而彼處略，不只於在形式上欠缺，乃至於應用上亦無以濟事實之窮。茲就中央政府有關各條比較中見其出入者，摘述如下：

查憲草第五十一條：「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其任，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第五十六條：「行政院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第六十條：「行政院設行政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第六十一條：「行政院設行政院會議，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及政務委員組織之，以行政院長爲主席。」比較上述而無院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院長代理之規定。行政院會議何等重要，如憲草第六十一條所規定之事項，應由行政院會議議決者，其中有時間性不容稍失之宣戰媾和戒嚴各案，及其他關於重要國際事項之議案。又憲草第四十四條：「國家遇有緊急事變或國家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爲急速處分時，總統得經行政院會議之議決，發布緊急命令。」院長因故不能視事，事所常有，僅限於院長主持，而無副院長代理之規定，坐失時機，遺誤大事，有礙行政。又查憲草第六六條：「立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以次如司法考試監察各院，同樣規定各該院長副院長一人，均無院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院長代理之規定。其中立法院有立法會議，監察院有監察會議，亦均無以院長爲主席之明文。不但詳彼略此，殊欠規律，假使立法院接收總統提議重要而且有時限性之議案，因無人生席將何以濟事實之窮？此爲立法技術上欠周，不能

不加以調整。

不僅上述各條因詳略關係應予補救，而於剛柔性欠調節之條文所生之影響爲尤大者，亦應加以注意，例如憲草第三十條：「國民代表任期六年」，第四十九條「總統副總統任期均爲六年」，是國民代表與總統之任期相終始。又查憲草第五十二條：「總統於任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任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總統副總統均未就職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第五十三條「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時，期限不得逾六個月。」依此規定，政府有中断可能，試申其說：

總統於任滿之日解職，已如第五十二條之規定，至國民代表之選舉自應事先辦好，以免脫節，但事實上之障礙，有非意料所能及者，便不能保證國民代表選舉計日可以完成。就以往辦理國民代表選舉自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成立國民代表總選舉事務所，直到三十一年一月始告結束，於區域代表六六五名中僅選出五五七名，職業代表三八〇名中只選出三一一名，特種代表一五五名，也只選出八二名，其間雖受戰事阻礙，也可見辦理選舉之困難。假定總統解職以後六個月乃至超過六個月，國民代表尚未選舉完竣，或選舉雖已辦竣，而代表因事實上之障礙不能如期召集，皆足以妨礙總統之產生。新總統無法產生，前總統早已解職，所謂代行總統職權之行政院長，又受第五十三條之限制，不能逾六個月，於此場合將聽行政院院長違法代理乎？抑政府從此中断乎？此爲條文中剛柔性欠配合，不能不加以補救也。

日本可能為憲政國家

龔德柏

日本目前雖為軍閥專政之侵略國家，但在九一八事變前，曾實行相當程度之憲政。並且由從前之歷史，可以知道日本在戰敗後，由我們為之剷除其軍閥，仍可恢復其憲政，並可發揚光大，與英國比美。

憲政國家，不一定非侵略國家。試看歐洲某國，其憲政為世界之楷模，但數百年來，實行其一貫之侵略政策，較之任何專制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足見憲政與侵略，可以併行不背。日本雖曾為相當程度之憲政國家，但其侵略政策，並未一日放過。所以日本縱為完全無缺之憲政國家，是否不行侵略政策；我絕對不能保險。這點請世人分別清楚，以免誤會。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即由中國與在長崎通商的荷蘭人輸入民權自由思想。維新後，這些思想更為流行。岩倉具視於一八七一年，率領多人，考察歐美各國，對為以自由民權為基礎之立憲政治，有助於中；不過鑑於日本國內之反動勢力，只得採取漸進主義。經過西南之役的內亂武斷派更為得勢；但板垣退助等自由分子，仍利用民權自由的思想，攻擊政府專橫，一八七四年，向政府提出建白書，要求設立民選議院，一般輿論頗為贊許。政府對於這種主張，雖不反對，但主張先開地方官會議，樹立建設民選議會的階梯，一八七五年下詔：「設立元老院，以擴張立法之源，設大審院，（最高法院）以鞏固審判權；並召集地方官會議，以適民情，而謀公益，俾國家漸達於立憲政體。」。此為日本建立立憲政體之詔書。一八七七年

七月，發布府縣會規則，在各府縣設府縣會，為代表機關，這是日本民選議會之開端。但板垣退助等仍不滿足，組織「愛國社」，後改稱「國會期成同盟」，與政府奮鬥。一八八一年，明治下詔，定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年）開設國會，以安民心。一八八二年，派伊藤博文赴歐美調查各國制度，準備實行立憲。這時候德意志勢力日展，在歐洲大陸為第一強國，伊藤等認為日本情形，與普魯士大致相同，乃擬倣效普魯士憲法，以便使日本為東方之普魯士。此為大錯謬成之開端。伊藤遊歐美一年餘回國，即在官內省設立「制度調查局」，編纂憲法，一八八五年設立內閣制，以準備實行憲政；一八八九年頒布憲法，與其他一切附屬法令；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召筆第一次帝國議會，日本立憲政體於以成立。

日本雖有憲法，雖有議會，但去歐美立憲國家之標準尚遠。她的憲法是做法律普魯士，且較普魯士更不如而係欽定，議會與國民，對於憲法均無權修改，惟「天皇」得提議修改之。「天皇」在憲法上，權力很大，除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外，並可發布緊急勅令，以代法律，其關於財政上之處置。並且「天皇」統帥海陸空軍（第十一條），「天皇」規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第十五條），有任命與免職之規定，使議會對軍事無法過問，軍閥可借「天皇」為名，實行侵略政策。這是日本憲政極不健全之所在。因為有這種條件，所以國會一開始，就為軍事豫算，而與軍閥衝突，遭受壓迫。但日本自由派人士，在這樣

不健全的憲政中下繼續奮鬥，並藉內外各種機會，擴展憲政勢力。甲午清日戰爭，日本於戰勝後，受三國干涉之打擊，政府始承認政黨之存在。一八九八年，因各國在中國佔據各海港，影響日本甚大，日政府感覺難於應付，始許成立第一次政黨內閣。這種政黨內閣，因黨人自己衝突，於短期內宣告瓦解，仍由藩閥執掌政權。

日本由議會開設，到一九一八年原敬內閣成立，中間除三個月內閣外，全為藩閥執政。這由於日本反動勢力根深蒂固；議會權力甚小；政黨勢力微弱。而尤其惡劣者，則為政黨本身，往往與藩閥勢力勾結，冀在內閣獲得一二席，為藩閥政府助勢，致使日本憲政遲遲未得上軌道。但議會中少數硬骨漢，不願藩閥政府的壓迫，孤軍奮鬥，憑三寸之舌，於議會開會之短期內，藉政府之失政，攻擊當政者至體無完膚，使政府威嚴嚴重威脅，而民氣得以大張，憲政得以進展。這樣的硬骨漢當推尾崎行雄為第一人，內閣受尾崎之嚴重攻擊，而倒潰者，不知凡幾。日本人稱尾崎為「憲政之神」，詢非虛語。因非有這樣硬骨漢的存在，且得議會外民衆之熱烈擁護，遂使議會勢力日趨強大，藩閥壓迫漸次減低。一九一二年，由尾崎的熱烈演說，而擊倒陸軍巨閥桂太郎第三次內閣；一九一四年，又由尾崎為首之激烈政戰，而擊倒海軍巨閥山本權兵衛內閣。遂使藩閥首領山縣有朋，感覺困感，不能不推薦曾參加民權運動之隈重信組織內閣。隈內閣因對華二十一條要求政策之失敗，又使軍閥再獲得掌握政權之機會。寺內正毅執政兩年，於德奧傾向失敗之際病故。這時候歐洲和平即將恢復，日本已不復容許軍閥或藩閥內閣之成立；而日本國內復有猛烈之經濟恐慌，亦不合時代之需要，內閣所能担負政局。山縣有朋不得

已，始推薦政友會總裁原敬（原姓，敬為名）組織內閣。這是第一次政黨內閣經過二十一年後，始成立第二次的政黨內閣。這次的政黨內閣，與第一次政黨內閣迥然不同。即藩閥勢力已大大衰退；軍閥亦因德奧之失敗，無法抬頭；而在政黨本身，則勢力充足，原敬只委閣員，一係有力人物，而國民之知識亦大進步，所以政黨內閣非常有力，任其勢力均不能使其動搖。這時候，反對黨之憲政會，則主張普通選舉，即將從前選舉法的各種制度撤消，凡國成年男子均有選舉權，選舉人民之參政機會，鞏固憲政基礎。但政友會內閣，則以爲尙早，理由而反對之。原敬雖之反對普通選舉，並非根本反對，而係出於黨略。即普通選舉之議，係發自反對黨，若政府贊成之，則反對黨必獲得人民之擁護，下次選舉有在衆議院獲得絕對多數之可能，於政府非常不利。所以政友會一面反對普通選舉，一面從事打擊憲政會，擬將其至不能競爭之地位，然後由政友會內閣實行普通選舉。此民意必擁護政友會，政友會乃可久握政權。政友會內閣這種黨略作用，不僅使日本憲政受挫折；且使政友會本身受損失。人民因政友會內閣反對普通選舉，大感不滿，原敬竟為人暗殺而死。（內幕如何至今未明）原敬死後，元老仍推政友會繼任總理，高橋是清繼任組閣，仍為政黨內閣。不料政友會發生內閣，高橋內閣崩潰，元老中有人擬以反對黨首領加藤高明繼任組閣，不料在元老會議中，有人反對，遂以海軍大臣加藤三郎組閣。加藤曾參加華盛頓會議，這時該會議各議案，須付諸實行，加藤遂得兼任內閣總理之職，而日本憲政又受一大打擊。在此後三年間，三易內閣，均非政黨首領。但普通選舉法，於這期內通過，第一次普通選舉，即使當時擁護非政黨內閣的政友本黨大敗，所謂「護憲派」三黨

，獲得衆議院絕對多數，而清浦內閣倒潰，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始得膺組閣之令。這是日本第三次政黨內閣，自此繼續由兩大黨交互組閣，日本憲政殆走上常軌。若無九一八事變，軍閥以非常手段打破此局面，或者日本憲政更要進步，亦在意中。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這幾年間，兩大政黨相互組閣，雖然是出於西園寺元老之推薦，殆已成了政治上的不文法。軍閥首領田中義一，知道以軍閥的資格，是始終得不到政權的，所以放棄軍職，而以平民的資格，加入政友會，做了該會的總裁。一九二七年，與樞密院各官僚合作，推翻了民政黨內閣，（係憲政會改稱）政權輪到他的頭上了。田中幹了兩年一個月，幾乎使中日全面戰爭那時候就要爆發。但到最後一瞬間，他躊躇了，所以佔領東三省的計劃，未付諸實施；但軍人却自由行動，炸死了張作霖，終於爲這問題，田中內閣倒了台。民政黨內閣捲土重來，在衆議院選舉時，獲得絕對多數，決心破幹一番。首相淺口雄幸是個鐵面辣心的人，他打算藉鐵道賄案，把田中下獄，田中不得已自殺。於是政友會與軍閥都喪失了首領，民政黨更爲得勢。所以對外訂結非戰公約，倫敦海軍條約；對內欲裁減陸軍，以剷除軍閥勢力。軍閥見形勢不佳，在國內沒有方法對付，只有佔領東三省，在國際上惹起滔天大禍，以爲打倒政黨內閣的手段。但民政黨內閣雖被九一八事變逼倒而西園寺元老，仍推薦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組閣，還是政黨內閣。軍閥又把犬養毅公然殺害，西園寺元老之心，還是想以政友會繼任總裁鈴木喜三郎繼續組閣，因軍閥明目張胆表示反對，西園寺躊躇考慮了半個月，始以中立派齋藤實組閣，而日本政黨內閣於焉告終。

日本政黨內閣制度，被軍閥殺了，日本憲政亦由此漸漸失勢終至破滅。這在伊藤博文制憲時，已種下禍根。他規定軍權屬於「天皇」，因此使軍閥關於軍事，可以任意行動，不受

內閣之控制。所以九一八事變發生，內閣毫無救濟之法，軍閥目的既在故意與內閣爲難，所以內閣向國際保證，不擴大事變，軍閥偏偏要擴大事變，使內閣在國際上喪失信用。這已足使內閣爲難了。而火上添油，使軍閥橫行的，則爲內閣官制規定：陸海軍大臣，須以陸海軍現役大將中將任之。這是山縣的主張，有這一規定，使任何內閣，均須受軍閥的控制，若內閣不爲軍閥所贊成，絕無人出任陸海軍大臣，內閣不能獲得陸海軍大臣，即不能成立。所以犬養毅被軍閥公然殺害後，西園寺雖要維持政黨內閣，而不可能，這是重大原因。憲法與內閣官制種下此惡毒，終以毒死了日本國家，恐非伊藤山縣始料所及！

照上面所說看來：日本憲法雖賦予議會權力甚小，且有種種妨害憲政發展的規定；但日本憲政，由於自由分子的努力，在短期間，竟能排除許多障礙，而作到兩黨相互組閣之地步。且內閣權力相當大，除受憲法妨礙不能制服軍閥外，幾於無事不能作。我們平情而論，不能不說日本國民之努力憲政，縱能獲得此種成績。反轉來說：假使從最初就在憲法內，賦予議會以相當權力，而不使軍閥獨立於內閣之外。那末，日本憲政更要有良好成績，並且可以永久維持而光大之，是可以預料的。日本這次敗仗，是創巨痛深的，雖不滅種，也有三之一的人民是要炸死餓死的。在歷史上，除加太基之亡國滅種外，日本當居第二位。我們於戰勝後，爲日本剷除了軍閥，使不能再爲日本人民之害；日本人民亦鑑於這次的巨創，對於軍閥的胡行妄爲，一定深惡痛疾。將來實行憲政，既無從前的種種妨礙，又可爲更多之努力，他們的憲政，一定是成功的。我們由歷史上之事實，敢保日本國民有實行憲政的資格。實行憲政後，是否還行侵略政策，則係另一問題，不在保證之列。至於如美國某某人所主張：日本並無自由主義，或日本不能成爲民主國家之說，我絕對不敢贊同，容俟另文論之。

三月十四日稿

改革僑務芻議

張禮千

兩年前由星洲來滬，欣逢僑務委員會十週年紀念，參與盛典，至感榮幸。當時陳樹人先生在訓詞中有幾句耐人尋味的話，略謂：本會成立雖已十年，但外界致函本會，仍間有稱爲僑務委員會者，此蓋一部份人猶誤認本會爲辦理橋樑事務之機關也。觀此，國人對僑委會之隔膜可知，同時反映該會本身之宣傳不夠，亦係實情。

今之僑委會本身，組織甚簡，共分三處，處各二科，除秘書處辦理總務文書外，其直接處理僑務者，僅僑民管理處與僑民教育處。三處職員，據三十一年度之統計，不足六十人，該年經常費亦僅三十八萬元，以戰時僑務之艱鉅，戰後僑務之繁重，奚能任此。該會過去成績，我人不願多言，而現有組織之不能適應戰時戰後，亦爲關心僑務者所深知，則該會之亟應改革加強，理至顯明。所成爲問題者，應以何種方式出之，俾可負起戰時戰後之重任，以造福于海外千萬僑胞，此爲我人今日必須研討之課題也。

去秋參政會開會時，華僑參政員曾有將僑委會改爲僑務部之提案。最近各方，亦有改僑委會爲僑務部之主張。惟由會改部之內容如何，則均不得而知。民三十年春余在星洲時曾函告旅居香港之周啓剛先生，應將僑委會加強機構改爲僑務部，當時所擬辦法，以政治地域爲單位，視各地域政治之不同，僑務之繁簡，每一地域或合數地域於部之下各設一司，如越南、緬甸、暹羅、馬來亞（附英領婆羅洲）、東印度（附荷屬帝汶

）、菲律賓應各設一司，澳洲紐絲倫及其附近之太平洋各島合設一司，南美洲一司，美國與加拿大一司，歐洲一司，印度近東及非洲一司，日本與朝鮮一司，每司之下則至少應分三科，即移民、經濟及文化（包括宣傳）是。此外尚須成立各種綜合性之研究委員會，如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研究委員會等。此種建議，其理由非常簡單，述之如左：

除澳門香港台灣外，海外僑民號稱千萬，其中八百五十萬則分佈於南洋，故僑務之重心實在南洋。此八百五十萬僑胞，雖僅佔南洋總人口十七分之一（全南洋總人口爲一萬四千四百萬人）。然其經濟勢力之雄厚，除英荷兩國稍遜外，遠非其他國民所能及。即以投資一項而論，已達戰前國幣四十萬萬元（註）。故華僑在南洋地位之重要，可說無與倫比。同時戰前南洋之政制結構，極其複雜，戰後大體上恐亦無多變動。按南洋各屬之政制，不但荷法美暹各異其趣，即同屬英領亦大相逕庭，如馬來亞與緬甸與砂朥越與北婆羅洲間之不同，固盡人知之；即同一政治單位之馬來亞，亦有直接統治與間接統治之別。此外如越南緬甸東印度等，亦無莫不然。吾人試就華僑教育而論，則各屬居留政府之處理方法，各能曲盡其妙，或外寬內嚴，或明嚴暗寬，或表裏均嚴，或一任自由。所以以僑委會現行之僑民教育處，欲其負處理整個僑教之責，不容易獲得相當成就，這是必然的。華僑經濟之複雜性更甚於教育，此因地設司之必要，其理甚明也。還有南洋各屬的政府，均設有專理

華僑事務之機構，或單獨設立，或附屬於內政局，其規模最大者，當推吡城之東亞司署及新加坡之華民政務司署。後者之組織，極洋洋大觀，如移民局，勞工局，註冊司，報窮司，保良局，華文副提學司，新聞檢查所，及華文訓練班等，均在該署之內。國內外出版有關華僑及南洋問題之書刊，該署亦盡有蒐藏。職員人數達二百餘人。然此僅係處理華僑民事之機關，而其組織之嚴密完備，即已如此，餘可概見。準此對比，則今僑委會之必須調整，安容忽視。至上述之以地設司建議，除南洋各屬以與我國關係密切，必須單獨成司，俾可集中精力，專門

處理與應付外，餘如歐美非澳等地，得視僑務之繁簡，可合為一司或兩司。又如海外部係處理華僑黨務之機關，原可於組織部內另立一處，以司其事。他日若容黨政合一，則亦可分置於僑務部各司之下。誠能如是，則今日僑委會與海外部間因權限難分之磨擦，自可消除。以上所述，僅及梗概，蓋作者之意，無非欲使關心僑務者對此問題加以注意而已。

註：華僑在南洋之投資，惟日人福田省三所估計者比較可靠，茲由其所著之華僑經濟一書示華僑之投資額如左：（單位百萬、統計年度一九三〇）

類 別	馬來亞（叻幣）	荷印（盾）	菲律賓（比索）	越南（越幣）	暹羅（銖）
農 業	二四四	二〇〇	—	一五	—
礦 業	五〇	—	—	—	—
工 業	二三	一五	四〇	四〇	五〇
貿易及 販賣業	一五〇	四〇〇	一〇〇	一二〇	二五〇
金融業	一五	一三	七	一〇〇	三〇〇
其 他	一一	二六	六九	三〇	—
總 計	四九三	六五四	二二六	三〇五	六〇〇

表中所列各地幣值，折合抗戰前國幣約得四十萬萬元，緬甸之華僑投資額，雖無統計數字可引，但就其所營之工、礦、商業而論，其投資額至少可與越南相仿。

蘇波問題之演變及其解決之道

孫寶毅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蘇聯政府宣佈對波蘭絕交，其理由為波蘭政府未請蘇聯政府對德方所宣佈之波蘭政府遷居殺波蘭軍官一案，加以解釋，而竟邀請萬國紅十字會「調查」。蘇聯政府認為波政府此種行為，顯已「誤入奧希特勒政府協商之歧途，實際上已與蘇聯停止對其關係，而對蘇聯採取敵意態度矣。」

然而，蘇波兩國關係之惡化，其原因甚為複雜，且由來已久矣，其間最殺波蘭軍官一案，不過其重大端而已。據蘇聯外交副人民委員長羅辛斯基之聲明，蘇聯此次所以對波蘭絕交，其原因如下：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蘇波兩國政府成立軍事協定，規定在蘇聯駐波軍，（至一九四二年二月間，官方共七萬三千餘名），一經準備就緒，即權宜立為蘇聯戰場。然而後來波蘭政府未正式拒絕將其部隊調赴蘇聯戰場。蘇聯政府亦礙難准許其繼續在蘇聯駐軍。」

「因實行減少未出征部隊之餉給，以增進其征軍之供應之故，從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起，波軍餉給減為四萬四千份，其軍隊增至四萬四千份，特准波蘭政府駐蘇聯之四萬四千名以外，將其軍隊增至四萬四千份。一九四二年八月間，又將此四萬四千名撤至近東去矣。一九四二年，除七萬五千四百九十一名波軍外，共有三萬七千七百五十六名塔爾蘭開蘇聯。硬將蘇聯當局阻撓波軍成波軍者屬開蘇聯，俱屬虛妄之詞耳。」

「依德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西部各州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蘇聯共和國分別從新統一以後，依據蘇聯國籍法，上述各州居民已取得蘇聯國籍。因幫助波軍之編組起見，蘇聯政府表示願將居住在西烏克蘭和西西俄羅斯之波蘭民族特別營做波人看待。而波蘭政府不以此為滿足，而對蘇聯烏克蘭和西西俄羅斯提出不合法之領土要求。」

「波蘭大使館官員們，假裝從事『蘇聯』活動（從總領館區遷出之波人家屬救濟事宜），而進行種種對蘇聯敵視之開關工作。例如前波蘭軍事代表團團長佛希夫斯基，對於在蘇聯扶植並且實施開關工作，起着最重要作用之一，波蘭大使館附位首席秘書，兩位二等秘書，四位武官，一千人等，假借破壞波蘭從蘇聯撤退之計劃，而進行種種對蘇聯敵視之開關工作。大多數專員與官員，更有組織地從事宣傳，有反對蘇聯佔領波蘭的惡毒詆毀，有宣傳蘇聯破壞秩序，有反對波蘭人民，有反對蘇聯蘇聯人民。」

但據波蘭外長拉多斯瓦夫斯基於上述聲明之答復，則蘇方所言者，全非事實：

「波蘭政府撤退，並非出於波蘭政府之願望，而乃蘇聯政府之要求。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之協定，規定以招募方式招募所有兵丁，迄一九四二年春，蘇聯當局停止招募，同時波軍所得之口糧，亦因供應缺乏而予減少。當有三萬人在蘇政府之協議下，撤至中東。撤出之波軍，並未接受蘇方之武器。其

留於蘇境之波軍，雖於數月內再提出要求，亦未領得武器，僅有一師領得一部配備。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波政府通過議案，謂波軍之未能參戰，並非其本身之過失，因其不能獲得充分之配備也。蘇境內之波籍難民，確數無法知悉，惟此輩難民之福利，已為一急迫之問題，亦為波政府最基本之責任。波人為德方在蘇之種種行為，全屬子虛。波代表在蘇代某盟國從事情報工作一節，不但毫無根據，且不能想像。」

蘇波兩方所爭論者，誰是誰非，吾人不便詳究深論，然要而言之，領土邊疆問題在其中作祟是也。蘇波兩國之感情，素非融洽，但自德蘇戰爭後，即同為反軸心盟國之一，今竟發生此項絕交之裂痕，誠屬盟國間之大不幸事也。吾人可斷言，若不急謀調解，則將演成他日更為嚴重之禍根。英國每日電聞報，曾對此感慨言之曰：除非缺口能迅速彌補，則歐洲其他國家間恐將重有同樣之不幸事件。盟國團結若有一處破裂，極易引起他處破裂。吾人應知盟軍若不能獲勝，則他日解決邊疆問題及其他問題者，將為希特勒而非盟國。

英美當局亦未嘗無視於蘇波絕交之含義之嚴重，故曾力謀斡旋，一方面由英美保證波蘭，在戰爭期中，決不承認任何邊疆問題之協定，一方面則力促波蘭政府撤消「調查」之邀請。蘇波關係，因之略有轉機。四月二十八日，蘇聯宣佈絕交後之三日，波蘭政府發表一辭句極為溫和之聲明一項（註一）。在該項聲明中，波政府有意避免提及要求國際紅十字會調查一事，亦並未提及絕交字樣，但堅決表示波蘭會履行與蘇聯協定之各種義務，而在國內及國外，對德國侵略者作不共戴天之爭鬥，並否認對蘇有任何領土之要求（註二）。波總理薛戈爾斯基並於五月四日廣播稱：「對蘇建立友好關係，始終為波政府及

波蘭全國基本原則之一，將來亦係如此，故使吾人分離之事實必須儘早消除。」薛氏之言，意即願接受英美之調解，而謀蘇波之復交。而史太林於五月六日答覆紐約時報記者巴克稱，蘇聯政府自希望有一強大獨立之波蘭存在，而蘇波關係應以真實之睦隣關係及互相尊重之原則為基礎，且如波蘭人民願意，並可以同盟關係規定兩國互相援助對付蘇波之主要敵人德人之原則。史氏之真意義究如何，當時雖不甚明顯，但一般人遂認為蘇波關係之破鏡重圓，似並非毫無希望者矣。

波總理薛戈爾斯基，本非無能之士，但其處境至為艱難，每不能一展其雄才大略，一方面由於盟國之督促，不能不與蘇聯謀合作之道，一方面則因與蘇聯太接近之故，時受波蘭國人之責難。薛氏不幸於七月四日夜，由直布羅陀返英途中，因飛機失事而罹難。薛氏之赴中東，乃檢閱由蘇境撤出之波軍，而在啓程之前，曾有人促其中止此行，勿冒生命危險。是故薛氏之死，曾引起若干人之懷疑。且有人焉，曾指出蘇聯政府圖謀傾覆薛氏，而樹立一更接近於蘇聯之波蘭政府。此或乃不可盡信之言。然而蘇聯之不十分滿意於薛氏，則屬不可否認之事實也。

現繼任薛氏為波蘭總理者，為米洛茲柯氏。米氏為波蘭最大政黨農民黨之領袖，素稱左派人物，其新聞之外交政策如下：（一）與盟國通力合作，（二）與西方民主國密切合作，（三）建立中東歐聯邦，（四）對蘇睦鄰政策。彼對最後一項，尤特別着重，認為不但欲盡力促進國際間之和平共存，且因波蘭之地理處境，實有此必要也。米氏雖較薛氏更有接近蘇聯之表示與趨勢，然而蘇波國交迄今仍未恢復，其故安在耶？乃在蘇聯政府始終認為在倫敦之波蘭流亡政府，乃以「友好」為烟

幕，而實行反蘇政策是也。吾人可以今年一月十二日真理報之言爲證：「波蘭政府始終以蘇聯和紅軍當做敵人……彼等更有系統地，以有組織之方式，與德寇合作，極力幫助德寇。」換言之，蘇聯不願與波蘭政府來往之態度，至爲堅決。

自史大林格勒一役後，蘇軍轉守爲攻，至今年初，竟長驅直入至波蘭邊境。蘇軍愈近蘇波舊界，蘇波問題亦愈趨緊張。一月五日波蘭政府發表聲明一項，表示不承認由武力所作成之解決，並堅持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前之波蘭疆界與主權之完整，爲不容侵犯，與不容分割。蘇聯政府爲駁斥波政府計，乃授權塔斯社發表聲明一項，其要點如下：

(一) 蘇波現在疆界乃根據民主基礎之全民投票，由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人民之意志而確定者；

(二) 蘇聯贊成再建立一強大而獨立之波蘭；

(三) 波蘭流亡政府，已證明其不能和蘇聯建立友好關係；

(四) 旅蘇之波蘭愛國者聯盟(註三)，以及與紅軍並肩作戰之波軍，正爲波蘭作一強大而獨立之國家之再生展開其可能性；

(五) 波蘭東疆，並不視爲不可變更，大致可依照所謂卡遜界線(註四)。

(六) 波蘭西疆，可將德國先前奪去之古波蘭國土併入波蘭，而予以擴大。

總之，在該項聲明中，蘇聯對波蘭之態度，表白無遺，里加條約(註五)爲蘇聯之恥辱，必須予以矯正一也，波蘭流亡政府爲親德反蘇者，蘇聯不願與之維持關係二也，旅蘇之波蘭愛國者聯盟及波軍，蘇聯願予以扶植，作爲再生一強大而獨立

之波蘭之可能代表三也，波蘭東疆可依照卡遜界線予以勘定，波蘭之「損失」，可以西勘之擴充「補贖」之四也。

波蘭政府於一月十五日發表宣言，作爲對蘇聲明爲之覆，在該宣言中不提所謂卡遜界線，並表示願與蘇正式談判。蘇聯當局於二十一日乃又授命塔斯社發表聲明一項，表示以下三點：(一)波蘭政府之宣言中避免關於承認卡遜線爲蘇波疆界之主要問題，顯然等於拒絕卡遜界線，(二)波蘭提議與蘇正式談判，意在迷惑社會輿論，因蘇聯不能與已經斷交之政府進入正式談判，(三)從種種方面再度證明波蘭現政府並不願和蘇聯建立新關係。

以上所述，乃蘇波兩國絕交前後之經過及最近之發展情形，至將來究如何演變，則吾人至難斷定，或以「不解決解決之」方式出之，亦未可知也。在蘇方不願其西疆再有強大之德國與夫所謂「衛生地帶」之存在，故堅決表示蘇波舊界不能恢復，並以解決疆界問題不能與民族問題分開爲其主要理由。在波方則認爲波蘭在此次戰爭中，結果被另一聯合國國家奪去將近一半之領土及一千一百萬人民，實屬不可想像之事，故波蘭決不能認此乃合理及公正之行爲，換言之，不承認所謂卡遜線，而堅持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前之疆界與主權之完整。波爲小國，蘇爲大國，波蘭此種態度，不啻以卵擊石，然而吾人須知，波蘭之幾度分割而不滅亡者，正因其有此倔強之民族性之故也。至英美方面，美國雖願從中調解，但爲蘇方所婉言謝絕，遂不得不表示對於蘇波問題守中立矣。美國務卿赫爾於莫斯科會議後，即表示疆界問題應於戰後解決，或已有見於蘇波問題之難於調解也。英國之態度，則吾人可從二月二十二日首相邱吉爾向國會之演詞中見出之。邱氏之言曰：「吾人過去從未向波

蘭提出關於特別疆界之建議，并對波蘭在一九二五年佔領維爾那，不表同意，英國在一九一九年也曾對於以公正態度處理波蘭問題之卡遜線，表示其立場。換言之，英國贊成以卡遜線作為蘇波疆界之合理解決。英國此次對德作戰，初為實踐其對波蘭之保證，但嗣後為合力擊潰德國計，又與蘇訂同盟條約，故英國對蘇波問題之處境，實左右為難，但邱氏為現實主義者，同時為權力是視之人，蘇聯力量之日益膨大，以及敗德之非與蘇合作不可之理，邱氏見之最切知之最深也。

然而，世間決不可無真理與公道。關於蘇波問題，雖錯綜複雜，但作者個人認為如從以下數項原則上加以考慮，未嘗不可得一公平與合理之解決：

(一) 是否合於大西洋憲章之原則？(該憲章中曾規定：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英美兩國不願其實現)。

(二) 聯合國對軸心國作戰之目的如何？

(三) 羅斯福所謂免除恐懼之自由，其意義如何？是否合於蘇聯目前之處置與解釋？

(四) 疆界問題與民族問題是否可以分開？

(五) 大國與小國在戰中與戰後之地位應如何？

(六) 聯合各國對於戰爭之貢獻大小應如何評價？

(七) 流亡政府與其國內自由解放運動之關係應如何？

(八) 戰後之世界組織應如何？

若不從以上諸項原則詳慎考慮，而貿然解決蘇波問題，則勢必發生以下各項弊端，或遷就與奉承大國，或互爭勢力範圍，或造成大國獨霸之局，或造成勢力平衡之勢，或袒護小國，從事於領土疆界之紛爭，以免害英美蘇及聯合國間之團結合作

，則吾恐一二十年後，第三次世界大戰，又將起矣。為蘇聯計，此次大戰後，無疑為一強大之國，可左右世界之局勢，是故不得波蘭十數萬公里之土地，亦無傷於蘇聯之聲威，且蘇聯現已修改憲法，擴大各盟員國之權力，其聯邦組織更富於伸縮性，如對各國待之以寬大，則他日或亦相繼而願為其盟員國之一也。如此，不但東歐和平可以維持，即對世界和平，亦大有裨益也。(二月二十八日作)

(註一) 該項聲明名義上係向報界發表，但其用意意在轉達蘇聯，作為波政府對蘇政府絕交照會之間接答覆。按蘇聯向波大使致送照會時，波大使因照會中指稱波與希特勒成立默契，故拒絕接受，故波政府亦非直接而經由報紙獲悉蘇聯照會。

(註二) 一九三九年德攻波時，提摩盛科率兵越過波蘭邊境，佔領其東部，因此蘇波斷絕外交關係。一九四一年七月兩國訂協定恢復外交關係，蘇聯聲稱一九三九年德蘇協定中關於波蘭領土變遷一項為無效，且又規定戰時雙方互助，因此產生在蘇聯之波蘭軍隊。在「特定之條約中，蘇聯又同意解放在蘇剝奪自由之數約六七十萬之波蘭人民(當時俘虜及其他)」。但波蘭官方認為一九四一年之協定，承認一九三九年之現狀，蘇聯對此不表示態度，既否認，也不贊同波蘭之解釋。蘇方報紙曾發動「反波運動」，烏克蘭副主席高爾尼米克聲稱，波方目的在將其邊境擴充至蘇維埃烏克蘭。波方報紙亦不絕而批評蘇戈爾斯基者，認為彼未能於一九四一年協定中，使蘇聯明白承認波蘭戰前之邊境。波官方且作一強有力之文告，要求保持一九三九年之狀態。蘇方對此文告，加以駁斥，且指派高爾尼米克為外交人民委員副委員長。一九四一年廢棄之一里賓特羅夫「洛托夫邊境」，因此又引起紛爭。

(註三) 波蘭愛國者同盟由蘇聯境內波人所組織，發行「自由波蘭」報，其主要人物有名女作家汪達華西萊夫斯卡。該同盟組織自由波軍，由蘇聯供給武器，與紅軍並肩作戰於東戰場，以爭取波蘭之自由解放。彼等曾譴責在倫敦之波蘭政府與總理薛戈爾斯基，認為無權代表波蘭人民，並由波蘭人民之利益，並指出以下五點：(一) 該政府不能代表波蘭人民，(二) 該政府以討價還價東方領土為主要目的，而不實際對德作戰，(三) 該政府摧殘其正民主黨人，及愛國志士，(四) 該政府迫使波軍不能活動，並削弱波軍之士氣，(五) 該政府與敵

政府合作，與完全協調之態度。

(註四) 卡廷界線為一九一九年協約國與高委員會通過之蘇波疆界，而波界則未遷改出，一名之，北自與東普魯士交界處起經比亞里斯託克，布羅斯特，沿布格河，至捷克邊界。

(註五)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蘇波戰爭，蘇軍曾抵華沙，由於國際對波軍之援助，八月中旬蘇軍自華沙撤退，雙方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在里加訂立休戰條約，確定兩國邊界西自俄羅斯，西自烏克蘭至波蘭版圖，並條約名里加條約。

悼亡廿絕

(三)

慕韓

百年浩劫走雷霆，累汝焚香日所經，自疑恩智逾緣結，誰將心事寫丹青。
文山不用勞生祭，天上人間子自知，一瞑料應憐我志，春歸未見有蘭枝。
念我飄孤久出亡，傳言欲為置偏房，誰知垂老情如舊，那忍星光換月光。
自與家外祖談，兒時母教敢忘乎，願君含笑世多遺，已有人扶六尺軀。
東坡南海喜生還，定遠西陲入玉關，杜宇聲聲行不得，憐君徒上望天山。
聞坐悲君亦自傷，人天永隔恨茫茫，孤舟大海吾何待，賴有情絲萬縷長。
如如抱病幾經秋，難數文君恩意稠，待把平生數語下，與卿泉下話從頭。

隆斯德特口中之德國防禦西歐計劃

米特蘭頓著
抱貞譯

隆斯德特乃德國將領中之佼佼者，彼於今年二月中旬曾發表談話，表示堅強抵抗盟軍侵入西歐之決心，並概擊退英美軍隊之各項措置。同一日，在彼指揮下之維琪宣傳部長赫洛特，則報告英國飛機曾投下若干軍火，供給法國愛國志士，俾在盟軍侵入時作內應。

隆斯德特再三強調戰形勢之嚴重。彼所發表之談話，可更適宜於詳述德國在西歐之準備情形，與夫抵抗敵人之決心也。從彼之談話，可以證明，此精幹之德國參謀本部智囊也仍在法國境內為德軍統帥，並未調往俄國戰場。彼之上司為隆美爾將軍，負指揮西歐德軍之全責。

隆斯德特之談話，可以下兩方面解釋之，第一，向德國人民保證，參謀本部力能保衛西歐，第二，使盟國感覺登陸西歐之困難，因而延宕實現東西夾攻之時日。

前者之解釋，似較可信。吾人若認為隆氏所述之準備情形，不過虛張聲勢而已，則實屬不智。吾人須知，德國參謀本部人員與納粹黨人，有大不相同之處，即從不虛張聲勢是也，至於其所發表之公報，宣傳部長吉勃爾氏如何加以附會曲解，彼等概不予以理會。隆斯德特之言：「在余之戰區中，不會有脫逃與撤退等事之發生。沿海岸以及縱深配備之砲壘，必將作戰到底。」

當隆氏敘述其砲壘如何堅強之際，吾人不禁油然想起英首相邱吉爾於一九四零年所發表之有名演說：「吾人將作戰於海灘。」隆氏自信其所建造之砲壘，與馬奇洛防綫相比較，更為堅固，彼之言曰：「從一深度之區域，防禦轟炸之攻擊，並不受側面攻入之威脅。」

「在沿海岸防禦工事之後，經已建立一連串之陸地砲壘與據點，遍地廣泛埋藏地雷，並已完成使陸地頓時變為沼澤之設計，此外又設置各項及坦克障礙物與夫較馬奇洛防綫更精巧之防禦工事。」

「水面上之障礙物，將阻止敵人之登陸船艇，海灘上之佈雷地帶，將使任何進攻遭受困難，即使在第一階段，敵人亦甚難獲得一鞏固之立脚點。」

彼又聲言，彼已採取「秘密措置」，以殲滅大規模之空中進犯。在「數小時內」，「即可調來大量裝甲部隊與摩托化部隊，以擊敗侵入者。」

隆斯德特所述之德國防禦情形，無一不為盟方所料及而早事準備者。吾人所認為重要者，乃身任駐法德軍統帥之隆氏，向德人保證作戰到底也。而法國在德人之心目中每認為乃盟軍侵入及手槍軍以重創之地點。

隆氏之言，對於英美輿論，將發生有益之影響。英美若干高級官員曾坦白表示，對於一般輿論，頗為擔心，蓋一般人每將開關第二戰場視為一種「把柄」，且希盟軍一旦於西歐登陸後，德軍即可瓦解而投降。

至維琪方面，則對英供給愛國志士以軍火一事，甚表痛心。赫洛特報亦稱，英國曾將軍火及無線電器材投下於波爾多之北；於蘭舍爾亦曾投下軍火炸藥等物。波爾多與蘭舍爾多，皆位於法國之西南部。在南部之馬賽，則英國飛機曾於二月十一日在其東面投下一百二十支鎗炮，七百七十個手榴彈，二千袋爆炸藥。

又據赫洛特稱，盟方曾於法國中部投下軍火與炸藥等物。此等地區，離德人所猜想之盟方侵入地區較遠，是故頗值得吾人注意也。（譯自紐約時報二月十五日）

新書評介

舜生

(一) 論蘇德戰爭

(屈武著，中蘇文化協會編譯委員會印行，三十三年二月初版，各書店均有出售)

自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蘇德戰爭爆發以來，到現在已經是兩年零十個月了。蘇聯是我們的盟邦，德國是世界的公敵，這一方面戰局的演變如何，結果如何，不只是同盟和軸心勝敗的一大關鍵，對於我們尤其有着切膚的利害。可是多數國人對蘇聯的認識是那樣的淺薄，對蘇聯的地理又是那樣的生疏，因此，關於蘇德戰爭的消息雖是每天都佔着我們報紙上重要的篇幅，但國人對這個戰爭演變的脈絡，似乎並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印象。

本書的作者是國人中研究蘇聯有數的專家，除對蘇聯的軍事有他正確的估計外，對蘇聯其他的各方面，也有着豐富的常識。因此，他這本書雖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到本年二月陸續發表的六篇講稿和論文，但前後的觀察和判斷，却無矛盾。

條理明晰，敘次謹嚴，雖為盟邦多少帶點鼓吹，但態度客觀，並無過火之處。為認識這次世界大戰一局部的事實，為研究國際局勢未來的演變，為提高我們自身抗戰的情緒，這是一本很有用處的書。附蘇德戰爭地圖三幅，尤其對於對蘇聯地理不大熟悉的讀者，有很大的幫助。

(二) 蘇聯底軍隊

(蘇聯科學院通訊會員依·明茨著，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在渝中英文本均有出售)

全書計分十一章，由第一章至第四章，說明此次蘇德戰爭之起原，迄德軍從莫斯科附近之敗退，即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蘇開戰起，迄翌年一月中旬止，其說明德方對蘇聯估計的錯誤，以及蘇方如何運用其特性的戰術以克服德方的閃擊，至為明白痛快。

第五第六兩章，追述自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由列寧簽署建立紅軍之法令開始，迄一九二〇年冬蘇聯如何應付內戰，及國際武裝干涉者之經過，而於斯大林在此一時期所表現的勢績，尤加詳焉。

第七第八兩章，說明建軍之積極進展，包括陸海空三方面之齊頭並進，而於軍需工業與軍事教育之如何推進，以及紅軍指揮人員及兵士質素之提高，均有扼要的敘述。

第九章說明自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迄翌年三月蘇芬戰爭的經過。

第十章列舉在此次蘇德戰爭蘇軍中若干個人所表現之英勇事蹟。第十一章則專述游擊戰爭。

此書雖帶有濃厚的宣傳色彩，但證以兩年零十個月以來蘇軍之戰績，可信所述事實之不謬。至關於蘇聯建軍之始末，以

及建軍必與重工業及一般人民教育之發展相配合，尤足供吾人之參考。

(三) 俄國人物

(一九四二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重慶讀書出版社代售)

這是蘇聯作家西蒙諾夫寫的一個劇本，分三幕九場。他是拿一九四一年秋天在南方戰線那樣一個緊張的時期和地點作這個史劇的背景的。這個劇本的演出，約須三十人以上。作劇的本意，當然是在鼓起蘇聯人民對於保衛祖國的热情，和對德軍的敵愾，但寫出的手法，却完全是文學的。作者描寫了蘇聯的人民那種視死如歸的心情，(例如劇中主人公薩方諾夫的母親曼爾華，和軍醫助手格洛巴。)但他也暴露了那種出賣祖國的叛徒底醜惡面目。(例如作敵探的科茲洛夫斯基和接受敵人僞

命而作市位的哈立頓諾夫。)作者寫劇中男主人公薩方諾夫和女人公克柳間的羅曼斯異常細膩，一面可以說是以私廢公，一面也可以說是愛乎情止乎禮。作者寫一個六十二歲的老軍官瓦辛是那樣精明而忠實，同時寫這位老軍官一個作了敵探的外甥科茲洛夫斯基却是那樣陰森可怕；作偽市長的哈立頓諾夫出賣了祖國，同時也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但他的兒子却為祖國而犧牲在前線，而他的妻子却以毒藥毒死了一個敵方軍官。像這樣的對照和穿插，雖是劇作者慣用的手法，但妙在作者寫來却一點也不過火。

最後寫克柳在敵人的手中，其去死真是間不容髮，幸以援軍趕到，宛轉得而免死，這是全劇發展的頂點，可以使觀衆在萬分緊張以後，仍可回復一種樂觀的心情，這與中國著名劇作者曹禺先生在雷雨以後次次種種有名劇本中的作風似乎有些不同的。

幼椿大兄生日賦一絕為壽

滄海橫流到此身，風雲長護徙薪人，掃天松柏蒼葭子，要與安心萬頃春。

村居

一片疏林帶夕暉，數家茅舍動煙霏，牧歌小隊收操去，笑語聲聲散學歸。且喜日晴綠如畫，莫嫌霜重菜蕪肥，邇來謝却城中客，漸遠人間是與非。

本屆參政會余未出席，知者多以爲問，其實衡於耳。人生行止，不必皆有理由，偶厭江瑤，一思螺蛤，亦何必煩瑣解耶？戲言一律，以答答問。

燕生

浮雲去住本無心，枉被人間作意尋，出岫慚非行雨具，在山不必入林深。眼中龍虎爭呈瑞，巷底鸚鵡慣比鄰，一嬾從容百事了，世情反覆任晴陰。

華僑興業銀行

陳其南

圖 15

四國
一三
七二
八九

金明館叢書

九

羅伯遜

新華 辦 關 州 桂 遠 西 新
 華 報 華 報 華 報 華 報
 華 報 華 報 華 報 華 報
 華 報 華 報 華 報 華 報

便利顧客

六、

44

4

44

19

[illegible]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人

行人

發行所

11

庭

10

一元四

1984

純粹華僑資本 華僑聯合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信託 儲蓄
分行 支行 處
重慶 柳州 興
森林路八十八號
電話掛號二〇九四
電 話 一四二七六

手續敏捷辦事簡便

中國工礦銀行

利導游資 調濟金融 營業要目 貼現放款 匯兌 儲蓄 協進生產 扶植工業

衡陽 桂林 昆明 西安 安長 沙 州 市 充

重慶 洛陽 寶雞

總行：重慶森林路二號

電話掛號：二一八八 電話：四二二六 電話：二九一八

大同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銀行部

重慶分行	蘭州分行	西安分行	昆明分行	桂林分行	貴陽分行	衡陽分行	柳州分行
地址：重慶打銅街	地址：蘭州中正路	地址：西安東大街	地址：昆明護國路	地址：桂林東路	地址：貴陽中山路	地址：衡陽剛直路	地址：柳州培新路
電話：四一九六	電話：四八八	電話：八八一	電話：二四八	電話：二九〇	電話：八八八	電話：八八八	電話：八八八

儲信部

重慶分行：森林路一號
電話掛號：三五一八
電話：二八四一
外餘均掛號

交通銀行

為各工廠：

謀求戰後復興之準備
解決添購機器之困難

舉辦：

工廠添購機器基金存款

存額 至少國幣拾萬元

期限 至少一年但得分期繳存

利息 照本行定期存款利率計息

優待辦法

- 1 存款期滿後工廠以之添購機器如有不足得向本行商借最高額可達已繳存款之總額
- 2 存戶借款定購機器時由本行代辦其需自辦者由本行代付價款
- 3 存款未滿期前訂購機器得向本行商請保付價款
- 4 此項存款到期時如不需添購機器可申敘理由取回全部本息

憲政

第一卷 第二期

大愛國心

張君勱

自由與現代社會

李璜

談中國憲政問題

梁漱溟

憲政與三民主義共和國

余家菊

中國憲政運動的歷史教訓（上）

陳啓天

蘇聯紅軍之演進

毅生譯

蘇聯婦女教育的新方向

釋因

理學漫談（一）

余家菊

新書評介（三則）

田父 舜生

元萬千壹幣國額總本資

各項樂器要緊

蘭州	西安	昆明	貴陽	柳州	衡陽
內江	江津	瀘縣	宜賓	成都	梧州
重慶	白沙	磁器口	合川	上海	長沙

中央信託局

民國政府特准設選

資本伍仟萬元

各超普通儲蓄存款

紐約建國紀念儲券

本期有獎號碼

轉取有歷儲蓄

各區信託及代辦業務

產物水大

戰時陸地兵隊運輸兵隊

一、**總局**——**重慶第一輯報**

普通國民學校

代購國內外材料

工業品進口土產出口

印製鈔票印花

1. **THE**
 2. **THE**
 3. **THE**
 4. **THE**

會計服務

代理處
外運
各設
國內

行銀裕泰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

法定業務

地址：重慶民族路七十八號

電話：四二四六一

匯兌迅速 服務週到

手續敏捷 信用穩固

通元寶

茶 廠
出 品

寶星沱茶

勝利蛇茶

翠湖散茶

得勝陀茶

成 績 表

寶元通各分號

各埠茶莊內均有出售

大愛國心

張君勸

第一 小引

吾國經抗戰七八年之久，若一線晨曦，隱約已達地平之上，然自今日迄於和約之成，謂一切危險已經過去，而不必有臨淵履冰之戒，恐任何人不敢作此肯定語也。歐洲戰局未了，英美兵力何時移用遠東，尙不可知，即令緬甸着着勝利，而運道之暢通，恐必待印度雨季之後。美海軍在南太平洋上由各島逐步前進，遠達於菲律賓島，然香港廣州灣之開闢，亦尙有日。當此青黃不接之際，敵人忽移開東軍開其敵爲五師至十師，或至少爲十番號，輔以裝甲部隊，以圖打通平漢路與粵漢路，吾之所以抵禦之者何如？此目前與迫之事爲朝野所關心者甲也。

日人此次之進攻，以吾國大河大江以北爲着手地，其目的有三：（一）企圖毀滅吾現有之實力，使其於英美登陸時，無法協同反攻；（二）敵人散在極遠安南及其他南洋各地之軍隊，彼既不顧其成爲荒中之蠶，如前所加馬紹爾羣島上之已事，然，惟海上船隻缺乏，無由從海上運歸，其惟一之希望則爲打通平漢粵漢各路，方能由陸路有一交通路綫，可以自南洋各地，或先經短途海道，以接陸運，或直接移於吾國邊界處，以逐漸撤退於華南華北各地；（三）我國沿海各省，在平粵線以東者，敵人企圖以之爲根據地，對英美與中國爲最後之掙扎。此三者由第一事之起，以成爲第二事之果者乙也。

此次敵騎之橫行，其爲孤注之一擲，爲人所共觀，然吾之

淪陷區因而日廣，各地人民爲敵所迫而使用者恐將益多，彼雖敗於海上，然猶可負隅頑抗於吾國領土之上。此由第二事之因，以成爲第三事之果者丙也。

以云吾國內部，抗戰之期久於歐洲，招致財政金融與工商之艱難，自屬理之當然。然財政支出之浩大，通貨之膨脹，物價之高漲，工商業生產之萎縮，物資之益形缺乏，久之究皆足以陷人心於不安，而不能不速求克服困難之道。此則異乎甲乙丙三者之來自外方面爲吾內部之問題丁也。

此四者，即吾所謂方今危險所在。然而其危險雖大，未必甚於抗戰初期之單獨作戰。何也？今有外援而昔則無之也。抗戰初期，既因全國人民之一致，以收今日之效果，今敵人又妄圖在吾國爲孤注之一擲，而倭虎牢許昌洛陽等地，吾國應如何益團結，益戒懼，益求政治上之進步，以度此危局而終達於勝利乎？

第二 英國之例

吾人試舉英國之實例言之。吾國人之論英國政治者，每名之曰議會政治，此名詞之由來，即出於英人所言閣之巴力門政治，或曰巴力門主權而來。一若英國最高權力在於國會，而其大政方針，或閣員更迭，皆由國會議員主之。蓋派總統，議院龐雜，故其國家大權不統一，其行政不敏捷。此在英國非平之日，有時偶或不免如此，然英之握大權者，要以內閣總理與各黨領袖爲多，決不若法國之多黨林立，內閣更迭頻仍，以陷政

府於机陞不安之境也。至於戰時之英國政治，與其所謂爲巴力門政治，不若謂爲巴力門所信仰之領袖之政治，上次之勞合佐治，今次之邱吉爾，其明顯之證也。英國戰時必有一各黨公推之人物，爲全局之主持人，然英之各黨生存與議會開會未嘗因此而間斷。戰時巴力門之權力，雖因授權政府之條例而受限制，然巴力門之預算通過權未嘗一日停止。吾人之意，平時稱英國爲議會政治，在戰時可稱爲議會各黨共戴一共同信仰之領袖之政治。雖內閣總理因作戰不力而去者，如前次之亞斯麥斯，如此次初期之張伯倫者，未嘗無人，然英人在於戰時，不重議會之討論，而重行政上綜攬全局之人物，可以斷言者也。惟其然也，有戒嚴令之發佈，有新聞檢查之條例，有平日所不採而戰時用之之徵兵法，有支配全國之力之去權，有工廠之管理，有糧食定量之分配，此戰時英國注重行政權之明徵乎。然其所行使之者，不出於一人一黨之獨裁，而出於各黨公推之領袖，不由於言論之壓迫，而由於輿論之同意，不成於官僚之佈滿全國，而成於人民自願參加此項工作。此則英國內閣總理之大權，所以能盾以各黨合作與人民合作，其朝宗於同一鵠的之勝利也。百餘年來，法國之戰也，有敗有勝，其敗也，失領土，變國體；德國之戰也，亦有敗有勝，其敗也，亦失領土，變國體；而英國之戰也，其準備不如人，其發動之早不如人，然常能以全國之團結，轉初期之敗爲最後之勝，至於國王被俘，受敵人之迫而變更國體，更爲英國歷史之所絕無。何也。英國平時尊重個人之自由，戰時則人人願受限制，政府亦未嘗藉口於戰事而橫加蹂躪也。平時雖各黨之間互有競爭，然戰時議員缺額之補選，由原議員之黨自行選舉，他黨決不與之爭競，更不在國家危殆之中徵求黨員。其富翁在戰事之中，其每年所得超

過未極數額者，國家課以百分之九十之所得稅，政府決無以戰事名義奪民厥剝民財以爲己利者。凡此所云，即謂一己一黨一職工團體之上，更承認有一共戴之國家在，大家應爲之犧牲，而不應趁火打劫。此則所謂大愛國心也。

以上所云，涉及大愛國心之邊緣，而未達於大愛國心之核心也。吾人試論吾人狹隘心理所生之愛國心，爲小愛國心，反之，其超越而上之者，方足以稱爲大愛國心。

第二 小愛國心與大愛國心

凡人各有其專屬，有所專屬而嗜好隨之，或爲一家，或爲一業，或爲一學，或爲一政。因其所專屬，如子弟之於一家，有父母兄弟之愛，則爲子者常樂道其本身父母之劬勞，而於他人之父母忽焉。此家庭方面狹隘心理之所由成。某甲以學工業之故，知工業之影響於國計民生者特大，吾國若鋼鐵若棉，向所未具，因而重工之言，益振振有辭，既有所注重矣，若農田水利森林水產，皆在見擯之列。此職業方面狹隘心理所由成。科學家嘗言哲學爲黑屋中捉黑貓之言，此即輕視哲學而重科學之意見也，然既重科學矣，則現時之獨重工科，在純理科學家言之，則爲不當，以無純理科學，則技工之基礎將永不確立。此又爲學術方面之狹隘心理。以云政黨，則其重己輕人之心理，尤爲顯露，或以本黨對國家之貢獻特大，其領袖在歷史上地位之特高，尤覺本黨不應一日以政權拱手授人，而已是人非，惟我有功，人皆有過之心理，尤牢不可破。至於工黨或社會黨其產黨昔年常以旁貸利害對立爲出發點，但覺自己爲受壓迫之人，不可不謀自己利益之保護，而民族本身文化傳統則忽之，此爲政黨方面之狹隘心理。凡此種種心理者，在

臨時之對外一致，亦為歐洲各國之常例，全國之人共息各人各業各黨之爭，悉聽命於領袖一人之下，以效力於國場或後方。人民之自由，本諸國會之授權加以限制，人民之各工廠歸於政府統制，各黨派訂立政治的休戰協定。其所以如此為之者，必內部之意見消除，然後能外競以達勝利之目的也。然此種風氣之養成，非曰凡為政府者，以一紙號令之宣佈，便足以左右全國之民心使之從吾矣。何也，但許一人一黨之愛國，而不能將他人他黨之愛國兼容而並包之，則在己黨雖有愛國之誠，而未能勝而大之，即孟子所謂不善推其所為者也。吾人取英與德之歷史互相比較，便知國之有大愛國心者，雖敗而必轉為勝利，無大愛國心者，雖勝而必敗，此非徒兵力為之，而政府人民所以相處相待之恕道，或西方所謂彼此容忍心之有無實為之。

第四 結束語

吾人所共信者，曰勝利之必屬於盟邦與吾是也。然吾國在勝利確立之前，尚有若干難題，如首段中之所列各項是也。吾之所以擬之者，是為吾第一線兵士之責任。然美也俄也英也三國之援助，是為吾之理所得而請求，或為俄方加壓力於滿洲與日本，或為美方加速度進攻菲律賓，以達成吾國港口之開闢。詳則盟方在緬甸之盟軍應在雨季以前攻下密支那，以期滇緬路上大砲坦克源源而來。然為達以上各種要求，則吾內部政治之民主制度必須早日實現是矣。方今盟友之所以懷疑者，皆由吾國從來不民主之積習使然，非一朝一夕能轉移外人之觀聽者，然為吾目前防惠計，為失土收復計，與其因外人之疑吾政治制度而功則敗於垂成，何如早改革現制，不獨在內可以相安，外人之疑亦亦渾然冰釋，是所得者大，所失者小，果何樂而不為

乎？

蘇俄之所為，已於最近之新疆事件見之。美之所為，於各報之評論，及哈佛大學教授之言言見之。倘我政府一旦毅然決然開誠心佈公道，不注意形式方面之國民大會與成文憲法，先將目前各項實際問題，如軍隊之國家化，如言論自由之確立，如各黨活動之公開，如參政會權限之擴大，先一一實行，則內部之磨擦既除，團結因之確立，以周旋於英美蘇之間，益有把握，以之應付國外輿論，自能撥雲霧而觀青天，以之改革內政，則各黨各派且擁護之不暇。是則所以謀勝利謀建國者，厥在於大愛國之心培植發展而已。

夜雨

登恪

浙瀝聲中沉萬喧，揚輝暗角賸燈尊，心情一室依紅焰，屋外乾坤付雨吞。

暮歸

登恪

低飛倦鳥覓林隈，我亦蒼黃曳杖回，衝破萬家燈火路，獨披寒霧過江來。

江城畫角催旗落，茅舍人還趁暝鴉，稚子迎門牽笑語，中年情味此生涯。

自由與現代社會

李璜

用這個題目，我想在下面說明三個觀點：（一）自由二字並不可怕，自由不一定是個人主義的，而且個人主義也不一定就是自私自利的。（二）現代社會又何以必要個人自由？自由在社會進化中，以何因緣而產生出來的？（三）現今所謂國家的自由，與個人的自由是否立於對立衝突的地位？

一

假使我們人類每一個人的出身，都像西遊記上孫悟空那樣，既無父，又無母，他是從一塊受了日月精華的頑石當中鑽了出來，無挂無礙，用他身上許多毫毛，吹一口氣，便可以變化作許多東西來使用，打一個筋斗，便可以跑十萬八千里，上天下地，為所欲為。——孫悟空這種離却人的一切環境條件，毫無依傍，也無需求的自由存在，確是令人可怕，所以他高興與玉皇大帝開頑笑時，天宮全體為之失色，玉皇也有些害怕。

可惜人類的存在，都不能像孫悟空那樣，每一個人的出生，既各有父，又各有母，並且各有他的家門親族，社會環境，遺傳與歷史等等。每個人一生下地，便離不開環境，便少不了需要，哺乳提攜，無非依傍，衣食住行，早具定型，或穿長褂，或穿短衣；用筷子取菜的民族則不能自由用手來抓，如像南洋土人那樣；說話有一定的文法和用語，自由顛倒的去用，便沒有人懂得你說的甚麼；一時風尚作揖碰頭，你行禮便須作揖碰頭，一時變為握手鞠躬，你又只得握手鞠躬；歷史習慣是

死了一身附棺，下土埋葬，你的命運便終須一個土饅頭；歷史習慣是將死屍切碎喂鳥，你的命運便必得分屍萬段，鴛鴦合去，而且稱為升天了。不但死了沒有自由，你未生以前，又何嘗是自由的。人之生必須有胎，胎之初只一細胞而已，但此一細胞中之染色體，即已編有先天的遺傳，像鰐鰐格是有遺傳，鰐才調也有遺傳，某種疾病常遺傳，早熟早衰也遺傳，一個人在娘的肚裏養，他的命運便早注定了至少一半，所以盧梭所說：「人生本自由，社會與宗教桎梏，一生一生本自由」四個字是不確實的，是被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常識所否定了的。現代哲學家李德金曾說：

「每一個人類，在他的構造上，好像是單獨的，但在他的構造上，便有父母種性之不同，在他的各部份的凝結上，則更複雜了：遺傳，環境，以及一切因素均存在影響一個人的品質。就這三個所謂個人的品質，個性！他如同傳燈賽跑中的火炬，——文明進化就有甚深的積堆，而不致隨時落空。」

柏格森也曾說過：

「所有生物，其生之情況，有時站住，有時被掀動，于一種力大無比的風吹之中。小小動物在被掀排時，常着力緊貼於草木之上，而人類則駕於其他動物之上，全體人類，在空間與時間之中，組成一無比其大的聯隊，馳騁於我們每一個分子的左右前後，用一種排山倒海的牽

拉之力，可以引着我們每一個人向前排除障礙。」

所以柏格森在創化論書中，把文化比如雪地中滾着的雪球，隨時在向前，隨時在加大，從原始到現今，新的成分雖然增加，舊的成分也在裏頭。假定剖開新舊滲混的局面來看，對於我們每一個分子，究竟新的力量的支配力大呢，還是舊的力量支配力大？在社會學家孔德便認為舊的支配力大些，所以他曾說「死人的力量比活人大。」這是孔德歷史哲學的中心見地，這個說法在現代社會學家解釋上，便是，社會先個人而存在，社會化（socialisation）的力量要勝過了個人化（individualisation）的力量。反過來說，人類的社會化日益進步，而個人化乃隨之進步。文明民族比之野蠻民族，中間較能發現個人的格調與其價值，這乃是文明社會之社會組織比較進步，分功愈密，相需愈切，而一社會中人與人乃益互相尊重的原故，這並不是甚麼個人主義的學說發生了力量，而是社會事實演化的結果，這個道理，我們待下段談個人的人格和自由何以產生出來，再來詳細說明。

總之，我們在讀了社會進化史之後，雖不必去信從孔德「個人是虛體，社會纔是實體」的說法，但我們應相信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却是在社會事態上不會有的。因之這種只顧私利的原始衝動慾，就在有社會組織的蜜蜂螞蟻類裏，也已經被限制了，何況社會分功如此細密的人類。有許多人對於「自由」二字發生恐懼，便給他一個「個人主義的」形容辭，然後再由個人主義聯想到「自私自利」，於是自由乃係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的產物，所以非常可怕，罪該萬死。然而拿社會科學的常識來一開照，則自原始以來，既無赤裸裸的個人的存在（如孫悟空一樣）則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便不會存在的。認為人生來

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如同禽獸一樣，（其實禽獸也是有社會性的）而必須加以嚴格教訓，方成為道德的人生，這是十七世紀宗教家和教育家自誇其教化之力的說法，這個說法在現代教育上早已站不住腳的了。

二

原來專制朝代都惡個人自由，認為自由是一種毛病，一種罪惡。提到個人自由，就好像所有社會的生活都被破壞了，所有法紀的繼續都被打斷了，國家因之成為一片散沙，社會因之完全解體；這是如何可怕的東西！於是這兩個字寫出來都犯忌諱。嚴復譯穆勒的自由論，怕觸犯清廷的忌諱，便不敢直稱自由論，而改稱羣己權界論。嚴復為自由下的界說也很含糊，他引柳子厚的詩句：「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這樣蜻蜓點水似的點了一下，其實離題甚遠。自由的定義在中國人腦裏始終沒有明白，無怪有許多的人在今天還對之生恐懼了。

我們要了解自由為何物，須先知道自由是如何的產生。在這裏請恕我不談哲學上的解釋和學說，既不把從柏格森到康德，笛卡爾等理智學派對於自由與自由思想的說法敘述出來，也不把從柏拉圖到黑格爾，尼采等羅曼意味的英雄和超人說法來比較一番，這樣用哲學術語來將自由選擇（libre arbitre）或主觀精神（esprit subjectif）等加以辯論，結果仍墮於糾紛的理論或專斷（dogme）而且容易聯想到中國的高尚趣味主義如巢父許由嵇康阮籍的放浪形骸，或希臘羅馬的忍苦一派，這就離題愈遠，扯不清楚了。我們認為自由在現代的產生是一個事實，並且是一個社會的事實，因此我們仍願意本着社會學的

觀點，將這個社會事實敘述出來，以見個人人格或自由需要，不是由於學說和主張，而是由於社會形態變遷，社會組織進化，而必然的產生出來，雖有大力，也莫能遏止的。

敘述事實之先，請注意我們所說的自由是現代的，現代的自由含義與古代不同，我們看下去便可以明白。說到現代的自由，如我們今日所知，在英國，美國，法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裏，這個字內含是些甚麼？每一個人，他只能服從法律，非依法律，任何個人或多數人對於他不能逮捕拘禁審問或處罰，這就叫身體的自由。每一個人依法應由他處置他的財產，選擇他的職業，不能追問其原因或趨向，這就叫財產和職業的自由。每一個人有權利說出他的意見與主張，或決定他對某種意見主張的贊否，對於他的意見可以行使權利去叫一些人信從，來共同主張，這就叫言論，信仰，著作，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他有權同安樂業，出外旅行或移居別地，這就叫居住遷徙的自由。

這一些自由的好尚，在現代社會裏，不但成為倫理的規範，而且定為法律的條文，要政府去尊重他，其目的何在，換言之，現代政府與社會准許每一個人有些自由是為的甚麼？一部法學史便容復得很明白，從前社會倫理與法律所科的義務對象是整體，凡有罪過是羣體負責任（responsabilité collective）而現代社會倫理與法律所科的義務對象是個體，凡有罪過是個體負責任（responsabilité individuelle）。既然要個人負責任上的責任，則這個人必須有若干的自由權利，他纔能夠負得起這個責任，至少必須這個個人在精神上感覺着他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由的，他纔能夠承認他是負責任的。現代法律之所以認小孩，瘋人，白癡等在法律上不負責任，因為在精神上他不能

感覺得到他是自由的。

我們離開社會進化史一看，便知道在原始社會裏，一切個人責任均由羣體負之。野蠻社會，甲部落中一個分子對於乙部落犯了殺人的罪或使人殺了，則甲乙兩部落必全體與師動衆械鬥起來，這個辦法，在川康的獼猴社會叫作：「打冤家」，打冤家必須見血，甲部落殺了乙部落一個人，乙部落必須取甲部落一人殺之，（不必一定殺兇手）因此冤冤不解，數十代人這樣彼此報復下去。歐洲中世紀的社會，一個信徒對於神犯了不敬不潔的罪，也是全社會負責，神要降罪，全體信徒共受之。中國專制帝王時代，一人犯罪，誅及妻子，同族，三族以至九族，乃是家族的羣體共負責任。而中國封建法統，也如同歐美社會，將羣體負責變為個體負責，現代中國人犯了罪，在法律，不但不及同族，而且不及妻孥了。（除了在犯罪證據上其妻孥乃是意見），實言之，現代中國也是如同歐美現代社會，法律的對象是科個人的責任了。

這在法學上個人負責的理論，在法學哲學裏和個人心理學家的說法，便認為這文明人由於理性進步而生的自我情緒（sentiment du moi）和個體意識（conscience de l'individu）必然使每個個人意識，和法律上要去負責任，所以「人權的要求，」和個體的負責是同時發生的，換句話說，自由的種種權利的需要，是自然的同法統的種種個人義務同時而來的。但是法律哲學家和个人心理家所說這種「必然」與「自然」的表現，在社會學家看來，不是個人理智進步的結果，而是社會形態在一定階段上有了變遷，社會組織在某種程度上有了進化，而自由的需要與個人的負責不得不同時產生出來。

所謂社會形態的變遷，是因為交通日益頻繁，人口日益

中，人類的密集與轉徙同時加甚，而同化作用與分化作用便同時加大，於是由家族與部落的社會形態變為城市以至國家的社會形態，在這形態變遷中，最初只知有家族與部落，其生理和心理都與個人緊連在一起，而無法分開，漸集成城市，更集成國家，同化和分化同時在起作用，於是家族和部落所能涵化的身心，到此便無法維繫，而個人便從傳統的觀念與社會的環境當中解放出來，平等，自由的好尚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裏發生長養的。社會學家達爾德（Taine）與布格勒（Bouglé）均解釋很明白：或由於互相模仿，或由於社會同化，其結果在心理上一定的變為不一定的，簡單的變為繁複的，專制的變為自由的了。

在這轉徙與密集的過程中，社會組織便日趨於繁複與進步，這個進步是由於分工的關係。在一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古家族或原始部落裏，其社會組織是經濟生活，宗教生活，倫理與法律生活，教育與政治生活都一併限於家族或部落內，那時在這個由於血統（或血統的相信）的單純組織內，個人一切都解決了，這所謂「自給自足」。那時在一個家族內，或部落中，也並無所謂交換與契約等行為。待交通發達人口集中，所謂城市經濟成立了，社會分工便不得不開始繁複，從前一家人日常生活所需，一家人便自行製造，消費者與生產者都是這一家人，而在都市裏便不可能，油鹽柴米醬醋茶等等分工各成專業，各造一種，以為交換，一個人在都市裏，他雖能執一業以為生，但同時須靠其他許多業的產品，用他專業換來的錢去買得來，然後始能滿足其需要。因此他雖有業務，但不能不尊重別人的業務，別人亦然，這個彼此尊重，個人自由解放便從此日益發展起來。這個事實，在現代哲學家社會學家和

經濟家都已看到，還給這個現象以一個新的名辭，叫作連帶主義（solidarisme），就是說在現代社會中，每一個人都與他人有連帶而離不開的關係，因為離不開，便不能不彼此尊重其個人的自由了。

社會學家把史事來證明這個看法，最明顯的是中世紀歐洲所謂小市民的革命。這些聚集於王公堡壘周圍而漸成城市的市民，他原先本也是王公的農奴，因為適應王公的需要，各人專精一業。或為裁縫，或為負販，或為木匠泥匠鐘表匠等，各自分工，大得王公之寵幸，便被王宮解放，成為自由的市民，而這些小市民分工愈密，其業愈精，彼此交換，以應彼此之需，彼此皆知尊重其個人自由，於是羣向王公漸次提出自由程度放寬的要求，王公為其需要，既然離不了他們，不能不答應，結果使王公與市民平等，這都是由於分工的關係，王公無法獨自閉戶生存下去了。

個人自由的解放是這樣的事實中產生的——在這樣的社會形態的變遷與社會組織的進步中日益進發而成功如此的要求的，這並不是某一個人的特別提倡而有的學說影響，也不是某一民族的特別散漫，而表現出來的一片散沙，在社會學家的見地之下，沒有一個民族在任何進化階段中是會成為一片散沙的：在古代家族或部落社會這階段中，個人與羣體意識不分，固不會成為一片散沙，就是在現代民主國家的社會階段中，分工最密，組織最繁，固然自由主義因之發達，但同時連帶關係也因之密切，所以社會學家認為自由主義與連帶主義是在社會進化階段中成為雙軌，而且同時並進的。

只要在社會進化的事實上，了解到了自由主義是與進帶主義同時變軌並進的道理，則個人的自由是否與國家的自由兩相衝突的問題便自然解決。所以還要發生問題的原因，乃在一種唯心派的看法，不認為個人自由解放是一個社會進化歷程中的事實，而認為這是人慾的橫流，風尚的嗜好，如同嗜好烟酒，以便神經受着刺激，而會痛快些一樣。當然煙吸多了，可以傷腦，酒飲醉了，可以罵人打人，擾亂社會秩序，於是把個人自由解放當成慾，視同煙酒嗜好，為之異常戒懼，恐怕個人自由一解放，社會秩序便會大亂，於是便如同父母隨時招呼小孩一樣：當心，當心！又如同警察招呼犯人一樣：守法，守法！其實歷史所表現出來的事實不是這樣的。一七八九年法蘭西大革命是由於個人自由解放的呼聲而來，打破巴斯底監獄，放出無辜受囚的市民，並且羣衆共起密判法皇路易十六等人，這時可謂自由平等成了高潮！然而「祖國危殆了」的呼聲一起，普魯士的外兵將打入巴黎的恐懼一來，全體的巴黎市民拿着各樣不同的武器，前仆後繼，華爾米（Valmy）一戰，普魯士強兵

為之披靡，祖國獲得了自由，而巴黎市民犧牲得不少，這是顯明爲了個人的自由，並不是便不顧國家的自由了。進一步講，惟其要有個人的自由，然後國家的自由方纔能得着保障。如其一國國民對於其自身沒有自由的意識與人格的好尚，則對於其國家之自由也決不能了解而無所謂了。這裏的事實例證更多：中國歷代暴君虐民，絕滅國民的自由，雖有外患，而內亂且隨之而起，內外紛乘，朝代以遞，如宋明之末，都是例證。我們相信德國納粹必敗，日本軍閥必亡，就是本於這個例證，德日絕滅其國民的自由，結果其國家自由必然不能保。我們更相信英美的民主必勝，也是本於這個例證，英美一向由法律的保障，尊重其國民的自由，其國民自然覺得他的國家可愛，而要始終拚命救護其國家的自由的。我們不看見好愛自由的愛因斯坦教授等本爲德國人，而反棄掉德國，去幫助美國製造火藥嗎！我們不又看見美國籍的日本人也編成隊伍去打日本軍閥嗎！我們便未曾聽見英美國人趨往德日去幫忙納粹。即此一點，已足令我們深長思之了！

陳啓天新著兩種

一新社會哲學論（定價一元四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孫子兵法校釋（定價四元）

中華書局出版

談中國憲政問題

梁漱溟

我始而標題「中國憲政論」，後來自己恐怕不能對這一問題透澈地言所欲言，作成首尾完整之文，乃改用今題。取其比較輕鬆，隨意寫多寫少不拘。繼續不斷談下去，未嘗不可；如其不然，隨時亦可截止。

此次政府於國防最高委員會內，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要我參與其事。我謝不應徵。於答覆邵秘書長力子先生函稿中，說明我從來認為憲政可以為遠圖而非所謂急務。又說我們都盼望政府實踐民主精神，而憲政却不必忙。

今為第一談，便將先談我對於此一問題的態度。中國憲政問題的發生，至少亦有五十年，而我剛好便是五十歲底人。我自十五歲後，便熱心國事，三十五年的憲政運動都在我心目中。假如不是親自參與其事，亦是耳聞目睹底。其間總有自己意見和態度；今便是先談我自己先後態度之不同。

我最初態度，自然是渴望中國憲政之實現。大約當前清光緒宣統年間，比較有知識底人，都是如此。那時領導憲政運動底，是梁任公先生一派人；其出版物流行內地人人傳誦。而駐外使節各省疆吏，莫不獻言籲請，力量確是很大。民國亦有開會演說，作種種活動者，多是各省諮議局為之倡導。末後，則各省諮議局推定代表，有全國大聯合請願開國會之舉。清廷規定九年預備立憲程序，將應行準備之事，一件一件排列詳明，燦然可觀。而我們渴望憲政底，却大為譁然，覺得九年太遠了！真沒有想到，過了三十多年至今天，中國的憲政還是在預備中呢！

這時候，談憲政者多半集中在「開國會」和「實行責任內閣制」兩點。（不像今人言憲政便聯想到開放言論出版等自由，更沒有民國十八年那人權運動）政府所模倣底，是東鄰日本；而我們則莫不歆羨英國式憲政，夢想「政黨內閣」「議會政治」。大家心中絕不發生這事可能不可能的疑問。今日想來，其所以不發生疑問者，原因就在有日本之例近在眼前。當時人都相信，日本以一小國而能一戰打勝中國，再戰打勝俄國，全為實行憲政之效；日本既可以學西洋而成功，中國有什麼不能成功底呢？至於作到日本式憲政或英國式憲政，那亦不過程度之差；要看人民奮鬥之如何，和統治者固執不同執而已。——當時觀念便是這樣簡單，這樣淺薄。非獨我一人如此，實在不會發見有什麼不徹底意見。

就在清廷以九年預備立憲，拒絕了開國會之請求，並逐各省諮議代表出京之後，內地人心乃轉向革命。我亦是其中之一人。原來清廷的顛覆，民國的成立，除當時的革命黨外作用於其間者還有兩大力量：其一為各省新軍（新式陸軍）；再則便是這代表被逐的各省諮議局了。革命既起，憲政似乎不遠，但憲政方式却亦發生一點小問題。那就是革命不要君主，無論日本式英式都不能用；將必選擇於美法德式法國式之間。而論憲政運用之靈活，美國法國皆遠不如英德。於是康有為氏特著「虛君共和論」一小冊子，說革命無非要求共和，英法亦是一種共和，即所謂「虛君共和」。鼓吹保留君主制度，假如不願保

留清帝，亦不妨選立孔子後裔爲帝。他的話，當然不發生什麼影響。却就一般人的憲政觀念而言，辛亥革命後，從英國式轉向於法美，多少算有一點變動。「總統制」「內閣制」之討論，即盛於此時。本國法國式（即內閣制）較近於英國式，而後採用。當然此亦是爲了對付袁世凱之故。不過多數人念及於「議會政治」，構成當時的憲政思潮，亦是不可忽視之一因素。

從清末之資政院，到民國初元之臨時參議院，以至正式國會開會，我都是熱心旁聽底。除了議員們之外，沒有人像我那樣日日出入於議會之門。同時，自然我亦要出入於政黨之門。我的政治思想，初時受梁任公影響極大，於梁系人物亦有相慕者，所以「共和建設討論會」「民主黨」的先後黨部亦常走動。而自參加革命以後，亦算著籍於同盟會；所以同盟會本部和國民黨本部，往來更多。當時梁派之夢想議會政治、政黨內閣，固不消說；即同盟會之收合「統一共和黨」等小黨，以改建國民黨，亦正是本這一傾向而來。這一改建，意在將原來革命底秘密組織，轉變爲憲政軌道內公開存在合法競爭之一政黨。那時，婦女參政尚未得通行於那些憲政先進國家；因此，同盟會本來有女同志，國民黨却不收女黨員了。更重大底改變，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被刪略，而在另一條文中，代以「民生政策」字樣。這就是只談社會政策，不談社會主義。在主持改組者的信念，只要憲政奠定了，任何問題無不可在憲政內求解決。何況中國還沒有歐美社會那樣問題，只須在產業開發之初，運用社會政策得宜，不難達成理想。而且社會主義在那時都看作是高調；改組國民黨恰在正式國會開始競選的前夕，爲「接近社會」一般心理，以期多得選民，亦是要避免底。孫總理對於這些改組者不滿意，爭執十分激烈；然

卒如此議，建立民國初年底國民黨。我在當時沒有資格參與這些討論，然而卻得個閒議論。在我的意識上，完全贊同宋邁初（力主改組者）一議，以爲真是間違之極了。

政治上固偏不左偏右、偏左、偏右、急進、緩進兩大派，國民黨當然是前者，梁任公一派當然是後者。現在兩方面恰抱相反內閣之同一理想。於是宋特訪梁密議，以兩大黨一黨在朝，一黨在野，互爲監督，互爲監督；彼此相期勉。這決定正式國會開會後，由國民黨主閣，成立得一很好底諒解（此一諒解之成立是必底底，宋被刺後乃漸宣於外）。宋梁兩先生，不能不說是那時最有遠見底人；而且他們的識見，實爲多數人所接受而形成了公共意見。此一諒解，更不能不說是他們共同的家前途，所作合理打算。然而不久，都被事實所粉碎。不唯當時成爲空想夢想，亦許永遠是一儲蓄想！

粉碎這一合理打算者，照史實說，是袁世凱之破壞約法。自是以後，則是北洋軍閥一面再，再而三底玩弄憲政。到民國十三年曹錕賄選總統，同時公布憲法之一幕，可說中國憲政運動的前期就結束了。雖然接續還有段執政時代之憲法起草委員會（以林長民爲首），實不足數。此後應該劃然別作中國憲政運動的後期。前期後期如何分別，後面再詳。這裏要說我在結束時期，所得感想和啓發。

說前期運動結束了，是吾人自今日回想而判斷其壽命已終底話，在當時只顯示此一運動之失敗而已。其失敗之慘，與其熱心於其運動者能深刻感覺之；失敗的教訓，亦必曾致力於其運動而肯用心思者，乃能領會之；外人總不免隔膜。我於這一期運動，只算得一無名小卒，原不足數；然而體驗和覺悟，却言之不盡。約舉其大者來說：

第一、打擊這運動使它不得成功底，看是袁世凱北洋軍閥

那一幕一幕歷史劇；實則造成這幾幕劇底，不是我等個人，而是那時全體社會。何以言之？箇人的意識，不是憑空來底，是從社會來底；更且離開社會的支持，箇人是沒有力量底。說支持，不一定要積極支持而後為支持；消極容忍他，亦便是支持他了。我在民國十年出版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曾說：

西方政制所以不能安設在中國之故，全然不是某一箇人的罪過，全然不是零碎底問題。雖然袁氏野心，軍閥搗亂，都不能不算一種梗阻；而根本原因却在國人不能克服這梗阻，而竟讓他成為梗阻。

正為親眼看到袁等行動，皆由於許多人助成他，尤其大多數人縱容他；憲政運動却日就分化，崩潰，動搖，沒落。暴力打擊，不足令人氣短；自身沒落，却令當初熱心的人不能不氣短了。體驗就在這裏，覺悟就在這裏。

第二、一種政治制度不寄於憲法條文上，却託於政治習慣而立。西方政制，在我國並沒有其相應底政治習慣，全然為無根之物，單憑臨時約法幾條條文，建立不起自屬當然。像英國的憲政，更是習慣之產物。在一般習俗與英國大致接近之美國人法國人尚且模仿不成；我們社會距離英國，不知多少遠，其不能模仿又何論焉。我在民國十九年出版「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曾說：

（上略）似此三權分立，相依為用，又復相對抗衡，各有所限，或互為制衡，原是沿着英國歷史不知不覺演成底事實；然後孟德斯鳩乃從而為之說；然後若美國，若歐洲大陸國家，乃有意識地著為法律制度。即在後之取法而制者，雖非自然演成底事實之比，固亦自有相當歷史根據，或新興氣勢可憑。一言以蔽之，西洋政治制度所為如此安排設置者，正為其事實

如此，有在法律條文之前者。然在我們則何如？一點事實無有可憑，而曰「我今欲如此云云」；但憑條文，期收大效，詎非夢囈！天下莫巧於自然，莫拙於人為。自分權標為學說而刻劃失真，訂為制度而膠柱不靈。今世仿行之者遍於各大洲土，察其政制曾非其相懸，而政象之一美一惡，一治一亂，乃不啻天壤之殊。是其故，蓋全在其制度或本乎事實之自然，或較近於事實，或離乎事實而徒人為之拙也。然若法之於英，南美之於北美，亦不過仿行其制，而事實有所不逮耳；猶未若事實根本不同，而口味相師如中國之於西洋者，則其事不止於拙而幾於妄矣！（中國民族自救之最後覺悟，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人今後必須斷絕模仿之念，而自本自根，生長出來一新政治制度才可以。從民國十五年後，決心從事鄉村工作，至今此志不移。其動機，就是要由小範圍地方自治入手，為中國社會培養新政治習慣，而努力一新政治制度之產生。（在鄧著「鄉村建設大意」一鄉村建設理論」等書中，均說明此意）。

第三、更進一步，我們由此認識得中西兩方人生態度絕相異，或說：民族精神彼此絕相異。西洋這種制度所由產生，全在其向前爭求不肯止步之精神。所爭求者，一是箇人種種自由權，二是預聞公事底公民權（或參政權）。這些問題一經確定下來，便步入憲政。而其憲政所賴以維持而運用者，還靠此精神。如果不是大家各自愛護其自由，抱一種「有犯我者便與之抗」底態度，則許多法律條文，俱無效用。如果不是大家關心其切身利益問題，時時監督公事之進行，則大權立即為少數人所竊取。所以這種精神，實在是憲政的靈魂。但中國自一九一一年革命後，徒襲有西洋制度之外形，而大多數人民的根本

精神却不能與之相應。淺俗之人看見大局擾攘不寧，便太息責怨大家之爭權奪利；我却說道這正爲大家太不愛爭權奪利之故。這並非有意翻案，出語驚人，實在是當時一點真覺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二〇八頁：

「今日之所患，不是爭權奪利，而是大家太不爭權奪利。祇有大多數國民羣起而與少數人相爭，而後可以奠定這種政治制度，可以寧息累年紛亂，可以維持各人生命財產一切權利。如其不低頭忍受，始終在作逃反避亂的消極打算，那就永世不得太平」。

在此以前，我民國七年爲反對內戰而發布「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小冊子，民國九年爲批評一般盲目提倡佛法者而作「唯識義自序」，皆發揮此義。總之，民國十年以前，我的態度都是如此。我相信中國人的人生態度，必要從「讓」轉到「爭」才可以。那亦就是認定中國人只有隨着西洋路子走，乃有其政治出路。

其實這些體驗和覺悟，不過是最後覺悟之前導；尙不免於知其一，不知其二。從民國十一年，我漸陷於懷疑煩悶，久不得解，直至十五年以後，對於中國的憲政問題始有新觀念展開。

當這前期中中國憲政運動慘敗，我正在煩悶不解的時候，而中國國民黨有十三年改組容共之事，開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中國近二十年的政局於此開端；中國憲政運動的後期，亦要從這裏說起。——雖然這次舉動並不以黨政爲號召，而且在某些點上像是不合於憲政風氣底。

我在上面，曾指民國十二年那煌煌一大篇憲法之公佈，爲前期憲政運動之沒落幕終；現在我又指這不揭憲政名號乃至不合憲政風氣之國民黨改組事件是後期憲政之肇始。前後對看，

真是如映成趣！非我有意爲此趣文，淺到中國的憲政運動實有不可不請讀者注意之特點：

第一、請注意它原不是真正憲政運動。讀者乍聞此言，或不免驚異；其實無可異也。真正憲政運動，是老百姓起來向羣國鈞者要求確立國家根本大法的運動。所謂憲政便是一切事情都要根據此根本大法而行的政治。其內容意義要在自由權之保障和參政權之取得。它可以說是來自人民之一運動。然而中國當年之擬憲政，却出於挽救危亡之動機，是站在「民族立場」。如我從前所說，它只是涵在民族自救運動之內底。民族自救運動則是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來，中國民族適應不了這新環境，感於國勢陵夷而發生底。從民族自救運動的起手來說，恆必起於國內政治之改造；從自救運動之完成來說，又必包涵了一種理想底政治之實現。從頭至尾，貫澈其中者，實有一新政治運動在；憲政運動正是其物。蓋無論當初之革命派或立憲派，無論今天的國民黨或其他黨派，莫不以憲政爲其理想政治；雖然其所謂憲政者，亦許彼此有些出入。

距今幾五十年前，有中日甲午之戰，國勢陵夷，警覺最大。自救運動由是激進，憲政運動由是激進。距今四十五年前（庚子）有八國聯軍入北京之役，使阻撓此運動之守舊勢力大受打擊。距今四十年前（甲辰），有日俄之大戰在我東北，俄軍敗績。當時負負時望之張季直先生（謇）給當局執政者的電報說：

「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

這正是代表最流行的意見而說話。因爲日本蕞爾小邦，在它立憲十年後一戰而勝大清帝國，又十年再戰而勝大俄帝國；這兩個大國都是其頑不立憲底。好像事實給予了立憲論者以驗

有力底證據，說服了在朝在野的人心，都認為中國國強必須立憲。於是清廷立刻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接着便成立了一「憲政編查館」，以為籌備憲政機構。我在上文曾說過，憲政在清末民初底人心目中，最注意「開國會」和「行責任內閣制」兩點，其故亦正在此。明白地說，當時人心只切盼一個能負起自救開強任務底政府出現，莫讓滿清親貴誤國。及至清廷拒絕了「開國會」底請願，而宣佈再待九年立憲，排滿革命的潮流遂為之急進。那就是不容他再誤國九年，策與不要君主立憲，而奔赴民主憲政之路。——試問：這與歐美憲政先進國家當初之憲政運動，可以說是同物嗎？以「自救國強」和「憲政」聯繫起來，恐怕在他們當初不曾夢得到呢！憲政在他們是目的，是到底要求，任何事物不足以易之；在我們則作為一方法手段了。以憲政為目的，則目的不達，運動不止，卒必成功。以憲政為方法手段，則一旦發見其他方法手段，不難轉而之他。在「救國第一」口號下，即令背叛憲政運動亦無難節之嫌。古語有之：不誠無物。對於憲政不以為目的而當作手段，便是不誠；中國憲政至今不得成功，蓋有由也。

我說這話，並不含有責怪中國憲政運動的意思。運動不是憑空發生底，要必有使它發生之問題在。中國人底問題，固不是當初歐洲人的問題；從不同底問題，發生不同運動，理所當然，夫何足怪。不僅過去憲政運動必然陷在變法維新運動內，即在印度革命（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二六年）運動內亦進行；抑且今後，憲政運動亦只能陷在抗戰建國運動之內，而不能分離獨立。中國之不能有獨立底憲政運動，亦正猶之它不能更有獨立底社會革命或社會主義運動一樣。所有這前前後後許許多多，要與非從近百年世界大變遷所形成之一大「中國問題」引發

的民族自救運動，而全然一脈相通底。至於憲政成功之早晚，那亦是為中國問題所決定；你便急亦急不來。

第二、請注意此國內運動之外來因素的重要。這自然是國前第一點而來底。西洋真正憲政運動，皆是從社會內部問題逼出來底。而我們民族自救，却是受外界壓迫打擊，自覺文化上種種不行，亟謀維新改造底運動。假若世界不交通，東方國家不受近代西洋影響，中國還是中國；即有問題發生亦必為舊日歷史之重演，而不會有新式民主運動，有國民革命共產革命這些。因為末後一兩千年中國文化已陷於盤旋不進，歐如斯密斯博士 Arthur Smith 所說：「如無外力進門，而欲中國進行改革，正好像要在大海中造船一樣」。近百年之中國，實從外面問題引發其內部問題。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就是對外求民族解放——外面問題；其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就是對內求政治和經濟之改造——內部問題。然此內部問題亦是由外面引發底；所謂外面引發，具有三義：

一、受外面壓迫打擊，激起自己整頓內部之要求；
二、受世界潮流影響，領會得新理想，發動其對自己傳統文化革命之要求；

三、外面勢力及外來文化實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將它捲入外面世界漩渦，強迫地產生一全新底「中國問題」。

因此，救國雖屬國內之事，而其所由構成者，外來因素却居重要。

這兩特點既明，我們便可以來解說中國憲政運動前前後後期所由劃分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中國憲政運動，其構成要素原在西洋近代潮流；却是到了上次世界大戰，此近代潮

說即說過去，而別有一種潮流代興。此新興潮流，恰是反乎那近代潮流底；它反自民主義，反商人主義，反資本主義。當大戰一停之後，糾纏入到中國來，而馬上在思想界佔取優勢。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中國國民黨的改組，皆由此而來。中國憲政運動之消潮，所以到至民國十三年為止，因為它自身底矛盾，正為它所提出之近代潮流沒落了。同時，所以反對運動於此算起，則因民族自救運動則明走向一新途徑。雖然它此時對於憲政風氣不合，例如不尊重個人自由，不將政黨開放給多數人；但此後中國憲政前途却還待它乃得開出來。它便不能不說是後期運動的端始。

民國元年國民黨成立時，我在場；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我不在場。我從來對於我見不到信不及底事，是不能參加底。我僅僅是那參加廣州大會李守常先生（大劍），送給我一切。十四年，此一運動益見發皇，顯呈榮采；要我進從軍則不能，却不敢不從中學學習。即於是年冬，在我們朋友中分出三個入去廣州。十五年北伐出師，他們皆在軍中，一同到武漢。十六年五月我自己方去廣東，但仍保持觀態度。——所有以上這些事情，舊著「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中華書局出版）第五——二十頁曾加敘述，今不更及。簡單說我頗得一些啓發，我是從中學學習了一些。

就在此時，我認識了中國問題，並弄明了民族出路之何在；數年疑問為之清除，所謂「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者，蓋正指此。我對於憲政問題一箇與前不同底態度，當然亦即產生於其中。還有許多見解和主張，亦是從那時演下來。所以在「鄉村建設理論」（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抗戰前出版）自序中說：

這真箇是見地和主張，萌芽於民國十一年，大體決定於十五年冬，而成熟於十七年。——此次做憲政討論會之召，於答邵力子先生書中則說「竊抱此見地至今殆積十有五年以上」；以十七年到今三十二年，是十五年也。

從那時起，我就致力於鄉村運動；——始在廣州標名「鄉治」；繼回北方，北方同志既以「村治」為號，亦因用之；未幾定名「鄉村建設」。鄉村運動便是我前憲政運動。所謂一個與前不同底態度，便是以前認憲政為救急偏方，今則知其為最後良藥了。此次答邵先生書，說「憲政可以為遠圖而非所謂急務」意本於此。

民國十八年胡適之先生常請先生，有人權運動之倡導（新月書店有人權論集出版）。倒退二十年我心算一份，倒退十五年（約法初被破壞後）我或者更熱心，但此時却無意附和。個人自由之神聖觀念，「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中國人本缺乏。清末民初學得一些，方苦不足，而布爾塞維克新風氣傳過來又破壞了；正我所以太息者。說我不了解人權運動的意義，總不能。那時節，我正在兵災匪禍之區，窮苦破爛底豫北地方，努力鄉村運動。說我對於社會運動無興趣不熱心，總不能。然則我自有的見地主張，蓋昭然矣。三十年在香港，亦有一次人權運動（時代批評月刊曾出人權運動專號），我不參加，亦是一理。

二十三年南京立法院以「五五憲草」公諸於社會，徵集各方意見。其時天津大公報初開星期論文欄，我寫了一篇論文，標題便是：我們尚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內容理論現在不談，態度固自可見。

二十八年九月忽有早施憲政之議發於陪都，而且通過於國

民參政會。那時我正從山東河南各游擊區回來，行抵晉南太行山中，深惜事先未得在渝與各方面商談，貢獻一點我底意見。十月到重慶，憲政運動正非常熱鬧，然我心知無結果。果然，後來事實證明我所料之不差。我豈是反對憲政嗎？我是愛惜憲政啊！

這回雖不同上次，說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制憲的話；然而亦算舊事重提了。就我個人講，仍和上次抱持同一態度。我認為：

一：眼前迫切需要底，為國內之團結統一；我祝望國人以求憲政者，求團結統一。

舟中望大石佛

登恪

一簑披送到中流，百轉迴瀾數萬牛，逝者如斯渾見慣，千年屹立大江頭。

烏尤寺軒畔老椿樹

登恪

似對青山似帶河，高軒四照石雲波，橫空一幹虬龍首，表裏靈山豈在多。

戲題方蘆垠新居

登恪

汶泗參差汲水前，東來簾鼓掃華鉛，城中兒女夢驚破，分取鄉農自在眠。
天涯有地無餘美，煙雨何妨一撥鄰，莫認松枝學戩柳，坐看春水噴沙唇。

二、實現團結統一為談憲政之前提；却不是從憲政可以達團結統一者（有人這樣想）。

三、民主精神實為團結統一所必需；沒一少些民主精神團結不可能。不如以團結統一責勉於執政方面；隨着團結統一，自然帶來了民主精神自由空氣。

四、對於憲政不曉得愛惜，不曉得珍重其事，便是憲政的罪人，願國人警覺。對於中國憲政問題，我自己先後態度之不同，已大略敘明。其所以轉變之理還待另談。

憲政與三民主義共和國

余 家 菊

33, 5, 31

民權一卷二期

「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是爲五五憲草開宗明義第一章。吾人對之，從不漫加反響，以國民黨革命多年，犧牲許多志士以及人民之生命與財產，掌握政權二十年，今者製定一部憲法，承先啓後總須有一個交代。以恕道待人，此種心情，是可以了解的。所以當年五五憲草公佈之日，立草一文刊佈於天津大公報，提出三民主義之解釋問題，嗣雖蒙受注意，而所爲答復，則仍嫌輕鬆，故更論之。

三民主義就其爲國民黨的主義言之，解釋之權自在國民黨；至爲國民黨之全體會乎？抑執委會乎？抑總裁乎？抑黨員之良知乎？則非吾人所得而過問。其次，三民主義既規定於憲法中，則成爲一種國家教義，國家當然賦權於一種機關以司其解釋之責；至此機關爲立法院，抑爲司法院？吾人可置勿論。又其次，三民主義既爲國民所必須信仰，國民對之自須加以認知，認知之中，自有判斷解釋。故於三民主義施以解釋者共有三種權威；一曰黨，二曰國，三曰民。使三種解釋而能趨於一致者，固屬大幸，而不能一致，則將如之何？

曩年國民黨內外友人，間有告我以三民主義與國家主義「差不多」何必固執？我每答謂：我可解釋國家主義如是，但國民黨是否如是解釋三民主義，則非我所能問也。及至二十七年國民參政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中有一「不違反三民主義」之諾言，既爲諾言，便不能欺已欺人，至少自心上須有一種心安理得之解釋。於是不揣僭妄，自爲一種解釋曰：信仰國家主義者

決無背於三民主義。何以故？三民主義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國家主義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自由平等，其意即獨立也，此其一。三民主義講民族，民權，民生，國家主義認定國家是全民的國家，故當由全民主政以求全民福利，所以二者無甚出入，此其二。此種僭妄的解釋，凡以自求不欺人，不欺己而已，至於國民黨的解釋，是否如此，固非吾之所能知也。

又如耕者有其田，此三民主義之要件，似無爭論之餘地。然而耕者有其田，實有兩種解釋之可能。其一曰：「凡」耕者「能」有其田。其二曰：「唯」耕者「得」有其田。前者即培植自耕農，創立小農場，更用合作社以扶助之，政府設施似近此。後者祇許耕者有田，田不得買賣，從而即不得爲私產，從而即須打倒地主制度。世間作如是解釋者，恐亦不無其人。在個人解釋與黨或國的解釋，趨於衝突時，其將何所去從？

或謂國事取決於多數，多數作何如之解釋，即服從之可也。不知服從多數云者，乃在行動上服從之，良心的主張並未放棄也。故民主國都許人民以信仰之自由。

歐洲在信仰不自由時代，其所以有宗教戰爭，既自由時，其所以宗派林立，實皆由於欲保持良心純潔之一念。何可忽略視之。

或謂宗派雖林立，而對於上帝之崇拜則同，對於耶穌之頂禮則同，對於聖經之信仰則同，雖有出入，無害其爲大同。國人但須信仰 中山先生，信仰三民主義，信仰全部遺教，則解

釋之出入，亦自無妨。予曰：是不然。往年有一次予在火車上，曾遇一傳教士，向予。耶穌道理，予告以青年會西人多與予友善。彼聞予言，蹙然曰：此一世界之橫流，皆此輩新教徒有以致之。予乃深悔予未曾知彼之爲公教徒也。據此，足見即在同一信仰之下，亦未足以弭爭？弭爭之法何在？即憲政軌範是也。人人恪守憲政軌範，以待己者待人，以尊己者尊人，則人心平，人心平則民氣和，而團結有可能，教學有可高之望。信仰之統一，未必能奏此功也。

對於憲法規定「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我不欲多加反對，但願政府許人民以依照良知而爲解釋之自由。因爲解釋自由，或可相安無事，於政策上所見縱有出入，猶可訴諸討論也。

古人有言：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所謂以仁心說者，即爲國家人民着想之謂也。吾之執筆，每以此自警。至於聽者何爲，則我之態度是：說不說由我，聽不聽由你，罵不罵由他。然而「憲政初步」，實不學習勿罵人！

悼亡妻宋靜芳女士並寄謝故鄉諸親友

慕韓

先室宋靜芳女士，以癸未秋杪歿於故鄉，予至冬初始獲聞訊。遠隔海上，歸視無由。家貧無以爲葬，賴諸親友醴質棺斂。予也徙宅忘妻，自慚薄倖，徇人喪我，終陷窮途。徒有阮籍之哭，空餘元稹之悲，爰賦二律，寄謝親友。失侶孤鴻，離羣哀雁，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

病中忽報孟光歿，客裏誰憐慘信傷。幸有嬌兒能執體，卻勞鄰友爲營喪。還家蘇武知何日，負屨梁鴻空斷腸。淚淚直教成恨海，海枯猶覺恨茫茫。

清宵慟負太常妻，徙宅真忘悔噬臍。怕聽隨風三季笛，夢聞鄰巷五更雞。結綢卅載成孤衽，屈指幾年曾並栖。別恨難懷誰與訴，離魂還帶錦江西。

中國憲政運動的歷史教訓（上）

陳啓天

人類一切事項的歷史過程，都含有一種學習過程在內。一切事項的學習過程，依照學習心理學的指示，都難免有試行錯誤。錯誤逐漸減少，然後可使學習成功。人類一切事項的歷史過程，也是循着學習過程前進。在初步試行一種新制度，或一種新生活時，總難免錯誤。最要緊的事，是要能從前次後，往知來，使錯誤逐漸減少，然後可完成一種新制度，或新生活。這就是現在所謂歷史教訓，也是從前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憲政，在我國是一種新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新政治生活，需要學習，自不消說得。我國開始學習憲政，到現在，已經有了將近五十年的歷史。但憲政尚未成功，我們仍須努力。今後我們究竟如何努力學習憲政，以完成憲政？最好，是先從過去憲政運動的歷史中去汲取教訓。

中國憲政運動的歷史，雖不過五十年，然也可分為三個時期來說：第一個時期，由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共約十四年。這個時期的政治趨勢，是由君主專制，到民主憲政。第二個時期，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到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共約十五年。這個時期政治趨勢，是由民主憲政，到軍閥專制。第三個時期，由北伐到現在，共約十八年。這個時期的政治趨勢，是由一黨訓政，到民主憲政。本篇擬先說明中國憲政運動第一時期的歷史教訓。另篇再繼續說明第二時期的歷史教訓。至於第三時期，現在尚在進行中，故須待至將來再說。

一、由君主專制到民主憲政

我國原來是世界上實行君主專制制度最早，而且最久的一個老大帝國。這個老大帝國，在秦漢時代，已經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由秦漢演進到滿清中葉，君主專制制度益為完備。在政治傳統上，固久已習於君主專制。在政治思想上，也多以君主專制為天經地義。加之滿清，以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更徹底實行絕對的君主專制。君主以下的中央機關，雖有內閣六部與都察院等，但大權均操之於君主一人，及與君主接近的軍機處。中央以外的各省督撫，雖對於地方事務，實際握有若干權柄，但須直接接於君主。中央以及地方的大權，均直接操於君主之手，這是雍正乾隆時代所完成的一種君主專制制度。這種絕對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延續到滿清中葉以後，在本身以及在效能上，均發生了大變化。絕對集權於君主的專制制度，必須君主本身十分健全。但清季諸帝，多幼年踐位，或享國不久，君上年歲不久，君主本身不能專制。結果，君主專制的實權，落於母后及親貴之手，而君主反受母后及親貴的脅制。這般代君主而專制的母后及親貴，又只知爭權奪利，而不知如何治國。因此清季的君主專制制度，只有君主專制之名，並無君主專制之實；只有君主專制的壞處，並無君主專制的好處。縱無外患，也難再延續下去了。況清季迭遭曠古未有的外患，不但暴露了滿清政府的無能，而且動搖了傳統甚久的

君主專制制度。所以甲午對日戰敗以後，便發生了憲政運動。

甲午以後所發生的憲政運動，可分為兩大派：第一、是君主憲政派，承認滿清，承認君主，而只希望改專制為憲政。這一派的態度，比較溫和，所以又可稱為溫和派。溫和派的領導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第二、是民主憲政派，反對滿清，反對君主，而只主張建立民國，實行憲政。這一派的態度，澈底激烈，所以又可稱為激烈派，或革命派。革命派的領導人物，是孫中山先生及黃克強。至於滿清政府，則不但要維持滿清政權，而且要維持君主專制；不但壓制激烈的民主憲政派，而且要壓制溫和的君主憲政派，可以說是澈底的頑固派，也可以說是反憲政派。以上三派，在清季的消長和成敗，是值得我們加以切實檢討的。

戊戌維新，是我國憲政運動的開場白。這個開場白的導演者，是溫和派的康梁。他們所高揚的旗幟是「變法維新」。變法維新的根據，在骨子裏是效法西洋，而在表面上則是託古改制。康氏做了一部新學偽經考及一部孔子改制考，特別推崇今文春秋（即公羊傳）的微言大義，以為他託古改制的張本。他於甲午之役以後，一再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維新。結果得了光緒帝的信用，造成百日維新之局。在百日維新中，康氏上了許多變法的奏疏，詳見他的戊戌奏稿。光緒下了許多變法的詔書，詳見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康的奏稿，有請定立憲，開國會，乞預定開國會期，並先選才議政，許民主書等事，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摺，及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畛，均直接與憲政有關，但尚未見之實行，亦多未見之詔書。最重要的詔書，如關於改科舉、辦書局、改官制、和裁冗官等，均只能算是憲政的預備。這種憲政的預備，在中國史上絕無前例，實在

是「速變全變」。於是引起種種衝突，在思想上，有中外、新舊和今古（謂今古文經）的三大衝突，而合成為憲政與專制的重大衝突；在實際上，有帝后、滿漢和權利的三大衝突，而爆發為母后專制與君主專制的一大衝突。結果，以母后為首領的滿族與舊黨專制，壓倒了以君主為首領的立憲運動。西太后再度訓政，因禁光緒，屠殺新黨，推翻一切新政，這即所謂「戊戌政變」。此次政變，不但使初步的君主立憲慘敗，而且使真實的君主，即光緒帝，既不能立憲，也不能專制，只成為舞台中的一個小囚徒。西太后既經因禁光緒，還想實行廢立。但恐「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宜防」，不敢立即廢立。西太后以及他的黨徒，妄想天開，以為可利用義和拳來扶清滅洋，先將洋人打倒，再來實行廢立。不知義和拳並無此大本領，反招至八國聯軍，攻打京津，連西太后本人也要逃難了。這即所謂「庚子拳變」。庚子拳變，可以說是戊戌政變的報應。如果西太后不再度訓政，想光緒繼續維新，便不會有庚子拳變。所以西太后逃難至西安時，曾發出一「不意見笑於帝」的呼聲。

西太后既見笑於光緒，於是想用變法維新來進養。他在庚子年底，即下詔「法。翌年，又設軍機處督辦政務處」，為籌辦變法的總機關。自此至武昌起義前，共十年間，清廷對於憲政的設施，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可以說全預備立憲。第二階段，自光緒三十一年至武昌起義前，至宣統三年武昌起義前，即通常所謂「預備立憲」階段。至武昌起義後，清帝退位前，共僅六個月間，清廷對憲政的設施及表示，則超過過去十年的預備工作。現在依照時序，加以扼要的敘述。

在第一階段內，最要緊的事，是確定了變法的趨向。但五

年間的實際變法，尚不及百日維新的充實和澈底。西太后的辦法如此遲緩，可見他對於變法，不但沒有真知，而且沒有誠意。預備復預備，到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始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回國後，才於三十二年九月御前會議中，決定「十年或十年以後，實行立憲政治」，並發佈預備立憲的上諭。從此由前一階段的廣泛變法，進入後一階段的預備立憲。在此一階段內，最要緊的事，是確立了立憲的趨向。而其重要設施及表示，有光緒三十二年的預備立憲上諭，宣佈釐定內官制；三十三年設立憲政編查館，籌備設立中央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頒佈憲法大綱及議院法，選舉法要領，並確定九年籌備完竣；宣統元年，召集各省諮議局；宣統二年，召集資政院；宣統三年頒佈新內閣官制，並組織所謂新內閣。從表面上看，似乎清廷的立憲預備設施，一天進步一天。但在實際上，清廷的先後當權者，如西太后奕劻榮祿載瀅等，以及一般親貴，實無一人真正了解憲政，也無一人願意實行憲政。他們的中心思想，只有一「攬權撈錢」四個大字。而且權只許滿族攬，錢只許滿族撈。所謂預備立憲，只是清廷敷衍門面的一種幌子。一再拖延，到不能拖延時，還要假借預備立憲的幌子，來實行滿族親貴攬權撈錢的勾當。對於民間主張憲政的人，依舊視為家奴，加以壓迫。滿清之不能用憲政挽回他行將沒落的命運，是值得我們加以考究的。

最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滿清政府始終對於實行憲政無誠意。這只須看看預備立憲的上諭，便可證明。該上諭上曾說：「時至今日，惟有仿行憲政。大權統之朝廷，庶政公之與民，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自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待數十年之後，規模粗具，查看情

形，參用各國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之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諭士庶人等，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預備立憲國民之資格。」

這道上諭，好像對於憲政很鄭重，可惜將實行期限推得遠遠，暴露了清廷對於憲政毫無誠意，何能挽回人心呢？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清廷所謂憲政，只在「大權統之朝廷」，而不在「庶政公之與民」。照憲政的通例說，本應「庶政公之與民」，而不必「大權統之於朝廷」，甚或不可「大權統之於朝廷」。人民急切希望「庶政公之與民」，而清廷却始終置重「大權統之於朝廷」。「清廷利用假憲政的招牌，將「大權統之於朝廷」的辦法，是模仿日本君主大權的憲法大綱。但是當時的君主，是被監視的光緒，和幼沖的宣統，均不能行使大權。而實際的大權，却落在皇族的親貴手中，成為皇族集權的假預備立憲。一般親貴，一面假借君主大權，一面假借預備立憲，以實行皇族集權的企圖，可舉幾件大事為證：光緒三十二年，依照新內官制組成的政府，計軍機大臣及各部尚書十三人中，滿人有七個，蒙人有一個，漢軍旗人有一個，而漢人只有四個。又宣統三年三月，依新內閣官制組成的內閣，計總理大臣及各部大臣共十三人中，滿人有八個，蒙人有一個，而漢人仍只四個。在未預備立憲前，漢人尚可與滿人平分政權。在預備立憲中，漢人在中央政權的地位，反日見削弱。而政府的首腦人物，及有實權的各部首長，都是滿人，滿人又多是皇族。因此遂有人譏評這種內閣，是親貴內閣，是皇族內閣，是排漢的內閣，如何能滿人望呢？親貴藉預備立憲，將中央的政權集中手裏，且不必多說。他們還要將地方的政權，也集中在手裏。他們集中地方政權的方法，是先將漢人有名的督撫，

如張之洞等調到中央，另換滿人去充任。既經調虎離山以後，如不自死，便把他們免。雖善於取巧作官的袁世凱，也不能倖免。從此，所謂預備立憲，總算做了一大總統之於朝廷。但可惜的，是除袁世凱外，沒有人滿意於預備立憲。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清廷對於人民憲政運動的態度。清廷對於革命的民主憲政派，固採取高壓政策；對於溫和的君主憲政派，也採取高壓政策。例如戊戌政變，屠殺六君子，驅逐康梁於海外，並禁錮其餘的黨徒，便是對溫和派的一次大高壓。不知屠殺殺不完，驅逐逐不了，禁錮禁不絕，反使溫和派的言論和行動轉趨於激烈。庚子年，唐才常在漢口謀起事，便是溫和派的行動，因經過高壓而轉趨於激烈的一個例證。梁啟超自戊戌政變後，逃亡於日本，先後創設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等，「筆鋒常帶感情」，也偶爾談破壞與革命，這也是溫和派的言論，因經過高壓而趨於激烈的一個例證。光緒三十二年，宣示預備立憲以後，論道理，論手腕，均應起用康梁，襄助立憲。康梁也滿想從此得一顯身手，以建立君主憲政。但清廷對於康梁，不但不起用，而且更加緊禁錮。可憐康梁，因高壓不分滿漢，擁護清廷，實行立憲，已飽受革命派的攻擊。而清廷還恨康梁「一保中國，不保大清；保皇帝，不保太后」。光緒三十三年，梁在日本所組織的政聞社，既受革命派的打擊，又受清廷的壓迫，始終不能在國內正式活動。清廷揚言預備立憲，而對於主張君主立憲的溫和派，仍不許其生存並活動。這除使溫和派心灰意冷外，只是暴露清廷所謂預備立憲純是一種欺騙而已。溫和派雖如此受壓迫，仍癡心妄想，一再請願，希望清廷多少實行憲政。光緒三十三年，政聞社既遭查禁後，又由預備立憲公會約集各省代表，齊集北京，請願速開國會，是溫和派的第一次請願活動。這次請願的結果，只有一大總統之

於朝廷」的憲法大綱，與九年預備立憲的詔書而已。但是其不憲，並非「一大總統之於朝廷」。而「一大總統之於朝廷」的假立憲，還須九年預備，也未免太使溫和派失望了。於是溫和派，又於宣統元年冬至次年冬，以各省諮議局代表為中心，組織國會請願代表團，繼續請願四次。頭二次請願，皆遭拒絕。第三次請願，始允縮短預備立憲期限，於宣統元年召集國會；在國會未開以前，先將官制釐定，設立內閣。第四次請願，則以遭查禁，無結果而散。清廷對第三次請願，所允設立的內閣，於宣統三年三月開始成立。在表面上，似乎是實現諾言。但在實際上，該內閣既以一個貪而且庸的皇族，即奕劻任總理大臣，又以皇族或滿人充任有實權的各大臣，真正做了一個「大總統之於朝廷」。溫和派費了一年的功夫請願而實際只得到了一個皇族內閣，還談什麼立憲？所以又由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請都察院代表，「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結果，只得到「點陟百司，係君主大權，議員不得妄行干涉」的斥責。溫和派希望速開國會，而不得速開；希望設立非皇族的責任內閣，而不得設立。溫和派本有意扶助清廷立憲，但清廷既不願真立憲，又不願溫和派扶助，輕則加以斥責，重則加以禁錮。這不僅暴露了清廷的頑固無知，而且迫使溫和派與激烈派攜手同行了。

原來清廷的溫和派與激烈派，在主張上是對立的，在行動上也大體是分道的。因為主張的對立，所以新民叢報與立憲報革命的論戰。因為行動的分道，所以溫和派不參加激烈的革命運動，激烈派也不參加溫和派的憲政運動。以上所述的各種憲政運動，大體以溫和派為領導者。至於革命運動，則大體以激烈派為領導者。例如，甲午以後的革命運動，多由興中會發動。乙巳（光緒卅一年）以後的革命運動，多由同盟會發

。但辛亥武昌起義以後，至清帝退位以前的革命運動，雖在主張上仍由同盟會領導，而在行動上則多由同盟會與立憲派合作，即革命派與溫和派合作。溫和派本與革命派反對的，何以兩派忽然合作，一致排清革命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外是溫和派的憲政運動完全失敗。溫和派在百日維新後所得的報酬，只有立憲與禁餉，因屬完全失敗。在預備立憲中所得的結果，也只有禁餉與皇族內閣，仍是完全失敗。溫和派的憲政運動，既一再完全失敗，便只有參加激烈派的革命運動了。

辛亥武昌起義以前的革命運動，以未得着溫和派的贊助，多因孤軍轉戰，可歌可泣。但武昌起義以後的革命運動，以得着溫和派的贊助，不過一個月的光景，便有十五六省響應了。武昌起義的先導，是四川保路風潮。而四川保路風潮的領袖人物，則為立憲派的蒲殿俊張謇等。蒲等之所以熱烈鼓動保路風潮，則由於他們前此請願速開國會完全失敗。武昌起義後的軍政主腦人物，是黎元洪湯化龍。黎為純粹軍人，而湯亦為曾參加國會請願的立憲派。至於原為立憲派活動根據的各省諮議局，此時亦均參加革命運動。由以上各事看來，可知辛亥革命的發動者固為同盟會，而贊助者則為立憲派。革命派如得不着溫和派的贊助，則辛亥革命便難如此迅速成功。溫和派本不願革命，然頑固的清廷偏要驅使他們贊助革命，他們也只好贊助革命了。

從前激烈的單獨革命運動，尚且屢仆屢起，愈後愈烈。現在激烈派溫和派的聯合革命運動，便一發不可遏止了。到了此時，頑固的清廷，再頑固不下去了。清廷在張皇失措間，忽然用從前因皇族集權，而被革斥的袁世凱為兩湖總督，希望他統率兩湖武昌，打平革命軍。但袁狡詐萬端，那肯如會國藩胡

林翼左宗棠等一樣，再為清廷打江山？他只想利用這個機會，將政權與軍權，從清廷手中，拿到他的手中，以謀復被革的權利。他在袁世凱以前，即提出（一）四年的召開國會，（二）軍費由清廷撥付，（三）軍官軍人，（四）解嚴禁，（五）委以指揮軍隊的全權，（六）與以充足的軍費等條件。清廷尚遲疑未完全答應。適逢九月初旬，一面有資政院立憲派，主張（一）取消親貴內閣，（二）憲法須由人民代表贊成，（三）赦免國事犯，（四）即開國會的奏請；又一面，溥州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及協統王士珍等主張，於本年內召集國會，憲法由國會起草，組織責任內閣等十二條的電奏。於是清廷始立即下諭，改組內閣，命資政院立即起草憲法，解除禁，認革命黨為正式政黨，並下罪己。九月十三日，資政院奏上議決國憲法十九條條係以英國憲政為模範，清廷當即宣佈。同月十八日，資政院依據十九條條，選與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同月二十六日，袁世凱正式組閣。所有閣員，除理藩大臣達壽外，全是漢人。從前溫和派，用哀懇的方法，再三請願速開國會，組織非親貴的責任內閣，清廷始終一面高壓，一面欺騙並拖延。到革命派大得勢以後，即一一辦照，但可惜太遲了。南方革命各省，即將於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固不要而清君主立憲政府；即袁世凱本人，也不過利用總理大臣的地位，一面收攬軍權與政權，又一面以逼使清帝退位，換取民國臨時大總統而已。從此以後，中國憲政運動，另入一新時期，留待以後再詳述。

我們既已略述清季憲政運動的歷史如上，可由此得些什麼教訓呢？第一個教訓，是君主專制政治，已不適用於現代，必須代以君主立憲政治，或民主立憲政治。第二個教訓，要實行

君主憲政，必須在朝的開明分子與在野的溫和分子合作。如果在朝的只有頑固分子得勢，則在野的溫和分子必然失勢，足以助長在野的激烈分子，甚至驅使溫和分子變成激烈分子。等到溫和分子與激烈分子合作以後，雖欲實行立憲，也不能挽回危局。第三個教訓，是激烈分子不怕專制，只怕立憲；不怕頑固，只怕開明。開明立憲，是鞏固政府的第一良策。頑固專制，是政府自掘墳墓。所以吳繼不炸貪而且庸的奕劻，而要炸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所以同盟會不但反對滿清，而且反對立憲派。第四個教訓，是時勢既已到了憲政時代，便須立即切實推行。

行憲政，不可拖延，更不可欺騙。如果假預備立憲來一面拖延，一面欺騙，甚至壓迫溫和的立憲派，便足助長革命，自取滅亡。總之，憲政是一種天下為公的新政治。而滿清只知天下為私，私天下於滿族，私天下於皇室，肆其專制，壓根兒不知憲政為何物。既高壓革命派，又高壓溫和派，難怪同盟會堅決排滿革命，立憲派也因君主立憲絕望，相率贊助排滿革命了。在革命派與溫和派聯合排滿革命之下，中國憲政運動，遂由君主專制，一躍而為民主憲政了。

悼吳子馨先生（其昌）

陶元珍

少陽死猶生，同甫名不朽。誰其繼二陳，先生千載後。早歲遊樂溪，上與宋賢友。入洛正英年，得師益益厚。黨錮八俊傳，敝屣俗榮久。金石並甲冑，這時同滯留。志原存家國，輟筆心血嘔。齋志遂長沒，知交淚濕袖。

憶昔辛未年，遼海新失守，三省一時亡，驅吏曳兵走，竟言不抵抗，奇聞世罕有。先生方講學，孤憤鬱難受，挈弟及夫人，南下謁元首，絕食國府前，伏闕陳東顧，至誠感路人，翻遭腐儒詬。先生志更堅，精神愈抖擻，筆舌鑄國魂，喚醒神明胄，一朝處變作，羣起抗強寇，緊惟先生功，禿筆復瘡口，名高俗所仇，大勇怯私鬥，謝病臥淪州，一瞑遽撒手。

曩余弱冠時，負笈東湖右，兩載從先生，質疑承枉詔。別來書問稀，嚮往時懷舊，豈當制人天，賢者胡不壽！聞耗起徘徊，淒淒風雨候，逝者日以多，濟濟泉下友。剝極何時復？夜盡終當晝。

蘇聯紅軍之演進

史托生 著

蘇聯紅軍在對芬蘭作戰時，何以如此之弱，而在對德國作戰時，何以如此之強？關於此項問題之回答，我認為應歸之於其迅速與聰明的改革，此項改革開始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迨至今日，蘇聯之戰爭機器，不但已成為最富有彈性者，且為現代各列強中最卓越者矣。

紅軍在對芬作戰中所學得之教訓與經驗，以及其改革之迅速，外界人士每不充予以認識。但在其抵抗德軍之突然進攻，與夫保衛列賓格勒與莫斯科之不陷敵手之事實中，已可證明蘇聯當局改造紅軍之適應性與其努力為何如矣。紅軍初對芬蘭作戰時，不但裝備惡劣，且軍官素質不良。但此種情形，歷不久，僅於三星期後，完全不同之第一流紅軍已出現於前線矣。余在芬蘭前線曾親見第一批紅軍俘虜，則其服裝不整，裝備不全。芬蘭當局認為此乃由於蘇聯當局誤信特務組織之報告，以為可以不戰而屈服芬蘭政府也。嗣後余在莫斯科始獲知蘇聯實打算不經激戰而佔領芬蘭基地，與夫未及完全準備而被迫出戰之不匆忙情形。凡此皆可說明，紅軍對芬蘭初期挫敗，芬蘭軍隊之不可輕視，與一九三九年冬季之嚴寒，確屬事實也。

對芬戰爭結束後，史大林與紅軍當局即着手紅軍之全面改革，不但重組其隊伍，且修改其戰術與指揮系統。實際，此項改革之時間，不其充裕，僅十五個月而已，因一九四零年三月蘇芬休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即進攻蘇聯。蘇聯深知希特勒在西方毫無牽制之虞，即將轉而攻蘇，故蘇聯當局對紅軍之

改進，誠可謂不遺餘力。於此可見蘇聯當局之深謀遠慮與其隨機應變之才能為何如矣。彼等當時之主要目的為修正戰術，改良武器，選拔軍官，及增進指揮官之素質。當然，有賢良之指揮官，而無戰志旺盛與耐勞持久之士兵，彼等亦不能必打勝仗也。

蘇聯所以如此成功之原因，尙須指出以下兩事。蓋在改革紅軍之同時，蘇聯當局又開始實行一勇敢之計劃，即一方面，將機器與全部工業從烏克蘭東移，一方則在烏拉爾之東，建立內地的工業堡壘。嗣後，當美援蘇之軍火，雖源源流入，然而並不能及時解救蘇聯之危難。尤因由北極海通達摩爾曼斯克與亞爾干日爾之船隻，損失甚為嚴重，故美國之租借法與英之供應品，每不能大量運抵蘇聯，使其在一九四二年，夏季與初秋於頓河流域，北高加索與史大林格勒之防禦戰之嚴重關頭，發生主要之影響。直至蘇軍在史大林格勒站住腳跟後，此項軍火之源源源流入，始顯出其重要性。換詞言之，在起初十五個月中之紅軍之抵抗，應完全歸功於蘇聯當局。經過守勢階段後，蘇聯當局準備使紅軍之力量發揮於另一方面，即攻勢是也。余於芬蘭前線曾親見紅軍使用大量炮火，坦克與步兵，突破孟納斯防線。於白俄羅斯撤退戰中，及越過烏克蘭與頓河草原之時，紅軍又逐漸熱練其深度防禦之方法，及使用新式反坦克武器之戰術。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冬季與去年夏季之役，更證明紅軍之能力，足以計劃及實施一及時之攻勢。

以上所述之紅軍之成就與進步，一方面固由於其士氣之旺盛，但另一方面則由於其機警聰明與適應時應變。希特勒背德之軍人，其傳統之淵源，可追溯至於非利人帝。但現今第一次為一翻起之軍事機器所阻遏與擊敗矣。其故安在耶？吾人若詳致紅軍改進之各項主要步驟，從可知其所以得今日之結果，並非偶然者也。

二、

在芬蘭作戰中所獲得之教訓之一，為對於政治委員應給予多少權力是矣。蘇聯自一九三六年至三七年清黨之後，政治委員又重返紅軍，給予彼等以必需之權力，以監視其長之是否忠誠於黨，但在芬蘭戰爭中，彼等每因過分熱心，對於純軍事之決定，亦堅持必須加以嚴密控制。蘇聯對芬作戰之所以受挫，此其原因之一也。

蘇聯在內戰中及隨後數年中，委員之性質完全為政治的。彼等以宣傳共產主義為主要任務，但往往亦有超出此範圍者，彼等時常將軍隊之牧師，教育指導者，宣傳家與牧師專家等職兼而有之，迨德國攻蘇後之一月，蘇聯主席頒佈一新法令（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特用以規定委員之紅軍之職掌。該項法令中，不稱彼等為「政治」，而稱為「戰爭」委員。此乃根據於史大林之觀念之故也，因史氏認為「如指揮官為軍隊之首領，則軍隊之委員應為其神父與靈魂」。是故，在該項法令中直至最後一條款始提及委員在軍事單位中之政治與黨務之任務。委員之主要責任，在「完成戰鬥任務」。彼等為「其所在單位之德義上的領袖，與物質上的與精神上的利益之最先衛護者」，彼等必須「鼓勵軍隊作戰」，必須使優秀官兵在軍隊中大得聲望，必須對諸怯者，恐懼者與逃兵作無情之爭鬥。一至於

聽取與解除軍中之痛苦，亦屬彼等之分內事。總而言之，紅軍委員之此一任務為建立士氣。

美國陸軍當局駐莫斯科之供應代表團團長費蒙維爾，曾贊同余之見解，並對余言曰：「全體紅軍咸覺，如委員在此，則種種錯誤皆不予以矯正而各項痛苦將被聽取，至於任何嚴重過失，亦將被報告上司。此對軍事指揮官大有裨益，因彼等得以獲知其部屬之士氣甚高，故敢於勇往直前也。此種制度不但使士兵，且使官長之精神，亦因之旺盛。除此以外，尚有一重要事項在焉，即自委員採用選擇制後，每能將優秀者提拔至上層。委員參加實際作戰，且往往身先士卒，幾千委員因之死於疆場，但候補彼等之職位者，則大有人在，且多受嚴格優良之訓練」。

蘇德戰爭之最初十六個月中，紅軍之官長與委員共同指揮作戰。德軍雖與德軍史大林格勒戰下與加爾加山脚，但紅軍之戰鬥精神，始終旺盛，其故安在耶？英美觀察者咸認為，委員之有力領導，為其原因之一也。

共同指揮之制，於一九四三年十月間令取消。當是時也，史大林正準備第一次大反攻。在此大戰爭中未曾見蘇聯之英美人士，遂認為蘇聯之委員制完全失敗，故已取消之矣。其實，此乃錯誤之見也。蘇聯最高當局樂意時自由決定之權，交與戰場上之將領，以從事偉大與複雜之攻勢，乃無可致疑之事也。此項權力之交與，在目前已屬可能，因一方面史大林已完成其參謀本部之改組，另一方面則彼已獲得大批忠誠可靠之將領。我認為最重要者為以下之事實，三百師以上之紅軍自經十六個月不斷之戰鬥後，其軍官之損失，已相當慘重，但於委員中得得其補充者，因委員之駐在戰鬥區域前方之數百里，而咸在

訓練，故不啻爲一候補軍官之養成所，且在共同指揮之制度下，每一委員對於官級至將領，皆須在砲火連天下之戰役中受訓練。階級較高之委員，又得參加每一戰路上之決定，日日與具有二三十年作戰經驗之指揮官周旋接觸，故深知且親見每次作戰役之成敗，而能獨自判斷其原因何在。由是觀之，由於委員制之存在，紅軍得以獲得大批受過戰爭訓練之候補軍官。委員所缺乏者，爲某種特殊技術上之教育，故於十月頒佈之新法令中，時規定優秀之委員須返回後方，入軍官學校，受三個月至六個月之訓練。至一九四三年，彼等咸重歸紅軍服役，此時也，彼等除在戰前所得之經驗外，又補充之以新技術智識矣。未調返後方訓練之委員，以及新來者，則仍維持其原有之工作。現今蘇聯每一戰線，其軍事指揮皆爲一單一的。

三、

芬蘭戰爭後，蘇聯開始改組其紅軍，於一九四〇年七月，蘇聯修正其委員制，但史大林不久又發覺，其最高指揮部亦非予以變動不可。在對芬戰爭中，史氏將其責任完全歸之其內戰時之老同志，伏洛希洛夫將軍，但其結果使人失望。在對德戰爭之起初數月中，史氏之另一密友，勃登納將軍，亦不能阻止德軍侵入烏克蘭。史氏遂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將伏勃兩氏調回後方，使其負責訓練新軍之責。此乃建立今日之最高指揮部之第一個步驟。史氏在決定此項問題時，必感若干棘手之處。於彼即對知己老友，亦毫無相讓之心，以證實彼爲最高統帥之賢明與公正。嗣後彼之對待秋廉盛科將軍，亦如此。

自伏勃兩氏調返後方後，直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之採取攻勢爲止，紅軍指揮官始終匿名。蘇聯報紙亦鮮少公佈將領及指揮之名字，雖有關於接受最高勳章時，始顯現其一二。

青年軍官每逐漸升爲重要將領而知名一時，但彼等往往拒絕成爲顯赫之英雄之權利。有若干青年，領其年齡之小，實使人吃驚。吾人初在莫斯科時，頗奇異焉。有名將之少，嗣後方獲知，此乃蘇聯當局之政策也，除非在戰場上完全證實其才能，或其獲勝之戰果，足以大舉慶賀者，其名字方准見諸報紙。在長久之時期，中蘇聯人民與外國記者茫不知其軍官之擢升與其功業之發展。當蘇聯人民獲知新將領名字之時，彼等已將極國威熱者，或已將史大林格勒之危機挽回矣。

蘇聯最高指揮部之重要變動，初次見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即朱可夫。軍指派爲史大林直屬下之國防部之副委員。此項重要職位，在以前秋廉盛科擔任。當是時，羅斯多夫方告消落，突然中止蘇聯步步抵抗之習慣。其責任當由史氏担任，因彼氏指揮所有下頓河區之紅軍，新聞檢查機關不准吾人發表朱可夫將軍已繼秋廉盛科而爲斯大林助手之消息。美國各報紙亦忘記朱可夫之新任爲誰，故在以後五個月中，仍繼續敘述秋廉盛科如何保衛斯大林格勒，殊不知此紅軍大將因七月二十五日德軍侵入羅斯多夫之過失，已調至其他比較不重要之方面去矣。

直至九月十三日，斯大林格勒之役開始之時，莫斯科之新聞記者始微聞羅斯多夫不守之情形。第二次改組紅軍參謀本部與調動各戰場將領，發生於何時，則吾人不得而知。但紅軍機關報曾言曰：一法西斯軍隊接近任何吾人之城市時，吾人必全力予以痛擊。此種精神表現於洛佛徹爾卡斯克與羅斯多夫之保衛戰中，但並未完全發揮，因有若干膽怯者與恐懼者，四圍逃避，將領亦缺乏對此戰事以無懈對付之決心。洛羅兩城，本可固守，但現則爲敵人佔領矣。一。依余所知，重要城市而不固守，死守者，惟有此大之一例而已。其責任歸於指揮官，而於

摩科所以仍能維持今日之地位者，或由於史大林不忘此老鳥克蘭戰士過去對蘇聯之功績故也。

羅斯多夫之潰敗，證明紅軍之機中，尚有嚴重之弱點在焉。是故，史大林格勒保衛戰起，立將此重任，寄於青年將領之仔肩。此輩青年將領，身心強壯，更適合於現代戰爭。其中之一為朱可夫將軍，彼指揮第六十二軍。當彼負起指揮史城保衛之責任時，史城已成爲火燄之地獄矣。彼曰：「當時吾人之軍隊，疲乏非凡，想觀者亦流行於士卒之間。我將此輩驚恐之徒，驅除乾淨，並對部屬曰，吾人決不能退至窩瓦河之後，在此次戰爭中，如此肉搏血戰，余未之見也。刺刺與手榴彈用過如此之廣，亦未有如用於史城者也。盧特米科夫部隊最先到達，故遭受德軍之激烈攻擊，盧氏告余曰：「吾人必須戰至最後一人，但吾人不能離棄此城。」由此可知，吾人之軍隊祇有一個念頭，即史大林命令吾人不准後退。」

當朱盧兩氏進行此次有決定性之戰爭之時，蘇聯人民知悉彼等及其他將領之名者，恐不及數千人耳。彼等與其他新指揮官，有一顯著之特徵，即相當年輕是也。彼等之中鮮有超過五十歲者，大多在四十左右，但彼等已身經三四次戰事矣。例如李留盛科將軍現年僅三十九歲；稱爲史城之英雄之盧特米科夫將軍，則僅三十八歲。指揮南方部隊，收復羅斯多夫之葉門科將軍，現年五十，爲頓河戰線最年老之指揮官，葉氏部下之瑪爾洛夫斯基將軍，則今年僅四十四歲。如此年輕之青年，已成爲紅軍高級將領之標準矣。

俟紅軍越過頓河，驅退德軍及其附庸國軍隊，並追擊至其一九四二年六月發動戰爭時之原態之際，此秘密面幕，始行揭開，而蘇聯最高指揮部之新重要人物，亦漸聞名於世矣。

史大林之身分爲上將，鑒於彼之領導蘇聯，及史城之大戰略，則可知以此官銜予彼，理所當然者也。朱可夫亦升爲上將。瓦西列夫斯基 (Vasilovsky) 於二月亦升爲上將，其職務爲參謀總長。此三人即爲計劃大反攻之幕後人物也。紅軍空軍司令維高夫，亦於史城一役中升至最高級，史大林現如拿破崙，以最高頭銜與榮譽，賜予在戰場上打勝仗之將領，如砲兵司令伏克諾夫，及其他將領，如羅柯索夫斯基，瓦圖丁，託命諾夫與諾夫李高夫等。在今後之對德戰爭中，蘇聯最高指揮是否將再有變動，雖吾人不得而言，但優秀之將領，則確已存在，且已發覺之矣。

史城之役之勝利，及隨後冬季攻勢之成功，吾人不必言過其實。因紅軍早已證明其深度防禦之才能，現今則又表現其包圍運動與殲滅戰術之精練矣。希特勒在兩次夏季戰役中成就，與紅軍冬季攻勢相比較，實未見有何高明，因紅軍之速度與確實，亦不在其下也。

四、

與紅軍軍事方面之改進，同時進行者，爲心理方面與政治方面之改革。今日之紅軍，其「工農軍隊」之氣味，業已減少。史大林以各項裝飾，獎勵其特勝之官兵，使其在蘇維埃四字中，成爲超於任何蘇維埃團體之精英。蘇聯軍官現皆佩戴廣闊之肩章其上並飾以金邊。校以上之官長，則又在其褲子兩旁加以紅邊。在戰事初發生之十八個月，紅軍軍官告假來莫斯科者，除整潔以外，不甚注意其裝飾，彼等時常穿著前方之服裝，與不甚雅觀但甚感溫暖之皮靴，其手中並攜帶各色包裹。但此種現象，現已嚴禁禁止。蘇聯軍官進城時，必須穿著最好之制服，彼必須使社會對軍隊發生以下印象，即軍隊代表

某種殊之物，有其階級與地位是也。

蘇聯士兵對彼等之指揮官，雖仍稱「上校同志」或「少將同志」，但由於各項發展，已逐漸使此同志關係發生疑問矣。軍官俱樂部現已成立，實為蘇聯歷史上之破天荒。余在前線曾親見蘇聯婦女穿着制服，在各司令部執行各種傳令兵之任務。數月後，雖人力更感缺乏，但最高當局竟作以下之決定，紅軍軍官應有男勤務兵服侍其飲食，擦亮其靴，及執行其他日常事務。在數年以前，紅軍若有人提出此項建議，則共產黨領袖必羣起而攻之，認之為革命之叛徒矣。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公佈於莫斯科之蘇聯戰役建設計劃中，曾規定設立九所軍事學校，訓練八歲至十七歲之兒童，使其將來成為紅軍之幹部。因用以紀念蘇聯戰役之查理第十二之俄國名將亞歷山大蘇瓦洛夫，故以蘇氏之名名之。此項軍事學校令人想起革命以前之士官學校。

以上所述，皆足以指出，今日之紅軍已具有新風氣。此項軍事組織必將加重國家主義之色彩，而減少——相當程度之減少——對於革命理論之拘泥。紅軍中之軍人成為蘇聯國中之第一流國民。紅軍中之軍官，其特權與社會上之地位，甚至比共產黨代表更超而上之。

從心理方面言之，今日之紅軍亦為一新的紅軍也。彼等擁有獲得大勝利之威望，其聲勢，將垂久不衰。此次發展又與蘇聯人民之國家信念之增長，互相融合。是故，戰爭發生之初，蘇聯當局即稱之為「愛國戰爭」，並非偶然者也。現今蘇聯之新勳章，大多以俄國過去歷史上之大英雄為名，如蘇瓦洛夫勳章，如潰敗拿破崙之考託甫勳章，又如七百年以前擊退條頓武士於奧特考斯湖之納維斯勳章。在各種革命的勳章中只

有蘇聯英雄勳章及列寧勳章，其價值仍凌駕此項新勳章之上。固然，紅軍之力量，在蘇聯下一代之地位如何，須視其作為保衛蘇聯之安全，抑作為實行其帝國主義之工具而定。但不論如何，吾人可斷言，蘇聯紅軍之動力，乃蘇俄國家主義之熱烈與堅信是也。

五、

紅軍之地位，現已周知於全世界矣。然則，何者使其如此強大耶？在技術方面言之，余雖資格妄加一詞。但余為一新聞記者，自抵俄至中國，曾身經七個戰場，並親見紅軍之訓練與作戰情況，或可指出其所以成功之各項原因：

(一) 堅苦勞作之外，又配合以智慧之指導。從最初時期起，蘇聯軍隊之訓練，即以體力耐久，警敏與效率為基本。

(二) 從上至下之領袖制之發展。且有大量身經百戰，具有二十年以上之服務與戰鬥經驗之軍官。

(三) 早已養成強有力與準確之砲兵。突破孟買與防線，促成芬蘭崩潰者，為紅軍之砲兵，抵抗德國之裝甲部隊與坦克，蘇聯之砲兵亦担任一主要之角色。某紅軍砲兵將領曾以自負之態度告余曰，蘇聯砲兵學校今年舉行一百三十八週年紀念，乃世界上兩大最老學校之一。

(四) 早已集中全力於坦克車之設計與發展，尤特別注意於如何避免其着火燃燒。

(五) 第一流驅逐機之發展。蘇聯軍事飛機之進步，可以一九四三年春季製造之新形式機證明之，此即約克七號機，並有依立與四號式之新攻擊轟炸機，四引擎梯皮七號式之新重轟炸機，以及稱為彼得蘭考夫二號式之俯衝轟炸機，紅軍之空中力量，雖在數量上，初期不及德國，但其素質從未在其下。

(六)徹底消滅不適宜與無能者，並有迅速從過去錯誤中學習之才能。

(七)敢願以空間與士兵之血肉換取時間。

(八)有一鼓勵與維持部隊士氣之非常的有效制度。此項制度，以委員會為基本，又由一紅軍之信念加強之，即其努力犧牲，不能由政府與後方行政機關之腐敗與無能，予以損害之，此項信念在一九一四至一七七年之沙皇軍隊中未有之也。

(九)從現代眼光觀之，此乃蘇聯第一流之軍隊也，每一士兵服裝齊全，並滿當裝備以來福鎗與小武器。

(十)從歷史上言之，此亦乃蘇聯第一流之軍隊也，因其士兵大多數能讀書識字。彼等現為教役等如何讀書識字之政府而作戰，該政府並大開其門，使任何有才能者，不論其出身微賤，咸能飛黃騰達。

(十一)及時從西段遷移其大部工業至東俄之安全區域，並在烏拉爾山之後建立一內地的工業堡壘。

(十二)逐漸運來大量之英美軍火，一九四三年之春，英美援蘇之飛機與坦克，數量達到可觀程度之後，對於紅軍之阻遏德軍沿庫爾斯克凸出地帶之攻勢，與紅軍之不足採取夏季攻勢，確大有幫助。再者，自一九四三年八月之後，紅軍在空中之力量，得與德國空軍形成一平衡之勢，若無英美幾千架驅逐機與轟炸機之運來，當不能有此局面也。此外，德國空軍分散其力量，以對付英蘇在西、與地中海之空中攻勢，當亦有助於蘇聯。

(十三)在史大林領導之下之這大的與全面的，攻守計劃之邏輯之發展，不顧任何犧牲，死守史城，以待包圍德軍約二十五萬，乃史大林決斷之堅決與勇敢之一例也。

蘇聯從此大戰爭後，將成為歐亞兩洲軍隊最為強大與最有效率之國家，在今日已屬彰彰明甚之事實矣。紅軍今後將龐大非凡，其新起之軍人貴族，亦將保持其光榮於久遠。但彼等雖保衛一國家，其領土之大部，已被蹂躪，且有一萬萬六千萬人民，流離鴻雁，總之，蘇聯之經濟已雜亂失序，是故，蘇聯需要一長時期之和平，從事重建與復興，紅軍將保證其力量，足以負起此重任也。

蘇聯今日之盟友，甚易由恐懼紅軍之力量，而感覺煩惱。蘇聯對地球上六分之一之面積，必須予以保護，於此可見紅軍之力量為何如矣。但吾人須時時不忘以下兩事，第一，蘇聯人民因求彼等國家之生存與其政府之存在，其所付之代價，為何之鉅大，第二，因彼等之英勇，得以保全英美人民之生命，為何之衆多。西方各國惟有如此作想，始能排除對蘇聯之恐懼，而與之開誠合作，任何國家，若犧牲其人力士兵達一二千萬，並從最困難之局面下，轉危為安，取得最後勝利，則決不會不計較其地位與尊嚴，蓋可斷言者也。此等國家需要其他國家尊敬之與瞭解之。余以為若此等國家亦以尊敬與瞭解其他國家而答之，則更其妥當矣。欲使此項友誼關係，成為事實，或非易事，但世界和平，則不可缺此也。(原文載美國外交季刊一九四三年十月號)

蘇聯婦女教育的新方向

導因

（譯自紐約前鋒論壇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康里斯聯社史之訪問記）

奧羅加米希可娃是蘇聯埃執行委員會中年紀最小而最重要的一個委員。她也是蘇聯中一個最漂亮，裝飾最美女人。她具有喜寶型（電影明星）美態，金髮白膚和藍色的眼睛，配上托爾斯泰小說中所描寫的俄國女人的活潑精神。她是俄國少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秘書，因此她所知道的俄國青年比國中任何人更詳細。這其實就是她和她同伴的職務，去領導和教育俄國青年是正進現在俄國社會正在尋找而達到的生活之路。

嚴厲已經過去了

換言之，米希可娃和她的組織直接或間接幫助俄國青年發展他們的品性和人格，我去訪問她，要知道蘇俄青年在戰爭幾年中所遭遇的情形。

整齊的衣服，整齊的修飾，米希可娃在她那陳設雅潔的公事房裏表現着十分公事化的精神來接待我。我請她告訴我關於俄國青年的情形，尤其注意於最近重視女子教育，是否與蘇俄革命時所宣傳的平等相反。

她說：

是的，在一方面可以說是對於我們女子數年來所實行的毫無差別的平等「反動」。好些女子穿着長袴戴着帽子，還不斷的抽着香烟。還有好些胸襟上插着紅手巾，也不管這樣的裝飾是

否相稱。他們以這種習慣和態度圖取女性的解放。但不知道女人畢竟是一個女人。

拿她們的裝飾做例子。一個女人總要注意使她自己天性的美的風趣表現出來。爲着充實她的個人生活和個人人格，她一定具有純粹的女性才能，和女性的德行。

我又問她：你們女子養成純粹的女性之後，會不會有一種危險，就是她們將會遺失她們的前途，即蘇俄所謂社會的創造工作？

米希可娃堅定的搖頭說：一點都不會，一個女人若只限她的生活於家庭之內，她就有墜落於懶惰，以及說閒話，消遣時間於無益的危險。一個女人一定同時使她參加社會的創造工作與家庭生活，而她自己必須預備同時兼顧這兩方面。我們要盡力所及使女人能夠負荷家事的重擔在她的肩膀上。我們認爲有必要把女人每天工作的時間減少到六小時以至四小時。而不願有一個女人犧牲了她的職業前途。

我問今年實行男女分校教育，和注重女子家事教育與女性道德的結果，會不會使女子減少對於社會和職業前途的理想。

她答：

這不是新教育制度的目的。這種教育是我們在戰前早已決定的，但是直到現在才有機會實行。我們從前忽略了對於女子的特別教育，即她們成爲賢妻良母所需要的。現在我們要給與她們這種教育。

我問：「在女校裏有男教師嗎？」

米希可娃答道：「自然沒有女人那麼多，因為在那裏有許多功課只有女人能教的。」

我說：「在美國，男女同校的教育『我們沒有發現壞結果，像你們教育者在這裏所發現的』。」

戰爭延緩了既定方針

米希可娃搖頭說：

「在美國的情形也許同這裏不一樣。你想想看，我們自從蘇維埃成立以來怎樣的生活。我們常常在忙碌中過生活。我們不能不做許多事。到了戰事發生，我們忙上加忙，為從來所未有。可是我們仍然要替年青的一代保持公道，同時盡我們能力所及努力從事。」

「你想男女分校教育是永久的嗎？」我問。

她有力的答道：「我可以保證，若是事實上的必要，我們決不躊躇再恢復男女同學的教育。」

（譯者附誌）記得一九三二年，我從德國回來，懷着思念念子心情，經過俄都莫斯科時，看到最新典型的俄國婦女，又看到一切家庭社會化的機關，如托兒所，如公共食堂等，給我精神上一種新刺激，使我起了莫名的悵惘；我覺得如果人類的理想，單純是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兩個思想極端的發展，那麼蘇聯社會制度的完全實現，即是人類生活的最高集體化與機械化；由於家庭制度的廢除，將使人類天性之愛，夫婦親子之情，無復存在之餘地，而入羣生活的冷酷將不可以想像！我這樣的想，僅僅為着我自己不能忘情於我的慈親與愛子，同時却也不能忘記中國婦女黑暗的情形，有從家庭解放出來的必要。

兩種思想的衝突使我不敢說什麼話，只不斷的注意到蘇俄的婦女——她們是不是愈趨極端，而可以完全的男性化，抑或人類中男女的性別將永遠存在呢？直到不久以前，忽然聽到蘇俄禁止男女同學教育的消息最近又讀到這篇訪問記，在蘇聯婦女本身所發出的呼聲「女人畢竟是女人」，女人的教育是要注意到「她們成為賢妻良母所需要的」我不禁得到安慰。我想，必反，蘇聯的婦女為着「女人畢竟是女人」，大概對於已往太偏於男性化的事實，感覺疲乏，而必須回頭駐足罷？我覺得只這一點就沒了，如果人性的發展，要順人性的自然，而理想中人類生活美滿的境界，是男女老幼各得其所，那麼女人畢竟是女人，女性與母性畢竟是要被尊重，而家庭生活畢竟要保留到相當的程度，我希望我們中國婦女運動的後進，對於最前進的蘇聯婦女所經由的路綫，要加以詳密的考察。同時我要引起姊妹們的注意：我以為婦女運動之所以必要，在一方面可以說就因為婦女之為婦女，要保存她原來的面目——母性與女性的尊榮——同時不容放棄人性所應該享受的人權，而反對從前女子因女性的特殊而形，在於男權社會下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換言之，有自覺之婦女，應該明白男女的真正平等，是男女各自發揮本性的特長，而收到人類互助共存的效果，決不是無條件的，女子必要做到男子所能做的女子男性化。在這裏，我們發出要求：第一女子自身對家庭兒女的責任感，結婚的好女應當拿改善家庭生活與教養兒童當作自己的第一責任，而發展個性的業務，只能在不忽略家事和兒女教育的範圍內來處理。第二，在社會上，我們要求家庭婦女的正常地位，我們認為家庭是社會的小集團，服務家庭的家庭婦女，也是服務社會的一員，她的工作價值，決不低於一般獨立職業的婦女，而

理學漫談

余家菊

一，開場白

談中國的歷代思想，求其具有系統而又自相條貫者，除去周秦數大家而外，漢代祇有董仲舒，至於揚雄，尙嫌膚泛，魏晉而降，祇有范縝，裴頠，李翱輩數家。其條綿相承，繼起不絕者，實唯宋代以後所謂之理學。理學家企圖打通天人，建立人事法則於宇宙法則之上，所以理學是人事哲學，亦是純正哲學。不徒在中國思想上於一異彩，而其發生竟早在公元十一世紀之際，持與同時代的西歐思想相比較，亦毫無愧色。國人對之，應當具有若干了解。

一種學風，有其獨特精神，向後亦難免有其流弊。理學自宋元明清凡數百年，自身造成種種弱點，故攻擊之者不一其人，不一其說，而漢學宋學，尤爲對立的兩大壁壘。漢學追求聖經的本意，所探途徑，爲文字之了解，故着重於訓詁考據，最後且及於經籍真偽之考訂。宋學追求聖賢之真意，所探途徑，爲理論之闡明，故着重於合理的論證，最後且及於自己思想體系之建立。大體言之，漢學可稱爲歷史學派，宋學可稱爲哲學學派。漢學有古文派今文派之歧別。古文派持執客觀態度更爲謹嚴，今文派發抒主觀思想較爲活潑。根據此一觀點，古文派可稱爲「漢學之漢學」，今文派可稱爲「漢學之宋學」。人類的思想，恆往來於依傍與獨立之間。獨立固然活潑，流弊就是私智自是。依傍固然安全，流弊就是拘墟停滯。所以今古文，

不必空事軒輊；漢學宋學，亦不必互相排拒，且亦不能排拒。偉大的漢學家，必有採用宋學態度之時；正如偉大的宋學家，必有採取漢學方法之日。

其次，排擠宋學者，又有重視事功之一派，如宋代之浙東學派是；而重視力行之一派，如清初的顏李學派，其思想亦復爲同一種類。其反對理學大要爲反對理學之空談性命天理，舉子貢所謂不可得而問者，日日向學者索居業；至於國家安危所繫的典章制度，經綸方略，或人生日用要道，以及身體力行之事，反忽而不講，或言而不行。宋明之弊言，此等攻訐，全皆適當。但創立說之本師言之，則未有不重力行，亦未有不講典章制度者。特是理學家對於治人，必求一個最高原則以爲其依歸，且此最高原則，又必爲人智所可達到的最後原則，以期其信則不移，而不至不滿意於天命。試觀孟子所持以教人之「行己有恥」言之。大行己有恥，但爲一當然之原則，但自不肯接受之人心之，則必起一何等人類之恥？「之」詰問。就肯接受之人心之，或詰問：「何謂恥？寬以何者爲依歸而認爲可恥？依歸之依據又爲何？自有意欲人知恥者觀之，亦或問：人之無恥，其故安在？必如何始能有恥？如是，則理學家窮根究底之態度不可無，而所爲答案，自將成爲一種理學式的思想矣。

其他攻擊理學家者尙多。例如「和尚陸九淵，道士朱熹」之說是。其實擷取他人思想以爲構成自己體系之材料，乃是無

可非難之事。凡是愛好真理者，自知此理之真切。類此的攻詰往後有便，或將涉及，目前無須多論。

理學思想，精細深邃，分析須周密，推論須透澈。粗疏習態，廣泛性格，祇可大言欺人，不可尋取真理。理學所提問題，皆為真實問題。謂理學虛渺者，祇是由於自己之粗疏廣泛而已。不懂張載朱熹之人，亦不足與言康德黑格爾，若能了解洛克休謨，便足以思想家自豪矣。抱疏廣泛之病不除，無論休謨創造，休言介紹，即了解故紙，亦非所能。

理論建立在事實之上。世間事實，至少有一部份是發生在內心之上，固然要用內省法始能體認，同時亦須其內心生活上確有可供體認者在。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其內心生活上未曾發生利人愛人之事實，則其認定前人教人博愛的旨趣，盡是欺大之誤，正如夏蟲不可與語冰，毫無足怪。研究理學，須用沉潛工夫，切己體認。

學說影響，初看似無足道，細思確實重大可怕。持說萬不可不慎，例如王陽明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使人敢於毅然行其心之所信。所信如果正確，敢行自屬好事。所信如果失當，敢行則遺禍百端。我與某君，六年同學，年半共事。其思想內容，可置勿論；而其人實為一陽明信徒，敢於即知即行，不料所謂已知者未必果屬真知。陽明立說之初，雖有提防，而後人不飽耐心求知，好以銳利之氣，力行其主觀不密不精之見，小則殺身，大則害人。陽明於孔學傳統上為率性宗朱子為博文宗。今代為理智時代，力行終須用窮理工夫以相輔導。至於不肯博學之人，與其信主觀的己見，毋寧恪守客觀的規範為猶愈。信守客觀規範，是為約禮宗。

一一，天

生寫孔學漫談（中華書局金兆梓先生為改題為論語通解）從人事談起，至天道而止；今作理學漫談，則須自天道談起。孔子的正宗思想，是立己盡己，一切力量都從內發出；一切規律，都是自我規律。此種思想，使人祇管耕耘，不計收穫。人生祇須為其所當為，至於成敗禍福，則一毫不問。所以立得腳穩，硬得脊骨起，而能不變不遷不懼。於言發有為之中，保持靜怡怡之意；於窮苦困辱之際，保持適然自得之態。於無可如何之中，猶竭盡自力以為其所能為。懷抱此種精神，必能無入而不自得，無時而不有為。不過自我宰制，較之外力持夾，其事雖難遠甚。所以兼用宗教的修養，確有必要；而有識之士如王國維輩皆致歉於國民宗教思想之淡薄。

程明道曰：詩書中凡有一個主宰的意思，皆言帝；有一個包含徧覆的意思，則言天。福為祭祀上帝之禮，或問福之說，孔子不答；但孔子嘗言天。孔子曰：天何言哉！似孔子不認天有主宰功能。雖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安知其意非謂理則不可違反乎？易謂：天地不與聖人同憂。程明道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程伊川謂：天地無心而成化。朱晦庵謂：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嘗有心。是見天是無思想，無感情的。然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其本質安在？程伯子所謂：天地之常者，其常恆的總性究竟何若？

或問朱子：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所謂合

當如此便如此，實言之，即是理則如此便如此，天亦不能違反理則，天的活動亦受理則的支配。理則是最高的必然的，故謂之天理。程明道謂：某學雖有所授受，而天理二字，則是自家體貼出來。欲了解天理二字，必須確見宇宙萬象皆受必然法則支配，確切不移。又須認識理則是最高的，一切皆受理則的支配，而真可逃避。至於理則之本身，則受其自身之支配，於自身之外，別無他力與以支配。其實宇宙間，除理以外，亦更無他種力量存在，所以理是最高之力，亦是唯一的力，人當皈依理則，崇奉理則，遵循理則，否則必有禍殃，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是也。

理則支配萬有，理則却不束縛萬有的活動；理則雖不束縛萬有的活動，而萬有的活動却不能逃出理則之外。理則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所以理則是普遍覆臨的。人可以違反理則的某一方面，而理則的又一方面，於其違反此一方面之際，又將違反者加以控制矣。正如魚在水中，可赴上游，亦可赴下游，終不能離水，離水即禍來。人在理則之中，可以違反理則，但是違反理則必有其代價，至於償付代價者為犯者個人，抑為犯者所屬之羣，則視所犯理則之性質而定。自作自受，固是理則之一種，而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亦是理則之當然。理則對於人間，並不絕對一一隔離，所以孤立主義不能成立，人與人間，必須負擔連帶責任。

理則不可違反，違反即有禍，尚可說也。設違反理則，還禍他人，而自身反能得福，有如犯法，而逍遙法外，毋乃亦天亦昏憤不合理乎？欲究此理，須知所謂福者，究屬何義？福存在於客觀乎？抑存在於主觀乎？謂存在於客觀乎？則多財而愁

苦，窮困而享泰者，比比皆是。福祿存在於主觀心態之中，心態健全、曠達、甯靜、淡泊者，始能有福。所以福德合一，有福者必有德，有德者始能有福。彼犯理而逍遙法外者，必定德性充實，足以潤身，雖然違犯理則之某某方面，但實能充備理則之其他方面。理則全智全能，賞罰善惡，決無漏網之魚。此理非僅一種情感的要求，實亦為理智的結論。

有人謂吾人當盡人力以征服天理，所謂勸天主教是也。昔日在理則上認為不可能者，今日已多屬可能，倘認理則不可突破，恐難免苟簡偷安之患。不知人當努力向上，正是理則之當然，征服理則正是服從理則。程伊川曰：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古人說：天工，人其代之。人代天工，正是人之所以能參化育處。參化育，正是人之所以頂天立地處。彼懶惰不作爲，何嘗能遵奉天則。人生正當規範，是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程明道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所以盡人力即是守天理。天理人義，本來同條共貫。

天既無遺憾，無遺憾，天的常恆德性又安在！朱晦庵云：「吾果無心，則萬物生而歸焉，純陽上發乎乾，地又卻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天的活動，有一定的方向。此一定的方向，即是天之常德，即是天心。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陰氣彌漫之時，一陽來復，含蓄生機，以漸次萌動，天地生物之心，由此可見。程明道曰：天地以生物爲心。程明道曰：一天地之德，莫大於此；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二者皆天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人特自小之，可謂賊仁也。一以生而不息，即是仁，即是天之常德，即是

善之本質。例如政治之善惡，當用何種標準與以批判？生即政治善惡的最高標準。而能充實生並開展生者，即是善政治；反之，便為惡政治。何以故？生是天心，生是最高理則故。

生之本質又何如？凡生物學上所謂營養，蕃殖種種者，皆是生之本質。此種本質，足以說明有生物之生，不足以解釋無生物之生，必將使人疑及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此項定義，須加修正。生之本質，最好以「綿續」二字加以說明。其綿續也，又非單純的綿續，而有其開拓翕聚的作用，而有其交感推遷的功能。所謂天命之流行也。朱晦庵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動即開拓靜即翕聚。生物營養是動，消耗是靜。無生物之

動是動，靜是靜。萬有之生之本質，藉此一動一靜的現象，以表現於無窮。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或謂萬有生存過程，皆有生、住、異、滅之四階段。既生既矣，豈得只生為天之常德。須知所謂滅者，是就各個體而分別觀之；若就萬有之統體言之，則祇有盈虛消長，無所謂滅，甚至同與異相待之生，亦復無有；天德曰生之生，祇有此「綿綿長存」之一事實而言之已耳。在絕對的世界，祇有存在；在相對的世界，始有開拓翕聚。所以在相對意義下，生是「綿綿的演進」；在絕對的意義下，生即永存。

（本節完）

（三，二十一）

遊峨雜詩（二）

舜 生

微雨發清音閣

閣下雙橋，去橋數十步，有巨石矗立溪中，曰牛心石，劉光第聯所謂「雙橋兩虹影，萬古一牛心」者是也。

微雨穿林隙，霏霏濕我襟，遲回別橋去，詩思託牛心。

阻雨滯息心所

輿夫云：由此到洗象池，須經攢天坡，坡長五里，路險苔滑，留至午後一時，雨霽日出，始復前進。

一雨來從山北邊，奔泉飛澗樹籠煙，攢天路險蒼苔滑，我息塵心汝息肩。

兩宿九老洞

寺貌慈延古，仙稱九老尊，叢巒開碧嶂，百鳥弄晴暉。覓徑探幽洞，登臺索夢痕，靈猿何處去，清磬又黃昏。

新 書 評 介

田 父 舜 生

(一) 羅素論民主政治與中國

——介紹羅素近著權力論

英國哲學家羅素B. Russell近著權力論Power一書，已由柯而亭先生譯成中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羅素曾於二十年前到中國來講學，對於中國政治及學術有相當的了解，因此中國學術界也有些人對於他有相當的瞭解並相當的欽佩。他的近著權力論之得很快的有中文譯本，也許就是由於我國學人歡喜他的著作。這本權力論的內容，計有：一、權力之衝動，二、領袖與徒從，三、權力之種類，四、借債權力，五、君主權力，六、孤行權力，（按此指武力），七、革命權力，八、經濟權力，九、支配意見之權力（按此指宣傳），十、信仰——權力之源，十一、組織之生物學觀，十二、權力與政體，十三、組織與個人，十四、競爭，十五、權力與道德，十六、權力哲學，十七、權力倫理，十八、權力之節制，共十八章。

這本書中所謂權力，是一種廣義的權力，即凡社會上可以影響或支配他人的力量，統稱為權力，不僅限於政治權力一事。羅素以為人類有一種主要欲望，即權力欲望。權力欲望，現在各種社會現象上，而有各種形相與轉變，但皆不離乎權力。所以說：

社會科學之基本概念，厥為權力。與在物理學中以能力為其基本概念者同一意義。權力亦如能力然，蓋有多種，如財富

、軍備、民政、支配思想之勢力，是也。凡此諸種，無一可視為其他一種之附從者，亦無一為其他諸種所從而衍出者。企圖視某種權力，如財富者，為孤獨之存在者，其事僅能得局部成功。正如研究一種能力者，若不計及其他諸種，必在某數點上遭遇失敗耳。……社會動學Social Dynamics之規律，只能以權力之觀念敘述之，而不能以此一種權力，或彼一種權力之觀念敘述之。……權力如能力然，必當視為連續轉動之物，由一形相變為另一形相。而研索此等轉動之規律，則為屬於社會科學之事。企圖使任何一種權力獨步而行者，尤以今日之對於經濟權力者為然，皆為實際上重大錯誤之淵源。以往疑已如此，現在仍然如此。（見權力論第一章）

這是羅素對於社會科學的一種基本概念。原意近代西洋文化，可以說是一種權力的文化。宗教改革，是向教會要求權力。民主政治，是向君主主要求權力。海外發展，是向國外伸張權力。科學研究，是對自然發揮權力。從前培根曾說過：「知識就是權力」。可見近代西洋人對於社會上的一切，都認為含有權力的意味，或權力的關係。現在羅素將權力做科學的這基本概念，可以說代表近代西洋人的一般看法。不過又與一般看法稍有一點不同，即一般看法多單獨看重某一種權力，而僅則將各種權力綜合敘述，以說明社會轉動的規律。綜合考察社會上的各種權力，是單獨看重社會上的某一種權力，自然比較精細而圓滿。所以這本書值得我讀一讀。

他依據權力的觀念，說明領袖與徒從的心理，討論各種權力，如教喻、君主、武力、經濟、宣傳、信仰等的形相與規律，討論權力取得的方式，如傳統權力，革命權力及孤行權力的形相與規律，討論政治權力運用的方式，如君主政治民主政治及新舊各式專制政治的形相與規律。他認為人人愛好權力，而常置自身於上帝的地位，便難免競爭，而使社會陷於混亂。要使社會免於混亂，則須對於權力加以節制，而使各方得到一種平衡。所以他說：

世界前途之希望，僅在權力能被馴服，能被納入正軌。

（見第二章）

能使政治權力納入正軌的方法，只有一種政體，即民主政治。所以他維護民主政治，並在本書中一再討論到民主政治。他說：

君主政治與寡頭政治之主要弊害，為政府早遲必成為甚不關注人民願望之政府，以致革命遂起。民主政治，在建立穩固以後，足以防止此種不穩定之狀態。因內戰乃一甚大之罪過，故可令內戰不能發生之一種政體，實足提倡。若權力屬於大多數人者，則此政府在內戰中獲勝，較易於僅代表少數人之政府。此為民主政治之一論據。為保護人民，迄今未經發現一法，其法有一切程度之效驗，此即民主政治也。民主政治，用為治國之方法，有兩種主要限制：其一、由於有若干國事之決定必須迅速，其二、由於又有若干國事之決定則需專門智識。因有此等主要限制，故全體選民須將許多最重要問題，信託於政府。在政府不得不尊重公共意見之情形下，民主政治乃屬成功之制。

民主政治之為政體也，其困難乃在其制須迅速之妥協耳。

失敗之黨，勿以為原理所具之重要性質，有足令其黨性於讓步者也。在另一方，大多數黨勿推進其優勢至於惹起反抗之點，此事需要經驗，需要對於法律之尊重，且需要一種習性，相信本人以外之其他意見，可以不為邪惡之證據。其尤為必要者，須無極端恐懼之情況。

主政之政府，雖強於領軍之統帥，似為可異之事。不過此種實例，在民主政治植根於民族習性中已經鞏固之處，乃克有之。

民主政治欲求穩固，必須成為傳統性質乃可。而其制必在完滿建立以後，乃克開始其繼續傳統性質之程序。夫希臘與在亞洲，則有何足以致此之機運耶？

總而言之，軍事論據歸向之點，為民主政治在其現今猶存之之處，則猶存也；若其制暫在失勢中之國家，則亦返也。

（節錄第十二章）

以上所引羅素的話，有幾個要點：第一、民主政治可以消弭內戰，故值得提倡。第二、民主政治欲求穩固，必須成為傳統性質。第三、民主政治須政權高於軍權。第四、民主政治須各黨派互相寬容，即須少數黨勿佔於讓步，而多數黨勿過求優越。這幾個點，確實是民主政治的要義。他以為東歐的俄德，與亞洲的中日等國，均尚無建立民主政治的機運，故曾再三討論及之。他說：

教會或政黨治國，乃寡頭政治之一種，而在近年取得新重要性。此制，雖有較古之一方式，留存於教皇領地中，與巴拉圭之耶穌會政制中。而其現代方式，則始於喀爾文在日内瓦之統治。尤為現代化者，則為克林威爾繼之聖者統治。在十八與十九世紀中，此一類型之政制，已可被視為永遠絕

跡矣。但其制因列寧而復活，而採用於意大利與德意志，且懇切圖施於中國焉。

在有如俄國或中國一類之國家，其大部分人民不識文字，而無政治經驗。其革命家則於成功後，自覺處於頗為困難之境地。依照西方圖案之民主政治，不能一定奏效。其制曾經嘗試於中國，而其最初即屬一大失敗。（見第十二章）又說：

假令革命權威欲不甚施用孤行權力，而使自身克以成立者，則需要人民更為強烈而積極之支持，遠甚於傳統權勢之所需者。當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一年宣佈成立之時，受外國教育之人士預行議會制憲法，而民衆漠然，其制迅即在好戰路督軍之下，成為孤行權力。（見第三章）

他以為中國在民國初年，由受外國教育人士，預行議會制憲法，而民衆漠然，因即為北洋軍閥的武力所擄掠，是中國試行民主政治的大失敗，固然不錯。但若因此即認為中國無再行民主政治的機運，則似乎不免過慮。因為中國對於民主政治雖迄今尚未完全成為傳統性質，然已有若干點漸成傳統性質。例如，中華民國的名稱，是民主政治的象徵，已經過三十三年之歷史。凡企圖改變此象徵者，如袁世凱張勳等無一不慘遭失敗。此點可說已成傳統性質。又如民主政治思想，自孫中山先生首先倡導以來，已有將近五十年的歷史，不但國民黨以民主政治為理想目標，即其他黨派，也都以民主政治為理想目標。此點在理論上可說已成傳統性質，只待在實際上逐漸加以充實。至於羅素所謂民主政治的機運，則以中國經過此次長期抗戰的教訓，已漸次造成，並已具有不可抗的形勢。凡服膺此形勢，而逐漸實施民主政治者，必可獲得多數人民的擁護，而遂成

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的熱望。否則難免漸失民望，無由使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了。現在中國已有這個再度試行民主政治的機運，羅素著此書時尚未及見，故特加以補充。

羅素以為欲建立比較完美的民主政治，必須注意四種條件：即（1）政治條件，（2）經濟條件，（3）宣傳條件及（4）心理與教育條件。關於此四條件，羅素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可掛諸人參攷，試扼要引錄如下：

社會生活，若應較善於暴虐政治，則需一定之公正性質，惟一可行之公正方式，乃為多數統治，即民主政治。不過在民主國中，多數人施行殘酷與全非必要之虐政於少數人，乃屬可能之事。故少數黨之保護，就其適合於完整之政治者而言，在節制權力一事中，乃一重要部分也。在民主政治存在之處，仍有保護個人與少數黨派，以防暴政之需要。因暴政本身為一可惜之事，且頗可引起破壞法律之舉動也。現今需要種種團體，維持各種方式之自由，並產生敏捷之批評，以毀滅過用權力之官吏、警察、邑令、法官焉。行政人員與行政機關，本來便有妥為規定之數種權力者，若不加以監督，則頗優待不足贊許之獨立權力。（第十八章下同）

以上為民主政治必須具備的政治條件。其要點為：（1）公正的統治，惟有民主政治。（2）、民主政治，雖以多數統治為原則，但仍須保護個人及少數黨派，以防暴政。（3）、為防止權力之濫用，須由人民自由執事並監察。

今日經濟權力之問題，乃管理權之問題，非所有權之問題。馬克斯輩之許多思想情形，屬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所以若輩仍然想像工商業之狀況，猶如尚屬於個人資本家者然，所以若輩未曾得知由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而產之教訓。故欲

經濟事業之國有與國營，確有利於普通國民者，不獨民主政治爲主要之事，而尤須爲有效之民主政治焉。吾人在以前已經表明，期望無責任之權力，爲仁慈之權力，乃其爲輕率之舉。若無民主政治權制度 Devolution 與免除法外懲罰之方，則經濟與政治權力之合併，爲贖人聽聞之暴政新器耳。

以上爲民主政治必須具備的經濟條件。其要點，爲實行經濟統制，必須先實行民主政治。不然，則經濟事業之有國營及一切統制，皆爲利於官吏而害於人民的暴政。

人民不平之鳴，愁苦之訴，須爲可能之事。激昂議論須有自由，惟以不鼓勵破壞法律者爲限。官吏用權過分，或用權濫妄者，須有途徑以控訴之。凡此一切，當國家有對古經濟權力之時，故國家在資本主義之下時，尤爲重要。因彼時國家之權力將大爲增加也。民主政治若奏功，若欲持久，則需要有容忍精神，而無過多之憤恨，無過多之愛好權力之心情也。

以上爲民主政治必須具備的宣傳條件，其要點，爲（1）人民均有言論自由，（2）官吏濫用權力，人民有方法控訴；（3）言論態度須互有容忍精神。

民主政治，若欲成功，則需二種性質之廣佈。此二性質，乍觀之，似趨向於相反之二方。一方面，衆人須有一定程度之自信，及支持自己意見之一定願心；互相反對之政治宣傳，各有許多人民參加其間者，須任其進行。但在另一方面，當大多數之決定，與若干人士意見相反之時，此若干人士，必須欣然服從。民主國中，每一男子，每一婦人，應不爲一奴隸，亦不爲一叛徒，而爲一公民。即其人自有適當一份之治權心智，但不得濫量，其人並許他人亦同樣有之。此等心

智，乃平等合作之心智，而包含一人已意之堅持，達於一定之點，但不過之者也。造成民主政治成功之氣質，乃於懷疑與獨斷二者之間。即此種氣質，以爲其理想全盤可達到，亦非全然不可能到，真理之可達，只能至一定之程度，且能有經過困難亦可也。欲養成此等性質，則須實施自由教育，而勿爲殘忍狂熱者流所傷害。而欲達此目的，吾人須求造成精神之獨立。自由教育之工作，即如次所述：授與重視統治以外諸事之感，贊助造就自由社會之聰明公民。

以上爲民主政治的心理與教育條件。其要點，在以民主的教育，養成民主的氣質。

我們十分相信：民主政治不僅是個法治的問題，而且是個人治問題；不僅是個制度問題，而且是個態度問題。（此種道理，拙作民主憲政的風度問題一文已論及，擬再專篇詳論）普通政治學及憲法學上所告訴我們的，多半偏重在民主政治的法治或制度方面。羅素在本書中所說的民主政治的四大條件，多半關於民主政治的人治或風度方面，特別值得我們加以注意，故介紹之於上云。（田父）

（二）斯大林格拉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蘇軍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開始，迄翌年二月二日止，將企圖佔領斯大林格勒的德軍整個解決這不只是蘇德戰爭的一大轉捩點，而且是這一次世界大戰中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

綜計這一役蘇軍除掉將從斯大林格拉西北和西南，頓河流域中部一帶，以及斯大林格拉南方，企圖援救在斯大林格拉近

郊被包圍的德軍的一切軍需物資，除在斯大林格拉近郊被包圍的德軍主力，整個被解決的僅有三十三萬人，計生擒的俘虜有九萬一千多人，其中有軍官二千五百餘名，將官二十四名，在將官中有元帥一名，上將二名，其餘的則是中將和少將。至奪獲的戰利品爲飛機、坦克、大砲、迫擊砲、機關槍、步槍、汽車、摩托車、曳引機、拖拉機、拖運機、無線電機、鉄甲火車頭、火車箱、以及儲藏彈藥和武器的倉庫等等，更多至無算。蘇軍得此一番勝利，已士氣大盛，德軍受此一度打擊，已漸近再衰三竭。

這本書的內容，除蘇聯情報部所發表之正式公報外，更有論文報告通訊等多篇，而此類報告和通訊，均出自當時身在斯大林格拉目擊此一幕活劇的名記者如西蒙諾夫、格羅斯曼等之手筆，其文字之生動有力，即我輩外國人在事後讀之，猶覺可泣可歌，其足鼓發蘇聯人民敵愾同仇之心理，自更不待論，不僅什麼是現代戰爭，必讀此書始可略窺其全貌；即以宣傳技術論，亦大值得吾人學習學習。（譯生）

（三）蘇聯工業轉入戰時軌範

（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一九四三·莫斯科）
這本小冊子是格爾曼德克寫的，從這本書裏，我們可得着如下的若干事實：

（一）在革命前，俄國本來是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

（二）經過幾度的五年計劃，不僅在舊有的工業中心如莫斯科，列寧格勒，哈爾科夫等處建立了許多巨大的五金工廠和機器製造工廠，而且全國也都按計劃地工業化了。

（三）蘇聯的第一工業據點，自然是在西部，但根據斯大林的新意，在烏拉爾和西北利亞並建立了第二個極大的工業據點。

（四）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九的十年之間，他們增建了一萬公里的鐵路，這對於這次關於西部工業的搶救，實有莫大的幫助。

（五）在幾個五年計劃中，一般工業不僅在數量方面有了突飛猛進，即技術的提高，也得了平衡發展。因此一遇非常，無論高等技師與熟練工人，均能不感缺乏。

（六）主義能實踐，領導的人物不腐化，工農羣衆深感自身的利害已與國家的利害打成一片，因此雖遭遇極大的困難，仍能發揮其英勇的勞動精神。

建國必從正本清源上多下工夫，不只需要如鐵的巨腕，更需要如車的眼光，蘇聯的往事可鑒也。（譯生）

華僑興業銀行

存 放 貼 匯

款 款 現 兌

電話
四一三三九
四一七二八

書用簿固

利息優厚

▲營業要目▼

手續敏捷

▲分行▼

西 安 明 林 關 州 陽 縣 新 華 辦 事 處 匯兌迅速

行址：民族路一四九號

謙泰隆興業銀行

電話：四一五八二

電報掛號：九六六〇

協助工商
便利顧客
貼放靈活
存取方便

民憲半月刊（第二期）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卅一日出版

編輯人 左舜生

發行人 鄭振文

發行所 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信義街卅九號

定閱處 本社

代售處 重慶成都桂林昆明貴陽長沙衡陽各新書店

本刊零售每冊國幣十二元

定 額			時 間	冊 數	收 費
全 年	二 四 冊	二 百 三 十 元	半 年	十 二 冊	一 百 二 十 元
三 個 月	六 冊	六 十 五 元			

不備圖說之費，一元的郵票可以代現。不收寄費，加快郵掛號照加。

純粹華僑資本 華僑聯合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信託 儲蓄
分行 支行 處
東興 柳韶 州關
號八十八路森林
四九二〇號掛報電
六七二一四話電

手續敏捷辦事簡便

中國工礦銀行

利導游資 調濟金融 營業要目 貼現放款 匯兌現款 植生工業 協進生產

衡陽 桂林 昆明 西安
陽南 林自貢市 明柳 安長 沙州

梧州 洛陽 寶雞

總行：重慶森林路二號

電報掛號：二一八八 電話：四一四二 二九一八

大同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銀行部

重慶分行 蘭州分行 西安分行 昆明分行 桂林分行 貴陽分行 衡陽分行 柳州分行

行址：重慶打銅街四一號
行址：蘭州中正路八八號
行址：西安大街八八號
行址：昆明護國路八八號
行址：桂林東路八八號
行址：貴陽中山路八八號
行址：衡陽剛直路八八號
行址：柳州培新路八八號

儲信部

重慶中一路電話：二二八四
昆明：三五一八
（一四〇七）均餘外

交通銀行

為各工廠：

準備之復興戰後謀求
解決添購機器之困難

舉辦：

工廠添購機器基金存款

存額 至少國幣拾萬元

期限 至少一年但得分期繳存

利息 照本行定期存款利率計息

優待辦法

- 1 存款期滿後工廠以之添購機器如有不足得向本行商借最高額可達已辦存款之總額
- 2 存戶借款定購機器時由本行代辦其需自辦者由本行代付價款
- 3 存款未滿期前訂購機器得向本行商請保付價款
- 4 此項存款到期時如不需添購機器可申敘理由取回全部本息

民憲

第一卷 第三期

建國目的之政治休戰

張君勱

民主制度與人才的培育與護惜

左舜生

中國到憲政之路

梁漱溟

中國憲政運動的歷史教訓（下）

陳啓天

理財與養民兩觀點下之土地制度

余家菊

如何綜合尼·史·麥·蒙四氏擊潰日本之戰略

孫寶毅

蘇聯擴大十六邦自主權的意義

費穩譯

理學漫談（二）

余家菊

新書評介

張申府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Academia Historica

元萬千壹幣國額總本資

扶助實業促進生產
以服務社會爲主旨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兌
儲蓄
信託
手續敏捷利息優厚
以便利顧客爲前提

衡陽 梧州
柳州 成都
貴陽 宜賓
昆明 瀘縣
西安 江津
蘭州 內江

蘭州	西安	昆明	貴陽	柳州	衡陽
內江	江津	瀘縣	宜賓	成都	梧州
遵義	白沙	磁器口	合川	上海	長沙

號八〇二街西陝慶重：行 總
三五〇二四：話電 五三二六：號掛報電

民國政府特准設遷

資本伍拾萬元
各種營業儲蓄存款
節約款項以全儲蓄
定期有獎儲蓄
特種有獎儲蓄
各種信託及代辦業務
產物水火保險
戰時陸地與海運險
總局——重慶第一橫街市

〔目要秘集〕

代辦國內外材料
工業品出口土產出口
印刷鈔票印花
辦理運輸
會計服務

分局 遍設國內
代理處 外各地

茶 廠
出 品

寶星沱茶
勝利沱茶
翠湖散茶
得勝沱茶

成 績 表

寶元通各分號
各埠茶莊內均有出售

泰裕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

法定業務

地址：重慶民族路七十八號

電話：四二四六二

匯兌迅速 服務週到

手續敏捷 信用穩固

建國目的之政治休戰

張君勱

一

吾國之成爲民國，已三十餘年，然政府與人民猶日以「建國」爲號召何也，以建國工作未達於歐美普通民主國家之境地，其規模略如今日之英美是也。建國已成之國，第一，有國家基本大法，爲政府人民與黨派所共守，因而政制有繼續性；第二，爲政治改進計，各人各黨所提出之主義與方案，均能以平和方法解決，不必訴諸武力；第三，人民不獨享受自由，且政府注意於其日常生活水準之提高；第四，國防力足以抵禦外侮。有此四者，則其國家對內外之基礎，庶幾具矣。

此建國之目的，爲朝野上下所共同意，然抗戰以前政府因北伐功成之後，據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階段，圖逐步進行，在前兩階段，謂爲一黨統治可也。吾人以為訓練人民之法，在增長其智識，養成其人格，許以自由發展之機會，毋以口行負責之中央與地方大小職務，如辦理地方自治，如爲國會議員與參加政府，則人民之守紀守法，具有獨立意見與負責意識之習慣，日積月累，自然養成。否則教之以同種口號同種學說，取全國人民而入之於同一模範之中，以爲如是而一黨統治之基始固者，適足以自造紛爭而陷於不可收拾之局矣。

或者以爲一國中多黨存在，不如一黨握權。思忽統一，步伐整齊，如蘇俄之第一第二第三三個五年計劃之實行，豈英美之各黨政治所能望其背？即退一步言之，德自希特勒執政，宣告凡黨憲軍事條款之無效，自動取消徵兵制，乃能佔領因河

併奧捷，其國疆拓土之成績，亦豈英美所能及？其所以贊許一黨之制者如是。然吾人以為吾國之立國，誠如蘇俄明標無產階級之名義，或如德意志之反對民主者，斯無論矣。倘猶以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爲基礎，且將來早晚有還政於民之一日，則多黨之制，終必見諸吾國。試證之蕭條土一近代民主政治「中之旨曰：

各黨林立爲不可避免之事實。凡自由的大國，均不能免此。苟無黨派，代議政治將不知所以運用之道。彼等對於千百萬之投票人之混然者，所以條理而整齊之。試問如美法英之人口或爲一萬萬以上，或爲數千萬者，苟無各黨之組織，將何以鼓導輿論以向於某種特定之目的乎。甲黨以甲說或以反乙黨反內黨之說鼓吹於人民，然其爲公衆者亦樂於得聞乙黨內黨之主張與其所以反甲者如何。

政黨既有其公開之主張以爲召人民，其主張必探其有關於國利民福者而後能得人信從，反之則爲人所不齒。或其主張雖善，而竟不見於實行，則此種政黨勢必見諸淘汰，良以政黨在於自由空氣之下，而猶不能有所施爲，是政黨之無能，而非政府壓迫之過矣。

政黨各以政綱以主張以自見於國民，而國民之政治智識因以增進，本其主張以角逐於選舉場中，得多數者爲議會中之多數黨，得少數者爲少數黨。其爲多數者立憲，其爲少數者在野，於是立憲者自知有多數之可恃，而大胆發揮其政治手腕，是

為行政部之穩固。其為少數黨者同樣列席議會，或以普會則身政府，深知政情，對於政府提議施以嚴格批評，故在朝者之施政，愈不敢怠忽，惟以戒慎從事。而在野者之批評，若以吹毛求疵為事，或為過高之論，將不為人所信用，而失其下屆之議席，如是政府黨與在野黨地位雖異，其首行之不能不出於負責感覺則一也。各黨有各黨之紀律，甲既屬於甲黨矣，自不能蠅營狗苟，乞援於乙黨之門，至於朝黨野黨以互相監督之故，不能有營私舞弊之舉，更無論矣。

蒲萊士氏於其書中再三發為多黨果必要乎之問題，然其最後答案則曰：代議政治非多黨不能運用。且曰，大政治家如皮爾(Peel)狄思蘭里(Disraeli)格拉思頓(Gladstone)雖明知政黨之弱點，然非明白承認政黨之價值不可矣。

二

然政黨者生存於國家之內者也，活動於國家之內者也，不論其黨之貢獻如何重要，要不能謂其政黨之重要，越國家之重要而上之，如是政黨者，居於國家之下者也。惟其然也，國家重大利害發生之日，政府應犧牲其一黨之政權以公開於國人，如一九三一年世界金融風潮發生之日，麥唐納氏棄其工黨內閣以成立聯合內閣一也，前次及此次戰事起後，英人毀其一黨之內閣，另組各黨混合內閣二也。其所以為此者，要不外乎尊重國家至上之原則，而尚有其他條目在焉。

第一、各黨為對外之故，實行政治休戰，對於議案雖有討論，不若平時之採取對立態度，所以表示不事內爭之意。

第二、各黨不為黨的活動，如議員之補選，由原人所屬之黨自指定候選人，他黨不與之競爭。

第三、人民所享之言論自由與人身自由，不若平時之具有憲法上之保障，是乃出於為國家之故，非所以壓制人民。

第四、各黨對於敵人之作戰與議和，始終保持一致，不容紛歧。

國家對外作戰之日，自身之存亡且不可知，各人各黨惟有犧牲已見犧牲私利，以增強國力，然後可謂為真愛國。聞英國既行糧食定量分配制之日，某富翁別墅中，飼小雞六枚，僕人多購餵料若干，其鄰居乃挖其屯積之罪，法官按法罰之。惟政府與法庭能保持其法律之公平，不論人之高下，黨之異同，而諸小憤微至於如此，而後大公無我之誠，乃為國人所共仰矣。今國家至上之原則，在吾國中，雖漸為人認識，然其行之也未澈底，於是一致對外之中，而不一致者生。對內對外言論之莫衷一是也，對敵作戰中兵力之分散也，更因其他種種之爭，將精力時日消耗於他方面，不集中於作戰也。嗚呼，吾全國上下乎，慎勿謂自八一三以來，國人已竭其最善之努力，此事之公罪，將待諸未來之歷史，非吾人今日所能逆料者也。

惟戰爭時敗為國家存亡所繫，在先國後黨之原則下，其為政府負責大員，應以才不才為惟一標準，而後所決策所施行者，皆歸於至當，軍事也，財政也，外交也，盡全國之人才而用之，何恐不濟，倘若心理上稍存此疆彼界之分，直等於寧可不用人材，而國事居於次要矣。

上次大戰中，勝者為英法美等，敗者為德奧，此兩方所以勝敗之故，全在內部始終能一致團結，而德奧不能也；至於帝俄與英法美為盟友，然未及戰終，而俄之內部已破裂，於是本具有勝者之資格者，乃變而為敗者。此次戰爭之中，法以內部

之不一致，忽而具常政府，忽而解放委員會，某時期內，法蘭西之是否為正式國家，已成為一種問題。至於意大利忽而加入軸心，忽而離開軸心，今雖漸為盟軍所承認，然將來盟國對意所提條件如何，尙待和局之中，方見分曉。由以上兩次戰爭之經過觀之，則國內能休戰能一致者勝，不能休戰不能一致者敗，已顯然矣。

吾國今日，以對外言之，無所謂不一致者在，朝野所認為敵者曰日本而已，其所認為友者英美蘇而已，合全國上下與盟邦之所期者為早日驅逐日人而還我依舊之河山而已。其不一致之所以起，由首段所云建國工作尙未完成有以致之，憲法之未公佈也，各黨派之地位未確定也，實為吾國內部於戰後七年之久磨擦事項所以發生之大因。其極也，影響於外人之觀感，甚或無中生有，疑吾政府關於對內關於盟邦政策有何異同之處，此實目前內外議論之集中點，應急圖有以補救者也。

三

吾人心中所擬議之方法，曰真正的政治休戰而已。英美法諸國之所謂休戰，均行之於戰爭始期，若各黨不為黨的活動，若不反對黨之立場批評議案，若大家不爭執額議員之席，凡此所以以一致之精神對外而已。以云吾國目前，除對外戰爭外，更有其內部之建國大業，如將來之憲法如何，黨派之承認如何，人民之言論結社自由之保障如何，此種種問題，何嘗不可效法西方各國之一政治休戰而徹底行之，以為解決之嘗試乎。

今先試驗不休戰之害，其首先發生影響者為外交。如國外輿論疑吾內部之分道而馳，如對某國之政策，甲黨以為然者，

乙黨或丙黨則非之，甚至外人疑吾以抗日之軍力移用於他方。凡此種種內部之不一致，均是招致外人之誤解，將來戰爭結果降降之日，不一致之現象尤大，其貽禍於國家者尤深，此吾人所為終夜待得不能安枕者也。

次則不休戰之害，影響於內政者。國內平和也，軍政也，歷十餘年，尙未達於安定統一之境，今吾又與敵人對峙七年，所以全國一致攜手，以奠國家於磐石之安者，猶未可見焉。乃有起點觀之見者，謂抗戰之後政府將召集國民大會，自能議決憲法，自能實行工業化，而使國家臻於盛強。吾人則以為內戰之因素尙未消除，萬一破裂，如何而有建國之可言乎。

吾人以為與其待之於戰後，何若決之於今日，與其使特國民大會與憲法之形式，何若就其爭執之實際而解決之。所以解決之者奈何：

第一、政府方面就民主憲政之實質問題，如各黨各派之言論結社與行動之自由，如民意機關之預算監督權，先予以許可與保障；

第二、中共之軍隊，除現時共同作戰外，視上項保障之增進程度，逐漸統一於中樞。

吾人以為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之下，所包含者廣，可以容納者多，各黨各派問題，按之此種政論，固有迴旋之餘地，與其因此爭之久懸不決，而陷國家於分裂，何若政府先伸己手，予之以讓步，其為人民者或者不能不感政府求治之殷，而亦不致躊躇之乎。

國家與政府之所以立者，非徒曰手段而已，非曰猜忌而已。吾人以為此後政局之轉捩點，不在乎算舊賬，而須有一種新

信心之發動，此新信心之狀，難以形容，就其相似者言之，在乎個人有所謂通善改過之悔悟，有所謂革除舊習之決心，就一國言之，如明治天皇之下詔維新，如一八一三年後德意志之民族自覺運動，似一種朝氣，似一種由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之心理發生而出之心態也。一方以惟恐建國事業之不成而求助於人，他方亦以政府相需之誠，而有誠意志齊一之不吝已，體之兩人之本相仇者，一朝杯酒言歡，相約爲兄弟者然，乃可晤乎建國之大業矣。

世界各國歷史上，其萬難解決之事，何處無之。歐洲宗教革命起後，始爲舊教與新教之爭，其後復有新教中甲乙等派與

丙丁等派之爭，路德之對於羅馬教皇，是爲新舊教之爭，英國清教徒之革命與英國不服英國國教者之赴美，是爲新教中宗派之爭，然其所以歸於解決者，曰相容相忍之原則而已。英國自美國因抗稅問題而宣告獨立，毅然改變其對殖民地政策，許各殖民地以各治其地，甚至與英相見於疆場之南非洲，亦完全以自治領之地位許之，故今日英帝國之所由成者，曰自治原則之支配而已。所謂容忍原則，即信仰自由之謂也，所謂自治原則，即人民有口丁己事之權利之謂也，再綜括言之，不外乎民主精神之施行於各方面。彼西方各國既已施之於宗教，政治與經濟，而大收其效者，惟吾政府其急起而直追之。

幼椿招飲新居田莊，歸過時珍宅，兼柬芸生大理，

劫人蒼瀟菱角堰

懷園

避炸脫城居，就作一椽築，故人喜我來，梅花插滿屋。開篋羅陳編，五色燦珠玉，鐘聲度草堂，晨昏動清淑。四郊經世亂，硯硯觸人目，回憶昔年游，共赴安撫役。天下益紛紛，儼如虎狼逐，書生般獸腥，廟議無由出，清醪且盡歡，一陽自來復。歸過魏子宅，移燈照我讀，先出老彭詩，懷人知不足，次出太炎文，格度悲吾蜀。漫漫長夜談，城守傳燈燭，何當風月夕，更向菱窩宿。

民主制度與人才的培育與護惜

左舜生

一九〇一年即光緒二十七年之晚秋，中國北方的故都，已感到甚深的寒意。其時的平津大沽一帶，經過年餘的兵燹，已成滿目瘡痍；而敵騎滿佈國門，猶未盡撤。李鴻章，這位七十八歲高齡，儼然在國際上代表着中國，而以一肩支撐着滿清殘局的元老，經過了他最後一年的勞瘁，終於永別了他曾辛勤愛護過的祖國。

其時一位因政治失敗而亡命海外的青年政論家——梁啟超，得着李的死訊，默念着當時的局勢，熱察當代的人才，乃不勝唏噓感慨：「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他一面低吟着這首有名的絕句，一面乃伸紙濡墨，信筆疾書，為鴻章草成一篇長約數萬言的評傳，於李不少過分的責難，但惋惜之意仍躍然紙上。「太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漫漫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黃鶴竟何之？」即以他輓鴻章的這一幅對聯而論，也可見梁對於這位前輩，原沒有失掉他的敬意。其時的梁啟超，不過一二十九歲的青年，當他為李寫這篇評傳的時候，他自己曾聲明行篋中無可供參考的資料，一切全憑記憶。本來，關於清季的許多外交史料，以及鴻章自身那部一百本的全集，梁氏在當時還不及見，因此他綜論鴻章一生的功罪，雖然筆鋒異常犀利，可是說到最後的定論，自然還有待於後來的史家了。

現在隔李鴻章之死，又已四十三年，在這四十幾年短短的

歲月中，不獨在中國是多事之秋，就是整個的世界也隨時顯示着它的波瀾壯闊。像我們這輩已過五十的人，眼見着世界若干國家的改組與傾頹，親見着兩度幾乎是全人類的世界大戰，最近的七年間，更躬歷着國家一度空前的對外戰爭，且其事一時尙不易終了，我們已略略懂得什麼是憂患，已稍稍明白什麼叫艱難；其一切人物在動盪，如在目前，或所親炙；其一切舉措的成敗得失之故，也大致可舉。平居深念，或與三五友輩縱談，覺吾人於他經世變之餘，對一切一切已勘破殆盡，其猶足以日日縈繞於吾人之腦際者，則為一、國家不能不愛，二、是非不可不明，三、下一代青年的培育與護惜之德不能不講。這一篇的目的，則在就此第三點一述吾人之所見。

現在關心國家前途的人，目視當前的許多困難，默念未來的種種艱難，往往疾首蹙額，深致慨於人才之不夠用，其實平心而論，以中國的人才與並世諸大國相較，自然使人感到中國的人才太少；但以中國近五十年來的人才與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時代相較，則不惟不覺其少，以數量論，實在可以說是中國人才最多的一個時期；其應由吾人加以細心的檢討者，乃在過去這一時代的人才是如何消耗的？而其所活動的成就，是否值得吾人滿意？

在此一時期以前，即五十年前，論到中國的新人才，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國在當時有一大批辦理所謂「洋務」的人物，這一輩人物，可以說是咸同一代人才的尾聲，似即可以李鴻章為

之代表。其時風氣初開，一切造就人才的機構與方法，猶是大轆椎輪，極不完備，而頑固守舊的風習，更充塞於朝野各方，即此一部分因時勢的要求不能不將就使用的人物，亦遭受一可悲的厄運，使之無法得盡展其所長，其所受最後的致驗，則為甲午之敗。甲午之敗，固由我國陸海軍之不如人，從根本上言之，則實由人才不如人，政治不如人也。自經過這一度的失敗，李鴻章所慘澹經營將近三十年的「洋務」，乃化為灰燼，而人才之動搖，乃不能不轉回於變法維新的一幕。

自戊戌以迄辛亥，其時間為十有三年，亦即滿清傾覆前的最後一段，其時遠東的風雲日劇（例如列強對中國之加緊壓迫，以及日俄戰爭），中國內部的動盪亦有加（例如戊戌政變與庚子拳變），而人才的消耗亦以此一時期為最大。在這一期的人才，大率不外分別集中於幾面旗幟之下：曰變法，曰立憲，曰保皇，曰革命，其不帶直接的政治意味者，則為教育與實業。其時留學東西洋的風氣已大開，國家的若干新事業，亦非新人物莫繼，於是人才在質與量的兩方面，乃均顯有增進。可是，內厄於清廷的腐敗，外激於世界的潮流，欲此輩人物齊一其心志以共出於一途，乃為事實所不許，於是各行其是，相生相尅，相反相成，其最後乃演成一時的合流，而其致滿清於傾覆。在這一期中，（即指滿清最後的十三年）雖死於變法死於革命者均為一代的精英，差幸時間究不甚長，而自武昌首義以迄民國成立，其間原有演成長期混亂的可能，亦幸猶有少數老成，加以潛移默運，故能使革命時間特別縮短，人才不致過度消耗，而國家的元氣也賴以保全甚多。

入民國以後，由袁世凱所代表的一部分軍閥與官僚，乃逐

漸形成一大反動勢力，潛假而有帝國運動發生，自民元以迄袁氏之死，雖為時不過五年，可是人才之毀於袁氏與死於倒袁者，又不知多少。自此以降，世界的變動更劇，國內的不安亦有加，於是醞釀復醞釀，乃有一五四運動的興起，而一時代的新人才出焉。

所謂「五四運動」者，乃結束過去，開發未來，由新思想運動以過渡到新政治運動的一道橋樑也。我們要認識目前的政治現狀，依然要從這一幕說起，因此我不能不把這一運動的起因及其影響加以較詳的敘述：

一、民三四之後，袁氏及其徒黨，想作恢復帝制的嘗試，乃有一種復古運動的提倡，因而激起一有力的反撥。

二、民三徵戰爆發，民四日本對我提出二十一條，均普遍的，深刻的給予國人一種刺激。

三、民五洪憲改元，民六張勳復辟，尤其使大家感到國本動搖，覺得非把代表帝制思想的魔鬼根本撲滅不可。

四、民六俄國革命，是形成中國新思想運動的一大助因。

五、民七美總統威爾遜發表構和華本原則十四條，頗給予中國以一種新的希望，以為二十一條及山東問題，庶幾於和會中可以得到一種糾正。

六、民八巴黎和會既開，一切不能如中國所願，二十一條既被拒絕提出，山東問題亦僅作一片面有損日本的解決，因此才有一五四一幕的產生，也因此才有對凡爾賽和約的拒絕簽字。

歸納這一幕的主旨目的，第一在反對誤國的軍閥，第二則在反抗當時協以護我的帝國主義者，這已經不是思想而是行

動，所以我說「五四」是由新思想運動到新政治運動的橋樑。由此推測以迄北伐成功的七年中，其間最可註目的事實約可舉出如下的幾點：（一）青年抬頭，從此成為推動中國政治的主要力量之一。（二）蘇俄對中國首先放棄不平等條約，頗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好感。（三）中國共產黨成立，而中國青年黨亦於此時產生，黨派關係乃漸趨複雜。（四）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出版，繼以三民主義的演講，國民黨始有寫成的系統理論。（五）蔣先生黃埔練軍，是為北伐成功的張本。（六）國民黨改組，實行聯俄容共，盤盤乃從此一新。（七）中山先生逝世，蔣先生逐漸取得國民黨的領導權，以迄今日。

在這一段中，風浪頗為險惡，全國人才之犧牲於此一時期者，為數亦甚多，其得失是非，非此時所能斷斷，只好把這個責任留待將來的史家。

由民十六以迄抗戰，其間又是十年，一個統一的政府雖告成立，但對內的軍事活動，仍隨時間作，而九一八事變，又爆發於民國二十年，其間死於內戰，死於抗日，人數自亦不少，可是比較民元迄民十六的這十六年，則此一階段仍不失為一適於培育人才的小康時代。

七七抗戰既起，這是國家民族的一個死活問題，在此七年之間，我全國的仁人志士，死於前線，死於流離，死於敵人的轟炸，死於飢寒的威脅者，又不知凡幾。吾人目觀當前現實，默念來日大難，因主張全國切實團結，以杜內爭；主張立即實行民主，以求得一共進的軌道；並主張加強中英美蘇四國合作以維護世界的和平。因為不停止內爭，則人才惟有相尅相消，重蹈以往的覆轍；不盡實現民主，則所謂團結即毫無根據；不

能得着世界真正的和平，則牽一髮而動全身，吾人亦決不能展開建國的工作。

往者「一二八」以後，政府將有困難會議的召集，上海一部分關心國事的人士，常假「中社」為聚談之所，某次，章行嚴先生亦出席，同人乃請其發言，章先生發言不多，而意則懇摯，其言有云：「中國近若干年來之人才，多用於消極，而無法使其從積極方面發揮，此實國家之最大不幸……」當時聽眾的感想如何，不得而知，吾人略知章先生及入民國以來人才消長之關係者，則認為此寥寥數語實已道出此四五十年來若干不幸事實的癥結。以目前的情勢論，中國人才的動向，又已陷入了非向積極或消極的歧途，這不僅是個人成敗之問題，實亦國家命運之所繫。吾人於此有一深切的認識，即認為惟民主制度最適於一國人才的培育與護惜，此外一切一切的方法，均非正常，且斷然無效。至中國今後建國的人才，亦即向積極方面發展的人才，究須具備何等的素養，則請諸端以讀其所見。

感懷鄒師

懷園

朦朧微雨細如絲，苦憶朝曦覓句時，
欲過玄亭問奇字，橫江風浪不勝悲。
十載西南苦用兵，欲將巴蜀作長城，
庾樓人散無消息，空向珠江望月明。
老向鄉關叫帝關，九原莫更念諸孫，
龍紗字字珠璣在，盡是人間涕淚痕。

中國到憲政之路

梁漱溟

在今日談中國憲政問題，最不好談。第一，是爲了今日的憲政不好談；第二，是爲了中國的憲政不好談。

何謂好談不好談呢？你談出來的，我明白；我說出來的話，你明白。彼此三言兩語，便將問題所在弄清楚。彼此談了三次兩次，便討論出箇結論來。這便是好談；反之，便是不好談。

何謂今日的憲政不好談？憲政到了今日，這不僅是三五十年前，一百年前，那樣簡單明瞭。就憲政本身說，近三五十年間世界史上演出許多憲政新例，形形色色，種種不同。你不能執其一，以否認其二。再就學者們的研究說，經過近三五十年的學術進步，討究日深，其間議論亦日益紛繁。因此可能你有你所謂憲政，我有我所謂憲政，彼此談了許久，未必談得是一件事。但如說它不是一件事體，却又弄兩件事。——這便大大不好談了。

何謂中國的憲政不好談？一箇民族如中國者，其歷史之久遠，文化背景之深厚，真是世無其匹，非常特殊。因此，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麼社會，令人難於認識。多年以前之中國社會史論戰，並沒有尋得切實歸落。彼此同是中國人，又誰能像外國學者那樣謙謹，自承「我不認識中國」呢。然而你心目中的中國，却未必是我心目中的中國，說它是兩件事固然不可，而正各有所見各有所聞，亦並非同物。則如何乃是中國到憲政之路，當然更可以東說西說，而大家說不攏了。莫說三次兩次討論不出結論，就這樣談下去，十年八年亦是白費唇舌。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要確定什麼是憲政，第二要講明白中國社會。這兩點弄清楚了，那麼，今後中國究將如何實現它的憲政，自然才好談。

一、試論什麼是憲政

究竟什麼是憲政，我不是研究憲政底專家，最好不要請教於我。然而我爲了發表我對於中國憲政問題的意見，既來寫這篇文章，却必須確定我之所謂憲政。假如我說底不對，有人能指正之，說出一箇對底來，那豈不甚好。

照我所了解底而說：憲政是一種政治。政治是指國家的事務而言。國家則是人類最鞏固底一種社會生活。從乎理性底解釋，國家應爲自願底團體組織；但事實上截至今天爲止，總還是有統治被統治兩方面，強制多過自願。不過自中古轉入近代以來，由於經濟進步，文化增高，理性之開發不可遏抑，片面強制漸不可能，於是而憲政出焉。憲政是一箇國家內，統治被統治兩方面，在他們相互要約共同了解下，確定了國事如何處理，國權如何運行，而大家就信守奉行底那種政治。憲政之「憲」，便是指相互要約共同了解下所確定者而言。「立憲」之云，便是有所確定之意。這種確定，有時是一種成文法，通常稱爲「憲法」。但果眞彼此各有力量的，誰亦不敢欺侮誰，而又誠信相孚，則共同了解者自然共守不渝，非必一一著之文字，昭告天下。

試再問：他們所必須確定者，是那些事項呢？這大概有兩

項爲最要

一項是國家和其組成份子相互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所謂組成份子自然就是人民；而國家照例由政府來代表它。事實上，政府或直接或間接總爲統治階級所掌握；而人民則正是被統治底一方面。其相互間的關係如何，正爲爭點之所在，必須一一確定之。大約在開初，總偏於限制國權之濫用，而保證人民的種種自由。到末後，又轉而加重國家的義務，明定人民之積極底權利了。總之，立憲就是於此等處有所確定；反之，於此沒有公認底準則，便不是立憲國家。立憲不立憲，首先從這裏分別。

一項是代表國家行使國權底爲那些機關，其彼此間如何相關係，而職權又如何劃分。上面說了，代表國家行使國權底，照例便是政府。但在立憲國家，其政府不是由一箇人獨攬或一箇機關包辦底，而至少分作幾箇機關，配合來運用。例如元首沒有內閣副署，便不能發號施令；內閣不得國會通過，便不能決定其施政方針和預算；國會沒有行政官署和各級法院，則其所立法亦無由見諸實施。這些機關各有一份權力，而都不可能任意所欲爲，以防國權之濫用。同時爲大局從積極一面設想，仍不能不求其運用之靈活。所以其間分際關係，都要加以確定，得一公認才行。又假如是聯邦國家，則各邦與聯邦中央之間的分際關係，亦必須明白確定。總之，立憲就是於此分別有所確定；反之，於此渾而不分，漫無規制，便不是立憲國家。立憲不立憲，再就是從這裏分別。

什麼是憲政？如上所說，似乎亦不難知。是底，憲政的本義不外是這。然而要曉得這只是本於憲政初起的形式而立論；後來發展變化，便多不同。

二、民主精神之分析

近三五十年来世界史上演出許多憲政新例，其中最特別亦最值得注意底是蘇聯。蘇聯是完成憲政最後底一個國家。而我們上面所論，却大體是以英國爲準；英國正是出現憲政最早底國家。兩下比較，其間頗多極端不相合之處。今爲說明其極端不合而卒又相通之故，我們要先來講一講民主。

照我所了解底：民主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細加分析可得五點：

第一根本點，就是我承認我，同時亦承認旁人。我有我的感情要求，思想意志，種種；旁人亦有他的感情要求，思想意志，種種。所有這些，我都要顧及，不能抹殺，不能排斥之，滅絕之。若像俗語所說，「有己無人」，便是反民主。

第二，從承認旁人，就有「平等」這一精神出現。那就是不但承認旁人之存在，並乃承認旁人亦不比我們低下，而大家彼此平等底。若像俗語所說，「唯我獨尊」，便是反民主。

第三，從彼此平等，就有「講理」這一精神出現。那就是彼此間的問題，由理性解決。什麼事情大家認識，你亦點頭，我亦點頭，就行了。不能硬來，不能以強力來行己意。所以凡不講理，而要「以力服人者」都是反民主。

第四，從平等而講理，因而就有「多數人大過少數人」之一承認。俗語所謂「三占從二」，少數服從多數者是也。所以遇事大家開會討論商量，公同取決，是謂民主。其中蓋含有承認旁人、平等、講理、取決多數之四點。民主之「民」，指多數人而言。民主之「主」，則有從多數人的主張，以多數人爲

主體，由多數人來主觀，三層意思。

第五，大家的事，當然大家商量決定；然若一個人私事於大家無涉者，便非大家所應過問了。於此而過問，而干涉，豈非又抹殺旁人的感情要求意見了嗎？於是就有一尊重個人自由之一精神出現。近西歐洲「人權天賦」之說，大抵由個人感受太過干涉，太過抹殺，以致發生反抗而來。其所謂「個人主義」不外要求提高個人在團體中之地位，認為團體要相當尊重個人，正是一種民主精神。

民主精神，實涵有以上五點；所有末後四點皆從頭一點本點推演下來。這一切本都是人情所恆有，並不稀罕。但求其五點並具，發揮盡致者，則似乎人世間又還沒有。倘這樣底社會。因此，民主不民主只在其正面一長一消上見出，只在彼此比較相對上見出，而非絕對如何底事。又此五點，雖恆相聯而不同時具備。每每一時一地各有其特殊之表現，或不同之風尚。此時此地，彼時彼地，此地彼時，彼地此時，此五點者有隱有顯，或中或細，曲折參差，不可一例相衡。例如英國風尚極重個人自由，而不求經濟上之平等；蘇聯看重經濟上之平等，而忽於個人自由。即以英國社會而論，其政治上機會之平等遠過於百年以前，而自由風尚却較昔修改甚多。又如中國文化，自古處於民主精神，初不後於近代之西洋人。然而中西相較，彼此所表現者每每互異。關於此層，後當更論。

三、憲政與民主

說「憲政」就等於於說「法治」；却是法治必歸於民治。何以言之呢？

「法」這樣東西，應該是為國人所公認而共守底；此所以

有一國法」之稱。依理言之，此國法便須是國人公共的意思，絕非任何一個人或一部分人可以其意思加於全國人身上底。轉說，若非出於國人公共意思，便不足以當國法之目。然而經濟未進步，一般人文化水準太低，不能表現他們的定思，結果就落到全國以少數人的意思為意思。——這是必然之事。此時自不免由他們來預定法律，而算是國法，要國人共守。翻老實話，便在今天這文明世界上，似此情形，那一個國家能免掉呢？至多不過某一國家好些，某一國家又差些，程度上不同罷了。然而這其間却亦有一界別，不可混過，不可忽視。

這界別，便是立憲不立憲之分。立憲國家，不管它實質上能否免於此，但在形式上它總要做到不如此。——形式上總要做到兩點：

（一）以國會為立法機關，非經一定程序，不能成為法律；

（二）法為最高，國人於此定其從違，任何機關命令亦不過依法而發出底，絕不許以命令變更法律。

前一點，即表示以國人公共意思為法，法為國人公共意思。後一點，即不承認任何人在任何一個機關，可以其意思要國人遵行。這兩原則之確立，非一般不立憲底國家之所具有，所以究竟大不相同。

所謂「法治」非他，即對此種原則之確立及其實踐。法治之「法」，既為國人公共意思，則法治內涵恰是民治，我們於此已可認出了。又通常說，政治上底民主不外兩點：一是國家對於個人自由之尊重；又一是一是國家大事付之國人公議公決。而立憲國家所要確定底，亦便是在此。則政治上底民主「民治」

，爲憲政應有之體，不可或缺，自甚明白。

但法治與民治，並不是同義語；憲政亦終不等於民主。譬如一個國家統治被統治兩方面，在政治上果真有他們共信共守者在，我們就得承認它是憲政。其所共信者愈明確，共守者愈真切，就愈見他們憲政精神之高。却是他們所共信共守者，果全合於民主精神否，實不一定。根本上統治被統治打成兩截這一事實，早不合於民主精神了。試就英國這一實例來看，英國的憲政自來是好底，英國的法治精神自始就很高，但從實質上

要論其民主成分之增高，却只是後來之事而已。此層隨後就可論到。

我們把憲政與民主之關係，總結一句：政治上民主精神，就過去歷史來看，端有賴於憲政之出現，乃得漸次開發出來。或云：憲政之出現於人類歷史，不外是爲政治上漸次開發其民主精神。

（未完）

山城操

佚名

山城一羈吏，狷介傲前賢，晨起扶藜杖，難崖復越巔。揮汗如雨注，喘息到衙墀，伏案理繁牘，俯首聽喚傳。謙詞囑僚屬，幸勿誤公箋，僚屬稱腹枵，長揖乞歸田！晨昏勤慰藉，調護費周旋，如此掬心血，猶難免過愆。公罷歸寓所，羣兒繞膝前，爭道鄰商子，糖餌百般全，阿姊指阿弟，見之輒垂涎。阿娘擁帶至，細訴一長篇：水夫糴粟貴，擔水十五圓，房租加十倍，不加卽速遷；俄而稅吏至，盛氣索房租，房捐方付訖，電費又糾纏；孩子衣服破，廚下鍋釜穿；更有三兒病，至今尙未痊，阿大需學費，一次繳半年；昨向趙家貸，趙娘轉乞憐，踽踽投汪第，汪說苦難宣，衣物俱售罄，何處得錢？如此復如此，滔滔若壑泉。聞之心已碎，一怒欲揮拳，妻兒皆嚇退，枯坐思惘然。自念四十載，廉慎且貞堅，而今難事若，任爾獨捐捐。反觀權貴輩，一席擲萬千，其財何所出，惟有質諸天。嗚呼山城吏，究值幾文錢！

中國憲政運動的歷史教訓（下）

陳啓天

二 由民主憲政到軍閥專制

辛亥革命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變。這件大事變所顯示的重要意義，除推翻了二百六十餘年的滿清政權外，又推翻了二千年來的君主專制制度。代替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則是從新建立的民主憲政制度。建立民主憲政制度，雖是辛亥革命以後的事，但主張憲政制度，則在辛亥革命前六年，即已決定。光緒三十一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宣言所標舉的革命大綱，（一）驅除鞑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等項。關於建立民國一項，該宣言有如下的說明：

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我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共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這個說明，可以說是民主憲政制度的最初主張。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何以必須建立民主憲政制度？同盟會領導者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二年所作中國革命史中，曾加以說明如下：

予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其理有二：既知民為邦本，一國之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餘地？此自學理言之者也。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處於被征服之地位，國民之痛苦，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主無甚深之惡感者，猶或可暫安於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歷

史事實而論之者也。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期所以長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為，遂相爭相奪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則爭自絕。此自將來建設而言者也。有此三者，故予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而後可以圖治。

既然「中國非民主不可」，「必立憲而後可以圖治」，所以辛亥革命，除「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外，便須開始「建立民國」，即須開始建立民主憲政制度。最初建立的民主憲政制度，是仿照美國獨立時各州會議的先例，先由各省諮議局及都督府代表組織各省代表會，議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次依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由各督代表會選舉臨時大總統及副總統，組織臨時政府，並以參議院同意之國務員輔佐之。又次由各省都督所派之參議員，組織參議院，為中央立法及行政監督機關，以代替各省代表會。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立法原則，大體仿照美國總統制。先在漢口倉卒議決，復在南京加以修改，是「建立民國」的第一部根本大法。依據這一部根本大法所組織的臨時政府，於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到同年四月一日孫中山正式就大總統位於袁世凱，共只過了三個月。臨時政府在這三個月中間的最要建樹，第一是確立中華民國的名義；第二是革創民主憲政的初規，由立法機關產生行政機關，並監督之；第三是聯絡獨立各省而統一之；第四是制定臨時約法，以代替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五是代表獨立各省，與

袁世凱商議清帝退位條件，並以大總統位號報關袁世凱。清帝於二月十二日退位，參議院於同月十四日改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又於三月八日制定臨時約法。三月十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職後，即提出唐紹儀組織內閣。四月五日以後，臨時政府由南京遷到北京，從此民主憲政制度的試驗，便由組織大綱時代，進入臨時約法時代。

臨時約法時代與組織大綱時代的最大差異，是在制度上仿照法國，改行內閣制；又在人事上改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是在君主專制政治下培養出來的一個官僚式的北洋軍閥代表，原與革命黨及革命軍無緣。適逢武昌起義後，清廷想利用他撲滅革命軍，革命各省也想利用他推翻清廷。他反而利用這個機會，一面將清廷的大權拿到手裏，做了清廷的國務總理大臣；又一面將民國的旗幟拿到手裏，當選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完成，在利用袁氏逼迫清帝退位。南北統一以後之所以不能確立民主憲政制度，亦在改選袁氏為臨時大總統。當時參議院為防制袁氏不能實行民主憲政，乃在臨時約法上嚴格規定責任內閣制，將政府的實權集於內閣，而內閣的實權又繫於議會。所以臨時約法規定參議院或國會對於國務總理及全體國務員事前有同意權，事後有彈劾權，但內閣對於參議院或國會却無解散權的規定。這是比法國及英國還要徹底的一種責任內閣。要運用這種制度，必須一面有安於高拱無為的總統，又一面有富於民主風度的議員。但是當時的總統，是一個官僚而兼軍閥出身的袁氏，只知大權獨攬，那肯安於高拱無為？當時的議員，也多缺乏民主風度，不大會運用這種民主憲政制度。因此臨時約法所規定的民主憲政制度，便無由

確立起來。袁氏及其所屬官僚政客更人走狗，為貫徹大權獨攬起見，一面利用約法，一面摧毀約法；一面利用國會，一面摧毀國會；一面利用黨派，一面摧毀黨派，以便逐步推翻民主憲政制度。在民國元二反對袁氏這種企圖最力的黨派，當推國民黨。當時的國民黨，由同盟會改組擴大而成，是一個最有聲勢的黨派。又明白宣言主張責任內閣與省長民選，詳見元年八月國民黨宣言，正與袁氏的大權獨攬針鋒相對。於是袁氏便首先一面利用國民黨，一面摧毀國民黨，以達其大權獨攬的目的。他利用國民黨的方法，不外用金錢收買少數的不肖分子，為他張目。但有三張的國民黨員，如孫中山先生黃克強等，却仍舊擁護民主憲政。宋教仁還想利用國會，多數黨的勢力組織政黨內閣。責任內閣已為袁氏所不喜，政黨內閣更非他所願意。於是袁氏便不擇手段，暗用暴力，將組織政黨內閣最有希望的主要人物，首先去掉。於是宋教仁遂於民國二年三月在上海車站為袁氏的特務人員所暗殺了。這即所謂宋案。在宋案未發生以前，國民黨的領袖，孫黃等都聲言不與袁氏爭正式總統，只願在野盡力國事。但宋案發生以後袁氏身為臨時大總統，而使用特務人員暗殺反對黨的人物，便不免激起公憤，尤其不免激起國民黨的公憤，而主張即以武力討袁。袁氏一不做，二不休。既以暴力暗殺宋教仁於前，便以武力摧毀國民黨的實力於後，於是造成癸丑暗殺之役，亦稱二次革命。這次革命的結果，國民黨在各省的實力，幾乎完全為袁氏所摧毀。從此以後，國民黨所主張的責任內閣與民選省長，便都談不到。只剩下一部分比較溫和的黨員，還想利用國會制憲，來制袁氏。但是袁氏只利用他們湊足法定人數，選舉他為正式總統，却不要他們制憲

來稱制他。所以袁氏要先舉總統，後定憲法。所以袁氏於同年十月六日用公民團包圍國會，逼迫議員，舉他為正式總統以後，便要解散國民黨，並且摧毀國會，使其不得稱憲。

這樣一來，主張民主憲政的多數黨，即國民黨，不能在國內活動了。實行民主憲政的必要機關，即國會，也不存在了。只有一部名存實亡的臨時約法，還多少是袁氏大權獨攬的障礙。所以又接着設法摧毀臨時約法。臨時約法原為民意機關所制定，袁氏要摧毀他，也不得不假借一種民意機關來增修他。換句話說，袁氏要為他大權獨攬的總統，取得一種法律的根據，仍須玩弄一番增修約法的把戲。於是於民國三年二月，自由設立約法會議，增修臨時約法。袁氏又自行提出一個增修條，查約法會議，其要點如下：（一）外交大總統歸總統，無須參議院同意；（二）總統制定官制官規，及任用國務員與大使公使，無須參議院同意；（三）憲法由國民會議制定，由總統公布，並由總統及參議院起草；（四）總統有緊急命令權及財政緊急處分權；（五）總統自由視察回復人民之公權；（六）採用總統制。約法會議依照此種宗旨，增修約法，於三年五月一日由總統公布，這即所謂「新約法」。新約法的立法原則，袁為模仿美國的總統制，面實仍沿如清末大權君主立憲法大綱。只有一點不同，一個是大權總統，一個是大權君主而已。我們可以說，民國元年所建立的民主憲政制度，到袁氏的新約法出現以後，已完全摧毀，只剩下一個中華民國的空招牌尚待改變。

當袁氏初任臨時總統時，雖曾經宣誓「遵守憲法，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但他就職以來，只知利用約法

，以取得總統的地位；又摧毀約法，以發揚專制的瑕穢。又知利用國會及黨派以選舉他為總統；又摧毀國會及黨派，以滌蕩共和的精神。如此繼續推演下去，便非至實行帝制不止。所以既有了新約法保障他的大權總統以後，又於三年十二月由新約法會議修改大總統選舉法，使他可為終身總統，又使他的兒子可為總統。然他和他的兒子還不甘心滿意，要想直截了當的做起皇帝來。民國四年雖經過二十一條的對日外交失敗，而袁氏父子仍唆使楊度孫毓筠等發起籌安會，並刊佈君憲救國論，以為共和不能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此種帝制運動，由御用的籌安會發動，經過御用的參政院建議，和御用的國民代表大會推戴，前後不到三個月多的時期，袁氏便於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行承認為「中華帝國皇帝」并改明年為洪憲元年，預備明年元旦即帝位。但是袁氏偽造民意，將民國忽變為帝國，總統忽變為皇帝，未免引起各方面的反對，使他做不成皇帝。自二次革命失敗以後，由國民黨改組而成的中華革命黨，始終反對袁氏做皇帝，自不待說。至於在帝制運動以前，原來贊助袁氏的部屬與進步黨，也多因帝制而起來反對袁氏，却出於袁氏意料之外。袁氏所以敢於稱帝者，恃他握有北洋軍隊的實力，不怕他人反對。但不知首先不贊成的人，便是北洋軍隊的兩個巨頭，即陸榮廷與段祺瑞。袁在準備稱帝以前，先設法陸軍統帥辦事處，並越模範團，以削弱陸軍總長的職權，段已不甚高興。到籌安會發生後，段便因而辭職，表示消極反對。蘇督馮國璋恐袁氏稱帝後，他自己無由繼袁做總統，也表示消極反對。古語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馮段雖曾經做了袁的部屬很久，却難於做洪憲的臣子，尤其難於做袁太子的臣

予。謂段尙且不安於稱臣，與袁比肩的北洋軍師徐世昌，自更只好以一嵩山四友」待之了。這種內部的消極反對，袁氏尙不覺，中止稱帝，可說是一「帝令智昏」。

進步黨在國民黨未遭袁氏解散以前，對於袁氏採取幫助態度。及國民黨既被解散，國會停止，約法增修以後，袁氏便用不着進步黨。進步黨有苦說不出，只好採取觀望態度。等到帝制運動一起，進步黨對袁氏的態度，便由觀望而趨於積極反對。首由梁啟超發表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在言論上予袁氏以一大打擊。繼由蔡鍔在雲南發動護國軍，又在行動上予袁氏以一大打擊。這次護國運動，與反帝制運動，雖聯動出於梁蔡，而實際却是國民黨與進步黨聯合反袁的共同活動。從前二次革命，國民黨單獨反袁，固不免失敗。這次各黨派聯合反袁，便必然成功了。果然護國軍起後，不但袁派以外的人都響應，便是袁派以內的人也響應，氣得袁氏自行制斃。自護國軍起，到袁氏倒斃，不過六個月的光景，與辛亥革命成功一樣迅速。四年多以來，袁氏反民主，反憲政，攬權稱帝的結果，只得到全國人的一致反對。袁氏所以爲全國人一致反對的主要理由，可舉兩個代表人物的話做說明。元年讓總統位於袁氏，二年以後堅決反對袁氏的孫中山先生說：

今袁背棄前盟，舉行帝制。解散自治會，而閭閻無安民矣。解散國會，而國家無正論矣。濫用公款，謀殺人才，而陷國家於危險之地位矣。假民黨獄，而良儒多爲無辜矣。有此四者，國無不亡。……一人冠冕，其心尙有共和政體存耶？既忘共和，是爲民賊。吾儕敢不犯難誓死除此毒賊，以拯吾民。（見民國四年討袁宣言）

這是指明袁氏的罪惡，在反民主，反憲政，初幫助，繼反對袁氏的梁任公先生說：

護國軍總司令蔡君之言曰：吾儕今日不得已而有此義舉，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幾爲我國民爭回一人格而已。……嗚呼我國萬萬人民人格，至今日也，爲世凱蹂躪而無復餘。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爲一切人類通性，惟其自刃喉，見黃金則膜拜。吾按此二物以陷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來，北京政府苟有言政治，惟有此二物魂影，縱橫披猖，縱旋而於人人心目中而已。……其有不甘受彼利用者，則必設法屠殺之，驅逐之，使其不能自存。使袁氏帝國成立，將續行此政策，其必善類日就滅絕，惟惡種獨能流傳，豈不使我國全國人喪失其爲人類之價值而不止也。（見居厚集）

這是指明袁氏的罪惡，在利用金刃政策，以摧毀國民人格。金刃政策，本是我國專制君主傳統政策。袁氏在專制君主之下長養出來，自然熟習此種政策。不過他却忘却了起爲民國總統，便不宜再用此種反民主，憲政的金刃政策，而陷於自取滅亡。

袁死以後，民國元年所建立的民主憲政制度，自須次第恢復，即須恢復約法，恢復議會，恢復總統。因此黎元洪得以副總統繼任大總統，臨時約法又成爲中華民國的根本法，原被袁氏解散的國會也得重行集會於北京。在形式上，總算恢復了民國元年所建立的民主憲政制度。不過在實際上，仍是未能依着民主憲政的軌道進行。其所以不能依着民主憲政軌道進行的重要原因，第一由於軍閥的專制，第二由於政黨的腐化。護國軍

之役，雖將袁世凱推翻，但中央政權仍落在北洋軍閥段派之手。段琪瑞在袁未死以前，即已取得國務總理的地位，成為袁派的繼承者。他在袁死以後，一面利用國務總理的地位，盡力集權於內閣，造成府院衝突；又一面利用督軍閥，威脅總統與國會，造成國會再解散，與張勳復辟，以便其一人獨攬大權。他也如袁一樣，除專制外，不大知民主憲政為何物。至於國會呢，則以有政黨關係的議員，除少數外，多數趨於腐化，也未能善於運用議會的職權，以扶植民主憲政的基礎。此時的國會議員，雖有憲政商榷會與憲法研究會的兩大黨派組織，但兩派均不能本互讓的精神，從速制定憲法，致遲延十月，毫無結果，且予督軍閥以干憲的口實，又被武力解散。

民國六年七月的張勳復辟，是民主憲政的第二度大打擊。這次的大打擊，雖在表面上出於張勳，而在實際上則出於段派的策劃。在復辟前，段的國務總理已為黎總統免職。段派不服，乃暗中唆使張勳復辟，以推翻黎元洪。又準備「討逆」，以奪取政權。結果，一一如願，段復自任國務總理，馮國璋繼黎為總統。國會既已再度解散，也不再恢復。段派只想利用外援，繼續貫徹武力統一政策，因此引起護法戰爭。護法戰爭的領導者是孫中山先生。他所要護的法，是約法，及依約法產生的國會。換句話說，即是擁護民主憲政制度。這種主張，不但與北洋的軍閥專制正相反對，也與其他的軍閥專制正相反對，因此護法事業遭受不少波折。所以中山先生說：

自五年至今（按指十二年）國內之革命戰爭，可統稱之曰護法之役。……擁護約法，即所以擁護民國。……故余奮然以一身荷護法之大任而不少撓。護法事業，凡三波折：六

年之秋，國會開非常會議，舉余為大元帥，余乃以護法號令西南。其時西南與北方戰，純然護法與非法戰也。及余解職去廣州，護法事業幾於墮地。九年之冬，余重至廣州。翌年五月，再被選為大總統，始重整護法之旗幟。而奸宄竊發，進行蹉跎。北方將士反以護法相號召，冀收統一之效。願以國會問題猶未解決，護法事業終為有憾。然予其願以和平方法，略護法之完全成功。（中國革命史）

這段話，是五年至十二年中中山先生為民主憲政而奮鬥的簡史。由這段簡史，可以察知護法事業固起於北洋軍閥的破壞，亦迭受南方軍閥的阻撓。其中詳細情形，茲不必談。我們只須知道在此六七年中，北方固苦於軍閥專制，南方亦苦於軍閥專制；中央固苦於軍閥專制，各省亦苦於軍閥專制，全國成了軍閥世界。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護法事業，固難免迭受波折。即段琪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也因九年的直皖戰爭而一敗塗地。繼段而起的直系軍閥，如吳佩孚等，雖仍做武力統一的夢，但絕對無法武力統一，只有一個假和平統一的辦法，即所謂「恢復法統」，將中山先生的護法旗幟，拿到直系的手中。因此於十一年五月由孫傳芳發出一道通電說：「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階。統一之歸來，固當以恢復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法，共選副座。非常政府原由護法而興，法統既復，異幟可銷。」這道電報，原是直系與一部分舊國會議員所商定的把戲，只待一一出演。所以不久，舊國會又三度在北京集會了。黎元洪也代徐世昌為總統了。這樣一來，直系軍閥可藉法統的招牌，正式奪取北京的中央政權；同時也可折散廣州的護法政府，統一南北，總算如意算盤。

不。直系所謂恢復法統，並非真正護法。只是利用黎元洪爲過渡總統，再收買舊國會議員，選舉曹錕爲總統而已。所以中山先生發出反對的宣言說：

六年以來，戰爭延長，是非莫定。直至今日，法之不可廢始大白於天下。惟現在北方擁有重兵，能操縱北京政權者，祇爲直系。若直系軍閥能護法，則從此兵不血刃，而國是可安。否則除世昌雖已潛逃，而直系軍閥無悔禍誠意，則禍亂之來，不知伊於胡底。夫約法之效力不墮，在使國會自由行使其職權。國會之能自由行使其職權，在掃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則國會之自由行使職權，不但徒託空言，抑且供人利用。求已亂，我以亂。若惟知假借名義，以飾耳目，而無悔禍誠意，且益張謠言幻之習。

直系軍閥那能聽中山先生的話誠意悔禍，只知利用國會，選舉。到十二年十月，賄選成功，議員成了豬仔，曹錕成了總統，憲法成了廢品。從此民權憲政變爲完全掃地。法不成了，國會不成國會，無人再擁護了。從此直系的賄選政府，固其亦無誠意悔禍。繼賄選政府而起的段系執政府，及奉系安撫政府，也都是赤條條的專制既談不到民主，也談不到護法。爲此本報特刊此宣言，以對直系之賄選政府，及段系執政府。而向北方擁護法統，以救所建之民主憲政制度，並希望全國軍閥領袖，能擁護所建之民主憲政制度，並希望全國軍閥領袖，能擁護所建之民主憲政制度。中山先生，始終一面擁護民主憲政，又一面反對軍閥專制。

中山先生與民主憲政

他所領導的護法運動，雖因迭遭波折，未能及身見其完成。但留下一點根基在廣東，爲十五年以後北伐的張本，不能說不是他多年護法的一點成就。我們從十五年來民主憲政變爲軍閥專制的史實上看，可以獲得些什麼大教訓呢？第一大教訓，是民主憲政與軍閥專制絕對不能相容。要實行民主憲政，便不可有軍閥專制。有軍閥專制，便不能實行民主憲政。第二大教訓，是軍閥專制，無論爲何人，亦無論有多大的武力，未有不及身失敗的。北洋系的大軍閥如袁段吳等，固因專制而失敗。其他小軍閥很少不失敗的。第三大教訓，是武力統一政策，不但難成功，而且易招失敗。袁段吳等都以武力統一政策相繼失敗，這是一個教訓。第四大教訓，是軍人不宜干政。如果軍人干政，不但足以破壞國法，而且足以破壞軍紀。第五大教訓，是軍隊須完全屬於國家，而不可屬於任何私人，私人軍隊，是軍閥專制的爪牙，同時又是民主憲政的障礙，政治家固宜誘導一軍服從民主憲政，軍事家尤宜誘導一切軍隊服從民主憲政。稍有私心，則民主憲政固無希望，而擁兵自雄亦只是以自毀第六大教訓，是在軍閥專制之下，國會與政黨均不能堂堂正正的在。國會與政黨供軍閥的利用，則失其價值。不供軍閥利用，則失其存在。第七大教訓，是軍閥專制雖暫時勝利，最後成功仍屬民主憲政。所以現在沒有人敢斷實行軍閥專制，其理由全賴吳佩孚等人，而主張民主憲政的孫中山先生，其理由全賴全國一致的追慕。

無可非難的。既然可用田地為投資對象及儲蓄保障，則一定利潤之賦與，自是應有之事。在現代，金融業的合法利潤為月息兩分。當然，政府依據其土地政策，可將田主的利潤減低，以過低田地價格的高漲，並轉移投資方向於有利國民經濟之途；不過總當給與若干利潤。不然，則田地不成為投資對象及儲蓄保障，田地必成為呆貨，無人過問，農村金融，必然呆滯，決非農民之福。欲確定田主的利潤，必須精確計算田主的每畝收入數及其每畝負擔額。今日所有之計算，尚無一個普遍適合的數字。據我所知，田地投資的利潤，祇有年息八釐；田地的漲價落價，悉以此一關節為轉移。所以其利潤低於商業金融利潤甚。國民喜購買田地，祇是由於買田為最安全的儲蓄。而今田地糾紛日多，樂於買田者漸少。甚至拋棄田地的人亦不少。更有些人，因為祖傳產業，日在勉強掙扎之中。自然戰時的後方，有些人受到戰時的利益，那是一個特殊問題，不在話下。

總之從財政的觀點談土地問題，不但戰時的田賦歸入國庫，不是一個經常的制度；便是戰前的田賦省有政策，亦難做到清爽明確。在將來，最大的限度，田賦收入亦似祇可用作縣行政經費。田賦欲做到清白合理，祇好委託給鄉鎮以下的人員。不但丈量煩雜，田產的轉移登記，繼承登記，欲求明確，亦祇有鄉鎮人員，可勉勝其任。至於每一塊田應納賦額之多少，恐唯有在鄉鎮建立賦額評核委員會，使之估定每塊田所應納的賦額。遇有水旱荒歉，應否減免賦額，亦祇有當地人盡知之詳悉。在田賦作為縣以下財源時，此種辦法，是利多害少的。

關於農民觀點以減土地問題，取問題更多。惟其注意點應在產量之增加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其關鍵則在於尋求何

種經營方式最利於產量之增加。從增加產量之觀點言，當然以引用科學的技術為前提。在何種方式之下，科學技術始可發揮其效能？當然，農場愈大，則任用專門人才之機會愈多。觀察前途，將來為國防物資的種植，為軍士的屯田墾殖，為邊僻地帶之開發，自有許多國營農場之出現。其經營之是否合於經濟原則，可望逐漸有所證驗。

其次，今日鄉村小地主，既多不諳農事，而又別有所業，不能親自經營耕種；即在自耕農，以現今改業之容易，亦有不願終身田畝，而欲從事他業者；循此趨勢，將來必有許多具有農業技能與興趣之人，起而於一定條件之下，代人經營耕種；於田主之田地，取得經營權，而用科學的技術與經濟的方法以經營之。專門人才從事專門任務，從增產的觀點言之，實為一種良好趨勢，應當有以促進之。

又其次，自耕小農，其經營當然比較節約，其努力當然比較勤奮，其愛護土地當然比較殷切，其行為規矩亦為善良風俗之淵源，中國立國之幹部人員多自此一形態之家庭出身。故自耕農體系，應當成為吾國農業社會之中樞。惟其力量薄弱，難收增產之望，一面當由各级政府予以指導協助，一面當施以合作教育，使知協同經營，合諸技師，合購機械。於獨立奮進之中，養成聯帶責任之觀念，不僅有益於農事之進步，亦且有益於民德之培植。

又其次，佃農之地位雖較自耕農為稍劣，但佃農有兩種；一為出戶佃農，一為當戶佃農。當戶佃農在本村內，就其所賣去之田，而自為佃戶。此種佃戶，在習慣上，是有永佃權的；出彼可轉佃，而田主不得退佃。其不同於自耕農者，僅在向地主

繳納年租。此種制度，實際上係等於用田地作押品向地主借款而對年租。此項年租數，當然各地不同，在吾鄉則約等於年息八釐，而地主尚須還糧納稅。至於出戶佃農，則係離開其本村，耕作於彼或彼之親族所出賣之田地中。此種佃農，其佃租自不及前者之穩固，然而此種佃農常附有住宅，山場，魚塘，種種利益而無代價享用，故非有信用之農人不能取得，既取得，殊少喪失。所以佃農雖有兩端，其勤奮經營，並不減於自耕。佃戶並不以其所得者如約按成交付田主，如尾欠不付，或色低劣，花樣繁多，能交付所約之六七成，已是田主之幸事；至於有風蟲水旱諸災，則皆在另議之列，往往田主一無所得，而還糧納稅則不能免。吾意為扶助佃農，可制為贖回法；凡本身及直系尊親屬所賣出之田地，佃戶可分年付款，於一定之年數中付清贖回之。又出戶佃農，於其所佃耕之田地佃耕一定之年數後，其本身或其子孫得備價贖回之。但山場住宅之類另議之，因山場或有多年生林木，乃至祖先墳墓之類，住宅或因

田主人口蕃殖須自住也。

為增進生產計，雇農制度最有弊害。雇農品格一般低劣，食人之食而不肯盡心其事。既無事業心，又不感利害關係，對於增加農產大有妨害。幸此種制度，大體漸趨淘汰。今日之雇農，多與雇主有戚屬關係或他種特殊關係。即此種不負責任之情形，便是雇農制度之致命傷。農業勞動與工業勞動不同。在工業勞動，監察制度可以生效，而農業勞動之效果，則一半繫於領導者之示範作用，一半繫於雇農之自發精神。國營農場如欲成功，則農業工人之教育問題，又不僅在技術方面，而道德方面之重要或且過之。

土地問題，在以農立國而食糧不足之國家，誠為嚴重之問題，且其問題，亦為多方面的。錯綜複雜，不可執持成見；本篇從財政與農民的觀點談土地制度，其目的在就我所閱歷者提出幾種看法，或不至見笑專家。

雜 咏 抄十首之四

表方

盡懷倉穀赴征期，子負妻誰未敢遲，官吏競分家園米，嗷嗷誰念有朝暉！
 義民新製禦寒衣，市費多金意自歡，最是堪憐鄉婦語，如今布貴補衣難！
 輸將恐後國忘家，軍服軍糧兼有加，不信健兒抗戰死，寒猶衣夾做多少！
 沿途查驗幾多番，商旅時間有怨言，誰知如今關市異，不愁征重苦國煩。

如何綜合尼·史·麥·蒙四氏擊潰日本之戰略

孫寶毅

去年十二月開羅會議公報曰：「我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而今年三月英首相邱吉爾則於廣播中曰：「一年以前余曾請諸君注意，在希特勒崩潰與日本崩潰之間，或將間隔一長久之時間。余今日仍以爲將隔若干時日，但不似余一年以前所想像者之久。」時聞只隔三個月，而對於擊潰日本需時多少之估計，已變動若此之甚，可知主持盟國大戰略之當局，對遠東戰事尚未有一具體的計劃，換言之，英美中三盟國之間，對遠東戰事之戰略，尙未獲得一致之意見，美海軍在太平洋中之跳躍式之進攻，中美陸軍在緬北之深入密支那，英印陸軍之防禦阿薩密阿拉甘，英海軍在印度洋中之攻擊蘇門答臘，以及中國陸軍之苦戰於中原，是否爲單獨之表現，抑其間有密切之聯繫，吾人甚難言也。

關於遠東攻日戰略之分歧點，吾人可從三方面言之，第一爲德日先後問題，第二爲遠東戰事之性質問題，第三爲進攻日本本土之路線問題。中國當局始終堅持應先擊潰日本，至少應同時並攻德日，並認爲對日戰爭之性質主要者爲陸地之戰爭，擊潰日本之陸軍，始可謂真正打敗日本。英國方面則持相異之意見，認爲先擊潰德國，即可擊潰日本，並認爲對日戰爭之性質，主要者爲海上之戰爭，擊潰日本之海軍，其陸軍即孤立無能爲力矣。美國方面之意見，則不如中英兩方之明顯，有贊成中國之主張者，亦有贊成英國之主張者。

對於遠東攻日本本土之路線問題，則各方之意見，更莫衷一

是；其主張海上進攻者有四，即北太平洋進攻路線，南太平洋進攻路線，中太平洋進攻路線，與由印度洋向西中國海進攻路線，其主張陸上進攻者有二，即由中國大陸進攻路線與由蘇聯南下進攻路線。

以上所述三大問題中之第一問題，即德日先後問題，英美早已決定於去年之卡薩布蘭卡會議而予以相當之修正矣，其第三問題中之第六條路線，即蘇聯南下進攻路線，在目前蘇日維持中立關係之時，則無從談起。是故吾人所可討論者，爲遠東戰爭之性質問題，與其他五條進攻日本本土之路線問題而已。關於此，自美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氏於今年二月九日發表談話後，似有獲得一致意見之趨向，但迄今尙未成爲具體化耳。

尼米茲氏之言曰：「余信惟有自中國之基地，方能擊敗日本。余之任務在以陸空軍，送至中國，庶可以順利打擊日本。此項戰略甚爲簡單，余不信僅海上之戰爭可以擊敗日本。吾人設法在中國之任何可能地點登陸，無庸保守秘密。日本艦隊如欲出而干涉，實屬無任歡迎。要之，尼氏所代表之戰略意見如下，遠東戰爭之性質非僅海上之戰爭一也，進攻日本本土之路線，惟有由中太平洋向中國海岸作一巨大楔入，再以中國爲基地，進攻日本本土二也，引日本艦隊出現，一舉而殲滅，以達威海軍之傳統戰略三也。尼氏之談話，實代表海軍思想上之一大進步，各方咸予以重視在中國戰場之史迪威將軍，首先予以

響應，其總部發表聲明曰：「尼米茲將軍謂，美國海軍志在越過太平洋突破日軍之封鎖，以運送陸空軍至中國本部登陸，惟欲完成此一任務，海軍之活動必須獲得陸空軍自內地發動攻勢聲援，吾人應不顧現在之封鎖，而奮必出此。緬北作戰之中美軍，已開始對日本防護圈作初步進攻，需多公路之修築，雖目前極端惡劣之氣候，但進展仍甚滿意。中國現發願空軍接濟供應品，吾人必須立即並繼續增加以中國為基地之空軍活動，而不能坐待從陸上或海上打破日本之封鎖。此一戰場之空運數量已造成歷史性之紀錄，惟運輸量仍須增加，為達到此一目的，吾人必須使用最大最新之運輸機。」分析言之，史迪威總部之聲明中，含有以下三點：目前立即增加中國空運，加強以中國為基地之空軍活動，不必等待從陸上或海上打破日本之封鎖一也，修築多路，打通供應中國之滇緬路，輸送盟國陸空軍至中國，並配備中國之大量軍隊二也，由中國內地向沿海發動攻勢三也。是故史迪威氏之言，可認為對尼米茲氏談話之批評，或謂為對尼氏有所補充，亦無不可焉。尼氏為美國海軍界中人，主張由海道直捷了當運送中國，史氏為美國陸軍界中人，主張由陸地迂迴艱難修築多路通往中國，兩方意見雖差如此，然有其共同之點在焉，即承認中國對於進攻日本一事之重要性是也。而兩人所持之攻日戰略，雖方法上有所出入，實有其相助相成之處。曰由海軍向中國海岸進攻，配合陸空軍由中國腹地向沿海進攻，以最後擊敗日本是矣。

吾人站在中國之立場，自歡迎尼米茲氏之戰略，然而其與麥克阿瑟將軍及蒙巴頓勳爵之關係為如何？換言之，彼兩人是否贊成尼氏之戰略耶？

請先說麥克阿瑟氏之戰略。彼曾言曰：「余之太平洋戰略觀念，為集中攻擊幾個重要戰略目標，以陸空軍之攻擊力，助以艦隊，突擊敵人。此與所謂『跳島戰略』大不相同。因該項戰略乃以直接正面之攻擊，逐漸驅逐敵人也。『跳島戰略』不但犧牲重大，且進展遲慢，有人估計，倘若應用此項戰略，須於一九四九年始能獲得勝利。是故應選定若干重要據點，而不須一一佔領敵方所盤踞之如許之多之島嶼也。」要之，麥氏之戰略，乃根據以下三個主要觀念，（一）以其在西南太平洋之戰場，發展成為用以進攻敵國本部之主要跳板。（二）主要之戰略目標應為收復菲律賓，以此為基地，然後再進一步進攻日本，（三）作戰方法應為海陸密切合作，選定若干敵人重要據點突然集中攻擊，而不管敵方其他據點。西南太平洋戰場是否適宜作為對日本發動大攻勢之起點，收復菲律賓是否為對日戰爭之主要目的，擁有菲律賓後，是否即能決定戰爭之結局，關於以上幾點，吾人且不論，但麥氏始終認為彼之戰略為最切實最迅速之途徑。尼米茲由海上直攻中國海岸之戰略，彼認為不但過於空談，且屬自欺。彼於尼氏發表談話後，發表表示曰：「吾人欲擊敗日本，必須計劃各種方法與途徑，使吾人之地面軍隊在各決定性之地點與日軍接觸。近代戰爭中，惟有運用海陸軍聯合作戰，方可獲得決定性之戰果，否則絕無勝利之望。吾人欲摧毀日本之軍事力量，祇有依賴陸軍，必以陸軍擊敗日本，勝利方可獲得保障。吾人必須運用強大之陸軍作戰，毋須空談捷徑，惟有如此，吾人方為不自欺。」（二月十六日路透電）麥克阿瑟之言，意即不以不先取菲律賓，而由海軍直攻中國海岸之戰略為然。然而麥克阿瑟與尼米茲史迪

威二氏，對遠東戰略基本因素之主張，則顯然並無二致。此基本因素為何？曰打敗日本之惟一路線，為打敗日本陸軍，而近代戰爭中，惟有陸海空聯合作戰，方可獲得勝利，而到達日本本土之捷徑，為經由中國基地。惟蒙氏主張先取菲律賓耳。

再言蒙巴頓氏之戰略。尼米茲，麥克阿瑟與史迪威三氏，雖前者為海軍，後兩者為陸軍，但皆屬美國人，至蒙巴頓則屬英國人，其被任為東南亞盟軍總司令，實用以表示英國擊潰日本之決心，簡言之，彼代表英國之利益也。彼之任務在收復英國在遠東之失土，如緬甸，馬來亞，新加坡，香港等，再進而聯合中美盟軍夾攻日本。曾有人猜測，蒙氏將與麥克阿瑟會師於爪哇，新加坡，香港，或菲律賓。殆曾有人猜測，蒙氏與史氏將共圖克服緬甸。而蒙氏與麥氏史氏之職權，亦曾一度盛傳發生衝突，但此事現已過去矣。英方現正全力從事於歐洲，尚未轉移其力量於遠東，故未能見出有與麥克阿瑟或尼米茲之戰略。在根本上有何衝突之處，但以目前而論，蒙氏與史氏對東南亞之戰略目的，顯已有不圖之點在矣。吾人可以印緬戰役及突擊沙班之海戰證明之。

蒙巴頓氏不僅為海軍專家，且為陸軍中將與空軍上將之頭銜，邱吉爾曾稱之為三棲專家，意即指其善於水陸空作戰是也。彼之總部移往緬甸，足以證明蒙氏之戰略，注意於海上，而其目的在圖馬來亞發動水陸攻勢，并收復新加坡。因蒙氏與史氏之戰略不同，故發生兩條路線從東南亞基地進攻日本之現象，第一路為越過緬北。與中國以抵達尼米茲所欲佔領之中國海岸，此路由史迪威計劃與執行之，第二路則由蒙巴頓計劃與執行之，由緬南之英方海軍基地，指揮海軍越過南中國海，于日

本以有力打擊。蒙氏之戰略，更可於英方之輿論中見出之。彼等認為東南亞戰爭的水陸兩棲之戰爭，應以海空為主，而不應全賴陸軍，如收復緬甸必先佔領仰光，而佔領仰光即須依賴水陸作戰，盟方通往緬甸之陸上交通線，艱苦難行，盟方打通滇緬路，亦不能供應在中國之大規模戰爭，故盟方應襲擊敵人從新加坡通緬甸以及從日本通新加坡與南洋之海上航線，始可減輕陸上敵方之壓力，並可奠定盟國日後發動水陸戰爭之基礎。總而言之，英方並無從印度收復緬甸之大企圖，此不但表示蒙巴頓與史迪威之意見不同，且表示印度總督魏爾爾，印軍總司令奧欽勒克與史迪威之意見不同，故美國方面謠傳英美在東南亞之戰略目的上之意見不睦，實非無因也。

尼米茲，麥克阿瑟，史迪威與蒙巴頓四氏之戰略意見，如上述，然謂四氏無溝通之處，則為不可信之謬言也。美政論家李普曼之言，最為駭要，茲不憚煩瑣，引錄於下：「尼米茲之由夏威夷出發，麥克阿瑟之由澳洲出發，以及蒙巴頓之由印度出發，皆係殊途同歸，換言之，即三路大軍如能同時獲得完全之勝利，則結果均將會師中國。如謂尼米茲，麥克阿瑟與蒙巴頓今日作戰之目的乃欲在亞洲大陸開闢一第二戰場，則吾人更能看清太平洋戰爭之較大輪廓。吾人一旦攻入中國之後，即將步入一人口衆多之大國，但其本國之軍事裝備甚少，其會受現代戰爭訓練之士兵亦不甚多。吾人勢將遭遇一龐大之日本軍隊，且其距離本國之供應基地亦復甚近。吾人將立於一異常漫長交通線之極端，且所在之國家又須自國外輸入，並臨時建築現代戰爭所需之一切設備。……就戰爭將延至何時及須付如何重大之代價而言，蘇聯之行動顯極重要，甚至具有決定性。如

吾人反躬自問，蘇聯果將有何種作爲，則吾人無須洞察人心並熟悉內情，即可斷言。歐洲正有一世界戰爭，但將結束於東亞，將來解決日本問題時，勢必牽及中蘇英美四國，故在對日戰爭結束以前，四國自不至分體也。」（二月十五日中央社紐約專電）

是故，理想之攻日戰略，爲自緬甸起至白令海止，從多方面進攻，而以會師中國爲目標。羅斯福總統曾言曰：「到達東京之路甚多，吾人不可忽略其中之一。或攻入緬甸，或從中國內地發動，或從錫蘭經由安達曼羣島進攻馬來亞，或從菲律賓進攻中國海岸與台灣，或越過日本代管各島直攻日本本土，或從阿留安羣島直下千島羣島，並可望從西伯利亞發動攻勢。」羅斯福所列舉者，爲到達東京之可能路線，亦即以上所關進攻日本本土之六條路線也。第一條路線乃自阿留安發動進攻，該路線雲深霧厚，風暴無常，美空軍當局曾拍製電影，以證明空軍進攻之不可能。第二條路線乃由澳洲荷印進攻，以直搗菲律賓賓即現今麥克阿瑟所採取者也，該路線路途最遠，而沿途日本防禦網亦最密。第三條路線乃自夏威夷爲中心，經中途島，韋克島，馬紹爾羣島，特魯克島與關島，以達菲律賓，台灣及中國海岸，即尼米茲所欲經由之路徑也，該路線可與麥克阿瑟會師，且無南太平洋路線之叢林瘴氣與瘧疾之困難，但其最大障礙，乃在距離之遙遠，運輸線之缺乏，進攻基地之缺乏，以及日本在途中之建立若干堅強之空軍基地。第四條路線乃由印度洋向南中國海進攻，即巴頓所擬就道者也，此路線須先在陸上克復緬甸，在海上升克復安達曼島，又須與中國與西南太平洋路線相配合，始可攻到日本本土，而距離之遙，運輸之困難與

基地之缺乏，亦爲其最大之困難所在。第五條路線爲由中國大陸發動攻勢，該路線最大之困難，爲中國軍隊之新武器，新訓練，及近代戰爭設備之缺乏。第六條路線爲以西伯利亞爲基地，此路線須待將來外交及政治之發展，在目前祇有作爲一種希望而已。

目前所即可進行者，則爲五條路線，而此五條路線並非單獨進行一線即可攻到日本本土，易詞言之，此五條路線，有需互相呼應者，有互相關合者，亦有需互相連接者。在原則上應各戰並舉，但最後應圖合爲一主流，必如此，始可謂爲一個戰爭也。攻日之力量宜集中，不宜分散，此爲家取勝之要訣也，然而在制敵方面，則應使其力量分散，不能集中。

吾人若根據尼米茲，麥克阿瑟，史迪威與巴頓戰路意見，以夫黎度各路線之地位形勢，吾人對遠東戰事，可獲得以下之輪廓。遠東戰事分爲四個階段，（一）防禦時期，（二）防禦攻勢時期，（三）攻勢防禦時期，（四）攻勢時期。盟方現已進入攻勢時期，乃屬無可疑之事。而攻勢時期又可分爲以下四階段。第一，各路線並舉進攻，第二，匯合爲一主流，會師中國，第三，驅逐日軍下海，並以中國爲基地，轟炸日本，第四，在日本三島登陸，迫日本無條件投降。各路線進行之步驟，則有如下述：在史迪威方面，增加空運，以加強以中國爲基地之空軍活動，擴大緬北戰事之戰果，由雷多路接連緬甸路，裝配與訓練中國軍隊，輸送盟軍至中國，並加速建築現代軍事設備，如此時麥克阿瑟能攻克仰光，則供應中國問題更容易解決矣，然後由中國內地發動攻勢，以會合尼米茲之戰路。在蒙巴頓方面，由錫蘭爲基地，發動其擅長之三棲攻勢，收復安

漫曼島與尼科巴島，取回仰光，再由中美英印軍隊聯合肅清緬甸及泰國安南之日軍，一方面會合史迪威之戰略，一方面進而收復新加坡，進入南中國海，會合中國陸軍，收復香港與廣州，於此時也，不但可與麥克阿瑟會師於爪哇，或會師於菲律賓，並可與尼米茲之戰略相會合。麥克阿瑟方面，則循由今日彼所採取之路線與戰術，經由新幾內亞，並配合尼米茲之中太平洋攻勢，收復菲律賓，以完成彼所立誓之志願，同時亦可指，爪哇，會合婆羅巴頓路線。尼米茲方面，則越過日代管島嶼，佔領特魯克島與關島，或以島嶼為陸上基地，或以航空母艦為水上基地，護衛美國優勢海岸，追尋日本海軍主力，或逕攻日本本土，或直攻中國海岸，以陸空軍送至中國，擊潰日本陸軍，並以中國為基地轟炸日本本土，以最後打敗日本。此時盟方如獲得蘇聯之援助，則戰爭期限更可縮短矣。日本最後之困守地域，必在日本海，中國海，及中國北方大陸，故盟方最好之戰略，為由中國及太平洋合擊日本是矣。

對日戰爭之最大問題，厥為距離。空軍優過於地上陸軍之處，在能克服距離與夫越過地面上之障礙。故空軍在遠東戰事中，將居一重要之地位。但空軍雖戰爭之面目，但舊時戰爭之原理，似不能因之而盡都推翻。且其本身亦有其限制，如基地之設置，以及轟炸機與戰鬥機之有限飛程。德國不能以轟炸屈服之，日本亦然。是故，對日戰爭之性質，不能全賴空軍，亦不能全賴陸軍。空軍可作為攻擊力之先鋒，陸軍則奪取與佔有基地，海軍則消除日艦之威脅。海軍力量，尤以太平洋中最高明，須與空軍相聯合，以保護供應品之安全到達，在另一方面空軍之一切設備，如炸彈軍火則須由海上運來。再者，飛彈之

出動，須有安全之基地，是故又須依賴陸軍之佔領與保衛其前進之基地。至空運隊與登陸作戰，則需空軍之握有制空權，如是言之，對日戰爭之性質，為陸海空之聯合作戰，乃事理之至明者也。軍事評論家威爾遜曾言曰：「太平洋戰爭之決定行動是在於登陸作戰，海軍與空軍之力量，祇能實現海上之襲擊。」

麥克阿瑟亦曾言曰：「摧毀日本之軍事力量，祇有依賴陸軍」。蓋從軍事學上言之，能佔領敵人土地與殲滅敵人主力者，祇陸軍而已，然因之而以海空軍從屬於陸軍，則亦非健全之理論也，海陸空三軍應配合作戰，並應謀平衡發展之道。

對日戰爭之性質為陸海空聯合作戰，而對日戰爭之戰略關鍵，在將太平洋上之海戰與亞洲大陸上之陸戰，互相配合，而其目標在會師中國，直至日本三島登陸。以目前戰局之發展而論，則其缺點，在太平洋上之進度頗速，而大陸之進度遲緩。吾人明乎此理，則尼米茲，麥克阿瑟，史迪威與婆羅巴頓之戰略，皆可溝通為一。所謂戰爭性質問題與夫路線問題，可迎刃而解矣。

由上觀之，盟軍之渡過海洋，在中國任何可能地點登陸，或由空運及滇緬路之陸運，以陸空軍送至中國，以中國為基地，最後擊敗日本，乃將來遠東戰爭中必有之一幕也，日本勢必於中國大陸上作最後之困獸之鬥，尤以華北與東北為然。而在盟軍未在中國建立堅強基礎之前，日本亦勢必發動攻勢，或打通陸上路線，以解決其聯系南方派遣軍之困難，同時擴大佔領吾沿海各省以擾亂吾國之防線，減少吾國軍隊之反攻力量，以遏阻破壞與延長盟國大計劃之實現，此次中原大戰，吾人即應

作如是觀也，吾國陸軍應如何奮起，以粉碎日本之企圖耶？同時吾當局應如何訓練軍隊，使用新戰術新武器，並加速建造現代戰爭所必需之設備，俾協助盟友，擊潰日本陸軍，並保護基地及海港，以便由此轟炸日本及在日本三島登陸，最後迫

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總之，遠東戰事之中最後階段，是以英聯担任海空作戰，而中國担任大陸作戰之大部，惟其如此，故吾國人應團結一致，奮發有為，修明內政，鞏固經濟，共荷此重大之責任也。

嘉峨道中

老秋

嘉州風物最清嘉，處處桑田傍水涯，漲沒沙洲盤古渡，綠環馳道走輕車。
清波味勝鱸魚館，龍水泉思虎跑茶，怕憶江南行樂地，可憐秋月與春花。

入山

老秋

入山因避暑，山近覺清涼，潭水澄春夢，杉皮透古香。寺沿東漢世，僧拜
普賢王，夜宿華嚴頂，詩宗共此房。

九老洞

老秋

人自錦屏下，來朝九老尊，栽松沿石徑，鑿虎鎮山門。燕語洞中趣，苔留
樹上痕，崇巒依晚景，相對惜黃昏。

蘇聯擴大十六邦自主權的意義

費穆譯

俄國人很少舉動不是大模大樣的。最近宣佈的蘇維埃新政，治國構，就是一個例子，簡直可以稱為近年來現代國家最長驅直入的改組。如果該項新組織實行出來，俄國的全部內政和對外政策，勢必要引起極大的變動。無論如何，會立即開始影響到未來世界的模糊，因為這種新組織頗適合於以下一種觀念，就是由幾個列強把世界分為幾個勢力範圍。

俄國人所運用的這種根本上變更憲法的方法，在民主國家中很難找出相像的，但是當然，行動很迅速。最高蘇維埃，類似巴力門的一個機關，於二月一日僅僅在四小時內就通過了這個議案。

一千三百六十九個議員，代表蘇聯五十個以上的邦國，齊集於克里姆宮的大議事廳中，聆聽外長莫洛托夫的報告。

莫洛托夫把這個歷史性提案的要點，報告給全體議員們，議員們很少去看看放在他們桌子上的提案原文。莫洛托夫告訴他們，在以前關於外交和軍隊的事務，完全集中於聯邦政府的手裏，在今後則十六個共和國都各自有權處理他們自己的紅軍和與外國簽訂條約。

雖然，俄國人提出這個大改組的計劃，帶着一副正經的面孔，但既不是他們，亦並不是任何人，認為會真正實施出來。集中於斯大林和莫斯科官廳手中的權力，仍舊握在他們的手裏。即使真正給予十六個共和國以外交和軍事自主權，在某一長時期中，必然好像做一幕啞劇，背後仍由莫斯科牽着線。我們

對於蘇聯的新組織，雖然要打個折扣，但它仍舊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和俄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的立場，息息相關。

在內政方面，這項改組可稱為邏輯的步驟，不但由於蘇維埃的發展，且由於存在於鮑爾雪維克以前的俄國。沙皇亞歷山大第一，於維也納會議後，就曾採行同樣的政策，當時他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而由他自己做波蘭王。這政策雖然沒有實行，但亞歷山大的意向，則是好的。同樣的情形，芬蘭公國是一九一四年前俄帝國中的一個自治的部分，其他許多沙皇的屬地，亦只不過由莫斯科遙遠的統治着而已。

沙皇的帝國實在是一個許多民族所居住的許多國家的集合體。十月革命後共產黨開始在這個機構上面，建立起來，使民族主義成為統一，而不成為分裂的力量。於一九一八年他們開始組織一個完全俄羅斯區域的國家，稱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R.S.F.S.R.)。下年，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外高加索，亦建立同樣的國家。蘇維埃聯邦第一次憲法，於一九二四年正月三十一日，就是由以上所說的四個國家批准的，那一天可以叫做今日的蘇聯的生日。

其他國家後來相繼加入，外高加索分裂為三部份，一九三六年採用第二次憲法時，蘇聯共有十一個共和國。戰勝芬蘭，和佔領波羅的海國家與羅馬尼亞的一部分之後，蘇聯又增加了五個共和國。

蘇聯今日的結構，它的形狀好像一個十分不規則的太陽系。蘇俄好像一個太陽，四周圍着十六個共和國，好像跟着太陽旋轉的行星。有幾個行星，其周圍又有衛星（各自治共和國）。各國間土地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和資源的富貧，有着極大的差別。

擴大十六國自主權的計劃，從內政上說，可以說是俄國本身的事情，但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說，則其意義是在於因為這種改組而改變了蘇聯的對外關係，和所有盟國的戰後計劃。

最淺薄的解釋，認為蘇聯的宗旨是想在國際會議或將來的國際聯盟中獲得十六票，這種見解並不是對克里姆林所實行的世界聞名的現實主義加以嘲笑。認為任何重要的國際問題可以由舉手多少來解決，斯大林曾經是最後一個人去相信這種說法。同樣的，有人認為已經得到了一個結論，新計劃乃保證莫斯科給予華盛頓和倫敦一個兜圈子跳的機會，如果英美兩國提起波羅的海國家這個問題的話。（在這種情形之下，西方盟國僅能說到「孤立的」蘇維埃國家的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關於這件事，蘇聯不需要施用什麼邏輯或詭計，僅拒絕討論就夠了。

然而，俄國這次舉措最重大的意義，不是如上面所說的，而是在它指示了一個普遍的趨勢，這個趨勢就是由強大國家分開世界為幾種勢力範圍，或是說，建立幾個由大國保護的區域。

弘度生日

登恪

壽抱春常在，松心老益堅，清輝含本性，苦語不辭妍。
關塞同爲客，親情我欲偏，文章猶事業，持此樂長年。

的組織。美國，得到英國某種程度的後盾，曾對這種發展，激烈的加以反對，而極力建議將來必須要建立一個普及全世界的安全制度。

雖然，以事實的全部趨勢而論，確是對於區域組織的發展。蘇維埃的解體計劃，實是向這個方向跨一大步，就是由一個單獨國家把持一塊大區域，而設立一個無定形的政治機構。蘇聯的計劃，又開給鄰國一個方便之門，使他們更可以接近蘇維埃，而同時仍保持主權的附屬品。莫洛托夫演說的全部音調就在說明這點。

英國亦給這種以區域的基礎來組織世界的思想所感動了。這種思想不主張設立包括全世界的至高無上的國際組織。首相邱吉爾於去年的一次演說中，描繪這種趨向。南非的史末資將軍在去年十一月的那篇有名的倫敦演說中，甚而指出比莫洛托夫更肯定的計劃。除邱吉爾以外，史末資是英帝國最有影響的人物了。

那篇演說當時所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大部分是因為他說到法國已經不再成爲大國了。但是那篇演說的真正中心點，則是在建議歐洲西方的小國加入英國，使英國成爲一個強有力的區域聯邦的領導。史末資的演說，好像莫洛托夫的報告一樣，都可以當作從這次戰爭中所產生出來的未來世界的模樣看。（譯自美國新聞週刊二月十四日）

弘度答詩有塘蒲敢望年句

登恪

作此再贈

根草生新葉，池塘細雨中，歲春人不覺，原野綠無窮。

理學漫談 (二)

余家菊

二、太極

太極在萬有中而不在太極中，此為本特立論宗旨，首當標明，以清視聽。上篇言天，說明宇宙間有箇主宰控制的理在。此篇言太極，說明宇宙的構造演變，有箇究竟的物事在。宇宙萬象紛紜，披除其各具的特質，探究其原始的質素，必有箇共同的物事在。若萬有絕無歧異，不具親屬關係，則絕對互異之各物事，如何能發生交涉，不能發生交涉，如何能保持確定的關係，以構成一共同體。如不能構成一共同體，則宇宙不成整體，必現出孤零破碎的局面，甚至彼此衝突矛盾而人生苦於應付矣。在事實上，宇宙是整體的，有貫澈萬有的條理。所以萬有之此，必定保有一親屬關係。就萬有的構言之，太極便是萬有的共同質素。就萬有之演變言之，太極便是萬有的共同來源。劉蕺山曰：「形下之中而指其形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原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無太極之可言。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萬有，道即普在於萬有中之某事物。」劉蕺山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太極也。程明道曰：『道亦器也。』」

「理學淵山」劉師周濂溪，作太極圖，且為之說。其首句曰：「無極而太極。」其極這上字何故置置無極與太極為物，實難在何個性人不具聲的屬性，不具色的屬性，不具香的屬性，不具味的屬性，不具堅軟滑燥等屬性。何以謂假使太極而具有任何

屬性，則太極便是萬有中之一物；既是一物，便不能構成萬有，便不能生出萬物。太極既是萬化之原，萬有之母，便不能有任何屬性。凡有，皆有制限；唯無，乃可演化於無窮。

陸象山最反對無極之說。朱晦庵答書有云：「一不言無極，則太極固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兩言最為簡明。又云：「一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證。周子所以顯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此段大旨亦是內在論，謂太極在萬有中惟不免游移於超越陰陽太極亦打打為存在於萬有之上耳。劉蕺山曰：「一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兩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為此氣從出之母，則亦一物而已，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朱子曰：「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又曰：「陰陽只是一氣。其為內在論，本已顯明。或問朱子曰：「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正因此故，朱子對於內在論，似無把握不定。

「生理」者，謂生理在萬有之外，何以見其不然。假定太極在萬有之外，則此太極者又曰是自成一物，其名曰神。此一

物者，對於萬有，爲有關係乎？爲無關係乎？使爲無關係乎？則不入於萬有之中矣，則吾人安得而知之？不知而認定其存在，是爲無據之談。使爲有關係者，則太極既不立於萬有之中，即必立於萬有之外，既立於萬有之外，則萬有所在，太極即不在；太極有所不在，是太極即不完全而受有制限；以不完全而受有制限之事物，如何能爲萬化之母？太極既爲萬化之母，太極即最完全，即無缺欠，即無所不在，即無所不能。謂太極高存在於另一世界，睜眼瞧着此一世界而無所作爲，是爲隔岸觀火之雲，仙人醫學，非真承孔子有爲精神之理學家思想。

或謂太極既無屬性，何故能生出各具其性之萬有？無而生有，其說果與實際相符合否？夫無不能生有，一亦不能生多，要無可疑。所謂無者，以其爲萬有所具，不礙萬有之生成演變，雖有而無妨稱之爲無。此無並非空寂。所謂一者，乃分析至最後之究竟單一體，不可割裂破碎，其實此單一體之構成，在自身上，已是含有對立情事，所謂「自體立」也。以此對立作用，相推相盪，生出萬有。程明道曰：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朱晦庵曰：「天地初間，祇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許多渣滓」。萬有之生，由於此氣運動；此氣之運動，又由於陰陽對立。若無對立，則單體不能運動。不能運動，則不能出生萬有。

或謂陰陽對立，是爲一元論，何故又曰太極。不知太極是就包含萬有而言，絕對無二；陰陽是就分割太極本身而言，太極本身，含此對立情態。就太極之爲完整單一體而言，籠罩一切，無與爲對，故獨自不能起動。動必有所向，而太極是一切，故無所向。動必有所自來，而太極是一切，故無所自來。太極如有動，其動必爲繞其自體軸心之旋轉，無所向，無所移。

故動而不動。剖析太極而見陰陽之對立，有此對立，一推一拒，而運動起；有此運動，則消息盈虛生；有消息盈虛，或陽多陰少，或陽少陰多，千態萬狀，關係種種色色，而萬有生。周濂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黃黎洲太極圖講義曰：「通天地，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有往來闔闢升降之殊，則分之爲動靜，有動靜則不得不分之爲陰陽」。故所謂爲陰者，太極之靜的情態耳；所謂陽者，太極之動的情態耳，初非於太極外，別生出一陰一陽來。故周濂溪曰：「陰陽一太極也。取譬人身，則如有呼又有吸，有消解又有營養；其呼與吸，消與營養，各是一種作用之相反的面，是謂一自體對立」。邵伯溫爲康節之子，其思想稍闢，異於其父，而爲其父所掩。其言曰：「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大地而未嘗終，始大地而未嘗始，與大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本固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依此觀之，可見太極在萬有中，萬有在太極中。或謂：如是具足，將何以解釋演進現象，如生物新種屬之出現，如飛機之發明製造，不知剖析太極而觀其陰陽之交錯，其間關係，可有千態萬狀之殊異。譬如紅色與藍色之調配，由其相對濃淡深淺之變化，在理論上，可以發生無窮程級的不同顏色，特人未能一一感覺之耳。所謂演進者，不過陰陽配合上發生一種新關係耳，所謂發明者，不過對於陰陽間可能發生新關係之認識耳。就相對世界言之，陰陽有消長盈虛，故可起新關係而生新物事。就絕對世界言之，太極自始具足，而亦永遠具足，無所增益，無所虧損，祇是綿存。

新書評介

張申府

中蘇——亞洲的柱石

中蘇——亞洲的柱石

介紹 Asia's Lands and Peoples (亞洲的國與民) • George B.

Cressey (葛德石) 著。一九四三年紐約與倫敦 McGraw-Hill 書店出版。大本一、一四六〇八頁。價未詳。

這是一本大著作，是今日正用得着的一本參考書。它的副題是「地球的三分之一與它的人民三分二的地理志」，由此已可以略見其範圍。著者葛德石博士是美國的一位地理學家（生一八九六），本出身於耶魯與芝加哥，自從一九三一以來就任美國俄拉古大學地質與地理教授，兼系主任。以前曾作過上海租界大學的地質教授（一九三三——一九三九）。又作過中國的地理顧問（一九三四），與蘇聯政府的地理顧問（一九三七）。他對於中國地理與蘇聯地理是特別有研究的。現在正由美國國家科學院等機關派來中國講學，並從事推進中美文化交流的工作。

這本書原是教本性質。但是體裁是新穎的，範圍是廣泛的，所以也很可供一般關心國際者的瀏覽。著者在各篇的序言裏，自稱爲世界公民的序言，實在既非謙詞，也非誇言。在這個世界大變動的時代，各國間的關係一天天地複雜，人與人間的接觸一天天地加多。而且世界大戰還在急驟的進展之中，同盟

間既有隨時增加相互了解的必要，對於敵人也時時都用得着「知己知彼」，以期「百戰不殆」。因爲這些緣故，一般地理知識，確是一般社會人士都應該具備的常識。爲供給這種常識，這本書的出版，自有其適應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意義。

著者短序中又說，所有把人格加給地理的項目都是地理書所有事。因此本書所論的，不但有土地，並論及人民；不但論各國，更論到各國國民。換言之，就是物理地理，人文地理，都在它的講述範圍。經濟生產資源以外，政治軍事文化思想當然也歸到了一些。各國的「地略」Geostategy，尤有是著者所最着重之點。這顯然是受了所謂「地理政治學」的影響。道有有關事實的盡量羅列，著者也自信是本書的一個顯著的特色。

本書內容一共分爲四十五章。書名雖然是一「亞洲的國土與人民」，可是除了遍論亞洲各國外，並講到有關的分不開的歐洲部分。由此也可見，地理的分區也是相對的，部分人爲的，由於習慣，而非一成不變的。本書開端先有汎論兩章，一章汎論太平洋（頁一——一四），一章汎論整個亞洲（頁一五——四四）。以下就依次分講中國、日本、蘇聯、西南亞洲、印度、與東南亞洲。在西南亞洲部分，先有一章汎論西南區域（頁四五——六八）。以下就依次分講土耳其，敘利亞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富汗斯坦，一共六章（頁六九——一二三）。東南亞洲部分，也先有一章汎論東南區域（

此更可見，日本今日之大逞其狂暴，原有一向的瘋狂的島國的心理作基礎。著者還說，日本開關時代的優越感，遭遇了西洋文明，突然一變而為下劣感。這也道破了真理的一面。但由此又可見日本人處心積慮定要瘋狂的一個原因。總之確如美國記者阿本德（Herbert Abend）等所說，非把日本整個的教育制度，整個的政治機構，整個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亞洲絕無永遠和平的希望，至於其它更直接有關於日本軍事的種種口更不待說，本書著者對於日本風景之美却是極口稱贊。大概日本作一個世界公園是要得的。

本書篇幅雖多，可是因為所關涉的過於廣泛，語焉不詳的缺欠勢所難免。書中的插圖却是多而且美，地圖圖解尤其非常之精，令人感為得未曾有。著者大抵深長此道。此外分節分段的清晰，文字的簡單明了，令人讀來十算無餘。這些大概都可以幫助本書的流行。在這地方更會令人聯想到大英百科全書在

結茅水上感賦

登洛

艱難結茅屋，能有幾人同，欣看一室好，慚愧萬家空。夢寐河聲壯，乾坤血戰中，短窮無限意，還逐暮雲東。

結茅水上弘度贈詩答之

登洛

平生蹤跡但羈縻，况復兵戈四海迷，漫道江頭春色好，可憐風雨燕啣泥。

由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第十四版。那部世界名著的這一版大部分是英國學者以及英國像新科學史家馬爾夫（H. J. E. Marlowe）一類的學者所改作。這類著作對於現代的學術大衆化，或至少如羅大衆化，那種潮流，可以說很是適合。至於什麼深奧奧術，深奧悠長，那原不是與這一類的著作所要作到的。

葛德文教授這本書本文之後還附有很長的檢索（頁五七三——六〇八）。原名之前又附有一篇建議讀物（頁五七三——五八〇）。書中與論文的說明，共有三十三頁（頁五四九——五七三）。檢索按部地依次敘說有關的可以參考的藝文，并不僅僅開一張清單子而已。除了說明詳略得宜以外，所舉的圖書論文既很概括，很適當，也很及時。除了英美出版的以外，法德文的也舉了不少，很可以供參考，很可以幫助進一步的研究。這也是這本書又一個可以稱贊的特色。

聚興誠銀行

營業要目

儲蓄	匯兌	放款	存款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設重慶森林路
分行遍設各地

四川省銀行

資本總額 國幣肆仟萬元
本行宗旨

一：發展社會經濟	二：調濟全川金融	三：扶持特產運銷	四：促進生產建設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兌
代理公庫	儲蓄	信託	倉庫
總行	分行	支行	辦事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內江	自流井 瀘縣 南充	樂山 瀘州 榮昌
		達縣 合川 遂寧	隆昌 眉山 等地
電話掛號 均為零九六六號			

民憲半月刊（第三期）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所：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重慶信義街卅九號
定閱處：本社
印刷者：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重慶成都桂林昆明貴陽長沙衡陽各新書店

本刊零售每冊國幣十二元

時間	冊數	收費
全年	二四冊	二百三十元
半年	十二冊	一百二十元
三個月	六冊	六十五元

不通匯兌之處，一元的郵票可以代現。不收郵費，加快或掛號照加。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頁四九五——五〇〇。以下就依次分講緬甸、暹羅、安南、馬來亞、荷屬印度羣島、菲律賓羣島、也門、六東（頁五〇一——五四四）。

本書所講的，隨着事實上的輕重，顯然有所偏重。所偏重是什麼，由各部分頁數的多少，也顯然可以看出來。那就是偏重的是：蘇、日、印。至於講到阿富汗、馬來亞、等等，不過稍稍點綴，聊備一格罷了。

講中國的部分一共分爲七章（三——九。頁三五——一六九）。開端第三章講中國的內景，（三五——四九），最後第九章講中國的外況（頁一六二——一七九）。此外則分講中國的地文，農業，以及三個區（華北，華南，邊疆）的情形。

講日本的部分一共分爲五章（一〇——一四。頁一七〇——二五二）。其中第十一章講日本的人民與經濟（頁一八七——二〇七），末後第十四章講日本的對外關係（頁二四六——二五二）。此外也是分講日本的地文，以及兩個區（本部，外藩）的情形。

講蘇聯的部分也一共分爲七章（一五——二一。頁二五三——三七二）。開端第十五章講蘇聯意義，位置，歷史，經濟，政治，人民（頁二五三——二六六），中間第十八章講蘇聯的經濟發展（頁二九七——三一〇）。此外也是分講蘇聯的地理環境，礦物資源，以及三個區（歐蘇，中亞，西伯利亞）的情形。

講印度的部分也一共分爲五章（二九——三三。頁四一四——四九四）。其中第三章講印度的人民與經濟（頁四三五

——四五六），末後第十三章講印度的對外關係與文化政策（頁四八四——四九四）。此外也是分講印度的地文、農業以及兩個區（印北，印南）的情形。

照以上所講的，開端的一二兩章和講中國的三九兩章，講日本的十一、十四兩章，講蘇聯的十五、十八兩章，講印度的三、六兩章，三十三兩章；這些就是本書精華的所在。再拿頁數來算，最多就是講中國的共一百三十五頁；其次就是講蘇聯的，共一百二十頁。拿這麼多篇幅來講蘇聯，這也是本書著者最自得的一點，是與其它許多汎講歐亞的地理書都不同的一個特點。

在這本書裏邊，著者對於中國的同情是在在都流露的。把中國講的特別詳細，當然也就是一個同情的表示。著者把中國認爲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現象，與中國不同的文化已滲透了社會的一切階層，就是人力車夫說話也稱引孔子。因此又說，地球上再沒有別的國家像中國這樣成熟。這些同情的話，表面看來，也許會覺着是阿諛之辭。但如向哲理的深層來看，大體都是說是不錯的。只可惜中國有的方面雖成熟，有的方面也還正因此成熟，却大大地落後了。中國政治制度，民族，宗教，國人是世界人類民族中最落後而最民主的民族，至少有些地方大體也可以說不錯。著者又說，中國可以說先前的獨立，作主，這三句話，在現代世界，是極大的優點。而中國的大而顯赫的獨立，這些優點也可以說并不出事實可能範圍之外。中國在歷史上并不是都光明的，難得的是居然延續到今天。將來當然要，或應該，更光明些。這是中國人應有的風采，也是中國人應負的責任。而中國的光明的將來，在這書裏，實也是人類之福，否則

由於觀視利用這塊肥土而引起的紛糾，不知又將伊於胡底。著者講中國的經濟開發地頗有可觀。著者說，「中國的三大地理財產是煤炭，人力，與位置」。又說，「在地政發達上很少國家比中國更不適宜」。又說，「天獨厚，問題就是中國人怎樣對得起它。或者說中國人怎樣對得起天人合一的道理或『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句話；誰是意為增進的優裕所害？」

蘇聯的地理境況是比中國差的多。但著者已認為蘇聯是今日最富強的國度中的三個。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的輝煌的成功就是幾次五年計劃（按第一次始於一九二八，第三次起於一九三八）成功的證據」。又說「經濟生活的轉機大概從來沒有像蘇聯一九二八以來這樣快的」。又說，「蘇聯處處表率，精神實是獨一無二的」。但從這些說話，著者對於蘇聯的同情，對於蘇聯的認識，也就可想而知了。書中除對於蘇聯的經濟發展以外，對於蘇聯的礦產都講得也很詳細。

講到印度，著者特別注重它的文化上的參差，種族，宗教，以及物質文明的紛歧。他認為印度是許多方面懸殊最利害國家，例如在貧富文野之間。又力言印度統一的不易。但著者對印度文化上的成就也是稱譽的。著者認為「一種文明的要與其過去，現在，以及其能有的世界影響為比例」。照這樣子對於印度當然便也不可以輕忽來看了。印度是世界不多的幾種偉大的歷史的文化中的一種。這已經是今日所公論。但著者關於印度文化還有些話，在今日普世界的民主潮下特別顯得很有些。這就是說：「沒有一個地方像印度教人生活的

圍繞著哲學與宗教。就是人對宇宙的關係。……這種心理態度與倫理觀念都是獨一無二的，其中的一個就是知識上的寬容。每一個人只能看見真理的一小面。我們對於宇宙，能了解多少，才能看見多少？所以沒有一個人全是，也沒有一個人全非。真理，就它的大端來說，還只能被少數人所了解，照這樣子寬容自在意思了。在這地方也許有人會說，印度文化上的參差不齊，國家的不協統，正是因為容許異見，容許多樣的緣故。其實在這地方最要緊的依然是相反相成的道理。就是：既要參差，也要整齊；既要整齊，也要參差。也就是：要參差，也不要太參差；要整齊，也不要太整齊。積極言之，就是要中，要恰好，要恰到好處。反過來說就是要汰太。在相反的德性兩面之中，不向偏在那一面，總都不好。太過，已甚，總之都不好。著者又說：「印度之文明是一條相續不斷而成熟的流。現代文化上的變革并不是要把傳統都丟開，無事是把承襲的東西加以修正，以適應現代的需要，印度文化是必然要繼續存在的。……中國現代文化上的變革，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可以說，至少一部分是如此的。」

講到日本，著者的態度也是心平氣和的態度。據著者說，「日本最大的財產是關於人民的。日本最大的問題也同樣是關於人民的」。又說，「日本先領有它的歷史與系統，不能了解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又據著者說：「多數日本人都自覺有把他們的生活方式弄到世界其餘的部分的使命」。并說：「誰也不能了解日本的地帶帝國主義，如不能體會它背後的這種改化的與精神的衝動力。……在帝國這個誘惑物之後是將到本人所視為較好的社會的那個目的」。由此可見日本的根本反民主也

通惠實業銀行

主 旨

調濟金融 服務社會

開發實業 扶助工商

業 務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及法令許可之銀行業務

總行 重慶 大什字 電報掛號 〇〇四四 電話號碼 四二〇一 分行 成都 內江 自貢市 辦事處 灌縣 雅安

大 同 銀 行

經營業務一切銀行商業經營

部	行	銀
重慶分行：	蘭州分行：	西安分行：
昆明分行：	桂林分行：	貴陽分行：
衡陽分行：	柳州分行：	

行址重慶打銅街
電話四一九九六
行址蘭州中正路
電話四八八
行址西安東大街
電話八八一
行址昆明送風路
電話二四八八
行址桂林桂東路
電話二九〇八
行址貴陽中山東
路 電話八八八
行址衡陽剛直路
電話
行址柳州培新路
電話

部 信 儲
四八二二話電 路一中慶重
(八八五三)明昆：號掛報電
(一四〇七) 均 餘 外

中國工礦銀行

利導游資	調濟金融	營業	要目	扶植工業	協進生產
		存	貼	植	
		款	現	工	
		款	辦	鑛	
		各地	分行		
			辦事處		

衡陽南	桂林	昆明	西安
充	自貢市	柳	長沙
州	州	州	州

雞寶 陽洛 州梧
號二路森林慶重：行總
一六二二四電話八二：掛電
八二九一四話八二：號報

交通銀行

爲各工廠：

謀求戰後復興之準備
解決添購機器之困難

舉辦：

工廠添購機器基金存款

存額 至少國幣拾萬元

期限 至少一年但得分期繳存

利息 照本行定期存款利率計息

優待辦法

- 1 存款期滿後工廠以之添購機器如有不足得向本行商借最高額可達已繳存款之總額
- 2 存戶借款定購機器時由本行代辦其需自辦者由本行代付價款
- 3 存款未滿期前訂購機器得向本行商請保付價款
- 4 此項存款到期時如不需添購機器可申敘理由取回全部本息

憲

民

第一卷 第四期

決戰年之一致團結

張君勱

論轉移風氣

左舜生

民主憲政的實施問題

陳啓天

中國到憲政之路（一續）

梁漱溟

憲政實施後省之地位問題

再生

自由與組織

張申府

中華民族與南洋民族

張禮千

如何處置戰後德國

毅生譯

美將領口中攻到東京之路線與方法

抱貞譯

元萬千壹幣國額總本資

各 項 營 業 要 目

總行：重慶陝西街二〇八號
電話：二四〇三 電報掛號：六三二五

置設准特府政民國

資本伍仟萬元

各種普通儲蓄存款

節約建國儲金儲券

定期有獎儲蓄

特種有獎儲蓄

各種信託及代理業務

產物水火雜陳

戰時陸地兵險運輸兵險

總局——重慶第一模範市場
分局——
代理處——
遍設國內
外各地

普濟壽險國民壽險

代購國內外材料

工業品進口土產出口

印製外印花

陳 瑞 興

會計服務

茶 廠
出 品

得勝沱茶	翠湖散茶	勝利沱茶	寶星沱茶
------	------	------	------

經銷處
寶元通各分號
各埠茶莊內均有出售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

法定業務

地址：重慶民族路七十八號

電話：四二四六一

匯兌迅速 服務週到

手續敏捷 信用穩固

決戰之年之一致圖

張君勳

方今歷歷在目之歐戰，已達何種階段乎，曰決戰之日已屆，勝負之數目茲以定而已。一九四〇年，貝當政府投降德國以後，英倫三島實以獨力維持危局，賴有美國貸以驅逐艦百艘與後來之物資租借，乃得重振軍備。時英人為歐戰制於近東與北非，故第三戰場，迄之又久，迄未開闢。其與德軍之接觸，僅為遠程之飛機轟炸。一年以來所進行者，不外德國二十五大城與其軍火生產之毀壞，絕未推廣及於法國沿岸要害焉。自今年正月英國飛機隊與美國之第八及第十五空軍日夜輪流轟炸德境，其目的有三，（一）消滅德國戰鬥機，（二）毀壞德國飛機製造廠，（三）滅削德國戰鬥機人員之數。及四月之中，聯合空軍之力更增，每廿四小時內，出動之飛機至少為一千架，有時多至五千架，投彈五千噸，以二十日計，共達十萬噸，所以毀德之交通線，德之軍火廠與德之飛機，使其無力出而擾亂英美軍隊登陸也。及六月六日，英美軍隊以四十萬大兵侵入法北，先之以飛機轟炸沿岸，繼之以降落傘兵與空運部隊，又繼之以空中保護，而後船隻運輸之隊伍隨之，至於海軍，除護航外，更與陸上作戰遙相響應。今則在哈佛與瑟堡間之海灘上，已建立鞏固陣地矣。雖曰上岸之兵力，尚未深入內地，然敵人之無力逐之以去，固已顯然。聞英美預備之兵力共為五百萬人，其準備犧牲之數為一二百萬，其能突破大西洋長城，而繞道以蘇法之腹地，俟之一二月後，自見分曉。然世人所關心者，曰東線上之蘇聯如何其，逗留不進，如昔日之英國歟？

抑東西策應以輔蘇聯之進？吾人以為昔日英國之躊躇，由於北非兵事之未了與準備之不足，今則蘇軍已驅敵人於境外，乘戰勝之威，鼓行而西，德軍處於夾攻之中，無法顧全東西兩方必矣。倘世人對蘇之進攻猶有疑慮之心，請觀斯大林氏五月一日之佈告，其言曰：

吾人之工作，不以驅除本國境內之敵人為限。今之德軍，如一受傷之獸，回至自己穴中，自舐其傷痕。然此自匿之獸，尚不能謂其不能為害於人世。所以脫離吾國與各同盟國於為奴為隸之苦境，驅逐此受傷之獸，而解決之於其巢穴中。為追逐敵人計，吾人願解放波蘭人及西歐同盟國為希氏所蹂躪之人民。此一問題，較之驅除蘇境上之敵人為複雜。然亦自有其所以解決之法，是為蘇英美三國聯繫的合作，吾人自東進，英美自西進。此種東西合進之打擊，能解決希忒拉的德國必矣。

讀此文者對於蘇聯滅此朝食之決心，可以瞭然矣。就雙方實力言之，蘇方兵力以千萬人計，合之西方英美之五百萬人，共為千五百萬人。德之現有兵數，有云三百師，約三百五十萬人，有云五百師，約五百七十萬人，然軍火之製造力已大受損，飛機之數又遠不如英美，彼此實力相差如此，不知德人之所賴以出奇制勝者安在。乃有歐美人發為歐戰結束將在今年終之言。吾人根據蘇聯之義言之，殆在今冬明夏之間乎。更轉眼以觀東亞之戰局。聞之日寇內部在上次內閣與參謀

部改組之日，其內部持強和說者兩派：（一）爲松岡、石、日本實行社會主義，加強對蘇之友好關係，（二）爲上野派，主張以經濟合作與英美議和。此兩派之說，東條聞之，以爲不足取，乃決定竭全力以與盟國決戰，而其下手處爲中國。此乃對豫對湘所以進攻，亦即東條氏惟一錦囊妙計也。東條氏所以採取此策，圖毀吾反攻之兵力一也；所以打通平粵湘桂鐵路，以圖分割吾國爲東西兩半二也；此路果通，再接上安南越緬，將來對吾對英美之調動軍力大爲便利，萬一南洋挫敗之日，尚有一線後退之路三也；以吾國之閩粵爲抵抗美軍登陸之地四也。此四者爲東條氏目的所在，以爲國力如日本，僅有抵抗餘地，何必急急向人求和。然吾人觀乎一年來南太平洋之戰局，瓜島也，所羅門島也，新基納島也，馬紹爾島也，空中霸權爲人所制，海陸軍之接濟斷絕，各島上僅有駐軍，而自東京觀之，則束手無策，其誠爲世界第三位之海軍，惟有藏身本國領海內，不敢與人度長絮短，則新加坡也荷印也非韓寶也，其既得而復失，殆爲意中事矣。海上領土日縮之後，英美勢必挾海空之力，以逼近日本，斷絕其交通，則戰爭物資何自而來，日本糧食仰給越過，饑餓之苦，轉瞬即至，雖有陸上根據地如華北如東四省爲負隅之地，然本土之存亡不可知，更何能憑藉其佔領地爲持久戰之計，萬一蘇聯決心參加亞洲之戰，則關東軍腹背受敵，雖欲不敗，其可得乎。日本當局亦明知來日命運之已定，然爲最後掙扎計，不能不存困獸猶鬥之心，此則豫省與長沙戰事之所以起也。竊嘗言之，日本此次作戰，猶之一九一八年三月魯登道夫之策略，時俄處革命之後，軍隊逃亡，陣線散失，德人移其東線之兵於法境，集合大砲無數，以爲英法聯軍陣線一旦截斷，則英人惟有遁逃海上，自可徐制法之死命。不

圖一九一七年六月後，北美合衆國亦已參戰，軍隊人數頓增。德之興登堡總帥竟無以自保，而三國聯軍乘勝長驅，德人望風而遁。魯將軍所謂德軍最黑暗之日，即在此時。及至秋冬之交，德人惟有屈膝求和而已。日人戰略向奉德人爲師，雖好侵略，其初之發動至猛，而後來之勝算則不可必，及失大瀋陽領，則傾全力以圖一逞。彼等亦知照膺一死報君之義，殆將於東條之身親見之矣。

雖然，吾人屈指計之，歐戰長則一年，短則半年，倘於歐戰未了前，日人以全力壓迫，彼戰略上之目的，或有所得，將如之何。曰吾人集中全力抵抗，定能使日人之所圖，不易得逞，如此一條交通線，由東北以達於南海之濱，數年來日人於從容開闢中，未能據而有之者，何能於今日運用自如。日人於南洋方面之海上交通線既不能自保，此後將於陸上重蹈覆轍。此吾所以認爲吾國所以抵禦之者不患無法也。

抑吾人所深念者處此戰爭之最後階段，當求內部之整飭。軍紀也，財政金融也，兵役也，無一事不當動求民團以圖改善，然後能度過難關。其在外交方面，根據四強協作之諾言，應向盟邦大胆提出協助吾國軍力與武器之方案，如蘇聯於一九四二年之呼號第二戰場，此不應視爲恥辱而緘默不言也。然今日政治軍事之不足應敵，由於平日政策之不公開發論，雖有雄思之機構，而未收廣益之效用，良以民主政治在吾國尚未實施，故內外政策，未能發自全國人之心思才力之至善者。昔人有言，「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自古代已然，況全民族團體之如今日之戰爭乎。人民之負擔也，政策之利害也，外交上之親甲親乙也，黨派間之歧出也，凡此諸端，誠依民主國家之方式，一切出之以公開與公議，大家方協力之不暇，決無有以互相

革命為樂者。如是則永絕，出刑棘而履坦途，此則後乃新亂麻之手段也。

或曰，予以民主政治為團結國內之要圖，然憲法須俟國民大會召集而後制定施行，其奈緩不濟急何。要知今日所謂民主，非憲法之謂也，非選舉之謂也。目前之爭點不外乎政治結社之公開，言論自由之開放，財政金融與一切之方針取得人民同意。此二三項之實現，自足以平國人之心而達一致團結之目的。夫政治家之所以救國者，亦曰因時制宜，不抱成見。各聯盟國中，除其國體之固定者外，無一不走上民主政治之坦途；此大勢之所趨，無可逃避者也。況乎所謂民主，本為吾國既定國策，政治上步驟縱稍有變更，然絕不損及政府之尊嚴，不獨不至引起紛擾，反可以阻止紛擾。其所以保全國家，保全國家在國際上地位之效果，為何如乎。

所以謀國家統一之道多矣，然不必出於一途。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以成統一，然漢高之分封諸王，何嘗不為統一之國。清代於關內實行郡縣之治，然蒙古之世襲王公，存而不廢，不害其為統一。更求之外國，俾士麥經普丹普奧普法三戰，而博德意志民族為一體，然對於巴伐利亞王國許以獨立之郵政，自印郵票，另為一式，并其軍隊自為一單位，何嘗因此之故，德國不成為統一之國。考之英國，其肘腋旁之愛爾蘭，素不甘於英倫之統治，自上次歐戰後，許以獨立，此次戰起，愛爾蘭政府宣告中立，以立異於英帝國及其他自治領，其所為誠不免令英人受窘，然何嘗能取英帝國之統一而動搖之。又不觀蘇聯乎，戰勝餘威之下，竟對於十六共和國，昇以自組軍隊自理外交之特權，外人疑蘇之為此，自另有外交目的，然蘇聯知高度自治之無妨於統一，則與德俾士麥英倫政府之所見同也。是則

政治家所當求者，為國家之統一與其對外一致，以承所以統一之者，實不必以秦之郡縣政治為唯一方式，仲尼之縮之，大有餘地在矣。吾國處今日內外交迫之日，雖能以民主方式統一之，即建國大業已自我而成，復何政權得失之足以計較乎。前段既已言之，盟邦之勝利，已無待乎預卜。然盟國之勝利，不為一切會員國同樣之勝利。上大大戰中之意大利，英美之友也，然意國關於參戰密約中所得之條件，在和會席上為英美所拒，其原因由於意在戰爭中之成績不佳。亦即國際間之然諾，常因形勢之變而變，不可視之為一言無二價實更無欺一者也。

又觀上次戰爭中之俄國，原為英法之同盟，然未及戰終，俄起內亂，且與德人言和，於是俄為和會所排斥，所以加諸德國之條件，俄竟不得分毫其利。更證之此次戰中之法國，維琪政府自一九四〇後與德締結停戰協定，且供給以法國工人，今雖有戴高樂及其民族解放委員會助英美作戰，然英美所以承認之者，遠不如正式之國家。可知國家自身作戰之不力，或其內部之不一致，有起於革命如一九一七之俄國，有起於投降，如一九四〇年之法國，皆足以影響於盟國之所以待遇之之態度矣。以云吾國乎，其與英美之聯盟，起自太平洋戰起之後，既無所謂分裂，如法之維琪政府與戴氏之離而為二，亦無如俄之一九一七年之革命，其地位之鞏固，差與英美同。所望政府繼今以後，顧及未來隱患，而思有以預防之杜絕之，以免內部之紛擾以取得國際一致之贊助。則抗戰勝利之目的既達，而建國大業亦因而完成。是在當局之熟思審處矣。

三三年六月十四日

論 移 風 易 俗

左舜生

不久以前，在報紙上曾見一次所謂轉移風氣的運動，似乎有不少的人做過文章，也有不少的人演過說，我對這些文章和演說沒有詳細看，不知道所說的內容如何，但我認為這種運動確有相當的意義；能有人感到目前的風氣確有轉移的必要，而苦心孤詣想把做這件事業來形成一種運動，總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因此，我也要就這個題目發表我個人的一些感見。但對這個題目我想說的話很多，不打算在這一次說完，以後還有機會，也許還要再說。

首先我要請大家注意的，便是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太容易，以為只要有幾個著名的人物出來提倡提倡，一翻手間便真可以收轉移風氣的實效，我們必得好好的想一想，把這個問題的涵義切實弄明白，然後才有希望找出一些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所謂風氣究竟是什麼？就字面講，好像這兩個字相當玄妙，其實我們可以不必把它向玄妙的方面去解釋。簡單的說來，所謂風氣也者，乃是一時一地多數人之所崇尚。這種崇尚有真有壞。所謂好壞，乃是就它所及於社會的影響如何而說。其性質有的是無關宏旨，好比微風之起於蘋末；有的却具有甚大的力量，類似一種狂飈，能在一個靜靜的社會，掀起洶湧的波浪。就時間說，大概一種風氣已成，有的可以延續到幾十年，幾百年；有的却好比一陣飄風，一吹也就過去了。就地域的關係說，一種風氣之成，大半起源於都會，尤其是一國的首都；至於窮鄉僻壤，或交通太不便利之處，却往往不大容易變動，而

能長久保持它一種樸素的氣息。再就人的關係說，一時代的風氣之形成，每每是由少數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士有意或無意的加以提倡，由於多種因緣的湊合，久而久之，乃居然為多數人所則效，而成了一時的風氣，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便正是這種關係的說明。

讓我來舉出若干過去和現在的例子，以作為我上面一段解釋風氣究竟是什麼的補充說明吧。例如貪污，這是最容易成為風氣的一種現象，在中國一部歷史上，我們可以舉出一大堆這樣的事實。像明末，有了一個招權納賄的魏忠賢，便可以使得當時的社會醞釀到不堪的田地，當時京朝和地方官吏，除掉以金錢珍寶向這個閹黨的漢魁竭力「孝敬」以外，甚至乃妙想天開，不惜以朝廷的大官或地方的巡撫，屈膝拜給魏閹作乾兒，同時魏忠賢的生祠且廣建於全國，乃至像袁崇煥那樣比較有為的人物，也居然列入為魏閹建生祠的名單以內。這樣一股惡風，經過當時不少的志士仁人以性命相搏，僅乃遏止於一時，但一到南明，由於阮大猷馬士英輩的一番煽煽，死灰又已復燃，馴至把明朝整個兒斷送！貪污風氣之不易轉移，貪污集團之不易摧毀。於此可見一斑。清朝的傾覆，是在那個所謂極盛的乾隆時代已經種得有因的，而當時的貪污代表人物，便是那個有名的和珅。我們看看和珅那一份被抄的清單，當時的腐敗，便已不難想像。此後又歷嘉、道、咸同、光緒一百年，至清季的慈禧、奕訢、李鴻章輩，乃等輩造極，實缺是公開的祕密

，行賄是必要的手續，黃金以得高官，社會不以爲恥，納賄以得美缺，且爲人所翫羨；地方官對京官，照例有所獻納，而美其名曰「冰敬」「炭敬」；地方的各種衙門，照例有種種額外的收入，更錫以嘉號曰「陋規」。於是憧憧鬼影，自中樞以迄地方，自京朝的達官顯宦，以迄一縣衙門的門丁差役，乃至一切經手稅收的釐金關卡，幾幾乎無一不是黑暗重重。例如長官愛好古董，僚屬便可以古董進；長官愛好女色，僚屬也可以女色進。清末有一部著名的小說叫「官場現形記」，還有一部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其中所描寫的大率都是這一類貪污的事實。袁世凱本來是從清末那個官僚社會裏滾出來的，他因爲要鎮壓異己，以自便私圖，於是乃不惜使貪使詐，以造成當時的一個壞人集團，假定當時不是還有幾個硬骨頭，說不定袁世凱已居然做成了一代的太祖高皇帝。至於多數的北洋軍閥，其貪污乃更是赤裸裸的，在他們中間積資至數千萬乃至上萬萬者，不乏其人，如段祺瑞吳佩孚那樣不大要錢的人，在他們中間要算是鳳毛麟角。馮國璋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總也算虛榮達於極點了，可是連「三海」裏的幾條魚，他也要撈出來把它拍賣！愈是有錢的人，愈視一錢如性命；愈是窮光蛋，却愈能揮金如土；古人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便正是指的這種地方。我們要研究如何肅清貪污，以爲改進政治的張本，千萬不要忘了這種貪污風氣的歷史線索，同時亦必得承認斷不是一種簡單方法所能有效的。

上面所舉的一個容易成爲風氣的例子是貪財，下面再舉一個容易成爲風氣的例子便是好色。古人說：「食色性也」，假定色情的發揮只限於異性，這真是無關中外文野如出一轍，原也不算稀奇。所奇怪的還是這種事實不惟行諸異性，乃亦見諸同

性。中國歷史上所寫的彌子瑕輩實一類餘桃隨袖的故事，便是見於男性與男性之間的，班固前漢書上所記載的「對食」，便於見於女性與女性之間的。捧旦角的風氣，在有清一代甚爲流行，至清末則似已登峯造極。當時那種旦角生涯，儼同娼妓，可以出局侑酒，可以送客留覺。當時的士大夫可以把這類的事實著爲小說，存諸筆記，見諸詩歌，絲毫也不以爲恥，而一般社會也相習成風，視爲風流韻事，絕少有人敢公然加以非難。流風所播，這種風氣不只盛行於北京一地，也逐漸的傳到南方，例如民國初年在上海所流行的「春航集」，「碧雲集」，便是當時江浙間一班所謂名士爲捧小旦馮春航碧雲而寫出來的。

聽說德國的納粹黨人間也有這種風氣，不知道確實不確實，但證以納粹和法西斯黨人的許多行爲，全屬違反人性，就國人性，這類事實是寧信其有的。亡友王光祈先生，當他正在德國着手寫「中國音樂史」的時候，忽然得着梅蘭芳有到歐洲演戲的消息，他乃發奮寫一篇長約萬言的文字寄回反對，託我在上海的報紙替他發表。他的論點第一說明在歐洲的舞台上，已經沒有以男扮女的事實，中國仍保留這種惡習，適足證明落伍；第二，以男子的聲帶而唱女子的高音，從音樂的見地實所不許；第三，他更要求中國的戲劇界應該發起一種運動，絕對禁止男演女角，以矯正中國這種傳統的惡風。可是其時的「梅老蘭」在上海報界的勢力很大，這篇文章簡直弄得無從發表。後來梅到歐洲的傳說雖沒有成爲事實，但程鵬秋却在某報人的多方提倡之下，畢竟到歐洲去跑了一趟。我舉出上面這一段的例子，在說明風氣是一種可怕的東西，一件事無論怎樣不合理，只要成了風氣，要矯正也便不大容易。這是談風氣的人們所不可不知道的。

東晉的文人歡喜談老莊，談佛，說幾句俏皮話，於是當時的士大夫便相率清談。宋時的理學家歡喜講窮理盡性，於是當時的士大夫便相率講理。清末的文人歡喜打時鐘，一直延入民國，那班遺老遺少，也還是以打時鐘作他們消遣的妙法。有人愛講公羊，便有許多人隨着講公羊；有人愛談金石，便也有許多人隨着談金石。更推而廣之，哥德寫一本『少年維特之煩惱』，便有不少的德國青年歡喜着維特那樣的服裝，同時也學着像維特那樣的煩惱去煩惱。甘地愛戴一頂白布的小帽，於是凡甘地的黨徒，都愛戴一頂甘地式的帽子；甚至因為甘地隨時舉行絕食，中國一位有志的青年曾提先生，便也學着他實行過一度長時間的絕食。當其納粹盛時，希特勒那件黑色的外衣，似乎也在世界上發生過風氣的作用，假如希特勒不像今天這樣倒楣，您還怕他那件外衣不成爲世界一種最時髦的裝束嗎？當假時代的工業化，比之西歐的許多國家和美國是相差很遠的，革命的初期，經過一番的內亂與外患，便連原有的那一點基礎，也掃蕩殆盡。但蘇聯經過幾度的五年計劃，並提倡一種新遠

挽李其相四律

老 秋

漢諾夫運動，於是全國人對於增加生產的努力乃成爲一種風氣，因而於這次對德三年的苦戰，表現非常的力量。隨手舉出這樣一串的例子，在說明一種已成的風氣雖是不容易改變，可是一種新風氣却不難創造，只看創造者的毅力和感召力如何罷了。

中華民國的建立，已經三十三年，對日的抗戰，則已屆滿七年；領土尙待收復，敵人尙待驅逐，建國的工作尙待計劃與安排，人民的生活已相當窘迫，而友邦對我的批評，則已漸漸深刻。雖說政府對勝利的取得已有成竹在胸，但人民的普遍苦悶則爲無可否認的事實。由於這種苦悶的積累，乃發爲民主的要求。這種要求有其外在內在的原因，既非少數人所得而提倡，也決非少數人所得而遏止。我們相信全國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化，社會民主化，經濟民主化，教育民主化，在最短的期間，必將成爲全國一致的風氣。必得這種新風氣形成，然後一切舊惡俗俗始可洗滌淨盡，而一個嶄新的現代民主國家也才可以建設成功。這還有賴於大家的繼續努力。

三三、六、一二、

大海星沉萬馬瘡，出師未捷怨何如。秦關北望雲如墨，蜀道東來血似朱。十年怕溯相如意，君亦猶如兩鬢疏。

(一)

懷 國

北道風雲是幾時，幾年回首首重圍。崑崙路渺思歸早，洛水秋高信使稀。依然遙遠前戰績，少陵諸將出師遲。

三三、六、一二、

民主憲政的實施問題

陳啓天

自去冬憲政實施協進會成立以來，我國政治已進入一新階段。這一新階段，即是由訓政時期到憲政時期的一個過渡階段。在此過渡階段中，一面要準備結束訓政，又一面要準備實施憲政，將來憲法頒布以後，能否確立民主憲政制度，須視這個過渡階段中的準備工夫如何而定，西諺說得好：「好好開始，便是完成了一半」。這個過渡階段中的準備工夫，即係要我們好好準備開始，以求能於憲法頒布以前完成一半的憲政。換句話說，便是要在憲法頒布以前，完成憲政實施的基礎。我們深信，徒有憲法，未必就有憲政。要憲法頒布以後確有憲政，必須在憲法頒布以前先有憲政實施的準備。這是政府所以設立憲政實施協進會的主要理由。我們又深信真正的憲政，需要逐漸發展而成，決難一步登天，盡如理想。因此我們在現在談憲政實施問題，調子不必太高，步驟不必太急，只須照着民主憲政的確定理想，從現在起，逐步推進，逐步實施，然後理想與現實乃能漸次接近，使憲政基礎易於漸次確立。這是我們目前對於憲政實施問題宜取的一種態度。本稿擬本着這種態度，對於憲政實施有關的時期及步驟二大問題，分別加以討論。

第一，憲政實施的時期問題。目前尚是戰時，我們所說的憲政實施是否即從戰時做起，還是等待戰後再行實施？要決定這一個問題，我們可先從幾個主要國家的憲政歷史上加以考察。例如：美國的憲政，實導源於獨立宣言與聯邦約法。這兩種有關憲政的重要文書，實產生於戰時，即美國獨立戰爭時。又

如法國的憲政，實導源於人權宣言。而人權宣言正產生於戰時，即法國革命戰爭時。又如蘇俄的憲政，實導源於一九一七年七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通過的蘇俄憲法。而此憲法產生的時期，不但有內戰，而且有外戰。又如英國的憲政的重心，在經過長期發展而成的主權國會，即所謂「巴力門」。而巴力門之得由「大會議」，一面漸次擴大組織，又一面漸次擴大職權，多半藉助於戰事，實現於戰時。英王亨利第三，於一二五四年改大會議為巴力門，並加選武士為議員，是在戰時，為戰事。愛德華第一，於一二九五年召集模範國會，又加選平民為議員，是在戰時，為戰事。巴力門的最要職權，是租稅同意權，預算決議權，與立法權。而此三種職權的漸次取得，也多藉助於戰事，實現於戰時。當愛德華第三時代，英國因與法國戰爭，巴力門開始取得預算決議權，便是一個確證。又如我中華民國的憲政，當開始於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而此大綱的產生，實在戰時，為人人所知，不待詳說。以上各種史例，可以證明各國的憲政，往往產生於戰時。原來沒有憲政的國家，固多在戰時新建憲政。原來已行憲政的國家，也多在戰時改進憲政。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一、由於戰時需要人民出錢出力，而使人民樂於出錢出力的方法，則莫如實施民主憲政；二、由於戰時需要人民精誠團結，而使人民易於精誠團結的方法，亦莫如實施民主憲政；三、由於戰時需要人民以政治上的新希望，而使人民咸信政治有新希望的方法，更莫如實施民主憲政。這種種

原因，值得我們加以注意。不過有些人一經提到「戰時」二字，便以為一切均與平時完全不同。他們以為平時可要憲政，但戰時則不必留憲政；戰後可行憲政，但戰時則不可行憲政。又有些人以為現在所謂憲政實施，不過談談罷了，戰時固不能實施，戰後也未必能實施。果真如後一種說法，戰時以及戰後既均不能實施憲政，那我們便根本不必談什麼憲政問題。果真如前一種說法，則憲政實施須等至戰後，那末現當戰時，也不必多談什麼憲政問題。然而現在政府自設立憲政實施協進會以來，既一面積極準備實施憲政，又一面發動國人研討憲政，自然與以上兩種說法不同。我們為維護政府逐步實施憲政的賢明政策起見，對於以上兩種說法，自須略加辯正。

要辯正以上兩種說法，首須說明戰時是否需要憲政，次須說明戰時能否實施憲政。我們在說明戰時也需要憲政之前，尚須對於「戰時」與「亂時」兩個名詞，加以分辨。我國歷史上因為內亂與內戰甚多的原故，使得一般人多將戰時與亂時兩個名詞混淆不清。一經說到戰時，便以為就是亂時。戰亂兩字，在我國詞典中聯成一個習用的名詞，便是一個證據。其實現代所謂戰時，專指對外作戰而言。我們現在所說的戰時，也是專指對外作戰而言。在平時固不可亂，在戰時尤不可亂。戰時亂了，便根本不能對外作戰。在平時固需要治，在戰時尤需要治。戰時是治的，然後對外作戰才有必勝的可能。所以現代所謂戰時，僅與平時相對而言，不與亂時相聯而言。平時要法治，戰時仍要是治時，這是近代國際戰爭的一個必要前提條件。其前提條件的國家，戰勝的可能性大。缺乏此前提條件的國家，戰敗的可能性多。欲求戰爭必勝而不敗，自須求治。自須求治於平時，更須求治於戰時。現代國家在平時以至戰

時求治之一貫的必要的通常方法，第一是憲政，第二是憲政，第三還是憲政。除了憲政以外，沒有更好的求治方法。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原來實行憲政的國，如英法美等國，仍於戰時實行憲政，亦可獲得最後勝利。至於原來不大實行憲政的國家，如俄德奧等國，一到戰時，更不大實行憲政，因而外招戰敗，內起革命。所以在當前世界大戰中原來實行民主的國家，如英美等國，不因初期戰事失利而反對民主，亦可漸獲最後勝利。原來反對民主的國家，如德意日等國，到了戰時，更反對民主，雖初期戰事稱雄一時，然以缺乏民主力量的支持，一鼓作氣，再衰三竭，最後必歸失敗。由這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看來，可知欲求戰勝，在平時固需要民主憲政，在戰時更需要民主憲政。戰時所以更需要民主憲政的重要理由，約有兩點：第一、戰時最忌釀成亂時。要戰時不釀成亂時，只有政府與人民更共依民主憲政的軌道行動。為應付戰事起見，固然需要相當增大政府的權力，並酌量限制人民的自由，但仍不能脫離民主憲政的軌道。換句話說，戰時政府的權力，無論如何增大，仍須以民主為準繩，以法治為範圍。戰時人民的自由，無論如何限制，也仍須以民主為準繩，以法治為範圍。如果增大政府的權力與限制人民的自由，均不依照民主憲政的軌道，那便不是求治，而是求亂；不是求勝，而是求敗了。要求勝須先求治，要求治只有更依照民主憲政的軌道行動，這是戰時所以更需要民主憲政的一個重要理由。第二、現代戰爭必須實行國家總動員。要實行國家總動員，必須先行「政治總動員」。什麼叫做政治總動員，便是要停止黨爭，一致對外；便是要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在平時不妨有黨爭，在戰時則須停止黨爭，一致對外，這又可叫做「國家至上」。一般民主憲政國家實行政

治黨與自主要方法，不外在一「國家至上」的原則下，由各黨派聯合組織戰時政府或國防政府，以求大家均能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平時政府多由一黨單獨執政，而戰時政府則多由各黨派聯合執政，這不是更民主了嗎！因為戰時政府是更民主的政府，而舉國一致的政府，所以不妨增大政府的權力，以應付戰事。至一般非民主憲政的國家，如前次大戰的俄德奧及此次大戰時的德意日等國，多知道戰時政府應增大權力，却不大知道戰時政府更應採取民主的方式；多知道戰時應實行國家總動員，却不大知道國家總動員的前提條件是政治總動員；多知道政治總動員必須停止黨爭，一致對外，却不大知道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必要方法。這些國家的當道，也有所謂國家總動員，但缺乏政治總動員做國家總動員的前提條件。他們只求藉國家總動員，將權力盡量拿到自己手裏，却不知道民主憲政是運用權力的最好方法，他們喜大痛快，怕小麻煩。因此他們對於政治上的異己，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加以壓迫，無所不用其極。結果，不但使對外戰爭難得最後勝利，並且造成國內革命。前次世界大戰時，俄德奧等國皆於戰敗後發生國內革命，便是一個明證。有些評論家說：前次大戰，德國失敗的原因，不在軍事，而在外交與經濟。依我看來，前次德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在外交與經濟，而且在政治，在政治缺乏總動員的民主辦法。這次大戰，軸心國家將必然次第歸於失敗，失敗以後也將不免發生國內革命，其原因所在，仍不僅在軍事外交與經濟，而在政治，也在政治更缺乏總動員的民主辦法。由上說來，可知戰時需要政治總動員的必勝，沒有政治總動員的必敗，這是戰時需要民主憲政的又一個重要理由。依以上所說的兩個重要理由，我們可以斷言：戰時對外求勝，只有實行民主憲政；

對內求治，也只有實行民主憲政。所以我們說：戰時需要民主憲政。

以上所說戰時需要民主憲政的兩種重要理由，是就一般國家的戰時泛論。若專就當前中國說，更可發現戰時需要民主憲政的重要理由。自抗戰以來，政府確定的基本政策，是「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建國的先務，在政治建設。政治建設的總方針，依據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當是民主憲政，不待多所引證。我們不談建國則已，要談建國，首須注意政治建設。不談政治建設則已，要談政治建設，自須依據中山先生所提示的總方針，即民主憲政的總方針，去建設政治。如此建設政治，然後政治有軌道，有辦法，有進步，可以以漸次達到「建國必成」的希望。否則惡政治不易有軌道，不易有辦法，不易有進步，如何能達到「建國必成」的希望呢？這是就對內建國說，中國雖在戰時，確實需要民主憲政。再就對外抗戰說，中國也需要民主憲政。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國的抗戰因之擴大了範圍，並且改變了性質。在範圍上，由中日兩國間的戰爭，擴大為中英美等國聯合對日本一國的戰爭。又在性質上由單純反對侵略的戰爭，改變為民主國家聯合反對非民主國家的政治主義戰爭。戰爭範圍的擴大，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神益，早經為一般人所確切認識，無須詳說。但一般人對於戰爭性質的改變，似乎還未十分確切認識，難免使抗戰前途受不良的影響。原來我國一般人的政治思想，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以前，多半徘徊於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是一種不必諱言的事實。到太平洋戰爭以後，對於民主與反民主的徘徊態度，始漸次趨向於民主，並行將成為一種確定的政治方針。我們要求抗戰勝利，除自力更生外，尚須與英美等民主國家聯合作戰，尚須爭取與國及援助

。要爭取與國及援助，須先行確定我國的政治方針，也是民主憲政，也與英美等民主國家的民主憲政相近而不大相反。這即是與國內政治與國際戰爭有適切的配合。有此配合，則與國的關係易於加密，援助的力量易於增大。無此配合，則易引起與國的疑慮，而使國際的援助為之延緩。人人已知我國欲求抗戰勝利，第一要盡力發揮自力，第二要盡量爭取援助。更須知盡力發揮自力的最好方法，是民主憲政；盡量爭取援助的最好方法，也是民主憲政。民主憲政既為對外抗戰時發揮自力與爭取援助的最好方法，那末中國戰時確實需要民主憲政，自不必再有所徘徊與疑慮了。總之，民主憲政，是建國成功之路，也是抗戰勝利之路。欲求建國成功與抗戰勝利，只有依着民主憲政的大路前進。所以說戰時中國也需要民主憲政。

戰時需要民主憲政，已無疑義，我們再進而研究戰時能否實行民主憲政。我國在戰前未及實行民主憲政，要在目前戰時開始實行，自有困難，這是我們承認的。不過我們尚須知道「困難」與「不可能」，應有分辨。「困難」不是一「不可能」。如以困難為不可能，則任何事皆有困難，皆不可能了，豈僅民主憲政一事而已？當前的抗戰不困難嗎？然而已經支持了七年，並且還要繼續支持下去，以求獲得最後勝利。抗戰所以能在困難中繼續支持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最高統帥的決心與全國人民的擁護。我們要知道戰時能否實行民主憲政，也須先行看看政治領袖的決心與全國人民的擁護如何。去冬以來的憲政運動，原出於當前政治領袖蔣主席的發動。其所以發動這次的憲政運動，依我看來，實由於他已具有的決心。實際政治家對於一切事項的決心，多半以實際需要為依據。前段曾經說過，欲求抗戰勝利與建國成功，均需要從戰時起實行憲政，已為有目

共睹的道理。蔣主席是當前抗戰建國的領導者，其熱望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當在一般人之上；因而其感覺戰時需要憲政，也在一般人之上。其組織憲政實施協進會，便是對於憲政實施已具有決心的一個佐證。自蔣主席決心發動憲政運動以來，亦已獲得全國多數人的擁護。領袖既有決心，人民又多擁護，故目前實是準備實施憲政之最有可能的一個時機。又我在抗戰前所以未能實施憲政的各種原因之一，在各方缺乏互相寬容的政治風度。經過此次長期抗戰的教訓，已多少發出一點互相寬容的政治風度。如果將此新政治風度，即移用於民主憲政的學習，我相信必可在戰時建立起民主憲政的基礎。萬一到戰後才開始實施憲政，則此種新風度，即將隨抗戰的共同目標消失而俱消失，便更難實施憲政了。故只就這一點說，戰時更是實施憲政之最有可能的一個時機。我們要極實把握這個時機，確切準備實施憲政，不宜輕易錯過。如果隨便錯過，則不僅影響抗戰，而且影響建國。我們觀察各方事實，覺得實施憲政，在戰時固有困難，在戰後更多困難。在戰時如不能實施憲政，在戰後更不能實施憲政。我們既決定實施憲政，便宜選擇困難較少的戰時開始。雖然我們所說從戰時起開始實施憲政，不是要在戰時完全實施憲政，也不是主張在戰時立即召集國民大會，並頒佈憲法。由憲政開始，到憲政完成，自有一個步驟問題。我們在以上既經說明憲政實施的時期宜自戰時開始，以下再略述我們對於步驟問題的意見。

第二、憲政實施的步驟問題。關於憲政實施的步驟問題，首須注意者，為不成文的憲政與成文的憲政。一般人說起憲政來，便以為必須先有憲法，必須在憲法制定並頒佈以後。不過有憲法，不必就有憲政。例如舊世紀的新約法與曹錕的憲法，

(指十二年時議員制定的憲法)都可說是有憲法，但不能說是有憲政。因為袁世凱的新約法，只求他一人自便，固根本說不到有憲政。曹錕的憲法，只是時議員的遮羞工具，從來無人過問，更根本說不到有憲政。要求有憲法以後續有憲政，必須在未有憲法以前已略有憲政的趨向與規模。未有憲法以前的憲政，是不成文的憲政。有憲法以後的憲政，是成文的憲政。不成文的憲政，是成文憲政的先導，也是成文憲政的基礎。有此先導與基礎，雖無憲法，仍為憲政。無此先導與基礎，雖有憲法，也未必是憲政。所以我們不但要有憲法，並且要有憲政；不但要有憲法制頒以後的憲政，並且要有憲法制頒以前的憲政。憲法制頒以後的憲政，可待至戰後再行實施。憲法制頒以前的憲政，則須即在戰時開始實施。戰時開始實施憲政，到戰後則制頒憲法，以完成憲政，這是在步驟上由不成文憲政，到成文憲政。戰時先實施不成文憲政，然後戰後可漸次完成成文憲政。戰時僅實施不成文憲政，然後不致因憲法上的爭論，延緩了憲政的實施。戰時所實施的不成文憲政，只須一面培養各方的民主風度，一面制定與一般憲政有關的必要的單行法規而共同遵守之。這是逐步實施憲政所宜採取的一種必要步驟。

又在憲政實施的步驟上須注意者，為初步的憲政與完全的憲政。一切國家的憲政，多由長期發展而完成。不成文憲法國，如英國固是如此，成文憲法國，如美法等國，也多是如此。這有各國憲政發展的歷史，可資證明。憲政既由長期發展而成，那末我國要完成憲政，自也須長期發展。不幸從前主張憲政與反對憲政的人，都不明這種道理。主張憲政者，因不明這種道理，於是多主張在最短時間之內，即實行完全憲政，却未十分顧及事實行得通與否。反對憲政者，因不明這種道理，於

是既不實行完全的憲政，也不實行初步的憲政。縱迫於時勢，不得不談憲政，仍要藉人民程度不夠，預備復預備，拖延復拖延，而成為一紙上憲政。紙上憲政，決不能滿足民意。而完全的憲政，又未能立即實施，然則宜如何乃易於有真憲政？我們以為宜將憲政實施步驟，與人民程度適切配合起來。假定國民小學畢業，為實施憲政的最低必要程度。則凡具有小學程度的人民，宜即令其有學習憲政的機會。具有小學程度的人民，約一分，則憲政的實施宜進一步。據說我國已受教育的人民，約全人口百分之二十。目前開始實施憲政，即宜先以此已受教育的人民為起點，而實行初步的憲政。以後受教育的人民，隨時加多，參與憲政的範圍，也隨時推廣，以至完全的憲政完成而後已。我們不可藉口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未受教育，而延緩了憲政；也不可強令尚未受教育的多數人民，立即一律參與憲政，而使憲政只成為一種形式。先從已受教育的少數人民實施初步的憲政，這是將實施步驟與人民程度適切配合的一種妥當辦法。依據此種辦法，則在戰時開始實施憲政，固可減少困難；即在戰後繼續完成憲政，也可減少困難。我們對於憲政的理想，固宜以少數人民甚至全體人民的完全憲政為目標，但在步驟上必須由初步的憲政，以漸完成完全的憲政。已具相當程度的少數人民，倘無法令其先行初步的憲政，而高談多數人民，甚至全體人民的完全憲政，那就不免成為空談或假意了。要不流為空談或假意，便須在戰時先行初步的憲政，到戰後再逐步實行完全的憲政。這是逐步實施憲政所宜採取的又一種必要步驟。

又在憲政實施的步驟上須注意者，為自上而下的憲政與自下而上的憲政。所謂自上而下的憲政，指中央憲政而言，或簡稱爲憲政。所謂自下而上的憲政，指地方自治而言，或簡稱爲

自治。地方自治是中央憲政的基礎，而中央憲政又是地方自治的模範。沒有地方自治，國難建立中央憲政。沒有中央憲政，亦難完成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與中央憲政的相互關係如此。我們現在實施憲政，是先從地方自治做起，還是一面促成地方自治，又一面試行中央憲政？這是在步驟上必須決定的一個問題。有些人以為地方自治既是中央憲政的基礎，便須先完成地方自治，再實施中央憲政。自清末以來，凡特別重視地方自治者，多半如此主張，不能說沒有一部分的理由。不過我國地方自治原無何種根基，要待地方自治完成以後，再實施憲政，那就至少還要等待十年至二十年，才有實施憲政的可能。如果十年至二十年之內，還不能完成地方自治，那末實施憲政，又須再等十年至二十年了。如此等待下去，決非時勢所能允許。為適應當前抗戰建國的迫切需要起見，必須在地方自治未完成以前，即行開始憲政的實施。換句話說，即須一面促成地方自治，一面試行中央憲政；一面自下而上的實行憲政，一面自上而下的實行憲政。試行中央憲政是自上而下的實行憲政，以為地方自治示範。促成地方自治，是自下而上的實行憲政，以為中央憲政立基。不示範，則自治將成為變相的官治，不一定能備憲政的基礎。不立基，則憲政難於穩固並隨時進步。所以憲政與自治應同時逐步實施，不可偏廢，也不可只談憲政不談自治，更不可只談自治不談憲政。又所謂地方自治，原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城市自治，二是鄉村自治。城市人民的教育程度，經濟能力，交通狀態和社會關係等，多較鄉村人民為優，而易於實行自治。因此我國地方自治宜先由城市做起，漸次普及鄉村。如果同時注意城市自治與鄉村自治，則恐人力財力有所不逮，不易完全收效，也不易短期完成。現行法規上所謂市自治

，至屬於城市自治，固不待說。即縣自治的縣城自治，也應屬於城市自治。詳細的說，凡首都，省會，縣城以及人口集聚在十萬以上的地方，均應屬於城市自治的範圍，不可僅限於省會市，也不可將院轄市除外。我們要推行地方自治，宜先行完成此等城市自治，以確立地方自治的中心據點。然後再由此等中心據點，漸次推廣到鄉村，以完成鄉村自治。先完成城市自治，後完成鄉村自治，這不是重城市而輕鄉村，而是使自治易於逐步完成。這是一面實施憲政，一面促成自治，所宜採取的一種必要步驟。

又在憲政實施的步驟上須注意者，為間接民權的憲政與直接民權的憲政。間接民權的憲政，通常稱為代議政治，即由議會代表人民，監督政府的一種民主政治。直接民權的憲政，通常稱為全民政治，即由人民直接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等權的一種民主政治。從純理上說，代議政治當然不及全民政治更合理，間接民權當然不及直接民權更民主。但從事實上看，現在世界上的民主大國，如英美，只能在地方自治範圍以內，酌採直接民權制度，而仍不廢間接民權制度。至於中央政治，則全行間接民權制度，無法採用直接民權制度。這是因為大國的領土廣闊，人口衆多，極難實行直接民權制度。只有小國，如瑞士，才能在中央政治上採用直接民權制度，以補助間接民權制度。我國是一個大國，而不是小國。一縣之大，可抵瑞士。一省之大，可抵德國或法國。要在中央政治上實行直接民權制度，固極感困難；即在地方自治實行直接民權制度，也須大費斟酌。所以我們不可空慕直接民權的美名而鄙棄間接民權制度不用。具體的說，我國在近一二十年內，中央政治及各省政治，均只能採用間接民權制度。縣市自治，可即參用直接民

權與間接民權兩制度。初一步，必須以實行間接民權制度為主。進一步可先從縣自治內，漸次推行直接民權制度。民權制度與實施步驟互相關連，乃易於收效，這也是在憲政實施的步驟上不宜忽略的一點。

最後在實施憲政的步驟上須注意，為憲政的宣傳與憲政的實施，必須相輔。我國一般人對於民主憲政缺乏正確認識，並且缺乏共同認識，這是一個事實。因此我們要民主憲政順利進行，不得不設法增進一般人對於民主憲政的正確認識與共同認識。要使一般人對於民主憲政有正確認識與共同認識，除教育外，不得不藉助於宣傳。所以在目前從事民主憲政的宣傳，是必要的；在今後從事民主憲政的宣傳，也是必要的。不過宣傳多限於口頭與文字，未必即能使人起信。要使對於宣傳易於起信，只有一個辦法，即是一面宣傳一面實行。實施是最有效力的宣傳。所以不可徒有宣傳而無實施，也不可將宣傳與實施分為兩個時期，致使宣傳與實施失去聯繫，甚至使宣傳與實施互相反對，而發生反作用。我們要使宣傳不發生反作用，只宜一面宣傳，一面實施；只宜為實施而宣傳。這是在憲政實施的步驟上所不可忽略的一點。

憲政既不僅要有宣傳，還要有實施，那末憲政實施方案，便須從速確定，以便按年逐步實施，庶免宣傳落空，實施凌亂。關於憲政實施方案的期限，可定為十年：前五年，規定戰時所宜實施的初步憲政事項；後五年，規定戰後繼續實施的憲政事項。分年規定進度，切實如期完成。在前五年內，必須實施並完成的重要憲政事項，當包含有：（一）人民對於政治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之合法保障；（二）中央及省縣設立名實相符的民意機關；（三）城市自治；（四）與一般憲政有關的單行法

規之制定與施行；（五）司法機關及監察機關的完成；（六）後方各省軍民分治；（七）軍隊的國家化；（八）憲法的修正。在後五年內，必須實施並完成的重要憲政事項，當包含有：（一）國民大會的召集；（二）憲法的制定與實施；（三）中央及省縣正式民意機關的召集；（四）鄉村自治；（五）為實施憲法所必要的單行法規之制定與施行；（六）全國各省一律軍民分治；（七）人民對於政治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之繼續保障；（八）絕對防止內戰內亂。以上所說憲政實施方案的内容，只就我們所認為必不可少者舉要說說。至於詳細規定，應待正式機關從長斟酌。現在特別有促進憲政實施的正式機關，是憲政實施協進會。此會對於憲政實施，已向政府有若干建議。我們希望此會將來能建議政府，早定一十年憲政實施方案，以便按年逐步實施。我們承認憲政必須逐步實施，不易一蹴而幾。我們又覺得要逐步實施確有成效，必須預定一整體方案，有期限，有計劃，有考核的逐步實施。這是憲政實施的步驟上首宜決定的一個問題，希望大家加以注意。

憲政實施方案，擬定為十年，有人以為比前清九年預備立憲還多一年，未免太長。但須知前清的九年預備立憲，重在預備，未必全實施。故清末的人民深覺九年太長，一再要求縮短預備立憲年限。今後擬定的十年憲政實施方案，重在實施，重在從戰時起即開始實施，不僅限於預備，所以年限不妨稍長。也許又有人以為十年的期限太短，不必預定定期限，只須漸次向前推進憲政便可。漸次向前推進憲政的原則，是我們所贊同的。不過不預定期限來按年逐步實施，則恐遺誤抗戰建國的前途，並恐錯過當前難得的時機。只有從速確定憲政實施方案，以便從現在起按年逐步推進，剋期完成。古人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憲政要立而不廢，也須預定一戰時及戰後分年實施的詳細方案。

中國到憲政之路（二續）

梁啟溥

四、英國之例

政治上底民主，就是借着憲政而得有一點，進而再多一點，再多一點，再多一點，如此步步增高底。其最好之例，自然便是英國。英國憲政淵源中古，數百年來所涵民主成分日高，時或外表可以不變，而內裏自有脫胎換骨之妙。試就現在底事而追溯上去，數一數看。

誰都知道，現在底英國一切國事決於國會（巴力門），而國會議員則選自民間；選舉權是普及至民底，沒有不平等底限制。以云民主，似可無憾。但一經按核，便知其權力之所寄，前後大有轉變，而實行普選亦只是最近底事。原其所謂巴力門者，實包有英王、貴族院、衆議院三方面在內。固然今日之巴力門，實際上幾乎就是一箇衆議院而已。而論其確立此種地位，尚須以一九一一年爲準。在此之前，事實上其地位早居重要，固不待言；而上溯到十五世紀以上，却正是貴族院權重呢。再追上去，此兩院制又由三教會議而來，那時大權還是在英王底。即在今日，英王特權依然具在，不過暗中移歸衆議院之多數黨，以爲政治上必要時之運用了。

就在大權逐漸移歸到衆議院之際，選舉權一步一步推廣到社會各階層，衆議院由之愈得深植其基礎於廣大社會。亦可翻轉說，衆議院因選舉權之推廣，而地位愈形重要，取得了大權。兩面是互爲因果底。計自一八三二年、一八六七年、一八八四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九年，選舉權前後經五次之改訂；

最後一次，方將過去不平等之選舉大加清算，確定普選之制。此不過距今十數年之事而已。

政治上之民主，不外前說以國事付之國人公議公決，和國家尊重個人自由兩點。前一點以漸而進，既如上所述；後一點雖不全同，亦不相遠。英國人篤嗜自由，特成風尚；法院於此，遇事必予維護。即從法院判例中，或巴力門所製各法律案中，而人民各種自由即以確立；初不待憲法條文明示保證或賦予。其間一切多循乎事實而來，則漸進之跡自亦可睹。及至晚近，雖好自由之風並不衰替，而時移勢異（特自上次大戰起），國家干涉之事不免與日俱進。這却不可作退步看，而寧爲民主路向中底進步。

法國學者篤奎爾 Touchard 研究英國憲政，曾歎息說「在英格蘭，憲法常常不斷地改變；嚴格言之，它實未嘗有實際之存在」（註一）。這話自然很對。但根據我們的研究，更可爲之進一解。我們說：

立憲就是有所確定。數世紀以來，英國蓋不斷地有所確定，以至於今。每一次它有所確定而共守，每一次它便是憲政。雖所確定者，不久又改動，以致其內容總不一定；然其爲憲政則未嘗變，其每一次改動總是向着民主精神前進則未嘗變。是若似它未嘗實際之存在者，固自大有其實際在也。它的實際就是：以憲政替英國兩次開出其政治上之民主精神。

（註一）此據戴雪：英憲精義第十二頁蕭賓南譯本商務書館版

五、再看蘇聯如何

自有憲政之英國出現，世界各國先後效法，雖因時因地各有變通，不能無出入；然大致看去總是那回事。只有蘇聯蹊徑獨闢，確有種種不合之處，似難以憲政相許。但近年世人眼光對它又漸轉變，似乎亦可接近。據我們看，其間原有可通之理，不過却有一段曲折。

它所不合於憲政者：第一，它是共產黨獨霸之局，或如它所云「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單方面的事，自無「相互契約」，共同了解」可言。第二，人民生命財產毫無保障，一切自由都談不到。此種情形，特以頭兩年軍事共產時期為甚，特以格拍烏（祕魯警察）之橫行為其明證。第三，大權集中一處（指蘇維埃大會及其執委會及其主席團），立法、行政、司法渾而不分。

照這樣說來，似無討論餘地了；如何又說可通呢？這就為憲政實以民主為其應有之義，且是不斷地向前進；而它正同樣是趨向民主底。為要說明它自己，它將站在民主立場先批評英國。第一，將指出英國人民除百分之六獨立自營生活者外，百分之九十都是受僱於人，靠工資為生活底，而其他百分之四恰為僱主。生產工具如此被壟斷，大多數人在經濟上受制而不得自主，其影響於政治是不待言底。第二，影響輿論之有效底宣傳工具如報紙、廣播電機之類，亦多為資產階級所操縱利用。此其足以影響政治亦是不待言底。第三，初等教育在英國雖已普及，但工資生活者中約百分之九十不能升學，所受學校教育僅到十四歲而止。教育機會如此不平等，則政治機會之不平等隨之。第四，在英國歷來執政者多出自世族門第及財富之家；特別是政府文官（巴力門決議有待他們執行），主教（他們像

報紙一樣能影響輿論），法官，銀行和鐵路的總理等，幾乎全都出自同一少數階級。（註二）總上四點，是其階級統治之類為諱者，則民主政治不免於空言。

這樣底民主，既令人不滿足，就有別尋途徑之必要。於是而有蘇聯這一條路出來。以上可作為蘇聯申明它自己的話。

原來英國人之愛好自由和服從公理，其精神實非其他民族所及。數百年來政治上之民主，實開其端，雖然為一世之冠，誰能抹殺。不過却不免忽略一點事。事實上，一箇人生活未得穩貼，或教育未受充分，則誰能信自由，他亦難於利用之；請他預聞政治，他亦不得盡其言。況且經濟上既有壟斷，則政治上之壟斷亦事實所必致。恰在英國壟斷之風，便是蘇聯着眼之點。它着眼在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同時亦是志在給大眾同受較高教育，求得文化水準普遍增高。蓋必如是，而後每一箇人乃為不折不扣的一箇人。政治上雖欲不民主亦不可得，民主政治乃實現而不虛。但這非建立社會本位底新經濟，就辦不到。所以其意不徒在經濟而止，而其着眼點和入手處却非在經濟不可。因此它首先將「主要生產手段國有」和「不勞動不得食」，這經濟上兩大原則提出；而政治上底自由與民主，却不忙提到。

非但如此，而且它基於下面兩點理由實有領袖獨裁和階級專政之必要。——

第一，它這種運動自是一大革命，面對着兩面敵人：在外則西歐資本主義正強，在內則舊日封建餘勢尚厚；而它全然要處於一指揮作戰之狀態下。

第二，這樣經濟建設及其社會全部文化之建造，必須以一貫之方針計劃完成之，勢不容築室道謀。

領袖獨裁是一種事實；階級專政則更有它的理論在。這就是國家之爲物，原是一強制組織。凡強制，必有強制被強制兩面，新階級統治所以爲國家之定理而不可逃。但從乎民主政治的旨趣，不應再有一治人一治於人一之分，而必須合一，歸於吾人之自治。所以在國家之內，是沒有民主政治底；其民主政治必爲國家之消滅。在它正是要作這種消滅國家底功夫。不過此却非可一步登天之事。當其從經濟建設入手，以訖全部社會改造之完成，還要假手於「國家」這機構。此時「國家」仍爲一階級統治之局；所不同底，是原來被統治之無產階級起來作統治者，執行這一大改造計劃，以渡達於階級之混化。屆之乎近代國家資產階級的統治一樣，在其本階級內未嘗不民主；此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之一「專政」兩字，蓋對於無產階級以外而言。當新建設逐步達成，國內外情勢日趨穩定，起初民主在無產階級圈內者，此時便可將圈圍放大。最後到不設圈界，那亦就是平等無階級社會之實現了。

以上是關於政權公開不公開之解說。至於人民自由沒有保障，在一般國家遇着非常事變，入於緊急戒嚴狀態，豈不是亦有這類情形。且又可分兩面解說：它爲制止無產階級以外之反動而用特別手段，正等於一般國家對付亂黨之例；對於本階級

內，則它又正像罷工期間底職工會，以各種必要手段來執行其高度紀律一樣。

總結來說，對於人生情調、理趣，它和英國人本有不同：一則偏於樂羣居而以社會爲重，一則偏於樂自由而以個人爲重。這是事實。但除此以外，它和英國同樣相信民主原則，要求民主生活；沒有根本底不同，像法西斯國家那樣（法西斯不相信民主原則不要求民主生活）。而且二十餘年來之勇猛精進，經濟生活文化水準均如預測之普遍增高，政治上之民主果亦隨之逐步實踐（恕不收舉）。其事，世人既無不見之，一向疑忌心理已然大減而代以彼此接近之心情。只以國際戰爭又作，其建設進程爲之頓挫，其政治亦難呈常態；民主政治之完全實現，猶有待於今後。然即今所表見者，固已可使我們相信它並非邪魔外道。我們不妨承認它與英國——一般憲政國家之代表例——同是憲政，其次爲政治上開出其民主精神來，並無二致。不過在同一目標之下，各有各的路線而已。

（註二）以上四點係根據英人斯隆著「蘇聯的民主」一書，鄒韜奮譯本，生活書店出版

（未完）

求 眞

抱 一

每乖世好苦求眞，但適天懷樂如辛。遠慮豈辭招駭俗，孤芳時復忌嚮人。羅安耿耿嗟存否，不已勞勞思有身。卻曲未愁妨坦蕩，樊籠養得盡然春。

憲政實施後省之地位問題

再生

省在中國，已有六七百年的歷史了。其初，省原為各中央在地方設置的一個行政機關，後來逐漸演變，遂成了一種地方制度。關於省制的演變歷史，筆者在本文中不想多說；而我們所要研討的，則為憲政實施後，省之地位究竟應該如何？

自財政收支系統改革後，省之地位，已陷於含糊不明的境地。它究竟是中央的一個派出機關呢？還是一個地方制度呢？幾乎無人能作確定的答覆。我們希望這只是暫時的現象，在將來的憲法中，關於這個問題，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我們以這種心情來看五五憲草中關於省的條文，深覺得它未能符合我們的要求。五五憲草關於省之規定，一共只有五條（自第九八條至第一〇二條），簡單固不必說，而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即省之地位問題，即根本未給我們作一解答。其次，規定省長由中央政府任免，亦似與中山先生遺教不合，這個問題與省之地位實有聯帶關係，故擬一併加以研討。

憲政實施後，省之地位究竟應如何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須從三方面着眼：第一，是中山先生的遺教；第二，是中國的實際情形；第三，是目前世界政治的趨勢。

說到省的地位，有兩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加以檢討。其一，省究竟是虛級還是實級？其二，省究竟為單純的國家行政區域抑或為地方自治團體？有人認為依建國大綱第十八條一縣為自治之單位，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此種規定，省應該是虛級而非實級，因為省既為中央與縣之間的一個聯絡體

，其本身自無實權可言。這種看法，我以為是斷章取義或誤解中山先生的遺教了。建國大綱第十七條明說：「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這是何等的明顯。省既為權利的主體，且須與中央均權，豈能虛級？第十八條所云，原是「隨着第十七條而來，惟其意義，是在對於省之功用，加以補充的說明，而并非規定省之本質的。且在中山先生遺教中，除建國大綱外，關於省之地位問題，亦屢有明白的指示。如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親訂的中國國民黨政綱對內政策第二條說：「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選舉省長」，這可與建國大綱第十六條，互相參證。自定憲法，自選省長，這又豈是虛級的省所能辦得了的？

其次，依據中山先生的遺教，縣為地方自治單位，固然不成問題。但是省是不是自治團體呢？這一點，我們也必須在遺教中求得解答，我們首先看民十三年制定建國大綱宣言。

「先以縣為自治單位，於一縣之內，努力於除舊布新，以深植人民權力之基礎；然後擴而充之，以及於省。如是，則所謂自治，始為真正之人民自治」。

這是何等的明顯。地方自治，雖然應該先從縣做起，但必須做到省自治，才算完成。省應該自治，這一點，在中山先生遺教裏，始終是一貫的。最初的主張，我們可以見之於民國紀元前十二年致香港總督書：「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

各省立自治政府，以資分理。——民國十三年北平宣言書所說的：「對內政策，在劃分中央與省之權限，使國家統一與省自治各遂其發展而不相妨礙」，可說是中山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最後主張了。

我們從這些重要的文獻中，可以清楚的看出，縣因為地方自治單位，但到一省全縣之數俱實行自治時，省也就是自治團體了。那時候的省，一方面是國家行政區域，受中央指揮，辦理國家行政事項，一方面是地方自治團體，辦理省自治及監督縣自治事項。那時候的省，就行政方面言，它與中央保持均權制度；就自治方面言，它得自定憲法，自選省長。

在憲政實施後，省應該為實級，省為地方自治團體，這是中山先生遺訓之所昭垂，毫無置疑的餘地。這兩點決定了，省之地位問題，自然隨之解決了。

我們現在再看中國的實際情形是怎樣的？中國地方遼闊，南北東西，均相距甚遠，民情風俗，因之亦在迥異，加以交通不便，民智未開，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法律政令，均欲由中央貫徹全國，事實上是很困難的。在過去君主政治時代，中央集權，雖為歷代君主的一貫政策，但因事實的關係，省的地位，歷明清兩朝，均日趨於鞏固與重要。中山先生對於這種情形，認識得最為清楚，故始終主張以均權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不僅在建國大綱第十七條中有着明白的規定，而在其全部遺教中，更是屢見不一見。中山先生何以主張采均權制度呢？這是他針對着中國的實際情形而提出的。關於此點，他在民國元年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宣言裏，說得最為明白。「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此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以遂其偽立憲之術；今則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

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間，調劑得宜。大綱既舉，條目自舉，是曰內政統一。」故關於省之地位問題，我們必須體察實際的情形，予以妥善的解決。我們決不可再以過去的眼光來看省，怕它割據作亂，反抗中央，於是想出種種方法去限制它。要知道時代是進步的，在國民的意識中，國家民族的觀念，正在日漸長成，在憲政實施後，中國必定是個大一統的國家，那種封建思想與地方割據主義，決再無殘存的可能。假使這一點我們做不到，那末，立國就根本成問題，又遑論實施憲政！

在近代歷史中，地方自治與國家統一是一相成而不是相反的。許多國家，由地方自治而促成統一；也有許多國家，先有統一然後再促進并發展地方自治。只有人民真能自治，國家才真能統一；地方自治的程度愈高，國家的統一才更為鞏固，更有力量。這種情形，在這次大戰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法國是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經納粹一擊，首先崩潰了。大英帝國的各自治領，平時幾乎是個獨立國家，但在這次戰爭中，英國是如何的團結而有力。美國與蘇聯，都是聯邦制的國家，尤其美國，平時的各邦自治權是很高的，但又何害於它們的統一與強大？我引證這些事實，并非主張中國也應該實行聯邦制；我只想说，明一點，地方自治與國家統一是一相成而不是相反的。我希望大家要有時代眼光，不要視省自治為洪水猛獸，連說都不敢說；更不要忘記了中山先生的均權遺教，硬要把省權縮小以至於無。目前世界政治的趨勢，都在加重地方政府的權力。這原因是很明顯的。因為現在是積極政治時代，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的責任，是在替人民多做事，這決非一個中央政府所能擔負得了的。蘇聯在不久以前，宣布將各邦以軍事及外交權，大家或者認它別有用意，我們姑不引作論據。我們且略談談歐

國日本近來關於地方行政的改革。我們知道，歐戰日本，係採取極端中央集權制的，它的地方行政，向以府縣為單位，直接與中央聯繫。但近年以來，它感到困難了。故在去年六月裏，創設了一種地方行政協議會制度，將全國（日本本土）劃為九個行政協議區，每區置會長一人及參事官等助理人員，這些會長，多半是從前任過各省（部）大臣的，可見對於這個位置的重視。地方行政協議會的任務，就是要調協地方，加重其權責，以補救過去中央集權之缺點的。這種措施，也許是戰時的權宜之計，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現代行政上過於中央集權之困難了。日本本土，不及我們四川一省大，其中中央政府與府縣直接聯繫，在行政上尚有困難。我們若竟罔顧事實，抹殺省的地位，將來真能行得通麼？

我們依據中山先生的遺教，觀察中國的實際情形，更曠觀

世界政治的趨勢，無論就政治方面或行政方面言，省之一級，均必須加以重視的。近來若干人士，關於省，無疑的，是懷着若干錯誤觀念，更滋着這種錯誤觀念以為措施，遂使國家行政發生了脫節的現象，這是很可慮的一件事。所以我們認為在討論憲草時期，關於省的地位問題，實有重新予以確認的必要。我們主張在將來的憲法中，必須明白規定左列各點：

- 一、中央與省采均權制度；
- 二、省為地方自治團體；
- 三、省自治實施後，省得自定憲法，自選省長。

至於具體條文應該如何，那是將來制憲者的責任，毋待我們饒舌了。

卅三、五、三〇於半角樓。

挽李其相四律

時真

（三）

海水羣飛已七年，中原劫後更烽烟。河防砥柱爭天險，麟閣勛名等浪傳。莫再鼓鼙思將種，空餘涕淚滿西川。何時荷纓鄉人語，為寫千秋傳一篇。

（四）

古雲

桐棺聞尚滯西京，回首前塵百感生，似雪縈麻緯外泣，去年油館醉中情。明時道遠疑傳貽，虛死人誰為不平？欲向遺容酌杯酒，傷心熱淚忽縱橫。

自由與組織

張申府

多少年來我常與人說，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羣與己的問題，就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如果偏重個人，則會擾亂社會秩序，如果偏重社會，則會妨礙個人自由。二者對於人類進步都是不利的。如何把社會與個人安排得各如其分，各得其所，秩序自由雙方兼得，這是自古至今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是人類社會的演化，歷代一治一亂分分合合的遞嬗相承，也就在此個人與社會，自由與秩序，崎嶇崎重，此起彼伏，搖搖擺擺，相推相疊之中。

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末，曾在倫敦「民族」周刊上看見一篇講易卜生的文字，說他一生創作，所要解決的也就是這個羣已關係問題。此外見到這個問題而想解決之的，當然更不在少數。

這個問題也可以說就是自由與組織的問題。羅素在一九三四曾出了一本大作，就是叫作「自由與組織」(美版作「自由對組織」)。但他偏于十九世紀的歷史敘論，雖然在紀事上富有意味，時見幽默，也沒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得了。(注一)

我現在提出一個似乎平常而其實根本的意思，聽來不過常識，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却須從此起。這就是說，自由與組織并不是互相敵對的，個人與社會并不是根本不相容的；自由與組織，個人與社會，其實是相反相成的。這聽着也沒有什麼。但是假使不是有人心裏并不這樣想，我也就用不着這樣說了。我的意思也并非只是說，沒有個人沒有社會；而且今日世

界更沒有沒有社會的個人，換言之，就是在今日尤其是離開了社會也就沒有個人。我的意思尤在說，在今日的世界上，沒有自由就沒有組織，而且沒有組織也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的組織是不會組織得堅固有力的；沒有組織的自由也不會自由得充分圓滿而盡致。自由與組織，如果缺一，其餘一個，在今日世界上，不但必然空虛而不實，而且簡直是不可能。今日世界需要自由，也需要組織。在好的社會裏與其個人上，尤其既要有自由，也要有組織。而自由與組織則是相依相賴的，相反相成的，似相否定而其實是互相發展的。相反的相成總是好的。因此，自由進步，組織也進步，也就是人類最高理想的期望。我願由此更提出一個意思。這也許會使得有些人駭然了。有些人也許又要對我胡思亂想。但是真理所在，我不能不說。這就是說：與其說中國今日需要自由，無寧說中國今日更需要組織。這其實不過上項原則的一個一面應用。在今日世界，自由與組織既是相依為命的，中國今日既需要自由，當然也就需要組織。但是我的意思乃在加重說，中國今日固然需要自由，中國今日實在尤其更需要組織。

大家莫詫異，且待我慢慢講來。

要說開這個，先要弄清楚所謂自由的意義。

遠的不說，至少從英國詩人密爾頓以來，人類講自由，要求自由，號召自由，鼓吹自由，也有幾百年的歷史了。但是到了今日，仍然又在講自由，要求自由，號召自由，鼓吹自由，

但這一點兒也不能說是倒退，更算不得落伍。理由很簡單，就是：直到今日為止，人類并未得到圓滿的自由，人類所已得到的自由，實在還太少。有人對人的自由，有人對社會的自由，有人對自然界的自由。這些之中，有的不夠，有的簡直沒有。而且有的地方甚至連起碼的自由也還沒有。自由之為理想，就令不是充足的理想，確是一種必要的理想，許多人都見到了。既然自由是一種理想，而又沒有得到，那麼又怎能禁得住人來爭求呢？

雖然三百年前講自由（密爾頓有名的「阿勒奧巴格提加」*Areopagitica*——言論出版自由請願書——正是三百年前即一六四四所發表），今日也講自由，究竟對於自由的見解，所講的自由範圍，已經有所不同。雖然同講自由，但自由與自由論，在這三百年間，却也是不斷地發展着的。現在世界大戰，照一個意思說，本是為自由而戰，就是為使人得到自由而戰。現在全世界，至少一切民主國與一切有民主傾向的國度，尤其是英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自美國總統羅斯福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國會書文中提出的四種自由（即：一、言論表示的自由；二、宗教禮拜的自由；三、不虞乏的自由；四、不恐懼的自由），以及以後總統華萊士所開揚，以及英國特別從一九四二年二月以來以草成社會安全計劃報告並聲全世界的威廉·貝維里治博士 *W. B. Beveridge* 以及新進化論家與社會理論家尤里安·赫胥黎博士 *Julian S. Huxley* 所發揮，等等對於自由，可以說已經有了一種大體一致的見解。這種見解，就我所看到的，當以英國國會議員兼政治學家兼倫敦大學 *H. C. Gray* 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的「自由之條件」*The Conditions of Liberty* 中論及倫敦大學出版「自由與組織」項。

十二先令六片士）裏所講的，為最詳盡，最透澈，最有條理。

據我所見，這套今日大體一致的新自由理論，其最重要處，至少可以分為兩項。第一項就是：除了政治自由以外，還要經濟自由；沒有經濟自由，則政治自由雖有也是空的。因此不虞乏的自由為今日人所最注意。因此全部有業的問題為今日人所最注意。這也就是所謂「窮人不是自由人」（羅斯福常引語）。第二項是在自由上分別消極積極兩方面。在這一層上，就我所知，就以嘉爾教授書中講得最為斬截乾脆。照他所引的話說（頁三〇），自由的消極看法，是「不要管我」*let me alone*。這是不夠的，這是不行的，這只有養尊處優的人或「有」的人，即富有的人，才可以說。至於別的人所要的自由乃是「給我機會」*give me a chance*。因此他說，「假使自由要恢復其意義，必須重界說為差不多像一極大社會與經濟的機會」一樣的說法。其實自由這兩說，深一層看來，也并非根本背反。解到最後，自會見其相通。所以我在去秋所寫的「第一民主原則」裏已經說過：「所謂自由并不只是讓人人隨便，讓人人解脫一切要不得的情事，就像貝維里治的五惡（窮，病，愚，餓，閒），以及憂愁，危險，或如羅斯福所說的「匱乏與恐懼」等等。而且更要給人人以機會，使得人人都能盡其地發展發揮其才其力其業。」——推到極處，兩解本也並無二致。

把這自由的新說應用到今日中國，那就不能不先認識中國的國情實況，那就不能不承認現在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政治經濟所影響的許多方面，比諸歐美一些國家，實在太落後了。因此在今日中國固然要經濟自由，也同樣要政治自由，固然要經濟自由，也不能不要消極的自由，甚至起碼的身體

居住職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學習研究選舉自由。現在講自由，要講到圓滿，更不能不如我在「民主原則」篇中所說的，要「人人自由」。因為要人人都得自由，當然不許有壓迫自由，侵略自由，掠奪自由，剝削自由，欺騙自由，以至賺錢自由，傳染自由，等等。

自由是民主的精髓。要實現民主，必須保障自由，這所須保障的自由，確乎不止消極的自由，而尤在於積極的自由，尤在於自由的機會。尤其就是我在「民主原則」中重重說道的「使得人人都能盡量地發展發揮其才其力其業」，「使得一切人力都發展到，施展到可能的最高峯」，「使一切人所潛藏的才幹可能都得到最圓滿的發展實現」——這就是今日所謂民主的根本精義之所在。

民主自由的這個意思，我現在願意更系統分析地綜合條舉如下。這就是：充分運用一切現代科學方法與工藝技術直接間接所造成的一切可能與機會，而一，把一切人或羣己的才力都發展到最高處；二，把一切人已有的或已發展成的才力都使用到至盡處；三，使一切人對於他所屬的團體或所担负的任務，都得盡其最大的可能，作其最善的努力，而使一切「止於至善」。這樣解說的自由可以叫作發展的自由。這樣的對於民主自由的解說方才合於今日唯一的活的實在的進步的科學的人生觀或人生理想，也就是我近年常說的遂生、大生、羣生的人生觀或人生理想。（注二）

關於民主自由的這個意思，英國有一位已故的麥道渥先生（Arthur Sydney McDowall, 1877-1933）有過一本遺著「一個超脫的觀察者：給文與札記」（A Detached Observer: Essays and Sketches. 麥道渥夫人編輯。一九三四倫敦牛津）

學出版部出版。一九加二八四頁。價八先令六片士，其中會說，「民主因為堅持一切人都應有把自己弄到最好處的機會，在人類進步上實劃了一個主要階段」；又說，「自由在最後解析之下，不僅在沒有束縛，而且在每人都有為個人的好處而發展的機會」。這與我所說簡直若合符節。

當然這也不只是一二人的意思。蘇聯的民主正是在實踐上向這方面發展。而且在這地方，今日世界新思潮，與往日中國舊思想，竟也有點兒合了拍。中國顯然從沒行過民主政治。至於中國有沒有過民主思想，民主精神，那就要看怎樣解釋。講理性或講情理，要商量，重恕道或忠恕之道，這都是民主的根本。但是像大家常常稱道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以至「民為貴，社稷次之」，雖然都有個民主字，却只是接近民主思想，夠不上說是民主思想。（前四句可說是與民主相同的人本思想。）因為民主乃是嚴格的民為主，主權在民。不但「對人民」To the people。定不是民主，就是「為人民」For the people。也夠不上是民主。民主一定是「由人民」而且「盡人民」By the people and from the people。斷章取義講來，倒是舊經說稱伊尹作的成有一德篇最後兩句話大合乎今日的民主的意思。那就是說：「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這大概是民主而學最初的聯用，而恰恰也正是最新的意思。雖然原文所謂民是指的民的主，而非指的人民為主。（以而威爾遜也談過和極自由，就是圓滿發展的意思。）但是怎麼樣才能實現民主自由的這種發展的意思呢？怎麼樣才能使得男女老幼人人都得自盡其才力共舉其大功呢？這就牽連到組織上來了。我深信，沒有組織或組織不善，是不能保

障人人自由的，尤其不能保障人人這種發展的自由，尤其不能給人人以這種發展的自由的機會。組織不是束縛或阻礙自由的，組織正是要保障或發展自由的。一個亂七八糟的社會必不會使得人人都自由。善良的組織一定：一，使其分子的才能都得到圓滿的發展；二，使其分子的力量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三，一定更凡可以利用的力量（人與物）都不憚於利用。要作到這些，一層就是所謂知人善任，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書經皋陶謨）。也就是把人人都擺在他最適當的地位，使人人都作他能作的事，而且也不憚於所謂楚材晉用，以至於外舉不避仇。善良的組織也就是善於動員的組織。這樣的組織是怎樣的呢？假使不嫌兜圈子的話，未嘗不可以說，這樣的組織就正是民主的組織；就正是天下為公的組織；就正是凡是天下的利器都不憚取而利用之，而且使利器日多日利，能利用之的人也日多日精的組織。這豈不正是今日中國之所最需？假使中國有這樣的組織，中國問題簡直可以再不成問題。

要作到這個，當然不易。你看中國那個組織，那種活動，已能作到這個？以人而論，要作這個，必須大量，必須遠觀，必須有理性，必須大智、大仁、大勇。不幸歷來中國的文人以及今日的知識分子，頂多也只是善於自用，而不善於用人。但是善於組織的人一定就是善於用物用人的人。今日中國實在正需要多些有些這樣的人。中國今日實在最最需要組織家。中國今日也需要大政治家，大軍是家。可是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其實也就是大組織家。只有大組織家乃能不開置人力，乃能不糟塌人才，乃能使人無廢人，也物無廢物，事無廢事。

但要長期作到這個，實在不在人，而在組織，在設計，在配合，在分工合作，在腳踏實地辦事。是在活而脈絡相通息息

相關。也在有好的組織法，好的組織傳統。因此，開創的大組織家應該作一個好榜樣，養成一種好風習，打下一個好傳統的基礎。治人是一時的，偶然的。必有治法，乃能必治，乃能久治。

在人又怎能作到大組織家呢？一個必要條件，那就仍是必須有理性，必須有站在崇闊的感情上的理性，而天下為公。必須他重新採取一個觀點，以民主為觀點；重新採取一個立場，以國家民族或人民為立場。更要確證是他為人作事，而非他利用人為他作事。要實在，勿欺人以口給，那自更不待重證。

（注一）羅素新近在一篇以「一個大國裏的公民資格」為題的文字（美國「福氣」雜誌去年十二月號所載）開端曾說：「一個大國在行動上與在行動上一樣完全是有德君子，世界，當是一個頑固世界，大概沒有偉大的成就。聖人是一種本可以犯惡的人；天才人是一種本可以發憤的人。所以，多少的原始野性，人人都喜歡保存。問題是：人能夠把它保存多少而不引起社會災難？尤其是，現在的政治經濟制度能夠把它容忍多少？」又說：「在荒野裏，可以靜靜地站着，一隻鷹，可是假使你在紐約這樣子，很快就會聚集一羣沒法管束的羣衆，搶佔交通。因此警察不得不有力量使你向前走，雖然靜靜地站着望天本身並沒有什麼不道德」。這些話都仍然是講的羣已問題。

在那篇文字的末後，羅素先生又有一段鄭重自白的話說：「就我而論，我是保留舊派自由主義者的嗜好與成見的。我喜歡民主，我喜歡個人自由，我喜歡文化。我不喜歡看見無限制專制的官吏需要干涉私生活；我不喜歡看見創新的

思想被選策的多數人的專斷所無數。我不喜歡迫害，不管是多數人的還是少數人的。我不放心政府。不信賴政客；可是但當必須有政府時，我就願意它是民主的。這些，我說，都是我的成見；可是容許成見裁制一個人的意見，却是危險的。這也大可以資參考。以羅素先生的坦白真誠與多事的一生，更以其非常的富於實在感與幽默感，與一枝生花妙筆，文字既簡潔透亮而又多纖而韻，他的自傳久已是世界上許多人都期待著的一本一定絕無趣味的書，從他這二十多年許多著作裏已經時有的自傳的話，以及這一段，都可以看得出。

羅素確已老了，現在已經七十二歲（生一八七二）。但他一生是自由人，是自由的鬥士，是自由思想家。在擁護自由上，在主張民主上，在鼓吹科學法上，在顯揚理性上，在反斥法西斯上，實在還沒有像他那樣果敢而堅貞的。

當然，在許多地方，羅素都是先覺。例如解脫恐懼，今日已列為四種主要自由之一。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羅素就寫過一個小冊子叫作「恐懼——戰爭的原因」，而沒有多少應聲。

×

×

×

一半由於蘇聯的科學的設計（或說科學的計劃化Planning of science）的成功，英國科學家近年對於科學的設計，科學的組織與科學的自由關係，也頗有所論列了。去年一月底在倫敦舉行過兩天熱烈的專討論「科學的設計」的會議，為少壯的「科學工作者聯合會」所召集。倫敦大學有一位極前邁極有成就的少壯物理學家柏納爾教授J. D. Bernal（生一九〇一年），年來在蒙巴頓勳爵的聯合作戰部幫忙的，在

前年在倫敦創刊的一個叫作「努力」Endeavour的新科學季刊第三期通訊欄裏，關於這個問題曾表示說，科學的組織需要操在老少科學家們自己的手裏；只有這樣的民主組織才能保障科學的實在自由，這不但包括發見的自由，并包括看見發見被應用的自由。又說，自由社會不能沒組織，自由科學也不能。

英國最重要的推進科學的團體是大英科學推進聯合會（一八三一成立。簡稱「大英聯合會」）。由於見到科學的社會職分，由於現代科學與社會的關係與國際交流的潮流，一九三八年九月初在劍橋集會時成立了一個半獨立的組織「科學之社會與國際關係部」，大戰以來特別發生了作用。由於它，大英聯合會曾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在倫敦皇家學社講堂召開過一個有二十二國人參加的國際會議，一個表示科學與治國之道第一次公開合流的會議，在所謂「全部人類歷史裏最大的社會革命正在前進中」的時候，討論有關「科學與世界秩序」的問題。會議共分為六次。第一次講「科學與政府」，第二次「科學與人類需要」，第三次「科學與世界設計」，第四次「科學與戰後救濟」，第五次「科學與工藝進步」，第六次「科學與世界心」。會議記錄已由大英聯合會在一九四二一月發表在該會的李刊報告「科學的推進」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卷第五號裏）。英國有名的前進的科學作家柯樂茲J. G. Crowther與大英聯合會秘書霍華茲博士O. J. R. Howarth與里雷D. P. Riley三人曾取會議中所談的大部分，并加了些別的材料，編撰了一本很有重要意義的小冊，作為企鵝特種叢書的一本（ST 22）在一九四二秋出版，書題也就是「科學與世界秩序」。

(Science and World Order。企鵝叢書書店出版。一四二頁。價九片士)。在其中關於科學與政府的部分，敘述到柏納爾教授的議論，說：「因科學的推進，我們已而對着把我們的文明的全部加以設計的問題。……把文明加以設計，必須以對於個個公民都給以人人都非常欲望的那種不匱乏的自由與安全為目的。為這個目的必須把科學自己已也加以設計，如果它要成為那個文明的建築者們手裏的一件有宏效的工具。……照柏納爾教授的說法，人民是不能命令去思想的。如果把科學加以設計，必須在一種主要是自願而合作的基礎上，在科學家們自己的有效的管轄下。建設起一種明白保障自由支持個人鼓勵創意的柔性組織，乃能得到人類知識資源的充分利用」。又接說：「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極大地利用社會與個人的本身能力，而這個的必須條件就是對於一切人都供給以最好的生理的與社會的環境。除非一切科學家與一切非科學家同樣在為這個目的而工作，人類將永遠在彼此衝突之中」。

倫敦大學何登教授 J. B. S. Haldane (生一八九二) 是今日英國一位最前進最活躍最淵博最有成就的數理生物家，既是偉大的發見家也是最好的敘述家，作英共機關「工人日報」的編輯委員會主席已經多年，更多年來每周或每兩周為該報寫一段新的通俗科學文字。這本書「科學與世界秩序」講到他在會議裏關於科學與設計的議論，曾說：「在蘇聯科學乃是政府一個不可缺的部分，科學所含蘊的設計乃是蘇聯那種形式的民主政府不可開的」。又說：「在蘇聯科學乃是政府一個不可缺的部分，科學所含蘊的設計乃是蘇聯那種形式的民主政府不可開的」。又說：「在蘇聯科學乃是政府一個不可缺的部分，科學所含蘊的設計乃是蘇聯那種形式的民主政府不可開的」。

二會得諾貝爾獎金)，在這個會議裏也說到「科學設計與藉助科學的設計都是我們所欣期；不過，可以達到什麼新秩序的設計乃是適于我們的傳統自由的」。

自從一九四〇以來大英科學推進聯合會的會長與其社會與國際關係部首任以及現任的主席就是理查·格列高里爵士 Sir Richard Gregory，今年一月二十九剛過了八十一生日(生一八六四)。他可說是英國一位極有聲望的科學教育家。他本是弄天文的。也曾作過大學教授。他曾與倫敦出版的世界上最好的科學周刊「自然界」Nature。有過四十五年的關係。從一八九三起即任該刊助編，至一九一九遷為主編，直到一九三八年年底，七十五歲時乃辭去。告別書中曾講到他個人的人生哲學，表示他深信，科學進步及其對於人事的應用對於人類將來的意義。因他對科學有顯著的功勞，一九三三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在一九三九九月初歐戰初起時選為大英聯合會次年的會長。一九四一他還出過一本很優美很有趣的小書「英國科學家」(British Scientists。倫敦科林士書店出版。四八頁。有精圖。價四先令六片士)。

不管戰時怎樣困難，大英聯合會仍能由其社會與國際關係部不斷舉行小規模的會議，大半是由於理查·格列高里爵士所領導。關係部的創立本也主要是由於他的力量。在他提議舉行的這個「科學與世界秩序」會議，第一次會也是由他主席。他的開會辭裏有一段話：「科學與世界秩序」小冊中曾引來作全書的總結。其間有幾句確是極可以記取，這就是說：「科學本身就是一個共和國，一個沒有社會的，種族的，或地理的分別的共和國。它的原則是真正民主的。可以名為一切自由民族的科學原則的就是科學的解放，表示的自

由「發展的機會」這些都是科學的基礎原則，這些都是一切國家的自由公民所要求應有的原則」。

「那次會議實是大戰以來第一次使得各國的科學人士得以聚在一起，自由無礙地討論他們對於戰爭以及戰後情勢的關係。因這個適當的機會，遂由蘇列高里會長宣布了「科學的朋從之誼」的七條簡單而有力的原則（也稱「科學原則宣言」）。第一條說：『學習的自由，教課的機會以及了解的力量，都是擴充知識所必需；我們，以科學人士的資格，主張這些不能被犧牲了而不至貶損人生的地位』。第四條說：『服務科學需要獨立與合作結合；它的結構是為人類進步的需要所影響的』。第七條說：『進行科學研究要求完全的知識自由與無限的國際知識交換；只有由文明生活的無桎梏的發展，它乃能繁榮茂盛』。

所有以上所錄這些話，同樣可以供現在的參攷。

（注二）相反所以相成，相反的相成所以總是好的，乃在相反的乃是一個整東西的不同的方面，不可相缺的方面。要解決矛盾，對立，相反，先要通，要了解全與分的不同而相關，以相反的為分而觀其所屬的全，而觀其會通。於是必須靈活，要周，要實在，要解析，要弄清楚；要看客觀實在的需要，社會實踐的可能，要注意到意義，解釋，範圍；更要留心於脈絡，關聯，變化，發展。

「科學與世界秩序」小書中在其講「培養科學精神」的那個第二章的末一節也講到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自由與權威，設計與創意的衝突，稱為現代的些大問題之一。因為這個問題，遂由近年（一九三三以來）逃亡到英國講學的前德國哥廷根大學理論物理大師波倫教授 Max Born（生一八八

二）。一九三六以來任愛丁堡大學自然哲學教授）的話講到科學理論與實驗物理大師波爾教授 Niels Bohr（生一八八五）。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近年曾提出「相成原理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以解決物理學裏三百年解決不了的一種爭執。就是對於光的兩種解釋，或以為原子的流，或以為波動的串。一向物理家們認為不相容，總想證明此是而彼非。今日乃知道，為羣狀同一現象的兩個不同的方面，兩種理論都是必要的。兩種理論都只是互補上自圓的一種新理論的「極限例子」，適于羣狀現象的特殊方面者。也可以說是講同一故事的兩種不同的言語，并不是矛盾的，而乃是相成的。因此，「科學與世界秩序」承接說，「這個相成原理可能會使人能以處理自由與權威，設計與創意，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間的些衝突，從一個較寬較高的看法」。

在「科學與世界秩序」的同一章裏先曾述及一位最對中國有興趣的最博學多產的少壯胚胎學家尼丹博士 Joseph Needham（生一九〇〇）。劍橋大學生物化學讀師。現來中國已一年半，在會議中曾證明對於中國文化有知識有如何深厚實際的認識；對孔子自然主義的倫理并大加讚揚，稱為「久在科學之前已經是科學的」；又指出「浪漫的與理性的在中國文化裏已成功地揉為一體」。這也是一個相反相成的例子。關於上項衝突的解決，據述，尼丹博士曾引科學自己的舉措為可以遵循的範型。科學「也許就是人類活動的唯一型式，在其中可以找出解決自由與權威間的衝突的引線的」。科學更還充分有實踐的權威，但也同樣有自由。科學的世界觀對於行動給人以有權威的知識，可是又總許人可以盡量利用。波倫教授於此舉例「對於科學與社會生活中的

位分有兩種對照的理論」。一種以科學為社會環境的結果，為社會需要所產生，所指導；其保證首在拿得出統制自然力與累富積強的方法。另一種偏重個人方面，以科學為吸引人的名貴的，悅人甚至使人興奮的消遣；其目的首在滿足以這種玩好為樂的人。波倫教授說他既是一個理論物理學者，並不很為這種矛盾所煩惱。于是提到波倫教授曾提出相成原理來處理物理學裏一個相似的矛盾，就是前邊所說。

「科學與世界秩序」小冊在前一層下還會接着講到特別由生物學研究而見到的自然界以及社會裏的進化進步的過程，說，「通過所有這些當中的唯一指導線索就是組織的增加與發展」。

（注一）英國現在有兩位同樣年輩同值得注意同極進步活躍有創關成就的青年遺傳家，同樣關切科學的社會關係。一位偏于植物方面，就是達陵頓博士 C. D. Darlington（生一九〇三。科學博士，哲學博士。皇家學會會員。倫敦約翰·殷奈斯園藝研究院院長）。一位偏于動物方面，就是華丁頓博士 C. H. Waddington（生一九〇五。科學博士。劍橋大學動物學講師）。關於達陵頓博士，一九四〇復刊復革新的科學月刊「發見」Discovery 去年九月號裏有過一篇記載。華丁頓博士則在一九四一九月六日的「自然界」周刊上發表過一篇講「科學與倫理間的關係」的文字，曾引起了多方面的最熱烈的討論。一部分結果已由他編成一本書，就題為「科學與倫理」(Science and Ethics. 一九四二年初倫敦 Allen and Unwin 書店出版。一四四頁。價七先令六片士)，也極被重視。照此看來晚一輩頭腦最清楚而劍橋解放派哲學家博克頓博士 C. D. Brock（生一九八七。劍橋大學道德哲

學教授）所說的，華丁頓理論的中心就是：「一個倫理信念，如果傾向於，或者（1）在社會關係上把變化弄得更進一步，向着過去已極優越地遵循過的方向，或者（2）防止社會關係向着支離的方向變化，或轉回已經遵循過的路程上的早期階段，它就是對的。如果傾向於在社會關係上弄成些變化，離開或反轉這類的變化過去已極優越地遵循過的路向者，那就是不對的」。又由他所作且自認為很必要的一「好本身」與「作成好的特徵」的分別，說，「那個理論似乎就是：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作成好的特徵，即，支持或推進人類社會關係的進化的趨向」。華丁頓自己所說乃是：「一個倫理系統的職分是為人類進化的過程作介」，并因而把「對于整個人類有普遍效力的倫理系統」界說為「在指導整個人類上實際上已經有效的那種倫理系統」。參看「亞里士多德學會紀錄」，一九四二出版的新四十二卷，六五至一〇〇又一〇〇A至一〇〇H頁，關於華丁頓博士的問題的彙論。哲學季刊「心」一九四三七月號對華丁頓書并有長篇評論。「哲學」同年同月號也有一篇無甚意義的短評。

在一九四一華丁頓博士先已出了（一九四二重印）一本也很有意義的小書「科學態度」(The Scientific Attitude. 企鵝小叢書中的一本) A八四。企鵝叢書書店出版。一三八頁。價九片士。會說：「文化工作者真正的任務，或至少最重要的任務，就在把可以由充分發掘直接實際的些可能而得的精神富藏，顯現於人」。又說：「技術知識的狀態，與社會力的平衡，給人以其機會。把這種機會弄到最好處，那就要靠人自己」。又說：「科學能對人類行為下倫理判斷；根據科學態度的，或鼓勵它的就是好的，愚弄或否認它的，就

那個範圍說，就是壞的。」（這本可讀的小書在其後半講「科學會作什麼」的一章中，也曾特別加重地說，科學會解決自由與秩序間的矛盾。）

尤里安·赫胥黎博士（生一八八〇年）。前倫敦大學動物學教授，皇家學社生理學教授（近年也活躍異常，也把科學問題與一般社會問題聯繫為一體。對於民生也有極精闢的議論。一九四二秋初曾出過（去年已再版）一本極得好評的大著「進化：現代的綜合」（*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倫敦Allen and Unwin書店出版。六四五頁。價二十五先令。）在去年六月十一為紀念他祖父（H. 赫胥黎）那個有名講演「進化與倫理」（即嚴幾道譯的「天演論」）的五十周年，又作了一個同類的并同樣重要的講演，叫作「進化的倫理」（*Evolutionary Ethics*，同年十一月倫敦牛津大學出版。八十四頁。價二先令）。他把「進化的進步」界說

為「獲得較高程度的組織而不對更進一步的前進開門的能力」。由是進一步指出由進化與道德的結合而產生的進化倫理的三個主要原則：「在進化上實現日新的可能，特別可注意的是那些為其自己的緣故而被珍視的可能，這就是對的；既重視人民的個性又鼓勵其最充分的發展，這就是對的；為更進一步的社會進化建設一個機構，由此把先舉的那兩條件儘可能充分地，有效率地，迅速地滿足，這就是對的」。這是他對華丁頓博士所問作「倫理判斷對出一個知識基礎的古老努力」的答復，也就是嘗試當代奇人創橋大學哲學教授維持根什坦博士Ludwig Wittgenstein所稱為「可怕的營生」，可怕得談起來頂多只能吃吃的，對於倫理上的對錯尋找一個客觀的標準那件事，所得的結果。（參看「自然界」周刊今年一月二十二日號書評。）

這都是正切現在論題的立論。

中華民族和南洋民族

張禮千

黑白本由人定，是非常無標準，可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是相傳已久的俗諺，旅渝兩年餘更覺這話的親切，真是經驗之談，所以我寫本文的目的，既不是和人家辯論，也不是批評，僅僅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淺見，寫出來給留心這問題者的參考罷了。

最近讀到三月十五日出版的三民主義半月刊（四卷六期），內有好幾篇關於中華民族和南洋民族的文章，讀後獲得新知不少，英國旅渝新聞記者，爲了此事，報告倫敦，說中國人很關心南洋的民族，馬來人是中華民族十大宗族之一。倫敦方面對此問題注意與否，現尙不知，據余推測，英法荷蘭的南洋學者，對南洋民族均有深刻研究，倘使我們根據歷史語文人種等去研究南洋民族，別有創見，歐洲學者也許是歡迎的，否則將不免視爲含有作用的宣傳。好久以前，日本人盛創源出馬來之說，這與說成吉思汗是日本人一樣的滑稽，但是日人含有巫人（馬來人）的血液，是一部份學者所相信的，至中巫兩民族同源之說，我讀了上述的半月刊後方才知，可是所提證據頗有商榷餘地，爰將淺見，舉要述之。

該刊中之馬來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係一文，曾再三提及馬來（Malay）是希馬拉雅（Himalaya）的縮音，由是斷定馬來之名來自希馬拉雅無疑，且說「馬來」是梵文，真是奇談，我人任檢何種梵文辭典，斷難尋出 Malay 一字，因爲此字是歐洲人到了南洋後從 Malayu 一字逐漸演變而來的，荷語之 Ma-

leisch，法語之 Malais，其意盡同，所以 Malay 已是十足英化的字了，而 Malayu 一字，或說巫語，或說坦密爾語，巫人巫語巫地均可用此字表之，又可解作「山市」，此因巫人之鄉村市集大都依山旁水建立的緣故，華僑譯稱巫來由，千餘年前譯稱摩羅遊或末羅遊或末羅瑜，這在唐代載籍中時常著錄的。至 Himalaya 是由 Hima 和 alaya 二梵文合成，前者解作雪，後者解作住，合之就是積雪的意思，所以英文 Himalaya mounts 譯做雪山，正是此理。照這樣看「馬來」與「希馬拉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吾人把一個字，殺頭割尾，轉成另一字，假使合乎兩種條件，也是可以的。其一，這兩字的音義可轉輾相通，其二源流相同，如 Sphatika（梵文，水晶）之變爲 Pat（梵文、巫文、物之最精良部分），再變爲 Poti（巫文、金鋼鑽層），即其一例（本節所論，讀者可閱 Macdonell 之實用梵文字典，牛津大字典及英巫巫英大字典等）。

在印度方面，和 Malay 形似實非的字，其數不少，南印度西岸，有一大山，名 Malaya 玄奘譯稱秣刺邪，以產梅樹著名。Malaya 日人爲達羅尼茶（依玄奘譯名）民族之一，移殖於新嘉坡一地者即有四千餘，諸位看，這兩個字豈不是同一「馬來」更像麼？但是該文的作者定說馬來是希馬拉雅的縮音，其理安在呢？這因爲他要把中華民族和馬來民族同發源于中亞崑崙的緣故。他的意思，馬來民族是由崑崙山移至希馬拉雅山及恆河以東之地，然後再移至中南半島和馬來半島的，於是他們

用原住地域的名以稱其種族的名了，所以南洋有種種崑崙的名稱，就是這個道理。關於馬來民族的起源，至今尚無定論，我人可置勿談，惟中亞之崑崙和南海之崑崙究竟有沒有關係，是不可不稍加說明的。

崑崙是純粹的中文名詞，在南海方言中絕對無此。僅有與崑崙聲音類似之官名地名，則隨時隨地不難遇到，此種情形，今昔皆同，此所以晉唐時往來南海之僧人用彼等所熟知之中亞崑崙轉成南海崑崙之惟一理由也。十九世紀初，英人雷佛士率三船，泊于新嘉坡南面之兩個小島，該島巫人呼為 *Sakijang*，英人聽不清楚，譯稱 *St. John*，南海崑崙的來歷，亦不過如此而已，試問與中亞的崑崙有什麼關係呢？現將南海崑崙之重要事實，或為法人費那所未嘗注意者，撮要述之于後。

在晉書卷三二孝武文李太后傳中，有下列幾句話：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這也許是南海崑崙最早的著錄，到了唐朝，崑崙之名，盛極一時，或詠于詩，或著于文，然以慧琳一切經音義中之解釋最為透澈，其詞曰：崑崙語，上音昆、下音論、時俗語便亦作骨論，南海州島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馴伏猛獸犀象等，種類數般，有僧祇，突彌、骨堂、閻蔑等，皆鄙賤人也。按僧祇為大食語 *Negri* 之對音，泛指大黑人，突彌即南印度之坦密爾人 *Tamil*，閻蔑即居于湄公河下游之吉蔑人，保達羅毗茶民族之支庶，除骨堂一名現尚不明外，此等黑人均非馬來民族，這是必須注意的。在唐代載籍中，凡是涉及崑崙的，不曰頭捲體黑，就說捲髮黑身，這是崑崙人一致的象徵，那末南洋有沒有這種民族呢？吾人用直覺的觀察，知道開化的馬來民族是髮不捲，體不黑的，自然不能算做崑崙，惟有在南洋到處可見的吉甯人，就是坦密

爾人，也就是達羅毗茶民族的一系，是膚如黑炭，髮不卷而微虬的，這或許是崑崙了，還有在乾隆年間王大海所著之海島逸誌中，記有兩種民族，可說與崑崙一般無二，其一是鬚髮人，他說狀如夜叉，渾身漆黑，毛髮螺拳如艾。其二是西蘭人，亦稱烏鬼仔，其狀深目高嘴，口闊至耳、皮黑毛捲，赤身露體。這種醜惡的人，是否與馬來民族有關，現無確切證據，就廣義言，也許是屬於巫來由波里尼細亞系的民族。至于暴暴，應是 *Poppo* 西蘭即是 *Ceese*，這是摩鹿加羣島中的兩個小島，此外濟魯魯，蘭那底，帝陀爾，峇漳等島的土著，均與此相類，而此等土著的首領名曰 *Kolono*，這就是崑崙或骨論一名所自出，余或敢自信的。又十世紀時大食人所說之 *Mundrang* 海，是指介于馬來半島與婆羅洲間之海，唐代崑崙之名或出於是，亦極可能。依余淺見，南海崑崙之來源有二，即 *Kolano* 或 *Mundrang* 是：（關於 *Poilo Condore* 耶譯為崑崙山：乃係宋後之事，此在不談），所指之崑崙人亦有二，即摩鹿加羣島的土著或吉寧人是，若說南海之崑崙來是中亞之崑崙，是與馬來之為希馬拉耶之縮音，恐同一令人與舊之奇談罷，試再就南洋民族作一簡單的敘述。

世界上人種和語言最複雜的區域，恐怕要算南洋了，菲律賓就有五十餘種族，七十四種語言，東印度之民族，調查似尚未完盡，據吾人現在所已知的也有六十餘種，語言稱是。馬來亞大別之為五種族，即尼格列都人，沙蓋人，皮仙仙人雅貢人或稱原始巫人，及開化之巫人是，實際尚不止此，中南半島的民族也很複雜，其中確與中華民族有關係的，為越南之安南人，牢人，暹羅之泰族漢蠻，緬甸之喀等（就是現在報上常見的由頭人，親山，瓦人，華人，緬人等是，此外尚有少數民族，

不能盡述，而越南之古人則屬巫來由波里尼細亞種，這個民族，於西元二世紀末曾建國於安南，名曰占婆，其開國之君名毗連，或稱毗達，有不少近人都認他是華人，然據法人馬司昂羅根據 Vo-Cam 碑文的考證，謂中國載籍中之區達，就是碑文中之 Shi Mats (讀者可查一九一〇年之通報)。則區達非華人明甚。又繁殖於伊洛底江及湄公河下游間之吉籠人和得得楞子(或稱蒙人)，則係南印度民族之後裔，所以此等民族自難置於中國民族之列了。至于馬來民族則可就廣狹二義來說，就狹義言，僅指馬來半島之馬來人(巫人)，就廣義言，則凡能說巫來由語，或語言雖不全同，而語源出於同系的(如非語之 β 與巫語之 β 其語系同，義均作黑)，那末都是馬來民族。這一事實，吾人可以馬來之歷年戶口冊為證也。在戶口冊中，凡是馬來人，爪哇人爪哇北干人都陽人(Boyanese)，是爪哇海中 Babend 島之土著)亞齊人，拔查人，明南加保人，骨林子，占碑人，巨港人，廖龍牙人，馬辰人，舞古子，狄雅克人，菲律賓人等，統稱馬來細亞人，質言之即廣義的馬來民族。現在我要想追究的，這種馬來民族究自何處來乎？據歐洲學者之一般見解，謂來自中國之貴州和雲南，可是沒有充分確切的證據。所以，以我人現在所以的知識，要解決馬來民族之

起源問題，恐為時尚早能。

歐洲是有民族問題的區域，所以小國林立戰爭頻仍。印度自有史以來，未嘗統一，也是因為民族問題。一雅利安人和一達羅毗荼人站在一氣，就是三尺孩提，也知道他們的差異，南洋未經歐美分治以前或分治行政治未上軌道以前，部落之多，殺伐之烈(小規模的)識者皆知。美國也是有民族問題的國家，可是因為政治的公平，民主的發揚，所以一千萬黑人願為羅斯福總統四次競選的後盾。日本之強，其國內沒有民族問題是主要因素之一。中國分久必合，終能統一，也是因為沒有民族問題。滿蒙雖曾入主中原，結果終受漢化。我想，我們現在的立場，最好不必太唱高調，免得人家發生懷疑，免得引起民族糾紛，所以把整個的南洋民族廁於中華民族之列，是一種不智的念頭。我中華民族有悠久優越的文化，是世人週知的，南洋民族的文化比較居後，是無可諱言的，以先知覺後知，這才是我們的責任，同時，我們對南洋各色的民族以及印度民族，作精深詳盡研究，去實地考察與調查，這才是有益于全世界民族的工作。

附註：凡較普通之專名，不附洋文。

三、五、二五、滄

如何處置戰後德國？

Paul Harfen 著
教生譯

以下譯文乃從保爾海根所著「德國是否將潰敗」一書之最後一章中摘出。保爾海根爲一奧人之筆名，彼歷年來從事於對希特勒政權之秘密地下工作。德國青年之反對納粹者，曾組織一團體，名「新開始」，(New Beginning)其宗旨爲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與發動德國國內之民主運動。該團體爲以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殘餘部分，在德國國內與國外，擁有相當勢力，保爾海根即爲該團體主要份子之一。彼所著之書，美國版出版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英國版於一九四三年二月，離今日已相隔一年有餘之久矣。世局變化極速，故其論據或已失真，但其對如何處置戰後德國之主張，則頗值得吾人玩味，用特彙譯以介紹於本刊讀者。

保爾海根認爲全體主義之希特勒政權，其內部不論如何困難，亦不致於崩潰，故惟有加以以外力，始可將其打倒，而最重要者無過於有一技巧之政治戰略，彼所建議處置德國方案，即根據此理由。但其態度較爲溫和，或非盟國方面堅持激烈主張之人士所喜聞者也。

至盟國間對於如何處置戰後德國之意見，亦並非完全一致者。莫斯科方面，則擬有一項分裂德國之冷靜計劃。蘇聯當局曾對波蘭表示，爲補償其讓與蘇聯之東疆起見，波蘭可取得東普魯士，波默蘭尼亞西部及高度工業化之上西利西亞，吾人須知蘇聯自經此次德國之慘痛攻擊後，其以後方針，自以防止未來德國之東進爲主旨，故除分裂德國及在東普魯

立國防地帶外，又決定根絕普魯士之貴冑制度，將軍人階級逐出波羅的海沿岸區域。至蘇聯所受之破壞與損失，則主張由德國勞工重建設之。

倫敦與華盛頓方面，雖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一再聲明，國社黨消滅之後，普魯士之軍國主義亦必須消滅，但英美兩國迄今尚未獲得一致之意見，則吾人可斷言者也，其原因或由於不能斷定蘇聯最終之計劃爲何之故。其一般的討論，咸不出於以下兩項基本見解：(一)設立長期的同盟國監督制度，期限爲十年至十五年，以防止德國再圖建立作戰機構，(二)分裂德國南部或西部之一小部份，配合蘇聯在東部之計劃，使普魯士(指德國)所餘之土地，不致再強大。但較爲具體與激烈者，則爲前英國外交部顧問范雪達爵士(Lord Vassilout)於今年正月在紐約時報上所提出之十二點：(一)無條件投降，以打破德國不敗之神話，(二)由盟國陸空軍佔領德國，並組織盟國統制委員會，(三)逮捕戰爭罪犯，並於犯罪之當地受審判，又通知中立國不可收留或隱藏彼等，(四)完全解除所有德國與其他軸心軍力之動員與武裝，(五)德國國內警察分爲數區域，無其中之管制並解除其軍事化，(六)取消所有軍事與半軍事之不論任何方式與任何年級之訓練；軍官團與訓練團當在取消之列，(七)撤退所有佔領之土地，(八)恢復或賠償所竊取或破壞之掠奪品，機器與設備等，所破壞之商業與工業利益，當亦

在賠償之列，（九）有效管制，如屬必要，甚或封鎖所有德國戰爭潛在力，包括各種航空在內，（十）不獲得盟國之許可，不准借款或幫助德國，（十一）學校及大學由盟國監督與指導，直至德國人民注入國際善意原則之後，（十二）德國無祿電與其他宣傳機構，由盟國監督。范氏不但認為德國軍人與大工業家，須加以消滅，使其不再成為政治勢力，且認為德國之左派亦不可靠，因德國社會主義者太多染上軍國主義之故也，總之范氏認為處置德國必須變徹底，以范氏之十二點與保爾海根之建議相較，其相去誠不可道里計矣。

據美國務卿赫爾言，彼出席莫斯科會議時，曾提出處置戰後德國計劃，但未經英蘇加以考慮，於此可見盟國間對此項問題之意見為如何之不一致矣。今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國時代週刊曾分析處置戰後德國之困難點如下：「如吾人不分裂德國，只想控制其內政，則必將引起重大問題。例如，德國是否能夠成立一強有力之政府，力能維繫一般痛苦與失望之民衆，同時又要充分溫順，使其能在盟方不派強大佔領軍駐德之情況下，施行同盟國之指示？代表各主要戰敗國之聯合監督力量，能否長期團結一致？如採取分區佔領與監督之方法，（即英國佔領其西部，蘇聯佔領其東部），其結果是否不發生分裂？但如吾人分裂德國，則亦將引起同樣重大之危機。例如將德國南部（巴伐利亞，瓦登堡，巴登），劃離德國，則彼等或將產生一項爆發性之意願，即希望重返祖國是也。德國南部或不能自存，須與奧地利聯合。但蘇聯或將反對天主教之巴伐利亞與天主教之奧地利聯合，而寧願將奧地利拉入捷克與波蘭之集團。至西部之德國人，即萊因區，薩

爾區以及魯爾河流域或將發利亞區，亦將不願獨立，（第一次大戰結束時，曾有一國共和國出現，但不久即消滅）。十九世紀俾斯麥之統一德國，以及近年來納粹黨消除所有國界之努力，或已得極大效果，故目前任何分裂德國之企圖，終將歸於失敗也。是故，同盟國之設計人員，應權且將德國之利害得失，與蘇聯具一致意見，一盤主要平衡力量之，不得失，或輕就重。彼等又必須考慮德國工業分派給同盟國之安全因素，因此對獨立國家與向外參加一非自耳比之經濟範圍，再審計此等分裂德國而成之小國要求賠償，則更屬困難也。最後，如蘇聯釋放其以前建立強大奧民主國之主張而贊成分裂德國之計劃，同盟國又須考慮如何對付蘇聯一項問題矣。」

由上觀之，如何處置戰後德國一問題，不但困難重重，且有關於後世界之全面和平，吾中國雖離歐洲較遠，或有不關痛癢之感，然世界和平不可分開，乃鐵的事實，是故吾人對處置問題亦不可不略加注意焉。保爾海根之建議，雖有可議論之處，但其溫和性與現實性，自有其價值之所在也。譯者附識。

盟國之利益與法西斯主義下之人民之利益，兩者間之衝突，是否不可克服耶？設計一解放計劃，同時亦顧及德國與意大利，是否不可能者耶？乃吾人今日之大問題也。

吾人如認為國與國間之利益衝突，為不可排除者，則吾人惟有接受法西斯主義與民族社會主義而已，因兩者雖令人厭惡，但不失為互相攻伐之有效制度也。易詞言之，如吾人認為世間有不可排除之衝突在，則吾人勢必擁護一與法西斯主義發生不解緣之計劃。其實，所謂國與國間不可排除之利益衝突，但

爲該等國家中特權階級間之利益衝突而已。而人類社會之所以貴爲人類社會者，乃在真正之衝突，每能以互相妥協之方法，而和平解決之。是故，建立一歐洲聯邦，以謀永久與和平解決歐洲之複雜問題，並非一不可能之事也。推而論之，建立一世界組織，以解決世界上所有各國間之問題，亦非屬一不可能之事也。

前言之歐洲聯邦，不但事屬可能，且已歷期過久矣。由於吾人生產力與技術之發達，吾人久已到達組織此次歐洲聯邦之境地，然而所以遲遲不能實現者，實因吾人心知方面落後於技術方面之進步遠甚，而毫無準備之故也。亦即道德與政治方面之落後，阻止吾人求得一永久和平之解決方案。蓋有數原因在焉。某等國家之政治落後，爲其原因之一。富於侵略性之法西斯主義，即爲此種落後之最顯著之表現。法西斯主義既不能解決吾人今日之問題，意即吾人永不能解決該等問題乎？吾人必曰不然。是故吾人應組織一歐洲國家之團體，以避免互相糾紛而不時戰爭之局面。欲達成此目的，各國固應作極大之讓步，然而其所付之代價，總比數十年來歷次戰爭所流之血汗爲便宜也。擊潰納粹後，惟獨聯合國始有資格建立一新世界，乃無可置疑之事也。然而彼等須具備堅決之意志與事前有所準備，始可勝任之。曾有人焉，認爲今日之困難更甚於昔日，此乃不可盡信也。蓋因此次戰爭已產生若干有利條件，使問題之解決較易於往昔任何時代。

有利條件之一爲歐洲人民現已更願於試驗新方法。今日歐洲除新愛國主義之外，又有一新現象在焉，即新容忍態度是也。在法西斯國家中，此種新容忍態度，其表現方法爲消極的，即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拒絕表示其瘋狂之熱誠。在聯合國人

民方面因缺乏此項熱誠，每誤認爲決心不堅。其實，在今日作戰之任何列強，無一能破壞此項人民之容忍態度。正確的瞭解，在將來謀進一步之變革中，已成爲一最重要之工具矣。此項容忍態度爲此次世界第二次大戰之特性，其所以產生之故，乃由於反對民族主義之偏狹性而起。換言之，認爲二十世紀之問題，不但可能且必需要以超民族之方法解決之。

二十世紀爲民族戰爭與民族解放之世紀也。民族解放之時代，在世界各部分迄今尙未完成，即以法西斯之反革命而論，亦隱藏其征伐目的於復興計劃，如所謂新秩序與其榮耀之後。據守舊派之意見，認爲吾人只要恢復舊時之道德標準或重反過去大思想家之倫理觀念，吾人於將來即足以建立一光明與健全之基礎，而避免重演今日之慘劇。但吾人不能完全贊同上項意見。因吾人深知，每一時代必須有其自身之社會組織，以表現其技術上之成熟。此次戰後之美國，蘇聯與英國之爲社會也，不但爲超民族之力量所組成，且惟有在現代政治與經濟之大單位下，始有其發展之可能。而在現世界中，其亟需一超民族之組織者，則莫甚於歐洲大陸是矣。今日之歐洲，爲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與上次世界大戰之殘餘遺物。歐洲在幾世紀來爲現代進步之中心，但現今則暗澹無光。其故乃在無政治機構，以適應現時代之需要也。

此項機構最主要之特徵，應爲完全改變歐洲大陸上舊時社團所有制之制度。納粹之掠奪經濟，業已使其根本改變矣。納粹推翻後，歸還各國掠奪來之財產或可使歐洲團結，倘在歸還時，一切措置之主旨，爲歐洲之共同利益打算，而不爲此等新的或舊的特權團體謀利。在戰爭中，納粹已建立若干大托拉斯，如戈德公司，如大陸油公司與化學工業托拉斯等等，採用

各種特殊偷竊之方法，在技術上統一若干歐洲國家之經濟。納粹趕走後，此項機構即可為歐洲計劃經濟之基礎。若不如此，惟圖恢復戰前狀態，則在重分配與管理此項財產時，勢必發生嚴重之新衝突。蓋由希特勒所征服之國家，不但被搶去公有財產，且亦奪去私有財產。納粹每利用佔領等費，購買地方工業，並將其併入德國公司或置於納粹管轄之下。

擊敗希特勒後，惟有兩種方法，以矯正納粹罪惡。或由解放國家儘其可能將其財產歸還舊主。不論人民如何堅決以民主方式處理，此項辦法亦必不能十全十美。私人之財產，如家室，農場，小商店等，或可物歸原主至社團或公司之財產，則可差別處理，但有若干工業，其東主已再易其手矣。且征服者以佔領費之公費所收買之私人企業，被佔領之國家是否亦可收為己不乎？另一辦法則為由歐洲國家收回納粹所集中之大財產，包括戰前德國邊疆內之財產，而置於一聯合管理機構之下。吾人須知，納粹擊敗後，吾人將立發現歐洲之交通，鐵路、航空，與重要工業，如鋼鐵、化學工業等，實較諸以往更易於聯合。以此等大工業與機構作為歐洲大陸復興之基礎，其收效不但甚宏，且甚易。是故將其置諸歐洲之大規模上，抑再度四分五裂，而為不合經濟原則之國家單位，其利弊與優劣何在，即三衣童子亦必知之也。

此不論吾人於擊敗納粹後，其過渡時期之理論與計劃為何如何，吾人可斷定至少在緊急與再建設之時期，其主要工作為供給歐洲諸國受難人民之飢寒。此項工作決不能單以恢復舊時之經濟秩序為限，而須考慮如何回到戰前之國際通貨與關稅體系，則新困難與絕不可能解決之問題勢必立將產生。於是時應由歐洲各國人民之新精神與新機關負責。

吾人甚難相信，德意兩國於潰敗後所興起之民主運動，願將此項未由勝利國取回之德意工業財產，歸之於私人的大獨佔企業與托拉斯之手。彼等深知，此等獨佔企業之頭腦，實為希特勒之主要擁護者。希特勒之得權，彼等應負其責。但如德義工業財產置於一歐洲聯合管理之下，則德義之新民主代表者，即可讓其參加該機構，而成為該機構之一份子。歐洲之舊地圖，從此面目一新，而歐洲亦將訂立同盟，組織一歐洲聯邦，以完成此項建設的經濟目的焉。

但同盟國在彼等之計劃中，並無此項歐洲聯邦之踪跡。

即在大西洋憲章中，亦避免提出此項問題。總之，全歐之聯邦，包括德國在內，尚未認為盟國官方戰爭目的之一。流亡政府代表，如捷克，如波蘭，所計劃之聯邦，實為區域的，雖有若干人曾主張組織一且耳其國家之聯邦，但其性質亦為區域的，是故此項聯邦僅為東歐之新名字而已。要之，此項制度仍維持舊時之民族國家。但吾人認為只包括，一部分歐洲，而德國拒絕在外。聯邦，決不足以解決問題也。再此項計劃之用意，乃在阻止將來之德國侵略，或希特勒主義之再版，然而實際上適成此事之再演耳。設計一歐洲計劃，而將德國除外，即可保證安全於一時，即可因而易於軍事統治，政治平衡或經濟制裁，然而歷史教訓吾人，此項計劃只能暫時收效，而其結果每演為戰禍。

吾人無庸斷言對於反對超安全之計劃，例如破壞德國之生產力，粉碎及沒收德國之工業或滅絕德國人民等等。此項性質之建議，雖曾有人提出，而為戈爾斯所利用，但聯合國負責當局並未認真加以考慮。此項建議乃情感上之反動物也，適足以幫助希特勒與墨格利尼團結國內。此項性質之理想，實屬一

種自殺。其安全之觀念，乃完全錯誤者也。因歷史上從未有戰一國或破壞其生活方法，而對勝利者有所裨益者。

關於如何保證將來之安全，尚有一錯誤之觀念在焉，即單方解除戰敗國之武裝，並使其孤立，成在其四圍圍以政治與軍事之安全地帶，或排除其於戰勝國之同盟之外。吾人可稱之為隔絕政策。如將此項政策付諸實施，不啻重演克里蒙梭之錯誤。此項隔絕政策之所以動人聽聞，其原因之一為不願與罪惡之國家，同流合汙。尚有一重要原因在，即小國對德國，心懷畏懼是焉。德國有七千萬至八千萬人口之衆，其活力與生產能力，亦驚人鉅大，即使解除武裝，在將來之歐洲聯邦中亦必能發生力量，而最後又以領袖自居矣。彼等認為如使德國加入聯邦，則德國終必再有一日再起而再戰也。

吾人若宜備以此項隔絕政策對待戰敗國，吾人可斷言，其對於削弱納粹在德國人民間之影響，毫無補益之可言。由是觀之，所謂隔絕政策，實為最浪費與最不安全之解決方法也。

然則最有效與最安全之解決方法為何耶？曰將德國與意大利組合於一歐洲聯邦之中是矣，所有歐洲國家之聯邦中，非日耳曼之國家，在人口與生產力方面，俱可佔適當之優勢。在民主的聯邦組織之下，代表進步勢力之權力平衡政策，可勝過於任何國家之優勢，例如德國。小國之部分的聯邦，可在大聯邦之內，獲得保護，不但此也，且獲得充分安全，以反抗大國集團之組成。部分的聯邦，若排除現在法西斯統治下之國家，則惟有產生對安全隔絕與對峙而已，反抗勢力必因之而起。但部份的聯邦，若隸屬於聯邦之一部份，則將成爲整個制度之有機部份。

將此項聯邦之民生的決定付諸實施，不僅依靠於道德因素

，且有賴於維護和平之機構與力量。苟每一歐洲國家在聯邦中成獲得相等之權利與相等之機會，則道德力量即可達到最高點，至政治與警衛之機構，固應有充分之力量，以阻止任何侵略者與和平破壞者，但由於現代武器之發展，此項機構之建立，已屬毫無困難之事矣。空中警察可控制歐洲大陸最遠之角落，且從政治與心理觀點上言之，空中控制不但爲最簡便者，且爲最優良之制度。此項戰事停止後，經濟必成爲最重要之事。在小國方面，不能恢復其軍事組織，因其需費浩大，財力有所不及，且亦不足以保衛其國家。而在大國方面，則不能長此繼續軍備。

更重要者爲政治與心理因素。戰後歐洲軍事與警衛安全之計劃，現時最受一般人接受者，爲單方解除該等破壞和平之國家之武裝。但余認為，除歐洲聯邦以外，甚難設想其他保證軍事安全之方法。關於實行武裝和平之費用，將由戰勝國中之大國或比國負擔。而戰勝國亦將要求有所賠償，因戰敗與解除武裝國家，對於武裝和平之維護，毫無貢獻也。單方面之解除武裝，必帶來新衝突之禍根。德國之軍閥與納粹黨徒，固曾去歲於此。但吾人決不可無視於以下之事實，即新民族主義者之報復主義，由於此項解除武裝，而又播下種子矣。單方面之解除武裝必造成一種特殊之國家，某國國家允許攜帶武器，而在另方面則又禁止某國攜帶武器。一倫敦某期刊曾對上述意見，有所變難，認爲作者主張解除納粹武裝，並主張德國軍隊之解除武裝，爲歐洲其他國同時解除武裝爲「條件」。作者認爲此項解釋之所以發生，必因讀此書者之心境有所不同之故。希特勒之軍隊，一如其政黨，必須完全摧毀，乃任何認真擁護對納粹德國作戰者所共認之公理。但作者所討論者，並非德國軍

事統治歐洲之工具之必須摧毀，而在吾人是否恢復舊時之歐洲，除禁止一國外，各國皆有軍隊，抑組織一歐洲聯邦，成立一國際軍力，在此組織中各國咸得其所。）

新的民族主義必因民族尊嚴，虛榮與安全情綜之激盪而興起。舉例言之，德意兩國之革命民主政黨，若主張德意自動服從於一國際制度，而該項制度不由戰勝國所領導，而由其所統治，則試問該黨如何能獲得青年一代之擁護？魏瑪共和之民主政治，其所以衰弱無力與最後傾落於法西斯主義之下，其理由或即在是。且亦以此為基礎，而得以建立報仇戰爭之宣傳，其初為一浪漫運動，終則由希特勒所運用。由是觀之，惟有成立一聯邦，始可解決此問題。除此以外，無其他方法以突破德國罪惡之循環。德國之戰爭份子曾被人擊敗，但每由和平份子償付其耗費，然而一俟稍有機會，此輩超戰爭份子又應時而出矣。德國之民主革命，初挫於一八一五年，再挫於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一八年又告中斷，而其結果為希特勒之勝利。不但德國如此而已，在希特勒十年前興起之墨梭里尼之意大利，亦何嘗不如此。而在其他國家中，亦在在可以證明反動勢力如何在民族恥辱之土地上發榮滋長。例如法國，於戰敗後，由拿破崙之浪漫主義執政一百日，其後三十年，由路易拿破崙執政二十年，在今日則由拉伐爾等執政矣。

若欲使今後歐洲之再建設，誠能從此奠立永久和平之基礎，則惟有使各國在道德上獲得完全平等之地位，如是之後，始能避免新危機之再起，亦即野心家無法以戰敗國為工具，而用以危害世界和平。國家有如個人，其最善良之療治法，為使病者能恢復其體力。吾人除請求各國各個負起責任以外，吾人不能獲得其現代繼承永久之解決方法，換而言之，除釋放全體以

外，世間無其他方法謀得最後之安全。一人人生而平等，國家亦豈非如此乎？

由歐洲聯邦所建立之安全機構，則不但保護此次戰爭被侵略之國家，且保證為希特勒與墨梭里尼所欺騙而用以破壞世界和平之德意人民，亦可獲得解放與康樂之生活。至於德意兩國中最真誠反對法西斯之人士，在此新安全機構中，將居何等地位，及担任何等任務，則屬次要之問題也。但吾人可斷言者，即在前為保護民主國家而在西班牙作戰之反法西斯者，以及現今在國內仍從事於秘密反抗工作者，其地位當高於民主國家內之姑息派。

綜合以上所述，吾人可得一結論焉。納粹所侵略之國家與現今在法西斯統治下之國家，兩者之物質與安全利益，能兼顧而真正調整之者，惟有組織一歐洲聯邦而已。惟有歐洲聯邦，始可解決以下之難題，一方面為因疏忽而引起之危險與不安，另一方面則為造成若干特權國家，伏下新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之禍根。惟有歐洲聯邦，落後國家之民主革命，始可有完成之一日。亦惟有歐洲聯邦，始可給予今日之歐洲戰爭一進步的與建設性之目標。此目標為何，即歐洲聯邦是也，該聯邦又為世界聯盟之一部分。本文只限於討論此較大之世界問題中之歐洲部分而已。

以前之國際聯盟，業已失敗，往昔歐洲大陸上所出現之更有力聯合運動，厥為歐洲之蘇維埃化，而希特勒之新秩序，則以假革命的反對姿勢與超民族主義之偽裝出現於世。在其背後，又附以侵略性之德國帝國主義，於是其力量遂叱咤一時。洎乎最近，始有一更強大之力量，從進步國家之同盟中脫穎而出矣。正確解決歐洲問題，以擊破希特勒反革命之政治宣傳，

乃此項同盟之力量所能勝任之事也。必如此，始能在政治上解除希特勒與墨索利尼之武裝。對於現在德意兩國仍擁有極大力量之泛種的愛國主義，不子以傷害。但對於潛伏於德國與附庸國中之反法西斯之偉大力量，則予以解放。此將使被征服國中之民族解放力量，與夫德意兩國內之民主解放力量，合而為一。此將使此次戰爭轉變而為一革命的民主的戰爭。又因具有一解放歐洲之切實計劃，故使希特勒之新秩序與革命之口號，無所施其技。簡言之，此將成為一真正適合現時代需要之歐洲新民主計劃。此項計劃必為美蘇英與解放之亞洲所贊助，乃無可疑者也。新歐洲聯邦，連合所有各國，參加世界聯盟。

此項計劃迄今尚未考慮及之，乃反法西斯陣綫中最落後與最嚴重之一點，苟無此項計劃，則分化之政策，仍為淺薄的。雖然，此項計劃中之若干點，現已採取之矣。盟國於V字運動中，要求德意工人怠工罷工，以反抗當局，並警告負責之法西斯黨徒必予以懲罰。關於發展民主目的與民主復興計劃，雖曾略有試，但仍無一越出恢復舊時狀態之範圍者。吾人迄今尚未認識，此類不完全之解決方法，其效力為如何之有限，對於

在希特勒與墨索利尼後方堅決反法西斯之人士，其所給予之鼓勵如何之微小，對於此輩消極抵抗之廣大民衆，其所保證之信念如何之脆弱，對於法西斯家園中之青年一代，其所加之影響如何之微不足道，欲冀其爭取過來，實難矣哉。總而言之，吾人尚未瞭解，為戰勝此次戰爭計，為使反法西斯之潛在力量歸入吾方計，吾人之計劃如何不適當。

承認歐洲聯邦之計劃為政治戰爭之主要目標，其意非即以之代替軍事之努力。希特勒之軍事機器，面臨一較強大者，則希特勒惟有以軍事擊敗之。軍事之擊敗可解放政治革命之力量。但偉大之軍事力量，而無動人之創造目的，決不足以成大事也。德意兩國中之反法西斯主義者，如認為政治戰爭中之伴侶，則不但此輩人數日見增多，且軸心之墮潰，亦可加速。加速軸心之潰敗，並建立復興之優良條件，乃政治戰爭之主要工作也。政治上亦如此，惟有希特勒之政治，面臨一較優良者，始可擊敗。總之，若民主革命不認為世界復興之一部分，而不加以完成，則勝利是否有把握，正未可知也。準備此項民主革命，何以為世界負此重大任務，其理由即在於是。

借繼室至南莊頗有躬耕之意

南 鵲

三春條向盡，耦耕野興長，夜雨欣朝霽，攜婦過南莊。相謂腰腰健，致遠挹清芳。舒嘯登東臬，扶藜窮曲岡。周覽碧無際，莊莊拂我裳。植杖耘野草，承露採桑桑。有歌互遙答，雙鳳白雲翔。田父歡嘉會，班荆傾壺觴。懷茲農圃樂，細嚼菜根香，荷蓀春亦歸，高蹤魏孟康。

美將領口中攻到東京之路線與方法

亞丹姆新著
抱貞譯

美海軍陸戰隊司令萬第格里夫特氏於四月二十四日在合衆社年宴席上言曰，攻到東京之路，將經由加羅林羣島，馬里亞納羣島與小笠原羣島。彼又警告曰，奪取此等火山島嶼時，或將遭遇重大之傷亡。

美海軍航空局長拉姆賽氏則於同一席上言曰，至一九四四年底，太平洋中美國將有一百艘以上之航空母艦，用以西向攻日。集中大批航空母艦，壓倒日本以島嶼爲基地之空軍，此項作戰方法，美國業已發揮盡致矣。

美國滑翔飛機裝載英國突擊隊，降落於緬甸日軍後方二百餘里之荒野叢林中，則由愛列生上校在同一席上，加以吸引人心之敘述。愛氏爲美國陸軍空軍之一員，曾親駛該役中之滑翔機之一。彼雖拒絕預言，目前緬甸戰事之結果如何，但表示英軍隊士氣旺盛，領導得宜。

萬第格里夫氏首先指出美國作戰部隊，每應用經驗所得之教訓，增強其戰鬥力。馬紹爾羣島中之卡瓦加林與安尼威吐克珊瑚島之勝利，「乃由於吾人在塔拉瓦所學得之教訓之果，因之傷亡輕微。」

「但其餘往東京路上之島嶼，並非全屬珊瑚島，馬里亞納、加羅林與小笠原即非珊瑚島嶼，而爲火山島嶼，且叢林密樹，洞穴滿佈，有如蜂房然。若干地區，不但軍艦砲火不可能，且炸彈亦不能透達。」

「吾人愈接近日本，其抵禦與反抗力量，亦愈堅強，日本

之艦隊何在，現雖捉摸不定，但屆時必將出而與吾人交鋒矣。

吾人之傷亡，將甚重大，但余深信，敵人之損失將更大。」

拉姆賽氏之言曰，美國海軍甚願與日本艦隊決一雌雄，且愈快愈好。因美國海軍之龐大發展，「吾人已能與日本一船拼一船，但日本則不能如此。」迨今年底，美國之航空母艦，將超過一百艘以上。彼作此言時，以目注視造船家凱撒氏，凱氏亦爲宴會中賓客之一，凱氏起立點頭示意時，全體賓客予以歡呼。

「吾人集中大批航空母艦於太平洋，吾人即可以壓倒之空軍優勢，進攻雖小但戰略上甚重要之日本佔領下之島嶼，因地形之限制，敵人以陸地爲基地之飛機數量當有限。」

「日本似將依賴於潛水艦活動與夜間空襲，以遲延吾人之前進。此乃彼等最便宜之防禦方法也，余深信彼等業已採用此項方法矣。」

「日本之艦隊何時何地，冒險與吾人一戰，現雖不可知，或在不十分接近彼本土以前，即出此一舉。從吾人之立場觀之，吾人愈早與敵人交鋒，而將其海面艦隊一舉而全滅之，則對吾人愈有利，吾人現能以一船拼彼一船，但彼則不能。」

拉姆賽氏前任航空母艦「薩拉吐加」號艦長，曾參加連同「黃蜂」與「進取」兩號，裝載陸戰隊於瓜達康納爾島登陸之役，據彼言，瓜島戰事緊急之時，因萬第格里夫之領導有方，始將危局挽回也。

愛列生氏則爲一細小與黃頭髮之青年。彼告知吾人曰，於緬甸之日本後方降落，初由英國旅長魏吉特氏設計，魏氏於前年曾率領突擊隊，步行滲入日軍後方，且收相當效果，故認爲此乃可能之舉。去年夏季，魏氏被召參加魁北克會議，即向邱吉爾與羅斯福提出其計劃，並告邱羅兩氏曰，若欲實施此計劃，受傷之官兵須設法由空中撤退，蓋受傷者留置於叢林荒野中，必影響全軍之士氣也。羅斯福即命美陸軍空軍總司令阿諾德氏籌劃此事。不幸魏氏於實行此計劃時，致難身死。

愛氏又詳述此項計劃之準備情形，於某一夜，此項龐大空中部隊由機場出發，在煙霧朦朧之山頂上，飛行三小時十五分，降落於日軍後方二百里之地。因彼等飛行頗遠，故有兩架飛機，不願滑翔機能否尋到其着陸點，即將其放開，因彼等無充足汽油飛返其基地也。尙幸此項滑翔機之降落，出於日軍意料之外，當日日本飛機於五日後發現彼等時，彼等已築成一機場跑道，戰鬥機與高射砲得以源源前來保護彼等矣。（摘譯自紐約時報四月二十五日）

步燕生先生上元四律原韻卽呈同席諸公

幹忱

爲尋幽約出城關，佳節飄零倍覺親。竹杖芒鞋權作客，吳山蜀水若爲鄰。（座中有江浙籍者）
風迴舞蝶花沾袖，月隱籠煙露漬巾，此夕人間燈火盛，淅清天上幾星辰。

醇醪待月醉歸遲，暮靄蒼茫鎖杜祠，世亂旅途增坎壈，詩清功業總差池。中原板蕩無寧歲，海宇狂瀾有盡時。留得錦心觀變幻，幾人能與虎謀皮？

夢回輒憶少年游，許劍蕭然繫遠舟。浪跡每興家國感，吟箋時寓黍禾憂。青春結伴舒千臂，碧血書盟許一頭。始覺湖山原有主，悠閑早應讓吳鉤。

迷濛烽火漫江天，引領吳頭意黯然。子職早違傷往事，（老母棄養卅上迄今迄夢未安）
心懷老去畏新年。鄉園錦夢餘餘燼，（長沙燬於自焚）千古溫情付逝煙，市遠隱聞傳爆竹，且將愁緒託雲邊。

聚興誠銀行

營業要目

儲蓄	匯兌	放款	存款
----	----	----	----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設重慶森林路
分支行處遍設各地

四川省銀行

資本總額 國幣肆仟萬元
本行宗旨

- 一：發展社會經濟
- 二：調濟全川金融
- 三：扶持特產運銷
- 四：促進生產建設

總行	分行	支行	辦事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內江	自流井 瀘州 南充	樂山 瀘陵 富順 榮昌 隆昌 眉山 峨眉 等地

電報掛號 總分 支行 處
均為零九六六號

預 定				時間	冊數	收 費
三個月	半年	全年	全年			
六冊	十二冊	二四冊	二四冊			
六十五元	一百二十元	二百三十元	二百三十元			

本刊零售每冊國幣十二元

不通匯兌之處，一元的郵票可以代現。不收寄費，加快或掛號照加。

民憲半月刊（第四期）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人 左舜生
發行人 鄭振文
發行所 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信義街卅號
定閱處 本社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 重慶成都桂林昆明貴陽長沙衡陽各新書店

已呈請社會局轉呈內政部登記中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登證渝忠字八五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九七二號

本期定價國幣拾貳元

通惠實業銀行

主 旨
 調濟金融 服務社會
 開發實業 扶助工商
 業務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及法令許可之銀行業務

總行 重慶
 大什字
 電話掛號 〇〇四四
 電話號碼 四二〇一
 分行
 成都 內江 自流井
 辦事處
 雅安 瀘縣

中國工礦銀行

利導游資 調濟金融
 營業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兌
 扶植工業 協進生產

西 安 長 沙
 昆 明 柳 州
 桂 林 自貢市
 衡 陽 南 充

總行：重慶森林路二號
 電話：二二四一
 掛號：二二四一
 電報：八一八二

大同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重慶分行：行址重慶打銅街 電話四一九六
 蘭州分行：行址蘭州中正路 電話四八八
 西安分行：行址西安東大街 電話八八一
 昆明分行：行址昆明護國路 電話二四八
 桂林分行：行址桂林桂東路 電話二九〇
 貴陽分行：行址貴陽中山路 電話二八八
 衡陽分行：行址衡陽剛直路 電話二八八
 柳州分行：行址柳州培新路 電話二八八

儲蓄部 信託部
 重慶 中一路 電話：二二四一
 昆明 明三 電話：二二四一
 外電 報掛號：二二四一
 均 號：二二四一

交通銀行

爲各工廠：
 謀求戰後復興之準備
 解決添購機器之困難

舉辦：
 工廠添購機器基金存款
 存額 至少國幣拾萬元
 期限 至少一年但得分期繳存
 利息 照本行定期存款利率計息

優待辦法

- 1 存款期滿後工廠以之添購機器如有不足得向本行商借最高額可達已繳存款之總額
- 2 存戶借款定購機器時由本行代辦其需自辦者由本行代付價款
- 3 存款未滿期前訂購機器得向本行商請保付價款
- 4 此項存款到期時如不需添購機器可申敘理由取回全部本息

民憲

第一卷 第五期

華萊士東來與美國外交政策之關係

張君勱

論加強英英蘇中四國的團結

左舜生

從學生踴躍從軍說起

李璜

世界政治主流與吾國內政之修明

孫寶毅

中國到憲政之路（三）

梁漱溟

實施憲政應有之政治準備

費 肇

實施憲政應先革除反民主習慣

鄭振文

耕者有其田釋義

余家菊

世界大戰新戰術與第二戰場之開闢

孫寶毅

英國政治家之兩種典型

靜觀譯

婦女在和平會議席上

羅斯福夫人

沒有婦女就沒有勝利

王世宜譯

目 次

蘭州	西安	昆明	貴陽	柳州	衡陽
內江	江津	瀘縣	宜賓	成都	梧州
重慶	白沙	磁器口	合川	上海	長沙

資本伍仟萬元
各處商號均有存款
總行設在天津
定期有獎儲蓄
特種有獎儲蓄
各處信託及代理業務
並辦水火保險
戰時陸地及險運輸保險
總局——重慶第一模範市

香港海關關民事務
代辦國內外材料
工業品進口土產出口
印刷鈔券印花
機器運輸
會計服務

代理處——運設國內
外各地

寶星沱茶
勝利沱茶
翠湖散茶
得勝沱茶

手續敏捷 信用穩固

華萊士東來與美國外交政策之關係

張君勱

一、緒言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氏以其平日政務綽綽有餘之身，乃遠道跋涉，作西伯利亞與俄國之游，在俄境歷時近一月，在吾國費時旬日，其關心吾國與遠東問題，可以想見。昔在戰國之世，梁惠王於孟子之至梁，首詢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吾人於華萊士之來，可以不待致查而知其所以為中國為東亞為戰後世界計也。華氏於離美之日所發表之宣言中有語曰：

「吾人作戰之目的，係使生活於世界最大海洋沿岸之半數人類，均能保持和平及其幸福。」

目前南斯拉夫巨大地：中歐與蘇聯，均具有非常之光榮。西伯利亞乃一偉大英主庫，如無西伯利亞，蘇聯必不能戰勝德國。中國民衆求取生存與抗戰之意志，惟有史達林格勒，莫斯科，列寧格勒之防禦戰與之比擬。如余能將美、英人民及其總統對於國難等偉大努力所感之信心與榮譽，帶到此等在工與抗戰之亞洲各民族，則余覺此行之不虛矣。」

及華氏抵美後，其在機場發表之談話中之語曰：

「余經由最新地圖之西伯利亞而來，訪問歷史悠久之中國，並與蘇聯界毗連，由太平洋至中亞細亞，綿亘達五千餘哩。此間之蘇聯與中國，此兩國之友誼，實與美國與加拿大相仿，不遠一萬餘哩，而此兩國之友誼，實與美國與加拿大相仿，不遠一萬餘哩，而此兩國之友誼，實與美國與加拿大相仿，不遠一萬餘哩。」

亦作如是觀。余並相信將有許多經濟文化商務之巨大潛力，藉謀亞洲及北太平洋盆地人民之一般福利。」華氏一再提醒吾人中國蘇聯兩國之邊界毗連，不可視為分離線，應視為友誼之聯繫。則華氏此行之目的，固已不待其一一而告，已予人以共見矣。

二、世界外交局面之大變

雖然，吾國人欲知華氏此行之目的，不可不洞悉美國今後全部之外交方針，惟有洞悉美國全部之外交方針，而後美國對於蘇聯對於中國之方針，換詞言之，即華氏此行所負之任務，乃能深刻瞭解。蓋事有全體部分之分，惟有知其全體，其中甲部與乙丙部之輕重如何，甲部與乙丙部之結合如何，先為之明自分，而後關於我之部分，因以明瞭，若僅知我之部分不及其他部分，而自以為所見已透澈者，是猶僅知四五之為四五，而不知四五互乘以成二十之關係也。今日美國固為吾中國密切之盟友，然美之視吾為盟友，亦猶其視英蘇為美之盟友，中蘇之友誼關係如何，又將視美與英蘇之友誼關係如何而定。縱使以言之，今後吾國果與英蘇兩國中之一，有何不曉之事，將來美之助我者，是合與今日之助我抗日者同，當視其事之是非與美之利害如何而定。然則欲知美之所以待我者何如，不可不先知美之所以待英蘇者何如。是則僅知部分不知全體之不足為解已知彼，斷可見矣。

吾人可斷言，戰後之世界外交，在兩千年歷史中為一新紀元，即戰後之外交史上，將不復見有歐洲協調之名詞。昔日之奧國王國，已亡於第一次大戰之後矣。即德、法、意三國，於此次大戰之後，是否保持其昔日之地位，而仍為壇坫上之要角，亦已處於不可知之數矣。其可稱為歐洲之強國者，惟有英、蘇二國，然英倫三島之屬於歐，遠不如其集五洲殖民地以成之大帝國之重要。蘇聯之重心一半在歐，一半在亞，亦為當於世界性之大國，而與德法意之純粹立於歐陸者異。戰後之歐洲，東部將為俄所控制，波蘭也，捷克也，巴爾幹諸國也，即令仍為獨立國，然蘇俄為恆星，而其他國則行星而已。西部將為英倫所控制，法也，西也，荷也，荷比也，瑞挪諸國也，將惟英之馬首是瞻。至於德國戰後之數年中，為俄英美三國駐軍所分占，後此之所屬，為蘇俄系，抑為英國系，將視歐洲情勢之變遷與其自身恢復之能力而決，要而言之，此東西歐各有所屬之局面，將有較久遠之歲月，非一時所能變易也。歐洲主角之國，如德法意者，將居次等，其代之而興者，厥為蘇英，而蘇英二國又與美聯合以成為世界之盟主，是則歐洲協調之消滅，而另代之以世界性之英蘇美為其領導，其為世界歷史之新局面，復何疑乎。

吾人就美國言之，則美國在戰後世界中所處之地位，將大異乎昔日，簡單言之，美處於西半球中，昔則除不得已之事故外，鮮以與世界外交為其政策，今後則不然，不獨於事變之起，從而應之，反而於其未起之日，自己從而準備之，積極組織之。又以美為新國家，他人對之向少嫌怨，故其出為主持之人，易受人歡迎。此則今後之美國所以將為世界第一盟主也。茲分三項言之：

第一、美國之利益遍於全世界。美國平日所持之政策，蓋羅主義，即西半球之內，他國不得占據其領土，以為干涉之地。苟有干涉之者，則美國以兵力相抗。自此宣言出現之日，即美之軍事義務，遍及於西半球之各國，北自加拿大，阿拉斯加，南暨於阿根廷之百達哥尼。此吾人平日所以解釋孟羅主義之範圍如是也。然兩次大戰之後，又知孟羅主義之背後，實以大西洋上之英國海權之保全為後盾，倘英倫為人所併，其海軍力為人所壓倒，則英之不能自保，即孟羅主義所欲羽翼之各國，亦難免於侵略之懼。換言之，惟有保護英國之生存，而後西半球之領土上不至於有另一歐洲國家插足其間，此則美政府所以兩次棄其中立而參加戰爭也。美國與歐洲和戰之關係之密，於此可見。其次美自與西班牙一戰後，取得遠東之領土菲律賓，其在遠東與中日兩方竭力保持友誼關係，期於和好相處，孰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有珍珠港之奇襲，而英美荷之遠東殖民地，數月之內，為日人囊括以盡，日人割奪之技，且遠及於阿留申羣島。此時美人為求一遠東根據地，惟有退至澳洲，以圖反攻，上自北太平洋，下至南太平洋，無一地不為美人所注意。以為反攻日本本土之計，其在日本西岸之大陸國家，如中國如蘇聯如印緬，亦無一不在美人籠罩之中，此則美國與亞洲相距離遠，然為夏威夷與菲律賓之安全計，又不能不推廣其防禦線至於如是遼遠也。由以上所言觀之，南北美為孟羅主義之範圍，歐洲西岸，美人視為進攻大西洋之基地，遠東則與菲律賓之存亡息息相關，至於澳洲，則為此大戰爭中越島跳躍之出發地，然則五洲之中，除南非洲一隅而外，無一不為美國軍隊蹤跡所至之處，故曰美國之利害已遍於全世界矣。

第二、美國積極參加世界外交。美國平日之外交，向以

不與國外事務爲務，申言之，不與他國訂同盟之約是也。德威頓氏退職之日（一七九六年九月十七日），曾有忠告其國民之語曰：「歐洲自有其自身之第一等利害，此等利害與美國可謂絕無關係，即令有之，亦甚遙遠。倘吾人對於歐洲政治之變動與歐洲各國之相仇相友，受人爲的束縛參加其間，實爲吾人自身之不利。」美國自立國以至今日，鮮有與歐洲各國中之一互訂同盟之約者，即此遺教實有以限之。上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之參加，起於德國之潛艇戰爭，初不以對英法有何盟約關係也。巴黎和會既開，威爾遜總統爲保持和平計，倡國際聯盟之議，同時美英法德意四國爲法國計，與法訂安全保障之盟約。此兩項條約爲美參議院所否決，於是威爾遜氏所理想之世界集體安全，歸於失敗，而在歐戰之後，美國又遭遙事外矣。及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將起之前，美國會又訂中立法案，禁止軍火出口，禁止船隻駛至戰區，且有付現與自運之規定，所以鑒於上次陷於漩渦之往事，以免重蹈覆轍也。美國所以圖免於牽入者如是其周至，然法國既倒之後，美國爲自保計，不能不有英之舉，移讓軍艦與租借法案因之以成立，及夫珍珠港事件發生，雖欲不對日宣戰，而亦不可得，良以挑釁之舉雖出於日本，而其爲大西洋上之敵者，則德之爲害尤在日本上也。美國受兩次戰爭之教訓，深知不訂盟約，未必即免於牽入戰爭，以美之參戰與否，視戰爭之影響於美國者如何，初不決於盟約之有無也。美八又知美國平日不與歐洲政局，而終不免於牽入，反不如自身自始積極參加，從中切之安排，或者反保戰爭之不爆發，而美亦不至有勞師遠征之苦。如是言之，美國不訂盟約，不預聞外事之時代，殆將過去，今後，將結合聯合國中之主要國家以成核心同盟，且於戰後若干年，將在歐亞兩洲駐紮軍隊以維持

治安。是爲美國外交之新時代可知矣。

第三、美國將積極調協世界經濟。美國深知世界之長治久安，非武力或外交上之縱橫捭闔所能保持，強國富貴之習慣，一旦存在，而各國人民之生計，絕不爲之顧及，則欲謀國際間之和平，不可得焉。美國所以謀各國人民之生計者，先之以糧食會議，繼之以善後救濟會議，將供給淪陷區或戰地人民以衣食耕種工具或其他城市中小電兩方所需之機械，是從暫時之經濟過渡而達於正常生活也。次之則有世界通貨穩定計劃及世界銀行計劃，一以防外匯之劇烈波動，二以融通各國建設方面所需之長期資金，此兩者立於國際管理之下，以期有無相通，不至引起一九二九——三〇年之金融風潮。若更進而上之，有原料之分配，有通商之便利，有平民生活水準之調劑，俾各國人民咸享豐衣足食之樂，則昔日貧富不均享受相差甚鉅者，自能日就月將以達於彼此平等之境，昔以國際競爭造成富者愈富貧之現象者，今則以國際合作減少貧富之差等，是乃國際經濟之新局面也。

以上三項爲美國人民與其政府所抱之宏願，其間有外交問題，裁兵問題，國際組織問題，商約問題，金融問題，長期資金問題，乃至原料公開問題，其非旦夕所能實現，爲人所共見。然美國人固將以此新方法替代舊方法，且藉此以改造世界之現狀焉。

三、美國之新外交方針

以上所云之新世界，美之所以實現之者將如何，亦曰與各國共同努力而已。誠合作也，則長久和平與家給人足之世界，不難實現，誠各爲其私也，則未來兵凶戰危之苦更有甚於今日者。則此事之不能獨責諸美國，而有賴於各國之協力可知矣。

然就英蘇美三國言之，自以美國負此領袖華僑之責為最宜。何也？美處於西半球，與歐亞兩洲之各國，向少接觸，因而無舊仇新恨，都有主張，鮮有以爲出於美國之惡意而排斥之者。且美之國力富饒，有供給人足之樂，因而養成一種人道主義之空氣，以扶弱抑強爲樂事，除保衛其國土之外，且有餘力以干預外事，視英人之重於爲己者異，其所持政治經濟兩方之政策，平易近情，與蘇俄「意的牢見」之易令人疑懼者又異矣。況此次聯合國之戰勝，其物資之援助，皆出於美之租借法案，則美國之發音權，較其他各國爲強，亦自然之勢也。

吾次於下文分述美國（一）對英（二）對蘇（三）對華，之關係，再以其（四）對四強之態度，殿於其後。

（一）美國對英關係。李普曼氏有言曰：「惟有北美洲之地理歷史，乃能養成美國外交方針中以對英關係爲其主要關鍵。倘有人以此種關係，爲銀行家爲軍火商人爲宣傳家所造成，此實等於否認地理上事實與歷史之經驗之言也。」歐美兩洲之間有一大海，曰大西洋，大西洋之彼岸上，倘有一與美爲敵之國，美之所以禦之者當在西半球之境外，而不在西半球之境內，因而歐州之內，應有友好之國與美並肩作戰，則美之空軍有基地，陸軍可以登陸，換言之，乃不所以偏敵於美而以外歐洲以內之方法也。雖然，兩次世界大戰之中，美人見美之將敗，起而援助之，非徒爲英計，亦所以爲美計也。不獨美國如是，其他濱於大西洋東岸之各國，如法，如西如葡，一旦爲德所制，則其利用此諸國與其大西洋內之島嶼以攻南美洲之巴西，較之美國由北而南以保護之者，尤爲捷速，以自紐約至巴西之伯能港可凡三千六百餘英里，而自西而西岸以至巴西東岸之角上不過一千六百餘英里而已。如是，英美兩國之相依爲命，

爲美國軍部一定不易之戰略，即對大西洋沿岸之諸國，亦作如是觀。而美與英之關係，不獨限於大西洋上已焉，英殖民地之菲律賓處於遠東，其與吾國大陸及英荷兩國，亦無不可觀之爲倚相依之地，甚至南太平洋之澳洲，亦視之爲勢國戰略上之邊界地矣。因此美國雖不少深惡痛絕英國之人，然世界每次大戰，則兩國必爲同盟之國，繼今而後，其關係較昔爲愈密，可知矣。

（二）美國對蘇關係。美蘇兩國之外交關係，最爲奇特。昔日俄爲君主專制之國，其恨美之爲民主國也特甚，自美立國之後，遲至四五十年之久，而乃締結商約。（一八三二年）今則美爲資本主義之國，蘇爲社會主義之國，雙方之反感，猶之君主與共和也。然就兩國之歷史與時言之，則甲方常爲乙方之友。美國獨立戰爭起時之俄國，守武裝中立態度，以促成美之獨立，美國南北戰爭之日，俄又爲美國，不待承認商部反叛而之政府。同時美之所以保全俄國者正與此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美法紛紛援助白俄，以圖分裂蘇土，而美則反對之，一九一八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美軍隨其後，以阻制日軍之久佔，其後日美兩方撤兵，即美之所堅持而實撤之者也。如是，美俄已往之關係言之，美人名之曰甲方對於乙方常居於其敵人之間，雖然之中爲其友國。可謂能道盡兩國歷史上產爲應援之事實矣。

雖然此次第二次大戰之後，美蘇之關係何如，曰此視蘇聯之所得遇與中國之諸國若何而定。倘俄對東歐中歐之諸國，猶其獨立，不加干涉，又不影響於大西洋沿岸諸國之地位，則美之與蘇，定能和好相處一如昔日。就美一方言之，其於蘇之所以待波蘭，羅馬尼亞者，亦皆爲其關係之忠告，至於蘇之

是否採納，則聽之而已。由是言之，東歐方面，英美意蘇之所為，以期不至因此引起蘇之反感。至於中歐之德國，在其戰敗之後，由三國派兵分駐其地以維持治安，其不許蘇之染指者則西歐諸國是也。再就太平洋上美蘇之關係言之，目前美蘇之間，既無領土糾葛，又無其領土不相容之爭執，謂為絕不至有事可焉。他日空中交通，由美飛亞，大抵經由阿拉斯加與西伯利亞，故美蘇之接觸，將較昔日為頻繁，或者因北冰洋之交通，另有一種利害衝突，此則未來之事，不必預為臆測焉。

第三、美國對華關係。美自庚子之後，對我力持門戶開放政策，與他國取得租界租借地者有異。第一次大戰後，開華盛頓會議，重申中國領土完整主權不損之義，各國在九一八事變之前，謂其遵守此旨可焉。自是之後，日人排斥東北四省內歐亞人之經濟，八一三後，更推而行之於華北四省。日人得臨冀獨之心，漫無底止，由廣州而濟南而安南，所以包圍菲律賓，以攻其為強中物。美人然且遲回難顧，與野村磋商及數月之久，卒以珠港之變而美日戰禍起矣。此次戰事結束，日本既敗，其代之而興者為吾中華民國，然遠東一片土地上不容其干戈擾攘，民不聊生，而應有一安定強大之國，負其保持秩序之責，此則美人心目中所望於中國者也。

第四、美國對於四強集團之態度。此次對軸心國之戰爭之獲勝，其用力最大者，在美為合衆國，在歐為英蘇，在亞為中國，此四強之名所由來也。然吾國之兵力，遠不如其餘三國，即其軍火之自給，亦遠不逮他國，然其能簽字於莫斯科之四強宣言者，由美國之拉攏而後有成，其與三國先議而後署名者異矣。關於今後世界大事之決定，美英蘇，無論何事無不預聞，至於吾國所容喙者，恐獨有東亞之事而已。然此四強之地位

，自超其餘國家而上之。

美國之所深望者厥為戰時合作之四國，不因戰事之畢而解散，願求所以長久共事一堂之法。華萊士氏於其辭渝之日告吾國人之言曰：

「太平洋上之長期和平，其所賴者，（一）以有效方法永久解除日本武裝，（二）太平洋區域內四主要強國——中蘇英美——相互間之瞭解，友誼與合作。

太平洋和平機構之成立，必須有下列之基本要素：中蘇兩國關係，百餘年來表現之傳統友誼，必須繼續；中國與環境最近之偉大鄰邦蘇聯之關係，必須維持；相互瞭解之基礎之上；即中國與其鄰邦之關係，亦復如是。」

由華萊士以上諸語，可以窺見美國所擬議之國際和平機構，其為之核心者厥為四強，然四強之在此機構中，非為諸主之地位予取予求，乃以監護者之地位，保持世界各國之自由與安全者也。換言之，四強在此機構中之地位，略似昔日國際聯盟之行政會議是矣。美之對於此四強所以必置之於國際組織之中，而不見其其他方式者，自亦有故。所謂其他方式有三：一曰同盟，二曰均勢政策，三曰勢力範圍。依同盟方式，則此四強應互訂同盟條約如昔日三國同盟三國協商，既為同盟，須擇定目的敵，且規定其作戰準備如何。今為敵人之軸心三國倒矣，四國之邊界上晏然無事，即令有之，不過其鄰邦之或或或近或親或疏，以云想像中之大敵，渺不可得矣。倘美與蘇聯，英將疑其有分割大英帝國之野心，倘與英聯盟，則俄人心中必疑蘇格魯撒遜人種之壟斷世界。而四國同盟之名，本為美國歷史所視為禁忌者乎。此第一方式之所以難於適用也。誠用均勢政策，如昔日英國對於歐陸之所為，過有一強之獨霸，必扶植

第三國與之抵抗，甚且起而與之作戰，如英於拿破倫戰中之對法，與一九一四，一九三九年之對德是也。美國倘有獨霸世界之野心，自必採取此策以玩弄其他與之對峙之二國，然美之所求，為各國之各安於境內，非有干涉歐亞兩洲之企圖，則英人所以提議歐陸之策，不適用於美國之全球外交，又可知矣。至於劃定四強之勢力範圍，期於毋相侵擾，亦為一種似是而非之言，東歐西歐之間，英線俄線將如何畫定乎。前既言之，為保護南美洲，自北非西非起飛，較紐約至南美為近，則北非之地，應歸美乎應歸英乎。更就遠東言之，中國之安全綫，澳洲之安全綫，美國殖民地菲律賓之安全綫，將從何畫分乎。此又可見勢力範圍之無法解決矣。美政府將以上各策，思之再三，知其無一可以為世界和平之礎石者，乃決然放棄而另採一種國際組織，且以口頭納入其中之政策矣。

李氏於其隱晦語言中，名此四強地位曰四強之合作，李普曼氏於其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名之曰核心同盟。李氏暢論四強之結合應以尊重各民族之自由與依照法律謀其發展為目的，倘非然者，則四強必趨於分裂而和平不保矣。李氏舉例以明之曰：

「德日兩國無條件投降後，同盟各國頓覺大難之已去，所以結成同盟之壓迫力自然減少。各國中第二等問題之爭執又起，各分子之本合者又不免於離貳。此乃聯合作戰之局之後，常如是也。此現象實見之於維也納會議之後，而威立郎之政策，因之以成功。又見之於巴黎和會之後，和約簽字之日，即為聯合國解體之日。或者一九四三年冬，勝利之曙光，又引起盟國間之裂縫之發生矣。」

倘四強之一，犧牲另一強或其他小國，以謀自己之開拓，

則裂縫更大更深。

倘美國政策為帝國主義之開拓，以犧牲英國為事，則英之此種政策，即令不毀壞大西洋集團，亦且損害及之。英國為自身安全計，惟有另謀結合以反抗之。

倘英國政策拒絕十九世紀殖民政策上應有之變革，勢必引起亞洲，中東與非洲各地之反抗。當此時也，英政府難期美國對於反抗人民加以壓力，至於中蘇兩國助長此種勢力，又意中事也。

倘俄國在歐洲採取開拓政策，且將及各鄰邦國之自由，則英美必視此種行為為對彼之威脅，惟有鼓勵此等國家起而反抗。再蘇聯對於中國採取同樣政策，則蘇美在北太平洋之關係，必且破裂，或且推廣及於美洲。反之，倘英美及其他歐洲國家採取反俄政策，如一九一九年之往事，以期封鎖蘇聯，分裂蘇聯，則蘇之共產政府必有反抗之行動。

倘中國採取對印度，對馬來亞，對安南，對荷印之拓土政策，勢必引起英國，美國，澳洲，紐西蘭之反對。

李氏列舉以上各項假設之情勢，所以說明四大強國不可存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而應在國際組織之中尊重各民族之自由為事，此乃人已交利，而四強結合之維持於久遠者，在此矣。李氏於書末有語曰：

「自各國主要利益之開明的見解言之，其結論如下：為確立秩序維持秩序計，核心同盟應堅實與永久。為圖同盟永久計，各大國應自為秩序之組織者，在此秩序之中，各民族之自由為法律所承認，此項自由為各大國所尊重，而一切國家從而效法之。」

李氏之所謂四強合作之意義，由李氏言中，更可得其深切

之瞭解矣。再則言之，美蘇於三國之友誼之先後輕重，略如下方：

第一、美國所最希望者，為四強之好合無間。

第二、萬一三國之中有何衝突，如蘇之威嚇大西洋集團，則美之利害與英一致，自棄蘇而助英。

第三、遠東方面倘俄侵入南太平洋，則美之利害亦與英同，自棄蘇而助英。

第四、遠東之中國，倘在陸上與俄有衝突，啓釁之責在我，恐美袖手旁觀而已，倘釁事之責在蘇，且其範圍擴大，則美之干涉與否，當俟英之合作與否定之。

第五、遠東之中英衝突及於印度與南洋，則美將助英棄我。吾國既明美國對於三國友誼之輕重如是，其置身於此四強集團之中，應如何戒慎，以期不至為人所厭惡，更應如何努力上進，以期吾之友誼不至居人之下，此則戰後吾國所以自處之道也。

四、結論

華萊士此來，其目的僅為外交乎。華氏自其離美迄於抵渝，一則曰四強合作，再則曰中蘇友誼，苟無外交使命，何為御風而行，淹留遠東至一月之久乎。然謂其目的僅限於外交，何以有涉及題外之語，如謂政治的社會的安定，如謂為各國人民增進福利之政治，如謂以民權主義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並建立代議政治等等語乎。以負責之政治家如華氏者，豈有不知外交之本在於內政者乎。因廣華氏之意而申論之。

。界各國之所以立，有起於外力者，有起於內力者，十九世紀之意大利與希臘屬於前者，德意志與奧國一隅之地以與之抗，卒

以聯法德普奧參加哥里米之戰，乃取得其獨立地位，此建國之依賴外援者也。反之，如俾士麥時代之普國，明治天皇時代之日本，與夫蘇俄革命後為各國所摧，賴其自身之力以實行三個五年計畫，此則建國之由於內力者也。賴有外援者，雖亦一時崛起，其不能不返而國內部之建設，則與倚仗內力者一也。

蓋國之立於大地，在其能有內保治安，外衛國土之能力，簡單言之，負有自治其國之義務，其不能履行此義務者，難逃於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公例之外。試問英美諸國何以不聞有人侵其領土，削其主權之舉，以彼之自力足以自治自衛也。倘因他人之侵略，乃起而呼號於人者，其自身已犯一種罪過，即由不自治其國以招來外人之凌侮，謂為咎由自取可也。一九一七年後之俄國，何以受人凌侮，今日之俄國，何以受人崇敬。一九四〇年之法國，何以為人不齒，今日之法國解放委員會何以得各國之同情，亦曰自亂之國，自戕且不暇，更何能在國際間有所作為乎。

吾人於上文中詳攷美國對於世界之外交方針，此猶屬於吾之所以知人，而非我之所以自待也。美國務卿赫爾氏於三月廿一日宣佈美國外交政策基礎中有語曰：「每一國家有表示其建立穩固進步之政府之能力之義務。」此言與華氏離渝譚話所謂「太平洋上勝利之目標，在建立以政治的社會的安定為基礎之民主的和平，而政治的社會的安定。有賴於為各國人民增進福利之政治」，正為同一用意。吾人經此大戰之後，當知國之不能自治者，在情理上，不應享有立國之權利，慎勿以一時賴有外援之勝利，便可謂自能久安長治也。吾人痛定思痛，當力求內政之整飭，國力之增強，否則不容以自亂自伐之國，害己

而因以害人也。故曰自治其國爲吾國立足於今後世界之第一原則。

自治其國之道，首在不應有內亂。政府之施政，以人民福利爲依歸，則人民樂於受裁，而聚衆滋事犯上作亂者，無自而生。政府與人民同立於至公至平之法律下，上以是行，下從而效之，循此行之，政治但有進步而決無倒退。至於政府中人誰去誰來，應有平日從容排擠之慣例，若吾國之軍閥割據與憲法運動，均屬於武力之爭，而在不必要之列矣。如是消滅內亂，養成民主習慣，爲吾國立足於世界之第二原則。

語曰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朝鮮安南之失，清廷之愚昧爲之也，外蒙滿洲之失，民國連年內亂致之也。時之爲政者，對於國防，工業，與科學，一切怠忽置之，不視爲國命所繫之要政，而他人之耽耽逐逐者，乃思進而奪之。反之，誠認誠自治其國之義務，自知追求所以保衛其疆土之方法。陸空海軍無一不與人並駕齊驅，新式武器或效法他人，或自有所發明，軍

火應求自給，國中必有煉鋼廠大砲廠飛機廠造船廠，雖在被封鎖之日，亦不至有重武器匱乏之虞矣。能如是者，外人自引而與之爲友，何有失主，何有主權剝削之可言。如是，強國國防，保衛疆土爲吾國立足於大地之第三原則。

或者以爲吾人研究美國外交方針，進而求其所以應付之法，乃推本窮源於美國之原則，如上所云云，豈不與華氏之意正相反乎。應之曰，凡國之所以應付強鄰者，視其軍力之整齊與否，視其農工商業之發達與否，視其學術之進步與否，此數者何一不自治其國之成績相爲表裏乎。此則吾人所以論外交而推本於內治也。四強之一之地位，既在外交上獲得之矣，此地位之能否保持，今後之內治實左右之。吾國人乎！華氏所謂政治的社會的安定，華氏所謂每一國家有表示其建立穩固進步的政府之能力之義務，願吾萬萬人每日循循而見諸施行，庶幾不負吾盟友之好意矣。

六月二十九日

生日寄懷親友

愚公

行年五十又過二，北海樽空愧孔融，恥與阿瞞論甲子，獨依嚴韻伴漁翁。
知名九牧徒叢謗，亂耳千蛙合效聾，傳語親朋休悵望，雲中我亦倦飛鴻。

五十感懷

季子

百歲忽過半，流光只自驚，向餘飛動意，無復少年情。
慷慨曾紆策，艱危欲碎檉，好從屠狗去，莫漫說生平。

論加強美英蘇中四國的團結

左舜生

我們檢討國家的外交政策，或對外交官所主張，有兩個最不適宜討論外交問題的態度，首先應該排除淨盡：其一是主觀的成見，其次是個人的愛憎。更從積極方面講，我們處理外交問題的出發點，第一應該顧到自己國家的利益，同時也要顧到一切與我比肩作戰的盟邦底共同利益。在戰時，我們應注意外交的應付必使其確於戰爭有益；在戰後，我們更應注意到一切盟邦如何始能繼續的和平相處，亦以此維繫整個世界的和平。

從第一次的世界大戰，看到這一次的世界大戰，我們知道一些國家的失敗，并不完全是由於軍事，實際是由於外交；有些國家的成功，大體由於外交，却并不完全是由於軍事。軍事有時也須要門智，但大體是門力；外交也有賴於力，但大體是門智；軍事還比較的單純，外交則異常複雜，我們是處在一個力不如人的國家，因此對於外交的處理，乃不能不慎之又慎。

在這一次戰爭中，美英蘇中四國之應該切實團結，這是四國自身一致的要求，也是一切盟邦一致的期待，不惟在主張上這種輿論已經完全成熟，並且在事實上也正在加強，似乎是用不着什麼討論了，可是為世界上少數囿於成見或愛憎的人們着想，依然感到有申述我們的意見的必要。

我們應該首先承認：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我們不只是科學，教育，工業，政治，軍事等等不如人，乃至就有人說我們是一個農業國家，我們也還需要深切的反省，因為在某種場合，我們甚至連牛肉和雞蛋也感到供不應求，假定中國果然如統計上說是一個農業國家的話，這種現象便似乎是不應該有

的了。在過去的若干年，中國是生息在一個國際的均勢之下，勉強的維持着她的獨立，在今後的若干年，則中國將生存於國際的團結與合作之中，而以和平方式求得其自身之日趨於強大。在過去半世紀，使中國隨時感到生存威脅的，就是一個日本，這一次日本既自討敗北，即中國將自然強大。就中國的自身說，本來是人民勤儉，物產富饒，地下地產可供開發的資源，更是具備了一個泱泱大國的資格。假定中國不能自強自立，還不只是中國自身的禍害，同時也是世界的禍害；反是，則不僅是國之幸福，同時也是世界的福音。中國人的立國精神是忠恕之道，忠就是一切盡其在我，我必得對勤懇懇的「自來多難」；恕便是不顧別人以不好的態度對我，我也決不願以不好的態度對人。日本一定要滅亡中國，我們當然不惜以死相拚，同盟的友邦給我們以種種幫助，我們當然也只有衷心感激。假定孔子的兩句話來解釋中國人對國際的態度，那便是：「以直報怨，以德報怨」。有人悲觀中國已經是四強之一，我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或者也許中國今後真正會有這麼一天；或者我們就現狀的種種方面考慮，實在尚無以副友邦之望。有人以批評的態度指出中國種種的弱點，我們也相信這是友誼精神的另一表現，我們惟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決不會因此而引起任何誤會。同時我們也相信：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而文化也相當深厚的國家，我們的歷史上有過不少的聖哲，他們從思想上給了中國人各方面的薰陶，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這足以說明中國人一種兼容並包的

自爲其防日本，而延結了二十年的英日同盟，自經此一役而宣告解除，此實使日本陷於孤立的第十着。亦即使日本捲入新心運渦的先聲，今日英美兩國將以海空全力於太平洋共制日本，也可以說即以此一役爲之先導。當山東問題經此一會而得解決，英日毅然以敵對新交還中國；當十五年我北伐軍到達長江，英又與我國政府交涉，先後返我九江漢口兩租界。凡此舉措，殆無一不動中樞。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英實立於同情我國之一方，而李頓調查報告一書，尤爲一有利我方之重要文獻。當我抗戰初期，英以在遠東并無充分準備，乃不得不隱忍待時，然其輿論，則一貫的同情於我。自一九四一以後以迄今日，英與我已立於同盟戰友的地位，其交親無間自屬當然，其間最足以使人不能忘記者：其一則爲與美國一致行動，宣告對華不平等條約之取消；其二則爲予我以戰時財政上之援助；其三，則爲予我以充分便利，使我國一部分軍隊得在印度從事訓練與裝備。吾人確信邱吉爾首相在希特拉倒後即將以海陸空全力合擊日本之諾言，必能實踐；吾人亦深信在戰後英國對我國經濟與文化合作兩點將與美國採取大體一致之步驟外，亦將不復對我有何要求。因此，吾人認爲中英的親善以此次比肩作戰爲開始，必將以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爲歸宿，這是了無疑義的。

最後，我更要就中蘇的關係一加敘述：世界兩大國壤地接近之長真如中蘇，同在一專制君主壓迫之下而得着解放，蘇聯亦僅後我六年而已。因爲有此地理和歷史的背景，中蘇兩國國在此二十餘年的短期間，其所表現之成就，實爲過去二百五十年中中俄邦交上之所無。舉事例言之：一、俄國革命於一九一七年，在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即有兩次對華重要宣言發表，

將帝俄時代與我國訂一切不平等條約無保留條件的全部放棄，此實在抗戰期間各國對我先後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先導，吾全國國民至今感念不忘。二、在民國十年，中山先生已開始與蘇俄方面有所接觸，十一年越飛來華，十二年一月至上海，乃有中山先生與越飛的共同宣言發表；而國民黨的改組與黃浦建軍，則係蔣先生自蘇俄考察歸國以後的事；十三年一月，國民黨舉行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國共合作之局乃正式成立，而蘇聯之援助中國革命亦更趨積極；十四年中山先生留下的遺囑，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實即指蘇聯而言；而在他的臨死以前所給蘇聯中央執委會一封懇摺的信，更是明白的希冀蘇聯繼續與中國合作。這樣的一種關係雖不幸至十六年而暫告中斷，但中國革命的成功受有蘇聯的影響與援助，則係事實。三、民國二十年「九一八」日人佔我東北，至翌年十二月，中蘇即已正式恢復邦交，日人在事前曾多方破壞，松岡且赴莫斯科大肆活動，但卒歸無效，可見中蘇之分而復合，實給予日本一致命的打擊。四、當我抗戰初期，英美雖亦同情於我，然尚有一種期待日本「適可而止」的心情，因此還不能公然助我，其時毫無忌忌以人力物力公然幫助中國者僅一蘇聯。凡此種種，均可說明中蘇友好實始終一貫。

最近三四年間，蘇聯在遠東的活動漸趨沈寂，此實由於蘇聯正以其全力應付一空前的大敵，事實上無兩方兼顧的可能，其對日本之態度與蘇聯，不獨可免除其自身之遭受夾擊，同時還有一種分化軸心的作用。在過去三年蘇聯之無力可以援我，亦猶我之無力可以援蘇，正所謂同病相憐，惟有相互諒解，當有引起任何揣測與疑慮之理？現在歐洲第二戰場既已開闢，希特勒的末日即將降臨，蘇聯之不能忘情於遠東，亦猶她之不能忘

情於歐洲一樣。爲解決歐洲問題，無論在戰時戰後，蘇聯均有與英美切實合作的必要；爲解決遠東問題，無論在戰時戰後，蘇聯更有與英美切實合作的必要；整個世界的大勢是如此，其在行動上之或先或後，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假定有人懷疑到蘇聯對遠東問題所採的步伐終有與英美中三國不能一致之點，這可以說是「一種愚不可及的癡人說夢」。

爲加強美英蘇中四國的團結，以力量論中國爲較弱的一環

仁厚場道中

南鵠

明發石洞溪，徑與晨風上。關路遠而，晴野極清。乘輿徐曉登，磴岩一繞通。危磴紆盤錯，萬山入懷中。俯視流壑髮，長嘯聞猿聲。蒼松勁節立，獨立在清濤。川光逼山深，晨氣阻晴融。荷鋤夷棘莽，古道出無窮。

呈黃龍齋師

前人

春風披我襟，原野豁心胸。一駐結在靈巖，日暮數征鞍。主人樂幽栖，題漢老襟帶，結思耿玄草，黃龍發靈巖。嘉樹鬱蒼岑，崑崙開詩界，隱居清化境，超越法象外。題柱辨龍鳳，竊得中意快，（公自湘避寇入蜀，居嘉陵山麓龍鳳橋）植杖還延佇，悠悠廣行邁。

：以關係論，則中國爲極重要的一環；因此，中國人宜切實注意此目前之問題。第一、吾人宜以國家與世界的和平爲重，凡個人或少數人的意見與愛憎應一掃而空；第二、全國必須切實團結，尤以國共關係的調和爲然；第三、必須加強實行民主，以澄清國際的疑慮，並舉國內團結之責。時候是相當的迫切了，故吾人不惜反覆言之。

三三、七、二、

從學生踴躍從軍說起

李璜

記得前年十二月，政府重訂兵役法，在這個新兵役法當中，青年學生，高中畢業，年在十八歲以上，或大學修業，年在二十四歲以下，而身體健全，檢查合格者，均須一律被徵入營，當兵服役。這個新兵役法草案，曾經在成都提出來大家討論過。茶話席上，有人認為今日的青年思想紛歧而複雜，學校的訓練不夠，青年學生被徵入營後，恐在軍中發生紀律問題，因此不贊成學生服兵役。我當時對這個見解，曾經加以反駁，而有下面一段話：

「你說青年學生思想紛歧複雜，但是打倒日本軍閥，將蹂躪我們國土，踐踏我們同胞的日本強盜趕出國門以外，這個思想是一致的。這是事實，今日在野黨的主張各影響着一部份青年學生，這些在野黨的青年，他們的思想是不完全與在朝黨所宣傳的一樣，但是要打倒暴敵，這是一致的。我們應該把握這個一致，放胆的來做一切。所謂乘小異而趨大同，如果心目中隨時只見小異，而便忘却了大同的所在，我們便隨時只有害怕，而任何事都不敢放手去做，像這樣，所謂全民總動員又如何能總的起來，動得起來呢！」

去年以來，中國遠征軍對於要青年知識分子去參加的需要很是迫切，經過四川軍區及各方面一番宣傳後，於是四川大中各校的學生便踴躍投效，紛紛要求參加遠征軍，一時至使軍區當局應接不暇，收容不及。當州北來成都的第一批投軍學生到時，我曾在成都專門學校，我在該校講台上演講，有這樣一段：

「我們青年學生逢着國家遭了空前的侵略，或者想國家鄉淪陷，親故被殺害，自己生活都成問題，或者看見敵人野心很大，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而後方的情形還是軟弱和腐敗，因此大家心中很憤悶，於是請不下去，總是想找個機會來報效國家，就是死都願意。這個熱血沸騰的報國心思，一只是在青年學生心裏是一致的，就是在成年老年的心裏也是一致的。所以你們來了，這種多的士紳商學各界買了點心禮物來歡迎你們。在此刻大家的心情確是精誠團結，只有一個心：趕忙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過在前線你們青年應該不斷的去努力打仗，在後方我們成年老年應該不斷的去工作，使得在方鞏固，支持着前方。就可惜，後方工作起來也不能痛快，你們現在能到前方，痛快得很，不辜負大時代了！值得活值得死了！」

這幾月來，學生踴躍從軍，已由四川影響到了全國，知識青年都願意放下書本，為國殺敵，英美輿論異常稱贊，敵人聞之當更喪胆，到了最近七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氣好像衰了，但只要政府不怕思想複雜，放開手一徵集，這種盛況還得了！如果政府對於國事善於安排，就說「用民」罷，只要善於去用，民力是不竭的；就說「軍事第一」罷，只要政府在軍事需要下，能放開手去集中人才，安排得恰合實際，則抗戰是可以愈戰愈強的。

但是放開手集中人才，並不是要把有智能的中國人都集中來訓練，集中來作官。今日的中國，已經是官多為患。抗戰的

功令很繁，而事事都須交與實事辦，所以今日官廳多而權又大，就是委任的各鄉鎮長這種小官，都是天天在發號施令，強迫着民衆，限期辦到他的指示。官多權大，如果沒有人民來監督着，則貪污瀆職，便成爲一時風氣，莫可遏止，而人民抗戰的情緒也隨之衰減。故今日要安排人才，恰合實際，不是使他都去作官吏，而是使他都能夠監督官吏。

今日人民要求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最大功用，就是把是非明白說出來，把民隱民困宣達於上，把貪污瀆職表白於衆，實言之，就是監督着官吏，使他知道人言之可畏，而不致隨意爲非作歹。這件事很容易安排：只要政府一道命令開放言論，則國內許多有心人，便立集於新聞界，爲國家救命，其氣象之蓬勃躍進，必不亞於學生從事，而人民的抗戰情緒也必隨言論開放，陡然增加。開放言論也不必怕思想紛歧而複雜，因爲要打倒暴敵，還我河山，這是一致的。

今日人民要求結社集會自由，我們在野黨則明白要求政治結社集會的合法公開。結社集會的自由與公開，其最大功用，也是能夠監督官吏去奉公守法。在野黨如果能夠站出來監督政府，則政府黨必能立即自行振作，歐美民主先進國家的例子是很明白的。今日在野黨深恨對於國事無從效力，故意誤會者說是在野黨想做官，其實，他們的慾望不在做官們吏，他們是要嚴格的監督官吏，使政治能上軌道。民主國家所珍重的「民主監督制」是少不了在野黨的存在，公開與政府黨切磋的。所謂「輿論政治」，亦少不了在野黨公開各出其所見，然後輿論方有意義，否則朝野雷同，不自然的一致，固不會紛歧而複雜，

但這不能叫作輿論了。

至於工人，農人，商人，教育界，及記者律師等的結社集會，也應讓他們自由集合，不能太加以束縛，致使這些會有名無實，不能推動社會工作，以協助政令的進行。今日政府要各種公會短期成立，而參加者反不踴躍，因爲這些公會照組織條例及管理辦法，不但一切居於被動，而在事實上，簡直動也不能動，參加的人又如何能夠感覺必要，而踴躍入會呢！

現在政府在籌備憲政，並主張憲政準備，應從地方自治作起，因此自治之聲洋洋盈耳。不過顧名思義，既稱自治，總得要人民自發自動，去爲地方，爲政府、踴躍效力。如號稱自治，而還是束縛馳騁，動輒得咎，那嗎，人民只好仍舊聽天安命或怨天嘆命而已。中國人民數千年來，習慣於家族主義與聽命於專制帝王，要使他爲國家民族，自動自發，集合努力，本是難事，而今日一味相信官權，一切官辦，這與憲政的用意是背道而馳的。五月三十日大公報也注意到這一點，其社論末段說：「在實行新縣制時，地方有許多自治事項要舉辦，將來實施憲政後，人民更須隨時參加當地的建設工作。我們若不乘時鼓勵人民出錢出力，自動自發去做，將來便無力進行憲政下的自治。」

總之，要人民能自動自發，纔會踴躍而有生氣，國家也纔能因之而有生氣。學生從事之踴躍是自發自動，這一向馮玉祥將軍的四川募款救國捐，能夠出乎意外之踴躍，也是自發自動的緣故。」

世界政治之主流與吾國內政之修明

孫寶毅

國家之事，不外乎二：一曰內政，一曰外交。內政之鵠的，在求國內平和，民生富裕，與夫文化程度之提高；外交之鵠的，在能於國際間發生影響，而對全人類有所貢獻。權衡內政與外交之輕重，則應以內政爲先，蓋所謂外交者，國家力量之對外表現也，內政修明，然後國力充沛，國力充沛，然後能周旋於國際之林。內政不修，而冀外交方面有大成就，未之前聞也。

嗟乎最近英美蘇對世界政治之主流思想，更可證吾言之不謬。美國有名政論家李普曼氏於其「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曰，外交政策者，國家力量與其負擔義務之平衡也，所謂國家力量，即用以阻遏戰爭發生，或如不能阻遏，用以戰勝此戰爭之必需之武力，此項必需之武力，包括美國國內所能有效動員者，以及能從可靠盟國方面獲得之援助。任何真正政治家，其主要任務，在達到與維持此項國家力量與負擔義務之平衡。一旦決定彼人民所必需負起之國際義務後，彼應即無一日之懈以謀獲得履行此項義務之力量。一旦宣告彼國家對外之理想，利益與大志願後，彼應即謀其履行之道，一方面爲本國所能動員之力量，另一方面爲國外具有相同理想，利益與大志願之其他國家之援助。英國權威報紙倫敦泰晤士報於其論英國外交政策一亦曰：「英國若欲履行其職務，以建立此世界新秩序，則其義務與履行義務之能力，應謀一致」。外相艾登更從反面言之曰：「每一強國在其外交政策方面應作超出其實力許可範圍之事」。五月二十七日下院演說云。

此種關於世界政治之主流思想，吾人可名之曰現實主義的權力的政治。李普曼氏之言，一掃過去美國向空談之理想主義，而呼籲美國今後應更儘量力；美國過去根本無外交政策可言，其在國際上所發生之力量，實際上乃依賴於英國之海軍，一旦英國在海上之霸權動搖，美國之處境即岌岌乎殆矣；是故今後美國應求內部意見之一致，且保持龐大軍力，而期有所自立，然後國際上之地位，始可永保鞏固，此李氏立言之主旨也。至泰晤士報與艾登之言，則雖將英國今後立國之方針，代爲說明而已。英國以前爲世界之領袖，今後亦應保持此地位於不墜；內政對外交政策之關係，日益密切，英國若內部不能振作精神，且不能保持充分軍備，則外交勢必無力，國際權衡亦勢必跌落。張伯倫時代之所以採綏靖政策，實因英國國力空虛之故，此種教訓，英國人民所深受而永不遺忘者也，而尤以邱吉爾氏爲最。是英國之根本問題，在於內政。茲再引泰晤士報之言證之：「一有效力之社會與經濟政策，乃英國將來居領袖地位之必需條件。且佛里治之社會安全計劃，在國外給予世人之印象，實超過其真價值之重要，因此人認爲此乃一建設的社會思想在英國復興之象徵也」。

然欲美國盡脫其理想主義，恐非一朝一夕所能爲力，惟英國之現實主義，則不但顯明露骨，且已根深蒂固矣。以云蘇聯，雖吾人不能獲得一書一報作爲推論之根據，但史大林之冷酷的現實主義之作風，則舉世所周知者也。此次蘇聯之所以能抵抗德寇，乃由於其內部之鞏固與夫其三次五年計劃之成功，而今

日蘇聯在盟國間之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與夫歐洲淪陷各國共產黨之所以日漸重要，亦由於蘇聯國力之強有以致之。是故蘇聯今後勢必保持其龐大軍力，並努力從事於內政，然後談所謂國際政策，蓋可斷言焉。擴大盟員共和國之國防與外交權力，以及取消第三國際之組織，皆其例也。據聞羅斯福集會之時，羅斯福曾詢問史太林，其對於梵蒂岡將來參加和平會議之意見為何，史氏反問羅氏曰，梵蒂岡現有軍隊幾師。由此可知，史太林之唯力是視，實超邱吉爾而上之。

在此種現實主義的權力的政治下，含有以下幾項概念：先求本國自身之強而有力一也；聯合其他強而有力之國家，以實力衛護世界和平二也；結合或扶植若干國家，以自成一強而有力之單位三也；國家在國際間之地位之高低，以其力量之大小為標準四也。關於第一項，本國自身之強大，為一切之根本，自屬天經地義之理。關於第二項，即所謂三強之說是也，因其美蘇三國始有所謂真力量，若三國團結一致，自可負起建立世界和平之任務，至於中國之地位，李普登所謂「可憐」成為強國是矣。關於第三項，可以南非總理史末資與英駐美大使哈立法斯兩氏為此項觀念之代表人物。史氏認為三強之中，以英國為最弱，是故英國一方面應加強與英帝國之內閣，另方面應聯合西歐南歐各國，俾與美蘇鼎足而立。歐洲各國應組織類如英帝國之歐洲共和國，或類如美合眾國之歐洲合眾國。哈氏則認為增強英帝國各份子之國力，為最切要之圖，彼甚而稱加拿大應居四強之第四位。關於第四項，則可以中央社倫敦五月二十八日專電說明之。一戰後將分各國為三類，第一即為四強，此乃獲得大捷之盟邦，其實力確已表現於戰雲中；第二為第三流之次要強國與各小國，其中包括被為不幸之盟國，因在戰爭

期間業已落伍，但應受人尊重與遵就，並得獨立自主參與國際事務，此外尚有中立國及自行努力以重返國際社會之次要強國，第三則為戰敗之大敵國，其權力將被剷除，且使其永遠如此，並依照四強所協議之條件而生存。第一類國家指美英蘇中，第二類指法意土及各小國，第三類指德日，而其分類全以實力為標準。

以上所言之現實主義的權力的政治，其優點在於其能維持世界和平之核心與工具，其弊病則在於易造成勢力範圍與互相角逐之局。今後能否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再起，以余觀之，其關鍵悉視乎是否具備以下之條件：四強團結之持久一也，強國不以本國之利益為首要二也，國家主權受相當限制三也，民族主義之受相當約束四也，強國間力量之平衡五也。然而此項現實主義的權力的政治，乃此次大戰中之慘痛經驗所產生之對於世界政治之新觀念與新方法，則固不可否認之事實也。吾中國應如何認識此主流，而作長遠之計，不再得過且過，俯合苟容，其為當前之頭務甚顯然也。

吾國之強，以目前之實力而言，不及英美蘇遠甚，但吾國地大物博人衆，在在具備各項可能成為強國之條件，此則全視乎大舟在內政方面之努力如何而斷。外交大半操之外人，而內政則完全操之於自己之手，已欲發奮圖強即強，已不欲發奮圖強即不強，弱之乎個人前途之命運，可由自身之努力決定之，換言之，自身可掌握之。且中國為四強之一之地位，早已為國際所公認，而其地位之所以獲得，應歸功於近年來吾軍民之喋血抗戰，易詞言之，亦權力表現之果也。吾人若明乎此理，則可知吾國今後應急理關於內政之整明，至各國之是否真認中國為四強之一，抑在名義上予以敷衍，或在實際上說說而已，

非問題之要點所在，至國際對我之態度與與論爲如何，吾人亦不可輒動意氣，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態度可也。內政爲外交之基礎，前已言之矣，而國際間之地位，胥視乎權力之有無，前亦已言之矣，從可知，以內政之修明，求國力之充沛，乃中國確立四強地位之先決條件也。古人云：「自求多福」，此之謂也。

然則吾國如何修明內政，以求國力之充沛耶？其方法曰，實行民主政治，曰實行計劃的國家建設。關於民主政治，論者已多，余不擬贅添足。惟有一點余須強調提出者，即由於近代戰爭之技術，一國之能否屹立不倒，全賴於全國之生產能力，而全國生產能力之能否充分發揮，則視乎全國之團結與意志之堅決而定，此則非實行民主政治不可矣。所謂實行有計劃於國家建設，易言之，即接受社會主義之優良原則是矣。一方面，應立定一全盤的軍事社會經濟教育文化計劃，充分利用與開發吾國之人力與物力，另一方面，則應實行一廣泛的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如是而後，國家之強盛，人民之自由幸福，與夫社會之安全，始可兼營並顧。如是而後，免於恐懼之自由與免於匱乏之自由，亦始可兼而得之。蓋「鎗砲」固屬重要，但「牛油」亦豈可忽視之哉！寧遣「鎗砲」而捨「牛油」之希特勒政策，固爲吾人所不取，然而英美以前之只講「牛油」不談「鎗砲」之政策，亦爲吾人所不取也。國家雖有軍隊飛機坦克大砲，但人民無自由幸福，社會無安全，則猶之乎房屋之建於沙漠之上耳。人民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事做，有現代智識，然後國家之安全，始有真基礎，反之，國家安全有保障後，人民始有足衣食與夫自由幸福之可言，是故國家安全與社會安

全，乃相互相成者也。英國之貝佛里治氏，有見於此，故其社會安全計劃之提出，其計劃中之謀社會安全，自人民之幸福起直至進境爲止，可謂無微不至。至蘇聯之蘇維埃制度，則在謀經濟之平等，蓋亦深知經濟平等與社會安全，社會安全與國家安全之密切關係也。而美國之羅斯福總統，亦何嘗無睹於此，彼於今年一月十一日對國會之咨文中，即明白言之曰：「吾人可言現已承認一第二人權宣言矣。根據此宣言，在國內而農田，或礦場或有獲得有益有利之工作之權利；而獲得足夠生活費，以供衣食娛樂之權利；每一農人生產所得，足以使彼本人與家屬獲得適當生活之權利；每一商人，不論大小，有免受國內外不公的競爭與獨佔性的併吞，而得以自由交易之權利；每一家庭有獲得適當屋室之權利；人民有獲得適當診療與發展享受健康機會之權利；免受經濟恐懼，老年疾病，意外失業而有充分保障之權利；以及獲得良好教育之權利；以上各項權利，咸可產生安全。因國內倘無安全，則世界決不能有永久之和平。」由是觀之，羅斯福之經濟的人權宣言之提出，其主旨與英蘇兩國，初無二致，惟以美國政制不同，故其所取方法有異耳。要之，雖有人批評三國之制度，並非十全十美，俄國缺乏政治自由，美國尚未脫放任的資本主義之成見，英國保守觀念太濃，然而三國之探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全並進之方針，則相同者也。吾人稱此爲今後立國之大原則，無不可焉。

世界政治之主流思想，既如上述。吾國今後應充分予以認識，急謀內政之修明，以求國力之充沛，俾能周旋於此現實主義的權力的政治之國際之林。願以此爲全國人共赴之目標。

中國到憲政之路 (三)

梁漱溟

六 由階級統治到民主政治

此時我們有必須說明之一事：階級統治與民主政治，雖若矛盾不相容；但欲達於民主政治，却非賴有階級以爲過渡不可。如英，如蘇，皆顯示此理。

我們這裏所說階級，指經濟上有剝削被剝削之分，和政治上有統治被統治之分而言。不事生產勞作而享用轉厚，即是剝削。治人而不治於人，即是統治。這雖是兩樁事而每每相兼。或則以統治而兼剝削，如封建地主；或則以剝削而兼統治，如近世資本家。關於階級之如何發生，這裏不談；所要講底是階級廢除之所以有待。有待於什麼？簡單說，有待於勞心勞力之合一不分。正如孟子所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治人、治於人二者未能合一，實爲勞心勞力二者未能合一之故。但如許行所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殍而治」，以勞心勉強合於勞力，那樣却是不行。那樣不是順着社會進步趨勢，而是逆轉了。一定要等到生產工具生產技術高度進步，以蒸汽機電機一切物理底動力替代人力，勞力者自然化爲勞心才可。——因爲少用人的體力而多用人的心思，原是生產技術進步之一定趨勢。

這種進步，可得兩面效果：一面是爲人們騰出極多之閒空，以便大家都得受教育求學問；一面是使生產工作與學術生活極相接近而不相礙。本來讀書受教育，實在是一種高等享受；其中表示着人們有閒空；人們有閒空，表示着社會的富力。像

我們今天得以享受教育，實爲經濟上相當進步，而又有好多人在生產上服務，才騰出空閒來給我們底。假如經濟不進步，生產力有限，而又要一切人享受同等教育，那非大家一同挨餓不可。所以人類歷史上，從不見有這樣事實。而事實所趨，亦就自然在階級分化了。古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話，其實正爲其寡，所以就不能均。人類要廢除階級的理想，早就有了；而一直到今天還難實現，完全就是基於這種事實上底必要。只有生產力進到極高，如上所說者，而後乃有人人同受較高教育之可能；這種事實上底必要，才被取消。同時，那非平等不可之勢亦於此奠定。所謂非平等不可之勢，就是：人人均受較高教育，人人均從事學問，文化水準普遍增高，彼此知識能力相差不過，這一偉大事實。蓋能力平等，爲一切平等之母；而教育平等又爲企圖能力平等之道。階級廢除之有待，正待此耳。

這其中含藏有生產手段歸公之一義，未曾說出。因爲它是隨着生產技術進步而來，又包含在生產力進到極高之內底。蓋社會當生產技術進步之時，則各人各家私有其生產手段而自行其生產，實爲方便。只有在技術大進步之後，才有集中爲大規模生產之必要。而此時生產手段亦不可能分散零散，於是乃形成其歸公之勢。更且爲了完成生產力高度進步，亦非將生產手段歸公不可。所以社會主義和生產力進到極高這一句話，原不可分。不過點出來，自然更明白。

亦只有生產手段歸公，經濟生活社會化，而後乃完成了社



會的一體性，大家在社會中如一體，不可分。社會既達於一體，社會中自無不均平之事。所謂社會，教育機會平等一類事，是不待言者。要思社會達於均平之域，只在均平上求，是求不到底。却必在這一體性上求才行。此不可不知。

說到這裏，則最後民主政治之實現，有待於經濟上社會主義之完成，其理甚明。階級統治是現在底事實，誰亦跳不過這事實去；只有從現在脚下向着民主政治那一帶的，一步一步走。所不同者：英國起腳太早，未嘗認明此理；然步步走來，正亦不能外於此理。蘇聯未及趕上，却是先經認明此理，而有計劃地前進。

七 階梯原理

我們知道，政治上之民主不外兩面：一面是政權之公開；一面是自由之保障。所謂一欲達於民主政治，非賴階級以為過渡不可的道理，可分就這兩面來說。

論理既說政權公開，便應公開給全國所有底人。但政治上都是力量對力量底事，並不復哲學家推理一樣。如上所明，政權之公開原為經濟進步社會形勢開展所促成，非從理論演繹而得。全國人力均等之勢，既不可驟期；則政權亦只能隨經濟進步社會形勢變化而逐步公開，沒有一下完全公開之事。最後公開了，自是無階級，但中間過渡者仍必為階級，與原初之階級統治頗相類似。這裏說階級，係指「從社會地位利害關係而聯成之一羣」，在彼既有其「階級意識」，在人亦以此相待者。除中國社會獨以形勢散漫，階級分化不明外；此在歐美日本社會中，皆顯然若有可見。

何以必賴階級為過渡呢？須知政權在舊統治階級固不樂於

公開以予人。抑政權亦初不同於衣食，為人人所欲求（此以選舉權每遭放棄，主有行強制投票者，可為明證）；又不等於仁德義舉，特有善於賢豪之熱心。而要在其利害關係足以相及，自然引起關切注意，乃不惜時光不惜金錢，以求參與乎其間。此固非具有相當經濟地位知識能力者不辦。像那一股勞力為生者，不消說，便是像中國舊日讀書人，亦多半來不及。因為種種參預，亦不過參預某些問題之討論決定。其事固不可當一職業者適當其選了。即在他們，起初亦還不是自動要求，而是舊統治階級尋到他們頭上（所謂三級會議），隨後乃生興趣。假若不是既在舊統治者圈外，又大有別於鄉農齊民，巍然自成一新階級，安得有此？

這一階級固然還不曾組成一大團體，却正從許多團體而來，或亦涵有許多團體。各城市自治，是其地方性組織；各行業公會，是其職業性組織；從宗教信仰上，還有各教會組織。因此他們隨時可能聯繫起來，共同應付他們的環境，漸由被動而主動。此時政權之公開到他們身上，客觀底必要和主觀的要求，均在形成，其事遂不可已。在理論上，雖公開應不限於他們；在事實上却不可能泛及眾人。徒有理論之必要，是不行底；還待有事實之必要，徒有其必要，是不行底，還待有其可能。一股勞苦大眾，沒有公開沒有知識能力參預其間，便是不可能之大者。像前舉英國之例，從限制選權慢慢一步一步公開到無所限，正是循乎事實之自然。

自然就好。不自然必出毛病。假如生產力沒有增進，文化水準沒有提高，而早行普選；不是給少數人以盜竊民意之機會，便是決大計於衆愚而誤事。所以英國的政治學者曾指陳：

倘若四百年來，早經存有極普通之選舉權，因之遂存有極大選舉團於國內；我敢斷言：英格蘭必不有宗教的改革，朝代的變更，相異信仰的容忍，甚至正確的法歷。打穀機、器、汽力織布機，多軸紡紗機，以至蒸汽機，於是亦均要被禁絕不用。即在今代，強種牛痘會要不能舉行。（註三）常產業大興，資本勢力取封建勢力而代之，此新興階級無形中進據統治地位。却是另一新階級勢力，又從下面起來。此即勞工階級，又被稱為第四階級底。他們更且有工會、工黨等組織，以從事經濟上政治上各鬥爭。此時政權之公開到他們身上，客觀必要主觀要求以及事實之可能，又漸都形成；普選實行固不消說，就是工黨之入閣組閣亦出現了。國家政權就是這樣隨社會進步而逐步公開，有如升階或落梯然。倘若不如是，則如何而得有政權公開之實現，反不可想像。

由「天賦人權」之倡說，曾成為一時信念；箇人自由之得到尊重，似乎一朝而泛及衆人，並不假階梯一步一步展開。其實亦不然。如我們所習聞西洋史上一「自由市民」一詞，正是對封建下不自由農民而說；上面那先取得參政權底第三階級，亦就是早得自由底他們。自從立憲之後，在法制上人民同享同等自由，沒有像限制選權之事。但實際上箇人能否當真享有其自由，還看其經濟條件知識程度等如何而定；並不因法律規定之平等而平等。經濟條件知識程度既視乎其階級地位而異，則自由因階級而有異，隨社會進步而逐步實現，其理為明。而更重要底，還有下面一層道理。

自由是什麼？自由是國家（團體）與箇人之間的界限。箇人不得越出此界以妨礙團體（國家）；團體不得侵入此界以妨礙箇人。英儒穆勒所著（On Liberty）（論自由）一書，嚴幾道先生譯為「羣己權界論」正為此。然求國家與箇人各得其平，實一理想境界；如何而得實現此理想，却大成問題。蓋以箇人對國家太渺小了，又安得有力劃清此界而守之？沒有力量，只空談以講理，是不行底。此時就需用着階級了。原來國家亦只是一名義，除對外有時表見全國力量外，當其對內實不過以統治階級的力量為力量。西洋近代舊統治階級外，既有資產階級興起，其經濟地位文化程度足與中其自由之要求。更且他們非散漫之箇人，而如前所說隨時可能聯合起來，共同應付他們的環境。假如其中一人被侮，其所屬團體便受威脅而要反抗，其數個階級便為之不平而難坐視。以此階級與彼階級相抗衡之形勢，遂以保障了箇人自由。倘若不是這樣，則如何而得有箇人自由之保障，反不可想像。

從社會自然發展來看，非以階級作梯子不可能達於民主，既指陳如上，更妙底是蘇聯表面作風大不相同，它有意地建造民主社會，仍也少不得以階級作梯子。它必從平無產階級立場，運用無產階級力量，帶着無產階級專政，執行其一大計劃而後乃得完成這一大工程。它不以資產階級為過渡，而以無產階級為過渡，只是將階級原理轉轉應用而已。

（註一）見穆勒著「大英政治」第九七頁，此書「英憲精義」第七頁引用。

（未完）

實施憲政應有之政治備準

費 聲

吾國他日之必行憲政，爲無可懷疑之事。一則辛亥革命及中山先生之主義政策早經此以爲嚮的，二則此次大國民民主國家之勝利，亦即民主政治之勝利，戰後民主政治之盛行，爲大勢所必趨。而實行憲政不難，難於有真憲政。頒布憲法不難，難於能真奉行。憲政也，憲法也，徒外表耳，政權之嬗遞有常軌，民意之伸張有保障，斯爲實質。名與實果能符合與否，爲憲政成敗之所繫。是則實施憲政以前國人之所以當努力，而不可不先有準備者也。所謂準備云者，在求實行憲政條件之具備。實行憲政之條件有物質的，有精神的。物質上之條件，若建國大綱所示各地一人口調查清楚，土地測量完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道路修築成功，一以及全國交通之發達，各省治安之維持皆是也。物質的條件未備，固難驟辦憲政，然物質環境之改變猶非甚難，縱尚未完全達到上述境界，固不妨一面開始憲政，一面整理調查戶口修築道路等事，祇須政治清明，行政有效率，可於短期內完成之，政府宣布於戰事結束一年後，即提前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頒布實行之，因時制宜，即此意也。惟精神的條件尤重於物質，而其具備有難於物質者遠甚，此而不備，雖物質條件盡具，終難期憲政之有成。物質的條件可以隨後完成，而精神的條件至少於開始實行憲政之前，必粗具規模，有其端緒，憲政始能順利推進，此在朝野人士所當共同努力培植者也。

精神的條件舉其最重大者，可得三端：一曰政治訓練之獲得也，是即中山先生所謂政權行使之訓練，而稱之曰訓政者。

惟今既提前實施憲政，不及待地方自治之完成，此種訓練，自不能如原定計劃之遲緩爲之，而將廣泛的在全國爲之，苟能審慎出之，要亦無害。所謂政治訓練者，四權行使之外，有尤甚本之訓練在，是即教之如何爲公民。英人羅素君言曰：「從事政治之公民，應有兩種表面相反實則相成之性格。有自信與維護個人信念之決心，但又須許多人參加互相反對之政治宣傳。只以個人之意見，堅持至某種程度，而決不超過此程度，個人意見與多數違反時，必能服從多數。蓋民主國家之男女，不願爲一奴隸或叛徒，而應當爲一公民。易辭言之，即一位自己具有而且容許他人具有政治態度之人。」能如是，則公民應具之諸要素，例如有主張，肯批評，能容忍，知守法紀，皆已有之，始能行使政權，無忝厥職。此種精神之養成，除使人民有直接參與政治，抉擇國家用入行政之機會而外，首在開放言論，培養輿論。蓋民主政治所重者乃人民之公意，人民而無發表意見之自由，民意無從表見，輿論無從形成。當準備實行憲政之時，開放言論，在政府足以示人以至公與寬大，對人民足以誘導之以入於行使四權之初步。真正之訓政不僅訓練人民使之服從法令，亦在教以公開討論國是，監督政府。況無論誰人當政，終不能盡免過失，許人批評，即是許人糾謬指誤。社會上有識者對政府善意之批評，宜獎掖之尊重之。有健全之輿論，斯有健全之政治。抑思想之爲物，本無法使之統一，與其過之使橫決，不如導之使就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其抑之也至，則其暴發也愈烈。獨裁政治之異於民主政治者，即前者對社會之

輿論謀議，後者對人民之言論重疏洩。結果所至，在獨裁政治之下，人民舍革命外無他途，在民主政治之下，人民對政府不滿，可以在法律範圍以內，加以指正，縱不見納，憤懣已宣，亦自無礙。故憲政之作用，在使怨訴者有正當之發洩，否則不為政治之無由改進，即為反動之激起，如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抑此種正當之發洩，實為最好之政治訓練，言路大開，輿論蓬勃，使人民對政治生興趣，對國是知注意，精神上先已有一參與憲政之準備。至於四權之實際行使，猶居次要。吾國人口過衆，輻員過廣，民智尤過低，創制複決罷免權之直接行使，此時殊談不到，即以四權中最重要之選舉權而論，亦宜先有限制，不必人人賦予，如憲草之所規定者。教育資格之限制所不能闕，先利用國內智識份子行使選權，樹以楷模，俟一般人民智識漸進，徐圖擴充，未為晚也。祇須輿論有力量，對當軸已足為有效之督責，言論思想能自由，養成視國事如己事之風氣，使民衆日浸潤於民主精神之教育中，斯為最重要而有益之政治訓練。

二曰政黨組織之勸成也。民主政治，非由兩個以上之政黨無由運用之。政治主張不同之人士，應可以自由為政治之結合，可以公開活動，以合法手段從事於爭取政柄。蓋民主政治之要諦，為誰出當政，決於選民，故至少須有兩黨始能聽民抉擇，亦始能收互相監督之效也。間嘗論英倫政治之成功，其因在反對者之得力。英國旗鼓相當之政黨有二，更迭柄政，互為起伏，一在朝曰政府黨，一在野曰反對黨。在野黨在政治上有地位，稱一王之反對黨，一在野黨領袖在國會內有地位，稱反對黨領袖。反對黨之能力，在盡力掣政府之肘，謀推翻當局，取而代之；而政府之所以自處，在伸辯，在解釋，在可能範圍內

，且予反對黨之意見以相當之尊重與容納。英倫大之政制，源於英倫者也，且明定反對黨領袖為有給職，而英亦自一九七年起，年給反對黨領袖俸金二千鎊。陳威爾（L. C. Williams）論英之政黨政治曰：「王之反對黨一名詞，實十九世紀英人對政治最偉大不朽之貢獻。此一名詞者，蓋認在野黨一樣忠於王室，隨時可令入主國政，決不危害現有制度，動搖邦國基礎。全國上下，對反對黨不稍疑懼畏慮。不寧惟是，政府黨且決無盼望反對黨消滅之心理。政府黨果欲續行秉政，必於國會內保持其多數，然深知反對黨如式微，不足為勁敵，則外侮既不足畏，內訌隨之而起，已宜且急為改派，非其福也。故曰承認反對黨為合法團體，可由政治常軌取得政權，實為政黨政治成功之主要條件，亦即民主政治成功之主要條件也。」（見陳威爾英國政府參攷書第五二頁）可見正當之憲政，政府黨應有之態度，不在抑壓異己，而在聽異己之言意見之發揮。民主政治之異於專制政治者，在政見不同之人，可以互為陣營，互為責難，政黨政治之作用，在反對黨之存在，顯示政府之意見，未必為唯一正確之意見，政府而舉措失當，不釋其職，隨時有一反對黨可以代之而起。必如是，人民於其當政者，始有選擇之自由，而政黨競爭，亦應能循合常軌以大多數為當道之國民為其活動之對象。設政黨與主張，以博其信任。抑言政黨政治亦非此無由推進。人民對國事之主張，終不免有保守急進之別，倚左倚右之分，故亦惟有兩個以上之政黨，人民始可各依其態度傾向，結為不同之聯盟，以收相生相成之效。選舉之時，苟祇一黨，候選人將何從提出，政策主何從討論，選民於所舉者之賢愚既無選擇之地，將來施政方針之得失，又不能於事前有所推諉，此豈待猶待之曰民主。蓋民主政治者，一大政治比賽也，

猶球賽然，非由兩隊對壘，旗幟無由鮮明，高下無由判別，而勝負亦無由決定也。土耳其即鑒於此，其政治之無法實現民主也，人民黨政府曾於一九三〇年一度令曾任內閣總理而素來反對一黨制之費雪悲氏 Feizi Bey 組一反對黨，惜二月後又告解散，而土亦卒未獲憲政也。（見一九三五年 Political Quarterly "Ten years of Republic in Turkey" 一文內）今我國既決計定期實施憲政，政府宜早准許各黨公開組織活動，俾各種不同之政治信仰各得其正當之出路，各在法律範圍以內作正當之宣傳，他日亦得在選民之前，作光明之角逐，政府黨之外有在野黨與之分庭抗禮，政權壇遞始有軌轍，而憲政亦庶能順利推進。

曰政治道德之請求也。一國有兩個以上之政黨，未足遽以爲已合實施憲政之條件也。政黨與黨間能和平相處，相持相讓，始足言憲政也。蓋憲政者，不過一覓取政治決定之方法耳，其方法非全恃人頭之點計，而恃互相討論，互相協調，以求得一致也。故政黨政治之一大利益，在此種狀態下，各黨論政，不訴諸一黨一派之利害，而訴諸全民之利害，黨與黨間必時時互相討論互相妥協而調和以成也。（引英人 Bagehot 說）民主政治之特色，及其所以異於獨裁政治者，在有力之政黨或階級間，意見相歧時，不問其意見在何處不合，但問其是否皆願以和平之手段解決紛歧。故最主要者，雙方皆願不以武力解決糾紛，而能互相容忍退讓以得調和折中之道。黨與黨相處，首在能容忍對方。梅依 Maine 曰：「政黨之德，首在聽異己者之意見流行。已穆勒 J. S. Mill 曰：「一國之政論。必待異黨相督而後有有執中之美。又曰「二黨之爲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即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國，即在此相攻而不相得，乃

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循理而惺惺」。阿格爾論政黨曰：「人民分成兩大羣或數羣，各有其領袖，主義政策，愈欲奪取政權，於是可謂有政黨。然其相處也，均願自認曰，他黨可以存在之權利，正與我相等，而他黨之可以政權托之，亦正與我無異也」（阿格爾英國政府與政治第五頁）陸威爾亦言英國政治之成功，在各黨之能互相容忍，在位之黨，以容忍寬大待異黨，俾他日易地而處，異黨亦能以此相待也。此之謂政治道德。此種互相容忍之態度，爲政家應有之態度，所謂政爭必以公道之競賽 (Contest) 出之，始爲光榮之競爭，是亦政家應有之讓德也。政治道德之含義至少有二。一曰以公道待人，以不欺自律，一曰風格骨氣爲從政者共有之操守。政黨相處，光明磊落，爲彰明較著之鬥爭，不爲卑劣鄙吝之暗算。當軸者不以私害公，不假公濟私，不自然之優勢，不光明之勝利，不顧有之。在野者對政府只爲善意之督責，不爲惡意之破壞，此之謂以公道待人，以不欺自律。取得政權，將以行新善之主張也，主張不行則去，宿諾不踐則去，不貪位而苟進，不戀棧而苟留，同黨之人，以道相結，將以利國，非爲身謀，富貴利達，不以其道得之弗居也，此又從政者應共有之風格也。此之謂民主風度。實行憲政之始，各黨人士宜即以此相策勵，爲世楷模，以成風氣，他日政黨相爭，始能不復如前此之恃武力攫政柄，而將憑民意決勝負，不交綏於戰場之上，而交綏於論壇之間，爭持一事，恃理性，恃說服，而不恃暴力，容忍而非仇恨，懷疑批評而非武斷強制。政敵相與，雍雍穆穆，化干戈爲玉帛，變乖戾爲祥和，憲政前途，庶有焉乎。

吾國實施憲政之條件未備，如一般人民智識之低下，政治興趣之薄弱，政治經驗之缺乏，與夫風氣之未盡開，交通之未

發達，等等。教愚素主中國應有民主憲法，而不必過囑高調，此點有待專文論列，此地不遑深論。然語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憲政實施之後，假以時日，亦自可使其逐步具備。今既提前實施憲政，當務之急，乃在上文所舉三端。使言論能開放，

政黨能組織，政黨相處又能以公道待人，以廉潔自律，助長好之政治風氣，可望培植養成，可以為人民表率，可以為子孫示範，憲政亦自能為美好之開始也。

播州雜詩

雲孫

蕨綫

蕨綫者，以蕨粉為條，結成網狀，上凝白霜，有同濕雪，煮食之味清而耐饑。

朱門肉食徒充腸，念鄙復增面目惶，何似播州蕨綫好，味清足伴菜根香。

凍菌

凍菌傍樹而生，色微透明，味美無毒。

荷鋤尋藥入山深，喜有靈芝傍樹生，凍菌足消胸內熱，不需冒死啖河豚。

輓歌

播人出喪，挽柩者且歌且行，其聲絕悲，猶有雍容餘韻。

出山水濁在山清，且在窮山寄此身，陰雨連綿無日影，凌晨怕聽輓歌聲。

贈鄧衍叔先生

眉上桃花結晚明，秦淮碧共蔚山青，欲憑鄧老如絲筆，寫出金陵舊典興。



實施憲政應先革除反民主習慣

鄒振文

今日民主政治之在吾國，似已無理論上之問題，只宜如何於未行民主政治之前促其實現，已行民主政治之後，求其愈臻美善而已。民主之本義，雖指政治而言，實則其於吾人之社會行為，相聞至巨，蓋民主政治，不過吾人社會行為之共同表現而已。今人談民主，每以責望政府，一若政府民主，則一國之民主即告成功，要知政府乃寄託於國人之上者，國人若已民主，則政府雖欲不民主而不可得，而真正之民主政治乃於以實現。是故期望政府能民主，不如反求諸國民能民主之為直捷了當，踏實易行也。縱觀英國政治，泰半以英人具民主習慣為基礎，使英人無良好之民主習慣，則其民主政治必無由臻今日美善之境；蓋一國大多數之人便於民主，則民主之成，為真正民主，大多數之人不便於民主，則民主之成，亦一假民主而已。吾人欲真正民主政治之成功，必先完成國民良好之民主習慣，是誠有待於吾全國一致努力革除一切反民主之習慣，方克有濟也。竊以吾國人習慣最為反民主者，厥有數端，試為臚述於次，以與我愛好民主之國人共勉之：

一、自私自利者反民主

反民主政治之極端為君主政治，君主政治者無他，以天下之士為一人之士，以天下之人，為一人之臣者是，此自私自利之最大者。近百年君主政治，相繼消滅，（雖猶有戴君者，實際與過去君主迥然不同）藉狄克推多自意識出現以後，則有法西斯主義者出焉，又以一國之人民與土地私於一黨，私於一黨，與眾於一人一家，五十步與百步之聞耳。凡人倘於日常行事

，處處以自私自利為出發，則一旦負起國家之責任，豈不與國家私於一己與其政黨，而後國家於社會者。過去自私自利，實為現民主之第一條件，能革除自私自利，則人與人之間，黨與黨之間，均無意見之爭，而社會之中心意志，自能一致，其國家之大事。凡吾人欲實現民主，所應先革除者，自私自利之反民主習慣者一。

二、剛愎自用者反民主

剛愎自用者，往往好固執一己之意，而過於自私自利，致為民主之最大障礙，蓋剛愎自用者，其言多不中肯綮，其行多不為天下所共賞，而為天下所共棄，其意不為天下所共許，而天下人反易受其欺騙，此為人所共知，而未能以自覺者，是故利祿之私，尚不足懼，惟意氣之私，最為可畏，民主國家之優劣，即在於剛愎者之無法自用，意氣自用者，固為國家之障礙，雖因其執者剛愎自用，震赫一時，然其固執以方淺入，為舉世所共棄，其敗亡將不旋踵。其故，則剛愎自用之執者，往往喜逞一時之意氣而不能自止，則至成為獨裁政治，政成獨裁，則公意無由表達，亦無由收集民意之效，而難免於受其害耳。試以議會言，倘有若干議員，剛愎自用，其無他人意見，則會場亦必成為鬥毆之所，議會精神，遂無由表現矣。此吾人欲實現憲政，所應先革除「剛愎自用」之反民主習慣者二。

三、不平民化者反民主

民主政治之要求，起於反對特權階級之殘虐處優，而置大多數人民於奴役生活於不顧，因而平民化乃為民主政治之極重

要條件，不平民化而處處以優越者自居，則不啻自認爲特殊階級，視其他爲不足齒數之賤民階級，英美國家在今日所以爲民主國之模範者，即其國人在法律下無特殊階級，如以戰時英國言，英王已獻其苑囿之私爲公家之用，英后亦隨時接近民衆，實行戰時生活，其國人之納稅、服役、購物，貴族與普通平民同，此實吾人所共知，至於美國人士，則平民化，尤爲吾人所習聞，若美國總統華萊士，此次訪問吾國之行爲，尤多可述，如在迪化之手植草梅，在重慶之參加士兵排球賽，以及與農民握手攀談等，以美國總統之地位，且身爲貴賓，而能爲此等事，此真可謂平民化之模範矣。然則吾國既列名於民主同盟國，過去國人官僚習氣甚重，今未能革除者應立即加以清除，一返於平民化，以躋於民主之實，一若英美人之所爲，否則，少數特殊階級依然於國家艱危之際，仍度其養尊處優，金迷紙醉之生活，我前方將士浴血抗戰，後方民衆踴躍輸將者，果何爲乎？此吾人欲實施憲政所應先革除「不平民化」之反民主習慣者三。

四、作奸違法者反民主

民主政治，貴有共守之憲法，尤貴於有能守法之國民，守法之習慣，可從三方面表出之，一爲遵行法律所規定之事項，此最爲明顯者也。二爲遵照法律發布命令或制定法規，此點最易爲人忽視，因其本身爲執法，往往反忘以法律繩之，而貽莫大之錯誤，例如官吏可以隨便發布命令或制定法規，則人民權利，可隨時被剝奪而無保障矣。三爲不犯法律所不備載之危害公私事件，例如政治上之陰謀與煽上，額外，以及濫造私人系統等均是，此雖不能名之爲不守法，可名之爲作奸，作奸與違法之敗壞國事，不稍軒輊，且自來因奸黨或奸人用事而亡國者

，其禍尤較違法爲烈，蓋違法者其跡顯，事之發也速而禍小；作奸者其跡隱，事之發也遲而禍大，質言之，違法者公然破壞法紀者也，作奸者陰爲破壞法紀者也，法之所不能繩與法之所不能及，皆足以破壞民主政治之精神，而爲反民主政治之事件。即以我國民主政治言，孫中山先生主張最早，今日猶未能實現者，不能不謂被破壞於一部分人之公然違法與陰事作奸也。此吾人欲實施憲政，所應先革除「作奸違法」之反民主習慣者四。

五、侵犯人自由者反民主

民主政治之所求者，厥爲自由，然自由過度申張，則往往侵犯他人，而以欲保一人之地位與一部分人之權勢者，其侵犯人之自由爲最巨，如秦始皇之焚書坑儒，即其著者。民主國家之國民應於憲法以內，享有發展自身能力與發表自己意見之自由，此非僅便於一人，乃所以便於國家也；蓋民主政治之優點，即在國人得自由貢獻其心思才力於國家之機會，而國家方能獲其大益也。若人民自由隨時可被侵犯，則舉國皆噤口結舌，有如仗馬寒蟬，雖有言論機關與議會機關，亦失其效用，是故好侵犯人之自由者，雖日日講求民主，實則彼已反乎民主而行，不啻南轅而北轍。此吾人欲實施憲政，所應先革除「侵犯人自由」之反民主習慣者五。

六、反對革新者反民主

時代前進，吾人之環境亦隨之而異，自宜隨時變革以適應之。彼專制者，因求其政局之穩定，以鞏固其權位，遂以保守爲能事，若民主國家，則追隨時代，惟恐變革之不速，蓋社會之變革愈大，愈能滿足人人之所要求。民主政治者，將以滿足大多數人之要求，非以便於一人或一部分人之要求也。所謂革

新者，就廣義言，即所以滿足大多數人之要求，而改爲充分進取之改革精神也，亦即我昔賢所云：「自強不息」，「日新又新」也。近之如蘇聯，其外交政策之靈活，憲法條文之修改，文化政策之革新，經濟制度之相當改變，皆足以證明其爲應變而不憚改革之頻繁，具有充分進取之改革精神也。又如英法之執政者，最樂於聽從輿論，輿論欲去某員，是果正確，即去某員，欲興某新政，果屬必要，即興某新政，此皆革新之具體表現，足爲吾人效法者也。民主政治，既以滿足多數人之要求爲其目的，自宜以進取之精神，充分發揮其革新意識，一人不願革新，即生一人之阻力，一部分人不願革新，即生衆多之阻力，舉凡消極，頹唐，保守，貪污，淫侈，專橫，皆屬反手革新者也，皆反民主者也。此吾人欲實施憲政，所應先革除之反對革新之反民主習慣者六。

以上所言，舉其聲聲大者，吾人之日常生活習慣，其影響

於民主政治而爲反民主者甚多，端賴人人能隨時自省，隨時革除，以求達於民主光明之前途而已。上述六點，均屬於消極之革除，若能進而求之，則可作積極之自勵，蓋能革除自私利己，即成爲積極之大公無度；能革除剛愎自用，即成爲積極之恢宏器量；能革除不平民化，即成爲積極之誠樸性質；能革除作奸違法，即成爲積極之守法習慣；能革除侵犯他人之自由，即成爲積極之忠恕風範；能革除反對革新，即成爲積極之進取精神。國人能一一身體而力行之，即爲一完美之民主人，一國能有此完美之民主人，即成爲一完美之民主國。然則今日吾國之於民主，似不容諱言，尚有若干困難，殆猶孤舟行駛於大海中，反民主之霧障，與波濤，時時爲之障礙，小不當意，則有觸礁破舟之危，隨波逐流之險，是又國人之所宜戒慎恐懼，加意警惕者也。

芭蕉畔見梅花

登格

大葉搖風綠扇廊，苔枝紅糝靜春香，何當簪個初三月，留與黃昏細細嘗。

病起遊陳莊

登格

竹影雲廳擁一莊，涼生如水靜秋光，登臨洗眼閑愁擲，付與哀蟬訴夕陽。

耕者有其田釋義

余家菊

民國一書五期
33.7.16

耕者有其田，是道義之一，欲實行妥善，宜有切實研究。國中高呼實行者，所在有之。惟對於實情，從事精密之分析者，則未曾多見。用是私懷耿耿，難已於言。又念文人紙上之談，每爲事實之先聲，執筆持論，萬不可苟。所作主張，苟有違於人，亦決非有意立異。實由責任觀念不許其不如是主張。好

在國策不以我之一言而定，固大有商討之餘地也。

茲論耕者有其田，當先分析所謂耕者，其意義何如？第一就職業之專一言之，有人以專門耕田爲事，於耕田以外，不專任何其他職業；有一面耕田，一面兼營其他工藝或商販，或則以他業爲副業或則以他業爲主業，其兼業程度亦大有高低。若專門耕田與兼營他業之人，同名曰耕者，而於有其田上享受同一之待遇，則兼業之人所受利益必較多，而助成其成爲經濟的優越階層，實有背公平之義。若將耕者區別爲專業與兼業兩種，於有其田時，多與專業耕者以扶持之便利，則此項區別殊難精確。自販賤賣貴以至於出購多餘之菜蔬魚蝦，皆可成爲有利可獲之兼業；欲一一取而規定之，勢不可能。此欲確定何謂耕者之第一困難。

第二、就耕者之人身言之，所謂耕者係指耕者本人而言乎？抑兼指耕者之家人而言乎？如專指耕者本人而言，其家老弱由誰供養？及何所憑藉而給以供養？如兼指耕者的家人而言，則各家的人口多寡不一，各人的年壽不齊，父母年齡有高至八九十歲者子女有多至八九人者，所謂耕者宜以五口家爲準乎？抑宜以八口家爲準乎？若低，則人口多者受困苦，準高，則人

口少者佔便宜。依耕者本身以「有其田」，（爲欲避免各種不同辦法之矛盾，祇能用有其田三字以象徵吾意），既無以蓄養老弱，依耕者全家以有其田，而家之大小又不一致，此爲確定耕者意義之又一困難。

第三、就耕者之工作言之，有自身完全耕作者，有自身完全耕作而領導他人幫工者，有自身耕作少許而領導他人大量幫工者，有自身不耕作而指揮他人耕作者，其程度千差萬別，難以等視齊觀。所謂耕者，果概舉此種種而統括之乎？抑僅指自身完全耕作者而言乎？若僅指自身完全耕作而言，則富有管理經營之能力者不得展其所長，無以增進農業效率；如曰：將此概舉爲農官，使任指導之責，則有特長者反不得自營其私事，勢必人人皆將安於愚昧。且人有長於用智者，正如人之體力各有大小，必完全用體力耕作始可名曰耕者，是排斥智慧與組織力（比較言之而已）於農作之外也。若半自耕的領導農人乃至於農作的管理人皆可名曰耕者，則凡有志農業而又有經營能力者，便皆可獲得耕者頭銜，耕者有其田之一政策，對於欲有田者所能加之限制，其分益亦云淺矣。此確定耕者之又一困難。

第四、就耕者執業之久暫言之，則有終身農，間歇農，短期農之分。終身農畢生耕作，甚或父子相繼，絕不改業。間歇農耕作數年改就他業，數年之後又復耕作。短期農耕田若干年後即棄去農業永不復返。如必終身業農始得稱爲耕者，是農人將喪失其改業之自由，而無以適應其身心上，精神上或環境上

之需要，必將苦不堪言。如問欲農短期農皆得享受耕者有其田之權利，當其棄田不耕之際，其田之所有權應即消滅乎？抑仍維持原狀乎？若不耕之時而仍維持其所有權之原狀，是爲「不耕而有其田」；「恐欲有田者將紛紛假充耕者若干時日一俟田已到手即不耕。若不耕則須轉移所有權，則在今日職業變更頻繁之時代，殆將不勝其煩。此確定耕者意義之又一困難。

耕者情況既不一律，田的情狀亦復紛歧。就田的面積言之，有大有小，可得而丈量之。就田的生產力（或土質）言之，有沃壤田，有砂石田。就田的蓄水力言之，有耐旱者，有不耐旱者，前者如沖田，後者如勝田。就田的水源言之，或有水源救濟，或無水源救濟，前者如原野田，後者如梯坡田。就田的安全言之，則有藏收田，每年可冀有收穫；有旱不收田，遇旱即顆粒無收；有水不收田，遇大水即顆粒無收。蕩田，潮田，爲水不收田；崗田，坂田爲旱不收田；畝田（原野田），沖田（山溝田）爲藏收田。田的紛歧情狀，大致如此。

耕者有其田時，有無定額之制限乎？如無最低額之限制，則所有之田，無濟於事，祇是名爲有田而已。若無最高額之限制，則兼併之事必生，而新地主階級起。如所有之田果加以定額之制限，則其所據以爲規定者，究爲耕者之最低需要乎？抑爲耕者之最大能力乎？如爲耕者之最低需要，則前已言之，耕者的家屬，其人口多寡不一。倘以平均數爲依據，則不平之弊即起。假定以五口爲準，在既無父母又無子女之耕者，可佔少三口人之便宜；在父母俱全又有子女各二人之耕者，將受多三口人之苦。一方少三人，一方多三人，是有六口之出入。新經濟制度之創立，而使一個單位之間，發生六口人之懸殊，實爲一不能不加注意之問題。

如耕者所有田額，依耕者能力之最高度以爲規定，則耕者有巧有拙，更不論有勤有惰。巧者全耕而有餘力，拙者耕不善而日不足，必至於田有未盡其用，人有未竭其力。況昔日耕作，一人一年，能耕之最大限易知。今則日趨於使用機器之一途，每一農人使用一套機器，在一年內農作四季內，所能完成的耕作，即令所使用者是最小單位的動力，恐亦遠非昔日所能比擬。其收穫之全部，恐供給全家消費而大有餘。且用機器耕作，所需時間大爲減少，所餘時間，除娛樂教育而外，不能免於其他之經濟活動。由其他之經濟活動，不能不有盈餘虧折之殊。由此盈餘虧折之殊，不能不影響及於農業經濟如肥料之買賣等。由農業經濟的影響又涉及於農民經濟之全部。欲單從農業立場以解決農民問題，已覺困難。更無從單用土地制度以解決貧困問題。

所謂有其田者，係謂有其所有權乎？抑係謂僅有其使用權乎？如係有其所有權，則出售之事，不在禁止之列，出租所有權，更屬合法，與廢除地主制度之理想相遠。與耕者有其田之用意亦有出入。如係僅有使用權，則使用之條件，耕者親自耕作，不得請人代耕，更不得出租使用權，因請人代耕與出租使用權，皆足以造成變相的地主制度。如禁止請人代耕或禁止全部或部份出租使用權，則耕者偶有疾病或因緊急事故必須外出時，此一耕者的耕田便只有聽其荒蕪。如代耕可以允許，則耕有餘力之農人，必競求代耕而願以所代耕地收穫之一部份提供於出租人作爲報酬，於是而地租制度又成立矣。

基於上述之分析，所謂耕者有其田者，當然係謂「凡耕者可有其田，」非謂「唯耕者得有其田。」所謂凡耕者可有其田者，乃表明政府認定自耕農制度爲一種健全的社會制度，不但

足以增進經濟的生產，擴張農民的福利，亦且足為負責任，講信用，重勤儉種種善良風化之來源，故願在一定條件之下，用政府法律力量，助成農人取得其耕地。至於唯耕者得有其田，則係主張散田於耕者，有田者必耕，耕者必耕其自有之田，不但反對佃農制度，亦復反對大農制度。大規模經營，合於經濟法則，使於專門技術之運用，必欲加以反對，可謂落伍思想。至於佃農，欲加保護，要在注意兩點。試略言之。

保護佃農，兩點重要：其一為佃權之穩定，其二為租額之合理。農村習慣，佃權大體穩定，其發生爭議者，究竟僅佔主佃關係中一甚小百分比，不可認若千病態為全體代表例。但究宜用法令明文保障之。保障的條件，不可對佃農為不合理的偏

袒；不然，則有礙於農村經濟之正常發展，亦有礙於農民道德之正常。至於納租額率，其合理標準，為除去還糧納稅外，酌給若干利潤，以鼓勵國民儲蓄心，並保持土地的投資價格以活潑農村經濟。其利潤率可低於商業合法利潤一倍以上，因為土地投資比較商業甚為安全之故。舊日田租以八釐息為依據之標準大可採用。

吾國自秦代以後，名田，限田之法，屢試屢敗，實緣此問題之複雜錯綜。果努力創立自耕農，而又有充分合理之佃農制度，則此一問題大部解決矣。所餘者，雇農問題而已，容再論之。

(六，三)

時已暮冬草本猶未盡黃落晚於人家庭院見梅樹縱橫滿地賦此 登格

缺月和煙黃似屏，江村色尚偷春，侵階日寫龍蛇影，誰識幽香絕代人。

題張問渠畫冊

登格

暖色蒼茫欲無，青山曳杖應相呼，停看一陣催歸字，客枕今宵夢五湖。

凌雲寺

登格

穿徑人來語語奇，茶亭半覺山深，江聲自送應如舊，又見殘陽掛柳林。

此次大戰新戰術與第二戰場之開闢

孫寶毅

據軍事學家言，在這一次的世界大戰，並未改變戰爭原則，曰攻勢，曰安全，曰兵力經濟使用，曰主要目標，曰集中兵力，曰協同合作，曰統一指揮，曰突擊，曰流動性，所改變者，但戰術而已。而其主因，乃由於空軍之發展。

關於空軍與陸海軍之關係，英美軍事學家與將領之間，曾一度互相爭辯。有人認為，由英倫轟炸德國，或由中國轟炸日本，即可擊潰軸心。有人則認為，惟有歐洲戰場上之陸軍，與太平洋中之海軍，始能「決定」戰事。此項爭執之所以起，由於英美為島國，無對抗敵人之陸地戰場，如欲進攻敵人，則須跨越海洋，在未登陸前，惟有空中進攻之一法。至中蘇兩國則為大陸國，且為陸軍國，海軍空軍為陸軍之附庸，故不致發生此項問題。

中蘇兩國以其陸軍，附以海空軍，即可擊敗敵人，但以英美兩國而論，則陸軍須由海軍護送，單有海軍固不足以深入敵境，而空軍在目前亦未達獨立之境，有賴於陸海軍之處甚多，故陸海空三者不可缺一。然以同盟國全體言之，則此次戰爭為一個，盟國在一大戰略下，應各盡其所長，中蘇應發揮其陸軍之職能，追逐敵人至其巢穴，英美應發揮其陸海空之職能，謀三者力量之平衡發展，顯為擊潰軸心最良之策也。戰爭應利用各種力量與兵力，乃一公認之原則也，是故關於陸海空問題，其中心點乃在如何使海軍為陸軍籌劃作戰計劃，陸軍為海軍實施海軍的戰爭，以及如何使海陸軍利用空軍，空軍利用海陸軍，以達到戰爭之目的，換言之，海陸空三者，如何聯合作戰是

矣。

陸海軍為吾人歷代所舊有之物，但空軍在上次大戰時，始露其萌芽，至此次大戰而登峯造極。以前之戰爭為陸海，今大之戰爭，則為陸海空，故陸海空之聯合作戰，稱為此次世界大戰之新戰術可焉。

吾人欲明瞭此項新戰術，須先明瞭陸海空軍三者之職能。陸軍之職能，因吾國為陸軍國，故易於領會，簡言之，即在陸地上展開陣綫攻擊敵人，如吾國與蘇聯然，或至敵前登陸，如英美然，陸軍登陸後，建立橋頭陣地（Bridghead），使後繼部隊陸續開來，進而攻擊敵軍主力。自空軍發展後，可運送空運部隊至敵後降落。

海軍之職能，則較為複雜。與敵艦隊作戰一也，抵禦敵潛艇之襲擊二也，獲航三也，維護海上交通線四也，輸送軍隊至敵岸與佔領區，並供應軍火軍需五也，掃除敵海面水雷，為吾方進犯部隊開道六也，陸戰隊登陸作戰，為吾方進犯部隊之先鋒七也，軍艦炮火掩護軍隊登陸八也，協同軍隊作戰，以軍艦砲火轟擊敵區九也，修繕佔領之軍港十也。艦隻須以油為燃料，故須在各海港及海道上，準備大批運油船。軍火與軍需品，不但種類繁多，且於裝載時，須分先後次序，俾能應付戰時之急需。此外，又須設置修理船隻之設備。於此可見，海軍之任務為何等繁劇矣。

至空軍之職能，可分戰略的戰術的兩方面言之。戰略的空軍為長距離轟炸，以削弱敵人之戰爭潛力，如英美飛機之日夜



轟炸德國飛機製造廠，空軍基地，軍火廠，各大城市與交通補給綫。戰術的空軍則為擊落敵機，殺傷集結之敵軍，破壞戰區敵方工事，據點，飛機場，建築物與交通工具，並掌握戰區空中優勢。及協同陸上部隊作戰，換言之，即伊立奧所謂戰場之孤立，戰場上之空中優勢與戰場中之參加是矣。空軍嚴格分為戰略的與戰術的，本不可能之事，軍事學家威爾納論及此點。空軍以運輸機與滑翔機運送傘兵與空運部隊降落敵後，與夫自空中增援陸上部隊，或輸送軍隊，或供應軍火軍需，則尤為此大新戰中之奇觀。傘兵與空運部隊所攜之武器，有大砲，機關槍，高射砲，及坦克炮等，又可攜帶吉普車，為其交通工具，故敵等降後，即可組成一堅強之作戰單位。與彼等同時降者，有工兵，以破壞敵方工事，鐵橋，橋樑，及安置地雷與炸藥，以阻遏敵方增援部隊之到來；或摧毀交通障礙物，修復橋樑，建築飛機降落場，為吾方進攻部隊準備一切。要之，傘兵與空運部隊之任務為隔斷 (dislocation)，及配合進攻部隊之攻勢。

將以上所言之陸海空三者之職能，連合而運用之，即為聯合戰術。此項聯合戰術，在軍事學上，可謂展開一新頁，至少發生以下三項新現象：第一，任何作戰計劃，大多由陸海空三者當局共同籌劃，第二，作戰時，注重陸海空之協同配合，並謀發揮三者所產生之混合力量，第三，指揮官須明瞭陸海空三方面之職能，而謀聯合運用。目前盟國之聯軍，已由陸海空三方面之智識與技能，是其例也。

英國之蒙巴頓氏，對於此項聯合戰術，最為擅長，邱吉爾曾稱為三棲專家。自一九四〇年起，復任聯合作戰部大臣時，

即與陸軍當局柏吉脫，空軍當局阿格拉拉斯共同籌劃進犯歐洲之登陸計劃。至人員與技術之訓練，則由現主持意大利戰事之亞歷山大將軍與海軍當局凱萊斯負責。蒙氏曾作數次小規模之突擊，以試驗此項聯合戰術之可能性。初次於挪威北部之羅佛敦羣島，第二次於法國西部之聖那曼爾，第三次於治國北部之第厄普，又曾以傘兵降於勃倫凡爾。第厄普一役，突擊隊曾逗留法境八小時以上，當時證明如有充分空中保護，進犯歐洲，並非難事。迨北非與西西里，則為盟方初次大規模應用此項戰術。當盟軍於北非登陸時，艾森豪威爾曾囑咐曰，「此次進犯為最大之聯合戰」。北非之役，盟方出動飛機八百架，西西里之役，則達三千架，並試用傘兵降落。嗣後意大利之役，又有美海軍與尼杜洛之登陸，其規模比不大，但意義甚深，係「阿特蘭提克」，團長奧尼爾曾授命該團於該兩次盟軍登陸時之教訓，修築「大西洋長城」。三連太平洋戰爭，自日本手中奪取馬紹，諸島聯合作戰開始，盟方所得之經驗更多，總吉特氏曾以大批空運部隊降於日軍之後方。英美根據歷次經驗之訓練，隨時不斷接獲敵方情報，迅速擊沉敵軍之潛艇，調發各級戰術人員，並籌劃集中船隻，運送軍隊與軍需等之計劃，以備隨時所「第二戰場」之進攻。此項計劃，據聞最初由蒙巴頓氏擬定，其後以此計劃為基礎。由此觀之，此次計劃準備已達四年之久，中經魁北克會議，與羅斯福之批准，後又得蘇聯領袖史大林之同意，並於六月六日實現之矣。

現代戰爭，從另一方面言之，為一運輸之戰爭也。諸如第一戰事，迄今為止，盟軍猶未佔領如哈佛等與瑟堡等大港，與德方背後之鐵道相形見絀，在運輸上相形見絀，但據邱吉爾言，今

後將在他處登陸，且不以法國為限，可見此次登陸為進犯歐洲之前奏曲而已，吾人固不必以該地戰事之緊弛，而忽喜忽悲也。（按作者此文寫定於上月中旬，其時之惡僑尚未為盟軍佔領）

然從聯合戰術觀點上觀之，則此次登陸，可謂為最卓越之成就矣。敵前登陸，素為戰爭中難事。拿破崙曾試而失敗，希武勒則未敢嘗試。故史大林不得不慶賀盟軍此次在法登陸，為戰史上所未有。聯合戰術，簡單言之，不外乎：第一，於敵岸佔領一立足點，第二，突破敵防禦陣地，第三，進而殲滅敵軍主力。但詳細言之，空軍如何先之以轟炸與空中保護，海軍如何繼之以護送軍隊與砲火掩護，陸軍如何隨後登陸，則屬複雜萬分之事。即以數月來英美飛機之日夜轟炸德國與其佔領國而論，亦何嘗不屬於聯合戰術之一部分。第二戰場未開闢前，蒙哥馬利曾曰「早已開始矣」，即指此而言。

此次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出動艦隻約四千艘，並有較小船隻數千艘，內有主力艦五艘，英三美二，其他艦類約六百餘艘，第一線飛機一萬一千架，空運部隊之滑翔機長達五十里，由此可見其規模之龐大為何矣，史大林稱之為有史以來所未有，洵非虛言也。據德方廣播，盟方登陸人數約四十萬人，但據數學計算，每師團渡海需船隻七萬噸，四千噸一艘之船隻一千四百艘，即可運兵八十師團，從可知盟方此次登陸人數或不止於此也。

茲根據盟方所發佈之公報與隨軍記者之報導，略述當時作戰之概況，以明聯合戰術之內容。

六月五日夜，三百架重轟炸機轟炸沿諾曼第海岸之德方防禦，六日破曉，運輸機與滑翔機裝運傘兵與空運部隊降落於敵後，德方亦約有四等個之舉。五百架中型轟炸機繼續轟炸，戰術轟炸機隨之轟炸一陸灘。戰鬥機出沒空中，構成空中

傘。天微明，海軍砲火開始，射擊沙灘上目標，同時海軍飛機繼續轟炸。進攻艦隻開始放下滿載士兵，坦克，大砲與裝甲戰車之登陸艇。當時海軍大砲之轟擊加強，主力艦亦參加轟擊。掃雷艇往來遊弋開道，登陸艇由其空隙繼續前進。德方海防大砲開始轟擊，但因吾方之轟炸結果，故疏落可數。吾方巡洋艦隊繼續砲擊岸上。全部進攻艦隻繼續向海岸開進，驅逐艦隊逼近海岸，見目標即轟炸，登陸艇紛紛掠過驅逐艦隊前進，飛機仍翱翔空中保護。天大明，第一批空中堡壘出現，敵岸烟火熊熊。主力艦，巡洋艦與驅逐艦，集中砲火，射擊敵岸。驅逐艦隊逼近海岸，甚至八百碼之處。七時二十五分，第一批登陸艇到達海濱，戰士跳出登陸艇，向前躍進。坦克大砲等隨之登陸。空中堡壘之轟炸，現移至敵後。艦隊開始從事巡邏海面。初步登陸，於是告成。至此後之問題，則為如何擴大橋頭基地，如何突破德方防禦線，如何與傘兵空運部隊會合，如何在沙灘陣地佔領區建立飛機場，如何由海軍砲火協助，並護送增援部隊繼續登陸，或使軍火軍需源源而來，以及如何由空軍協助陸上部隊作戰，並轟炸敵方工事鐵路與橋樑等，聯合陸海軍三者力量，以消滅敵方海防部隊與反攻吾方之機動部隊，再進而擊毀其戰略後備部隊，易詞言之，如何充分發揮聯合戰術是矣。盟軍是否有獲勝之把握，全視此項戰術之運用而定。以盟國之實力，與此次登陸所表現之智能而論，其能克服一切難關，最後擊潰德軍，必矣。蓋乎近日來戰局之發展，盟軍似正與德方反攻機動部隊周旋之中，前途尚一場惡戰，乃意料中事。

蘇聯軍事觀察家托爾契諾在紅星報論曰，諾曼第之戰，迄今為止，仍屬戰術性質，且已收重要成就，盟軍可能以此為輔助作用，而在其他對德更危險之處登陸。然不論如何，此後英美所採取之戰術，仍將為聯合戰術，吾人可以斷言者也，即以戰中擊敗軸心國家之王牌，無不可焉。（六月十五日）

英國政治家之兩種典型

靜觀譯

英國克Ernest Barker教授原著

我在我所寫的英國政治家小冊裏，曾經說過英國現在內閣（到現在已有三年半的壽命）含有兩派兩種不同典型的政治家。

一派是貴族血統的政治家；這些人的姓氏和祖宗，都已在十八世紀出了名的；就像邱吉爾，艾登，和李特登。

還有一派是由平民出身的；這些人就像英國史家所稱為起於草莽，而劃身政界，漸至於顯達：如貝文，莫里遜，亞力山大。

回想到這兩種人在現在內閣裏的聯繫問題，在我的書末作下面的結論：

「這裏可以提醒我們，英國政治家之社會的和政治的環境，都已經從貴族政治漸漸趨向到民主政治。（這個趨向現在仍然進行着）

「貴族血統在英國政治家裏面已經很久；到現在仍然活着；並且仍然需要。

「這種貴族門第，還可以執行一種任務（就歷史來說，這種任務或許是最後一次，但不是不重要的）——即這類政治家，應以其為國家效力之傳統，灌輸於新興而且有志向上的勞動政治家身上，因為這些政治家同樣熱心服務，同時在合夥合作中，學習服務方法和技術。

「在現在內閣裏，這種勞動政治家的合作，是一種圓滿而

平等的合作，在這種合作裏，他們得到很大很富的經驗，可以作為一種傳統和遺產，留傳於將來的政治家，使他們以獨立的地位，在新的政治領海之遠程旅行中，把握住國家的船舵。以上這些是在一九四一年寫出的，整整兩年中，更多的經驗，引起更多的感想。這些感想現在用問答的方式寫下。

問題一——一般大眾，乃至於特別組織的勞動者，能夠產生真正偉大的國家領袖，像過去所已有的嗎？

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肯定的答覆。在過去一百年乃至再近些，所有政治的領袖，都由狹窄的範圍內產生，他們的升擢都由家庭關係或影響。

在過去，好人是由這種途徑出現。但是從廣大範圍選出，總比從狹小範圍選出的好；同時從自由範圍中升擢出來的，經過個人自己努力與血汗而沒有任何的援引，總是最好的。

包含着千萬人的勞動者組織是一個寬廣的選出範圍，一個人能夠在這個組織中露頭角，取得高的地位，還能夠憑自己的力量占國會一席之地，進而在內閣裏得一位置，一定要靠他自己的幹才。

有一個危險，就是這種的進身歷時太久，這樣按步就班的升上去，一定要到了老年才可以有所成就。

舊式貴族的進身方法，使得年輕人易於上進；就如青年的皮特在廿五歲的時候就做了首相。

比較起來，勞動政治家進身方法，是不能免於障礙，但是我們及身的歷史，已經證明勞動政治家雖然有障礙，仍能創造

，獲得勝利。

僅僅現世紀之內（不過四十三年）勞動政治家才有了機會。在他們行輩之中已經有屈指可數的人物，如斯諾登，亨特生，麥克唐納，貝文和莫里遜，另外還有別人出來。

現在我們有較好的田地，和較亮的日光，去培養他們的滋長。

問題二——古老的優秀分子能夠向前與思想的新趨勢站在同一陣綫上嗎？他們能夠受時代的激盪，而迎頭趕上，與勞動政治家合作，同時適應今日需要，放開眼光，跟上腳步向左邊嗎？

對於這個問題，有人會答說，英國和英國人通常有一種習慣，既不看右邊，也不看左邊，總是保持中道，（由中道以求調和之路）睜着眼睛直向前去。

另有人會繼續上面的答語說，邱吉爾無論如何都像他前代的父親，他能夠用很漂亮的行動趕上時代，並且具有這種性格的人，也不只是他。

這些貴族，並不是把頭放在泥土裏的。

貴族是在十八九世紀中人道主義，和社會改造之先鋒。狄斯萊里是貴族的過繼兒子，他寫出雪白爾（是十九世紀社會改造的一本最好小說）宣佈了保守的民主政治的主張。

他所宣佈的主張，至今還活着，抱此類主張者有奧斯布洛克爵士和霍格——別人不提——他們在現時長期議會中就是此

項主張之先鋒。

在這種超然的態度，去觀察保守的民主政治是愚蠢的，古

羅馬人有一種大氣在他的肚子裏——那是真火。

國羅馬人——就一般民衆或貴族身上觀察，不會有多數人起

而反對充滿動力的政治家——有朝氣，富有創造力，與強毅精神的政治家——因為這時代裏專門講安全，專門講免於冒險之保險。

對於這個問題，有一種簡易的答覆，無論你怎樣把經濟生活組成一個計劃的安全軌道，但是政治生活總是只有一種軌道（只要英國不失其為英國。）

就政治來說，在地方政府裏，在市會裏，在商業集團裏，以至居於一切之上之議會和台議會議場裏，都是一個很廣大地板，可以容納寬大的野心與尊貴的冒險。在此種種場所中，有很多給人露頭角的機會——去表現判斷能力和辯論權威——讓他們自己顯現出來像一個人物，發揮他們所具有的領袖才。

政治的生活是一個冒險的生活，是上下起落不定的，這種生活在自由國家中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品格的人物。

問題四——大政治家——第一流的政治家——應具什麼樣的性格，這性格是否容易產出於已經過了一半的廿世紀的今日呢？

要用簡短的語句，說出好政治家所應具備的性格，確實是不容易，以至於不可能。但是或許可以舉出三種性格是英國人所希望於英國政治家的。

第一種是對人的諒解，能夠用諒解的同情深入於別人情感；第二種對於社會生活，作穩健和整個的看法，就是我們所謂穩健的判斷；最後一種是對於別人的觀點，要忍耐與容納，不要太偏於論理的（太偏於論理會變成革命），貴於提出調和方案而出於公平與誠意。

這些性格不必怕不能在將來出現。

雖然我們可以說，即在多年以後，也不容易產生一個像現在邱首輔這樣偉大的政治家。
但是這句話並不是說在他之後的時代是貧乏，不易產生人才，不過說一個偉大非常的時代使人容易表現他自身偉大的性格。

本刊已出各期，尙存有少數，此時定閱全年者，可從第一期補足，一俟定完，即不再版。已出各期目錄如下：

(期一第)

努力與恩索(代發刊詞)
確立中華民國對於西強系統之關係及其地位
民主憲政的原則問題
憲法與婦女
討論憲草應有的態度
革命時代與憲政時代
評憲草中中央政府有關各條之規定
日本可能爲憲政國家
改革舊憲法
蘇波問題之演變及其解決之道
羅斯德特口中之德國防禦西歐計劃
新書評介(三則)

左舜生 張君勳 陳啓天 張申府 方一堅 陳一清 張禮和 孫寶毅 抱貞譯 舜生

(期二第)

大愛國心
自由與現代社會
談中國憲政問題
憲政與三民主義共和國
中國憲政運動的歷史教訓(上)
蘇聯紅軍之演進
蘇聯婦女教育的新方向
理學漫談(一)
新書評介(三則)

張君勳 李璜 梁漱溟 余家菊 陳啓天 殷生譯 釋因 余家菊 田父 舜生

(期三第)

建國目的之政治休戰
民主制度與人才的培育與發掘
中國到憲政之路
中國憲政運動的歷史教訓(下)
理財與養民兩觀點下之土地制度
如何綜合尼·史·麥·費氏與日本之戰略
蘇聯擴大十六邦自主權的意義
理學漫談(二)
新書評介

張君勳 左舜生 梁漱溟 陳啓天 余家菊 孫寶毅 費譯 余家菊 張申府

(期四第)

決戰年之一致團結
論轉移風氣
民主憲政的實施問題
中國到憲政之路(一續)
憲政實施後省之地位問題
自由與組織
中華民族與南洋民族
如何處置戰後德國
美將領口中攻到東京之路線方法

張君勳 左舜生 陳啓天 梁漱溟 再 生 張申府 張禮和 殷生譯 抱貞譯

吾人所企望的安靜和平時代對於偉大的需要，和活動的餘地比較的少。但是對於純善的需要却不能少；所謂純善——只要我們能保持我們自己的純善——是不難得之於我們政治家的。

政治家的性格隨國人的性格而定。

婦女在和平會議席上

羅斯福夫人

譯自讀者文摘一九四四·四月號

在目前似乎還看不到和平會議，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了這個會議，我相信我們不只在美國代表團裏可以看到婦女，同時在其他各國也可以看到。婦女既與男人並肩作戰，則將來的決定中，不能不顧到她們的利益。

公平說起來，歷史上男人造成許多戰爭；今後永久的和平實有待於女人來助成。婦女由於天賦的職能，是生命之偉大保存者；而男人只是浪費生命者。男人現時正在放棄他們所不願放棄的特權，即古代沒有女人協助而孤行獨斷的決定國家政治上大問題的特權。

現在伊利薩白皇后，邱吉爾夫人，李定夫人和其他英國的婦女都站出來要從戰爭中展望戰後世界的問題。自然威廉明娜女王（荷蘭女王）和裘梨娜公主也是同樣的情形。俄國從莫洛托夫夫人以下，每個女人都盡她的本分協助軍隊職務。蔣主席夫人也時常不離蔣主席的左右。各國都有許多婦女準備着以世界的眼光去探討戰後發展的情形。

將來凡是國家集合的每個會議，不管討論什麼題目，都要有女人在代表團裏。這不僅承認女人地位的問題，實在是公民教育上的問題。

若是女人不與男人並肩而坐，共聽辯論的進展，那麼所決定的，就不會有智識上正當的根據，同時所決定的若不得各國多數婦女的合作與助成，也就不能實行出來。在女人俱樂部中

消息傳佈得快；像這樣的俱樂部，只要她們有幾個會員能夠與男人同坐於重要的會議席上，則可對於消息的傳播有很大的幫助。

我很驕傲我國有婦女代表在糧食會議席上，並且感覺愉快在聯合國善後救濟會議席上，我國的代表團裏不只有女代表，也還有女觀察員。這些女觀察員都對於特殊範圍內的問題有興趣；她們所提出的事情，若沒有她們在場，就不能得到適當的放慮。我希望在要召集的更多會議裏，不斷增加女會員的數目，與男人共同取得她們的地位。

所有國家的治理，都只顧自己的權益，女人在這方面也不能獨異於男人。但是男人常想從武力或貿易上得到本國的私利，難道女人不能另外想出方法，從改善世界中取得本國的私利嗎？這種想愈並不是說女人不自私，只因爲女人看人類生命保存的價值較重於權力的獲得。女人願意想出合作的方法，而男只想獨霸。

你們會說我的理論無法證明——我可以承認的。可是無論如何，過去的女人在重要會議中都已做出好的榜樣，伊利薩白女皇，和維多利亞女皇都在她們國中做了好領袖，威廉明娜是現在的一個好領袖。

我還記得我國女人初開始加入政治活動時，普通的說法都是一「政治上沒有女人的地位。」男人們脫掉大衣抽着烏烟瘴氣的雪茄煙，喝着飯後的甜酒，把腳放在桌上，以爲這樣的政治聚會一定會得罪了太太們。（可是太太們似乎仍然能夠適應而

存在！

女人在政治上所成就的，也許沒有達到她們所可能成就的，但是在社會立法上確是比女人沒有得到選舉權以前，進步得多。若是有一個問題真刺激到我國女人身上，那麼相信我，到那時男人們就要認識現在的女人真是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了。

我的說法，不僅希望女人出席和平會議。也希望女人列席每個戰後問題的聚會上；我們各州立法院裏，市政府裏國會裏都要有更多多的女人；乃至在政府高級負責的職位上，也要有更多多的女人。她們不是在那裏反對男人，是同他們共同工作，去形成一個新的世界，此新世界不管我們要或不要，總有一天會在我們面前實現出來。男人和女人要在此新世界中共同生活。男女兩方從現在開始共同建造這個新世界。

（讀後感）在國內婦女，掙扎着，企望着，男女待遇平等，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職業機會平等，以及種種反抗男權的呼

輓 劉 泰 龍

江漢聲成死別，交期了付一決瀾。撐風雨換詩酒，照眼河山蝕肺肝。慘澹精魂依佛力，從違身世誤儒冠。長知此後哀君處，終古蕭蕭湖水寒。

登 恪

聲中，讀到這篇文章，以婦女目居於人類生命保存者的羅斯福夫人，所代表的美國婦女，以之與我國的婦女兩相比較之下，更顯見我國婦女的情形是怎樣的黯淡，而婦女本身的能力是怎樣的薄弱。我只願意就這篇文章所說的縮小範圍，努力着。我國的婦女，若果能夠做到在本國內，在自身或家庭中，真實取得人類生命保存者的地位，已經算是大有進於社會了！

其次更有一部分，有心於政治活動的姊妹們，我則希望她以羅斯福夫人看世界的眼光，來看我們國內的政治。我同意羅斯福夫人的說法，「男人只想獨霸，」「女人看人類生命保存的價值較重於權力的獲得」。在國內許多男人爭權奪利所主持的政府下，困苦同民生，我們有數的熱心政治活動的姊妹們，可能高瞻遠矚，獨運心思「想出合作的方法」，替中國政治另闢出路嗎？這似乎是一「民憲」在婦女立場上應有的要求？

卅三年六月十日釋因。

沒有婦女就沒有勝利

王世宣譯

英國勞工及國民服務部部長貝文原著

婦女能左右勝利的天秤，我曾經對大眾說過這句話，現在我仍要絕對斷定的再說一遍，英國若沒有婦女，就一切沒有辦法。

請注意以下的數字：英國高射炮及摩托車製造廠裏的百分之四十四以上的工人是女人。有些製造機身的大工廠裏，僱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女工。製造飛機機械的大工廠裏面大多是技巧的工作，亦僱用了半數以上的女工，至於安置輕巧機器以及電機工具——因為為配裝無線電測位器所以更見其工作的重要——則差不多早已都用女工了。還有許多工廠，女工佔了百分之七十以至九十，在皇家軍用品各大製造廠裏，製造炸藥和裝入炸彈和彈殼，幾乎全部僱用婦女。

——駕此而上，婦女竟代替了男子担任一切重要的職務。運輸方面——在鐵路上有婦女十萬人以上；就倫敦客車而言，已有婦女一萬人以上。郵政局裏——十二萬五千女僱員中有數千婦女担任工程師工作。農務方面——婦女的人數在廿一萬左右，其中有八萬是婦女土地軍的人員，他們對於國內糧食的增產，有驚人的貢獻。

最近連索來全部僱用男工的工廠例如造船廠也聘用大量的女工。勞工及國民服務部最近出版的刊物中，曾列舉婦女在造船方面有一〇七種非常成功的工作。從打鐵匠到電機師，從搬運起重機到輕的鉸釘。我還可以舉例證明，單獨由女工們的合

作，把一隻一隻小輪船上的電器以及電線等等全部裝配，不必男人的幫忙。

二人造船身，一人裝配船上內部的木器，兩個電機師裝配船上的電線設備，另一人安置機械，還有第七個人担任油漆和裝璜的工作，她們在兩星期之內便可以完成小輪船一艘——工作的每階段都由政府派人仔細監工所以都做得盡善盡美。

三年前沒有一個婦女（一切都照着預定方案做）夢想到她們會担任這種工作。倫敦大旅館裏的一個女廚司自特馬路安直到被炸之後，她自己從沒有想到她會做了南部造船廠裏一個接鉚大帽釘的工人；因為她現在所做的工作從來都是男的電機師担任的。

馬堅繼太太，一位年輕少婦，兩個孩子的母親，向為家務煩忙夢想不到她的丈夫要跟着隊伍到北非洲去，在她的孩子疏散到鄉間之後，她竟熟練了一種新行業，就是做一個電機接鉚的專家。以上所舉的事實，不過證明英國幾千萬婦女中極一小部分，她們都是不辭艱難，不計辛苦，呈獻她們的手腦心血於戰時重要的工作。

許多工廠裏婦女所担任的工作，都是十分技巧的，如船首三角帆鑽孔的工作，船上汽壓機及其他工具的製造。他們對於戰時生產的貢獻不僅以數量計，還要算到她們的工作使數千萬現代機械化戰爭所必需的工程師及技師得以脫離工廠。英國婦女得於素不熟悉而需要準確技能的工作，會這樣的勝任愉快，實在是足以自傲。我欽佩那些負起調整停表細微條的工作的婦



女們，還有對那些衝到鑄造廠和起重機的上層，起運大片的鋼鉄溶化物的姊妹們，我也要致十二分的敬意。因為這兩種工作，都需要極度準確和確實。

我向在碼頭上的婦女們脫帽致敬，她們風雨無阻的在那裏起貨卸貨，並且運用偉大的技術能力來裝置無線電測位器，或是幫助男人們看守砲位的混合砲隊，不能不使我肅然起敬。

其實英國服役婦女另外有她們自己的事情。僅就輔助國民服役（軍隊的婦女一方面）而說，她們已擔任了八十多種的工作：自鞋匠烘麵包以至愛克斯射綫攝影術和鉛砲學實驗。婦女空軍隊輔助隊中女子當了氣象觀察和機械師（她們擔任試飛）也擔任氣球掩護隊的司機和廚司，還有婦女海軍輔助隊駕駛小船，渡船及港口船舶，在運輸汽船上搬運魚雷，以及裝置水雷的極冒險工作。

讀者諸君對於這些事實或者相當感動，實在的我認為是可驚人的事蹟。現在我們研究她們工作的背景，在一九三九年英國全國年齡合格於工作的男女有三千三百萬人，其中一千七百萬婦女中之一千萬為已婚婦女，並有相當家庭任務，或負有撫育九百萬個兒女的責任，這種婦女現在有七百萬以上（包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未婚婦女，十八歲——四十歲，二百五十萬的已婚婦女）成了替政府全日工作的僱員：更有六十萬以上婦女因為兒女與家庭的負擔過重，不得以全日為國家服務，也

自告奮勇的於家務之外担任半日工作。

此外成千萬的婦女担任有價值的服務，分配軍士及戰時勞工們的膳宿，疏散兒童或是參加其他自動組織機關裏的工作。

英國政府曾登記全國從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婦女徵召她們參加戰時服務。婦女們前來履行這種義務，不但毫無怨言，並且以踴躍從事為榮。遇有必要就是犧牲個人以至破壞一生的計劃也所不辭。她們離開家庭而到陌生的環境中，負起戰時工作。

不但如此，她們履行日間的戰時工作之外，如遇必要還應用休息的時間為市民安全服務，多多少少的婦女在定時工作之外當了空襲警衛，救火隊，救護車的職員等等，許多婦女不能離開家庭，就把工廠的工作帶到家庭來作，辦公室的職業婦女，自願在星期日或夜間到工廠去工作以替代換班。

軸心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得到國內婦人女子像這樣的為國家工作。他們也不敢希求。可是在英國，則政府用不到去要求，婦女們已經準備好服務了。

所以我仍要用開始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英國婦女們由於他們的願意合作，她們的技巧和她們的艱苦工作，實在已經左右了勝利的天秤。歷史一定可以證明婦女們對於全世界的貢獻，是如何的偉大。

四川省銀行

資本總額 國幣 肆仟萬元
本行宗旨 營業要目

一：發展社會經濟	二：調濟全川金融	三：扶持特產運銷	四：促進生產建設
總行	分行	支行	辦事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宜昌 涪陵 忠縣 雲陽 奉節 巫山 巴東 秭歸 襄陽 樊城 隨州 黃岡 孝感 漢陽 漢口 沙市 宜昌 萬縣 涪陵 忠縣 雲陽 奉節 巫山 巴東 秭歸 襄陽 樊城 隨州 黃岡 孝感 漢陽 漢口 沙市	重慶 成都 萬縣 宜昌 涪陵 忠縣 雲陽 奉節 巫山 巴東 秭歸 襄陽 樊城 隨州 黃岡 孝感 漢陽 漢口 沙市	重慶 成都 萬縣 宜昌 涪陵 忠縣 雲陽 奉節 巫山 巴東 秭歸 襄陽 樊城 隨州 黃岡 孝感 漢陽 漢口 沙市

總行地址：重慶
分行地址：成都、萬縣、宜昌、涪陵、忠縣、雲陽、奉節、巫山、巴東、秭歸、襄陽、樊城、隨州、黃岡、孝感、漢陽、漢口、沙市
支行地址：重慶、成都、萬縣、宜昌、涪陵、忠縣、雲陽、奉節、巫山、巴東、秭歸、襄陽、樊城、隨州、黃岡、孝感、漢陽、漢口、沙市
辦事處地址：重慶、成都、萬縣、宜昌、涪陵、忠縣、雲陽、奉節、巫山、巴東、秭歸、襄陽、樊城、隨州、黃岡、孝感、漢陽、漢口、沙市

聚興誠銀行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儲蓄
----	----	----	----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設重慶森林路
分支行處遍設各地

民憲半月刊（第五期）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人：左舜生
發行人：鄭振文
發行所：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重慶信義街卅九號
定閱處：本社
印刷者：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重慶成都桂林昆明陽長沙衡陽各新書店

時間	冊數	收	費
全年	二四冊	三百二十元	
半年	十二冊	一百七十元	
三個月	六冊	八十五元	

本刊零售每冊國幣十五元
不通匯兌之處，一元的郵票可以代現。下啟寄費，加快或掛號照加。

已呈請社會局轉呈內政部登記中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重慶市同德書報社審查處查照登記字第八號 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九七二號

通惠實業銀行

主 旨
 調濟金融 服務社會
 開發實業 扶助工商
 業務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及法令許可之銀行業務

總行 重慶 大什字 慶
 電話掛號 〇〇四四
 電話號碼 四二〇一
分行 成都 內江 自貢市
辦事處 瀘縣 雅安

中國工礦銀行

利導游資 調濟金融
 營業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兌
 扶植工業 協進生產

西 安 沙 州 柳 州 貴 陽 重 慶
 昆明 桂林 衡陽 陽明 林自貢市

總行：重慶 森林路二號
 電話：二二四八 二二九一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掛號：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大同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部 行 銀
 重慶分行：重慶 陝西街
 西安分行：西安 陝西街
 昆明分行：昆明 陝西街
 桂林分行：桂林 陝西街
 貴陽分行：貴陽 陝西街
 衡陽分行：衡陽 陝西街
 柳州分行：柳州 陝西街

儲 蓄
 重慶：重慶 陝西街
 昆明：昆明 陝西街
 貴陽：貴陽 陝西街
 衡陽：衡陽 陝西街
 柳州：柳州 陝西街

交通銀行

爲各工廠：
 謀求戰後復興之準備
 解決添購機器之困難

舉辦：
 工廠添購機器基金存款
 存額 至少國幣拾萬元
 期限 至少一年但得分期繳存
 利息 照本行定期存款利率計息

- 優待辦法**
- 1 存款期滿後工廠以之添購機器如有不足得向本行商借最高額可達已繳存款之總額
 - 2 存戶借款定購機器時由本行代辦其需自辦者由本行代付價款
 - 3 存款未滿期前訂購機器得向本行商請保付價款
 - 4 此項存款到期時如不需添購機器可申敘理由取回全部本息

本期定價同幣拾伍元

憲

政

第六期

第一卷

民主政治的哲學問題（上）

陳啟天

聯合國家中之治國與亂國

張君勱

我們為什麼要民主與自由？

張中府

論公務員的政治權利

程仁

五五憲草中之行政院

陳一清

論教育上之物力與人力

余家菊

教育為再建戰後世界的重要因素

崇實譯

當前國際金融問題的檢討

楊宜林

論雇農制度

余家菊

世界公民之養成

毅生譯

萬竹樓隨筆十三則

舜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SECRET

蘭州	西安	昆明	貴陽	杭州	衡陽
內江	江津	瀘縣	宜賓	成都	梧州
重慶	白沙	磁器口	合川	上海	長沙

中央信託局
民國政府特准設

資本伍仟萬一
各種普通儲蓄存款
節約國內儲金儲券
定期有獎儲蓄
特種有獎儲蓄
各種信託及代理業務
產物水火保險
臨時陸地及險運貨物險

香港總商會及商會
代辦國內外材料
工業品進口土產出口
印製各種印花
辦理運送
會計服務

總局——重慶第一模範市場
代理處——
外埠各埠

手續敏捷 信用穩固

民主政治的哲學問題（上）

陳啓天

任何政治都有一種根本原理。一切政治的根本原理，學者通稱為政治哲學。民主政治是一種近代政治，其所應具有的根本上原理是什麼呢？換句話說，民主政治的哲學是如何呢？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須先將民主這個名詞由意義限定在政治方面。因為這個名詞的原始意義，雖僅屬於政治方面，而近代人對於這個名詞的解釋，則一天廣泛一天，幾乎可以應用於人間的一切。自政治以至經濟，自國內以至國外，都可任人拿「民主」去解釋，而均能言之成理。不過如此廣泛的用法，只可單稱為「民主」，却不可合稱為「民主政治」。本篇只討論民主政治，故仍將他的意義限定在政治方面。

政治是一種生活，這種生活的圓滿表現，必須一面有一種政治制度，而同時又有與之相應的一種政治風度。研究某種政治制度的根本原理，我們可稱之為某種政治哲學。研究與某種政治制度相應的某種政治風度之根本原理，我們可另稱之為某種政治的人生哲學。通常談政治哲學的人，多將一種政治哲學所應具有的一種人生哲學合併研討。現在我們研討民主政治的哲學問題，將民主政治的政治哲學與民主政治的人生哲學分別說明，只是求其易於了解，不可因此誤會此兩種哲學絕不相關。

民主政治的政治哲學，亦可簡稱為民主政治哲學。這種政治哲學，與教育政治哲學，貴族政治哲學，軍國政治哲學，君主政治哲學以及黨主政治哲學等，截然不同的處所，在人民對於政治實際有無主權。人民在實際上有主權的政治，才是民主

政治。其他政治，雖人民僅有名義上的主權，而在實際上則人民均絕無主權。換句話說，民主政治必須主權確在人民，必須人民在政治上居於最高無上的地位。所以民主憲法多要規定「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不過只有憲法條文的此種規定，只能算是人民有了名義上的主權，却未必真有實際上的主權。有若無實的人民主權，即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即是違反了民主政治哲學的第一原理——人民主權說。人民主權說，創始於法國盧梭，詳見他「著的民約論」。（中華書局已有馬君武的中文譯本）關於民約的說法，現代學者雖多所批評，但關於人民主權的說法，則自盧梭以來的民主政治學者，莫不視之為民主政治哲學的第一原理。否認了此第一原理的政治哲學，便不是民主的政治哲學；抹煞了此第一原理的政治，便不是民主的政治。所以凡近代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都要類及此第一原理，都要極切使人民在實際上擁有最高無上的政治主權。人民擁有的政治主權，各民主國家雖大小不盡同，但實際政治不可與此第一原理相反，也不可完全使人民主權有名無實；則為一切民主國家的通例。

由民主政治的第一原理，復演繹出若干基本理論，以構成民主政治的整個政治哲學。這里所說的若干基本理論，依我看來，至少應包含以下數項：

第一、國家與政府的分明——在近代民主政治尚未出現以前，國家與政府兩個觀念，每每易於混同。身居政府的人固常常以為政府就是國家，如像法國路易十四所說「朕即國家」一

樣，要人民用服從國家的忠誠去服從政府，並且服從政府中的人員。即人民也多以為忠君就是愛國，服從政府就是服從國家。分不清楚國與國，也分不清楚政府與國家。到近代民主政治出現以後，始能使人認識政府與國家的嚴格劃分。在民主政治下，政府雖也是國家的必要機關，但政府的形式須依人民的意向而規定，政府的人員須依人民的意向而更迭，政府的政策須依人民的意向而決定。所以人民在政府之上，而不在此政府之下；人民直屬於國家，而非直屬於政府。人民既直屬於國家，則人民與國家的關係便直接起來，使政府不能冒充國家，而人民乃愈覺國家可愛。人民既在政府之上，則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便倒轉過來，使政府不能欺壓人民，而人民愈覺政府必要。政府既不能冒充國家，又不能欺壓人民，則國家與政府的劃分，近非常顯明，不易再混同了。不但不易再混同，而且也不易再將政府放在國家之上了。如此劃分國家與政府，在現在雖已成為一種政治常識，但此種政治常識的根據，則須溯源於民主政治哲學。換句話說，只有民主政治哲學，才確認，並易於使人確認國家與政府的嚴格劃分。也可以說，國家與政府的嚴格劃分，是民主政治哲學的一種基本理論。現在我們談這種基本理論，似乎不免辭費。不過在事實上還有人將政府放在國家之上，即由於不明瞭這種基本理論，故不得不首先提示出來。

第二統治與被治的交錯——凡非民主的政治，其政府必是單純的統治者，其人民必是單純的被治者。換句話說，政府是一高高在上的階級，而人民則是另一低低在下的階級。此兩階級的身分，或基於世襲，或基於統治者的特殊規定，不但非常特殊，而且嚴格固定，無由使下情上達。至於民主政治，因為必須承認國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則其政府不是單純的統治

者，其人民也不是單純的被治者。所謂國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用舊的話解釋，是一不分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司馬談論法家語見史記太史公自序）用新的話解釋，是法律不因國民的任何區別，即不因國民有男女、種族、宗教、職業、階級與黨派等區別，而設立歧異的待遇。從法律上看，是國民的法律平等。從政治上看，又是國民的政治平等。法律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必要保障，政治平等是法律平等的必要內容。如果沒有法律平等做保障，則政治平等無由完成。如果沒有政治平等做內容，則法律平等亦成為具文。所以民主政治既要求法律平等，又要求政治平等。全體國民在法律上與政治上均獲得平等之後，則統治與被治成為一種交錯狀態，而非完全對立了。全體國民都有政治平等，即是說全體國民都有權過問政治，都有最高無上的主權管理政府。在表面上，政府是統治者。但在實際上，政府須受主權人民之監督，而不能任意統治。又在表面上，人民是被治者，但在實際上，人民只受治於其所同意的政府，而非受治於其所不同意的政府。從一方面看，是政府統治人民。從又一方面看，則是人民統治政府。這是民主政治下統治與被治的交錯狀態。如果只許政府統治人民，不許人民統治政府，則統治與被治完全對立，必非民主政治了。更進一步說，民主政治的最高統治者，只有人民，政府不過是由人民授權的代治者而已。人民一面授權政府代治，又一面監督政府施政，使其無背於民意。所以民主政治即是人民自己統治自己。人民自己統治自己，則人民既是統治者，同時又是被治者。這更是統治與被治的一種交錯狀態。民主政治的統治與被治既應如此交錯，則其所要求的理想人民，不是順民，也不是逆民，而是國民或公民。所謂公民，要能一面領導，一面服從，而盡

力於公事。(按公民二字，係英文 Citizen 的譯文。Citizen 的原意，實為市民。但我國古籍所謂公民，則非市民，韓非子五蠹篇有「公民少而私人衆」的話，是以公民與私人對稱。民主政治正要求反於私人的公民，取之以譯 Citizen 含義更足。可惜一般使用公民二字的人們，多不知二字在我國古籍中的來源及其意義耳)。又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理想政府，不是神聖政府，也不是全能政府，而是人民政府。所謂人民政府，即是為人民所有，由人民所治，並為人民所享的政府。至於非民主政治，則統治與被治完全對立，無由彼此交錯。因此非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理想人民，只有順民。不肯做順民，則只有鋌而走險的去做逆民。既不肯做順民，又不肯做逆民的公民，則在非民主政治的政府下無法生存。因為公民要過問政治，要批評政治，要管理政府，要監督政府，不是非民主政治的政府所能允許的。又非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理想政府，既是神聖政府，又是全能政府，絕對沒有人民政府的意味。但政府總是由人組織而成，並非由上帝組織而成，那能既神聖，又全能呢？所謂神聖，不過自欺欺人而已。所謂全能，不過禍國殃民而已。總之，民主政治的又一基本理論，是統治與被治的交錯。統治與被治既交錯，則政府與人民易於成為一體。平時以之修明政治，則政治易於修明。戰時以之一致對外，則對外易於一致，決不重像非民主政治的政府與人民，無論平時或戰時，都永遠對立敵視，無由調和了。

第三、權力與自由的均衡——一切非民主的政治哲學，只有一個最基本的觀念，即權力，即只認政府有絕對的權力，而不許人民有任何政治自由，如言論出版集會集社等自由。這種只有政府權力，毫無人民自由的非民主政治，有以下數種流弊

：(一)人民頹喪萎靡而無活氣，雖本有才智，亦皆埋沒而不能用；(二)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則大多數人的期望意見需要，皆不能得到充分的注意；(三)剝奪人民的人格與責任，使人民對於政治徒有破壞的能力，而無建設的能力；(四)統治階級本身愚昧腐化甚至橫暴，無由使政治安定並進步。(以上各種流弊，詳見英國政治學家拉斯基現代國家自由論第三章，商務印書館有譯本)要免除以上各種流弊，只有一個辦法，即須以民主政治代替非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即須在政治哲學上以人民自由的觀念，修正政府權力的觀念，使權力與自由得到一種均衡。權力雖是政治上必要的一種工具，但欲使政府不濫用此工具，致禍國殃民，必須人民將最高的權力或最後的權力，即主權，拿到自己手裏。人民有了政治的權力，然後才能有政治的自由。人民沒有政治的權力，便無所謂人民政治自由。只是授人以柄，任人為所欲為，而自為其所困。所以近代民主政治運動，從一方面看，是人民向政府爭自由的一種運動；從又一方面看，則是人民向政府爭權力的一種運動。如果我們仍用舊的權力觀念說，(謂權力僅屬於政府)則自由與權力適相對立。近代初期的民主政治運動，正如此。如果改用新的權力觀念說，(謂政治主權在人民，政府的權力須隸屬於主權，而受人民的監督)。則自由與權力適相合一，而不能分離。業經完成的民主政治，應是如此。在民主政治之下，人民權力之所在，即人民自由之所在；人民自由之所在，亦即人民權力之所在。人民要求政治自由，即係要求政治權力；人民要求政治權力，亦即係要求政治自由。只有政治自由，而無政治權力，則政治自由便無保障。所以有人將自由與權力合為一個名詞，而稱為「自由權」。又有人只為政治權力，而須屬於人

民，而稱之爲「民權」，或人民主權。在民權、或自由權、這幾個名詞之下，包含有自由觀念，也包含有權力的觀念。就此一點看來，即可證明自由與權力的合一。

如果我們更推展點看，非民主政治的權力與自由，也可以說是合一的。因爲非民主政治的政府，既有權力，便有自由。其不許人民有自由，便是不許人民有權力，便是怕人民有了自由之後，便有權力也。不過尚有一重要點不同，即非民主政治的權力與自由，僅限於少數統治階級，而民主政治的權力與自由，則須分屬於全體人民。

民主政治的權力與自由既是合一的，又是分屬於全體人民的，那末權力與自由將如何運用呢？這在原則上，必須使權力與自由得有一種均衡，然後始能使政治既有秩序，又能隨時改進。所謂權力與自由的均衡，詳細說來，宜分爲以下幾層意思：第一、在權力與自由的均衡原則之下，也需要權力，但不需要絕對的權力；也需要自由，但不需要絕對的自由。完全舍去權力，則政治的事體，便根本無法推行，所以雖民主政治仍需要權力。不過權力一經成爲絕對，則必非民主政治，所以又不需要絕對的權力。完全沒有自由，便非民主政治，所以民主政治需要自由。不過自由過於極端，則恐成爲無政府狀態，所以又不需要絕對的自由。絕對的權力，或絕對的自由，均足使權力與自由失去均衡。只有相對的權力與相對的自由，才能使權力與自由得到一種均衡。第二、在權力與自由的均衡原則之下，人民必須確實保有的權力，是最高的權力，或最後的權力，即主權。人民必須確實保有的自由，是基本的自由，即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由、及集會結社自由等。人民確實保有最高權力的方法，雖因直接民主政治或間接民主政治不同，但無

一不有一個民選的議會，以實行立法，並監督行政。人民欲確實保有基本的自由，則須一面不司法獨立的法治保障，又須除得人民或其代表同意外，無論何時，也無論何人，不得任意限制人民的自由。如果人民不能行使主權，又不能保自由，則權力與自由即失其均衡，而非民主政治了。第三、在權力與自由的均衡原則之下，中央政府的權力也需要一種均衡，即中央政府的權力，須斟酌分配於數機關，不得完全集中於一機關。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權雖不能絕對分立，但總須各有一機關分掌其事。在實際運用上，立法與行政機關雖可妥爲溝通，但不可使行政機關完全有名無實，也不可使立法機關完全有名無實。如果立法行政司法有一機關完全成爲有名無實，或主權完全集中於一機關，則中央政府與地方權力即失其均衡，而變爲非民主政治了。第四、在權力與自由的均衡原則之下，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也需要一種均衡，即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範圍，須妥爲規定，使中央集權僅以保持全國統一之必要程度爲限，其餘則可任地方分權，依照地方情形，各自分圖發展。絕對的，或完全的中央集權，不但在事實上無法做到，且勉強到了，也做不好，並能不久。絕對集權的結果，多半不統一，而是分裂。因爲絕對集權，即易招至外部的強烈反對，又易釀成內部的尖銳分化也。中山先生有見及此，在建設大綱上主張中國宜建立一種均權制度，不偏於中央集權，亦不偏於地方分權，實深合於權力與自由的均衡原則。可惜五五憲章並未切實採用此種均權制度。我國一般人多半知道過重地方分權足以招致分裂，却不大知道過重中央集權也是以招至分裂，且有時更易於招至分裂。這點政治知識的欠缺，是我國近數十年來變亂紛紜的一個原因。今後要談政治建設，對於此點亟宜加以注意。

我國從前稱過重中央集權爲「內重外輕」，過重地方分權爲「外重內輕」。所以稱爲內重外輕，或外重內輕者，即以其均失去權力與自由的均衡也。總之，民主政治必須人民與政府，立法與行政、中央與地方各方面，在權力與自由上，均發到一種均衡，乃其基本理論之一。我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多過重政府而忽視人民，多過重行政而忽視立法。多過重中央而忽視地方，致權力與自由失其均衡，不易建立起民主政治。今後欲實行民主政治，則須極力矯正此種不合時宜的傳統政治思想。

第四、法治與人治的合一——法治與人治，是我國固有的兩個老名詞。在這兩個老名詞之下，各別代表一派政治哲學。儒家主張「爲政在人」，「爲政以德」，構成一種人治的政治哲學。法家主張「任法不任人」，另構成一種法治的政治哲學。這兩派政治哲學，自先秦爭論到現在，尙無定論。贊成儒家的人，必定偏重人治，而非薄法治。贊成法家的人，又必定偏重法治，而非薄人治。由儒法兩家的對立，演成人治與法治兩種理論的對立，使人誤解人治與法治只相反而不相容，這是中國政治哲學史上的一大不幸，也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大不幸。爲什麼說這是中國政治哲學史上的一大不幸呢？因爲誤解了法治與人治只相反而不相容，則不入於儒，必入於法。彼此各執一曲，相攻不已，殊難使政治哲學比儒法兩家更進一步。我們試看秦漢以後兩千年中的中國政治哲學史，均大體不出先秦各家的範圍，便足證明。又爲什麼說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大不幸呢？因爲在理論上誤解了法治與人治相反而不相容，則在實際上和信人治的人，無由完成真人治；相信法治的人，也無由完成真法治。結果，多只得到私治與偽治，使中國政治雖經過了長期的歷史，迄今猶不能修明。我們試看兩千年來的中國政

治歷史，人治少而私治多，法治少而偽治多，治時少而亂時多，便是證明。（關於私治與偽治的說明，詳見拙著新社會哲學論。）

現在我們研討民主政治哲學，則須知道法治與人治合一的新理論，不可再囿於儒家或法家的成見，而誤將法治與人治分離了。從一方面看，法治與人治合一的民主政治哲學，似可以說是法家與儒家政治哲學的一種新綜合。不過我們要記着：儒家所說的人治，是專制的人治；法家所說的法治，是專制的法治。至於民主政治哲學中所謂人治，固是民主的人治；所謂法治，也是民主的法治。民主的法治與民主的人治，在本質上，與專制的法治及專制的人治，大大不同。所以法治與人治合一的民主政治哲學，雖似是儒法兩家政治哲學的一種新綜合，但又根本異於儒家或法家的政治哲學。

關於法治與人治合一的道理，我曾在拙著新社會哲學論（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專章討論過。現在爲使人明瞭法治與人治合一，是民主政治哲學的基本理論之一，還須加以研究。我在新社會哲學論中曾說：

一切政治離不了法，也離不了人。法與人兩個要素結合起來，始成爲政治。論其價值，則法與人同等重要。論其關係，則法與人互相影響。論其本質，則法與人合爲一體，而法治與人治不可分。

法治與人治，在本質上，不但應該合一，而且實在合一。何以見得法治與人治合一呢？這可以從數方面加以說明。首須說明法治是人治的準繩，人治是法治的實現。一切政治，必須有一種公共的準繩，這種公共的政治準繩，不是人，而是法，人須依法而治，法須待人而行，既是法

治，又是人治。就人治的羣繩而言，可稱之爲法治。就法治的實現而言，又可稱之爲人治。法治與人治，則人治不離立，法治沒有人治去實現，則法治不能行。羣繩與實現不可分離，所以法治與人治是合一的。我須說明法治外無人治，人治外無法治。從前的人，誤將法治與人治分離爲二事。於是或者在法治外求人治，而人治終不可得。或者在人治外求法治，而法治也終不可得。不知人治的人，固即是法治的人；法治的法，應即是人治的法。法治之中有人治，法治以外無人治。人治之中有法治，人治以外無法治。欲求真人治，必須在法治之中去求。欲求真人治，又必須在法治之中去求。舍人治求法治，或舍法治求人治，兩無是處。何以故？法治與人治不可分也。

以上所引，是就一般政治泛論法治與人治合一的道理。其實嚴格說來，只有民主政治才易於顯出法治與人治的道理，也只有民主政治才易於實施法治與人治合一的政治。至於專制政治，則法治與人治易於分離，好像兩不相關，所以才有人只知注重法治，或人治。何以說只有民主政治才易於顯出法治與人治合一的道理呢？因爲在民主政治下的法治，不僅是由政府以法治人民，而且是由人民以法治政府。政府須依法而組織，依法而活動。政府稍有不法，如普通違法問題，便足引起人民的指責。大有不法，如違憲問題，便必爲人民所推翻。因此，非合於法治的人治，便不能在政府中立足，這是在法治中有人治，這是從法治中可以顯出人治來。至於專制政治下的法治，則多是政府以法治人民，而人民却不能以法治政府。政府要怎樣，人民除服從外，不能反抗。政府本身雖常公然犯法，而人民也莫可如何。從前有一個諺語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正是諷刺專制政治下的法治，只是片面的假法治，只有法治而無人治。

又因爲在民主政治下的人治，不僅是少數的人治，而且是多數的人治。所謂多數的人治，就政府說，則每一機關自上級至下級都要是才與職相稱的人治；就人民說，則須一面保障政治自由，一面盡力政治責任，以完成一種名實相符的公民，也要是一種廣義的人治。如果人民不能保障政治自由，並盡力政治責任，則是人民欠缺民主的人治條件。如果多數政府人員不能才與職相稱，則是政府欠缺民主的人治條件。在專制政治下的少數人治，或可舍去法治不講。但在民主政治下的多數人治，必須同時又是法治，始能做得通。所以法治與人治在民主政治下必須是合一的。

何以又說只有民主政治才易於實施法治與人治合一的政治呢？因爲民主政治必須實施憲政。所謂憲政，不僅是一種法治，而且是一種人治。憲政的法治，即憲法以及法律所規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憲政的人治，即政府以及人民都須依照法治軌道而行動的民主政治風度。在成文憲法國家，憲政的法治與人治，尙易於分別說明。在不成文憲法國家，則憲政的法治與人治，均一併凝結在憲法慣例中，難於完全劃分。所以憲政既要有法治，又要有人治。只有憲政的法治，可以說已經具體了憲政的形式，但不能說是已經具體了憲政的精神。如何而後才算具體了憲政的精神？那便須有憲政的人治，那便須政府以及人民都有民主政治風度。如果缺乏憲政的人治，便不能運用憲政的法治。憲政的法治方法，可從外國借來。憲政的人治精神，則須自己學習。近四十餘年來，我國談憲政問題的人，多半只知憲政是一種法治，却不不大知道憲政又是一種人治。因此談來

談去，大半屬於憲政制度方面的問題，而過於忽略憲政風度方面的問題，尤其忽略憲政法治與憲政入治宜如何而後始能相應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實行君主專制政治已經過兩千餘年的國家，在政治傳統上既少有憲政的法治，更少有憲政的人治。今後如果要真的實行憲政，首須注意憲政的人治問題，即民主政治風度問題，次須注意憲政人治與法治相應的問題，以求法治與人治的合一，然後乃能建立起一種憲政制度。不然的話，則所謂憲政，不過是一種空談，或一種點綴，連憲政制度的形式也談不上，又有何益呢？從前滿清政府的預備立憲，便是如此，可為殷鑒。

第五、秩序與進步的並重——任何一種政治，都須建立一種秩序，民主政治一也須建立一種秩序。不過民主政治只以秩序為手段，而不以秩序為目的。換句話說，民主政治不但要有秩序，而且要有進步。秩序只是進步的必要手段，而非政治的惟一目的。因此秩序與進步並重，便成為民主政治哲學的基本理論之一。此一基本理論包含的要義很多，試扼要加以闡明如下：

首須說明的，是民主政治所欲建立的秩序，與專制政治所欲建立的秩序，截然不同。簡單的說，民主政治所欲建立的秩序，是民主的秩序；專制政治所欲建立的秩序，是專制的秩序。詳細的說，民主的秩序，是一種有機的、和平的、平等的、內容多的、同外容異的、生氣勃勃的秩序；專制的秩序，則是一種無機的、殘酷的、階級的；一中不容多的、同外不容異的、死氣沉沉的秩序。關於有機的與無機的、和平的與殘酷的、平等的與階級的、生氣勃勃的與死氣沉沉的，兩種秩序差異，非常顯明，用不着解釋。至於所謂一中容多或不容多，同外

容異或不容異，則須稍加解釋。孟子上說：「天下無乎定？定於一。」定於一的本來意義是說定於一尊，或定於一王，而不容有多尊，或多王，以建立一種專制政治的秩序。這便是我所說的一中不容多。在民主政治之下，或者根本無王，或者君主統而不治，自無所謂定於一王，或一尊。民主政治的一，應是一國家與一主權。全體人民共同生活在此同一國家與一主權之下，沒有誰能獨尊，所以一中容有多。多，是就全體人民說，不是就國家或主權說。民主政治既係一中容多，必自須同外容異。同謂感情利害意見等相同，異謂感情利害意見等相異。全體人民的感情利害意見等，有的相同，有的相異。凡感情利害意見等與我相同者，固容之，即與我相異者，亦容之，此之謂同外容異。我國古語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即是說明同外容異的道理。至於專制政治，則謂我者生存，逆我者亡；只許有同，不容有異。所以他的秩序，與民主政治完全相反。民主政治既一中容多，又同外容異，自然構成一種有機的、平等的、和平的、生氣勃勃的民主秩序。專制政治既一中不容多，又同外不容異，也自然構成一種無機的、階級的、殘酷的、死氣沉沉的專制秩序。

因為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的秩序自然不同，所以他們保持秩序的方法也截然不同。民主政治是用建設秩序的方法來保持秩序，而專制政治則是用破壞秩序的方法來保持秩序。專制政治所賴以保持秩序的最要方法，不外暴力與陰使。（此名詞詳見韓非子，今名不一，或稱政探）。暴力與陰使名為保持秩序，而實不過破壞秩序。使用破壞秩序的方法，以求保持秩序，如何能長治久安呢？所以專制的秩序，只能震驚一時，決不能保持永久。其所以不能保持永久的重要原因，不在專制政治所

最不容有的異己，却在特以勸除異己的暴力與陰使一經慣用之後，常不免發生一種異樣的心情，即無論對何人都視為異己，甚至對同志也以異己視之。如此一來，則人人自危，秩序便不能保持了。這用舊話說，正是韓非子所謂「說使」——按說使謂使用的手段與希望的目的不相應。用新話說則是專制政治自掘墳墓而已。至於民主政治所以保持秩序的最好方法，則不是暴力與陰使，而是輿論與法院。輿論講是非，法院定曲直。凡有益於秩序的事或人，輿論必是之，法院必直之。凡有害於秩序的事或人，輿論必非之，法院必曲之。輿論與法院一經有了權威以後，則秩序自能長期安定，不必再用其他方法去保持了。所以可以說輿論與法院是建設秩序的最好方法。所以民主政治必尊重輿論與法院。

總說起來，專制政治的秩序固不合理，其所用以保持秩序的方法更不合理。因此，專制政治的秩序，便時時有問題，處處有問題，不得不特別注意秩序的問題，而無暇及於進步的問題。但又因其所以保持秩序的方法，大抵是破壞秩序的方法，即自己造亂的方法，於是越想保持秩序，而秩序反越成問題了。民主政治的秩序既極合理，而其所以保持秩序的方法又極合理。因此，民主政治的秩序，便不會常有大問題。縱偶有小問題，也不難訴之輿論或法院，而獲到公平的解決。於是民主政治，除注意秩序問題外，尚有時間與精力注意到進步的問題。所以說民主政治兼重秩序與進步。

以上所說的進步問題，專指政治的進步問題而言。關於政治的進步問題，通常不外兩大目標：一為對外求國家的發展，二為對內求人民的幸福。專制政治對於此兩大目標不能兼顧，多半假借圖謀國家的發展，以犧牲人民的幸福。人民為圖謀國

家的發展，而犧牲若干幸福，本是近代國家對於人民應有的一種要求。不過專制政治所謂圖謀國家的發展，多半是一種假託，而其實際則重在圖謀特權階級的利益。國家至上其名，特權階級至上其實。如此，則專制政治對於人民的幸福問題固不能即大進步，即對於國家的發展問題也未必能有大進步。有些人們以為專制政治有時也能求進步，歷史上不乏其例。殊不知專制政治所能得到的進步，多屬暫時的性質。時過境遷，便難免不化為烏有。即此一時的進步，也非特權階級多數贊助，或其本身法紀嚴明不能辦到。要特權階級贊助，或其本身法紀嚴明，實是世間稀少的事體。所以我們要專制政治真能福國利民，恐怕比升官入天堂，還要困難得多。

只有民主政治比較注意政治的進步問題，也只有民主政治比較易於使政治進步。因為民主政治有促進政治進步的較好方法，而專制政治則多無之。民主政治所以促進政治進步的方法，通常約有三大種：一為輿論制度，二為代議制度，三為多黨制度。所謂輿論制度，是容許各種人民設立公開的言論機關，如日報雜誌等，以批評政治，並指導政治，而不得任意加以法外的干涉。實際政治經過輿論的批評與指導以後，自易於隨時改進了。如果政府不依照輿論切實改進政治，則必然引起政府的更迭問題。在專制政治下，雖亦有言論機關，但多屬官式的或半官式的性質，民間的輿論機關極難存在。因為專制政治既不要輿論指導，更怕輿論批評也。古今中外不怕輿論批評，並經得起輿論批評的政治，才是較好的政治，才是易於進步的政治。所以專制政治不如民主政治，所以民主政治必確立輿論制度。

代議制度，雖萌芽於從前的專制政治時代，但名副其實的

代議制度，到民主政治時代始能行之。民主政治，是人民自己管理政府的統一政治。不過人民的數目，在小國也有數十萬，在大國則有幾千萬，乃至幾百萬，勢難個個人民都親自去管理政府。只有一個辦法，即由人民選舉代表，組織議會，實行立法，並監督行政。這便是所謂代議制度。代議制度雖非盡善盡美，但人類的智慧，迄今還沒有發明比他更好的一種政治制度。所以民主國家，無論採用直接民主政治制度與否，亦無論採用總統制或內閣制，都要確立一種代議制度。代議制度是發揮民意，以改進政治的一種必要方法。有此方法，則不惟政治不得與民意相反，且須依照民意以改進政治。無此方法，則政治與民意背馳，必非民主政治了。

多黨制度，是隨代議制度而發展的一種黨派制度，也可以說是實際運用民主政治的一種必要方法。人民對於政治的意見，有的相同，有的相異。相同的結合成為一黨派，相異的又另結合而成為一黨派。於是全國人民分為兩黨，或三黨，或更多的黨派，此之謂多黨制度。只有民主政治，才確認多黨制度。至於專制政治，則概為一黨制度。換句話說，凡是民主政治，必有政府黨，同時又有一個以上的反對黨。政府黨的任務，在實施政治。反對黨的功用，在批評政治。反對黨對於政治的批評，有時或雖不免過於求全責備，但是政治切實改進，而減少私污，正賴有反對黨的批評。如果今日的政府黨，因反對黨的批評而下台，仍可退居反對黨的地位，以嚴格批評明日的政府黨，使政治因之又進一步。多黨如此循環不已，則政治常有更新又新的氣象，不致像專制政治，除革命外，便沒有改進政治的希望。不過多黨制度要運用得法，必須注意以下三個要件：（一）同黨與異黨的共存共榮，（二）在朝與野的互相

監督，（三）外交與作戰的對外協力。只有同黨存在，不許異黨存在，便非民主政治。只許存在朝黨，不許存在野黨，也非民主政治。（嚴格的說，在民主政治下，既無單純的在朝黨，亦無單純的在野黨。因為執掌行政權的在朝黨，並不可使政府各機關的人員都變成同黨。而所謂在野黨，仍可留在議會，批評政府）。各黨派對於外交及作戰問題不能協力一致，便根本不能運用民主政治。所以各黨對於以上三要件，不僅要共同認識，而且要能共同遵守。至於專制政治，雖不承認多黨制度，但在實際上仍有多黨存在。專制政治下的多黨活動方式，大概不出兩個途徑：第一個途徑，為反對黨由和平活動趨於激烈活動，而成為革命黨，與政府黨不兩立。第二個途徑，為政府黨內部分化為若干派系，明爭暗鬥，也異常激烈，而不能相容。同志們成了冤家，這正如俗話說謂「同行是冤家」。黨外有黨不能相容，黨內有派也不能相容，則專制政治終久因之而自毀了。故賢明的政治家，必不贊成專制政治，必確認多黨制度，以運用民主政治，庶可誘導各黨派趨於公開的和平的活動，而不趨於秘密的激烈的活動。國家長治久安之道，其在斯乎！政治日新又新之法，其亦在斯乎！

總之，民主政治的政治哲學，自然含義很多，非本篇所能盡言。不過依我看來，如果能夠確實把握着以上所說的五種要義，即（一）國家與政府的分明，（二）統治與被治的交錯，（三）權力與自由的均衡，（四）法治與人治的合一，（五）秩序與進步的並重，並確實明瞭完成此五種要義的各種必要方法，便不會有大差池了。至於與民主政治相應的人生哲學，則以限於篇幅，另文專論。

合國家中之治國與亂國

張君勱

聯合國家之數，三十又二，皆以軸心國爲敵者也。自其參戰之先，皆有其爲先治國，有爲後起國；自其地理位置言之，有屬於歐洲者，有屬於美洲者，有屬於亞洲者。自另一標準言之，亦可分爲二類，一曰治國，二曰亂國。如英美蘇者，不獨軍事極其力，財政有條不紊，即內部意見，常融治而不至分歧，此之謂治國；反之如希臘如南斯拉夫，雖在外禦其侮之日，國勢之隆，始終不止，或由於各族意見未消，或起於政府設施不當，乃各借名義，各有所號令指揮，而處於同盟國之列者，常以其不能一致，致致深憂，此之謂亂國。

竊以爲國家對外作戰之日，存亡在此一舉，惟有停止內爭，而後能盡其全力，試之於敵人之身。其爲政府者，亦不以戰爭爲一黨一派之事，而與國人共之，如羅斯福總統以陸海軍大權交之共和黨員史汀生氏與諾克斯氏，英人於戰時改一黨內閣爲聯合內閣，皆所以消滅國內資爲分裂之口實也。乃聯合國中，之各大國，早已養成此種習慣，而其他國中偏狹之見，意氣之爭，絕未消除，竟於外戰之中，發生內亂，因此招來外國干涉，而爲人所非議，不可謂非國際之怪現象矣。

試舉五月廿四日英首相邱吉爾論及希臘與南斯拉夫之言。

一、希臘軍隊及希臘海軍之大部分忽而叛變，宣言贊助希臘自由運動，反對希王與其政府。

時希王遠居倫敦，其在開羅之人關心此事者，勸之勿歸。

，而希王拒而不納，次日自返開羅，正爲形勢嚴峻之日。希臘陸軍爲英軍所包圍，距亞歷山大城三十里，其海軍之叛者爲兩岸砲台及優勢英國海軍所控制。此事延長三星期之久。此後希政府之忠實分子登各艦上，將謀叛諸人遣散，死傷五十人。

希臘軍在沙漠中者，爲英陸軍所包圍，擊其兵營旁之高地，其四千人即投降，希人無死傷者，而英國將官竟死一人，此爲不可忽視之一事。

英國海陸軍之以忍耐與機警，終能恢復秩序，距今已有數星期之久，希臘海軍之爲人所誘惑者，已盡幽囚於圍圈中。

希首相鄒特魯氏，於事變發生之前，曾擬召集各黨派代表會議，且擬改選內閣以容納各方人士。其後以事未成去職，從旁助之者爲希前首相維納齊魯之子維納齊魯氏。

此時適有泊潘特魯氏 (Papandreou) 出現於舞台之上。泊氏素爲人所尊敬，戰爭以來，常居雅典，其人公而忘私，絕不因黨派私利有偏於衷。

泊氏現爲希首相，於其組織內閣之先，曾召集會議於聖拔農，各黨各派，如自由運動，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列席，各暢所欲言。

此會議中發現希臘自由運動以暴戾方法待諸人民，乃授

德人以可乘之際，另集台希人組織保安隊以相抗。此輩原可參加遊擊隊，徒以自由運動指揮不當，乃竟為德人所利用。此自由運動更與另一抗敵團體名愛狄司者發生戰爭。

若此內部自相爭奪，其最引為快意者惟有德人。自黎拔農會議之後，各黨列席於新政府中，全國軍隊立於同一命令之下，各遊擊隊即為其中之分子，并心合力於殺敵之工作矣。

南斯拉夫內部有米哈羅維次氏與鐵托氏之爭，邱氏前次已有報告矣。此次演說中更述及之曰：

余接南王彼得氏之通告，謂已接受皮里次（Petrov）內閣之辭職，另組一新而較小之內閣，期於促進南國之抵抗並結合國中之作戰分子。

此次內閣改選所關涉者，一為米哈羅維次氏辭去陸軍部長之職，二為哥勞維某團體之加入，此團體足以號召多數抗敵分子。

以上方針，自為英政府所贊同。然塞爾維方面之反應如何，吾人無從臆斷。吾人所以停止資助米將軍以軍火，其理由甚為簡單，即以其不能抗敵，而其若干部下反與德國妥協，因而與鐵托將軍開始武力抗爭，雙方互以罪狀相控，損失愛國者之生命，徒令德人稱快而已。（中略）

吾人已決心為鐵托元帥之支持者，以其能英雄的抗敵也。吾人正擬送并計劃輸送最大量可能之軍火供給，且與之維持可能之密切關係。吾已與鐵托元帥派遣來英之代表拉皮將軍晤談。所約定之事項甚多，其中一項，即

以托元帥將派一代表去英，以期保持密切關係，此密切關係之影響於南國。除鐵托將軍與近東總司令部之接觸外，更加上此項代表關係。

鐵托元帥在其為南國愛國領袖之地位，已捨其共產主義之見解，彼已屢次宣言不推翻塞爾維之財產法與社會制度，然鐵氏之所已發表者，尚未為他方所承認。

吾人之目的，在結合南國一切實力與塞爾維之全力於鐵托元帥之下，以期造成一個合一獨立的南斯拉夫，因而驅除希氏侵略者於南境之外，不令有一人之遺留。

自以上兩國之事觀之，吾人所得之教訓可知矣。凡為國家者，不幸遭逢大敵，惟有以一致對外之態度出之，庶幾內部即有黨派之分，而人力物力一切用於對外，反是者，如希臘，除其原有政府外，另有自由運動，除其自由運動外，又有愛狄司抗敵組織；其在南斯拉夫，除米哈羅維次氏之外，又有鐵托元帥，又有塞爾維之與德氏不相下，米氏始就為抗敵，轉而與德妥協，致令外國之軍火，而資助米氏者，不得不為之於德氏。就兩國內部言之，為派別之分歧，為精力之相消，雖大敵當前，曾不能稍息內爭。就外部言之，兩國之內政，公處於英政府演臺之上，受人之指摘，英國政府亦超越其代辦機關之政府，而自決定其誰應支持與誰不應支持之限。現以盟國之力為之代平內亂，其實費之將與焉，又豈能代平內亂之中，而邱氏發為此乃不可忽視之言。此非希臘與南斯拉夫兩國之不夠國格與其貽累盟邦之顯然者乎。

二、

吾人反而觀之英美則如何，上次大戰中，英美內部始終保

持團結，卒挫大敵，使之屈服，獨有沙皇之俄國，因革命之故，退出戰爭，其後起之新政府，亦被擯於巴黎和會之外。其爲敵人之奧德，一則以各族獨立，一則以海軍革命，不得不樹降旗而屈膝矣。此次戰爭之中，波、荷、比、挪，失其領土，已無法在本國抵抗，然其流亡政府初不以一時之挫折，而甘心爲人奴隸，獨有法蘭西於巴黎陷落後，貝當拉伐爾等竟向敵乞和，而戴高樂堅持不屈，樹戰鬥法國之幟於英倫，此時抗德之國在西歐者獨有英國。幸而大西洋彼岸之美國，假之以軍艦，更通過援助民主國法案，助之以軍火，及一九四一之夏，德對俄宣戰，而英人始免於寡助之苦。是年之冬，珍珠港事件起，而美又對軸心國宣戰矣。由此言之，前後兩次戰爭中，始終保持國內一致，則爲勝利之國，如英如美，其反是者，如上次之俄如此次之法，則不免於爲人奚落，故謂勝敗之數，視乎一致之能否保持也。

一致者勝，爲人所同美，不一致者敗，爲人所同惡，然所以去不一致，而達於一致者，其道何如乎？以軍隊之力統一之歟，賴警察之力以彈壓之歟，抑恃偵探網以去其謀爲不軌者歟？曰此皆似是而非之言也。所以治國者，專恃有形之武力如軍警等，而忽其國民自動自發之忠誠，則猶忌防制之術，終有窮時，而其一致所生之效果，微末不足道矣。羅斯福總統有言曰：「服從與忠誠之間，有至廣大之區別。服從之效，在獨裁國家亦可得之，所以致之者有三法，一曰威嚇，二曰強奪，三曰欺騙。忠誠反是，乃發自人心之自然，雖以真事實相告，不加強迫，昔日蘇高之理智保持勿墜，而彼等之效忠於政府自若也。」吾人廣羅氏之義以言之，一致生於忠誠，不一致生於不忠誠，一致由於政府設施之感人，不由於強壓，然則賴軍警之

力，以爲可以獲致忠誠與一致者，非南轅而北其轍乎？彼獨裁國家不識民主國之有此忠誠，有此一致，反以爲民主國易陷於分裂，易啓爭執，常利其外表意見之分，以爲可以使之陷於無法作戰，而日兩國之所以敢與美宣戰者，即此觀之，錯誤有以致之也。吾又聞之羅斯福曰：

予記憶上次戰爭之初，德國駐美代表施賓報告其政府，謂美國人民意見分歧，但求發生於平和之下，雖犧牲其自由與理想亦所不惜，此國家但知謀私利，或不免於暴動與革命。

軸心國之宣傳機關曾預言曰：所以克服美國，可由內部工作以致之，即不必賴有外國大軍之侵入，而內部將滋事，將擾亂，將分裂。

彼等但見民主國之言論自由，黨派對峙，主張不一，行動不一，以爲分裂之根，即伏於此，不知其言論結社之中，即自動自發自負責任之精神所由以養成，及外患之來，不期然而然，偃旗息鼓，以歸於一致，各服兵役，各入工廠從事生產，其效率之高，雖德人亦望而却步，然則自由之中，正爲團結一致之所在，惟其平日自由，故戰時尤易團結，與獨裁國之出於命令，出於強迫，出於虛偽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雖然，此一致精神，以道德上之名稱言之，曰忠誠，彼等所以養之以成習慣，是有歷史上與國情上之原因，非一蹴而就者，英美地域廣大，物力富厚，不必心存外競，以侵犯他人爲事，惟其如此，平日自能許國人以討論之自由，而不必出之以東縛馳騁如德日兩國，當外患之來，可從容坐待，以候敵人之發難，而自身不負啓發之責任，如上次大戰中，英之與德戰也，不始於德國總動員之日，而起於德國侵犯比利時中立之日，

英人能以條約神聖之名義，向盟宣戰，惟其能待敵人之變難於先，而所以遠於輿論之一致，與夫調結國內人心者，自較易矣。以美國言之，此次戰事起後，羅斯福氏未嘗不思參戰於一九三九或一九四〇法國崩潰之日，時則中立之主張正盛，遲遲又久，乃取銷所謂「區往來」，繼以軍艦之移轉，又繼以對民主國援助法案之通過，此一二年内，輿論已往轉移之中，及至珠港事變起，則參戰之決策，非任何人所得反對者矣。抑英美德兩國之人，頭腦冷靜，推算利害至精，英人處於歐洲，於戰事一起，不待他人之來攻，先於兩虎相鬥之日，助其一臂攻其一，因而英倫三島自餘年來始終免於敵人侵人。美人之戰時正與英同，宣佈孟羅主義，所以拒歐陸國家於西半球之外，更遇歐洲戰事之日，對於行將獨霸之國，渡大西洋而攻之，其孟羅主義之宣佈，在歐洲國家之受之者，以其不關戰事而許之，而不知其真正為美國禦敵境外之長策，遠出於彼攻而後還手者之上矣。彼等對外之計畫，高出他人之上如此，就內政上言之，與其獨占政權，招致他黨之不滿，不如以聯合內閣之策，合一切黨派於一爐之中，自然對於和戰兩事，易收一致之效，而免於分歧之患矣。

三、

吾國於以上兩種國家之中，為亂國如希爾乎，此必為國人所不願聞也，為治國如美乎，國人亦自知其詞不上矣。吾國內部雖有不一之象，然只有暗鬥，未嘗如盟國代為平亂，未嘗受他國政府公開之非難，此吾之優於希爾者也。然國家大法不立，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視同具文，至於混合各黨於政府之中，尤為法超焉，則吾國之不如美英固顯然矣。

國家之立於大地，第一要件曰平和秩序。政策之決定，法令之變更，政府之進退，皆能備一定之法律軌道與政治條例，以達於解決，而有意見之爭，黨派之爭，要不至於動武。如英美兩國，在平日言論結社，由之而下，固不失其從容排讓之規矩，而在外交交涉之日，亦能以各黨之合作，一致對外，故平和與秩序程度之最高者，莫過於此。兩國政治上之成績，皆與社會生活相為表裏，若英之貴族制度，若法之階級之興起，若大憲章以來之傳統，若美國統治階級之見解而論，皆其國內所以平和進化，而不至於或割裂之原因所存也。至於英人據英國傳統至於新大陸，其制憲之，聯邦組織也，三權分立也，皆取美國歷史上之基礎，與當時之學說，以規定於憲法之中，除南北戰爭一役外，皆為平和與秩序之調，亦人所共見者也。英美兩國政治之所以以此，可歸納為若干原則以言之：一曰尚法與理而不尚力，所以治其民者，一本於人情之同然與法理之大公，決不以權力威嚇人民，其權力原為法律所限，無可逾越。反是者，政府知有權力而不知有法律，且告其民曰，吾以力取而來，吾僅有以力取而去，一恐其民之不作亂，不毀法也。二曰尊重民意，無以私於某階級。專制帝王以一人之好惡，決定進退，進退人才；次之貴族政治，大權操於若干貴族之家。迄於最近如蘇聯者，人民既無私有財產，一趨於平等，然政權私之於鮑維克黨人，其出政無不計其由政立，故他國人評之者，謂蘇聯在政治上處於民主，而不能以全民之志為言，定政府之進退也。三曰英法兩國之總統既選與內閣進退，一決於民意之多少數。三曰發達富力，故人民之禮義，知進退。人民各從事於農工商之業，衣食饒足，積有餘財，其從政也，所以效力於公家，非所以爭一人之名與利，或進而任朝，或退而

在野，視乎民心之向背，絕不因此而釀成內爭。英美兩國惟遵此道，乃其所以成爲民主國之領導也。其他國家之出奇制勝者，如意之墨梭里尼，如德之希特勒，非不欲另創新制，以圖凌駕他人而上之，有所謂領袖制，有所謂法西斯主義，然其所謂結社，則一黨獨占而已，其所謂選舉與議會，則鼓掌而已，所

謂輿論，則清一色而已。既無反對黨，便無所謂批評與討論，即令此次大戰不爆發，而兩國政制之無法長存，可以斷言。然則今後之政體，惟有民主，惟有有言論結社自由之民主，惟有有反對黨之民主，所以去亂國而成為治國者，舍此無他道矣。

七月十七日

萬竹樓隨筆（一）

舜生

開羅會議，英美中三國已共同決定，保障朝鮮於戰後獨立。此事是否能順利實現，一決於朝鮮各黨派能否絕對團結；其次則視蘇聯平日主張所謂解放被壓迫民族是否真能實踐。憶余少時，同學某君曾以朝鮮詩抄一小冊見示，類多爲朝鮮志士之作，蓋閱其宗國之覆亡，發爲吟詠，以寄其故宮禾黍之悲者。至今爲余所記憶者僅得兩首，其一云：「欲哭不堪哭，欲行不忍行，乾坤雙淚眼，何處是秦廷？」又其二云：「歐美捷遲十六年，忍看宗國破無全，國仇未報生何益，一劍橫腔亦快然。」第一首不知出於誰氏之手筆，第二首則當時朝鮮駐俄公使李範晉自殺之絕命詞也。

章太炎先生晚年去蘇州講學以前，寓上海同孚路同福里。余於國難後始識先生，每週必去同福里一次或兩次，就國事向先生有所請益。先生操餘杭土音，余初苦不盡明晰，既久，則亦了無不懂之處。先生雖爲一純粹之學者，然喜談政治，其於黨國論實之身世及其與革命之關係，往往能詳其始末，其褒貶亦頗異時流，惜余未存筆記，否則可供治現代史者之參考資料當不少也。

余每至先生處，必在午後三四時，時先生雖已六十以上，然能繼談至三四小時不倦。章夫人所備之點心，爲一種糯米所製之小餅，蒸食，黏性頗大，失之太甜，先生食之津津，余亦不能不食之津津也。先生每述一件事，往往枝葉扶疏，能使聽者如躬歷其境，不願聽其中斷，章夫人一再催用晚膳，先生不顧，余不待其辭畢，亦決不敢復辭也。

我們爲什麼要民主與自由

張申府

一、因爲，在根本上，人與人差不多。所以在根本上，所有人都應有差不多的權與責。

二、因爲國家是大家的。所以國家的事大家都應有權過問。大家對國事都負有一種的責任。

三、因爲要廣泛地動員，以至統一心志，團結力量。特別現在在戰時，只有廣泛動員一切人力物力，統一團結，乃能打贏仗，乃能打敗強敵，乃能把慘忍殘人的戰爭趕快收場。——就在經濟上，如能廣泛動員，如能使一切人民都得過問國事，切實知道國家的困難，也許可使某些人激發天良，少趁國家困難的時候發橫財。這當然很少希望。因爲社會可有公道，個人本無天良。所以如能廣泛動員，如能因實行民主而敢于出而指摘奸惡的多了，機會也有了，趁國家困難而發橫財的人大概至少不得不斂跡些。

四、因爲只有民主乃能適應國際已經造成的民主潮流，而與民主的盟國配合。然後乃能立國于斯世。也可幫着保持世界和平。——現在全世界聯合起來要打倒法西斯，勝利已經確定，而且許多有力的人，許多人民，所要的還是澈底的勝利，當然戰勝後將能存留的，只有反法西斯的民主。我們名義上本是民主國，現在要緊的就是要名副其實。

五、因爲只有民主乃能容許人人或最大多數人的才力都得極大量的發展與利用。然後最進步的世界，最快活的人生，人類最高的理想，乃能有實現的可能。

六、因爲民主最合乎科學，最合乎科學法。事情由會議

討論決定，服從多數，尊重少數，都深合乎科學的實驗方法。「科學乃是民主的一個伴隨。」科學出於理性，民主出於理性。科學是多元的（就一個意義說，可以說這就方法的意義說，不是就根本說。就根本說，我一向相信，數是少，規則一而作用在二。中國歷來所謂體用的關係，則是不一不異），民主也是多元的（就義說，也同科學）。科學重解析，民主也不能不重解析，重分別，要寬容，要容許他人，異見，要作面而觀，平等觀。科學要實在，重事實，民主也有重思見與政治，而且民主重人，重人人，重個人，也可以相通。科學于個別事實而求普遍規律，民主則于不同個人求其共通。科學法是西洋文的最大貢獻。其精義（包括近代科學法新發展）統計解析在內），如羅素說，就是算學加強，或算學與經驗主義。或更分地如羅素以下最把話說得清楚的英國劍橋哲學派哲學大師陳老德教授則平對科學與倫理關係用更淺近見解所說，「由自然科學的方法，就是由官能知覺與內省，助以實驗而擴通以疑問歸納法。」科學法也可以說是對于真感覺，進而達于嚴密精密周密具體。

七、因爲民主最近于「國天下爲公」的大同理想，最近于「仁」與「中」的哲學，最近于思道，最近于諸情理講理性的風尚。——民主也是有合于哲學的辨與通的。這也是中國真傳統之所重。

其次，我們要自由，因爲沒有自由，民主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身體、居住、職業、思想、

學術、學習、研究、講學，以至免除匱乏，排脫恐懼，不至貽誤的自由，以上種種必都作不到。

我們所謂自由，本尤在於機會，尤在於發展，尤在於盡性。必須以組織的途徑，設計的方法，着眼在社會，時時在在都以求生、養生、美生的人生觀或人生理想爲所探的道德準衡，而使個個個人都得到最大的發展，都竭盡性分之所歸，都踐履職分所應爾，都對人類社會作最大的貢獻，有最多的收穫，達到儘可能地最高的造詣成就。

分別簡單說來：

一、我們要言論自由

因爲對於國家事，對於社會事，我們要說負責的話，要表示負責的意見，以求國家社會的發展與改進。（流語、暗示話、吞吞吐吐躲躲閃閃的話，能夠具體而乃抽象的話，都是不負責的話，不敢負責的話。不負責的意見也略同。）

二、我們要出版自由

因爲我們要把我們負責的話，對於國家社會負責認爲有利的話，印出來，傳之久遠，共同商討，集思廣益，相得益彰，也使真理由辯而愈明，實事求是，精益求精，以求國家之福，以謀社會之善。

三、我們要集會自由

因爲我們要對國家事，對社會事，以至對學術文化問題，更現實親切地共同討論，集思廣益，互相觀摩，互相切磋，互相教益，由種種不同觀點不同方面的觀察而得一靈活周到的面觀，以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四、我們要結社自由

因爲我們要更經常地作到上項事情，羣策羣力，同心斷金

，以求具體實現我們對於國家社會的善意，以求衆繁易舉，協力共進，止于至善。

五、我們要身體、居住、職業自由

因爲如果我們身體受到拘束，居住不得安定，遷居不得隨意，職業時有危險，如果有一于此，我們如何還能對國家社會人類文化，盡我們所能，作我們最善的努力？

六、我們要思想自由

因爲這在一個意義上實在尤其根本。言論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一種具體表現。如果沒有思想自由，什麼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便有也是空的。思想不自由，國家不用想進步，社會不用想進步，文化不用想進步。必須社會進行發展到使人類思想得着了自由，社會乃得到一個大的明白顯著的推進力量。

七、我們要學術自由

因爲這是思想自由的一個具體系統的表現。沒有思想自由，也就無學術自由少掉一個根子，缺乏了內容。學術不自由，文化不進步，國家社會必由停頓而衰落，而蛻化，而自剝或被剝去外皮，同時由核裏新生力量與依托它的思想自由的發展，一個新的社會，接着新的學術，新的文化，乃脫穎而出。

八、我們要學習、研究、講學自由

因爲這些都隨學術自由而俱至，都是學術自由一聯帶的表現。還有教育或受教育的自由也如此。沒有這些，學術是不會發達的。十九世紀的德意志，與今日的德意志，便是一個顯明的對照。中國過去：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兩宋之際，明清之交，以文化說都是文化最發達的時代。其所以文化燦爛，以文化說，就是：一、文化交流的結果，二、講學自由的收獲。

只是在今日，在學術上，或在講學上，除了充分自由以外，要更加上設計，配合，組織。這是使學問更發達，更進步，更自覺地有效率地進步的途徑；也是所以藉以增加其機會，擴大其可能。人類許多事都是以自覺為歸宿。解析方法是自覺的一種。設計組織也是自覺的一種。

九、我們自然也要免除匱乏，脫掉恐懼、以及不至賦閒的自由。

因為沒有這些，過不了太平日子，過不得好生活，生活不能安定給足，必然此疆彼界，獨處其詐，互相防範，互相角逐，結果非出之以殘人以逞其戰爭不止。今日世界已經大通到，一個地方一個人不能生活，全世界其餘的人都要受其牽連帶累。今日人仁的，感覺靈活的程度已經有許多人能感到這係。「窮人不是自由人」。要自由一定就要不窮的自由，這就是經濟自由。一個不窮的方法就是不閒。不閒的自由也就是另一種經濟自由。歷來雖說不患貧而患不均，今日中國則是既患不均

也患貧。同時今日世界却是不患不工作而患無工作。問題已不在生產，而在分配。分配得當，忙閒才得均勻。這才是真正的已不患貧，而患不均。

（照我們自己的另一種說法，一般民主的理論基礎就是：一、人與人差不多而不同的事實；二、理性，三、把羣己才力發展到極點，最好處，且越來越容易更發展的理想。一般民主的人生觀以及其道德準衡應就是我所說的途生、大生、美生的人生觀以及其道德準衡。最民主的人類關係應就是「仁」的關係。民主政治的極點應就是「仁」的政治。民主的美學原理應就是「充實之謂美」。一般民主的倫理觀即本體論就是真正現代的真正哲學。一片投地所得。一般民主的知識論，也就是民主的哲學，就是我的以「中」為原則，以「辨」為方法，以「通」為歸宿的「具體相對論」。它和兩句格言就是：「真理是具體的」，「絕對是相對之積」。都待另文詳講。）

萬竹樓隨筆（二）

舜生

太炎先生嗜紙煙，往往一枝未盡，更燃一枝，余曾見其歷三四小時吸之不斷。所吸以美麗牌為常，偶得白金龍，即為珍品。蓋先生為人書字，初無潤格，不欲得其書翰者，大率即以紙煙若干聽為酬，故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余初不嗜此，後在上海編日報半年，往往社論，短評及第一版新聞，均出余一人之手，每晚非至三時以後，不能離印刷所，不勝煙實無以振刷精神，於是乃嗜之成癖。後為先生座上客者近三年，每至，先生必談不斷，吸煙不斷；余則靜聽，亦吸之不斷，余與先生之一段因緣，蓋與余之煙癮亦不無關係也。

論公務員的政治權利

譚 仁

(一)

現代的民主政治，不是一全體人民管理的政治，也不是大多數人民管理的政治，而是一政黨政治，這是英美等國的實際情形，也是學者所公認的事實。在政黨政治之下，這教所說的治權，成為政黨競爭的目標，競爭勝利的政黨便組織政府，總攬行政權力。因此，支配行政的政治權今天屬於甲黨，明天可以屬於乙黨。在理論上（有時事實上也是如此），行總統制的美國，治權的所屬每四年要變動一次，行內閣制的國家，便沒有一定的期間，隨時都可以變動。因為掌握治權的政黨隨時可能變動，使行政上發生一些困難問題：

(一) 當甲黨將治權交給乙黨時，甲黨員在政府中服務的黨員是否應該忠於己黨而辭職呢？

(二) 乙黨是否可以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將原在政府服務的甲黨黨員免職呢？

(三) 掌握治權的政黨是時常變動的，因此政府的政策也是時常變動的，假如公務員並不隨政黨進退的話，他們是否應該在不同的時期，服務不同的政黨，在不同的時期，執行不同的政策呢？

(四) 公務員是否可以積極地參加政治活動來擁護或者反對某一政黨呢？

對於上面四個問題的答覆，應該都是否定的。因為假如公務員完全隨政黨而進退的話，行政的聯綿性便無法保持。假如

公務員對於與自己不同的政黨或政策可以不服從，那末官紀和行政效率便無法維持。假如公務員可以積極地參加政治活動，與黨派聯合，那末政府必定引用己黨黨員，排斥異黨黨員，公務員也必定利用黨的聯繫為升官的手段，結果不僅行政效率低落，必致行政的聯綿性也無法維持。

爲了避免上述這些惡果，現代國家往往將行政和政治分開，認為政治是政黨活動的對象，行政則應該超出政治的影響而獨立。在這種理論下，一方面，各國建立了文官制，使公務員的任免、晉升、獎懲完全超出政黨的支配。另一方面，各國大都對於公務員加一種義務，使之對於政治保持中立。他們只能安心辦理行政，不應該過問政治。

(二)

所謂公務員的中立義務，有二重意義：第一、公務員對於當權的政黨不應該有好惡的態度，他們應該在不同的時期，服務不同的政黨，在不同的時期，執行不同的政策。第二、公務員對於任何政黨不應該採偏袒的態度，不能積極地參加政治活動來擁護或反對任何一個政黨。

現代各民主國家大都有法律規定公務員的中立義務。公務員應在不同的時期服從不同的政黨與政策，這是政黨政治和文官制度必然的結果，民主國家大都已經做到。至於公務員的政治權利應該受如何的限制，才不違反中立義務，則各國制度並不一致。

自前一世紀末期以來，各國對於限制公務員的政治活動，已十分注意。及至現在，各國情形雖不無出入，但趨向於以法律或憲法限制公務員的政治權利，則實一致。以各國立法而論，大都不禁公務員消極地行使政治權利，但積極的行使，則與中立義務衝突，常被禁止。各國實際情形如下：

(一) 各國法律不否認公務員的選舉權。

(二) 對於被選舉權，英美兩國都有法律禁止。法國雖不否認公務員的被選舉權，但那只是特殊環境的結果，理論上並沒有根據。我們認為如果公務員享有被選舉權，則必積極地與黨派聯合，參加政治活動，實在違反中立義務，所以應該明文禁止。

(三) 對於一般政治活動，如政治集會、報章發行等，各國法律大都規定公務員只能消極的參加，而不能積極領導。威瑪憲法第一三〇條雖承認公務員的意見自由，但普魯士最高法院一九二二年的判例却認為所謂意見自由，也只限於消極的。

(四) 關於言論自由，各國雖鮮明文規定，但理論上應合於下的條件：一、不能發表言論破壞政策的統一性；二對於已決定的政策，不應批評；三、不能宣傳黨派主義。

(五) 公務員的結社權與中立義務，性質上雖有不同，但是二者關係異常密切。各國大都承認公務員於不違反中立義務的範圍內，有結社權。威瑪憲法第一三三條規定：「官吏之結社自由應受保障，官吏得依聯邦法律規定，設立特別之官吏代表機關。」

(三)

我國將來施行憲政，各黨派參加政治後，政治上的實際情形如何，我們雖然無法預卜，但是公務員應該對於政治保持中立的態度，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因此，我國憲法對於公務員的政治權利，也有明白規定的必要。

我們主張憲法中明白限制公務員的政治權利，不僅因為這種規定可以對於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並且認為這種規定如果能切實執行，可能有下列三種利益：(一) 如果公務員不能利用其政治活動，他們便無法利用政治關係來謀個人的利益，不能再利用「保護」和「打倒」來作升官的手段，政治局面必可較為安定。(二) 今天我們都感覺人事問題頭痛，其實，仔細分析起來，人事複雜，十九源於政治關係，如果公務員不能積極地與政黨發生關係，他們也無法再用政治關係來護身符，來創造人事上的困難。(三) 現在行政效率的低落，公務員的地位和生活沒有保障，固然是重要原因，但若干公務員把大部份的精神花在政治活動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們應該限制公務員的政治活動，使他們集中精力來處理行政事務。

至於我國憲法對於公務員政治權利的規定，我們以為原則上應該如此：一、可以行使選舉權；二、如欲充任純粹政治性質職位的候選人時，須先行辭職，行政性質的職位，不在此限；三、只能消極地參加一般政治活動；四、這些限制應該僅適用於國民政府以下行政機關的事務官。

為着保證民主政治的順利發展，為着改善行政，我們主張明白限制公務員的政治權利，並且主張在憲法中明白規定。

五五憲草中之行政院

陳一清

茲就這教試一檢討行政院在五五憲草中之地位。

行政院之產生 憲草第五十六條：「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政務委員若干人，由總統任命之。」按之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所謂中央政府官員者，全稱中央政府應設之官員也。中山先生又說：「在人民一方面的，要有行政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在政府一方面的要有五個治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以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選舉為政府之一，行政院為治權之一。我們既知道是以人民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則行政院應由國民大會選舉，了無疑義。本憲草改選舉為任命，不同其理由如何，其不必拘泥這教於此可見。

行政院之罷免 憲草第三十二條：「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選舉總統副總統立法院長，副院長，監察院長，副院長，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依中山先生這教：「行政官吏固然要有選舉權。如果不好的官吏，要有權可以罷免。」為甚麼選舉權之外，還要有罷免權。中山先生又說：「人民這權，對於政府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一面又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新式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機器的自由。」本條國民大會之職權，既不能選舉行政院，又不能罷免行政院

。行政院為五個治權之一，且居五權之首。行見「民權個政權，在兩個政權不能管理行政院，這大權也是應用這教之一端。

行政院之地位 憲草第五十五條：「行政院為中央政府行使行政權之最高機關。」即最高者，無不加之行政首長也。謂之中山先生說：「選舉總統和行政院。」又說「五權憲法行政首長，就是大總統。」是才總統行政院長，亦即行政首長，毫無問題。本憲草於總統之外有行政院長，似與教義頗有出入。惟其有此出入，「總統是否不負責任？抑或五院統於一尊？非本文所及，且且不提。

行政院之職權 憲草第六十條：「行政院設行政會議，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及政務委員組織之，以行政院長為主席。」第六十一條：「左列事項應經行政會議議決：一、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預算案。二、提出於立法院之戒嚴案，大赦案。三、提出立法院之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關於重要國際事項之議案。四、各部長各委員會間共同關係事項。五、總統或行政院院長交辦事項。六、行政院副院長各政務委員各部委員會提議之事項。」第六十二條：「國家遇有緊急事變，或國家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迅速處分時，總統得經行政會議之議決，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處置。」總統為國家元首，處理國家事務，尚不能自主，而一提交行政院長所主持之行政會議，即無異有拘束總統之力。總統由國民大會選舉，由國民大會罷免，行政院不由國民大會選舉，不由國民大會罷免。是國民大會總統為行政院，總統由國民大會選舉，對國民

大會負責，行政院由總統任命，對總統負責。是行政院視總統為國民大會，此與憲法顯有出入之又一端。

行政院代行總統職權 憲草第五十二條：「總統於任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任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總統副總統均未就職時，由行政院長代行總統職權。」在平時行政院雖不對國民大會負責，而有總統可以監督。今則混總統職權於一身，行使大權，為所欲為，任何機關不能過問，亦無法可以過問，其結果難免不操縱選舉，或延長代行期間。請申其說。

一、操縱選舉 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與總統均為六年。可以說國民大會代表與總統任期相終始。但是總統既規定於任滿之日解職，而國民大會代表無此剛性之規定。自以次屆國民代表選出始能解除職權，以免脫節。前任總統解職之後，正行政院院長代之秋，以至高之大權，集中於一身，又無任何機關可以掣肘。全國國民代表選舉之區，即其行政權統治之域，其能左右選舉，夫何待言。誠如呂復先生所云：「此種選舉制制之下候選人物，初不必具何德望，更不必過

遊各省，發表政見，全國人民亦不必聽其丰采，盼其言論，但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力能實際左右軍警，則其獲選成分，十九可以預定。即使國內噴有煩言，但使外國使節入內一賀，即於國際資格上，坦然可對外。」（見重慶憲政月刊創刊號）。

二、延長代行期間 以混同行使大權之機會，在任何機關無法可以掣肘之情況下，辦理國民代表選舉，自然精心如意。進一步以辦理大選，無論為自己或第三人，亦必精心如意，可以斷言。在積極方面如此，若消極方面，辦理國民代表選舉，不加緊進行，或製造障礙，使其不易辦理完竣。或辦理完竣，而延不召集，移其注意目的而後已，皆可操縱自如。雖有憲草第五十三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之期限，不得逾六個月。然以總統尚未產生，政府不能中斷。政府中斷，其危狀有不堪設想者。兩相相權，取其輕者。憲法行政院延長代理，亦事實所應爾，然則雖欲不延長又何可得耶？

萬竹樓隨筆（三）

舜生

張敬堯在北京東交民巷為人所暗殺，太炎先生曾作小詩一首以詠其事，詩曰：「金九一夜起交民，射殺湘東舊領軍，為問長陵雙石馬，可知傳法有沙門？」一日，余至先生處，先生作此詩正屬稿甫就，余問先生沙門何指，先生笑謂余曰：「古人作詩，亦往往有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者，何必深問？」

當宋哲元以大刀隊在長城抗日，國人頗壯其所為，一日薄暮，余謁太炎先生於其寓廬，先生正憑窗檢閱地圖，見余入，乃謂余曰：「長城竟有這許多的口子嗎？」余笑應之。私心自忖，先生於學無所不窺，且生平崇拜顧炎午，又曾一度任籌邊，何獨於輿地之學未多講究耶？

論教育上之物力與人力

余家菊

今國家已入於建設時代，各種建設皆需用大量人才，教育欲與建設相配合，乃不能不為大量之擴張。實行教育的大擴張，立即遭遇財政問題。教育財政政策，固然祇有量出為入之一途，然而就整個財政觀點言之，終有要求教育經費儘量經濟節約之權利，所以教育經費在大量膨脹之中，其支用仍當無背於節約之精神。今後教育費，其需要額之龐大，直是莫可供應，教育預算之編製，又何可不善加權衡？此所以言教育者，不可不措意於物力。

今日通病，在各方專家，各本其職，以預算之緊要，而使總全局者無從為通盤之籌劃。當以百廢待舉之日，每一事業皆有要求大量發展之理由。各執其所是而不容和，增費則同增，減費則同減，不能所有輕重後先於其間。於是便成為無政策之局面。建設需人如此其急，教育費膨脹如此其速而且大，不具正確政策，何足以赴事機。

為今之計，對於教育事業，應分為負責經營與力為獎勵之兩大類。政府當負責經營者，計有兩種：即學術之促進與國民教育發展是。其餘則一概列入極力獎勵之列。

學術為建設之必備條件，無技術人才固百廢莫舉，無技術研究亦不足以立國。故專科以上之教育，宜由國家負其全責，於教育之可能的發展，應不惜與以任何大量經費之支持。當然專科以上之教育，其自身亦有施以區別之餘地。例如近年提倡設立之會計專修科，謂為促進會計之研究乎？實不足以負此重任。謂為會計實務家之培成乎？則勞動費用六個月時間所培成

之人員，其負担行政官署之會計業務不讓於兩年畢業之專科生。故今後專科以上學校之設置，宜詳審其目的究需若干時間之教育始可完成。於其可付諸短期訓練者，則儘量付與之。短期訓練，誠有其必然之弊病，但其弊病之發生，多半係由於國家經營速成教育，而別無高深的同類教育以繼其後。同樣，目前教育政策着重實用人才之培養，同時又不廢至高深學術研究之推進，此急功近利之弊可以防止。實用人才之培養，不得不然之事，而高深學術之促進，又須假以歲月，而可計其育功。故純理科學與實用科學之爭，不可不並。

至於中等教育之經營——依今日行政系統，無論省營國營，固同屬國庫負擔。職業性質之中等學校，除極少數技術性質而外，又非私人所願經營如高級農校者外，其餘皆歸入獎勵之列而任由私人營之。如高工之土木工程，如初職之照像縫紉，誠不知何故而為政府所重視。今後工商發展，各業所需人才，各業所需日趨而為供應。今後——

政府祇宜注意供給國家需要，於社會需要，可置於次圖。國民教育亦為立國之根本，國民教育不發展，無論政治失其憑依，即國防言之，亦無術健全。故今後國民教育經費之經常部份至少應由國庫撥負三分之一，其餘二分之一及設備費，則由自治經費內籌集。吾人必須認定國民教育為國家生死存亡之所繫，立定最大決心，不惜任何犧牲以力謀發展。欲待地方產產以推進國民教育，固屬不濟急，而國庫對於其國民教

育祇為輕描淡寫之補助，亦是表則吾人謀國之無遠識。至於國民教育之年數則至少應為四年。今日已非千字文教育時代，掃除文盲已不足為國民教育之目標。國民教育當定其目標於國勢之瞭解，公民責任之覺醒，軍人預備條件之具有。故四年為最低年限。

以上粗陳國家祇宜供應國家需要，而付社會需要於社會之自謀。以下更略言教育之人力供應。第一、為教育效率之提高。提高教育效率首當注視教師精神之振作，所謂煙絲底理純是也。今日多數教師精神之低落，既不足為人師法，又不足克盡厥職，已成國家之嚴重問題，要屬無可諱言。欲謀救濟，時貽每語宜慎選校長。夫校長之賢不賢，其標準人各一說，在此是非無準，人事複雜之時，欲校長而合於理想條件，何希望梅止渴。又有人欲將校長之任用付諸一定人員之選舉，而選舉之難合理想，亦已有許多例證。假使對於校長任用，於其品格，學歷，經歷能為合理之規定，而忠實執行之，吾人自宜贊同。但事實上恐屬無濟於事。吾人似不得不寄其希望於教師之自身。教育事業其成敗究竟繫於教師之自發的奮勉，非如軍隊與行政，長官命令可以決定其成敗。故今日問題在尋求一種方法，使教師能奮自振作，日進無疆，以完成其教師之使命。吾國教育者之傳統精神在自覺自立，自覺自立，最為艱難，偶不覺覺，便行退墜。社會又無他律匡持之組織，以相夾輔慰助。更加以風習污濁，微論自求適應，難免同化，日日與社會抵拒，其事亦太苦。故謂教師宜為結合，以求互相策勵，而完成其精神

教師當發起一種教師會，以互相勸勉各完教師使命為其宗旨。嚴格實行政治的超然及宗教的中立。其主要任務在精神上的互勵，而學術心得之互相報告與夫世界新聞之互相介紹，則其次焉者。本會與學術結社不同。學術團體以講學為宗旨，本會則以精神修養為職志。本會自身不過問政治。其會員宜告不作為政治活動者為甲種會員，有管理會務之機會；其不作此種宣告者為乙種會員，祇能共謀修養，不能干與會務，以免受人利用為政治工具。

關於專科以上學校之師資，一面用留學法以造就之，一面宜大批延攬外國學者專家來華長期講學，而用回國留學生作講授翻譯。吾人為此議論，已二十年。惜國人為駭於之氣所乘，迄今未見施行。今需人如是之多，專科以上學校在勢必須擴張，而師資不足又如此其甚。捨借材異地，殆無別法。時不再來，勿復蹉跎是幸。

小學師資，已大感缺乏，再作擴張，勢將竹頭木屑亦復缺如。救濟之法，唯有向鄉村小學大量吸收師範生。願為教師者，多半為農村子弟。宜設立師範預備生制度，從小學畢業生中收取之。由國庫與以津貼使其肄業初中，畢業後再入師範學校。此項師範預備生，可由鄉村小學校長保送其畢業生百分之若干以應政府委託舉行之簡單甄試，及格者即予以津貼。似此，師範生來源既裕，師資可期足用。

以上論教育之人力與物力，願有識者虛心考量之。

教育為再建戰後世界的重要因素

A. Moklejohn 著
蔡 譯

——設立國際教育院建議書——

計劃任何國際和平與正義的時候，必須要討論到三個因素。我依據他們的輕重難易的次序，列舉於后，第一、經濟的，第二、政治的，第三、教育的。大家都知道，若要創立一個統一的經濟的世界秩序，這個時機現今已經到了。經濟的混亂，不能再讓他存在於世。但是這種經濟活動的管制，以及使其有秩序，又需要我們創立一個統一的政治的世界，其範圍相同於經濟的，但其權力必須要更大。財富的生產與分配，必須置於公衆管制之下。世界的經濟而沒有一個世界政府，仍舊發生種種競爭和不幸事件。但政治的制度，必須要由適當的教育來支持和控制。任何政府的性質，依賴於人民的智識程度。希特勒告訴我們，除非教育其人民為奴隸，然後奴隸制及能夠持久，這是一個悲慘的經驗。但這也是同樣與權力的事實，除非教育其人民有自由，然後民主政治才能夠持久。總之，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必須要由一個世界的政府來管理，而這個世界政府又有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世界的教育制度。

當我提到世界統一於經濟和政治的時候，我的意思並不是指那種蔑視或否認多樣性的統一。人類的經驗是各異的和複雜的，我們何以要把他們統一起來，乃是因為我們想把他們解救出來，而使他們不致跌入於混亂，乏味和慘酷的鬥爭之中。我們在經濟，政治和教育方面，所不能不有的，是一個有秩序的

多樣性，或一個有多樣性的秩序——一個經濟秩序，一個政治秩序，一個教育秩序。這是一個單一的人類事業的互相依賴的三個形相。他們是人類應努力的三方面，這種努力想我借用一句盧梭所說的話，使人類「不再成為一個愚蠢和不堪設想的動物，而成為一個有智慧的東西，和一個人」。

如果我在上面所說的話是對的，那末現今在國際聯合國的戰後重建計劃的，我認為有兩個嚴重的危險。第一、我們的經濟專家往往有所偏見，他們在把經濟計劃與一個經濟的世界秩序，而不把這個經濟的秩序放在一個適當的政治世界秩序的管制之下。第二、我們的政治專家亦往往偏見於支配，他們在計劃創立和維持一個政治的制度的時候，每不把這個政治的制度建立在一個適當的教育制度之上。如果以上所說的兩種危險不能避免，老實說，我們對於大自由的奮鬥，其結果不過是成立一個奴隸制度而已。我們的經濟方案，必將失敗，因為沒有適當的政治制度來支持和管制。我們的政治制度，亦必將失敗，因為沒有人民口瞭解和道德的根基。如果這些危險不降臨在我們身上，人類的大災難，勢必不能避免了。

我所說的經濟的危險，可以很簡單的和很抽象的說明於下。這問題就是經濟在由公衆和私人管制之間，加以選擇。如果我們說，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經濟的世界秩序，我們的真正意思是說，某一人類的頭腦，由某一人類頭腦所集結，已在思想和管制我們人類文明中的經濟力量了。秩序的真意，其要就是管制。所以當我們說，經濟力量已經成為有秩序了，我

其意就是說，已經有人在管理這種力量了。換句話說，就是已經有人在研究，計算，管理，和引導這種力量達到我們所指定的目標。力量的本身，並沒有秩序。秩序是人類的發明物，是由人類製造的。所以，經濟的世界，如果要成為一個有秩序的世界，第一個問題我們所欲問的：這是誰的秩序？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秩序，並且他所趨向的目標是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大不相同的回答，就是經濟由公眾或私人管制。由公眾的同意，或沒有公眾的同意。該屬於平民，或只隸屬於平民的主子們。如果採取第一個途徑，就是世界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由公眾的判斷和世界公民的總意所管制，那末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必須是成立了。但是在目前威脅我們的危險，乃是我們的經濟專家，或許會領導我們趨向於另一方面。有專門智識的人，往往有內在的習氣，尤其是那些英美商業世界培養出來的自私自利和侵略性的頭腦，往往不取得他們的人民的同意，而擅自把持了經濟的霸權。這批人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事。他們大多數不承認他們是我們的主子，但只承認他們是經濟他們的自然力量的忠僕。這批主持我們英美經濟生活的人，往往相信管制人類社會的力量是自然法則。這種信仰並不是偶然的，但是不論其有意抑無意，卻不過是用來掩蔽他們的管轄人民生活和幸福的殘忍事實而已。這批人如果不由政治制度的權力加以管制，就勢必領導我們趨向於大災難。我雖非難他們對於他們所做的事的毫無領會，但我並不否認經濟領袖的需要。但我確反對這種自委自派的獨裁的領袖的危害。任何政府，不論經濟的或政治的，必須要出於被治者的同意。如果統治不是公眾的，那就是私人的。世界經濟操縱於私人之手，其意義就是戰爭，和永遠不止的火

併。只有在自由世界政府之下，才可能有自由世界經濟。人類若欲逃避獨裁制度的惡毒，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由自己管制自己。

但關於政府的事務，有其自身的困難和危險。如果國際的經濟由政治來管制，換句話說，如果一切問題由公眾的同意來決定，那時所謂人類教育的困難，就立刻湧到我們的面前了。對於不明瞭的事情，請問世界公民如何表示其同意或不同意呢？兩千年前彼克梯圖斯曾對這個難題說過：「國家的管理看說，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夠教育，但上帝說，只有已受過教育的人才能夠自由。」

所以，假使有一個世界政府由被治者的同意來管理的話，我們就必須要同時有一個世界性的教育制度。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自由的世界社會，則我們的世界公民就必須要學習什麼是自由制度，以及在實際的情形下，如何能夠使其成功。我們這樣說，並不否認國際社會問題不應由「專家」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加以深刻的研究，在解決的時候，並且需要由經濟和政治的廣大的經驗所得來的智慧。但是為了建立自由的自治政府起見，這種研究並不是就此足夠的。我們必須要在民衆的水準上，把這些問題來研究一下。「專家」可以提供意見和計劃，但必須由「公民」來作最後的決定。這意思亦就是說，一個世界秩序中的公民有許多東西要學習去做的。他們必須能夠理解判斷他們的領袖所說的話。更重要的，他們必須要學習如何互相認識，如何共同思想，以及如何瞭解公共事業。最後，政治制度的所以能夠成功，惟有依靠於人民的能夠起來，而對任何主張和目的的基本討論，能夠有所表示。這就需要互相認識和互相瞭解。總而言之，需要有一個共同的教育。從世界的

這一端到那一端，所有自由的男女老幼都在廣泛的，有組織的和不斷的研究其共同的目的和實現這些目標的環境，如此之後，自由的世界政府才有成立的可能。人民的必須要管制其政府，正像政府的必須要管理其事務一樣。不然的話，獨裁制度勢必就要產生，而戰爭，不公道，奴隸，不論公開的或隱蔽的，亦勢必隨獨裁制度而俱來了。

如果我們由問題的消極方面轉到積極方面，或由威脅戰後建設的危險方面轉到如何克服這些危險的方法方面，我敢在下提出一個建議。我的建議是建立一個世界的教育制度，以適合我們經濟和政治的需要。我的方案是成立一個國際教育局。我的論點如下：

一、我認爲，在起草國際計劃的時候，應即加入人民衆教育一項在內。尤應對這些具有世界公民權利和責任的成年人的教育，有所計劃。在計劃一個世界秩序的時候，經濟的，政治的和教育的機構，必須要面面俱到。除非我們能夠教導他們，不然我們就不能夠實施正義和自由。把任何經濟的政治的解決方法，強加在對此不瞭解的人民的身上，不過是在計劃世界衝突的再演而已。

二、我們所需要的國際教育，不限於學者名流間的智慧的合作和交流。亦並不是建立一二個大學，就算了事。學者名流是重要的，但是不能以此就認爲滿足。我們將來的工作對象，是教育全世界所有的公民，使他們具有融合爲一個國際社會的智慧和善意。

三、在開始的時候，國際教育必須要注重於成人教育。世界公民必須要知道做一個世界公民的意義，爲了製造一個自由

的人類社會，他們必須學習如何運用其頭腦，以及如何享受運用頭腦的成果。

四、我們所說的教育，從民主的觀念看來，必須是自由的，給予學生的，不是問題的答案，而是問題的本身，包含其所有的錯綜性。這種教育，禁止利用宣傳，而必須要領導各國的平民趨向於共同研究共同的事業，這事業是他們大家所參加的。

五、所有各國必須給予相同的基本教育。在不同的環境之下，教以同樣的課程。不論中國人，英國人，印度人，俄國人，祕魯人，日本人，一概給予同樣的基本問題，應用同樣的教學方法，採取同樣的智識材料。

最堅要的，是使學生們明瞭，從世界的這端到那端，正在進行相同的人類奮鬥，就是維持法律和秩序。所以要受教育的緣故，就是在使大家適合於參加這種奮鬥。

從以上所述的論點中，我們就可以推論出國際教育院的組織大綱，和我們所不可採取的方式了。

第一、我們所需要的教育，不能由各國分別教授，而必須由國際機關來主持。所有真正的教育，都是造型。換句話說，就是某種社會團體企圖使他的老少會員，適宜於參加這個團體正在進行的活動。世界政府本身必須研究和教導正在進行的中的作爲。任何其他團體，任何各別的團體，都不能勝任這個責任。

第二、國際教育的新費，其來源應由於世界政府。這種教育必須是自由的，不應受任何地方的或國家的財政後台老闆的限制和約束。而國際組織應對這種教育的教學方法和行政管理，負起直接的和無限制的責任。世界政府應完成他自己本身的

研究和教導。

第三、國際教育院的職員，一部分應由國際組織的負責行政責任的職員中選出。該局亦應延攬其他學者和教授，因為他們已經養成善於批評，致驗和解釋世界秩序的原則。如果這兩部份人士能夠融合而為一個單一的機構，又能夠充分明瞭他們自身的責任，我們就可希望獲得許多智識和實際活動方面的成就。這種機構，在學者的工作方面，以及在現今正在進行之教育方面，簡直太缺乏了。

第四、國際教育院的學生，乃從世界各地的六學中選出。他們都是青年學者，對於某一種專門學術已有相當的成就，其程度亦適合於教授大學的水準。

第五、這批青年學者至少在國際教育院中受訓一年，研究國際組織的工作狀況，其目的和方法，其一般原則和其特殊問題，其成功和其失敗之處，以及其希望和憂慮之點。在成人教育的方式下，使他們成為最適當的國際組織的施政的通譯者。

六、受訓完畢後，即由該院派往世界各地，當做人民的教師。他們獲得地方當局的合作，可以從這社會到那社會，而在每地停留三四個月。教育院必須和他們保持密切的聯絡，務使他們成為一個完整的教育團體，並且充分明瞭他們自身的目的，而準備在他們所能到達的各種不同環境之中，達成其任務。這羣國際通譯者，不但教人，且不斷自己學習。在他們之間和在他們的工作之中，可以尋出一個相近於世界和平和正義的思想與動機的最適當的表示。

任何人曾經做過教師的，都會批評我的建議是如何的零碎。教育的路，不是一條容易的路。為世界公民所設計的教育制

度和計劃，是是很瑣瑣和複雜的。但二五十年來許多國家中的成人教育的成就，已經指示給我們許多在開始時可以仿照的方針。我擬在下面指出三點：

(一)我們的教師到達各地時，必須要舉行民衆會議，展覽國際事業的各種狀況，和有關的各種智識的資料。展覽後，又須加以討論。

(二)比聽講和討論更重要的，是詳細的和不斷的研究。為達成這個目的起見，應組織小規模的研究團體，共同閱讀和討論影響國際事件的大著作和決定性的文件。每一國際社會的每一成年公民，都成為該團體的活躍份子，則是這種教育方法的遠大目標，這目標不能立刻達到，但應惟有我們接近他，我們才能夠走上國際社會的大道。

(三)在現代交通方便和無線電、電影等新形式之下，在教育方面發展了廣大的新的可能性。這些方法，須加以試驗和發展。這些歷史上第一次在智識方面，便創造一個單一的統一的人類社會，成為可能。事實上，希望雖然很大，但危險亦很多，所以沒有公衆的鑑定和管制，不能讓其發展。他們可以作為提高人類智慧的工具，反之，亦可以用來貶低人類的智慧，並且所有人類合作的企圖，都依賴他們。所以教育院的必要工作是研究和發展這些可能的教育工具。

四

最後，我尚須說以下兩句話。我所提出的建議是亟需的當急之務。如果希望成人教育在戰後再建設中發生些作用，我們在目前就必須採取這種決定性的行動。等到經濟專家和政治專家完成他們的工作之後，再提出教育問題，恐怕為時已晚了。教育的計劃必須要修改其他各種計劃，其他各種計劃亦必須要

修改教育的計劃。所以教育院必須要成立，俾能一步一步的負起責任，而與其他機構齊驅並進。是故，官方的或非官方的會議，應該現在就舉行。我們已經失去很多時間了。

我們在計劃地球上各國的教育和再教育的時候，我們不要以為惟有敵人才應該學習，正在激戰的時期中，這種理論是很流行的，但是在事實上，如果我們希望成為世界戰爭的勝利者，這是我們，並不敵人，需要大大加以教育。失敗帶來它自己的教訓。但勝利從來不是一個好教師。英美在現世界門爭中，已經驚人的成功了。七十六年以前，阿諾德用悲慘和絕望的語調，說出英國人的頑固的偏見對教育力量的關係。有人時常在懷疑，全地球上是否尚有比英國上流社會中的青年，對世

界發達的真相，更要糊塗和愚昧的。

我引用阿氏的話，並不是因為他說到了英國的統治階級。這句話是可以適用於所有高居在平民之上的任何國家中的任何個人。聯合國家的最大危險是在權力日增，成功日大，而對於其本身教育的需要，則仍一無所知。慣於統治弱小和君臨天下的國家，是不容易接受自由和平等的教訓的。必須要加以教育的，倒是那些戰勝國，國際教育院必須要在他們身上發生其效力。我們計劃一個自由世界，而在同時計劃做它的主人，這是一件無聊的事。自由世界是一個平等的世界。所有人，所有各國，都必須要加以教育。（原文載自由世界一九四三年一月號）

萬竹樓隨筆（四）

舜生

「一二八」之役，翁照垣以守吳淞得大名，當戰事正酣之際，余往謁太炎先生，請書數字贈翁，以資鼓勵，先生領之。次日余往索，先生則出文一首，長約千餘言，且親筆楷書，舉照垣甚至。余大訝過望，持赴中華，製成珂羅版，印三百份，分寄全國各報館。天津大公報，因機余所贈，複製鉅版，刊諸報端，於是照垣之名更大噪於南北。時照垣與余初無一面緣，後晤於上海，乃覺其人為一純粹軍人。近年聞其居港尋閑，飽經憂患，其修養或更有進境也。

太炎先生曾以江左夷吾許宋遜初（教仁），及宋被列強，梁任公亦在大中華雜誌為文弔之，謂宋有政治家風度。頃讀漱溟先生「談中國憲政問題」一文，始知梁宋間在民國元年固已有互相維繫之要約。太炎先生晚年一聯云：「何人竟敢來君叔，舉世誰為魯仲連？」最能道出宋在當時所處之地位，蓋宋固主張調停南北，以求和平統一者也。惜宋能容袁，而袁不容宋，卒至造成民國二年之悲劇，而袁氏之敗亦以此一役發其端，趙秉鈞一輩小人之肉，賊不足食也。

當前國際金融問題的檢討

楊宜林

(一)

自去年四月英美同時發表凱恩斯及懷德計劃後，不久又透露關於設立世界銀行的消息，沉寂已久的國際金融問題，遂成為盟國朝野人士目光所注集的對象。本年四月盟國專家發表國際貨幣基金宣言，本月一日國際貨幣會議又已在華盛頓舉行，顯見本題日趨于具體化。

金融問題內容本不簡單，對於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影響，異常錯綜複雜。國際金融的範圍更廣，且和國際政治息息相關，如影之隨形，尤其不易捉摸。近一年來，國內專家對於英美兩國計劃，國際貨幣基金宣言，和世界銀行等問題，著作如林，分析研討，甚為詳盡，使國人對於本問題的內容，有所認識，貢獻良非淺鮮。可是分析愈細密，立論愈專門，讀者的注意力也愈容易分散在各個論點上，甚或被內中少數論點所吸引，鑽入牛角尖裏而不自覺。猶如入山攬勝，迨置身其間，往往目眩于一邱一壑，而未能認得整個名山面目，豈非遺憾？筆者以為本問題現已接近具體化的階段，我們在研討各種專門性事項之餘，似不妨回頭數步，放寬視線的幅度，眺望當前國際金融問題的全景，而後檢討本題對於我國的種種關係，這樣或可得到一些新的收穫。

(二)

當前國際金融問題，由來已久。表面上，這是國際經濟主

義和經濟國家主義衝突的表現，深刻些看，恐非如是簡單。人類是在進步，但距離世界大同的理想，何等的遙遠。與其說理想過高，毋寧承認進步得太慢。在過去數千年中，不乏聖賢賢良，聰明才智之士，奔走呼號，祈求全人類幸福最高理想的實現，而一般人的智慧，始終未能領悟這種高超的道德水準，無法擺脫偏狹的利害觀念。洎乎今日，道德沒落之聲，唯一毛之利害是圖，不知其他，固不足道。即在國家觀念比較強烈普遍之邦，其個人與團體之倫理，大致以權利與義務為基礎，究其根源，仍不脫功利主義之窠臼。所以就現實而言，欲求現代人類普遍地打破私利觀念，成立一純潔的國家觀念，似尚待重大的努力，至于範圍比較更廣者，恐更有待于人類智慧的覺醒。

遠溯亞丹斯密司的學說，流傳于英倫，李士特的政策，風行于德意志，其故安在？凡涉獵歐洲經濟史者，均能理會。又如上次大戰之後，英蘭銀行總裁諾門不避各方指謫，歷盡艱辛，努力于國際金本位的復活。另一極端，德國的沙赫德窮思竭慮，冒天下之大不韙，倡行外匯統制，出口傾銷，雙方對買等之制度。彼此所採舉動，大相逕庭，而用心並無二致。所以過去國際經濟糾紛，說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摩擦，亦無不可。現代國民經濟發展的特徵，厥為資本化的重要地位。由于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背景的不同，各國資本發展的程度，軒輊不齊，而大家爭趨于資本化的途徑。從超然的立場，國際間資本過剩和不足的調劑，對於關係各國不但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大家應盡相扶相助的責任，本不應發生摩擦。可是人類

的智慧，還不能這樣地超出，當政者的眼光，總是偏重在本國的利益。因此國際資本的融通，往往變成債權與債務者鉤心鬥角，逐鹿爭強的對象。高度資本化的國家，生產效率提高，產量增加，而由於國民所得分配之未能合理化，消費和生產往往發生脫節的困難，爲着維持其資本化的繼續進展，勢必在國境以外，尋求過剩資本的出路。因其動機是在伸長本國資本化的命運，故對於投資的條件，總爲本身的利益打算，而忽視接受投資者的情感和立場。在另一方面，缺乏資本的國家，鑒於歷來國際間以借款和投資，爲政治侵略的幌子之史實，以及「熱資」(Hot Money)驟然來去的作祟，對於外資問題，當然顧慮多端。但由於主觀的過程，往往發生不合理的反動，而採取偏激的對策，或則堵塞投資途徑，或則毀棄國際債信。此種經濟鬥爭，在上次大戰以後十數年間，已經充份表現無遺，明瞭釀成空前的工界不景氣，使資本過剩和不足的國家間脫去聯繫，形成國際間的鴻溝。當前國際金融問題的主要任務，即在建築一條平坦可靠的橋樑，以橫跨這可怖的深淵。

具體言之，這是一個國際收支平衡的問題。按戰前國際收支的統計，大致以美、英、法三國爲主要的資本過剩國家，其次加拿大，瑞典，捷克等國，也稍稍輸出資本，其餘各國都呈現着逆差，需要外資的調劑。經過這次大戰的蹂躪，美、加、法、瑞、捷克各國忙於復興建設，舉世都將感覺缺乏資本，祇餘美國成爲碩果僅存的債權國。從債務國的立場，欲求補救收支失衡的傾向，可採下列數法：(1.) 匯率從價或貨幣減值，足以獎勵出口，限制進口間接有助於收支的平衡。(2.) 實施緊縮政策，使國內物價降落，以改善對外收支。(3.) 採行出口補貼制度，以獎勵輸出貨品。(4.) 限制進口貿易以節減

對外支付。(5.) 以種種方法互贈制度，以求輸出輸入之調劑。可是不論採行任何辦法，未待注意國際間的反響。上列第(1.) (3.) (4.) (5.) 諸端，戰前都經試過，引起了山崩不窮的報復行動，使然兩敗俱傷。從大西洋兩岸的條文，租借法案的規定，以及其他外交文獻裏，美國的國際關係，顯然反對一切障礙國際貿易的指施。站在視俄國國際盟主的地以，美國勢必把過去經濟鬥爭的弊害，痛切告誡世界，毋蹈覆轍，嚴詞訓嚴，誰能非難。至於緊縮政策，係採取返求諸己的方式，以節收收支的失衡，自不致引起國際的反感。不過緊縮的實行，務必造成失業問題，間接影響於國民的生活水準。戰後各國止需產案的復興，以解救民生的倒懸，任何相反作用的政策，必然爲國情所不容。就從美國的立場，也未必能坐視世界不景氣再度出現，因爲一個高度資本化的國家，必須有廣大的市場，以維持其繁榮，其理至明。由此可見，這問題已成爲世界各國共同的問題，絕非任何一國採取任何單獨行動所能解決。於此更可見，目前同盟國家熱烈討論中的國際貨幣和銀行計劃，確是必趨的途徑，我人亟應掏誠擁護其順利進行。

(二)

關於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等計劃的內容，論者已多，即現在舉行的國際貨幣會議，定更有詳盡切實的討論和決議。可是我們應認清目前所論的各種計劃，祇是解決本題的一種辦法。我們不但要注意這辦法的方向是否正確，更要記得這僅是一個起點，今後必須繼續邁進，方能抵達目標。單以我國的立場言，我們歷年國際收支都是逆差，戰後復興建設尤需外資的接濟。所以至少在近二三十年內，我們決難脫離債務國的地位。

。國際貨幣基金的作用，在調劑國際匯兌的失衡，根據基金宣言的規定，我國可能得到的限額約為美金一億二千萬元，每年可能得到的限額約為美金一億五千萬美元。據專家估計，這數額當不距離實際需要太遠。所以國際貨幣基金對我國關係的焦點，似不在提額本身，筆者認為匯率一點，關係更大。我國現行對外匯率的需要修正，業已成為定論。如仍照目前牌價，出口事業將無法生存。且戰後國際運輸一經恢復，舶來品勢必大量湧到，縱有國際基金的援手，恐也將窮於應付。但是究竟修正至何程度，所關因素過多，非俟國內和國際物價水準比較穩定的時候，實不易遽下斷語。好在國際基金對於匯率一點，尚設有彈性的規定，我國尚可從容調整匯率，使達於合理的水準。其次世界銀行或類似的長期資金融通計劃，實與國際基金相輔而行。國際基金的額度，祇要不離我們實際需要，太遠，不必斤斤計較，而對於長期資金的接濟，則應慎重提出，務期足敷配合我國經濟建設的需要。國際基金和長期投資都是彌補國際收支失衡的財源，而後者關係我國經濟建設尤為深切，我們應把握這重點。

假定經過這次貨幣會議，以及其他會商之後，我們對於國際匯兌和投資都獲得適當的挹注辦法，我們的問題，祇是初步的解決，因為除非把造成我們收支失衡的因素，快快地糾正，根本上還是得不到解決。以匯率而論，在戰時或戰事才結束的過渡期間，因政治方面的顧慮，并為維持人民對於法幣的信任起見，也許不可按照純粹的經濟理論，加以徹底的修正。但是以長期的眼光看，我們決不能否認購買力平價學說和匯率的密切關係。如果戰後的世界不容許統制外匯的制度繼續存在，那末穩定物價和穩定匯率，更將成為不可分離的政策。戰時物價

暴漲，自有其種種特殊原因，在和平時代，當可逐漸消滅。此外國家預算的平衡，尤屬平定物價的必要條件，這從戰時經濟的經驗，已得到明證。所謂平衡預算和緊縮歲計意義頗屬不同。經濟建設時期，百廢待舉，絕對的節省支付，殆屬不可能事，抑亦無此必要。我們所注意者，支出的分配，應儘量減少，多量用於直接間接輔助生產事業的項目。歲收方面，應整飭稅制，厲行募債，務使國民儲蓄多量流入國庫，俾預算平衡，同時免除國民所得膨脹，剩餘的流弊。

其次關於國際投資問題，筆者為焦點尚不在開始時期可能爭得額度的多寡，而在於我國本身消納外資的能力。據聞世界銀行計劃，很重視客觀條件。換言之，對於投資的可否決定將根據金融經濟眼光，審查各個方案的内容，是否圓滿。國際投資既屬於經濟領域，這種客觀態度，自無可苛議。我返求諸己，嚴格詳定切實可行的接受外資方案使投資者興趣。關於各個方案的内容，本文無從詳括討論，不過對於下列一點，似有提出的價值。我們整個的建設計劃，自應按照國防和民生的需要，統籌訂定，但為便於吸收外資起見，應先各個建設計劃的對象加以甄別，再行決定應否向國際投資。提出申請，甄別的標準，首重各個計劃的經濟價值，這可分為長期和近期，直接和間接。投資原則，貴乎安全有利，一投資者的心理，無不注重近期與直接的經濟價值，反之對於利益和長期可能收穫的經濟價值，大都比較審慎。所以在開始利用外資的時期，我們萬不可忽視這種現實主義的心理。據美國方面傳來的消息，彼邦產業界人士對於我國戰後經濟建設雖感興趣，不過談到比較具體些的投資問題，往往發問我國原有基礎的情形。察其意向，彼方對於我國任何一種事業的投資，

農人生活相當優厚。衣著之類，主人例不負責，日常用品如扇子汗巾之類，主人則例所供給。

雇農祇作工，直接間接，皆與主人有族誼或世誼等關係。其關係不僅為經濟的雇傭關係，所以不能單從經濟觀點加以考察。其關係並不祇為主僕，實稱爲賓主；雇工對主人爲東家。故除經濟關係以外，尚有一種情誼關係。雇工工作精粗勤惰，一半繫於主人待人有情有禮，有方有權，一半繫於作者之領導有法，所以作者在農家所處地位甚高。從人性情不一，統率駕馭，並非易事。在從前幫工與主人或作者之間，其不融洽之原因，以人事的原因爲多，經濟的原因，並不多見。近年國民觀念唯物化，服務精神低落，事業觀念薄弱，農人深受影響，不但「不給錢，不作工」，是天經地義；而「少作事，多拿錢」，亦成人生的金科玉律。祇要自己拿錢多，飯食好，不管田地耕種得何如，作物的發育何如，主人的益虧何如，一概無動於衷。對主人的利害，既不關心，對自己的成績，又不感覺。農業業務，外間的監督，所能改進者甚少，必須農人有自發的精神，負責實爲始有成功之望。自發精神，固以待遇優良爲其必要條件。但是待遇既已優良，工作不必從而精勤。況且從經濟的觀點言之，提高待遇亦有其一定之制限。所以雇農制度，是否能存在，確成問題。

於雇農待遇，欲加提高，自須依據經濟原理，於土地利潤、投資（如施肥等）利潤、經營酬勞以及耕作成績皆不能不視為有力因素，而分別予以適宜的應付。在現今田地收益情形之下，於此等因素，概施以合理應付，摺此注彼，可資以供提高雇農待遇之用者，縱不等於零，其數亦必甚低。所以提高雇農待遇，其根本方法，在增加產量。增加產量有兩種意義，其一

爲因田地收益額之增加，其有待於耕作技術如選種，除蟲，灌溉等之改良；其又一爲每一農夫平均收益額之增加，其有待於耕種機器之使用，以擴大每一農夫所耕種之田地面積。每畝田地的總收益增加，固亦有益於雇農待遇之提高，但其主要方法則在減少農夫人數，故須使用機器。

農作不同於工業工作，其使用機器實有種種制限。如插秧一事，吾人固望其有使用機器之一日，但在目前，則爲一種不可能。其他如翻土、灌水、播種皆有使用機器可能；但在農作程序中，一種機器之使用，一年祇有一度；即令採行合作共用制度，而一種機器之使用終有一定時間之制限；不似工業機器可以不分晝夜，不分節季，永遠開動。故農業機器之製造利潤以及成本，皆不可太高，甚或須由國家製造而以低價售出之。真欲農業機器化，此點甚宜考慮。

農業制度，從國民經濟的立場考察，其中心觀念應在於產量之增加。農作的成績好壞，除技術的改進以外，即繫於農人的責任心。必農人對其耕作具有責任感，本自發精神，爲切實耕作，農事效率始可加強。人非聖賢，欲其無所企圖而切實負責，其事甚難；欲農人負責，須使每一農人對於農事收益，皆具有利害關係。基於此一觀念，雇農制度實爲一種不良制度。欲加救濟，宜做效工業上的分紅制度，使每一雇農，在總收益中獲取一定額數之分潤，以提高其利害感。當然，此項利益分潤，須有精確之計算，於土地利潤，經營酬勞，投資利息以及增稅負擔，皆須先加扣除，再就純收益額予以合理分潤。

目前鄉農推行一種「一分田」制度。其法由田主供給土地與肥料，由農人供給勞力，共同經營，俟收穫後，平均分享其利益而還納稅則由田主任之。此一制度實爲雇農制度之演進

，於產量之增加，甚有助益，於農利之增進亦復不小。但
 獨農人與社會受其益，則土地權誰屬，全無關係。因在一種
 分田之制度下農人雖無土地所有權，卻有土地使用權，除去使
 用權，則所有權祇是虛名而已，田主所得不過土地投資之合法
 利潤。

現今有人主張田地國有，是為推廣農制度，實期期以為
 不可。土地國有，欲名符其實必須「穀物國有」。穀物獨產於
 全國，獨存於全國，如何防止偷盜？如何偵緝私私？不但無法
 施行，其勢必至於全國人民，騷擾不甯。食糧產地有限，尤須

當差大批人員以從事緝私，且種種弊端，層出不窮。再者土地
 國有則「田官」必偏設全國，以司訂立佃約，監督耕作，收受
 糧食等事項。結果，每一田官必成為一個封建侯王，在耕作上
 可以作威作福，在收受糧食上可以故縱故擒以勒取賄賂。吾
 鄉舊日為資助秀才舉人赴應上級考試有所謂「片香」田。其田
 畝安在？其佃戶為誰？其租額奚似？全縣祇有少數從中漁利者
 知之而已。以全國土地之廣，欲行土地國有制，國有而不能由
 國家使用，其「有」一本屬虛名，納糧即所以承認「莫非王土」
 。若竟由政府經理，則勢將恢復封建制度。

萬竹樓隨筆（六）

舜生

湘潭王壬老（閻運），清季主講成都尊經書院者歷數年，所造就甚衆，如廖季平（平）
 宋若子（育仁）輩，經術文章，均卓然有以自見。其再傳弟子如彭雲生蒙文通等，現仍講學
 於川中各大學，為治國學者之導師。前歲余遊成都，曾歷訪新舊各書店，搜求壬老在川刊行
 之遺著，共得六七種，均甚銷行，可見其流風餘韻，至今未沫。

「湘綺樓詩五種」，一、圓明園詞，二、獨行謠，三、杜若集，（七言律詩）四、夜雪
 集，五、夜雪後集。（均七言絕句）由成都志古堂印行，凡兩冊，獨行謠三十章，托始於道
 光二十八年，迄同治十三年，就當時所躬歷之事實，與所親炙之人物，託諸吟詠，其目序所
 謂「綜述時賢，詳紀大政」者是也。每章均有自註，於太平天國一時代之事，所述尤詳；
 可補「湘軍志」之不足。近十年間，余所見關於太平天國一代史實之新刊，近二十種，似
 無一人提及壬老之獨行謠者，可見參考猶有未備也。

世界公民之養成

英國哲學家羅素著
戴生譯

美國以最大強國之資格而興也，年月短促，因而欲求美國人民適應此變遷環境，更改其心習，其爲困難，此乃多數美國人所表示之感想也。美國建國者所遺下之傳統，乃適合於鄉村田園與人口稀少之社會，且遠離於主權與經濟世界之中心。雖舊時景物，雖今已遠，但仍不能全去時舊簡易生活之懷鄉病，且舊習何者已廢，何者猶存，其難予以區別。美國今日人口甚衆，某部分且擁擠非凡。兩次大戰證明，美國之牽入國際糾紛，爲無法避免之事。國力之充沛，攜來新任務與新責任。因此種種變遷，應有一種適當之公民概念之發展。任何個人，除荒島上之魯賓遜外，只能爲部分的自私的個人。其居現代，所謂個人之大部分，已變爲公民。此種變遷之中，包含一種涉及全人類生活之含義。

「高貴的野蠻人」與開化的文明人之間，有一段悠久之演進史在焉。由野蠻人至文明人之變遷，非如吾人所想像之大，然確有相當之變化。雖多數人希望吾人保持若干「高貴野蠻人」之性質。若于形容詞，如「馴服」一字，吾人聞之，表示憤怒，以其含有輕蔑之意。數十年前，商人之成功者，吾人常稱之曰大盜，此名稱含有讚嘆羨慕之意。多數行爲端正之人，若有人告彼曰，汝可成爲一成功之大盜，彼必聞之而沾沾自喜。凡此人性中之無政府因素，吾人無意於盡行剷除，但在行爲方面，吾人確不願其任意發展。此乃當然之理也。苟有一世界焉，每一個人之衝動與行爲，均循規蹈矩，則此世界成爲一案然無味之世界，鮮有非常成績之可言。要知不爲大聖，便爲大罪。

人。不爲天才家，便爲一瘋狂之人。若干原始時代之野蠻性，爲吾人所樂意保存者。其所成爲問題者，何種部分應爲吾人所保存，而不致害及社會，更具體言之，何種部分爲現時之政府與經濟制度所能容許？

此種國家權力問題也。國家之起，由於懲罰罪犯與保護社會，使其不受其敵之侵凌。在遼遠與人口稀少之國家中，國家實施此項職務時，鮮有對於一般公民生活之干涉。易言之，軍隊可以不火，法律可以甚少。但目時代進展，國家繁榮後，此種舒適狀態，必將終止。嫉妒的鄰國，虎視眈眈，每視日益增大之財富爲其戰利品。而犯罪者亦甚易匿藏於大城市中。再者，人口密度增加後，即需要更多法律，因以前無害於社會之行爲，現或成爲過失。例如在沙漠中，汝可久立一地，凝視飛鳥之翱翔，但汝在紐約，亦如是爲之，則必立時集合一堆不可管制之羣衆，而阻礙交通矣。故警察必出而干涉，命汝前進，雖久立一地與凝視天空，並無含有不道德之處也。

戰爭造成國家

抵禦外侮，常爲國家權力之主要來源。在野蠻部落中，其酋長在戰時之權力，每大過於平時。戰爭使人民發生與其同胞一致團結之意識，此使合作更爲容易，其自然趨勢爲對國家權力之服從。但對國家之看法，常在各種不同人民之間有不相同之處。直至最近爲止，美國常與英國之大多數人民，曾認國家爲一障礙物，然亦爲必不可少之物。彼等認爲所謂國家也者，

惟爲謀人民福利之一種工具而已，吾人呼喊警察乃用以對付盜賊，一如吾人召請泥水匠修檢屋漏然。要之，並無其他神祕與偉大之處。吾人呼喊之時，不願國家踏上吾人之門，吾人認爲要吾人不犯罪，應讓吾人自由自在。雖然，此種態度因英國生活受戰爭緊壓更重之故，現今已較美國更少堅持者矣。

富於戰爭經驗之人，不取不同之國家觀。如霍布斯，爲英國之內戰所困擾，嘗視國家近於神聖之物，又如黑格兒，在革命與拿破侖戰爭中，漂流不定，遂認國家爲人類生存之主要目的。自黑氏及納粹觀之，個人生存，不在爲自身生存，而應爲發展團體光榮之工具，國家權力之發揮光大，即由此而來。

實際上言之，此項觀點必與貴族或民主政體之說，互相結合，惟統治階級之國王能享受一高貴的野蠻人——之特權，而其他人則須屈膝低頭，服從主子。此種社會，從全體觀之，一方爲無政府，他方爲法律，在上者爲無政府，而其餘則服從法律之人也。但在信仰民主政治者觀之，此決非適當之解決辦法也，吾人需要自由，但所能保持之自由，須屬於全體人民，不祇爲少數特權階級保持之而已。但國家之構成，實際上常須有少數特權階級，但吾人拒絕崇拜國家，不承認國家高出於一般公民。

吾人雖對國家抱某種懷疑，如我所主張者，但吾人由於現代世界環境之壓迫，不得不認清以下一點，即國家須有較已往更大之權力是也。

近代國家之權力與功能之增大，蓋有兩源，一爲戰爭，另一爲失業。而尤以戰爭爲最重要。戰爭在以前爲人民中一小部分人之職業也。英國十八世紀之戰爭，除美戰爭外，大部分認爲有利可圖之商業之進取。美國與墨西哥之戰爭亦如此。此

戰爭不能改變社會機構。但吾人目前所從事之戰爭，則不但須傾全國資源，且須傾國際所有之資源，始能操必勝之券。

戰爭不論延長多久，人民即使不願，亦須勉力服從此項事態，因除此以外別無他路也。但戰後將如何耶？吾人能否重建一放任政策之樂園耶？倘不能，吾人將放棄若干舊時之自由主義耶？公民權利之必需被吞沒者，將至何種程度耶？何種與何種程度之個人自發性，吾人可恢復耶？吾人永遠交與國家統制之事項，現時所認爲暫時措施者，將至何種範圍耶？

外交政策之四時代

如欲適當回答以上所舉之問題，吾人類抱與以前所共認者不相同之展望。大體而論，對外國有四種可能態度，國內經濟之如何構成，即視其對外國所採何種態度而定。吾心目中之四種態度如下，（一）孤立主義，（二）帝國主義，（三）組成一集團，運用權力平衡政治，（四）組成一新的與更強有力的國聯，盡其可能使其普及全球。欲在四者之中有所決定，則勢須對外界與其他國家之心理有所認識。

孤立主義爲十九世紀之美國，與一六八八年前之英國，所應採之政策也。自空中戰爭發展後，此項政策不但不需，且屬不可能矣。張伯倫氏曾試用此項政策，誤以爲捷克斯拉夫遙遠，但最後因時勢之強迫，不得不承認波蘭乃並非遙遠之地矣。若干美國人曾認爲日本離美國頗遠，但珍珠港事件之證明，適得其反。是故，惟有閉目無睹於現代戰爭發展之人，始在今日仍堅信孤立主義也，即身爲西藏之人，恐亦不能不感孤立之不可能矣。

孤立主義既屬不可能，其所激發之心智狀態，甚易轉而爲

帝國主義。而兩者俱為心理方面之守勢。孤立主義者希望其他國家無機會進攻其國家，帝國主義者則希望其國家強大，使其他國家不敢進攻。兩者成爲國際上與某一國家之真正友誼，乃不可能之事。兩者不_一之處，乃在帝國主義者認識以下之事實，即無希望完全避免與外界之發生重要關係，是故帝國主義，不論其是否爲聰明之舉，要不失爲「一可能」之政策，孤立主義則否。

舊式之帝國主義，如佔領與併吞亞洲與非洲之土地，現已過時矣。新式之帝國主義將使臣屬之國家，具有自治政府之外貌，但在背後則以財政與軍事力量控制之。此次戰爭爆發以前，德國即以此種方法統治巴爾幹，除蘇聯與其勢力範圍下之區域外，美國連合英國，似即可以此種方法統制全世界。（蘇聯與其勢力範圍究多大，現仍爲一不能回答之問題。）

在謀取安全之假面具下，新式帝國主義在美國獲得有力之擁護者。克蘭特（Krantz）提交共和黨戰後委員會之提案，即一例也。彼建議美國應有一五洋之海軍，一強大常備陸軍，滿佈各地之海軍根據地與飛機場，以及太平洋中可能取得之島嶼。彼言曰：「太平洋應成爲美國之內湖」。克氏之主張，固出於至誠，彼認爲採取此項政策，可使美國安全，而不受外力之威脅。所可惜者，彼未脫全世界之帝國主義者之習氣，即並未考慮若美政府照此施行，其他國家之反應爲如何。大不列顛，蘇聯與中國必將起而抗議，乃顯然者也。彼等將起而言曰：「吾等之所以作戰，乃反對軸心國之奴役，吾等亦將準備起而反對任何其他國家之奴役。」除美國以外，彼等將獲得全世界之普遍同情。其結果將證明所謂五洋之海軍，實嫌太小，而於一新的世界大戰中，美國扮演今日德國之角色而已。余深信甚少

美國人贊成此項計劃以維護其利益。

又有一更有影響與更可接受之提案，即英美同盟是也。反對此項同盟之論點，余不擬多說，惟余須提出以下一點，即只有英美同盟不能獲得世界之和平。只有英美同盟將造成英美聯合帝國主義，而非純粹的美國帝國主義，其他國家之不利有此同盟者，必將起而反對，而世界亦將回復到權力平衡政治之戰爭。關於此，四世紀以來之歷史已予證明，決無永久和平之希望。是故，英美同盟可認爲一種正當趨向上之有用步驟，不可認其本身即爲一種目的。此項同盟應在特定條款下，開門歡迎其他國家之參加，而此項條款中應避免英美稱霸世界之痕跡。現世界所需要者，非爲超然，亦非爲稱霸，而爲合作。余不以爲與任何人合作，皆屬可能；國內政府之成，固由於合作，但吾人決不與盜賊合作。但與所有遵守法律之國家合作，則應爲可能之事也。此則應有一確定之法律，使彼等有所遵從。以上所言，爲應憑之處理國際關係之一般概念，亦爲避免將來另一次大戰再起之惟一概念也。

以英美同盟與包括蘇中兩國之同盟相比，顯然可見，非一良善之出發點也，但或爲可能中之最善者。主要之點，乃在將有一權力之集體，從最小量言之，爲英美，從最大量言之，爲聯合國，此項權力之集體將成立一組織，用以維持和平。其宗旨在逐漸生長，最後成爲全球性之機構。此項同盟應有一憲法，應能容納新會員之加入，若該會員甘願遵守此項憲法。

此項憲法中之最主要者，將爲關於阻止戰爭之規定，任何國家若侵犯同盟中之某盟員，將爲同盟之公敵，且將由同盟合力攻擊之，如犯罪者爲同盟中之盟員，則將予以除名，而由其餘盟國共擊之。如此之後，任何侵略者將遭遇集體之懲罰。當

然，應組織一代表所有盟員之法庭，當侵略事件發生時，該法庭有立予宣告之責。

應設立一國際立法之機關，賦予以同盟之名義簽訂條約之權力，更重要者，盟員所共守之條約，若有任何盟員提出修改之要求，該機關有修改之權，亦應賦予以廢棄陳腐條約之權，如英政府與印度諸王所訂者。在目前，除雙方之同意外，尚無其他修改條約之合法方法。然因此之故，一方所反對，及外界輿論所厭惡之條約，在一方急欲廢棄，而在地方堅持必須遵守，則成爲戰爭之導火線矣。

目前所應採用者，爲使各個帝國主義交流融匯，但此方面因蘇維埃制度與其他國家制度不同之故，而困難起矣。或者各國間可以互相同意，任何盟員國之殖民屬地，對從任何盟員國輸入之貨物，應課以均一的關稅，對從非盟員國輸入之貨物，則課以較高稅率。或者更可互相同意，盟員國應有同樣利便，投資於殖民地，而非盟員國則不應再有新投資。

以上各種規定，再加以反侵略之保障，或可誘引小國樂於參加。余認爲有人或將推測，荷蘭，比利時，斯堪的納維亞與拉丁美洲各國，將首先加入。巴爾幹各國則須先同意將其爭執交由同盟仲裁之後，始准其加入，但彼等之決定，或不會延宕過久。以云德日之加入爲盟國，則須經過相當時期後，始有此可能也。

此項計劃能否實行，大部有賴於蘇聯，當亦有賴於英美對蘇聯之態度爲如何而斷。如雙方之互相猜疑，渙然冰釋，則此計劃即可實行矣，不然則否。

在國家內政方面言之，今後之合作，亦應較以前更爲推廣。魯濱遜全賴自立自助，早期之開拓者，多亦如此。開拓者果

敢勇毅，含有浪漫之意味。但顯然爲一種個人主義，不再適用於一安居與人衆之社會。但從開拓者傳下一種親身體驗事業之心理，威風凜凜之個人主義，現已不合時宜，而其所鼓勵之美德，並不再爲時代所最需者矣。此種心理上之應如此，猶之去蓬蓋之馬車代以鐵路也。一開拓者之家庭，能自造及自開其已有之蓬蓋馬車，但不能自造其一已所有之鐵路。美國西部開發之際，幾致巨富者頗多，但非由開拓者也。其巨富由鐵路巨商所造成，彼等活動於華盛頓及各邦首都，而彼等以操縱之腐敗方法，將小股東之投資放入其荷包之中。彼等所以能如是爲之，因開拓者忙於墾植其已有之土地，無暇注意此輩勇敢強盜之行爲，彼等遂得以獨佔此龐大之集體事業，而個人的農人惟有仰彼等以運銷其農作物而已。

通常誤認集體經濟所需要之品格，不及個人企業之品格。惟此種看法甚爲普遍。集體經濟如欲成功，須求公共利益之實現，異於個人企業之只須個人之努力，即可成功。個人企業之信仰，如不合於時代時，即趨而壞亂風紀。以修造跨大陸之鐵路之資本家爲例，彼等既非自身修築此鐵路，其造路後之獲利，未嘗不得他人援助。彼等雇有工資低微之苦工，彼等又雇有一批腐敗政客，經由彼等得以欺騙老百姓，作偷竊掠奪之勾當。此並非自立自助也，而爲一種獲得他人援助而不給以適當酬報之技術也。此項制度先使社會腐化，然後引起社會上之公憤與不安定，於是開拓者之道德變爲政治上之敗行矣。

現代經濟如欲成功，其所需之集體心理，吾人可於國家牽入一嚴重戰爭中之所作所爲見之。當此時也，目標一致，利益相同，戰局危急之際，自然表露出一種友誼的同道情緒，因而減輕不可避免之痛苦。當然，亦有少數人不歸入此公共的善意

中，即所謂和平主義者，第五縱隊與米來吉新林。此類人十招引他人之歡意，時局愈緊張，憎惡彼等亦愈大，但除此類少數人以外，當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人民每能認識各人之利益即全體之利益，而團結一致。從此項認識中，即跳躍出英雄主義與互相幫助之美德，全國對此加以敬仰與獎勵，而在平時則認為不可能者也。雖然，在平時亦何嘗不可能，惟社會之公共利益，須有如戰時之體認始可也。

此次大戰結束時，各參戰國立將面對一經濟的混亂狀態，其嚴重性可形成普通貧乏之危險。此項共同危險，如不能處置得宜，則其蒙難之人民，將大過於為敵人所殺害者。由於幾世紀來之經驗，已養成關於戰爭時通力合作之心境，但迄今尚未養成一旦戰事停止後，準備通力合作之同樣心境。開拓者之傳統，加重同一社會中各不同份子之經濟利益之衝突。戰後所興起之環境中，不需要特別注重此項傳統。而需要一正當之心理，即認仇敵為吾人之公敵，應以集體的力量擊潰之，有如吾人之擊潰德日者然。誠然，有若干個人將因之被殺在一任彼等剝削之社會中，獲利較少，但彼等將成為新戰役中之吉新林，且彼等為數極少，而極大多數之人民，如不由舊時傳統與不光明之宣傳所誤導，咸將認識公民之公共利益，實重要過於互相競爭之衝突，而將集中其共同努力，使吾人永能生存於世，不論戰事之是否停止也。當德日停止企圖殺害吾人之時，吾人將較諸目前更難於使吾人生存於世，此乃吾人經濟中所包含之表非實是之性質也。

吾人對於自身以外之社會團體之感情，反映吾人對於自身所屬團體之利益與他人團體利益二者間關係上之信仰。如吾人自覺吾人為甲團體中之一份子，而又以為乙團體之利益，不利

於甲團體，則吾人大多憎惡乙團體之份子。因吾人憎惡彼等，是故每將罪惡加於彼等之身，認彼等為仇敵，憤恨，不誠實，或詭計多端。有時吾人不能確定他人所屬之團體為何，因而吾人對彼等之態度，亦在不可捉摸之中。中國人，其為吾人之盟友，則愛之，其為來美之移民，則恨之。國人，因其英勇擊敗德國，則尊之，但作為共產黨人，則懷疑之。猶太人，其為希特勒之犧牲品，則不勝其同情，但當猶太人要求加入排外性之俱樂部或會員時，則憎惡之。不論吾人之態度是否友誼抑敵意，吾人每將吾人根本上之自私自利心，隱藏不見，同時造為各種理由，以解釋吾人憎惡之所由來，但若吾人一旦真正相信，彼我之間並無利害衝突之處，則吾人由所造理由中所生之信仰，亦烟消雲散矣。

關於利益之衝突，蓋有四種，一曰利，二曰名。甲先生希望賺錢，但發覺乙先生阻礙其路。或甲先生希望獲得社會上之名望，所以希望乙先生自認其下手，至少不應為其上司。兩者皆不能嚴格分開，因利可生名，名可生利。但既可分開，其作用與影響當亦不同。人類之純粹經濟利益，非如一般人所想像之互相衝突，因而集體事業能使吾人大家共富。是故，希望富有之心與但希望較鄰居更富之心，迥乎不同，便可促成計劃經濟之實現。但希望其地位高過於鄰居，則其中確含有競爭之性質，按之世事言之，人人共享大名，乃不可能之事也。例如，汝希望成為美國大總統，則非將汝之競選者犧牲不可矣。汝如希望汝之國家稱霸天下，如德國然，則非將其他國家一一征服不可矣。汝如希望白種人優越於有色民族，則汝就須阻止有色民族躋上平等之地位矣。由此觀之，若欲獲得社會合作之利益，有兩必需之條件在焉。第一，使人民瞭解不同團體經濟利益

之和諧之程度，第二，須建立一社會制度，在此制度中，不平等雖不可免，但高級地位之獲得，乃由於其對社會之貢獻之酬勞。

第六項關於教育與社會組織。大體而論，人類之經濟利益，以生產者言之，因互相競爭，但以消費者言之，則大抵相同。而在目前，生產者不但有組織且計算其消費者不但無組織且近於啞嚙，因是行政當局對於通貨膨脹遇見困難之所由來。某種利益有組織，而某種利益無組織，其結果則產生偏輕偏重之弊。最不幸者，無組織的利益，乃屬於此類，即人類間利益衝突最少之點也。現時所面臨者，為使人民認識平時之公共利益與戰時之公共利益，但於人民倫理方面應先有某種轉變，即使人民認識與鄰人在競爭關係，非社會上最善之制度也。

第二項為社會地位之優越與成績上之優越相結合，此事則較為困難，因除非在天堂中，不能貫徹也。美共和國創立者之初衷，在使所有人民盡其可能互相平等，然而此點乃現代大規模組織所用力摧毀之一也。苟有一龐大與重要之組織，即須有行政人員之設置，彼等即為掌握其大部權力之人。彼等或可隸屬於組成份子之監督之下，但此乃遲緩與不可恃之程度，一方由於多數人之無知，他方則由於當局之熟悉情形，遂使監督之法歸於無效。是故，在現代社會中，不論其為政府為工業界，其管理權不能平等。在資本主義下，或在社會主義下，在民主政治下，或在獨裁政治下，皆可作如是觀，但在所有上述各種不同制度中，並非同屬如此。只要民主政治能保存，究有最後之管制權，可用以限制官員之濫用權力。

官員之權力，乃社會地位所由取得之一種來源。其另一造成地位之來源，則為財富。吾人必須承認，財富之獲得，並不

由於對社會之服務而來。人之地位，苟以金錢收入為評價標準，則社會上將羨慕先與富翁結婚，以為日後離婚之計之女人，與追求富翁而與之結婚之男人矣。以上所言，或為目前制度之偶然結果，但吾人對並未做任何有益之事，而成為巨富之人，將作如何解釋耶？對公眾毫無服務之可言，而可致富，吾人應盡力取締之，但此須對個人自由加以相當之干涉矣。

自由有各種方式。資本家任意投資，自由之一種也。工人流動遷移，或與其他工人結為工會，亦自由之一種也。父母以其認為然者，管教其子女，亦自由之種也。改革者宣傳其改革主張，亦為自由之一種。透澈之無政府主義者，或並認盜賊之盜與刺客之暗殺，亦稱之為自由。

工人之遷移自由，只限於本國境內，因目前彼等甚難越過國界也。在以前，彼等無結社之自由，現則彼等欲不參加而不可得，已失其拒絕參加工會之自由矣。父母之自由，在古羅馬時代達於頂點，父欲其子死，子不得不死。英國十九世紀初葉，為父者仍保有權力，強迫其子女工作於工廠，因工作時間過久，大多數俱因之死亡，而在美之南部各邦，此項權力尚未完全廢止。在民主國家中，父母仍保有以其自身之宗教傳其子女矣。視子女如奴隸，如財產，今則不可能矣。由此可證，財產觀念之流動不居為如何矣。

改革者主張改革之自由，常受嚴厲之約束，迄今仍如此。盜賊與殺人者死之自由，因被害者之故，從未讓與，（除革命政府以外）。且法律日益增多，對狡猾多端之盜賊，如財政上之欺騙或食品之珍雜，均加限制矣。以上所述各種自由之限制，認為事實上所必需，然則資本家之希望能為例外，實無理由之可言也。

愛國主義。在小國言之，此舉或有興味，但在大國言之，則爲自失其莊重之態度。

以上結論，倘吾爲美國人，不得對之而有何抱憾之處。美國之地位，有如一從前鄉居幽僻之地之人，但今則發覺彼已身在首都，料理世界大事。美國之軍備實力與工業之潛在資源，遠超過於其他國家。因此地位遂攜來國內國外之新問題與新資

任。除非冒一連串大戰爭之危險，即不應規避此項責任。如美國能聰明、堅決、且溫和、運用其權力，常以世界和平之大目的爲念，則吾人之紛亂時代，即可讓位於一個秩序的進步時代矣。良好機會現已存在，吾視乎政治家與人民能否善爲利用，使其國家自身與人類全體同受其益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幸福雜誌）

萬竹樓隨筆（七）

舜生

王志兩卷，湘綺弟子桂陽陳兆奎編輯，大抵爲湘綺先生筆答及門問難之作，亦偶存筆記或其他短論。其「論裁同以來事」凡十則，所記當時故事與他家頗多出入，茲舉數例如下：

一、記曾李關係云：「李少荃平生服事曾二銘（心存），於曾蔑如也。後爲翁叔平（同餘，心存三子）所排，至與大役，欲致之死。……余嘗謂之，君推崇翁二銘過曾舜生，顛倒是非，故其子以此報，李但笑不答也。……」

二、記略乘章與曾左關係云：「湖南空虛，萬事不辦，曾侍郎獨力治軍，（略）不惟不助之，反多方以扼之，官士承旨，視曾軍如土寇。其用左郎中，由張石卿（亮基）移交，待之同胥吏，白事不爲起，見必垂手待。……」

三、記李左出處云：「世皆言左由曾薦，當密寄問曾時，曾覆奏左未能當一面，恭王遂棄用之。李在軍中不見知，常發憤失望，後以沅浦俊臣俱辭避，李乃自請行，（指李赴上海治軍事）非曾意也。

四、其論曾胡云：「曾起農家，胡稱貴胄，諸所指置，曾不及胡。而同時名人，希與胡接，由其少無邊幅，又荒於學涉故也。使曾有胡材略，胡有曾聲望，則豪俊效用，規模宏遠。中興之業，實成自胡，而外議不知所由，或謗或諛，皆非事實。……」

四川省銀行

資本金總額 國幣肆仟萬元
本行宗旨 營業要目

存款	代理公庫	支行	分行	總行
放款	儲蓄	自井	成都	重慶
貼現	信託	通縣	萬縣	
匯兌	倉庫	南充	內江	
		合川		
		蓬溪		
		遂寧		
		達縣		
		梁山		
		豐山		
		峨邊		
		馬邊		
		沐川		
		屏山		
		敘永		
		古蔺		
		榮昌		
		隆昌		
		內江		
		資中		
		簡陽		
		成都		

總發行所 均爲零九六六號

聚興誠銀行

樂 業 勤 耕

儲蓄	匯兌	放款	存款
----	----	----	----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設重慶森林路
分行遍設各地

定		預	
三個月	半年	全年	時間
六冊	十二冊	二十四冊	冊數
八十五元	一百七十元	三百二十元	收費

本刊零售每冊國幣十五元

不函購免之虞，一元郵票可以代現。不收郵費，
加快或掛號照加。

民憲半月刊（第六期）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卅一日出版
編輯人 左舜生
發行人 鄭振文
發行所 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信義街卅九號
定閱處 本社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 重慶成都桂林昆明貴

純粹華僑資本 華僑聯合銀行

經理一切銀行業務

存 息 優 厚	營 業 要 目					手 續 敏 捷
	儲蓄	信託	貼現	押匯	放款	
	存款	存款	存款	存款	存款	
匯 兌 迅 速	分 支 行 處					辦 事 簡 便
	東興	柳州	韶關			
	號八十八路森林：行	總電				
	六 七 二 一 四：話					
	四 九 二 〇：號掛報電					

中國工礦銀行

利導游資 調濟金融 營業存款 貼現放款 匯兌現款 工廠存款 扶植工業 協進生產

西 昆 桂 衡
安 明 林 陽
長 柳 自 南
沙 州 貢 充

總行：重慶森林路二號
電話：二四二六 一八二八
掛號電：八二九一

大同銀行

經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銀 行 部						
重慶分行：	蘭州分行：	西安分行：	昆明分行：	桂林分行：	貴陽分行：	衡陽分行：
柳州分行：						
行址：重慶打銅街	行址：蘭州中正路	行址：西安大街	行址：昆明八道街	行址：桂林八道街	行址：貴陽八道街	行址：衡陽八道街
電話：四一九六	電話：四八八	電話：八八一	電話：二四八	電話：二四八	電話：二四八	電話：二四八
信 部						
重慶：中一路 電話：二二八四						
昆明：昆明路 電話：三五一八						
（一四〇七）均錄外						

交通銀行

為各工廠：
謀求戰後復興之準備
解決添購機器之困難

舉辦：
工廠添購機器基金存款
存額 至少國幣拾萬元
期限 至少一年但得分期繳存
利息 照本行定期存款利率計息

- 優待辦法
- 1 存款期滿後工廠以之添購機器如有不足得向本行商借最高額可達已繳存款之總額
 - 2 存戶借款定購機器時由本行代辦其需自辦者由本行代付價款
 - 3 存款未滿期前訂購機器得向本行商請代付價款
 - 4 此項存款到期時如不需添購機器可申領本息

民憲

第一卷 第七期

半月短評

(一) 目前急切待辦之事 (二) 一個最緊張的時期

(三) 關於友邦對我的批評 (四) 「戰時英國」

塞班戰役與德國戰局

教育之生命

民主政治的哲學問題(下)

五五憲草中之國民大會

希特勒之惡果

大英帝國未來之轉變

南非首相史末資將軍

大戰以來巨頭會議之經過

萬竹樓隨筆六則

舜生

張君勱

余家菊

陳啓天

陳一清

孫寶毅

茂義譯

超然譯

孫寶毅

舜生

亞西實業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壹千萬元

主要業務項目

扶助實業促進生產
以服務社會為主旨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兌 儲蓄 信託

各埠分行辦事處

衡陽	貴陽	昆明	西安	蘭州
梧州	宜賓	瀘縣	江津	內江
長沙	合川	磁器口	白沙	重慶

總行：重慶陝西街二〇八號
電話：二六三五一 掛號：二四〇三

中央信託局

國民政府特准設置

資本伍仟萬元

業務範圍：各種儲蓄存款、國庫券、定期有獎儲蓄、特種有獎儲蓄、各種信託及代理業務、產物水火等險、戰時陸海空險、普通國民保險、代辦國內外材料、工業品進口土產出口、印刷鈔票印花、辦理運輸、會計服務

總局：重慶第一橋頭市場
分局：重慶、成都、萬縣、宜昌、沙市、長沙、衡陽、貴陽、昆明、西安、蘭州、內江、江津、白沙、重慶
代理處：重慶、成都、萬縣、宜昌、沙市、長沙、衡陽、貴陽、昆明、西安、蘭州、內江、江津、白沙、重慶

福鈺銀行

銀行部：辦理存款放款匯兌貼現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儲蓄部：辦理活期儲蓄定期儲蓄整存整付零存整付零存零付分期付息及禮券儲蓄

通匯地點：成都、宜賓、瀘縣、南充、貴陽、重慶、合川、遂寧、昆明、下關、昭通、柳州、衡陽、麗江

總行行址：重慶民族路特一號
電報掛號：六九四九 電話：41338

安康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 信用穩固 匯兌迅速 手續敏捷

總行：重慶林森路四五號
電話：四一四四八 電報掛號：四一四四

各地辦事處：
太和鎮——太和鎮正北街
中壩——中壩北大街
三區——三區林森路

一、目前急切待辦之事

需者事之賊也

所貴乎「知幾」者，最上能「見事於幾先」，其次亦能「當機立斷」，最下乃使機會坐失。

以中國目前的情況論，爲着爭取抗戰勝利，爲着建設一個民主統一的國家，其已經在做或預備要做的事，真是千頭萬緒。可是，如果不能提綱挈領，選擇條件是要緊最基本的事把它趕快辦好，則將愈拖愈糟。

什麼是今天中國應該趕快辦好的事呢？

一、民主必須要有實際。這個尺度很簡單，第一要使中國人人人感覺到自己是確實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其次要使到中國來的友邦人士，確能承認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在態度上最少要承認人民是國家的主子，政府不過是受人民的委托，或事實上予以承認，以處理衆人之事的一個機構，無任何奧妙，也無任何神聖。

二、要把多數窮苦的人民（包括純勞力的苦力，士兵，以及多數的公教人員與文化人）從飢餓線上救起。這件事自然很艱難，但並不是絕無下手處：（一）今後凡任何興作，必須先問辦這件事是否直接於多數人民有益，有益就辦，無益或收效很遙遠，很渺茫，則此時惟有毅然不辦。（二）凡過去花錢甚多，而成績不舉，或就辦有成績，而於多數人民並無好處，

甚至於還有害，這類事便應該普遍停辦。（三）凡民間一切生產事業，如屬有利抗戰，並有補於人民生活，不問工農，不問規模大小，應儘量予以扶助，不可輕言指導，更不可隨意干涉。（四）凡一切救濟人民的機關，今後須一律改歸人民自辦，即民間原有此類自辦之機構，亦應由地方民意機關加以監督整理，以根絕官僚習氣，衙門習氣，土劣習氣，庶使人民於緊急危難之際，能多少得到一點實惠。（五）以工代賑，也可酌量辦理，但所謂工須以有利抗戰（例如修建必要的機場）及直接有利多數人民（例如修建成都到樂山的鐵道）爲限，凡徒耽觀瞻或僅供少數人享樂，則無論由公家出錢，或私人自理，此時均應在禁止之列。（六）取締奢侈仍應切實辦理，但過去算是失敗，例如餐館不許喝酒，實際是以酒裝在茶壺裏當開水喝；沒收市面的高等紙煙，但實際此類紙煙乃變成了像鴉片贈長官的最佳禮品；禁止私人乘坐汽車，一時相當嚴厲，但未見明文，却早已解禁。凡此等等，都只算作中華民國的小小笑話。三民主義的排列，本來是民族，民權，民生，但三民主義的實現却一定是民生，民權，民族。因爲第一必須人民不餓死，（民生）然後才談得上使人民過問國事（民權），也必待人民能過問國事，然後才談得上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民族）。所以把多數窮苦人民從飢餓線上救起，乃是目前第一急務。古人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我相信今天即令到了四海困窮，天祿也不一定永終，可是果然等到多數人餓到要吃人了，少數有錢的人留在中國，也會自然感到不舒服啊！

三、國內團結必須促其實現。今天還談不到真正的團結，這是一件無可諱言的事實。可是要求團結的心理又似乎是各方面都有的。老實說；如果大家原則上還承認民主的話，則凡要求團結，商量團結，以及其所以不能團結的癥結所在，應將其事實，經過，全部向國民公開，實言之，即無論任何方面，應將其事實，理由，直接訴諸國民，以靜待其批判。否則即令因一時的利害而求得妥協，這種團結也決不會長久。因為今天因一時的利害而可「私了」，明天也一定可以因一時的利害而發生「私鬥」！從實際上看，今天國內團結不團結的一個問題，乃是整個國家全體國民的一個死活問題，決不能看為少數方面的私事，國民是有權要求過問的。如果永遠把國民圈在圈子的外邊，這種態度無論出自任何一方面，都為不智，而且事情也決定是辦不好的。

四、盟方團結有待加強。關於英美蘇中四國之必須加強團結，尤以改善中蘇關係為然，我們在本刊上已屢屢言之。此事須中國自為主宰；而不可靜待國際之推移。吾人須視盟友之成就，一如自己之成就，盟友間偶有意見上之參差，宜引以為戒，而不足引以為喜，以自身之力量，不過爾爾，今後若干年的中國，只能在戰後世界的和平秩序中勉求生存，勉求發展，勉求強固，凡以往國際間慣用的蹈瑕抵隙與掣肘縱橫，在中國舉無所用之，如自審力量果不如人，則待他人之遷就我國無希望，橫衝直撞，有時且不能不遷就人也。

以上四點，均屬舉之毋甚高，實在是目前急切待辦之事，先哲垂訓說：「需者事之賊也」，一國家到了緊急危難之際，惟有以敏捷的方法速謀穩局的打開，拖是決拖不出好結果的。

二、一個最緊張的時期

敵人失敗是已經定了的，但當地的海陸軍尚未完全瓦解，當地的本土尚未普遍受到砲火的威脅，便希望她俯首投降，這却是太早計了。

就敵方的大概形勢論，一、小磯內閣必然繼續掙扎，方針不變；二、她的陸軍主力還儼然存在；三、海軍雖已相當損失，但她的主力，也還是藏藏躲躲，想伺隙而動；四、物資自然是十分竭蹶，可是可以供她搜括壓榨的區域，却依然是異常廣大；五、人心確已十分不安，並且已經相當厭倦，但「皇室中心」的觀念，與軍閥的維持，財閥的勉求自救，却仍然使大部愛好和平的人民抬不起頭來。

敵人自己充分明白，以她的人力物力要與英美爭衡，斷然是沒有希望了；但她對蘇聯必然是繼續獻媚，並且可以不借任何代價；對中國她是憤恨交乘，必然以死相拼。

美軍在西南太平洋現已有着勝利，再進一步，便可能移入小笠原，恢復菲律賓，並可能襲其全勝之勢，南北夾擊，錫尼米茲與麥克阿瑟兩軍之力，以會師台灣而佔領之。於是則敵人與南洋的海上交通全斷，其勢不能不竭全力向中國的大陸以求一逞。

假定美軍對遠東的壓力有可能提早加強，則敵人之退出南洋亦可能提早。這次敵人在我後方的苦鬥，僅僅是敵人準備退出南洋的初階，同時也就是準備在大陸決戰一盤序幕。

今後的一年是一個最緊張的時期。在大陸決戰，中國必須發揮自身最大的力量，決不可過分的倚恃友邦。因此我們痛感我們的軍隊有整理，刷新，加強的必要；同時我們更痛感全國

的武力雖有從速調整團結的必要！

敵人敗是敗定了的，可是我們仍非有準備一個長時間苦鬥的決心不可！

二、關於友邦對我們的批評

最近的十年間，友邦輿論對我相當嚴格的批評，已陸續發表得不少。假定我們僅僅只有一種盲目的自尊心，當然讀了這些言論不免有些難過。可是我把他們主要的論點，歸納起來，却大致不外下面的幾點：

一、他們希望中國確能成爲一個名實相符的民主國家。

二、他們希望中國內部能夠切實加強團結，並永遠杜絕內爭。

三、他們希望中國的戰鬥力能夠繼續加強，尤其強調士兵生活的改善。

四、他們希望中國的文化與教育，能繼續在一種自由空氣中生長，而不加以任何妨礙。

五、他們對於中國的執政當局，亦偶有個別的批評，但對於蔣主席領導抗戰的地位與權力，却始終是相當尊重。

自然，他們的筆鋒，雖然也有稍帶感情之處，對於中國的若干事實，亦往往所見未瑩。可是我們反躬自省，如上面所舉他們的幾個主要論點，却不正是每個愛護國家的中國人所要說的話嗎？因爲在過去中國人民並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他們又確實是在和我們同生死共患難，由於一種希望中國好的心理，乃不能不發爲一些責善的指摘，這是充分可以諒解的。現在中國言論自由的基礎已經放寬不少了，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以一種負責態度，來檢討自身一切重要問題，我想友邦人士

也會逐漸感到他們原沒有越俎代庖的必要了。

四、「戰時英國」

最近王雲五先生發表了兩本新著，其一爲「訪英日記」，其二爲「戰時英國」。日記係王先生將他參加訪英團四個月零一天，包括來去的旅程，留英期間，及歸途訪問土耳其，伊拉克三國的見聞，逐日加以記載，一切都是嶄新的材料。加以王先生的文筆明白暢達，讀之可當臥游，可益人神智，實非是一本有益國人常識的佳著。但我認爲比較更重要的，還是它的這本姊妹篇「戰時英國」。

「戰時英國」所用的材料甚新，敘述的範圍甚廣，全書計分九章，自英國戰時的政府，財政，經濟，工業，教育，以及戰時出版界的現況，婦女活動的熱烈，少年的組織與訓練，乃至英國人的種種特性，莫不明白生動，加以系統的說明。我花了六小時的時間一氣看完，每盡一章，莫不令人繞室環走，感慨萬端，現在把我看這本書的幾點感想，寫在下面：

一、英國戰時的政府比較平時的龐大得多，其網羅各方面的人才，真是形形色色，蔚爲大觀。可是機關雖然龐大，工作却異常緊張，權責也異常明白，既無冗員，也無廢事，這種地方，實可看出英國人的政治天才。國會對於戰時政府，雖授以應急之特權，可是對於加重國民的負擔如加稅借債等等，則仍非經過國會完成法定手續不可。可見有人誤解，以爲民主國家一到了戰時，政府便可惟所欲爲，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二、英國本土即聯合王國的人口，僅四千七百七十八萬四千人，其已爲政府服役而受有報酬者，共有二千二百五十萬人，其中包括女子七百二十五萬，我們可以想像別人的所謂總動

員，其景象為何如？並可看出他們的婦女其在戰時的地位為何如？

三、從英國戰時的財政，例如從增稅，募債以及國民儲蓄各方面所顯示的龐大數字，我們看出英國國民對於國家是何等的公忠，其政府能博得全國的絕對信賴，又是何等的有力。

四、從英國戰時對於物資的管理與分配，我們可以看出是何等的公平合理，然其方法則至尋常，並無任何奧妙難懂之處，所最足令人起敬者，則在其一般國民組織力之強，及其一毫不苟的公忠體國之精神耳。現在他們一般物價的增加其平均數還不到百分之三十，僅此一點，已足令我們慚愧萬狀。

五、現在英國的工業，已全部在政府的管理之下，而產了一個整個的有機體，可以說一切一切都在為戰爭而工作。關於農業的增產運動，則更足驚人，蓋英國在食料方面，戰前僅能自給百分之四十者，到一九四三年已能自給百分之七十了，所

謂「人定勝天」，豈不儼然？

六、讀這本書最使我感動的，尤在教育一章，雖在這樣一個荊天棘地的戰時，英國顯然仍保持了她那種傳統的學術自由的空氣，這才真正是法西斯主義的死對頭，他們對於下一代兒童的保育，依然是無微不至，例如食品中的雞蛋牛奶，凡成年人可以節省的無不儘量節省，惟獨對於兒童與產婦則仍充分的供給。據格拉士哥學校衛生服務處報告，該地在一九四二年中，較諸戰前五年間之平均數，十三歲之男童體重增兩磅半，十三歲之女童則增兩磅，這真是值得中國人玩味的一種數字啊！

王先生這本書，在敘述上處處都能深入淺出，我想至少一個高中的學生都能看得懂，我希望能有數人讀他這本原書，所以不願在這裏多饒舌了。

我是把這本書當一本「民主教科書」向讀者誠意的在推荐。

萬竹樓隨筆（八）

舜生

丹徒柳翼謀先生貽教，曩歲主講東南大學時，余於寧滬間及劉伯明先生（經廬）座上，曾數數見之，聞其入川已久，願無纖絲一語。頃於友人壁間，讀其近作一首，錄之，以見此老骨鯁之不減當年也。詩曰：一兩人禽樂，秧畦似繡成，老夫堪強飯，暴客息橫行。即此權輕重，猶能洗甲兵，天心固仁愛，自愛盼公卿。

曾庵不知何許人也，其所著「三十年來燕京瑣錄」一書，（上海金馬堂出版）雖僅一二萬餘言之小冊，然自光緒庚子以後，迄民十七張作霖氏之出關，凡此三十年間起伏於北京宦海波濤之主要人物，靡不略有記載，其涉於一代掌故及外人軼事，亦附及焉。持論公平，語無枝蔓，頗具史識，一治中國現代史者良好之參考書也。

塞班戰役與德國變局

張君勱

歐亞戰爭何時了乎？日德之間誰先敗乎？假定德先敗，日本其投降乎？其抵抗乎？此方今人心中心急求解答之問題也。

（一）日德同盟之價值

吾人於討論日德戰事前途之先，不可不一論日德兩國同盟關係。凡兩國之為同盟，第一、壤地相接，第二、對一第三國可以就近共同作戰，第三、兩方在戰略上互相呼應，互通有無，必如此而後其同盟，成為真正之同盟，譬如上次大戰中德奧同盟對西方之法與東方之俄，皆符合於以上條件者也。即此次戰爭初期之英法，何嘗不因兩國海陸交通之聯繫而成為同盟國而共同作戰，至於上次之帝俄與此次之波蘭，則以地上之隔離，而陷於救不相救之境地矣。或者以為美國之與歐洲相隔甚遠，而英美兩次為同盟者，則陸上雖非鄰國，而因雙方在大西洋上之海權，其相去僅一衣帶水之隔耳。吾人根據以上實例，可以斷言兩國之為同盟，其第一條件在其有海陸交通之聯繫，而後兩國兵力可以牽制其敵人，可以遙為聲援。異哉日德之所謂同盟也，其兩方惟一壤土相接之國為蘇俄，日人攻之於東，德人攻之於西，則東攻者可以救西，西攻者可以救東，乃二國同盟條約締結之日，日人明言其目的敵為英美，故約中規定蘇俄為非攻擊之目標，此可以互攻之敵人，既已取消，其為日人眼中釘者，獨為英美。日人所以制英美者，惟在南洋，惟在太平洋上，以云歐西之英國與太平洋西岸之美，決非日本兵力所能及，反而言之，德國亦決無能力分兵以顧及西方之美國，印度洋，與其與日對壘之中華民國。故所謂日德同盟者，可謂天

各一方絕無雙方夾攻互相呼應之可言，自古以來，同盟之離奇，未有過於此者矣。然謂日德之間，絕無一種默契以圖策應，則又不然，德之攻北非攻蘇伊士運河，日人之佔領新嘉坡與出動於印度洋，自有會師近東之野心，此殆兩國心目中所以撕破大英帝國之策略，而美之為美，其大艦隊因珍珠港事變而毀其大半，日人心中因此假定其於歐亞一無反攻之能力，而日德兩方所以各敗其敵者，乃如願以償矣。孰知德人既敗於北非，又因斯大林格勒之役，欲伸手於高加索油田與近東而不可得，於是日德會師之計破。美國之鐵船也重炮也飛機也，其生產之增加，遠出於日德意料之外，不獨自固其疆土環巡邏大西洋，更派遣陸海空軍於北非，不數月間，德人自北非撤退，即其所謂稱之大西洋上潛航戰爭，自一九四三年夏季以後，亦已漸呈衰竭之象，於是德國之陸軍，除回老家外，無其他越出歐境擾亂英國交通之法矣。自太平洋上言之，美人自菲律賓退出後，堅守澳洲為反攻根據地，遲之一年後，乃於瓜島，蘇門答臘，拉布爾實行越島進攻之策，及今年春夏，據日人受委統治之馬紹爾卡羅林羣島而有之，今則並日人海上重鎮之塞班而奪之，而日本本土亦因此瀕於被攻之險。居今並日言之，日德聯盟之交通聯繫，始則切斷於北非與近東，繼則受挫於南太平洋與中太平洋，故已為各自孤立迎戰之國而已。乃聞日本當局時有加強日德聯繫與澈底協力之言，此種同盟，一在天南，一在地北，自其締約之初，聯繫之可能本極渺茫，以云協助，在地上海上空中俱無可言，則其所言，既不足欺人，適足以自欺矣。

（二）塞班一役爲太平洋上火力最盛之戰事

英相邱吉爾氏自太平洋戰起後，關於日德先後之戰略，胸中早有成竹，曰先德後日。其與羅斯福總統會議之中，關於先擊潰德國，再移英國全力協同美國以攻日本問題，曾提出互訂條約之議，其所以如此，希冀美國與之訂約後，則美傾全力於歐，而太平洋上暫時擱置，時則羅氏置之而不答，其言外之意，則美爲報珍珠港之仇，勢難聽日人之坐大，而不於德敗之先，加以懲創是也。就美言之，始終以日德兩國爲平等之敵，未嘗有所軒輊，更未嘗有先已後人之念，更未嘗有先歐後亞之見解如邱氏然。今美國此種政策之結果，已使日人於德國塌台之先，受到打擊矣。馬紹爾羣島也，塞班島也，關島也，使日人盡失其外圍之防綫，而本土之侵襲，亦處於無可避免之環境矣。

日人防線三，一曰內防線，指台灣琉球羣島日本本土，千島言之，二曰中央防線，指台灣南部，小笠原羣島，以至北部之千島言之，三曰外防線，指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及馬利亞納羣島言之。太平洋開戰前後，日人占據安南暹羅馬來半島與夫荷印屬地，則外線之外更加上一道新占領地之防線，此之謂一大東亞共榮圈。彼日謂可以高枕無憂者也。始也美人由瓜島而拉布爾而蘇門答臘，每一次登陸，所費時間及人力甚大，而所得之地，絕不令日人感覺痛苦，以其地距日本約在二三千海里之外，而時之美國多數航空母艦尚未出現，則日人心中以爲美既無航空基地，無法渡越二三千里之重洋以攻日人之南方根據地必矣。孰料今春以來美之大艦隊，已擁有主力艦二十艘航空母艦及航艦百艘，其他驅逐艦與潛艇不可數計，於是美人不必有待於逐島之進攻，而以高飛遠舉之力，席捲馬紹爾、加羅

林與馬利亞納羣島而有之，此則日本初料所不及者也。際此美海空兩軍風馳電掣之際，日本在南洋之陸海空基地之塞班，爲美所奪，由此以空襲日本本土，其距離不過一千數百海里，是三道防線毀於一旦，此日本所爲寤饋不安者也。日本廣播稱：此形勢爲嚴重以上之嚴重者，日本與新占領地之海上交通，受他人威脅一也，本國國土在人空襲範圍之內二也，對於南洋各地難派援兵，將爲人手唾而得三也。換言之，不獨太平洋戰爭之努力付諸流水，即大日本帝國之存亡，亦屬於不可知之數矣。

然美國所以獲此結果者，其在工廠中與戰場上之努力何如，此吾國人所不可知者也。據日艦上報導班記此次戰事中，美國之兵力如下：

主力艦四萬五千噸級四艘，三萬五千噸級十五六艘，巡洋艦及二萬五千噸重巡洋艦二十五艘，驅逐艦三百艘以上，太平洋上之潛水艇約數十艘。

此次進攻之中心勢力爲航空母艦十艘左右，一萬三千噸級重巡洋艦改裝之航艦十艘左右，汽船改裝之特別航艦數十艘，艦船用之航艦亦達數十艘。

敵人稱美國此項艦隊之特點，在加強防空炮火，並加強速力至三十海里以上，又提高主炮之發射速度，意在以炮彈數量之多，收毀滅之效果。

定式航艦及重巡洋改裝航艦共計十五艘，每艘搭載戰鬥機三十餘架，俯衝轟炸機四十餘架，魚雷機十餘架，共計九十架以上。

僅定式航艦之搭載機達八百架，改裝航艦載二十五架至三十架，故全部飛機達千架左右之多。

六月十五日始，美軍在塞班島登陸，美海軍陸戰隊第二師，第四師及陸軍步兵師三師，共為五師。

美國時代雜誌從軍記者之報告曰：初登陸時，某部隊之指揮官，一小時後中彈而亡，代之指揮之某上校中炮彈破片而倒，乃以第三人代之，旋亦受傷，計六小時內，共易指揮官五人，其在塞島北方登陸之美軍，其部隊共長官三人，亦於登陸後即倒在地上。惟美軍之赴湯蹈火如此，故七月二十五日美國海軍部長公佈，塞島上美軍死傷之數，共達一萬六千〇九十八人，而日軍屍首由美埋葬者二萬〇七百二十人，俘虜一千七百〇七人，平民被拘禁者一萬四千一百九十二人。

吾嘗聞之，馬來半島之戰，計日軍六師，坦克一旅團（一百五十架）英國禦之者為四師，菲島之戰，日軍約為六師，美菲聯合兵力不如日軍遠甚。此次美軍登陸為五師，不逮日軍在馬來亞在菲律賓之人數，然合美國大艦隊之艦隻數百艘，飛機千架之火力計之，謂塞班之役，為太平洋第一大戰可也。

七月十六日日軍在塞島全部覆沒後，其大本營之報告如下：

塞班島日軍，自七月七日晨，曾全力作最後攻擊，予敵以重創，一部日軍進至塔甫周山附近，勇戰力鬥，予敵甚大損害，至十六日止，全島壯烈戰死，該島陸軍部隊指揮官為陸軍中將齋藤義次，海軍部隊指揮官為海軍少將越竹武久，該方面海軍最高指揮官海軍中將南雲忠一亦在該島戰死。即日本之此地住民，均參加戰鬥，與陸海軍同其命運。

東條首相發表談話曰：「馬里亞納羣島，自六月十一日以來，由於皇軍之英勇奮戰，已予敵以重大打擊，然塞班島終落於敵手，使哀痛苦惱，不勝恐懼。」一日日人痛哭流涕之悲哀，

無過於日艦上報導員之言，其言曰：「二十四年間之塞班，竟為美機之泥足所蹂躪，對於吾一億國民，尙有較此更甚之憾事乎，吾人必將報復，必將犧牲身命，舉全力以擊滅敵人，今其時矣，回顧敵軍來襲塞班島前後之情況，令吾人不禁發生嚼碎鋼鐵之心憤。」「尚牙咬碎鋼鐵乎？抑鋼鐵毀滅齒牙乎？豈有以日人之聰敏，而不知所以辨別之者，夫亦曰此反常心理中，出此反常言詞，所以稍洩其憤憤之氣而已。」

日人外防線中一環之塞班島，已為敵有矣，此一環非其他外線各環之所能比擬，以其與日本本土最近也。此環之喪失，不啻日本之門戶外，為敵所監視。東條首相於十八日從後毅然廢止軍令部與軍政部混合之制，海軍軍令方面由島田繁次留任，海軍大臣由野村直邦任之，陸軍參謀總長任命梅津美治郎，陸軍大臣仍由東條任之。然野村之任為大臣，不及二十四小時，而朝野認為一二人之進退，無補危局，因而東條內閣總辭職問題又起矣。其新內閣由小磯國昭與米內光政共負組織之責，已告厥成功。吾人以為新內閣設於塞班島喪師之後，自必以此次失敗為鑒，而謀所以補救之，其所謂方法，不外（1）增強空軍，（2）增強海軍，（3）因以上二者增加軍需生產為第一要事，（4）其在陸軍方面繼續豫湘之戰，益圖吾軍力之削弱。此四者中，其第一事第三事視其工業能力，第二事視其造船能力，其能逞意以為之者，獨有第四事而已。此則新內閣之產生，所以不可視為日本和戰大計之變更，而當視為侵略之愈趨激烈也。

（三）德國變局

歐亞兩軸心國，一因塞班失陷而內閣動搖，一以東西兩線上難於支持，其正式軍人起而推翻希氏政府，謂為軸心國中魯

衛之政可焉。吾人欲知此次變亂之起因，不可不知德國向來國策及戰事近況。

德處中歐，介於東西強國之間，平日政策，稍一不慎，在外交上爲人包圍，在軍事上則陷於東西夾攻，上次大戰中，德與英法俄之對壘，一九四一年英俄所以急於聯盟，不外自東西兩方協以謀德而已。德之軍人與政治家深以此事爲懼，乃有力避兩面作戰之訓，俾士麥之與奧戰也，七星期而畢，力阻普軍攻入奧京，以免奧之深仇大恨，且爲留來日訂盟之地步，其尤懼者，爲拿破崙三世耽耽於普之西方，萬一與普兵連禍結，招來法國干涉，則俾氏所以排奧而統一北德者，殆失敗矣。惟以俾氏之謹慎，乃能免於東西隣國之干涉而告厥成功，此德人所共以沒齒不忘者一。一八七〇年之普法戰也，英俄兩國以拿氏三世好大喜功，其同情寄之於普而不寄之於法，其時之意大利正爭獨立，亦以拿氏之不撤駐羅馬法兵而恨之。於是拿氏三世陷於孤立，而俾氏乃得爲所欲爲。然普法之戰，至拿氏投降之日止，不及六星期，及和約訂立，不過十閱月，（一八七〇年七月十四日起，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和約簽訂日止）此又德人所沒齒不忘者二。俾氏敗法以後，處心積慮者，不令法國有其他盟友，因以長其復仇之志，一八七八之柏林會議也，一八七九之德奧同盟也，一八八二之三國同盟也，一八八七之德俄再保險條約也，皆所以聯絡歐洲之友邦，不令法國之外，另有一國與德爲敵，而後德之強國地位乃能維持，此德人所沒齒不忘者三。孰知一八九〇年威廉二世即位，對俄再保險條約不復繼續，以其執政者認爲對俄對奧之雙重友誼無法運用故也。一戰之後，俄法同盟條約旋即簽訂。威廉二世猶以棄俄爲未足，更擴張海軍，與英爭海上霸權，迄一九〇七英法俄乃結爲同盟以防

德國，第一次之世界大戰，即在此種形勢之中爆發，雖有名譽如興登堡如魯屯道夫輩，亦無術以挽救危亡，而德國乃處於一敗不可收拾之局，則多方樹敵，東西作戰之痛苦經驗，豈德人所能一刻去懷者乎。

巴黎和會後，德國十萬人國防軍之創立人羅塞克特將軍有言曰：「第一次世界大戰說明了德國在各方面中的地位，他衝進了俄羅斯平原，幼甫拉底斯河和蘇伊士，衝到波斯和阿富汗邊疆，這不是德國命運的一個象徵嗎？德軍的墳墓在非洲和亞洲，而法國三色國旗飄揚在斯特拉斯堡上，這是不顧一切能力的擴張，而最後由於基本力量不足，引起死亡。」塞氏鑒於一九一八年之失敗，乃有此力戒其軍人不可孟浪從事之言也。德國現時陸軍當局之大部，受塞氏薰陶，雖有心對外立功，然亦知輕於啓釁之不可。自希忒拉登台後，對於退出國聯與廢棄巴黎和約中之對德軍事條文，德國軍人未嘗不竊竊心喜，然於蘭因河之進兵，則反對之，於奧大利之合併尤反對之，誠恐一旦引起戰禍，德國因之牽入漩渦也。由於軍人此種心理，自倫勃軍政部長與總司令佛里次因之去職，而季爾斯氏與勃羅希茲氏代之而興，蓋以大權既操諸希氏之手，軍人雖欲反對而亦不可得矣。奧之合併方了，不數月而蘇台區問題又起，此時德國已暗中動員，幸賴英相張伯倫之調停，戰禍以克，既爲不血刃之成功，其爲軍人者，自無容喙之餘地矣。

一九三九年對波戰起，一九四〇年對荷比法大戰，德國國防軍之態度如何，與希氏一致乎？不一致乎？一九四一年希氏毀其與俄和好之約，又轉而侵俄，德國國防軍之態度又如何？與之一致乎？不一致乎？凡此問題，屬於軍事秘密非待之戰後私人文件發表之日，不易暴露。然吾人可以斷言者，塞克特氏既

以衝入俄國平原爲非，則德國軍人中之不願聲附和者，必大有人在，惟其服膺以身許國之大義，又處希氏聲勢熾赫之日，不便明言反對，徒默爾而息矣。

自對俄作戰迄今日，凡三歲矣，德於一九四一年中，表面上佔領蘇俄之廣大土地，嘗達於列甯城之郊外，又距莫斯科僅爲二三十里，然紅軍於是年冬即開始反攻，奪回羅斯托夫及卡哥夫二大城，而德人則高呼禦寒衣之不備，而無可如何。及夫夏季德人自知毀滅紅軍之無望，乃改而奪取高加索油田，且將繞道斯大林格勒之北，以攻取俄京，因此引起秋季斯大林格勒之保衛戰，德軍之力，達於二十師團以上，時間至於四月之久，然其數師之衆與其總司令一同被俘，而德軍之進攻，終告停頓。紅軍於保全斯城之後，更繼續進攻，迄於一九四三年之春，則戰略上主動之權已操於俄，而不操於德，紅軍實力之大，至是完全表現。是年三月八日德國發言人狄特瑪將軍有見於此，乃發爲「我們在伏爾加河上頓河上的戰綫破裂了，這有嚴重的後果」之言。其後又有言曰：「現在我們的問題，已不是取勝，而僅是遲延不可避免的結局的到來。」故去年一年以來，已爲俄人恢復失地之年，而德人則節節後退而已。迄於今年，俄軍已將境內敵人全部肅清，且越過波蘭而侵入東普魯士。其艱辛之奮鬥，容俟後詳述，以本段目的，僅在借俄戰經過，說明德國末路而已。

此時德國人民，尤其爲國防軍人，必自反問曰：（1）德國戰事前途如何乎？（2）一九四一年對俄作戰時，僅餘第一敵之英國，其陸軍已自歐陸撤退，自德言之，謂對俄之戰，爲一面作戰亦無不可，然三載以還，以德敵俄，猶且不勝，今後環攻之敵更不止一國，將如之何？（3）今南歐之意大利，已

一半爲英美所有，除其由意西攻法外，更將在海上海意東非斯拉克夫進攻，既難阻之於意西，何能阻之於意北，豈非德國軍士之南部將遭侵入與普魯士同。（4）更有西歐之第二戰場上，英美登陸已告成功，其預備之總人數達四五百萬，雖竭德之全力亦難與抗，況同時在東線上須與蘇俄作戰乎。（5）此三方面之作戰，德將以何種力量保國而驅敵乎？（6）況德軍火產量何自而來？（7）各自治區，因東西敵大勢力之發展，起而擾亂，德欲盡殺戮之而勢有所不能。凡此各大問題，總結言之，不外一語，曰德國和戰之計已不能無所決定。此當戰之人，方以國家爲孤注，罔惜民命，其爲軍人者，思之不思，不知前途稅駕之所，乃咬牙切齒，拔劍臨柱而前，不降不賊，國難不止，此謀刺希特拉之陰謀所由發動也。

據德國新聞社消息：「某日集會之際，忽有炸彈爆炸，炸彈係陸軍上校史托芬堡所置，地點距希氏官邸，不過二公尺，希氏幸免於難，僅受微傷。」其後希氏廣播曰：「吾等決不寬貸，懷抱野心之惡毒犯罪者與惡毒軍官，會進行肅滅余他及統帥部參謀人員之毒謀，……此等惡毒者所代表之人士爲數甚少，此等人與德國武裝部隊完全無關，甚至自陸軍亦無關，刻吾人必須將此次少數犯罪者完全剷除。故余於此宣布，勿使篡奪者之命令，任何軍事部門，任何團體之領袖及任何士兵，均不得服從此等篡奪者之命令。任何人均應有逮捕彼等篡奪者傳審命令者，或對其抵抗時，將其殲滅之職責。」吾人所欲問者，此次變亂究出之少數人歟？抑多數人歟？出之軍人中若干人乎抑有軍隊爲後盾乎？誠爲多數人而有軍隊之響應，則事變將擴大，有成立新政府之可能，反是者希氏且夕加以肅清後，

不足爲大害矣。

吾人根據俾士麥之方針與塞克特之忠告，認爲德國軍人向陶鎔於謀定而後動，與不戰則已，戰則必勝之教訓中，其於戰事前途之利害得失，早已辨之有素，又以其身歷波蘭法戰俄戰之故，對於東西南三方之戰況，瞭然在目。波蘭強半爲東普魯士之大地主，目擊紅軍將入東普，豈有不感家亡之痛者乎？以云預謀者爲多爲少，希氏自言勿接受魯奪者之命令，則除史托芬伯爵外，必另有發號施令之人與地可知，假令彼等本無結合之舉，何有命令傳達可言，且既曰命令，自必有統帥部在，而其負責者，必爲高級將領，甚或昔日曾爲參謀總長或全軍主帥之人。此希氏所以張皇失措而有勿受僞命之言也。夫以德軍人素知服從，乃竟挺而走險以出此者，亦以國家生命與希氏生命兩不相容故耳。此輩能否推翻希氏政府，當時尚未易言，彼等既犧牲希氏爲國家保存元氣之宗旨，則國中表同情之人不限於將領，即平日民間反對希氏者，亦將與之合作，而內部之分裂，內部之明爭暗鬥，將日益滋長，現夫國防軍與希姆萊之間，猜疑益甚，人人自危，則德作戰機構之敗壞與作戰力之日弱，殆意中事矣。善夫俄國真理報之言曰：「德軍在白俄羅斯的完全潰滅，德軍在法國北部的失利，以及他們從意大利的退却——所有這一切，就引起德國作戰機構更進一步的敗壞。德國老將領中間越來越信德國已注定要毀滅了，德國人民的處境，已毫無希望了。將領們的謀叛，便是要藉排除希武拉，來避免臨頭大難的一種企圖。」依上大大戰之前例言之，德國軍人於勝利絕望之日，必出於求和，以求國內之免於糜爛，此次叛變之發生，正同此意。嗚呼！德意志以俾士麥之小心謹慎而統一，因威廉二世與希武拉之魯莽滅裂而潰敗，其爲軍人者

，在俾氏時代立功疆場，在今日則棄其效忠國家之素志，不得不轉而追隨刺軻品政之後，爲國除害，豈非人生之幸不幸，視乎指導國家者之得人與否耶。

四、結語

開國內人士於德日政變後，常發爲戰爭何時結束之問，其中德國謀刺案，激動人心尤甚，頗有言三月之內，歐戰告終，日本或隨之而乞和，吾人明年夏秋間可返滬上。其出言謹慎者，則曰德事了後，半年之內，英國艦隊東來，則明年秋冬間長江可通航矣。夫上次歐戰不過四年，今吾作戰時期已倍之，如何不令人動思鄉之念乎？然而有一根本問題，爲吾問者所未提及，則吾國與吾國人之責任是也。昔爲赫赫一世之德國所向無敵，今退出俄境，僻處本國領土之內，絕無反又之能力，其所以致此者，亦曰俄國三年血戰之辛苦，死傷人數達數百萬，工廠所造之大炮以萬計，飛機數萬架，飛機亦以萬架數萬架計。其在西歐，則有英美飛機數千架之轟炸，毀壞德國之工業與交通，更有積二三年之糧食之糧食部隊，飛機軍輪也，海軍保護也，降落傘也，無一不出於精密之計劃與籌備，其登陸因而成功，然犧牲人數亦不下數萬人。嗚呼！軸心之南強，德國既因英俄之東西夾攻而引起政變矣。以云日本爲中美兩國共同之敵，而吾國自甲午以來所受之恥辱，甚於美國，則吾國之復仇雪恥之心，豈能居美人後乎。太平洋戰起，吾人之作戰，非復昔日之苦行，然美國所資助以飛機軍械，且爲之打開封鎖錢，而陸軍作戰，由湘而鄂，由鄂而東下，或由鄂而北上，爲吾人之所有事者，或較今日俄之在東歐，英美之在西歐爲尤難，良以吾方戰事猶在中途，長江南北之敵尚未肅清，大河之北爲敵盤踞，至自由黑水大豆腐梁之鄉，更無窮矣。國人對於此項

反攻之準備，兵力如何，軍械如何，絕少有人發爲問題以質諸當局，或與在野人士互相商榷者，乃至目前之通貨何如，物價如何，經濟如何與政治上之措施如何，凡此諸端，無一事不與戰事勝敗相爲表裏，乃國人之發問獨不在此，而獨在何時結束，何時歸去，豈不將以犧牲身命艱苦奮鬥之事，委之外人中之

盟友乎。語云：欲知明日果，先問今日因，俄英美三國由其人力之訓練，物力之積貯，自知本月下月今年明年所收之結果何如，倘但望盟邦打勝仗或敵人內部變亂，而自己仰屋興嗟，無所事事，豈自力更生者所宜出哉。

萬竹樓隨筆（九）

舜生

蔡松坡先生（鐸）（1882—1916）湖南邵陽人，年十四爲名諸生，十七入長沙時務學堂肄業，十八至二十三留日習陸軍，二十四至二十九在桂從事軍事教育。年三十入滇任三十七協協統，是年革命爆發於武昌，雲南旋即反正，被推爲都督。民二奉調入京，袁氏百計牢籠，初任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政治會議會員，翌年任參政院參政，加昭威將軍，兼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處員，充模範軍教官，最後任全國經界局督辦。民四帝制議漸興，八月籌安會成立，於是憤不可遏，決計倒袁，時赴津與梁任公湯覺頓等有所密議，至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乃微服東渡，返滬經香港轉滇，而雲南即於是月二十五日宣告獨立。翌年一月，率滇軍入川，轉戰川南敘瀘一帶歷四閱月，六月五日袁死，黎元洪依法繼任，被任爲四川督軍兼署民政長，以喉疾日劇，乃於是年十月東渡就醫，十一月八日卒於日本福岡大學醫院，時年僅三十五也。頃友人張君自湖南以公遺集一部見惠，編輯者劉達武，參閱者石陶鈞李劍農岳森，全書凡十二冊，於公生平著述，具見蒐集之勤。集首有編者所輯公年譜一卷，可以概見公之生平。集中凡公所手著之文告，演辭，函札，序跋，詩歌，聯語，雖吉光片羽，無不可窺見公人格之偉大，享年不永，而成就獨多，非偶然也。

教育之生命

余英時

教育之生命安在？曰：培育學生向上之真實意志是矣；簡言之，即培育學生之爲善誠意。就社會之觀點言，教育之機能，在維持社會已有之文化而發展之；就學生之觀點言，教育之機能，在培育學生使其汲取社會之已有文化而更促進之。文化之特徵，維何？處於臻於狀態而安心焉，不能謂爲有文化。處於燦爛境地而停滯焉，亦不得謂爲有文化。文化之所由構成，實由於不斷的向上進取。故文明人之不實，在自強不息，在日新其德。

人類非神，人類由低等動物演進而來，故人身含有獸性。以此獸性之故，人類具有種種缺憾。故無人能自命完人。凡自謂無過者，皆自欺欺人之語。德行純美之人，就其自身觀之，每若歉然有不足者，非故爲卑遜，實以其自心真覺有種種罪過在。以孔子天縱之聖，尚必七十歲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在七十歲以前，不能無所違於矩範，可想見矣。是故責人不可求備，而對於有過者，必須予以自新之路。又因此故，凡以德行功績自高者，由識者觀之，祇覺其淺薄也。語云：君子闢然而日彰。君子之闢然，非所以求乎日彰，實由自知甚明，不敢自欺，故不敢有所誇耀。在昔專制皇帝，常以睿智自命，而臣工習於諛媚，亦常以聖明相稱頌，其欺人昧己之醜態，不惟可笑，亦復可恨。

人身含有獸性，果爲人生之不幸乎？是又不然，人類純善之神性，正藉以獸性之具有而得其表現。何以故？正以具有獸性之故，而人生向上之活動乃能獲得其表現故。完全者，盡善盡美之謂也。盡善盡美非人間之所能果有；退而思其次，則向

上乃爲人間最高之美德。完全雖不得而果有，但向上乃所以奔赴乎完全而日益接近乎完全者。完全果有達到之一日乎？曰：永遠無之。既無達到之一日，而人又奔赴之，是果何爲者？曰：是正人類之莊嚴崇高處。人類之所以爲人類者，即在於不安於其卑陋污穢，而求所以超脫之。有此不甘下流之心，而後向上的活動起，此向上活動，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人生的完美狀態，即在保持此向上活動，而提高其速度，豐富其內容。若向上活動止息，則爲「心死」；心死而猶生存，則失其所以爲人者，可錫以禽獸之名，禽獸固不具向上性者，是使人生的至德在日新又新，而人生的圭臬在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而「鞠躬盡瘁，死後而已」，所以能起人崇拜於千秋萬世後，「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所以宜爲萬代人倫之楷模也。

吾人既明向上爲文明人之本質，而教育之事又所以教人爲人者，則教育之生命在鼓勵人生向上，斯爲必然之結論。教育企圖乎鼓勵人生向上，又必何如而後能達成其職志乎？夫向上者，意志活動之表現也。欲向上者須有意志活動而後可。壓抑其意志，使不得動作，而謂將使人向上，是何異穿牛鼻之舉，實之以繩，持其繩而曳牛上山，曰：吾因導牛向上也。機械的活動與強迫的活動，皆不得目爲本人之活動，因其不自本人內心發展而來，實爲不具意志之活動。活動而不具意志，便不成爲自己之活動。自己且無活動，更何論乎向上！向上以自主的活動爲其基幹，自主的活動以意志的發展爲其關鍵。故教育之事當發展學生的意志。意志之爲意志，肇諸其獨立自主性，故教

育當發展學生之自主活動。彼以壓抑爲教育者，實爲「反教育」，將以激成反動，促使學生奔向教師所求之反面者也。如彼水流，治水萬不可直當其冲，當其冲則其冲也愈激。教育決不可阻遏學生之意志，阻遏其直前的衝進，則必旁潰橫流。所以壓迫式的教育，常爲革命種子之製造所。家庭教育而主壓迫，則家庭乖離；國家教育而尚壓迫，則國家崩潰。

吾國教育當發展學生之自主活動，吾知必有人反詰：學生所以需要教育，正因學生是未成熟者，正有待乎保育監護；若聽其自便，則歷史之未成熟人而自爲獨立的意志發展，是可畏懼。稚子以刀而聽其自斷其指，毋乃太過殘酷乎？曰：欲稚子不操刀自斷其指，徒禁其操刀，喝其勿割，決不能爲功；必授之以刀，使其自爲割砍，適天之幸割砍而傷其皮膚，感覺疼痛，然後彼乃恍然於刀之不可輕持，割之不可不慎。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吾今亦云：將欲控之必明縱之。

人類的意志，若外在的力量，能有效的控制，則用一人的意志以控制萬人的意志，在數千年來，不斷有人企圖而終於覆轍重轍者，何也？使明哲的教訓果能確實支配人類的意志者，則數千年來，聖賢的教化企圖亦可謂宏偉而深入矣，何以社會的昏濁綿延不絕乎？須知控制意志者，非外在的力量，亦非他人的教訓，實爲自身的人格。外在力量與他人教訓，必須與自身的人格相揉合，始能發揮其影響以及於自身的意志。故教育之重心在發展學生之人格。使其人格之所含涵者，足爲消受所注之資本，足爲接受所加外力之媒介。教訓若無消受之資本，則語言符號而已，且不能了解，更何論實行。外力若無接受之媒介，則始終截然爲二物，外力移去，則故態依然。是故若無學生意志之協作，教育即爲不可能。

人格之發展，須發表於實際活動中，實際活動，自然難免錯誤。特是一切進步，都有其代價。真德性皆從罪惡中脫化而來。置身於理想國，既無罪過，即無德行。棲息於安全地，既無失敗，何來成功。過度的保育，適所以萎弱少年的發展力。過度的消毒，適所以剷除青年的抵抗力。青年必須經歷幾許罪惡，親嘗罪惡的痛苦，然後真知善之意義與價值。譬如人不生病，何由了解「健康是福」；人不經涉風波，何由了解「平安是福」。孟子：浪子回頭金不換。一切有成就的人，都是回頭之浪子，特其爲浪子之程度，有大小不同而已。故於青年罪過，不必重視，更不必悲觀。

或云「一失足成千古恨」，爲人當戒慎恐懼；教人當防護周全，何可聽任學生真行盲案，以蹈不測之危機。夫不測之危機，誠難防護周全，然而青年既不容軍閥大計，又不作社會領導，其所能蹈之不測危機，蓋亦僅矣：充其量，不過酒食縱逐，與人衝突而已。酒食縱逐，在其本身上，若無其他目的之附益，如商人利用作爲勾結媒介等類之事，則其引起興趣之能力決不能持久，必將迅即廢然思返。至於青年互相衝突，則因青年時代利害矛盾小，凡其衝突，皆無禍身殃人之可能。故青年時代，實爲最好的犯罪時代，以青年所犯之罪過，一般言之，皆爲無大影響之罪過故也。受青年之罵者，每一笑置之。何爲其然也。以不足重視故也。自國事思想犯之名立，而青年犯罪乃成大問題。青年受監督，而至於不能在思想上犯罪，斯真亂臣賊子將徧起國中之朕兆也。夫思想犯罪乃犯罪之免疫苗，欲社會安全，必須保障人民之思想犯罪權。思想犯罪，乃人生爲善之最低代價，亦人生向上之最捷途徑。真正的修養，皆從罪惡得來。

論語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青年時代，無大德之閑可踰，而小德之出入，不但應受許可，亦且具有必要。夫爭鬥，惡事也，戰爭，慘事也；而人有好鬥之獸性，西人設爲賽球賭馬種種鬥爭（議會辯論，報紙攻詰皆是）以消弭內亂。今世言國際和平者，且有欲用奧林匹亞賽會消弭海陸空大戰者。中國歷來六十年甲子一周而一大亂者，實因社會文化單調禮讓而比射之爭又告斷絕故也。

世間罪惡，有可嘗試者，有不可嘗試者。吾人不鼓勵人犯罪，吾人只是認爲願青年認識犯罪之真實意義，必須聽其從切身的經驗上體驗犯罪之果爲何物。禁遏意志之活動，而置青年於完全消毒之地帶，決不能使其具有真知。總之欲發揚教育的生命，必須發育青年之向上活力。發育青年的向上活力，則青年獲得剛毅的實踐意志，必剛毅始足以有爲。同時又從實際的經驗上，取得了解善惡是非之資本，足爲文理密察之推敲。於是而知識教育方能生根。於是而知識之授受方不至成爲道聽塗說之資，而人格教育始有其着手處。

人格教育，時代已知重視。唯人格教育，應如何實施，則仍爲問題。人格教育之實施，捨發揚意志外，更無從入手。不言人格教育則已，欲言人格教育，則必須使青年有軒昂奮發之氣，舉千鈞重擔負諸雙肩之上。人生最忌無志趣。一切成功之人，皆是有志之士。所以不可沉埋於凡陋卑下處，國民亦不可

沮沒在苟簡偷惰處。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真是無着力處。所以教育須助人立志。志之立，不能立於空想之上，必使其表現在實際行動上。青年認識不周密，其所表現之旨趣，自難免於妄誕乖張，教育家一面當出於容忍精神，恍然於妄誕乖張之爲必然，一方又聽其遭受「自然的懲創」，使知爲其事即須受其果報之鐵則，則意志受啓發於實際的錘鍊，亦必能「勇而知方」，而不至於成爲蠻橫剛愎之徒。

教育即活動，（兼合身心的活動），無活動，即無教育。然而活動不必即是教育，唯有向上的活動方是教育，向上之上何所在？是必明瞭善惡價值問題而後能明，簡言之，所謂善者，乃有益於人生者，惡反是，罪惡經驗固不能免，而力行乎善則尤不可忽，善之內容條理節目，曲折繁複，非青年所能洞悉，亦非任何人所能盡知，欲揭一簡明目標以爲南針，則於每一行爲求其有益於人可也，但何者有益，何者有害，其事亦未易辨，再退一步，則事事對人懷抱「善意」可也，「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但須對人懷抱善意，雖結果未必果善，而其遺害於人，亦當不至太大，此孔孟之仁學所以爲大中至正之道，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道，所以爲致太平之捷徑，言教育者，必當使其思索發端於如何致斯世於太平也！

民主政治的哲學問題 (下)

陳啓天

我們欲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具有與之相應的一種人生哲學。與民主政治相應的人生哲學，應有一個基本觀念，便是承認人是人，承認一切人都是人，便是把人當人。這種基本觀念，顯然與專制政治相應的人生哲學正相反對。凡與專制政治相應的人生哲學，大抵多不承認人是人，不承認一切人都是人，不把人當人。我們可扼要的說，民主政治的人生哲學，必合於人本主義，而專制政治的人生哲學，必反於人本主義。

何以見得專制政治的人生哲學必反於人本主義呢？我們只須稍稍考察專制政治所要求的理想人，便可明白。一切專制政治所要求的理想人，第一是超人，第二是爪牙，第三是奴隸。超人站在一般人之上，作威作福，為所欲為，可以說是「人上人」，却不是人中人，或通常所謂人。爪牙用非人的手段，幫助超人實行殘酷的統治，可以說是「人上人」，也不是人中人，或通常所謂人。奴隸伏在超人與爪牙之下，任其壓迫，終身過着悲慘的生活，而無處伸冤，可以說是「人下人」，更不是人中人，或通常所謂人。至於在專制政治之下，不願為人上人，又不願為人下人的人，則勢必被迫而為叛徒，冤鬼，或行尸和隱士等。叛徒與冤鬼，因積極反對「人上人」，而被迫為「人外人」，不能做人中人，也可以說不是通常所謂人。行尸與隱士，因消極反對「人上人」，而被迫為「人外人」，不能好好的做人中人，也可以說不是通常所謂人。人上人本不合於人本主義，人外人也不合於人本主義，人下人更不合於人本主義。凡不合於人本主義的人，無論為人上人，或人下人，或人外人，都只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都可稱為「畸人」(Abnormal being)，却不可稱為「常人」(Normal being)，所有的畸人，又可就其境地的不同，粗分為四類：超人與爪牙為一類，奴隸為一類，叛徒與冤鬼為一類，行尸與隱士為一類。後三類畸人的情懷利害與意見等，與前一類畸人極端衝突，而無法可以調和。因此專制政治的社會，常為怨恨、偽詐、鬥爭、殘忍與恐怖的陰森空氣所瀰漫，而十分缺乏人味，簡直不成為人世界了。既不成為人世界，那裏有什麼人本主義？所以說專制政治的人生哲學，必反於人本主義。

又何以見得民主政治的人生哲學必合於人本主義呢？我們也只須稍稍考察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理想人便可明白。民主政治，不希望有人以上的超人及其爪牙，也不希望有人以下的奴隸，更不希望有人以外的叛徒冤鬼或行尸與隱士，而只希望全體人民都是人，都是常人，都是「人中人」。全體人民的才質經驗造詣與志願等，雖千差萬別，不能全同，但民主政治的人生哲學，必承認他們都是人，而在人格上與機會上均予以同等看待，使每個人都感覺有人的意義及希望。每個人都能感覺有人的意義及希望，則其人必是常人，而非畸人。所謂常人，乃指身心狀態健全的人，或具有常態心理的人。心理一經變態，便不是常人，便不是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理想人。這種常人，常常在社會中生活着而能與人和平相處，所以又可稱為「人中人」。每個人要能生活於人之中，不可生活於人之上，或之下，或之外，這便是民主政治的共同生活方式。這種共同生活方

式所依據的人生哲學則是人本主義。

關於人本主義的人生哲學，我們在兩千餘年以前，即已由孔孟等儒家建立起來。孔孟等儒家所建立的人生哲學，可以「仁者人也」的一句話概括其要義。人要仁，便是要承認人是人，便是要把人當人。我們可以說，孔孟等的儒家哲學是「仁學」，也是「人學」。仁是做人的道理，人是行仁的主體。做人首須自己肯定自己是一個「人」，因而產生一種自尊精神。行仁首須肯定他人也是一個人，因而產生一種爲人精神。既自尊爲人，又尊人爲人，所以孔孟等的儒家哲學，實是一種人本主義。我國既早有了孔孟等儒家的人本主義哲學，似乎民主政治也應老早在中國出現了。然而民主政治到近代始漸由歐美輸入中國，其原因實在什麼地方呢？自然原因很多，本篇不能詳細探討。但有一個原因，我們必須在此指出：即儒家哲學的大質，雖與人本主義，而較其先秦哲學近於民主政治，然儒家自始至終，並未立出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具體方案，即近代民主政治所必不可缺少的法治要素，儒家也不重視之。原來儒家產生於封建政治到君主政治的過渡時代，而流行於長期的君主政治時代，他對於君主政治雖有許多嚴正的提示，但並不否定君主政治，只希望聖王出幾個「聖王」，「能行仁政以愛民而已」。聖王政治固較暴君政治爲優，無奈聖王不世出，而多爲暴君何！暴君政治固不能說是民主政治，聖王政治也不能說是民主政治。所以儒家的人本主義哲學，雖可以糾正君主政治，却不能產生民主政治。

現在中國政治已由君主時代進入民主時代。君主政治早已隨辛亥革命而過去，民主政治則正待從速建設。我們欲使民主政治早在中國完成，除講求制度問題外，尚須注意風度問題。

要注意民主政治的風度問題，則須建立人本主義的人生哲學，以爲培養民主風度的根據。要建立一種人本主義的人生哲學，除借鏡於西洋學說外，自須酌量取資於孔孟等的儒家哲學。借鏡於西洋學說，不可流於盲從。取資於孔孟哲學，也不可流於復古。只可多方取精用宏，以求有裨於今後推進民主政治而已。

關於孔孟哲學有裨於推進民主政治的處所，本篇不擬具論。以下只就民主政治所宜具有的一種人生哲學，加以簡要的說明。

前面曾經說過，與民主政治相應的人生哲學，必須合於人本主義，必須是人本主義的。茲將以下所說民主政治所宜具有的一種人生哲學，自亦不能外乎這個根本原則。依我看來，與民主政治相應的人本主義哲學，至少應含有三大要義：第一大要義，爲「己相涵」。所謂社會，已謂個人。社會與個人好像對立而相反，其實不然。任何個人都只能生活在社會之中，決不能生活在社會之外。任何個人都必须有所取資於社會，決不能完全離開社會的因緣。由此可見個人實涵於社會之中。又任何社會都須由個人組成，此組成某社會的各個人之個性，也能相當決定該社會的形態。有某種個性的各個人，才能組成某種形態的社會。所以亦可說，社會涵於個人之中。社會涵個人，同時個人亦涵社會，此之謂「己相涵」。人生的實際應該如此，也實在如此。不論有個人，重社會而輕個人，於是構成一種集團主義。又有個人重個人而輕社會，於是構成一種個人主義。這兩種主義，如果各別推到極端，自成一種相反的對立了。但是我們要知道，集團主義的重要功用，在矯正反於群性的個人主義。如是對於群性的個人主義，則含有集團主義在其中。又個人

知道，個人主義的重要功用，在矯正不容個性的集團主義。如是有個性的集團主義，亦含有個人主義在其中。更要知道，民主政治下的個人主義，其作用重在反對專制主義，而不必與集團主義完全對立。例如英美等國實行民主政治，講求個人主義，同時又深信國家至上。國家至上，是一種集團主義的觀念，並非個人主義的觀念。在國家至上觀念之下的英美個人主義，固有益於民主，亦無害於國家。由上說來，可知集團主義與個人主義，在表面上似乎對立，而在實際上，則彼此相需，不能完全偏廢。何以故？因人生的實際原是羣己相涵。故這種羣己相涵的道理，是適於實施民主政治的一種人生哲學要義。同時也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易於使人領略羣己相涵的道理。

第二大要義，爲人我一體。前節所說羣己相涵的道理，是說明社會與個人的相互關係。此節所說人我一體的道理，則是說明個人與個人的相互關係。我國先哲有萬物一體說，及民胞物與說。這類說法，非常博大，可說是一種最理想的人生哲學。不過因爲這類說法太博大了，只有少數哲人才能領悟並實踐之。民主政治是一種多數政治，其所需要的人生哲學，須便於多數人民以至全體人民的領悟與實踐。較便於多數人民以至全體人民領悟並實踐的人生哲學，當首推人我一體說。人我一體說，謂同屬於一羣的各個人，都應相視爲一體。我視人爲一體，人亦視我爲一體。如此，則個人與個人間，或我與人間，不但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友愛的關係上，而且實現一種一視同仁的人生社會。換句話說，即實現一種仁的社會。這種仁的社會，我國先儒曾努力求其實現。儒家在理論上主張同樣行仁於一物社會，無分於家，國以及天下；（按天下二字，等於現在所謂世界）。而在實踐上，則以家庭社會爲行仁的起點。所以

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見論語）不過近代社會已不以家庭爲中心，而以國家爲中心。行仁的重點，應是國家，而不是家庭或世界。如果把國家與家庭及世界三種社會同樣看待，則不合於近代社會的實際。如果像舊禮教把行仁的重心，放在家庭之內，則未免太狹。如果像新人物把行仁的重心，放在世界之上，則未免太幻。要行仁不太狹，也不太幻，只有實踐以國家爲中心的人我一體說，而對內不完全抹煞家庭的行仁問題，對外也不完全抹煞國際的行仁問題。這樣的一種說法，是要人生哲學的理想，與近代社會的實際比較接近，而易於實踐，不致落於空想。

第三大要義，爲修智雙修。此要義，是就民主政治下每個人本身必須具有的公民品性說。在民主政治下，要有修智雙修的公民，至少也要有德智雙修的政治活動者。何謂德智雙修？謂公民以及政治活動者，既要有道德的修養，又要有智慧的修養。所謂道德的修養，不僅指普通的道德修養，而且指政治的道德修養。普通的道德修養，是要每個人完成一個人所必不可少的基本道德。關於基本道德的條目，古今中外的說法雖多端，但大要不外公平與誠實兩大德目。如果一個人不公平，不誠實，便是缺乏做人的起碼條件，也即是缺乏公民的基本道德。缺乏基本道德的人，決不能運用民主政治。所以民主政治必須要求人民具有普通道德的修養。如果一個人能將此兩種基本道德應用於社會的各方面，即可說是具有圓滿的道德。不過一般人多誤信政治不必講道德，而有一「爲目的不擇手段」的說法。因此民主政治不得不重視政治道德，而要求每個公民，尤其是每個從事政治活動者，注意政治道德的修養。只有專制政治才不大講政治道德的修養，而民主政治則必須大講政治道德的修

養。政治道德的修養如何講法呢？不外將普通道德應用於政治事項及政治活動而已。所謂智慧的修養，也不僅指普通的知識修養，而且指政治的智慧修養。在專制政治下的人民，只要服從，不怕愚昧。所以專制政治多實行愚民政策，不願人民有較多的普通知識，更不願人民有較好的政治智慧。但民主政治是由人民自己運用政府的一種政治，人民不但要服從，而且要能領導並協作。領導與協作，自須較多的普通知識，更須較好的政治智慧。關於民主政治下的公民，需要較多的普通知識，已為一般人所熟知，用不着說明。至於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又要較多的政治智慧，似尚未為一般人所注意。所謂政治智慧，乃是人們對於複雜的政治問題，能參照各方情勢，而有一種扼要的，合理的，應時的，領悟能力，判斷能力與處理能力。這種政治智慧的產生，三分靠天才，七分靠經驗，磨練，與修養。天才的高低，雖大體為遺傳所決定，非後天所能為力。但經驗，磨練與修養，則饒有人力擴充的餘地。人們多以為智慧全賴天才，未免不合事實。所以我不稱以上所說對於政治問題的領悟，判斷，處理能力，為政治的天才，而稱為政治的智慧。如果稱為政治的天才，恐人誤會無法修養。稱為政治的智慧，可藉修養加以增進也。為甚麼要藉修養以增進政治的智慧呢？因為政治的問題最易使人智慧昏迷。古話說：「利令智昏」。政治問題多含有大利，大利便足令人智昏。又一古話說：「奪夫死權」。政治問題正是大權問題，大權且可使人誇而且死，自亦足令人智昏。又一古話說：「烈士殉名」，政治問題又有大名問題，大名亦足使人智昏。又一古話說：「女為悅己者容」，在政治上以女容求悅於有權者，已可使人「不愛江山愛美人」，何況求悅之法不只女容？欲免於「情令智昏」，實在不

易。加以人類本身常有一種大弱點，即一經有了權勢，便好「逞私」，「逞智」，「逞雄」，並「逞強」。這正是古話所謂「今日之事我為政」，亦即是古話所謂「沐猴而冠」。由上說來，可知在政治上欲常保智慧的清明，已極困難。我所說政治智慧的修養，即是使人先保持智慧的清明，然後始能扼要的合理的應時的領悟判斷並處理各種政治問題。如何而後乃可常保政治智慧的清明？從消極方面說，莫私令智昏，莫利令智昏，莫權令智昏，莫情令智昏。從積極方面說，要知政治是大家的公事，不是個人的私事。利之所在，須公之人民。權之所在，須公之人民。名之所在，須公之人民。情之所在，須公之人民。如此，則政治的智慧未有不清明的。政治的智慧既經清明，則政治問題未有不適當解決的。民主政治正需要這種清明的政治智慧。我們欲實行民主政治，自須政治活動者，以至一般公民，都加意修養，以求常能保持政治智慧的清明。如果智慧仍舊不清明，則政治那能有清明的希望呢？先哲說：「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民主政治最緊要的事體，是政治智慧的清明在躬，大家不要再忽略呵。

以上已將與民主政治相應的人生哲學之三大要義，即（一）羣己相涵，（二）人我一體，（三）德智雙修，說了一個大概。繼此再略說依據這種人生哲學所養成的人格與風度如何。依據這種人生哲學所養成的人格，是一種適於民主政治的人格，即民主的人格。民主的人格，須具有以下的五種要件，第一個要件為獨立精神。何謂獨立精神？請每個人須有一種獨立的自覺。如果一個成年人不能自覺其為一個獨立的人，則是等於一個未成年的人，小之不能過獨立的生活，大之不能過公民的生活。不能過公民生活的人，自難望其運用民主政治。所以獨立

的自覺，即獨立精神，為民主人格的第一個要件。第二個要件，為協作精神。在專制政治下，人與人的政治關係，多是命令與服從的關係。而在民主政治下，人與人的政治關係，則不僅有命令與服從的關係，尚有平等合作的關係。命令與服從的關係，只須有服從精神，便可圓滿保持。平等合作的關係，則非有協作精神不能保持。所謂協作精神，即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及意見，而共同服從多數決議的一種精神。此種精神，不容有專斷，亦不容有孤僻，更不容有姦詐。專斷，孤僻，與姦詐，皆不適於運用民主政治。惟有協作精神，始可以矯正之。所以協作精神，為民主人格必不可少的一個要件。第三個要件，為奮鬥精神。民主政治必須人民自己認定政治是人民自己的事件，與人民自己有切身的關係。人民對於政治必須用一種積極的健全的進取精神，以求實際政治的隨時改進。這種積極健全的進取精神，便是所謂奮鬥精神。奮鬥精神如不足，則必流於逃避，而成為從前專制政治下的一種委心任運思想，不能算是積極的。又如太過，則必流於橫暴，而成為現在惡意政治下的法西斯思想，也不能算是健全的。奮鬥精神宜如何而後可免於不足與太過呢？那便須人們一面能努力求其政治主張的貫徹，又一面能參照他人，酌量讓步，決不做過火，致他人完全失却政治上的地位。民主政治怕人缺乏奮鬥精神，又怕人奮鬥精神過火；怕人對於政治沒有主張，又怕人只知固執自己的主張，而完全抹煞他人的主張；怕人不從事政治競賽，又怕人只求競爭勝利，而不顧憲政軌道。現在有些人所謂「政治鬥爭」及「鬥爭精神」，多半過火，致完全抹煞他人的主張，並不顧憲政的軌道。這只是導入反民主政治，與我們所說合於民主政治的奮鬥精神大有分別，應請讀者加以注意。第四個要件，為正直

精神。此種民主政治下的人民，須有一種秉公斷事，秉公辦事的精神。政治之事，最易便是混淆，賢者倒置。能秉公辦事，始可使是非分明。能秉公待人，始可使賢愚得所。先哲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也。」這便是正直精神的一種表現。先哲又說：「世之亂也，上下繼於亡之不義，姦偽相若，變詐相角，言國其安，而子人以至危。」這便是由於沒有正直精神。民主政治與秉公斷事的，不是秉公斷事的。所以合於民主政治的人格，必須具有正直精神。第五個要件，為實踐精神。所謂實踐精神，是將自己的主張，必求其指導實行的一種精神。先哲說：「言必信，行必果，雖死無所恨。」此民主精神，因有宣傳競爭的性質，難免於多言。最要緊的事，是要將自己的言論，實踐到六七分以上，始能收其功效，並能切實相信。如果實踐與言論相差太遠甚至相反，如時下所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盡」，一便不配談政治，更不配談民主政治。又如時下所謂「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力」，也不配談政治，更不配談民主政治。只有實踐，始能實踐自己的主張，也只有實踐才能修正自己的主張，更只有實踐才能體認他人的主張也。當此當此。空頭支票決不能取信於商業。政治上的空頭支票，即不能實踐主張，難道可以取信於人民嗎？林肯說：「有些時候，一切人民都可欺，也有些人民，在一切時候都可欺，但是決不能任一切時候，欺一切人民。」在政治上不實踐自己的主張，便是想「在一切時候，欺一切人民」，如何可能呢？徒自失信於人民而已，徒自毀其政治前途而已。所以合於民主政治的人格，必須具有實踐精神。又所謂實踐精神，切不可理解為「幹幹的」意思。因為實踐精神，不但要實踐自己的主張，而且要體認人民的公意。至於體認人民

的公意於不顧，蠻則有之，幹則未可必也，實踐更未可必也。總之，民主的人格，要以上所說五項要件，即（一）獨立精神，（二）協作精神，（三）奮鬥精神，（四）正直精神，與（五）實踐精神，同時備於一身，乃可使民主政治順利進行。這樣的人格，是一種合羣的人格，而不是一種孤高的人格。在從前專制政治時代，需要孤高的人格，故先哲多提倡之。在今後民主政治時代，則只需要合羣的人格，只需要合於民主政治的人格，而不必再具有孤高的人格。

由民主的人格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態度，便叫做民主的風度。關於民主的風度我曾另文專論。現在只就合於人本主義哲學的民主風度，略略說明其要件。民主風度所必須具備的要件，依我看來，以下列四項為最重要：第一為堂堂正正的做人，第二為公道道的接物，第三為切切實實的做事，第四為規規矩矩的守法。如果一個人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人，那便連人也根本成問題。這談什麼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要大家都成個人，自須自己先成個人。要自己以及大家都成個人，首須堂堂正正的做人，而儘量以公開的態度出之。又如果一個人不能公道道的接物，則人我之間，必多齟齬，甚至背目相視，拔刀相向，如何能協作呢？政治既是關於大家的公事，我應有一份，他人亦應有一份。只求私便，不顧公道，則必引起反感，難於共同生活了。又如果一個人不能切切實實的做事，則無論大小事都做不好，何況是關於政治的公事？一般人多以爲關於政治的公事，只要能敷衍得過去，便算能手。不知公事並非敷衍所能了，更非敷衍所能好，必須切切實實的去做才行。又如果一個人不能規規矩矩的守法，那便根本不能建立任何政治制度，尤其不能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因爲一切政治都少不了法治，而

民主政治更少不了法治。專制政治只需要強制的法治，而民主政治則需要自動的法治。自動的法治，便非由人民以至政府都有規規矩矩的守法風度不可。商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此上字，指政府而言。在專制政治下，政府只責人民守法，而政府却自行犯法，故法治多建立不起來。在民主政治下，人民既自動的守法，又責政府守法，故法治常能建立起來。以上所說，是民主風度的四大基本要領。人民能具備此種風度，則是民主的人民，必會運用民主政治。政府能具備此種風度，則是民主的政府，也必會運用民主政治。既有民主風度的人民，又有民主風度的政府，則民主政治的人治條件完全具備，不應不能建立民主政治的法治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民主風度也不很容易養成。其所以不容易養成的重要原因，約有三大種：第一大原因，在人類的天性。原來人類的天性，本有民主的傾向，也本有非民主的傾向。例如仁慈，合羣等天性，是最近於民主的一種傾向。又如好勝，好權等天性，則是近於非民主的傾向。要養成民主風度，須一面擴充近於民主的天性，又一面變化近於非民主的天性，使其均適於民主政治。諸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們要變化原來不近於民主的天性，使其亦適於民主政治，自感不易。好在民主風度所需要變化的天性，如好勝，好權等，只是改換其方向，限定其範圍，確立其軌道，仍使好勝心與好權心等可以獲得一種適當的發展。經過長期的培養以後，自可化天性為習性，並非絕對不可能。近一百年來，世界已先有許多國家能圓滿實行民主政治，便是人性可化爲習性的明證。我們不必以有一部分天性不近於民主，便對於民主政治根本懷疑，何況天性也原有一部分近於民主呢！

第一大原因，在歷史的傳統。此所謂歷史的傳統，專指關於政治制度與風度的歷史傳統而言。一個國家的此種傳統，近於民主政治，則易於養成民主風度，否則須經過種種波折以後始能漸次養成。例如英美等國的政治歷史傳統，都是趨向民主政治。所以英美人民的民主風度發達最早，也最完全。又如法國在大革命以前的政治歷史傳統，多反於民主政治。所以到大革命時期，經過幾番波折與長期奮鬥，始能漸次養成民主風度。我國的政治歷史傳統，近於法國，並較法國的政治傳統勢力更為強大，這是無疑義的。在我國長期的專制政治傳統上，最有勢力的政治風度，不外帝王風度，官僚風度，隱士風度與順民風度等。帝王風度，顯然是一種反民主的風度，且不多說。官僚風度，只是抱着做皇家官，吃皇家祿的心理，能對皇帝一人敷衍得過去，便算萬事俱了，也是一種反民主的風度。隱士風度，雖比較高尚，但因其過於高尚，至於與世不相聞問，可以留名於後世，却不能効力於當時。縱不可說隱士風度完全反於民主，也須承認他實在不大合於民主之用。至於順民風度，則是一般老百姓完全不管政治好壞的一種態度。政治好固然俯首帖耳的不管，政治不好也俯首帖耳的不管。這種風度，也顯然是一種反民主的風度。因為民主的風度，須是一種要管政治的態度。政治好固須人民去管，政治不好尤須人民去管。如果老百姓永遠都不管政治，那末政治便永遠沒有改好的一天，民主政治更永遠沒有實現的一天。以上四種風度，前二種與後二種互為因果。因有帝王風度與官僚風度，於是逼成隱士風度與順民風度。但隱士風度與順民風度既經逼成以後，又足助長帝王風度與官僚風度。我們所培養民主風度，實行民主政治，自不容再有帝王風度與官僚風度。更何況正帝王風度與官僚風度，

只有一個有效的辦法，即自由民人助起來，積極過問政治，並管理政治，不要再做順民，也不要再做隱士。當順民固然十分痛苦，非人所能忍受。當隱士，還是痛苦，也非人所能忍受。況且現代的一切情勢，均已與從前大大不同。在從前尚有容人當順民或隱士的餘地。而在今後，則恐難甘於當順民或隱士，無奈毫無餘地何！既然如此，便只好培養民主風度，以求建立民主政治。

第三大原因，在當前的風尚。一個國家當前流行的政治風尚，對於民主風度的培養，也有很大的影響。假如當前流行的政治風尚，近於民主政治，則易於養成民主風度，否則難免困難。又假如當前流行的主要政治風尚，就是民主政治，則易於養成民主風度，否則也難免困難。我國自辛亥革命以來，所有一時流行的政治風尚，有沒有民主的風尚？又有沒有近於，或反於民主的風尚呢？辛亥革命，原是一面推翻帝制，一面建立民國的一種政治革命，自有一種民主的潮流隨之而來，成為一時的風尚。不過此次的民主潮流，僅僅經過兩年的光景，便為政治的歷史傳統所停滯，未能養成民主風度。到民國八年以後，外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內因五四運動突起，民主再度在中國成為一時的潮流。不幸又不到兩三年的光景，忽為外來的各種新專制思想及運動所摧毀，而不得向前發展。最近內因長期抗戰需要團結，外國中國已與民主國家聯合作戰，民主又一度在中國成為一時的潮流。這次民主潮流，能否繼續增高，養成一種民主風度，還是中途夭折，陷入斷港絕流？那就要看一般從事政治活動者的民主信念如何，同時也要看看有無反民主的政治風度。說到一般從事政治活動者的民主信念，無庸諱言的，尚不夠強，不夠廣，不夠深，亟須多方設法加強，加廣，

並加深。至於當前有無反民主的政治風度，也無庸諱言，隱約存在着。依我看來，當前還有三種政治風度，不大合於民主政治：一爲作戰風度，二爲革命風度，三爲利用風度。所謂作戰風度，本是軍事家徹底殲滅敵軍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如果僅用於對敵作戰，是應該具有的。但若移用作戰風度於政治問題，則必使政治問題亦變成戰爭問題，大大足以妨礙民主風度的養成。換句話說，以作戰風度爲內，只是助長內亂與內戰。民主風度可以在戰場中養成，決不能在戰場上養成。所以我們要求民主風度，必須真誠誤認作戰風度於國內政治問題。所謂革命風度，是用武力手段奪取政權的一種態度。這種風度，在清季曾盛極一時，因而產生辛亥革命。在民國十二三年以後，又曾盛極一時，因而產生現在所已有的各黨派，均以革命爲號召。我記得二十年前，有些人說：「不革命，就反革命，反革命就該殺」。這是革命風度的一種簡明表示。我國革命到現在，是否仍需要革命，這須看實際政治情形如何而定，暫不必在此討論。我願在此爲讀者提出的，是我們可以革命手段奪取

政權，却不可以革命手段運用政權，可以革命風度推翻專制政治，却不可以革命風度建立民主政治。近五十年，我國說革命的人們，多半不明這種道理。因此，革來革去，至今革不出民主政治來。今後是否仍蹈過去的覆轍，須看我們能否肅正革命風度。今後能否養成民主風度，也須看我們能否肅正革命風度。又所謂利用風度，乃指人們對於民主並無真正的信心，只將民主當作一種策略，或點綴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也可稱爲兩面政策。兩面政策，雖可暫時助長民主的聲勢，但終久必阻礙民主的實施。我們要養成民主風度，並實行民主政治，便不可以只以民主爲策略，也不可以只以民主爲點綴。民主政治需要說實話，策略式的或點綴式的話，到不如少說爲佳。世間對於真正信仰或真正反對一種政治主張的人，都可以得到一部人的相從。惟有兩面政策，則難免令人迷惑，而無所適從了。

以上三大原因，都是妨礙民主風度。我們要求養成民主風度，必須盡力掃除此三大原因。

贈趙凌寒并賀新居

寒 亭

慷慨多奇節，於今始見君。江山輕一諾，軒冕薄浮雲。國祚緣儲賄，官肥劇益分。雙江無盡淚，同與哭斯文。卅載江湖隔，生離死別忙。激昂前黨氣，零亂舊文章。身寄千山底，魂飛百戰場。彌天家國恨，負手送斜陽。如夢蓬萊海，相驚楚漸親。君奴存故態，後進笑陳人。世將衰中藥，天啓劫外身。歲寒松柏志，寧許使堪輪。

（君問寒名字以藏寒）

小有園林勝，高樓字水壩。杖藜難悲壯，窗牖闢嫺嫺。從隨龍階隱，朝雲亦解嘲。美哉張老碩，還待中興年。

五五憲草中之國民大會

陳一清

茲就教一論五五憲草中之國民大會。

(一)國民大會之性質如何？中山先生所著之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又說：「在人民一方面，要有四個政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在政府一方面，要有五個治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兩相對照，所謂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者，即國民大會以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五個治權之謂。在未頒布憲法以前，統治權由國民黨行使之，然亦係代表國民大會而始取得此項權源，查訓政時期約法第三條：「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又訓政綱領第一條：「中華民國於訓政時期開始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人民行使政權。」可以證明政權即統治權，亦即管理權。參看國民政府組織法第一條：「國民政府受國民黨之指揮及監督」，亦即管理之意。根據遺教及國民黨代表國民大會行使政權之事例，是國民大會在憲法上之地位應有專條以標明其性質，「國民大會為行使中央統治權之最高機關。」豈不如此，便失去監督指揮之立場，其職權乃至無由表現。

(二)國民大會之召集方法 憲草第三十一條：「國民大會每三年召集一次，會期一月，必要時得延長一月。第二項，國民大會經五分二以上代表之同意，得自行召集臨時國民大會。

。第三項，總統得召集臨時國民大會。」是國民大會之召集，分常會臨時會兩種，常會由總統召集，臨時會分自行召集或總統召集兩種。依自行召集臨時會之規定，國民大會無常設之機關，代表散處全國，所謂五分二以上代表之同意，誰為召集？誰為統計？此條件之成就，絕不可能。若謂總統得召集臨時會，而得與不得，其動因亦有利於總統自身之成分多，不利之成分少者始得為之。是臨時會之召集方法，幾乎難於適用。至常會三年由總統召集一次，會期一月，其他三十五個月，雖有應行行使職權之事由，而無行使職權之機會。是國民大會在時間上無限制其行為能力，因此對於國民大會召集之規定，似有修正之必要，特提出三項原則：一、每年召集常會一次，二、自行召集，三、開會期中應有常設機關。

(三)就遺教說明國民大會行使政權不容間斷 中山先生說：「政治之中包含兩種力量，一是政權，一是治權，這兩種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這是甚麼意思？好比有一萬匹馬力輪船機器，那架機器能夠發生一萬匹馬力來運動輪船，或者是要前進，或者是要後退，或者是向左右轉，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師，用很完全的機器，才可以駕駛，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駕駛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樣大力量的輪船要怎麼樣開動，便是怎麼樣開動，要怎麼樣停止，便是怎麼樣停止。這種開動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輪船的力量。這種力量好比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樣，這種管理的力量就

是政權。』是輪船的行駛方向快慢動靜，都靠管理駕駛得法，一個具有極大力量載着中華民國的輪船，實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所寄託，有風濤險阻，駕駛管理輪船的人片刻不安，倘將事，倘容易發生意外，若說駕駛管理之人長久不理會這隻輪船，聽其橫衝直撞其危險當堪設想？知此可以證明國民大會一種管理政府的力量之不宜間斷，也和管理輪船是一樣的道理。

（四）就國民黨代表國民大會之先例，應有繼續行使政權之機關。查訓政時期約法第三十條第三項：「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訓政綱領第二條：「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依此事例，國民大會閉會時，應有繼續行使政權之機關，殆無疑義。但在憲草以爲國民大會不必天天要行使政權，三年開會一次，已足表現，並不主張國民大會於閉會後另設繼續行使政權之機關，以便政府雍容措施，免蹈議會時時掣肘之嫌。此種設計，我們不能說是見理不真，或信道不篤，但在國民黨代表國民大會行使職權時，則有常設機關之必要，在國民大會自己行使職權時，則無常設機關的必要，在邏輯終不可通耳。

（五）國民大會行使政權之實際表現如何？憲草第三十二條，規定國民大會之職權，選舉也、罷免也、創制也、複決也、四權俱備外，尚有修改憲法及其他賦予之職權。若就全部憲草與道教會通觀之，則不能表現道教精神之處太多，所謂行使政權者，幾乎有名無實，試言其故：

（甲）選舉權 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所謂中央官員者，全稱中央應設之官

員也。是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副院長，各部各委員，皆中央官員也。憲草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所列「選舉總統副總統，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而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各部各委員會，均由總統任命。依中山先生道教，似乎變通太大。又憲草第一百四十三條：「在全國完成地方自治之省區達半數以上時，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半數由總統任命。」國民黨主政十餘年，安內攘外，奠定中華民國不拔之基，其盡力在遠者大者，故自治尙待完成，自今以後，當然不能如此類推，謂永無完成地方自治之可能，可見本條實爲過度而設。然在目前五院之中，僅有兩院爲選舉，此兩院之中各委員又有半數由任命，是五院皆爲任命權所支配，無一院爲完全選舉矣。

（乙）罷免權 憲草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罷免總統副總統，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而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及各政務委員，不在罷免之列。又憲草第九十三條關於監察院之彈劾案提交國民大會，爲罷免與否之決議，似乎國民大會之罷免係根據監察院之提交，能否自動罷免，殊欠明瞭。又立法司法監察考試各院院長副院長各院委員，（除行政院院長各政務委員各部部長均無任期之限制外）任期均爲三年，依國民大會三年召集一次之規定，是國民大會再召集之日，即爲各院院長副院長各委員任滿之時，假定在任期內，發生有應罷免之事由，絕對不能適逢開會，則罷免權即無從行使。如謂等到會期再來，不但事過境遷，難於復按，抑且任期已滿，罷如未罷。本來可以召集臨時會，設不幸總統有罷免之舉由，未必肯自己召集以律制裁，即其他應罷免之

人，皆爲治權機關，難免總統不庇護腐敗，置不召集。或監察院官官相衛，以致無彈劾案提交。雖有國民大會可以自行召集之規定，其要件無法完成，上已說明。然則國民大會罷免權似同虛設。

(丙)創制法律 站在人民方面的，只有國民大會，滿望有此機構創制人民所需要之法律。但是創制法律以後交何處執行，法無明文。查憲草第七十條：「總統對於立法院之決議案，得於公布或執行前提交復議。」第七十一條：「立法院送請公布之議案，總統應於該案送達後三十日內公布之。」一則曰立法院之決議案，再則曰立法院送請公布之議決案，而無國民大會字樣，是國民大會片面雖曰創制法律，而限於法文，無處送交，無人接受。又憲草第一百卅九條：「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然則除立法院通過之法律外

，別無所謂法律矣。是國民大會創制法律之權，未免落空。謂國民大會將所創制之法律送交立法院通過轉送總統公布，此種解說，是提交法律權，而非創制法律權，政府有提交法律之權，然則政府有創制法律權矣，此不能自圓其說也。

(丁)複決法律 關於所謂複決，僅看憲草第七十條但書對於法律案條約案提交國民大會複決，無論憲草上之國民大會非常設之機構，三年開會一次，未必會逢其適，而得與不得，權在政府。本來複決法律之意義，可以反對人民所不滿意之法律，即有便於政府而不利於人民之法律，如限制人民權利或加重人民負擔之類。但遍查憲草，並未規定有若干人民或省區民意機關及其他方法，可以請求政府提交複決，是便於政府者決不肯輕於提交國民大會複決，若然，則國民大會之複決權亦同虛設。

萬竹樓隨筆(十)

舜生

爭鐵道借款與請開國會，爲清季革命風潮擴大之導火線。當時吾湘人士對此兩事均甚激昂，且有因此而斷指流血者。其一爲梁默生戡時，於代表赴北京爭借款出發前，以指血書一五字付之，文曰：「湘路無庸借款，乞中堂主持，戡時謹上。」代表到京，即以此血書張之湖南會館門前，予當時人心以其大之刺激，此可與四川之保路同志會互相輝映者也。其一爲徐懋恂特立，其斷指則以國會問題。時湖南赴京請願開國會之代表爲易宗燾與羅時英傑，徐於代表出發前，亦書八字交羅，文曰：「請開國會，斷指送行。」當時羅贈徐之詩，所謂「指痕送別壯南八，才氣逼人求李雙」，即指此也。今人多知徐爲留學法國之老留學生，（徐留法已在四十以後）爲中國共產黨之老黨員，但知其爲三十五年前爭民主之老鬥士者，蓋不多也。

希特勒之惡果

孫寶毅

希特勒興起後，其勢力之目標有二，一為國內政治之最高權力，另一為國際政治之最高支配權。元首領袖制也，一黨獨裁制也，黨衛團也，挺進隊也，機械化部隊也，閃電戰術也，特選民族也，生存空間也，動力主義也，德國使命也，世界新秩序也，則為彼用以達成以上兩大目的之方法與理論。從德國本身言之，在極短之時間內，完全摧毀凡爾賽和約，又創造一日耳曼民族有史以來空前團結之國家與領土龐大之第三帝國，實不可不謂希特勒。政治生命上之奇跡，但從全世界言之，則從此播擲不安，和平破壞矣。

希氏之為人也，具有兩種相反相成之特質，一為非常冷靜之計算能力，一為無理性之直覺天賦。彼利用此令人不可捉摸之個性，在不斷破壞，不斷衝動，不斷穿假面具之戰術下，沒同民主國家之弱點，而圖一一擊破之。在彼心目中，英國為猶之帝國，法國為垂死之民族。環顧全球，有發奮圖強之上進心，與夫堅強之生存意志，而能担当世界使命者，惟德國而已。

其法既不足道，美國則由於意識形態之鬥爭，內部有立即爆發革命之可能，至蘇聯之鮑爾雪維克主義，亦終為將來人類之大害，是故德國應不吝辭，負起創造世界新秩序與維持永久和平責任，換言之，德國應在東方防禦世界革命之威脅，在西方阻止腐朽的自由主義之侵入。至達成此項責任之方法為何？則曰，第一步為遵守克蒙茲微支之原則：「只要有一支堅強軍隊之存在，第二步為聯合好大喜功之墨索利尼與急於向外

發展之日本，重分配世界，而由德國為盟主。

希氏自掌握政權後，所以傾其全力，秘密從事於擴張軍備與鞏固國防經濟，蓋以此故。奈何希氏囊括天下之野心，為當時民主國家之執政者所不察，遂使希氏得以得寸進尺，實行其支配全世界之計劃。推原其故，實由於民主國家中之無戰鬥意志之和平主義，得過且過之緩靖主義，與夫自掃門前雪之獨立主義，從中作祟。除此以外，更可歸咎於一種眼光短小之企圖，即欲使德國復興，以維持歐洲之平衡，與鼓勵德國東進，使其作為反蘇之急先鋒。而希氏於侵略之前，又善於作巧飾之謊語，以迷惑民主國家之耳目。一九三四年二月，希氏曰：「所謂，德國企圖破壞奧國邊境，全屬無稽之談」。一九三五年五月曰：「德國之無干涉奧國內政之企圖與願望，更無意於合併奧國。」一九三六年三月曰：「德國在歐洲決不再有任何領土要求。」然在實際上，每於發表宣言之後，即旋即進取次一目標。例如：於佔領奧國之時，曾對捷克疆界作莊嚴之保證，但僅在六個月後，即侵略捷克矣。

希特勒之侵略行為，雖步步成功，但究屬有限度者也。茲舉一例以明之：德國本有聯合德國，組成反蘇陣線之可能，但自德國侵略捷克後，頗使德希氏之怒海難填，與波蘭自身之危險，遂不得不改變其態度矣。由此可見，希特勒之英雄事業，如只限於日耳曼民族，或不至於危險之發生，英國雖但澤與蘇台區歸還德國，頗為公平，即是例也，但略超出此民族政策之範圍，則其德國家為自身之生存計，必起而反抗德國。有



人曾謂，希氏之行爲有如有一在一無底之深淵旁，作無休止之跳舞，猶言其終有一日，失足成千古恨也。

果然，由於希特勒之侵略不止，喊醒民主國家執政者之腦。法國由廢康不振，而大大恢復其元氣，雖一經接戰，即告瓦解，但其再生之萌芽，迄今仍由戴高樂堅持之。英國由漠不關心之狀態中覺醒，放棄其過去之傳統政策，而努力於重整軍備，開戰後，各自治領相繼自動對德宣戰，此可證明其非沒落之帝國也，法國崩潰後，英國仍屹立不移，無獨奮勇作戰，此更非希氏所能料及者矣。至美國則逐漸放棄其孤立主義，表示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物質資源，可作爲對德戰爭之用。迨希氏轉而攻蘇，日本偷襲珍珠港，於是德蘇之反德聯合陣線遂告形成。希氏之攻蘇，其用意在去進攻英國之背後方威脅，但希氏不但未達此目的，且自身受創頗重。希氏慫恿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其用意在牽制美國之力量，但羅斯福洞悉其計，反與邱吉爾訂收德蘇之戰略。

自北非之艾爾阿拉曼戰與蘇俄戰場之史太林格勒戰役後，德國在軍事上漸走入絕境。希特勒之煩惱，從此日益加重。雖其實力，現猶大部保存，但謂其氣勢未衰，吾人決不信也。此次大戰與上次相比，德國之支持力較強，但此次大戰已超過上次一年有餘，換言之，魯道夫所謂最黑暗之日，現亦已來臨矣。

據一般估計，德國實力現尚有三百五十師，在蘇戰場者二百師，在意戰場及巴爾幹者約五十師，在法戰場及荷比者約六十師，在德本土及北歐諸國者約四十師。以此與英美蘇三國之力量相比，英國兵力約五百萬（自治領及印度在內），美國兵力近千萬，蘇聯兵力則近二千萬，實不啻小巫之見大巫，且不

論其空軍與海軍之差爲數更大相懸殊也。英美蘇以其海陸空優勢力量，加壓於德國之身，德國豈有不敗之理？第一、德國須三面應戰，無足夠之預備隊可供調遣。第二、盟方海軍優勢，不但德國被封鎖，且隨時隨地有掩殺陸軍登陸進攻之可能。第三、無法阻止盟國飛機穿破蘇聯境及其佔領區，各大城市與各重工業中心，被炸殆盡，使德國生產困難，原料缺乏，運輸不便，調兵不易。第四、佔領國及附庸國中之抗德組織，紛紛興起，且間有一二，在脫離德國求和。第五、因盟方海空優勢，盟國海軍政策，無法推行。第六、各中立國有投入盟方之趨勢。第七、因久戰與敗退之故，德國本身內部發生普遍不安。

由是觀之，德國之前途，雖有波降而已。猶言，得以苟延殘喘，勉力作戰耶？以吾人之見之，希特勒之精神與文配之耳。德國人若見勝勢之無望，每作波降之計，則其戰，可以上成大國之例證之。但在希特勒動其黨徒之計，即無戰勝之望，亦須作波降之計。波降者以自認心爲一切之前提，此次戰爭關於德國之前途者較難，對於彼等之前途者較重，若卒而戰勝，彼等爲世界之主人，若不幸而戰敗，則彼等之生命亦不保。是故，彼等只能戰，不能敗，只能戰，不能投降，則何不以人民與軍隊爲工具，而作波降之一擲？

且希氏認爲上次大戰德國之所以戰敗，非由於軍事，乃由於政治上之革命，反言之若國內團結，將士效命，德國決無再戰敗之理。故希氏於此次大戰前，努力從事於異己之肅清，與軍軍之震盪，戰爭爆發後，則大舉擴充挺進隊，據傳挺進隊現有實力約五十萬，由其親信希姆萊統率之，其武器與裝備超正規軍隊而上之，不但有大砲坦克，且有飛機。正規軍隊每佔領

一地，挺進隊即隨而至，其任務除肅清抗德份子與扶植傀儡，以鞏固佔領區外，且負有監視佔領軍之使命。至國內，則一切反希份子，皆由彼等撲滅之。總而言之，挺進隊為希特勒最後之強牌，人民與軍隊之是否效忠於希氏，由挺進隊確保之。在希氏一輩觀之，擴充挺進隊，以暴力安定國內陣線，固為計之得者，然而彼等不知，在民主國家中，一切出於洽商與同意，人民與政府之間，根本無隔膜之可言，是故無所謂「第四戰場」與「第五戰場」，在獨裁國家中，則不然，政權之產生與維持，基於暴力，非基於人民之同意，一切政治措施，全出於黨魁與其私黨之獨斷擅行，人民惟有服從聽取而已，但人民之政見決難強定於一尊，不論如何威迫利誘，總有一二卓立不移之士，潛伏國內或逃亡國外，織成反對黨，從事推翻運動，是故獨裁國家若幸而對外作戰節節勝利，人民與軍隊或樂於追隨其後，但若一旦失利，則各種危機，紛紛發生矣，求得同意之人民，愈需加緊其壓迫，主尊重其意見之軍隊，愈需加強其控制，換言之，依賴於挺進隊黨衛團特務警察之處亦愈多，挺進隊等愈專橫，國內之怨氣愈深，人民對戰時工作愈怠忽，軍隊對作戰愈不力，戰事亦愈不利，周而復始，愈演愈烈，其結果終有一日破裂不可收拾矣。獨裁政治之中，已孕育革命之種子，故獨裁者每不得善終。此次德國軍人之謀刺希特勒，以及軍

隊與黨軍挺進隊間之衝突，吾人可作如是觀也。由是觀之，獨裁國家，不能戰敗，只能戰勝，民主國家，則不但能勝，且能收。英國於敦克爾撤退後，國內愈團結，戰志愈堅決，並未發生如德國今日之現象，即其例也。奈何在民主國家中，現今猶有人焉，認為戰時惟有加強統制之一法，又認為希氏之所以身脫此難，德國之所以至今不倒，實由於黨軍挺進隊與特務機關之實力雄厚與組織嚴密之故。

希氏雖憑其天賦之直覺，自信為不敗不壞之超人，但在目前內外交迫之下，試問有何錦囊妙計，以逃出其悲慘之命運？所謂秘密武器，如飛彈之類，或可收效於一時，但決不能挽回嚴重之危局，且不用於勢盛之時，而用於盟軍開闢第二戰場之後，直可謂迴光反照，黔驢末技耳。希氏以前所種下之各種惡因，必有一日產生其應自食之惡果，更托芬堡之一彈，其惡果之一而已，希氏豈可以不被炸死，沾沾自喜哉。在盟方言之，德國軍人即推翻希氏，亦不過加速德國之崩潰而已，然決非德國問題之根本解決也。根本解決之道如何？曰英美蘇不奢望德國內部之分裂，只知加緊多方面之進攻，以期會師柏林，徹底消滅希特勒，肅清黨與德國軍人之貴冑階級是矣。

（七月廿八日）

朝發成都夕登東城第一峯追陪舜生叔明濤聲諸兄看晚霞

老秋

不負追陪意，峯前落照遲，霞光明滅幻，樹色淺深移。鳥響因林靜，蛩繁覺露滋，頓忘塵世熱，秋思滿山陲。

大英帝國未來之轉變

譯自美報 Harper's
雜誌本年十月份

茂義譯

一、

戰爭對於不列顛共和國之影響如何乎？其將彼此分裂抑將加緊團結，或將依然如故乎？其將何以容納戰爭之激盪，與夫其間實力關係之變遷乎？大英帝國之聲威其將安在無恙乎？諸如此種性質之問題，殆已習見於今日，實應加以探討。事實之真相必爲：不列顛共和國不至走入分裂之途，但必發生若干變動，將對於不列顛與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及南非等自治領間之關係作決定性之影響。實力之平衡將自倫敦移至鄂大瓦，坎柏刺及其他自治領之首都。於作此重要決定之時，其真正決定之事實爲其他之自治領而非其母國。聯合王國的仍爲建議者——雖已不復永遠爲之——但各自治領將爲處置者，而其處置之事將與日俱增。不列顛將求助於人，而非假人以援手者，且其求助之迫切，將遠過於往昔，是同一革性之變動也。

英人已洞悉其在共和國及國際間所處地位之性質之變更，此對於去年一月間哈里法克斯爵士在多倫多之演講及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史末資將軍在倫敦之演講中，實予以充分之表示，於史末資認爲各自治領當然不成問題時，渠極力主張以西歐之各友好民主國皆包括於不列顛共和國之內，以爲支持不列顛實力之一種方法。至於哈里法克斯則坦白承認不列顛之弱點。

哈氏稱：「吾人目睹合衆國，俄國及中國三大強權，人衆地廣，資源富庶。與其並列者爲聯合王國，人口不足五千萬，土地不難包容於合衆國一較大之州中。……於此數大國度之

間不列顛倘與共和國或帝國之其餘部份相脫離，則幾乎與之並駕齊驅矣。」哈里法克斯繼續稱，不列顛但能自自治領及帝國之支持，即可爲「嗣後世界和平所資賴」之第四個強國。加拿大對於此次多倫多演講殊爲冷淡。金總理稱：「余對於其涵意殊不能同意。」吾人旋知其對於所希望之某種合作方式具有成見者，並非加拿大一地，其他之各自治領固皆然也。

自治領必須與母國密切聯繫之觀念，並非始自今日。遠於十九世紀，希雷教授 Professor John Robert Seeley 即因在劍橋大學發表一串精論「母」「子」關係之演講，而獲得爵士之位。希雷教授正確預見在蒸汽及電氣時代再假美俄以五十年光陰則行將見其超越任何歐洲舊的國家。英非加緊團結不足以逃此不幸也。

吉卜林之著作，維多利亞女王之盛大六十年卽位紀念及第一次帝國會議等目的皆爲喚起帝國團結觀念者也。帝國主義者約瑟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曾試行將此種觀念見諸實施。但結果甚小，原於主持之者未將殖民地之民族思想計算在內也。

自治領特殊經濟之建立與日俱增，純以農產品供給母國之早日關係現正逐漸改變。此等發展雖甚遲緩，但其途徑頗足威脅希雷及其他帝國主義者之理想也。

在大不列顛，團結之呼聲現又出現。各自治領是否更改已走之途徑而分拆支持聯合王國之建立乎。其回答必爲否。除紀念，情感，及政治上利益外，尙有其他因素在。各自治領現已

將臻獨立國之地位，各有其特殊之問題，不能完全依從不列顛而克解決之也。

二、

不列顛現在之地位如何。希爾教授所指之聯合王國現歷史上已不存在。吾人須瞭解不列顛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脫離而出之不列顛。與美國或世界上任何國家相同，不列顛將遭遇若干重大之假設。為供給戰爭，不列顛犧牲甚多之海外投資，故歷來公債權國之不列顛戰後將變為債務國。伊欠人之數將超過於人欠伊之數（在戰前國際清算此種趨勢已經開始，美國租借法案成立後始見改善）。伊之商航將見大減，而其主要競爭者之美國航運將大見增加。吸收國外資本之銀行業保險業等等亦將失去原有地位。總之，不列顛之國外進款將較戰前大為縮減。

不列顛之出口貨物從來不足以抵償其所需要之進口貨物。但在繁榮時代其國外進款不但足以補償此差額而可超過之。假如不能依賴此種進款以維持國際清算，英國行將大見窘迫矣。自治領如加拿大及澳洲各自發展其資本市場各能照顧其所需要。中國可能需要資本，但必須在伊指定之條件下。航運雖能恢復，不列顛資本雖可再度投到海外，但非增加出口貨物仍不足維持此非整個世界經濟發展不可也。

第一次大戰後英國損失奇重乃人所共知。國外貿易從去回到戰前水準，一九三二年之貿易額僅為一九二四之百分之四十六，一九三七額為一九二四之百分之六十五。更重要者，歷來大宗不列顛出口貨如紡織品，鋼，煤等恢復最少。汽車，車胎，電氣機器，無線電，人造絲，化學用品等物雖佔總貿易額之

小數則最為活躍。一九三七此種活躍物品之貿易額僅不過總額出口之百分之十四而已！

在本次戰爭結束時其展望將為如何乎？不列顛必須解決之。為維持國際清算之均衡，伊須空前發展出口貿易。伊須按照國外新興工業國家之需要而調整發展其出口貿易，以類同到美國之競爭。關於上述不列顛希望發展之活躍出口品，美國尤為最有力之競爭者。欲增加出口貿易勢須增加顧客國家之購買力，故在不列顛諸通中，逐漸注重到世界經濟發展之互相依賴性。故英人較美人尤鄙視劃分世界市場之加迭爾主張，其理至明不足為怪也。在此情形下，不列顛自須乞援於各自治領。但伊等正在各自工業化過程中，對於需要增加出口之英國，非常冷淡，加拿大及澳洲較南非洲及新西蘭尤甚。光陰荏苒，世界其他部份亦俱如此也。

英國對加拿大及澳洲等國之出口貿易前途，則須賴其以特別出產品爭取對方之市場，基本製成品則需要甚小。澳洲從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除軍需工業外不准建立其他工業……，三百請求建立新製造品中，核准一百三十，七十被批准」。吾人可推想戰時限制解除後，發展之新方向為如何矣。

三、

半世紀以前，聯合王國與自治領間之貿易關係，頗類似一大工業國與其食糧及原料供應者間之關係者，其理固簡而易明。聯合王國施行一自由貿易政策，並對於帝國外許多國家所保持之關係，皆與其國內各地者相同。其貿易關係普遍世界各地。於是各自治領遂採取保護制以獎勵工業之發展。各領地

在其市場之地位，特創「帝國優待」制，於此課聯合王國之貨物比外國貨付較少之稅額。然以最近之實際情形言之，優待辦法並不係絕對低稅。稅率雖云較低，但仍為保護性質者，對於聯合王國之貨物，仍為一不可勝過之障礙。各領地之保護其工業以抵抗聯合王國者一如其抵抗外國之競爭者然。

多年以來，雖經自治領多次請求英國對各自治領給伊之優待並未在其市場上有所報答，一世紀前，在進行帝國團結之最後階段，約瑟張伯倫主張保護自己工業之關稅制度，對自治領採報關制度，並對採保護關稅制度之國家布列顛在貿易交涉時須有力與之磋商議價。張伯倫個人雖然失敗，但此種主張則逐漸得勢，最後至一九三二年二月聯合王國遂變為保護關稅國家矣。

同年在鄂大瓦聯合王國及自治領詳討彼此間優待及特權辦法，原則謂在帝國以內增進貿易即為增進世界貿易之初步。完全空想。自最初不列顛即存心維持少數國家，如丹麥及阿根廷，在伊市場上之供給者地位，因此而限制自治領貨物之入口亦所不顧。

一九三四年郝爾氏 Cordell Hull 之「交互貿易協訂法案」成立，加拿大及不列顛先後與美成立協訂。其餘自治領不願主張封閉帝國各部者之反對亦皆各覓辦法以求解除束縛。反對者並不能提示擴大市場之辦法，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不列顛領地等亦逐漸瞭解唯一出路乃在擴充世界貿易。

今日不列顛對於貿易之態度，除絕對維持原有貿易額外，再盡力增加對外貿易。各自治領亦皆如此看法。伊等皆欲維持一九三九年在聯合王國市場上之地位，但戰後不列顛究竟對於

自治領之食糧生產者能有多少補助則甚成問題。據想希望將法渺小。倫敦大學教授斯丹波稱「不列顛農業（即指聯合王國內之農業）在此大戰爭後將與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大異其趣」，此意即謂假如在自治領內發展農業生產則非在帝國以外開發市場不可。

當自治領之農業家焦急四顧時，其工業家因鑑於不列顛內之無前途，已將眼光放到帝國以外覓尋出路。加拿大找到南美，澳洲找到東南亞及太平洋各島，南非找到非洲中部，藉以滿足其市場之需要並謀發展工業之根據。凡此交易雖不為大，但對各自治領而言則確甚關重要。任何阻撓之舉動皆將引起極端之反感，伊等並將與聯合王國競爭顧客。

聯合王國之出口貿易對於自治領之壓迫不易解除，各自治領向聯合王國之出口貿易之發展則毫無前途。不列顛之問題仍為：如何增加從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七發展中之該百分之十四之出口貨物。聯合王國並非與各自治領在貿易上有不可調和之利害衝突；原因在各欲擴充其貿易額，而親密之貿易關係乃不可能矣。不列顛各國今後經濟上之密切統一乃不可能之事，因各自治領對於不列顛之關係較之對其他外國其分別只是程度的並非性質的也。

今日各自治領遠較一九三九年時更接近於完全獨立國之地位。吾人固不應因在危急時期不列顛各國每擇一共同立場而過份重視現帝國內政治及意見之分歧；但現時之尖銳齟齬頗足定將來彼此間之關係則毫無可疑者也。

加拿大專家司考特博士現充麥記爾大學民法教授及加拿大新興社會黨主席本年一月間為美國國際公法雜誌著文略稱：「自治領之殖民地性質已大部隨此次大戰而消失，」因自治領之

宣戰及其他對內對外種種措置，現已獲取國際上地位……「自治領」之名雖在法上仍暫行苟延，其對於各共和國間關係上之意義則完全廢棄矣。」

司考特教授之意見甚難獲取全體之承認，在自治領中仍有多數人存有自居於殖民地之心理者，至於將共和國建築在殖民地之基礎而向實質的或僅名義的獨立方向推動之舊式觀念，對於此種觀念之信仰者司氏之說當更使之惑亂。但吾人須憶及不列顛傳統以來對於共和國間關係之措施遠早於其法律明文之所規定。一九三一年韋斯明司特法令並未劃制新軌，不過將已成之事實明文規定而已。

在不列顛共和國內現有兩種趨勢。一為前述之自治領之主之趨勢。一為地域主義之趨勢，要求直接激烈過問自治領內各項問題。避免以上二者聯合王國領袖等主張在聯合王國領導之下集中政策對外建立一共同陣線。哈里法克斯稱：「假如在重大問題上，吾人能獲得一共同外交方針不僅由一人說出而係由結合衆人而成者，則其收穫當非渺小也」。國際問題專家摩爾本年一月之報告中懷疑到「聯合王國是否仍如從前力能担負共和國之國防。伊國外投資及航業破產，達工作年齡之人口將減少，但接受扶養之人將大增加。各自治領本身地位甚小，但居於布列顛共和國之一部份則其關係甚大。……在政治國防及經濟上共和國如採取獨占之政策則其結果惟有自毀而已。」本年四月二十日下議院辯論中邱吉爾之反對者辛魏爾氏暫時加入首相方面熱烈主張建立一帝國經濟會議及將不列顛儲蓄投資在帝國以內，伊稱聯合王國須盡力保持帝國意志之統一。

但無論如何說法，事實上總係：不列顛本身不能維持其威望，亦不能保證聯合國防為戰前之程度；故更密切之政治團結

實所必需。此議論甚簡單，有力而能動人也。但問題在此種議論並未引起自治領熱誠之反響。在加拿大反對者普遍各黨。加拿大擁護哈里法克斯計劃之希望甚小，理由甚為明顯。加拿大居於小國地位其權列強集團之出現，不論將來美與俄之事或美與英之事俱將使伊介入中間。專欄作家索爾伯特稱「任何有理智之加拿大人能想像大英帝國侵犯吾人之南鄰繼又攻侵吾人之北鄰蘇聯其可能之結果為如何乎？加拿大金總理之擁護者哈勒生稱：「在現世界中每一小國須擇一大集團內覓一避難所而為其戰爭。在地理上及需要上，加拿大所應加入之集團為誰乎？地圖上將指出其必不為不列顛集團也。」

然則哈里法克斯及其同志將何適乎？南非絕不行，即史末資亦不能如此之計劃下而與之聯合也。新西蘭及澳洲較加拿大及非洲對不列顛關係親密但此不過程度上之分別，將來如何發展現尚未可逆觀也。

寇丁首相「處理帝國問題最高顧問團」之提議似係反對一極化之辦法。但仔細研究之，其提議止係建立一交換情報及意見之新的機構，並不處理行政問題。歷來不列顛意見影響全共和國之政策，寇丁之提議顯係意欲提高自治在政策決定上之地位。寇氏提議在不列顛引起甚大好感，原因由多數人認此為自治領擁護不列顛之前奏但寇氏真正所欲者乃自治領能影響不列顛之政策與帝國主義者之所欲正相反也。

事實證明寇丁無縮減澳洲決定權之企圖，澳洲決定保持是在太平洋上特殊地位之堅強政策。去年十二月工黨開會通過寇氏提議時其原文結束稱「無論參加不列顛共和國內，世界，或太平洋上各國間之合作其主權須操之於澳洲之人民，國會，及政府。」此對於行將出現之共和國之永久單一之聯合行政機

掃之企圖似爲一打聲矣。

今日決定共和國之形勢之兩種趨勢爲民族自主及各自治領及其近鄰密切接觸。自治領內民族觀念興起原因之一爲在大戰期間聯合帝國權力之低落。此權力之低落迫使自治領在國防上不得不依賴自己，而民族思想乃因此而生。澳洲及新西蘭不能不求援於美國，自治領民族主義之生長並不限於本國界限伊等將與其鄰國及對於伊等關係重要之遠方外國推進直接密切之邦交。舉例言之，加拿大及澳洲重慶有自己之大使，與不列顛無關。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在莫斯科各派有公使。

四種地域集團現似正在形成中：

(1) 聯合王國及西歐民主國家；(2) 加拿大及合衆國；(3) 澳洲及新西蘭；(4) 南非，南滿洲西亞，及英屬非洲殖民地。

余對於歐洲國家將加入共和國甚表懷疑；伊等將按照提議中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關稅同盟之例一面加緊彼此間之關係。但不列顛將捲入歐洲漩渦，平衡蘇聯勢力之新問題已面對伊而發生。伊需要密切之朋友。伊須以主權國家之對待之原國乃此次大戰已將歐洲及其他地方之民族性提高。不列顛將試行建立一西歐地域集團，伊將充其領導者但非絕對之盟主也。

加拿大之趨勢已如上述，最後或將加入汎美共和國同盟。假如此事發生，即可推想自一九二八年以後加拿大之驚人進展；自一九二八年在哈瓦那開美會議時美國代表曾反對加拿大參加會議，原因爲一般使雖對外交權被操於歐洲列強之手之確

民地及自治領等參加會議，則其處理及討論本半球之政治時歐洲國家之影響及政策將滲入在內矣。一加拿大之准許入盟即足以表示現時伊之外交方針完全操在自己之手中也。

一 澳洲及新西蘭之關係其形勢已確定於一九四四年正月在坎柏刺所簽立之協訂，其關係密切遠超過加拿大美國聯合之內容。協訂明確規定多項政策及方針其中包括國防，航空，殖民政策，移民及內政社會諸事項，並設立一澳洲，新西蘭總秘書處，兩國各設分處，藉以交換情報溝通政策。在美國太平洋政策未表明以前，此種地域協議在防禦方面不能屹然自立；故協訂內又有條款規定在決定政策時須與美國，不列顛，法國，荷蘭，及葡萄牙協商。

最後關於非洲地域，史末資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演講中，重提來自羅德斯帝國主義之舊觀念，謂自治領對其境內之殖民地有直接利益。此話雖甚動聽，但在種族之關係上增強南非勢力於非洲殖民地其影響所及則殊堪憂慮也。

以上所述爲共和國今日之概觀。行將出現之任何組織其性質及力量或爲一四強協訂或爲一國際聯盟——皆將發生重大影響於第四不列顛帝國。任何觀念謂共和國之組成部份行將密切聯結爲一單一之權力單位完全爲一夢想，但此並非指共和國即將瓦解之意。司考特教授曾指出獨立與聯合須劃分清楚者也。

吾人將見在聯合之形勢下自治領將有更多之獨立行動。自治領無論對自己，對世界或對聯合帝國皆將加強大有力，任何阻礙此趨勢之發展者皆必歸於失敗也。

南非首相史末資將軍（譯自美國時代雜誌）

超然

每天早上正七點，史末資開始替英皇家工作。他的白髮和白鬚已經稀疏；這張久經風霜的臉刻劃着近七十四年的皺紋。但那對灰藍色的眼睛，總是不露倦意的靈敏非常。這位形容漸漸消瘦下來的人物，身體微有變形，穿著拖鞋很活潑的走動着。

這位南非聯邦的首相，從他在倫敦所住的旅館的窗戶裏，能望到海德公園的草地，在他那愛走「桌山」土砂地，和廣闊而多起伏的山地的人看來，是太平坦而光滑了。他很閒散的吃早飯，多半吃的是雞蛋，定量分配的英國朋友送來的雞蛋。他靜聽無線電廣播的新聞，詳讀泰晤士報，注意電訊和通訊。到了十一點，他準備在大凸窗的會客室裏見客。十一點，他換下拖鞋，穿上他那件有元帥徽章和紅領章的毛外衣，然後坐上汽車去參加自治領首相會議。

跟幾個老朋友吃了午飯，偶然的喝一杯戰時淡啤酒或白葡萄酒，趕快回旅館，直到點心時間，他總在那裏閱讀各種文件，用普通文字寫下關於戰爭和平以及帝國的各種備忘錄與命令。五點半鐘，在這位英國戰時內閣中唯一的自治領首相，準備和邱吉爾及統治這日不落國的少數地位高和權力大的英國人會議。

還有一件工作，是晚飯與晚上出門。他總想在十一點鐘回家睡覺，但有時必須耽擱得久些。最近的一個晚上他在白金漢宮晚飯坐在伊利沙白女親王旁邊，伊利沙白可能是英國未來女王，藉此機會得以跟她的帝國中一位棟樑更為熟悉。邱吉爾的

晚宴是對史末資的睡眠最有妨礙的。這英國首相談鋒極健，歡喜一直說下去，直到早上二三點，一面說話一面喝着南非的白蘭地，是他的好助手史末資由好望角帶來的。

偶而他回來早些的晚上，他就沉思於一本哲學書，或念一段雪萊的詩或讀他隨身攜帶的很舊的希臘聖經。

（一）開始時期 這就是上星期史末資每天的日程，他的一生大多是為英帝國服務。英國人很喜歡他在倫敦工作。他們歡迎他當他是一個由深仇而變成老友，變成為心向英國的帝國人物，變成為以英國的偉大自傲的世界人物，而對於英國與英帝國之得失，多方注意的人物。這個多才多藝的政治家，同時又是軍事家，哲學家、演說家、科學家、以及著作家，他有伊利薩白時代的英國人的性格。英國人對他的看法，誠如前南非總督鄧肯（Dunkan）在一九四一年緊張時對於他的批評說：「憂鬱的世界中的一塊巨石。」

這塊巨石坐在直背的椅子中翻閱桌上的文件，能聽見下面街上雙層公共汽車的來往那聲音比他在半世紀前所知道的英國公共馬車更為吵鬧。

當時，他是一個灰白瘦弱的劍橋學生，剛由開普殖民地學校出來，是帶着錯誤重言的波亞（Boer）人，愛好背誦漢羅米修斯解放了（Prometheus Unbound）並熱心於為羅得斯（Rhodes）建立帝國的一位莊嚴而富有天才的青年。他從劍橋回到南非，那裏有鑽石田，有可獲大利的金礦，也有日趨嚴重的英人與波亞人的磨擦，這批波亞人從好望角北移脫離司瓦爾

，以求脫離英國而得宗教生活之自由。

年青而有志的史末資律師以作羅得斯的擁護者。開始他的政治生涯。沒有一個擁護他人者遭受到比他的更使人痛心的沮喪。焦急的羅得斯毫不掩飾的自居為著名的傑姆生侵襲事件 (Jesse's Raid) 之智囊，而把保羅克入格 (Paul Kruger) 大叔所建的脫二蘭司瓦爾共和國拉進英帝國。史末資因此嘗受了許多痛苦，他與不列顛和英帝國之間，缺乏血族上的聯繫，他的祖先在一世紀前由荷蘭移居南非，他在異族統治者的英國殖民地居民中間是一個十足正統的荷蘭人。他痛斥赤裸裸的帝國主義，他放棄他的英國公民資格到北方去，成為脫蘭司瓦爾共和國的一個市民與領袖。

(二) 幸福時期 他回顧過去，曾說波亞戰爭時期是他最快活的日子。他的體重增加卅磅且由一個書生氣的律師，變成一個堅強的人民的領袖。在倔強的巴蘇圖 Basuto 小馬上他與他的倔強的遊擊隊，創立了穿過山脈與草原的紀錄：五星期走七百里。屢次以機智戰勝吉親納 (Mikoboro) 將軍所自傲的英國軍隊，其時邱吉爾正在該軍担任軍事訪員。當天雨時，他們在水裏騎馬，在水裏睡覺。他們無衣無食，忍寒挨餓，又要突然襲擊與絕望的逃遁。雖然如此這位戴著垂邊帽和有黃鬚的史末資總指揮在他鞍旁裝著乾肉和咖啡的袋中，還同時帶着一本希臘聖經和一本康德諾的純理性批評反省起來，與其說他為一個自由波亞國而戰，不如說他是為了較寬大的英帝國主義而戰，但他奮鬥到底，直到最後一場戰役，即歐啓普 Oorlog 之援取。

新的帝國主義終於來臨。波他 (Botha) 成為南非聯邦中之熱的心，史末資為其冷靜的頭腦。史末資恢復他對英國的欽

慕，說道：「他們除了名字之外，把一切還給我們國家，他們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但有很多波亞人，仍居留於牛車和來復槍趕走黃褐色的吼囉套人 (Hottentots) 和黑色的開塞人 (Kaffirs) 的荷蘭先驅隊的生活，因此仍未復興。他們將史末資為羅得斯再世或滑頭的儉尼 (Janne) 以及其他更惡劣的名稱。

第一次大戰發生時這些至死不屈的人，看到一個自由的機會。波他首相與史末資國防大臣壓平了他們舊時武裝同志的叛。於是在一九一五年，經過一個如意的戰鬥，他們為英帝國獲得了德屬西南非洲。一九一六年史末資率領的軍隊終於奪取了德屬東非的控制權。

(三) 成就時期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英國正壓迫於西線的僵局，聽到史末資在殖民地方面的勝利，很是高興，給他一個名譽陸軍中將的銜頭，又召他到倫敦。他在那裏受人宴請，被人敬酒，被人頌揚，也被人重視。在波亞戰爭中曾經和他碰過頭而邱吉爾說他是「一個從帝國邊境來的一切特別的新人物。」史末資說他自己不過是「一個簡樸的波亞人。」但他的銳利的頭腦，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對英國制度的新信心，則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勞合喬治首相在戰時內閣中給予他一個非正式的位置。

史末資在當時和現在一樣，差不多對任何事情都有份。他調解威而煦 (Woods) 煤礦的罷工，他設立了一個戰時優先權委員會，振作人民的士氣，他對皇家空軍的組織及倫敦防空隊的重建，也盡了大力，他觀察過西線對大戰略及敵方和平試探者，都有所建議，並拒絕巴勒斯坦戰爭的指揮。

有一天，他發表了一篇關於英帝國的著名演說，替有史以

來最大的自由人的結合，即英自治領，創議了一個新名稱：大英各國之大聯邦。

(四)不幸福時期 史末資曾說，回顧過去，他一生以凡爾賽和約時期為最不快活。他在老舊的布勞(Bourbon)皇宮裏，看見了「生命本身的裂隙」，好像一個嚴寒的無底洞把他高尚的希望都吞沒了。他從倫敦帶去了國際聯盟的計劃，威爾遜就拿這個計劃和他自己對世界組織的意見熔合了起來。史末資與威爾遜進行密切的合作，兩個人都把盟約看作和平的基石，即「此後全人類的大憲章」。從這位南非人的有秩序和建築師式的頭腦中，想出了代管，制裁，國際事務局與聯盟大會等制度。關於此項對世界政府的貢獻，他後來曾說「我一生所作的其他事情簡直與灰塵一樣無價值」。聯盟所發揚的聲浪好像很明顯的觸犯和約中其他條款。史末資要求對德國寬大，然而他失敗了。他的聲音在含着痛苦和堅欲復仇的人的怒氣中消失了，克里孟梭在憤怒中，勢合衝治則善於漫罵，這兩人使威爾遜吃不消。大局定後史末資跟着別人在閃爍的鏡廳中簽署了那怪形文件，但他警告他們，「這條約能和平，和平還要待諸將來。」

史末資是一個在國內得不到榮譽的先知者。一九一九年波他首相去世後，他在南非種族糾紛的政界中，成為首相的繼承人。但波亞人的愛國熱潮高漲，國家主義者天天誹謗滑頭的儉尼，說他是英國人的工具。一九二四年的選舉，國家主義者獲得勝利，因為他們不滿於斯末資對蘭得(Rand)地方罷工者所施行的高壓政策，勞工黨乃不推讓史氏。精明的仇英的梅佐格將軍(James Barry Munnik Hertzog)成為首相，史末資在政府中住了十四年，也繼續到開普敦國會的反對席上去了。

(五)思想時期 史末資終於找到了回到家園的機會了。他注視着他仁慈懇切的妻子伊西(Isis)原名為賈拉馬加瑞他克里治(Sybella Magdetha Krige)，他們一齊在新待倫波希(Stellenbosch)某大學裏學希臘文與人格之演進時，認識後結婚。把關於史末資的新聞，貼上剪報本，(現在已有一百十卷以上了)他溺愛他的兩個兒子四個女兒，以及她的一羣孫兒們。他有一次很黯淡的提到他的家庭說，他們與他在一塊兒的時間太少了：「他們當我是一個特別的陌生人。」

他在他的農莊裏時，是一個植物學家，拿着拐杖與標本匣跨過草地。他也作過農夫，觀察他的純種母牛。他訪問他的開墾工人，以父親的態度拍撫小黑人的頭給他們糖果，心裏也許在想上帝留給這些黑人的命運是什麼呀，他們的大陸在史末資看來已成了白種人的貴重獎品了。

最得意的事情，是他能回到他的密室去，即滿佈紀念品與書籍的寶貴圖書館。他在那裏咀嚼囉嗦會特門(Whitman)，培根(Bacon)柏拉圖(Plato)李勃尼資(Leibnitz)，達爾文(Darwin)史賓那沙(Spinoza)諸人的著作，他在那裏把自創稿讀過後即成為他的伴侶的思想，寫成一部哲學「全體主義與進化。」

在這步心愛的工作裏，史末資說明他的全體性觀念。即他全生命工作與不移的樂觀主義之要素。史氏之意，以為宇宙間任何事物，其全體大於部份，換言之，電子微子間，植物動物間，心與人格間，人類之戰爭與混亂間，帝國與世界秩序間，那種合作，融洽，與全體主義之力拉總是在作用着。(哲學史末資，由希臘字全體(Holos)字中，演出他的全體主義

(Holism)

(六) 博爾時期。二次世界大戰把史末資重新送上馬鞍。英國向德國宣戰之後三天，一場動人的辯論震撼了開普敦國會。海佐格首相坦白的說：「我同情希特勒」，史末資副相（他已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次政黨聯合的投票中重入政府）提議南非聯邦應與不列顛結為同盟，並肩作戰。他的辯詞僅以幾票的多數獲得勝利，第二天史末資當了首相。第三天政府對德宣戰。據說得意的阿道爾夫希特勒聽到這消息簡直大笑起來。

大多數同胞現在不叫他滑頭儉尼，而叫他老主人了。他和第一次大戰中一樣，是各自治領袖中最活動的一個。和第一次大戰中一樣，靠了他的智慧，機變與人格的無窮力量把他的分散的人民拉到了戰爭，幫助英國人。和第一次大戰一樣，他的聲調在帝國會議中，祇次於邱吉爾，但在今日，他說話的神氣，已像個被人尊崇的聖賢。

有時，譬如說去年十一月，這聖賢在倫敦公開向英帝國說話，英帝國與世界都對重他的話。他的思想總是全體的，在他看來，大英各國之六聯邦，或曰英帝國，是一個極大的世界社團，亦就是一個很可以再混合其他國家的聯合，一如同西歐各列強。而在大聯邦內與帝國本身間，也能有更進一步的融合。自治領可以代替不列顛監督就近的殖民地。好比說，史末資就很願意看看他的南非聯邦成爲一個剛果以南的全部非洲聯邦的一部。

英國人知道史末資是在他們的帝國之下變爲偉大的。假使他在世時，帝國範圍已不免縮小，那麼他若不在世時，則帝國範圍更要減縮了。（「時代」報駐倫敦記者格雷勃納（Greene））上星期訪史末資後，打電報說，自我一九三七年

出國以來，見了多少人我毫不猶豫說他偉大的人，便是史末資。但在他的偉大，如在他的本身中，有一種超然的嚴峻，史末資研究其他人的偉大時，他把威爾遜這理想主義者註於林肯那人道主義之上。

(七) 分割之地。南非的不全體性的分割，減少了史末資的全體性的偉大。他的領土是一塊崎嶇不平的荒野土地，有葡萄園及牧畜場，有大沙漠及風蝕山脈，有建於金子上面的城市如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有建於鑽石上面的城市如伯來（Kimberly），有荒涼的草原，農夫在那裏看不見他鄰居的炊烟，有滅絕的吼猴套人，及仍以部落的光榮自傲的朱拉人（Zulu）。有黑人，有覺得這塊土地是他們的家鄉的波亞人，還有仍舊睥睨這海的人即好像是透過出外的英國人。

南非能非最大又非最重要的自治領。澳洲及加拿大在面積，人口和重要資源方面都比他大。在國家大宴席上次於邱吉爾的，不是史末資而是金氏。但南非仍是個重要自治領，他是帝國生命線的一把鑰匙，他守備大西洋與印度洋的交匯點。他又使帝國士氣的一把鑰匙，在英國人眼中看來只要她與不列顛站在一條陣線上，即可作爲聯邦與帝國的骨幹在相持久力竭之際人。

(八) 種族複雜之境。南非聯邦有二百萬白人，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的祖先的英國人，百分之五十五是南非荷人，他們統治着七百萬政治上無發言權，社會上和經濟上受壓迫的黑人，即史末資所熱知的南非將來的未知數。聯邦中南非荷人很多（常常是最多數）是反英的，對納粹的種族理論也半信半疑，至少對外贊成切斷大聯邦間的聯繫。

結果在危急的時候，造成高度不穩定的多數黨，二次戰爭

中，以站在英國一邊，都靠了史末資個人的意志與人格的力量。南非荷人，愛英國的，祇是少數。且有少數南非荷人，由他們的言辭看來，真敢完全與英國斷絕關係。在一九四三年，大多數反英份子同意於史氏英人會勝利說，而後此困惑的首相與他的聯合黨黨員，在國會中獲得穩定的多數票。但史末資的主要政敵與一度的主席學同學，近視眼的馬蘭博士（Dr. D.F. Malan），國家主義黨領袖，仍常提倡南非獨立，然而他的聲調好像漸低微了。

（九）為一個新世界奮鬥 國內緊張鬆弛後，史末資表示他對於他的國內牛油麵包問題，不感興趣。他把國內事務多多交給他的能幹的顯然要成繼承人的和夫漢兒（Jan Hendrik Hofmeyr），財政兼教育部長，與他的忠實的信徒絲倫（Louis Esselen）。他一步一步的轉到，他一向希望之任務，就是作英帝國與世界一個心地開闊的全體主義的政治家。他歡喜在問題的核心活動，他去年十一月突然出現於羅羅會議，和羅斯福第一次見面（他們以前常在橫過大西洋的電話中談話）

後來史末資說：「我們兩個老荷蘭人相處得如松呀！」現在在他倫敦的書桌旁，他最主要的思想是關於歐洲的未來，他在此中預俄國將成為一巨人，法國將成為一較小國家，英國須要權力的重行安排。他用食指在空氣中畫着整齊的全體性的圖形以加重其語氣曰，「新世界之軸，即今日最大的發展，是為美國與大英大聯邦之合作。」不寬恕人的老年波亞人，已消耗她們的一生於打擊老當益壯的滑頭儉尼，至今仍不願意聽說他與英國公主旁邊，或是玩弄國際間的牌戲縱橫。但他們現在給他最高超的頌詞：「我們恨他內心的謙恭，但該死的，他總是能引訓外國人的南非荷人呀！」

英國人很願意受教於史末資，永不說他是一個南非荷人。他們說他為他們的老顧問。當會客室或酒館無線電傳出史末資老年人的枯燥聲調時，酒館的吳聲與閒談都停下來，他們靜聽着，他並不分像他們中的一個，但他們都尊敬他，且因他在英國而自傲。

泗英兄經營金佛山，年來種茶製茶，山中生事日以豐。今將建文物館於三泉公園，

追憶舊游，數題二律。

老 秋

破敵摩岩舊有碑，風塵世外綠陰垂，雲開九遞霞橫錦，風送雙溪雨霽絲。乘興每隨松徑遠，探幽不負木橋危，坪中萬竹封殘壘，猶憶當年碧眼兒。

豐綠猶殘在嶺霞，管領名山活萬家，病久早思求大藥，詩清多為得珍茶。追憶舊游新修閣，欲盡丹心更種瓜，今日東川文物盛，好憑閣館駐英華。

大戰以來巨頭會議之經過

孫寶毅

大戰以來，國際政治上，有一顯著之點，即巨頭會議是矣。巨頭會議之長處，在於直捷了當，固最適於戰時者也。過去之民主政治，不無意志散漫之弊，而巨頭會議正補此缺點，故巨頭會議稱之爲民主政治集權方面之一重大進步，無不可焉。國家於危急之際，每將權力交付於一人，古代希臘羅馬已然。今日之邱吉爾氏，最明乎此理，故自任英內閣總揆後，盡力運用民主集權之制，英國得以安然渡過危機，其原因大半由於此。而民主政治之戰時效率，不及專制與獨裁之說，從此無法自圓其說矣。

邱吉爾氏與羅斯福氏相晤於大西洋，爲此次大戰中巨頭會議之開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邱氏夙懷僕僕，屢赴華府，會晤羅斯氏。邱氏固善於運用巨頭會議之政治家也。卡薩布蘭卡會議也，魁北克會議也，皆其傑作。而開羅會議也，德黑蘭會議也，更將羅邱兩巨頭之範圍，擴大爲羅邱與羅斯氏三巨頭之會。

每次巨頭會議成對世界發生重大之影響，諸凡關於全球之軍事政治問題，皆由各次巨頭會議予以決定，諸各次巨頭會議爲世界歷史之轉捩點，無不可也。語云：不知來，視諸往。來日世界之問題，不僅甚多，且究如何解決，現尙在不可知之數，但視諸以往，或有助於吾人推測將來所取之途徑也。茲先分述各次巨頭會議之經過與其結果。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邱羅斯氏會晤於大西洋上某地，發表包含八大原則之宣言，此即一般人所稱之大西洋宣言。從

表面上言之，該宣言爲兩國共同政策之基本原則及其根本理想之聲明，但從實際上言之，邱氏之意在從此奠定日後英美合作之基礎，羅氏之意則在用以警告日本，若日本作進一步之侵略，英美將採取一致之行動，換詞言之，英美合作與其認德日爲敵人，實由大西洋會議爲之始也。日美必出於一戰，或早在羅氏意料之中，果也，日本於是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英國立即隨之，美國旋即又對德宣戰，從此英美並肩作戰，儼如一體焉。

下年一月邱氏赴華府，與羅氏作第二次會談。當時所談者爲決定由美國負對日作戰之大部責任，英國則傾其全力保衛本國，作爲將來攻德之基地，並負大西洋與地中海海面之主要責任，及在北冰洋保護通往蘇聯之航運。不久，北非戰局告急，六月邱氏再赴華府，與羅氏作第三次會談。邱氏抵華府之日，正多布魯克失陷之時，羅邱遂計劃英美出兵法屬北非之舉，以解救此嚴重局面。

法屬北非之後，戰果圓滿，盟方從此由被動轉爲主動。邱氏會稱北非之役堪與蘇聯戰場上之史大林格勒之役相媲美，即以此故。邱羅有見於局勢之有利轉變，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第四次會談於北非之卡薩布蘭卡港。當時與會者有英美兩國之參謀部主腦。會議後發表正式聲明曰：「全世界各戰場均經逐一檢討，調整一切資源，以備在海陸空三方面從事更猛烈之戰爭」，然吾人根據以後之事實表現，從可知當時所加以討論而決定者，敵人無條件投降一也，先擊潰德國之戰略二也，而

西里登陸與意大利戰場之開闢三也，空中轟炸德國，作為對蘇聯在西歐開闢第三戰場之要點之響應四也，抵禦蘇聯與蘇聯樂間之關係，初步解決因北非之衝突引起之法國歸併問題五也。開會前，羅斯福曾邀請史大林氏出席，但史氏以指揮偉大攻勢，不克離蘇為藉口，未赴會。在史氏之意，英美既無意開闢第二戰場，而只擬在意大利開闢「第三戰場」，則彼與羅斯福會晤，實毫無意義之可言。而在羅斯福方面，則有如聲明中所言者，「彼等之主要目標，即在於最適當之地點，採取猛烈襲擊敵軍之方法，俾盡量減輕蘇軍之負累」。

當此時也，日本對澳洲之威脅，仍甚嚴重。守衛澳洲之麥克阿瑟氏，又屬於與羅斯福立於反對地位之共和黨人，故美國政治上曾因對蘇聯德日孰先孰後問題，引起相當之波動。參議員陳德勒甚至要求參議院與人民共向羅斯福施使壓力，促其對日採取攻勢，而暫緩對德採取行動。邱吉爾氏遂於五月中旬，又赴華府。此為邱羅間之第五次會議。邱氏在美國會中言曰：「日本之失敗，未必即為德國之失敗，但德國之失敗，即為日本之顛覆」。邱氏之言，頗對陳德勒主張先日後德者而發。該次會議之結果，僅由羅斯福發表長僅一句之聲明曰：「對每一戰場之未來作戰，具有完全之協議」，邱氏何以不願與羅斯聯名發表聲明，吾人雖不得而知，但所謂「協議」也者，則吾人可斷言為增強對日之戰也。邱氏於五月二十五日在羅斯福聯合招待記者席上言曰：「倘戰爭曠延，盟國將以同等力量對德日作戰」，豫測言之，在目前祇能以較輕之力量對日作戰。彼又言曰：「彼不能向蘇聯政府作任何新戰略之建議，然蘇方各領袖必須瞭解日本曾以純粹機會主義之眼光注視蘇聯。同盟國希望於適當期間內利用滿洲伯利亞之根據地轟炸日本，自非秘密」。

其言外之意，是否以蘇聯對日宣戰為先敗日本戰略之先決條件歟，抑故意使蘇聯為難，使其承辦即將發動之西西里與意大利之役為有益於蘇聯之舉歟，則吾人不敢妄加揣度矣。

七月十日盟軍在西西里登陸，意大利內部發生政變。代羅斯里尼而起之波多格里奧，正派遣代表與荷西英國外交使節秘密談判之際，邱吉爾氏於八月十日抵加拿大之魁北克，與羅斯福氏作第六次之會談。討論之主題，約有以下數項：先德後日戰略之相當修正，即美國艦隊之主力集中於太平洋，以加緊對日之戰一也，決定對希特勒歐洲堡壘採取攻勢之計劃，其形式先之以日夜大規模空中轟炸，俟收轟炸之實效後，再行登陸，易言之，不接受蘇聯所提在西歐立即開闢第二戰場之要求二也，擬定意大利之役之具體計劃，並商得如何處置因軍事行動所引起之政治問題三也，對法國民眾解放委員會，英美間取得諒解四也，於最短時期內舉行英美蘇三國會議五也。

魁北克會議所決定之第一與第五兩項，尤為重要。太平洋戰爭之得以由所羅門，新喬治亞，新幾內亞，而發展至今日局面，實由當時之決定使然。蒙巴頓氏之派往遠東，以及緬甸戰場之作戰計劃，亦於當時決定者也。截至魁北克會議為止，羅斯福氏曾談話六次之多，邱羅可謂勤矣，但顯然為英美兩巨頭間之會議，所討論之事，亦不出於盎格魯薩遜民族範圍以外。卡港會議曾邀請史大林氏赴會，但史氏未出席，至魁北克會議，則英美根本未邀請史氏出席，其理由為該會議着重對日作戰之討論，未便邀請未對日作戰之國家代表參加。但該會討論者不能全為對日作戰之事，而於討論之際，已處處感得無蘇聯代表參加，不能對歐洲問題有所決定之困難矣。至蘇聯當局，雖英美邀請，或亦未必出席，但對英美之不邀請，則表示不滿，

李維諾夫之免去駐英大使，即其所作姿態之一，塔斯社亦發表聲明曰：「蘇聯政府並無奉邀參加此次會議，因鑒於會議之性質，過去與現在俱不能望蘇聯政府任何代表參加魁北克會議」。魁北克會議之結果，蘇聯認為英美仍未能接受蘇聯之要求，自亦表示不滿，「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論曰：「魁北克會議業已鞏固英美集團，但從參加會議之成員觀之，尙不能獲得英美蘇全體聯合之見解」。

英美蘇三國間之關係，當時有日趨惡化之傾向，但從另一方面言之，因時局之發展，三國咸皆有集會討論，以解決彼此間，與對歐洲方面之各項軍事政治問題之需要。於是遂有十月十八日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之召開焉。開會之前，邱氏曾於九月一日赴華府，第七次與羅氏會談，對英美蘇關係與對莫斯科會議中英美所應取之立場，先作一番洽商。

至英美蘇三國間之問題，吾人可略舉於下，對德戰略問題，戰時連絡問題，戰後合作問題，威爾遜問題，巴爾幹問題，小國地位問題，波蘭，芬蘭，羅馬尼亞與匈牙利等之未來問題。以上諸問題，如英美蘇三國間無法獲得一解決之道，則世界前途實不堪設想也。但蘇聯當局竭力主張，莫斯科會議之主要問題，應為縮短戰爭之時間，並認為加速希特勒敗北之一致行動，為解決戰後一切問題，與保持英美蘇戰後永久合作之先決條件。英美對蘇方此項意見，在原則上自無反對之理由，故莫斯科會議得以圓滿舉行。但筆者個人認為，莫斯科會議在名義上為三國外長之會議，討論之主題實為戰時與戰後之外交，至「縮短戰爭」與「加速希特勒敗北」，顯然大部為軍事方面之問題，是故莫斯科會議如賦屬外長會議，則在軍事性質濃至之空氣中，討論外交，外交原則每易為軍事之便利所支配。

莫斯科會議所討論之問題，根據今後所發表之公報，吾人可得而審焉。茲約有以下數項：第一、開闢第二戰場問題，即公報中所稱：「關於明確之軍事行動，經已決定，並已從事準備」，第二、保證三國於戰中及戰後之密切合作，此即普遍安全宣言之主旨也，（中國之被簽字，得力於美方之處頗多），第一、設立三國間磋商之永久機關，以便坦坦討論由戰爭發展而引起之歐洲諸問題，（此機關即為在倫敦設立之歐洲顧問委員會），第四、贊成意大利恢復民主，設立意大利顧問委員會，以調整三國對意大利之關係，並允許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及希臘南斯拉夫之代表參加該顧問會，第五、三國同盟恢復奧地利之獨立，作為處置戰後德國之先聲，第六、羅邱史三氏聯合簽署嚴厲懲辦戰禍罪首宣言，用以表示三國對肅清納粹與法西斯之決心，第七、準備召開羅邱史三巨頭會議。以上七項乃當時需作最後決定而已決定者，此外尚有若干問題則在原則上先作決定，或僅互相交換意見而已。此類問題中，有對德國與附庸國之處置問題，戰後經濟合作問題，戰時和平機關問題，法國問題，巴爾幹問題，對倫敦及其他各地各流亡政府之態度問題，肅清傀儡問題等等。莫斯科會議中，有兩問題焉，吾人可斷言必絕口不談，此兩問題為何，即「蘇聯邊疆問題」與「波羅的海各國地位問題是也」，蓋蘇方認為其不能成為討論之主題，猶之乎不能討論美國邊疆與加利福尼亞之地位問題。但不論如何，吾人不能謂莫斯科會議之成就不大。在蘇聯方面，從此得以解除英美之懷疑，或謂蘇聯到達一九四〇年疆界時，即和德國講和，不再前進，或謂蘇聯扶植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與自由波蘭委員會，拉攏捷克流亡政府，袒護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其用意或在使紅軍先進柏林，操縱將來之歐洲。

在英美方面，亦一掃蘇聯之誤解，或謂蘇炸德國與從意大利方面之進攻，對蘇聯毫無幫助，或謂英美有由塞格薩進德民族獨霸世界之企圖。要之，自莫斯科會議後，英美蘇三國之合作，開始建立於一鞏固之基礎上矣。

史大林氏於紀念十月革命之文告中曰：「我軍之攻勢，實由盟軍在北非，在意大利各島嶼，以及在意大利南部之戰鬥行動，予以聲援。吾盟邦之空軍，已使德國工業中心城市遭受有力之轟炸進攻。紅軍自東方給予德軍之打擊，輔以盟軍主力之自西方給予之打擊，則必能粉碎希特勒德國之軍事力量，而其結果亦必將為反希特勒聯盟之完全勝利」。在蘇聯官方正式公文中，承認蘇炸德國，與北非，西西里，意大利等役之有助於蘇軍，此為第一次。易詞言之，蘇軍與盟軍戰路之漸趨一致，亦由莫斯科會議開其端也。

英美蘇三國間之問題，既在莫斯科會議中，謀得諒解，則邱羅史三巨頭之會面，自不成問題矣。此即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之德黑蘭會議是也。該會議之成就，吾人可分以下幾點言之：第一，對德作戰之戰略方面之一致，在會議後發表之宣言中曰：「吾人已就將從東面，西面與南面進行之軍事行動之規模與時間，商得完全之協議」，由此可知，邱羅兩氏在會中曾向史氏說明將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之規模與時間，而今後蘇軍之從東方，英美盟軍之從西南兩方，亦在會中商得如何使其成為一個戰爭中之一個戰略下之一部。第二，戰後三國之密切合作，宣言中曰：「吾人確信，吾人之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為一永久之和平」，即指三國合作對世界永久和平之必要性而言也。第三，解決戰後諸問題之原則。宣言中曰：「吾人將力求所有大小國家之合作與積極參加」，又曰：「吾人必須要

歡迎彼等，聽彼等抉擇，到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之大家庭中來」，此即公認世界民主為今後解決一切問題之大原則也。第四，對德作戰之戰術方面之協同，即宣言中所稱之「世間決無一種力量能阻礙吾人由陸上消滅德國陸軍，由海中消滅其潛艇，並由空中消滅其兵工廠」。第五，大西洋憲章之採用，三國發表伊朗宣言，允諾在戰時與戰後予伊朗以經濟上之援助，並維持其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過去三國間之誤解，如英美之不擬開闢第二戰場，如蘇聯之不滿英美之轟炸德國，以及蘇軍抵達疆界後不再前進等，從此一掃而空。總而言之，自邱羅史會面後，三巨頭成為「事實上之朋友，精神上之朋友，與志同道合之朋友」；而宣言中所含蓄之精神，曰戰略之一致，曰戰術之協同，曰戰後之合作，曰世界民主之原則，曰大西洋憲章之應用，亦指示今後世界之正確方向，即一般人所稱之德黑蘭路線是矣。

德黑蘭會議之前，十一月二十二日羅邱兩氏又曾與吾國蔣主席舉行會議於開羅。在開羅會議中，中美英三國關於對日作戰計劃，商得一致意見，並規定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戰後仍歸中國，剝奪日本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擷取之殖民地。德黑蘭與開羅相距不遠，邱羅史蔣四巨頭本可藉此機會，彼此會面，但以蘇聯未對日作戰，故不得不分別舉行兩個巨頭會議，吾人對此自不無惋惜之感。

但目前世界大局，已有極大轉變矣。英美盟軍在洛曼第已開闢所謂第二戰場意大利方面盟軍已越過羅馬數百里，而東線之蘇軍亦已迫近東普魯士邊境，至太平洋中之美軍則已佔領塞班島矣。而日本又於此時抽調關東軍分配於南洋與中國，若蘇聯對日作戰或在西伯利亞伴作姿態，日軍或不敢如此胆大妄為

。換言之，英美蘇中國國會議之召開，此其時矣。除舊問題外，英美蘇三國軍隊如何會師柏林，法國解放後如何樹立民主政府，蘇聯如何參加對日之戰，俾世界全面和平早日來臨，凡此皆有待於四國會議之予以解決也。

吾人根據以往巨頭會議之經過，可知四國會議乃選評上必然發展之事，而其所以未能即開者，厥爲蘇聯對日之保持中立

關係，吾人根據以往，又可知，四國會議之前，此羅氏必先會談，而四巨頭會議之召開，亦必在明羅會議之後。會議之結果，將產生一包括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經濟合作等大原則之重大宣言。該項宣言吾人將稱之爲世界憲章。以上所言之即羅第十次會議，英美蘇中國國會議，與邱羅史將四巨頭會議，不久或將舉行，吾人拭目以待之可也。（七月十六日）

萬竹樓隨筆（十一）

舜生

譚復生先生（嗣同）爲戊戌殉國六君子之一，所著「仁學」一書，影響當時思想者頗深，其獄中題壁一詩，更爲國人所傳誦。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按後漢書卷八十七，杜根以漢安帝永初元年（一〇七）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皇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緘籠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復蘇，因得逃竄。及鄧氏誅，乃得徵詣公車，拜侍御史云。譚蓋以貪位戀權之惡類鄧后，而已則不望爲倖免之杜根也。所謂「兩崑崙」者，據梁任公解釋，謂其一指康南海，其一則指當時在北方知名之大俠王五（名正誼），（見飲冰室詩話）據近人陳菊隱所著「新語林」一書，（中華書局出版）則謂除王五外，另有胡七其人，亦任使者流，與王同爲譚之好友，譚入獄後，曾百計營救，終未得聞，其所習武術，則與王五同屬所謂崑崙派云云。是則兩崑崙爲指王胡，而於康無與，或信然歟？

黃遠生君（遠庸）爲一代之名記者，以民四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舊金山爲人所暗殺，其死因余至今不明。或曰，黃終不願爲袁用，殺黃者即爲袁所嗾使；或曰，黃有祖袁嫌，殺黃者實爲反袁派。頃讀林宰平（志鈞）君所輯「遠生遺著」，則黃於民國元三年間所爲各文，見於當時在北京出版之「少年中國週刊」者，於袁氏實極不遺餘力，茲錄一段如下：

「大抵袁總統之爲人，並非不可與爲善之人，然自其受政以來，則善日少而惡日多者，

此由於其本身之原因者半，由於其左右及政黨政客之原因者亦半。今試更詳言之：袁總統之爲人，意志鎮靜，能御難故，其長一也；經驗豐富，周悉情勢，其長二也；見識宏遠，有容納之量，其長三也；強幹奮發，勤於治事，其長四也；拉攏材能，常有破格之舉，能盡其死力，其長五也。有此五長，而爲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智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智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於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願手執政權者十餘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爲其牢籠而宰御，則益驕視一切，以爲天下事不過如此，於其平日以老練，其執行日以勇往，乃至舉國之人物爲供奔走，盡中國國家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於此，長此不燭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爲中國怪傑之資格，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爲亡國之罪魁。夫以其明達宏遠舉世難得之資，若令其左右能盡職而忠規，議院能守法以監督，言論界能秉公勸告，則向能利用潮流以立功名，不願引潮流以取咎戾之袁總統，未必不能進化。……」

此其批評袁氏，可謂恰如分際，無溢美，亦未難以僥人意氣，必具此知人論世之能，更濟以敢言之勇，始足以進退一世之人才，惜乎近三四年間新聞界人物如黃君者，蓋不數數觀也。

四川省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肆仟萬元
本行宗旨

匯兌	貼現	放款	存款	四：促進生產建設	三：扶持特產運銷	二：調濟全川金融	一：發展社會經濟
倉庫	信託	儲蓄	代理公庫	分行	支行	總行	
辦事處	辦事處	辦事處	辦事處	成都	萬縣	重慶	
榮昌	富順	涪陵	樂山	自流井	南川	合川	
等處	等處	等處	等處	達縣	遂寧	遂寧	

總行設重慶
分行設成都、萬縣、重慶、涪陵、樂山、自流井、南川、合川、達縣、遂寧等處
支行設各縣

聚興誠銀行

營業要目

儲蓄	匯兌	放款	存款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設重慶
分行設成都、萬縣、重慶、涪陵、樂山、自流井、南川、合川、達縣、遂寧等處
支行設各縣

民憲半月刊（第七期）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日出版
編輯人 左舜生
發行人 鄭振文
發行所 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信義街卅九號
定閱處 本社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 重慶成都桂林昆明貴陽長沙衡陽各新書店

預 定			
時間	冊數	收	費
全年	二四冊	三百二十元	
半年	十二冊	一百七十元	
三個月	六冊	八十五元	

本刊零售每冊國幣十五元

不通匯兌之處，一元的郵票可以代現。不收寄費，加快或掛號照加。

中國國貨銀行

利導游資 調濟金融 振興國貨 扶助商工

行址：陝西路二〇九號
電話：總經理室二二四八
經理室一四七九
營業室一四六三
電報掛號：六六一八

大同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銀行部

重慶	蘭州	西安
大同街	中正路	東大街
昆明路	貴陽路	陽明路
護國路	中山路	剛天路
桂花路	柳州路	水常路
東林路	培新路	

儲信部

重慶中路一

電報掛號除昆明(3588)外其餘均(7041)

中央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廠址	廠址
重慶南岸	渝中區
銅元局	白土地廟
電報掛號	電報掛號
一六三五	〇九一四
	成都南校場外

總經理司公重慶南岸銅元局電報掛號一六三五

製造：化學藥品
配製：製劑處方
原料：精製藥品
注射：精製藥品
乳劑：精製藥品
葡萄糖酸鈣（注射用）
次硝酸鈹
次炭酸鈹
硝酸鈹
氧化鈹
甘汞（氯化低汞）
昇汞（氯化高汞）
白降汞（含亞氯化高汞）
出品繁多不能盡錄

營業部 辦事處 歡迎委託製造

重慶民權路十八號	電話掛號	41711
電話掛號	0929	0914

中元造紙廠

自製化學木漿
精造上等紙張
（製造廠）四川宜賓中元新村
郵政信箱號一二三四
電話掛號六六一六
電報掛號四一五五二
（重慶辦事處）中正路一四〇號

憲政

第一卷 第八期

短評三則

(一) 國共調整的途徑 (二) 關於身體自由

(三) 聽取葛利士先生之言

征途百里之最後十里

民主憲政的規模問題

王之反對黨

論身體自由

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公布以後

論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大選之勝敗

確保世界永久安全之關鍵

戴高樂所以興起的原因和其前途

萬竹樓隨筆七則

舜生

張君勱

陳啓天

費鞏

周鯨文

陳一清

毅生

孫寶毅

抱貞譯

舜生

正和銀行

△促進戰後建設

△增進羣衆福利

敏捷手續

存取便利

業務範圍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押匯 儲蓄
及其 他商 業銀 行一 切業 務

匯費低廉

利息優厚

總行：重慶林森路一〇一號
分行：成都、昆明、貴陽、重慶、成都、昆明、貴陽、重慶
儲蓄部：辦理活期儲蓄定期儲蓄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分期付息及禮券儲蓄金

△發展社會經濟

△扶助後方生產

四川絲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三千萬元

總公司	辦事處	製絲廠	製絲廠	冷藏庫	主要產品
重慶陝西街九十二號 電話掛號一〇八 電話四一七八	南充 成都 三台 仁壽 西充 南充	北碚 三台 重慶 北碚 重慶 北碚	重慶 北碚 重慶 北碚 重慶 北碚	重慶 北碚 重慶 北碚 重慶 北碚	改良蠶種 改良生絲 絲棉 絲筋

福鈺銀行

總行行址：重慶民族路特一號
電報掛號：六九四九 電話：41338

銀行部：辦理存款放款匯兌貼現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儲蓄部：辦理活期儲蓄定期儲蓄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分期付息及禮券儲蓄金
通匯地點：成都、宜賓、瀘縣、南充、貴陽、重慶、昆明、下關、昭通、江、合川、遂寧、昆明、下關、昭通、柳州、衡陽、麗江

安康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 信用穩固
匯兌迅速 手續敏捷
總行：重慶林森路四五號
電話：四一四四八
電報掛號：四一四四
各地辦事處：
太和鎮——太和鎮正北街
中壩——中壩北大街
三匯——三匯林森路

(一) 國共調整的途徑

從本年五月初起，到八月底止，國共兩方四個月以來商談一切的經過，已於九月十五日在國民參政會的大會，經雙方代表以書面和口頭鄭重的，徹底的向全國國民公開的報告了。

我們在本刊第七期，已經大聲疾呼的說過：

「今天國內團結不團結的一個問題，乃是整個國家全體國民的一個死活問題，決不能看為少數方面的私事，國民是有權要求過問的！」

基於這樣的一點觀點，我們對於這件事實的徹底公開是表示欣慰的。

可是，公開是公開了，公開以後的辦法怎樣呢？我們願以坦率真誠的態度就這個問題先作一種原則上的回答：

第一、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我們希望國共兩方，確認國家民族的利益超於一切。

第二、對於黨派的地位問題，當前的政治問題，軍隊的安插問題，我們希望由一個總方案，作一次公開的總解決，我們不贊成抽出任何一點作零星的解決，更不贊成秘密的解決。實言之，我們主張黨派地位合法化，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三者同時實現。

第三、我們希望國共兩方確認中國四萬萬五千萬老百姓，全世界愛護中國的一切友邦，都真心期待在戰勝敵人以後，中國會以一箇和平統一而現代國家姿態在國際舞台出現，國內將

只有民主的競賽，決不會有武裝的衝突。

第四、我們希望這個問題在戰爭未結束以前，必須求得一個徹底的解決，有人主張把這個問題拖到戰後去了，我們要指出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其危險性可以貽誤國家。

我們以一種比較超然的態度，深信依據上舉四點的原則，一經公平的，合理的，各方面都過得去的具體辦法，是不難產生的。仇莫大於國仇，痛莫大於亡國，國民對於這件事的焦灼，已漸感不能忍耐；友邦對於我們的責難，也大抵以這件事為中心；以時放之，我們認為已實在到了應該解決的時候了！

最近由國民參政會推出了一個五人的延安視察團，我們對這件事很贊成，也很重視，並且期待他們五位能得着他們應有的成功，但我們不希望因此一行而把問題解決的時機，又多出一個太長時間的延宕。

(二) 關於身體自由

本年七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公佈了一個「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並規定於八月一日起實行。從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起，中華民國主人的身體自由，已由中華民國政府，予以法令的保障了。

這件事我們從法的觀點看，就我所知道的，覺得至少有兩種現行法的條文，值得我們注意。其一為「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其一為「刑事訴訟法」。約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云：「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同條第二項

規定云：「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八條，則更有較詳的規定。（參看本期陳一清君一文）假定承認約法和刑事訴訟法完全有效，則人民的身體自由，早應有了保障，這次新定的「辦法」，豈不近於蛇足？如果新定的「辦法」與約法及刑事訴訟法又顯有出入，則豈不更有以命令變更法律之嫌？有人說：這次所定的「辦法」，本來不是法律，只是一種政治意義，將用以濟法律之窮。果然如此，則以往非法逮捕，久經拘禁，并未加以審判的若干人民，便應無條件的予以釋放，然而我們却又沒有看見政府以最大的決心對這件事予以迅速的處理。以法律論則「辦法」近於多餘；以政治意義論，又生不出大作用；且前且却，措置失宜，我們實在看不出政府用意的所在。

（三）聽取葛利士先生之言

美國地學專家葛利士先生，在本年的五月，發表了「一個美國朋友給中國的一封信」，我們老早就聽見說，可是一直到現在才讀了他的全文，我讀過一遍再讀一遍，引起了無限的感慨。我們的哲人對於交友之道曾定下一個原則：「友直，友諒，有多聞。」我覺得葛利士先生真當得起一位直諒多聞的朋友稱號而無愧。

原來葛利士先生和中國的關係，已有二十年的歷史，記得當他初到中國在上海滬江大學任地質學教授的時候（一九二三）我不知在那裏看見他一張照片，他還是那樣年青，現在却已經是近五十的人了。最近他由美國國家科學院等機關派

來中國講學，曾在各大學循環講演，曾在我國九省的地方旅行，憑着他自己銳利的觀察，又與各方面的中外人士多所接觸，所以他對中國前途的一些看法，實在是「言之有物」。

他在這封信裏，談到目前對日的戰爭，談到中國戰後建設，他提醒了我們在對外關係上應該注意之點，同時對我們的政府和教育也給了不少的批評和建議。

關於目前的戰爭，葛利士先生的持論非常謹慎，他承認日本初期的勝利，已使她取得了「地理上的優勢。」他覺得把敵人從長城以南的各省驅逐出去，應該是中國軍隊的責任，而勝利的到來，必須在中國軍隊將全部海岸線收復的一年以後。

他對目前中國軍隊的質素，表示不滿，他主張「要以有訓練有智識的軍隊來代替不識字的苦力。」因此他覺得即有一部分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為民主與統一而犧牲其生命，也還是值得。他說：「現在絕非停止行動而相持戰爭快將結束的時期，反之此時正為利用美國援助加緊作戰的最好時機。」

葛利士先生相信這一次的世界大戰，是兩種相反的理想鬥爭，單是中美兩國的軍隊到達了東京的市街，還不算戰爭真正的結束，一定要使日本人感到我們民主的生活方式實在比他們原有生活方式為優，才算是戰爭真正結束。

關於戰後建設，葛利士先生首先談到鐵道的恢復與新建，他認為公路與水運僅其次要，主要的商業仍須倚賴鐵路的運輸。其次重工業，他說：「中國煤藏豐富，缺乏鐵產」，他希望戰後最十年中，中國能有三個或四個特殊的重工業中心區，至少每一區均有自產之煤鐵。第三農業，他認定「中國仍將永為農業國家」。他以地理學者的眼光不感到「中國絕少有新的土地，可供較經濟的耕種」。他覺得人口過剩為中國最嚴重的問題。

題背後一個最大的困難。他認定「復興農村乃為健康中國之鎖鑰。」第四為出口貨之生產。他覺得中國在戰後需要大宗的進口貨，中國的外匯必將消耗殆盡。假如中國的鐵道和工廠不能有良好的管理，而所負的外債又過於巨大，則外國或將要求調查監督。他說：「中國需要外資，必須於管理方面準備接受外國合夥公司之制度」。他總結這一段，特別強調「中國需要大量的社會組織與國民自由」，由這種自由發為公民的愛國心，而這種愛國心非形式主義命令所能保持，乃與自由批評與參加政治之程度成正比例。

關於對外關係的一方面，葛利士先生似乎認定世界上并沒有一個真能自給自足的國家，今後唯一的出路只有國際合作。物質的方面是如此，精神的方面還是如此。因此他覺得關於貸款與商業投資，中國不必先存戒心，他要中國人記着：「美國許多鐵道均由外資建築，并且一部分由外國管理幾十年。」他希望中國繼續歡迎西方的學者與教士，也同樣盼望中國能派遣文化的傳譯者到外國，以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於此他有幾句最精粹的話：「中國人抄襲吾人任何事物時，我熱忱盼望，在選擇時，須要了解吾人生活之整體，中國應勿重鑄日本之大錯：日本抄襲西方之科學與專門技術，而未體會西方的民主政治，古代文學與精神生活。」

對於中國的政府，葛利士先生給了若干直率的批評；我不願重加伸述，因為我深信政府已在開始考慮改善，即令仍有少數保守的分子我相信不出半年他們也將大體的改變過來，中國這個民族的最大優點，便是不適於真正頑固派的存在。葛利士先生憂慮中國或將不免重演內戰，他乃大聲疾呼的提出警告：「中國不能再發生內戰……內戰只有為中國民生帶來悲劇，只

有戰後重建工作耽延十年，且將喪失外國對中國積累多年的友誼，並且可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戰！」這與我們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在這一段最後的結論說：「中國人民需要言論與出版的自由，需要無特務機關檢查的自由，人民要能公開的批評政府……對於人身自由要少加干涉，應提高教育程度，並成立代議政治。此則需要勇氣，尤其需要勇氣相信人民有權統治自己，人民應學習統治自己。更要有勇氣堅信人民重於國家，人性高於一切！」這與我們二十年來所說的更是完全一樣。

葛利士先生曾在中國任大學教授多年，他所提出對中國教育的意見，也以大學為限，並且更值得寶貴。他說：「大學為自由之保障」，所以他說：「大學必須自由，學術自由不特是恬退的學者，應有的權利，也是一切進步的原素。德國的著名大學當其教授們被命令何者應教何者不應教的時候，就失掉了他們的重要性。政黨的主張在學位的取得上并無位置，僅可作為比較研究的例證，一個真正的大學，乃為全人類的共同福利而存在，絕非用作宣傳與布置」。『編制與標準，祇有摧毀人類的創造能力。一般次等的教師與學校，如能有自由講學研究的機會，則必能發展彼等創造的觀念，實較一般嚴守功令，與標準化的教師與大學為佳。』他更說：「學生應學習為自己而思想，不僅以服從一種模型為能事。」

葛利士先生懂得若干私立大學甚至中學之改為國立，這決不是中國教育前途的一件好事，所以他強調私立大學應該予以鼓勵與維護。他說：「中國今日之最嚴重者，無過於優良的私立大學日趨減少。他認為中國「戰後設計，必須仍令多數大學由省政府或私人管理。」他感到中國優良教師的缺乏，因此他仍贊成中國歡迎外國學者來華講學並主持研究機構。他認派遣

留學生，仍為中國目前不可少之事。他對中外交換學生甚感興趣，他說：「中外交換學生應當獲得多方面之協助，惟必須自由，不指定學科與控制思想，並且不受任何方面檢查制度之拘束。」

葛利士先生又強調中國教育的需要應該是多方面的：他說：「一個巨大的機械工程發生困難，可以求助於外國專家，但若政府發生重要的政治問題，則中國必須產生其自己之政治家。我相信中國最大的需要不是技術，而是德行，忠心與勇氣。」

萬竹樓隨筆（十二）

舜生

湘綺先生生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卒民國五年丙辰（1916），得八十有五，身歷道、咸、同、光、宣，以迄民國，所經世變之繁，與所接觸人物之多，近世殆罕其匹。先生之長子代功所述「湘綺府君年譜」六卷，於先生出處之年，遊覽之迹，交遊之盛況，著述之始末，言之極詳。展讀一過，於過去百年間學風之遞嬗，人物之消長，社會之變遷，可窺見其梗概。其餘述湖南當時各方情況，余讀之尤覺親切有味。

年譜中有三處述及湘綺與梁任公之關係，頗可注意：

一、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正月，湘綺留杭州，（時年六十二）時云：「十二日，梁卓如來訪，論公法及時事，有出位之言，語以不忘名利者必非愛國，尚未及以思不出位也……余前者知任公曾於庚子歸國有所策動，然不知其曾至杭州，且曾於杭州與湘綺討論時事也。」

二、民國元年十一月，湘綺至長沙，（時年八十一）時云：「長沙來遊初教二，自上海歸湘來謁，國民黨領袖也，初教敬愛之，繼言民國新設吏治必須府君受其教訓，大要言清室三百年事，今人已多不知之，且清室金後，盛衰有別，證據分明，而東洋錄及言滿清掌故諸書，皆未言及，今值絕續之交，幸遇三長之才，及時不圖，後悔無及矣。」

三、民國三年，湘綺在北京，時云：「七月朔日，蔡松坡歸來，論徒民黨遺，議尚可行，令其條陳各事，以備采覽。」此二三兩節，可見宋蔡兩先生對國事從大處着眼，與當時一般以官為業者固自不同也。

中國工程師已在艱難中創立鉅業，將來必更能發展。惟中國是否解決其政治問題，乃較為基本與令人焦慮之事實。」他又說：「改革社會實較改良物質需要更多的智慧與耐心。推而言之即政治學者與社會工作者更較物理學家與專家與專門技術人員為基本。」因此他認中國「派遣學生出國，應使研究人文科學與應用科學相等。」關於這些意見，我們可以說與葛利士先生完全共鳴。

征途百里中之最後十里

張君勳

兩千年前兵家有言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語驟聞之下，大覺無理。既曰百里，五十即爲得半之數，今以開始時百分之九十爲前半，又以最後百分之十爲後半，豈非最後百分之十，即等於前之百分之九十，其不合於數目之邏輯，爲人所共見。然離數字而論心理，此語之中，自含精義。蓋人之長途跋涉，或創辦事業，始也精神抖擻，以爲達於其預定之目的地，初非難事，及至中途，或覺疲勞，或覺困難，乃有始勤終惰，而廢然返者，因此後一段途程上所費之精神，遠過於開始時之大半，因其疲乏之後，體力與心力已竭，苟欲勉強支持，在其最後一段路途之努力，必須數倍於其欣然就道之際。換言之，最後十里之堅持力，不下於以前之九十里，此則行百里者半九十者之言，乃本於尋常生活中有始無終之現象，所以勉人以不可忽視其行程上或事業上最後一階段之意也。

本此原則以論吾國之抗戰，則此時戰事已達於最後五分鐘，吾之所以奮飭內部以爲最後持久之計者宜何如乎。當七七與八一三開戰之始，吾獨以一國之力，抵抗強敵，各國之調停者皆開九國會議於北京，然皆淡焉置之而已。及歐戰既開，美猶堅守中立法案，蘇聯亦以置身局外爲幸，及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向蘇宣戰，同年十二月日本向英美挑釁，而後聯合國與軸心國對峙之局乃形成，而吾國亦處於得道多助之地位矣。飛機大炮，由美助之，黃金物資，由美助之，糧食作戰之軍隊，由美訓練之，其指揮之將領，由美人任之，乃至後方兵興將之教練，亦由美國代謀之，美人之爲我分勞爲我犧牲者，可謂至矣。

太平洋戰事之初期，英美盡失其遠東根據地，吾人如飢如渴以待者幾及一年之久，今美海空軍已反守爲攻，由瓜島所羅門羣島而馬紹爾，又由馬紹爾而塞班而小笠原，因此引起東條內閣之辭職，其繼任之小磯首相亦且自認曰：「帝國已遭遇空前嚴重困難」。在此形勢之下，但須美國海空軍攻之於東，而吾國陸軍反攻於西，則日人之盡失其佔地而退處於扶桑三島，自爲意計中事，此所謂勝利在望者一也。

更觀之歐洲，第二戰場自六月登陸後，先聲同海灘根據地，繼古克恩與瑟堡，其後呈膠着狀態者約一月。聯軍乃變更路線，開始其大迂迴戰略，除令英軍在克恩擋住正面敵人外，美軍西向以攻加列塔尼，由古丹斯而聖馬羅而勒恩而拉登而勒蒙，同時又分一支兵力以古布萊斯特與聖那最爾。此種戰法之最大影響，無過於克恩附近沉寂狀況之打破，不爲正面之敵所阻，反得由巴黎之西南方以攻入法之中部，則巴黎之陷落，殆不遠矣。然歐洲戰局之至可喜者，莫過於東線上蘇聯之進攻。蘇軍進攻之路可分爲三大線，第一，由立陶宛及白俄羅斯以入東普魯士爲北線，第二，由華沙至柏林爲中線，第三沿喀爾巴阡山前進者爲南線。而每一大線之中，又分爲若干支線，如攻東普魯士之一大線，又分爲三小線，則蘇軍在東線上各路兵力之強，可以想見。然不論蘇軍所注重者爲何線，其圍包圍德國之兵力而殲滅之一也。蘇軍自北中兩路入者，將會師柏林，其自南路入者，將穿過捷克與奧大利，或與意境盟軍會合，亦未可知。試問德人處此局勢之中，即抵擋一面之敵，猶虞不足，矧

乎其爲三面夾攻乎。此所謂勝利在望者二也。

雖在此勝利實現之先，尙有一極大之難關。敵之小磯內閣既已宣佈其貫徹作戰加強作戰之方針，既不敢南下與美爭衡海上，又不敢北向與蘇聯爲敵，其在遠東最弱之一環之吾國，自爲日本必攻之地，一見之於豫，再見之於湘，或且及於桂與滇，此後不獨陪都與東南各省之聯絡中斷，粵漢路以東空軍基地盡失，而吾之主力軍傷亡之後，疲憊不堪，將何以執行其奪取武漢，收回閩粵，與夫與陸美軍相銜接之計劃乎。吾國軍隊中之緬甸遠征軍與其堅守衡陽者之與城共存亡，自爲吾國史上光榮之一頁，然其他多數部隊，因供應之不善，逃亡散失，缺額不可勝計，亦有就食民間，而民有怨聲，是則戰事全局，雖有盟友可以依賴，而國內行政上應自丁日改良之事，猶多多也。

軍政云者，不過各種行政中之一端，軍費支出多少，財政問題也，兵士伙食之足不足，視乎糧食之有無，雖屬於農業，亦財政問題也，被服之暖不暖，視乎棉花之多寡，與紡織業之發達與否，此爲經濟部之事，亦財政問題也，前方軍隊之運輸，賴乎交通便利，然交通之便利與否，視乎設備之有無，雖屬於交通行政，亦財政問題也，病傷兵士之療治，視乎醫藥，雖屬衛生署與軍醫之事，亦財政問題也，以上各項除預算中直接支出之軍費爲財政問題，爲盡人所共見外，其他若農業，經濟，交通與醫政之所管轄，無一不需經費，即無一不需款項，因其款項多寡，定其設施廣狹，而其所以輔助軍隊者亦因之而定。是知財政一項，實爲一切行政之樞紐，而軍事自在其中，故財政不得其當，欲求良好之行政，良好之軍隊，不可得也。

國家一切大政，軍政，兵工，糧政，農政，國營工業，交

通，與夫醫政以及其他各院部會，無一不賴乎核定之預算與其法幣之價值，幣值日降，即各院部會之收入日少，以云維持尙且不給，更何論乎發展，此各種衙署之敷衍度日，即行政之萎靡不振，軍隊給養不足聽之矣，兵工業雖依賴租借物品，而國內自給之道，置之不問矣，鐵路建設停止矣，國營工業收縮矣，學校之師生生活不能維持，追論專心攻讀與有所發明。簡單言之，因惟一財源之法幣之貶價，一切行政失其平衡，雖欲維持平日之效率而不可得矣。

七八年財政貨幣政策之影響於民生者何如。其在第一時期，工商界未嘗不因通貨之多，而呈一時蓬勃之象，然因政府方面對於民間生產事業未嘗爲之通盤籌劃，故始之勃然者，不一二年而呈衰落之象。國內日製鋼鐵，由兵工業銷納者幾何，民用者幾何，政府曾否有何計劃。煤炭爲動力之源，一方面爲政府事業之用，一方面爲民間工廠與日常生活之用，政府曾否有何計劃。以云紡織業，各廠所織之布，歸政府收買，但收買之價不足償其生產之費，致廠家哭笑不得。其他小工業之倒閉者，或因原料缺乏，或因工價高漲，或因國貨物滯銷，要歸於不景氣而已。吾國自開戰以來，早爲被封鎖之國，始爲部分的封鎖者，繼而爲全部的封鎖，非政府爲民間之農工商，預爲估計其產額多少，銷售多少，原料供給如何，則民間事業決無生存之望，然政府但知爲自身之收入計，不爲民間產業計，故工商業界除囤積居奇外，除投機外，除購貯美金公債外，除爭購黃金外，不敢從事於正當之工商業，尤不敢投資於工業，試問人民無實業可經營，少數人安從而謀利，多數人安從而得衣食，民富消耗以盡，則國富所賴以積者安在乎？

凡此所云云，自軍政以至於工商，在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中

，各人豈不能本其經驗，以爲進言之資，無奈數年以來，人民之思慮，從未滲透入於行政之中，在政府方面曰，我何嘗不召集國民參政會，又何嘗不召開生產會議，我豈不怠從諫如流，無如忠告善道之不可多得。然在人民方面言之，倘政府去其成見，去其入主出奴之心，示人以虛心採納之雅量，示天下以用人一秉選賢與能之原則，不私於一黨一派，而謂國事之叢脞如今日者，吾未之敢信焉。何也，古人有言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誠知國事之不可憑一二人之意見以爲治，固應周諮博訪以察見輿論之從違也。政治爲全國人民生活之所繫，因所利而行，因所害而去，由民意之中，自知其興廢之何在，而政府用人之當否。亦可因此覘之。各事聽諸輿論，贊否兩方，直陳無隱，集衆人之長，以決疑定計，既可盡情發揮，自可參照前後互相照顧，即當局偶有遺忘，自必有人加以糾正，則其負責執行之責者，亦自可免於政策之前後反覆，試問近年以來之政令，美金公債忽賣忽停，後之止是，則前之賣非，一也，糖專賣政策忽行忽止，後之止是，則前之行非，二也，憲政期成會忽集會忽解散，今又以憲政實施爲國策，倘昔日稍加忍耐，何必阻之於先，而行之於後，三也，凡此舉措，始也皆出於少數人之忽喜忽戚忽愛忽憎，以云集合衆人冷靜頭腦之思考，參以揣案之利害比較，與夫深思遠慮者以先覺之見謀之於事先，則渺乎其不可多得矣。故吾人可以明言之者，政治不謀之於衆，不公開討論，其無改良之望，可斷言焉。

所謂政治公開云者其道多矣，有關於行政方面者，有關於民意機關者，行政之原則曰設官分職，既有職務，斯設機關，

有機關斯有權限，其權限屬部長者，不應由他機關以亂之，其權限屬次長司科長者，不應由長官以亂之，今也有機關而無所事事者，斯得謂爲機關乎？有爲一機關之長官而不得行使其職權者，斯得謂爲部長乎？有本爲某部某司之事，而以潛移默化手段移諸他處，而原司與其司中之人員不廢，其所司者果爲何事乎？凡此事務不依原定官制嚴格執行，而另以枝節橫生之法爲之脫胎換形，如此而期庶政之井井有條不可得也。行政機關與職權之所以不至凌亂者，必須有監督之機關。譬之機關之設不設，依議會中之預算討論定之，斯機關無由亂設，其有機關而無所事事，或名爲有權而實由他機關代行之弊去矣。行政機關之成績，須向議會報告，經議會批評，則有機關而無所事事，或名爲有事而實無事之弊又去矣。行政機關之設置與權限，依議會議決之法律爲根據，則其章則條文不容少數人之操縱，斯機關紊亂之弊又去矣。如此言之，行政組織決之於少數人者，未有不亂者也，依民主國之法治軌道行之，未有不治者也。居今日而言改革軍政，改革財政與其他庶政，舍公開民主而外，又安有他道哉。

國人其念之哉，吾國之抗戰，由獨力撐持，一躍以進於四強之林，然在敵軍退出以前，吾國所負之主要任務，曰準備齊全，以圖反攻而已。所以準備之者，第一曰訓練士飽馬騰之隊伍，第二曰堅守現有陣地，以待美國砲火之輸入；第三曰保守現陣地，以期兵源不至枯竭，物資不至減少，第四曰守現陣地，則東南之轟炸日本基地不至喪失；第五曰沿粵漢線與此線東西之人民不至流離失所，而國內之痛苦不至益深益烈；第六曰他日美軍在海上登陸，吾與之聯絡較易。凡此云者，所以明軍事上之現狀維持，自爲理勢之當然。反是者，吾之後退過甚，

雖其結果之有資於我者，亦未必即有利於日，日之南洋各基地，因海軍實力之懸殊，行且得而復失，日本之小笠原，台灣與其本土，早在飛機航程之內，其海軍且被迫而作戰，日本本土之存亡正未可知，此小機所以認為空前嚴重之形勢也。然日人正惟以冀求生之不得，乃移其對美之憤怒，以洩之於我國之身，豫也海也桂也，將一一占領之以為快。以云吾國處於戰局最後之一幕，自必堅持到底，以待勝利之來臨，然在此日人洩憤之日，吾國應有抵禦之策，以保疆土，以維持吾國在四強中之面目。倘日人前進而我退守，則失地益多，反攻益難，雖陸地作戰之義務，我猶不能盡，惟一切以依賴外人為事，是戰局愈拖長，失地恢復愈延期，不獨為吾之大不利，而盟國之中其何能無怨言乎。吾人熟思再四，以為處此形勢之下，惟有政治上之大革新，方足以減少痛苦，提早勝利。試取緬甸遠征軍與吾內地前線兵士以相比較，此兩種軍隊其為中國人同也，所以一勝一敗者，遠征軍之裝備勝於內地一也，衣食豐足二也，飛機掩護三也，此三事之中，裝備一時未能運到，自難與之並駕，飛機於上空之保護，美空軍已早實行，獨有供應一項，則為吾之內政問題，涉及種種行政，軍餉不足，財政問題也，幣價大

貶，財政問題也，衣著破爛，軍需問題也，逃亡衆多，兵役與陸軍經理問題也，作戰地之居民，積怨於軍隊之就食，乃於敵兵之來，不肯互相協助，則軍政與民政之關係，與各省行政問題也，各地之駐兵，久不移調，其長官耽於晏安，其士兵習為偷惰，則用人問題也，凡此諸項誠加以整頓，即微現代裝備之輸入，其所表現以出者，自將遠勝於今日，否則即有重武器之來，所以勝人者僅得視為倖勝，不足為真勝，良由政治之根本上不清明，而要求軍隊能作戰，要求及早勝利，猶源之既濁而求流之清，其可得乎。

目前之戰事問題，非純軍事性質問題，而實為政治問題。當局認清病源，以求其療治之藥石，庶幾潛伏之病既去，而國家之力量有以表現於外，而不然者，如第一次大戰中之俄國，其盟國雖勝，乃其自身竟不得列席和會，否則如意大利率為五強之一，然其發言權不為人所重視，以致缺席。當局既以堅定不移之決心，主持七八年來之抗戰大計，可謂已渡過歷史之大難關，豈不能於戰事結束之日，燭照全局，刷新政治，一新天下耳目，振作全國士氣，危局藉此挽回，吾國在國際間之地位，從此牢固不拔。此則方今四萬萬人所同引領以望者也。

萬竹樓筆隨

(十二)

舜生

民國十六年五月三日之濟南慘案，以戰地政務委員有交涉員蔡公時死事為最烈，蓋日人先用蘇彈將蔡捆綁，剷去其眼鼻，然後將其鎗殺也。蔡字癡公，能詩，其生年余不能詳，望知其人者能有以見示。茲錄其遺詩一首，蔡君風度固可因以窺見一斑也。詩曰：「黃沙白浪水連天，一別滄江十五年，薄霧遠籠雙岸柳，歸鴻寒帶六朝煙。久離桑梓翻為客，老倦風塵始問田，磊落匡時應笑我，飄零未暇買山錢。」

民主憲政的規模問題

陳啓天

政治規模與政治效率

世間最大的消耗，除戰爭外，莫過於政治。古今中外，不知已有多少人才，多少精力，多少金錢，多少器物，以及多少時間為政治問題所消耗。要減少政治的消耗，自須注意政治效率。

關於政治效率問題，不僅限於行政效率一項，應將全盤政治都包括在內。單講行政效率，決不能使全盤政治均有效率。如何而後可使全盤政治均有效率？依我看來，必須從確立政治規模入手。

何謂政治規模？簡單的說，便是一種有體系的政治制度；詳細的說，便是運用政治權力的一種確定的正常的系統辦法。運用政治權力的正常的系統，辦法不確定，即不能稱為政治制度，更不能算有政治規模。有了政治規模以後，始能促進政治效率。所以雖在從前的君主政治時代，也要講求「開國規模」。所謂開國規模，即是每一朝代於開國初年所確立的一種政治制度系統。這種開國規模確立得好，便可使國運昌盛，久享太平。否則難免變亂紛紜，興亡不定了。因此我國史家多非常注意每一朝代的開國規模。

關於政治規模，古今中外，式樣甚多，本篇不能詳論。但大要說來，不外兩種：一為專制的政治規模，二為民主的政治規模。這兩種政治規模，究以何種較能增進政治效率呢？有些人們以為最能增進政治效率的規模，莫如專制。這種說法的最大證據，是專制政治的權力集中，便於運用自如。不過我們要

知道運用自如的集中權力，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多須經過長期的慘烈的內部鬥爭，始可勉強得到。長期的慘烈的內部鬥爭，難免訴之內戰內亂。內戰與內亂，是最大的政治消耗。要求增進政治效率，自不可再取徑於內戰與內亂。進一步說，凡用內戰方法爭得的集中權力，往往發生兩種不好的現象：一為一把抓的現象，二為政出多門的現象。所謂一把抓，即是一切事權，由一手盡量抓，而不大注意規模與法治。假令一國的全部政治事權，能由一把抓，雖不成為一種政治規模，亦未必毫無一點政治效率。無如國家的事件太多，一把抓決抓不了，也抓不好。結果，名為一把抓，而實不只一把抓。換句話說，自政治的上層以至基層，層層都是一把抓，層層都抓不了，也抓不好。既然如此，一把抓的方法，何能產生什麼政治效率？在層層一把抓的現象之下，必同時發生政出多門的現象。所謂政出多門，不是政治學上所謂分權，而是同一政事既可由這個機關決定，又可由那個機關決定，既可由甲種勢力決定，又可由乙種勢力決定，令人無所適從。這個機關是一門，那個機關又是一門。甲種勢力是一門，乙種勢力又是一門。所以可以統稱為多門。如果政治上的多門，都是公開的，正式的，已足破壞統一，不成規模，決不能增進政治效率。況且在多門政治之下，最有勢力的門，常常不是公門，而是私門；不是正門，而是後門。這即所謂「幕後勢力」。在表面上，幕前勢力最大，而在實際上則幕後勢力最大。因為幕前勢力，尚須有所不為，而幕後勢力則無所不為。幕後勢力雖在冥冥中破壞了幕前勢力

，而幕前勢力也無可奈何他。幕後勢力既有超越幕前勢力的大權，自可作福作威，從心所欲，不怕越矩了。結果，使得好人相戒不談國事，以求免禍；而壞人則趨之若鶩，以求得利。如此推演下去，則好人消亡，壞人猖狂，勢必國破家亡而後已，還談什麼政治規模與政治效率。明代的幕後勢力是東廠西廠，其聲勢的煊赫可謂空前，然卒因之招至亡國破家的慘禍，便是一個例證。

再進一步說，一切專制政治，雖也可勉強建立一種規模，但無論如何，總難免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流弊。所謂形式主義，是說政治只求在公事上過得去，而不求實際做得好。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可以在公事上過得去，這是形式主義的慣例。由此可知專制政治的效率最小，縱有，也多是形式的，而不是實際的。形式主義，又常與官僚主義同時存在於專制政治之下。何謂官僚主義？是指一種官僚專用途徑，敷衍圓滑和排場的方法，以求達到個人升官，發財的目的。這樣的一種官僚主義，在中國起源甚早，流毒最深。近三四十年来，雖因種種原因，稍稍有所改變！然其游魂依然存在，足以影響政治效率。至於新專制政治，除仍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流弊外，又加上黨派主義與專利主義的流弊，則更難有政治效率。此為人人皆知之專，不待贅說。

更進一步說，任何專制政治，縱令有相當規模，並能產生若干效率，然其結局多難免引起革命。革命一起，則一切化為烏有，何能使政治效率繼續存在？這又是一個大消耗。專制政治在未建立以前，須經過內戰的消耗，不能說有政治效率。既建立之後，又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黨派主義與專利主義所腐化，也難有政治效率。腐化至極，繼之以革命，更難有政治

效率。由上看來，可知專制的政治規模，決不是增進政治效率的最好辦法。然而還有少數人偏信專制可以增進政治效率的真實原因，不在客觀的證據，而在主觀的心理。一般人的心理，多半喜歡痛快方便和威風。只有專制政治，才易於發揮這種心理，所以他使人執迷不悟。不過少數人的痛快方便和威風，必然引起多數人的不痛快、不方便、和不威風。結果造成革命，少數人也不能再有痛快、方便、和威風了。

專制的政治規模，既不是增進政治效率的好辦法，那末我們要求政治效率，自不得不注意與專制相反的政治規模。與專制相反的政治規模，已為各國實行的，現在只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求國家長治久安的惟一政治規模。在民主的政治規模之下，取得政權不要靠內戰，改組政府，也不要靠革命。全國的人民，對於政治問題，均可在法治軌道以內，公平競賽，互相監督。因此國內能常在一種和平狀態之下，向前進步。從表面上看來，民主的政治規模，好像不如專制強有力，而實比專制更有力。因為專制的力，大多表現在少數人的痛快、方便與威風之上。而民主的力，則表現在國家對外問題的一致團結之上。在專制國家，當權者與反對派對於外交問題常持相反的意見，不能一致，甚至有反對派溝通敵國，以企圖推翻當權者。但在民主國家，則此類事件極不多見。對外一致，當然比對外不一政更有力，所以說民主專制更有力。民主比專制更有力，我曾在他篇詳論，此篇不再多說。民主比專制更有力，則增進政治效率的最好辦法，當然要推民主的政治規模了。

何以見得民主政治規模，是增進政治效率的最好辦法呢？這只須再說明兩點，便可深信不疑。第一、民主政治對於人的問題，須完全依民意而進退。能得民意擁護的人始能當權，否

則，雖已當權，也不得不下台。因此在民主政治下改組政府的方法，不經革命，也能得到合於民意的當權者。但在專制政治下，當權者雖極不滿於民意，以有武力保鏢，也可一好官我自爲之。人民欲求改換人員，或改組政府，除革命外，便無辦法。可知民主政治對於人的進退問題以及政府的改組問題，比專制政治有較好的辦法。第二、民主政治對於事的問題，又須完全依民意而改進。如果政事不依民意改進，則既有輿論監督，又有議會監督，任何人也不能再戀棧了。但在專制政治下，不許有輿論，也不許有議會，當權者欲如何便如何，雖勵精圖治也不能有好效果，何況獨拍不能成聲呢？又可知民主政治對於政事的改進問題，比較專制政治更有辦法。民主政治既對於人的進退問題與事的改進問題比較有辦法，那我們欲增進政治效率，惟有確立民主的政治規模而已。

關於民主的政治規模，世界各國雖不全同，但有兩個要點，均須遵守着：第一個要點，是規模要單純；第二個要點，是權責要分明。所謂規模要單純，是說民主的規模，不宜夾有專制的成分，更不宜民主其名，專制其實。民主其名，專制其實，即中山先生所反對的「民主專制」，詳見中國革命史。「民主專制」是在民主名義之下，實行專制，既不成爲一種民主的規模，又不成爲一種專制的規模。用民主的名義，以實行專制，這無異自己反對自己，何能成爲一種規模？要實行專制，不妨單純用專制的規模。要實行民主，便須單純用民主的規模。既專制，又要民主，這是一種自己矛盾。自己矛盾，便難於立信，便難於確立任何政治制度，使其成爲一種正常的規模。這一要點，如果被忽略，不僅民主的規模無由確立，即國家的事業亦難成功。所以各處創建民主規模的政治家，必確切

遵守這一要點。

第一要點，所以確定政治規模的性質或趨向。政治規模的性質不確定，則一切陷於混亂，無從清理了。所以這一要點，是談民主政治者所首宜注意的。政治規模的性質，既確定爲民主以後，便須進而注意第二要點，即權責要分明。在專制政治之下，所最注重的問題，是如何使政治上的權責集中，而不大注意到權責分明的問題。雖然有些時候，又有些人們談專制政治下的權責分明問題，然爲一把抓與政出多門的現象所壓倒，不易收效。只有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使權責真正分明，而易於收效。民主政治所用以使權責分明的辦法，大要不外確定政治規模的系統，使每一機關各有一定的權，同時又各有一定的責，不得越權，也不得委責。此類確定權責，使其分明的辦法，各民主國家雖不盡同，然以下各項則均須完全做到，才能完成一種民主的政治規模，試分節說明之。

(一)公事與私事的分明——政治是與國家以及人民有關的公事，決不可與個人的私事混同，致公私不分，這本是一切從政者首須遵守的一種政治道德。不過我國的政治積習，有的人將公事當做私事，又有的人將私事當做公事，更有的人以公事爲幌子，而以私事爲骨子，弄得公私完全混淆不清。結果，私事固可因之大得便利，而公事却爲之完全敗壞。例如從前專制時代的皇帝，多以國家爲私產，人民爲臣妾，政事爲王事，便是將公事當私事。皇帝尙且以公事當私事，則官吏自然仿效。不過官吏雖以公事爲私事，則與王事衝突。皇帝爲防止官吏以公事爲私事，不得不定出許多官規來。官規雖定得很嚴，而官吏仍有法子使公事變成私事，甚至以私事爲公事，這便是所謂「辦公事」。因此公事愈辦愈壞，倒不如少辦爲佳。所以從

前我國儒家和道家都提倡「無為而治」。國家果真能無為而治嗎？當然沒有那回事。不過是帝以及一般官吏的有為，多為私，多是公私不分，自以為好。無為尚可少擾民，有為則害政猛於虎，民不聊生了。這是從前儒家和道家所以主張無為的一個重要理由。但是現代政治必須有為，而不能無為。要有為得好，則首領公事與私事分明。公事歸公事，私事歸私事，不得彼此混淆。如何而後始可使公事與私事分明？第一個要緊的方法，是實行財政公開；第二個要緊的方法，是實行用人公開。政治上最易使人公私不分的事，莫過於與金錢及用人有關的問題。實行財政公開，則不惟「取於民有制」，而且公款，亦均須用之於公事。所謂財政公開，既要對內公開，又要對外公開。對內公開，所以使內部平服。對外公開，所以求人民信賴。如果一個官吏能將與他有關係的財政對內並對外公開，必定在金錢上比較公私分明，而是一個好官吏。如果一個政府能將財政對內並對外公開，也必定在金錢上比較公私分明，而是一個好政府。不過金錢能迷人，又能通神，要一個官吏或一個政府，自動公開財政更不多見。民主政治保證財政公開計，不得不規定各級政府必須將預算決算按年交同級民意機關決議，政府只可照民意機關的決議收支款項。我們可以說，預算決算不經民意機關決議，便非財政公開。財政不公開，便非民主政治。所以民主的政治規模，必須有經過民意機關決議的預算決算，即必須財政公開。財政一經公開，則可使公事與私事能有一半的分明。還有一半，須待用人公開以後始能分明。所謂用人公開，是說有權用人的官吏，須依照法律規定的公開辦法用人，只求人與事相稱，而不問有無私關係。如此，則所用的人，必多是公人，即真能辦所任公事的人，而不是朋比為好的私

人。在官場的積習上，一個機關的總務，庶務等人員，多半是主管的私人。這類私人常有兩重任務，一是為機關辦公事，二是為長官辦私事，致公事與私事完全無分。要使公事與私事分明，必須不許官吏任用私人。換句話說，即須實行用人公開。用人不公開，便是私，便是假公濟私，非民主政治所可容許。要實行用人公開，只有實行健全的文官制度。所謂健全的文官制度，即普通行政人員的任用，須先經過公開的考試，既經任用以後，按其成績考核並獎懲，不與長官同進退，亦不得以長官好惡為進退。如此，則自長官以至一切屬員，都以機關為共同的中心，並都以公事為共同的目的，既可減少人事的糾紛，又可不因少數人員的進退，而影響公事的繼續進行。

以上所說財政公開與用人公開的兩種制度，是使公事與私事完全分明的必要方法，即是民主政治規模所萬不可缺少的兩種制度。我們要建立民主的政治規模，首須實行此兩種制度。

(二) 政府與黨派的分明——政府是國家的必要機關，而黨派則是運用政治，尤其是運用民主政治的必要團體。民主政治，是人民政治，也是多數政治。如何而後可使人民構成多數意見？自不得不有賴於黨派的指導與組織。這是民主政治所以需要黨派組織的一個重要理由。民主政治既需要黨派，那末黨派與政府的關係如何而後始能建立一種民主的政治規模呢？要正確解答這個問題，須先將黨派與政府的關係之各種方式略一說明。關於黨派與政府的關係，大要不外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為黨派超於政府，而構成一種太上政府。第二種方式，為黨派同於政府，而構成一種雙重政府。第三種方式，為黨派隸於政府，黨派可有多個，同隸於一個政府，而政府却只有一個，不可一個黨派即有一個政府。政府一及第二種方式之下，

黨派與政府的關係完全混同，不是黨權高於政權，便是黨權與政權衝突。黨權高於政權，則自然只許一國一黨，構成一種黨主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了。黨權與政權衝突，也只許一國一黨，企圖建立一種黨主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至於第三方式，則政府與黨派的關係完全分明，只有民主政治才採用之；也只有採用第三方式，才可稱為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為保證黨派與政府的關係分明，必須實行以下兩種制度：一為機會等的多黨制，二為超黨派的文官制度。所謂多黨制度，是說一國之內，同時容有兩三個以上黨派存在的制度。此兩三個以上的黨派，無論在任何方面，尤其在政治方面，都應享有均等的機會。甲黨可以經過民衆選舉，輿論以及議會等途徑，以影響政治。乙黨、丙黨等也可以經過民衆選舉，輿論以至議會等途徑，以影響政治。但無論那一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不可由一黨壟斷，而使其他黨不得過問；更不可使一黨與政府完全混同，而使其他黨不得生存。如果在理論上，或在事實上，只許一黨存在，便非多黨制度。政治規模是否為民主的，只看是否實行多黨制度，即可斷定。實行多黨制度，便是民主；否則便非民主。這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常識，也是民主規模的一個要點。反對民主的人，自然忽略這一個要點。但贊成民主的人，却不可缺乏這一種常識。如果缺乏這一種常識，則恐使民主運動陷於歧途，而中道夭折了。在多黨制度之下各黨派可以博取民意擁護的各種方法，以影響政治，並組織政府。但無論那一黨派均不可與政府混同。少數黨固然在政府之外，監督政府黨，與政府完全分明，且不必說。即多數黨也不過是暫時執政，民意一有變化，便須改組政府，不得永久壟斷政權。因此多數黨雖可稱為政府黨，却不可稱政府。換句話說，多數黨也與政府有

別。有時候，甲黨可為多數黨組織政府。又有時候，乙黨或丙黨也可為多數黨組織政府。此之謂各黨派依民意而輪流執政。在各黨派輪流執政和互相監督的多黨制度之下，黨派與政府的關係始可分明。所以民主的政治規模，必須實行機會均等的多黨制度。

在民主政治之下，一國黨派以多數執政以後，有時難免利用政權，位置黨員，擴張黨勢，而成為一種分贓制度（spoils politics）。所謂分贓制度，並是一種法定的制度，而是在事實上每一當權的黨派，將政權當做黨爭的勝利品，而以政府中的大小位置，分配給同黨黨員，不同原有人員如何。我國古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這種制度則是一黨政府「一黨官」。甲黨組織政府，全是甲黨一黨的官。乙黨或丙黨組織政府，又全改為乙黨或丙黨一黨的官。如此，不僅增加政府內部的紛擾，減少政治效率，並使黨派與政府的關係循環陷於混淆而不已。要矯正這種制度的種種流弊，只有一個辦法，即是確切實行超黨派的文官制度。關於文官制度，是公開用人的必要方法，上節已經說過。本節須特別說明的，是文官須超黨派。在多黨制度下，政務官隨黨派而進退，以問政治責任，是可以的，甚至必要的。不過一般文官，即事務官，也隨黨派關係而進退，則流弊太多。宜將一般文官超出黨派關係之外，而予以法律的保障。無論何黨執政，異黨皆得任事務官，不得以黨派不同加以歧異的待遇，也不得以黨派不同予以撤換，更不得以黨派不同或無黨派而強迫其入黨。強迫入黨，是摧毀人格，敗壞道德，惡化黨派，並腐化政治的壞辦法，也是反民主政治的辦法。要確立民主的政治規模，便不宜採用此種反民主的辦法。換句話說，即實行超黨派的文官制度，使黨派與政府見於分明。

。不然，則今天甲黨執政來一個黨化，明天乙黨或丙黨執政又另來一個黨化，循環黨化不已，還成什麼政治規模？還有什麼政治效率？這點關係非常重要，我們不可以爲司空見慣，而不從速加以改正。

(三) 民意與官意的分明——在專制的政治規模之下，只許有官意，不許有民意。我國先哲雖有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說法，但官意並不能如此以民意爲依歸。因爲官以爲是治民者，有其本身的利害，不能完全與民同好惡。勤求民隱，以求下情稍能上達，便算是天字第一號的好官。可惜這樣的好官，在歷史上，或實際上並不多見。近代政治有鑑於此，乃設法保障官意不得不以民意爲依歸，使民之所好官不得不好之，民之所惡官不得不惡之，而成爲一種民意政治，這即所謂民主政治。在民主的政治規模之下，首須承認人民主權最高無上，次須承認以人民意見支配一切政治。既承認人民有最高無上的主權，則人民至少必須能選舉代表，組織議會以監督政府。議會是民意機關，而政府則是官意機關。此兩機關必須分別設立，而各有相當的權力，始能使民意與官意分明。又民意機關所包含的民意，應有兩種：一爲多數意見，即多數黨的意見；二爲少數意見，而少數黨的意見。議會中的多數黨，多與政府一氣。故欲求民意與官意分明，必須尊重議會中少數黨的地位與意見。如議會中沒有少數黨，或雖有少數黨，而只是一種點綴，則少數黨毫無地位，不能發揮少數黨對於民意的特殊功用。一般人多以爲民主政治既是多數政治，則多數黨即爲多數人民意見所寄，似可爲所欲爲了。不過多數黨組織政府以後，是否確實依照民意而行，則全賴議會中有無少數黨隨時批評政治監督政府。這一點

是民意的一種保障，也是民主的一種象徵。無此保障與象徵，則議會必成爲有名無實，而使民意與官意完全無分了。所以民主規模下的議會，必須有少數黨隨時批評政治，監督政府。如果少數黨不隨時批評政治，監督政府，則是自行放棄少數黨應盡的義務；如果多數黨不尊重少數黨的批評與監督，則是剝奪少數黨應有的權利，均非民主政治所宜有。有些人們以爲讓少數黨得在議會中批評政治，監督政府，不是政府自惹麻煩嗎？誠然，少數黨的批評與監督，多少不免有點麻煩。不過，我們要知道民主政治原是有點小麻煩的一種政治；又要知道民主政治正賴有此類小麻煩，俾政治得隨時改進；更要知道民主政治是以此類小麻煩代替革命的大紛擾。如果怕小麻煩，不許議會中有少數黨，或使議會中的少數黨完全不能批評政治，監督政府，則是宣告議會無民意，政府非民主，政治何由改進？結果，溫和的反對黨因失望而趨於消沉；而激烈的反對黨，反樂於有此反民主的現象，以便擴大革命聲勢。這不是我故作危言，而有清季至現在各時期中各激烈黨派對於當權者所取的態度，可資證明。我們可以說如果政府不許民意機關中有溫和的反對黨得用和平的方法批評政治，監督政府，便是助長激烈的反對黨從事革命，並予以革命的口實。這同我國古話所謂「爲淵驅魚，爲叢驅爵」。政府黨的本意，原怕反對黨趨於革命。而其所用的方法，即使反對黨不能用嚴厲手段批評政治監督政府的方法，却又是怕反對派不革命，豈非一種「詭使」嗎？要免於詭使，必須設法使民意與官意分明。而使民意與官意分明的方法，則須容許並尊重反對黨在議會中的批評與監督。在議會中，有反對黨批評政治，監督政府，是使民意與官意分明的必要條件，即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却不是具足條件

。要使民意與官意確實分明，尚須容許反對黨得用輿論機關，一面指導民意，一面監督政府，以養成健全的輿論。反對黨的意見，雖不一定等於民意，但反對黨也可代表一部分的民意，並對多數黨常是站在民意辯護人的地位，所以多有利於人民，而較合於民意。多數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固須博得民意。但既經掌握政權以後，每易為黨利而忘却民意。要使政府黨不以黨利而完全忘却民意，須讓反對黨得用輿論機關，隨時為民意辯護。如果不許反對黨設立言論機關，或雖設立而不許其自由言論，則民意無人辯護，如何能使政府黨確依民意施政呢？所以反對黨的自由言論，又是使民意與官意分明的一個必要條件。缺乏此必要條件，則反對黨既無由博取民意，又無由辯護民意，如何能使民主政治成為民意政治呢？反對黨與民意的關係如此重要，所以使民意與官意分明的惟一辦法，即須容許反對黨得用和平的手段，在議會內外，公開活動，自由批評而已。

自民主政治出現於世以來，無論何人，都知民意在政治上的重要；也無論何種政體，都要找尋一點民意的根據。民主政治固須完全以民意為依歸，且不必說。即一切非民主政治，也不能完全離開民意而存在。例如拿破崙稱帝要假借國民投票，袁世凱稱帝要假借國民代表大會擁戴，希特勒獨裁，要假借國會授權等，都是想用民主政治的方法做敲門磚，以便另行一種非民主政治。我們由此類事例，可知民主政治下的民意，必須經常存在，不可以當做敲門磚，致成為一種假民意，而實不過是官意。又例如非民主政治過渡到民主政治的時期，多難免有種種假民意出現。或以官意偽造民意，或以官意冒充民意，均有民意之名，而無民意之實。換句話說，任何假民意，都仍是官意，並非民意。以官意為民意，無論何種花樣，均足使民意

與官意不分明。要使民意與官意分明，必須不以官意為民意。如何而後始能不以官意為民意呢？最要緊的事，要始終用民意來批評政治，監督政府。在民主政治下，固然可用民意來擁護政府或授權政府，但仍須用民意來批評政治，並監督政府。如民意只可擁護授權，而不能批評監督，則不成其為民意，而非民主的規模了。

有些人以為政治上的批評監督，可由政府自行為之，或專設官治機關掌之，不必假手於民意機關與輿論機關，以免牽制。這種說法，只重官意而輕民意，不合於民主政治，且不必說。我們所必須一說的，是這種說法決難收到政治批評與監督的實際成效。官官相護，是我國官場的積習。只以官批評官，只以官監督官，自難免官官相為的流弊。要減少此流弊，除以官監督外，仍須以民監督，以民意監督官意，以議會及輿論監督政府。這種監督方法，或稱為「民主監督」。民主監督，不惟是確立民主規模的必要制度，而且是增進政治效率的特效方法。我們談民主政治，固不可忽略民主監督；我們談政治效率，更不可忽略民主監督。如果忽略民主監督，雖多設許多官治監督機關及考核機關，也只能問問小官小事，有何大用呢！政治上最要緊的監督，是對於大官大事的監督。欲對於大官大事實行監督，則非有以民意為後盾的議會與輿論不可。人們多笑監督機關只會打蚊子蒼蠅，而不知大於蚊子蒼蠅的官和事，只有民意機關方能監督。民主政治，必須有民主的監督方法，他種方法，決難有大效。

（四）政治與軍事的分明——從廣義說，政治可包含軍事。從狹義說，則政治與軍事有別，不可混同。何以見得政治與軍事有別呢？這可從幾方面加以說明。先從對象方面說，政

的對象是人民，而軍事的對象則是敵國。如誤以人民當做軍事的對象，則足以妨害政治，尤其妨害民主政治。又如誤以敵國當做政治的對象，則足以貽誤軍事，尤其貽誤對敵作戰。故政治與軍事的對象必須分明。再從組織方面說，政治的組織比較散佈，只可用憲法加以規定。軍事的組織，如軍隊，比較嚴密，可以軍法加以部勒。如以軍法部勒政治組織，則必做不通。如以憲法治理軍政，則必治不好。此即司馬法所謂「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政治與軍事的組織又必須分明。再從內部關係說，政治的內部關係，比較複雜，既有命令與服從的關係，又有批評與商討的關係；既有權力的關係，又有自由的關係。軍事的內部關係，則比較單簡，只有命令與服從的一種關係。故軍人以服從為第一義。只要能服從，便可算好軍人。但是一個好公民，除服從外，還要能批評政治，並監督政府。軍事上的權力關係，只有自上而下的一種。政治上的權力關係，以主權在民故，又有自下而上的一種。此自下而上的主權，又應勝過自上而下的任何權力。如以軍事的內部關係，看待政治，則政治變成軍事，不成其為政治。又如以政治的內部關係，看待軍事，則軍事變成政治，不成其為軍事。所以政治與軍事的內部關係又必須分明。再從政治與軍事的手段說，政治所必要的手段，是公開手段與和平手段。而軍事所必要的手段，則是秘密手段與暴力手段。如以秘密手段與暴力手段用於政治問題，則必使政爭變成內戰，不足以言政治。又如以公開手段與和平手段用於對敵作戰，則必覆軍殺將，不足以言軍事。所以政治與軍事的手段，又必須分明。最後從政治與軍事所要求的精神說，軍事最需要旺盛的攻擊精神，以貫徹戰勝主義。而政治則最需要公道

的協調精神，使各方面能相安。如以軍事精神應用於政治，以攻擊異己，殲滅異己，則異己太多，豈能盡乎？如以政治精神應用於作戰，以和緩敵軍，驅離敵人，則是養寇自重，豈足法乎？所以政治與軍事的精神，更必須分明。

由上說來，可知政治與軍事在各方面都應該分明。然在實際上往往為一種說法與一種作法所混淆，不可不加以辯正。所謂一種說法，即指武力萬能說。相信此說的人，誤以為只要有武力，便一切有辦法；又誤以為軍事重於政治，而政治須受軍事的控制。武力對於對外國防，誠然相當重要，不可不相當講求。但若因此誤信武力萬能，對外可以橫掃世界，對內可以控制政治，便不免是一種法西斯或軍閥的幻想，不但足以禍國，而且足以自誤。政治原是全體國事的總樞紐，軍事不過是廣義政治的一部分。這種道理我曾另篇詳說，不必再贅。正常的政治，必須控制軍事而不為軍事所控制。我們兵經孫子，懂得此理，故開宗明義，即是示修明政治的一途，「而主張政治應先於軍事。德國兵學家克勞塞維茲也懂得此理，故在他的名著戰爭論上說明軍事只是政治的延長，而主張軍事應隸屬於政治，軍事家應聽命於政治家。第一次歐洲大戰以前德國所以能建立優良的軍事傳統者，克氏的說法，深入一般軍人心中，不為無功。到第一次大戰後，魯登道夫始倡反調，在他所做的全體戰爭當中，極力鼓吹軍事應控制政治，以助長法西斯的恐怖政治。希特勒因此得一時橫行於國內外，而結果必遭慘敗，並使德國陷於萬劫不復。故武力萬能說，及軍事控制政治的說法，咸事不足，壞事有餘，無論何人不可再誤信。如再誤信，不僅使軍事與政治混同，而且使人只知有軍事而不知有政治，或只知以軍事的辦法來處理政治，那是多麼誤事。

所謂一種做法，即指以現役軍人兼理政治職務的辦法。這種辦法，是否合宜，須加以詳細考察。我們在上面曾經說明政治與軍事應分明，可知政治與軍事的本質不同，更可知政治與軍事所要求的人才也不同。軍事的本質，多危險與變化。因此軍事所要求的人才，要有威嚴與沉勇，並能機密與應變。無威嚴，則不能統軍。無沉勇，則不能作戰。不能機密，則易遭戰敗。不能應變，則不能制勝。而政治的本質，則較軍事稍少危險與變化。因此政治所要求的人才，不重在威嚴，沉勇，機密與應變，而重在明大體，多公開，與重實踐。不明大體，則不能涵蓋全國一切，而使其其循法治的軌道。不多公開，則是示人以私，而不能以國事公之人民。不重實踐，則不能以實際成績博得國人的信賴。政治家貴能說服，而軍事家則貴能獨斷。政治家有時須能辯，而軍事家則切忌多言。政治家須能以正治國，一不得對於政治問題守秘密，而軍事家則可以以奇用兵。一對於軍事問題須守秘密。軍事家可對敵國用間，而政治家則不可以人民為敵，而亦用間。政治家以思想遇到為貴，而軍事家則以腦筋複雜為貴。這兩類人才，一般人多不能兼備於一身。文武兼資的天才家，雖可以軍事家而兼政治家，或以政治家而兼軍事家，但古今中外，究不多見。我們固希望有文武兼資的天才家，却只可遇而不可求。我們固希望有文武兼資的天才家能主持中央的政治與軍事，却難希望一般軍人都是文武兼資的天才，而能兼領軍權與地方政治。因為一般軍人的訓練與習慣，原不是為政治之用。又因為一般軍人的本務，是軍事而不是政治。如果強令軍人兼理方面的政治與軍事，則恐用意雖是愛護軍人，而結果反變成摧毀軍人。因為軍人一兼文職，則本務的軍事既勢必荒廢，而兼理的政治又難免外行。甚至以治

兵的方法來治民，以作戰的方法來施政，這成什麼政治。凡夫皆有所長，亦皆有所短。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又皆有限。一個人只宜專任一事，尤其只宜專任一個人所習的一事，不可同時兼任多職，尤其不可兼任素所不習的政治職務。這條原則，應該適用於一切官吏，軍人自不可成例外。如果軍人願意任政治職務，也未始絕對不可，然必須在辭去軍職以後，乃可免於濫職誤事，且可防一武力政治的滋生。

以上已將易於混淆政治與軍事的一種說法及一種做法分別辯正，茲此當再一說保證政治與軍事分明的必要方法。依我看來，保證政治與軍事分明的必要方法，莫如建立健全的國防制度。所謂健全的國防制度，應包含以下幾種要件：一，軍人教育應着重軍事的專業訓練，使其能成為一個優良軍人，樂於作戰，而恥於干政，不以為能為榮，而以忘本為辱。軍人的本務既是軍事，自宜集中精力以爲之，不可多涉他事，致忘本務，而不成爲一個軍人。有了不忘本務，而樂於作戰的優良軍人，然後才能漸次養成優良軍人精神與軍事傳統。這是健全國防制度之人的要件，或精神的要件，首宜注意及之。

第二、須確定文武分職，實行軍民分治。文武如不分職，則多文不成文，武不成武。雖或美其名曰一文武合一，而實際不像，現代國家的文官須有一點軍事常識，武官須有一點政治常識，是一事；而文官可否兼武職，武官可否兼文職，又非一事，不可混爲一談。如以稍具軍事常識的文官兼任武職，不免令人譁笑。如無政治常識的武官，而兼任文職，也不可令，譁笑嗎？但一般人對文官兼武職，則期期以爲不可。而對武官兼文職，則多視為當然。這是一種既敗壞軍事，又敗壞政治的心理，宜確定文武分職以矯正之。健全的國防制度，除確定之

武分職外，尚須同時厲行軍民分治。軍民分治制度，在君主政治時代已屬必要，故我國秦始皇時即已創建起來。到現代民主政治時代，則軍民政治的必要，當更甚於從前。不過我國自清季以來，已漸釀成各地方軍民合治的現象。此種現象，延續至今，尚未能完全改正。這不僅使軍事無法上軌道，也使政治無法上軌道；不僅足以釀成割據，也足以敗壞地方。因為一個軍人，既有軍權，又有政權，便可橫行一方，而莫敢誰何。有些熱心統一的人，常注意此種現象，而思所以改正之。然通常所用的方法，多不過是以親信的軍人代替原有的軍人，而仍兼理地方政權與軍權。一旦時移勢易以後，仍難免重演割據的現象。故用力雖多，也未必能為國家建立長治久安的政治規模。我們以為欲長治久安，必須實行軍民分治制度。欲實行軍政分治制度，須就中央勢力所能及的地方，首先樹立模範，然後漸次推及全國，此種模範一經確立，則輿論易於歸心，而法令亦易於推行。宜從戰時起，自擇地示範，以求能於戰後四五年內完成全國各省的軍政分治。如不即今開始示範，則恐至戰後全國各地或不幸演成割據之局，將更無辦法實行了。

第三、全國軍隊須一律編為國防軍，分駐國防地區，平時受政府的指揮與監督，戰時受統帥的指揮與監督。此項國防軍，只僅以保障對外國防，為惟一任務，不得用於對內作戰。為求國防軍的統一起見，無論何人，不得在國防軍內作派系活動；無論何黨派，亦不得以國防軍為從事黨爭的工具。國防軍的系統必須完整，然後始能保障國防。如為黨派或私人所分裂，勢必時時有引起內戰的危險。故軍人最好是無黨無派，超出政爭旋渦以外，而只以效忠國家為惟一目的。如已有黨派關係，必須不再在國防軍內作黨派活動，以免增加糾紛。我們要知

全國不只一黨，各黨各求擁有黨軍，而以忠黨為先務，則那里能十分愛國呢？那里真知道國家至上呢？那里能建立國防軍呢？要建立國防軍，必須超黨派，即必須一切軍隊國家化。至各地方保安部隊，雖可不在此國防軍以內，但為數必須有定制，而其調度權亦須屬於地方行政長官，不得由軍人自由行動。軍隊無其循的軌道，則軍事無規模。軍事無規模，則對外足以削弱國防，對內足以擾亂政治。故建立完整的國防軍，不僅是健全國防制度的一個要件，而且是民主政治規模的一個要件。

第四、一切中央軍事機關，須統屬於一個政府統系之內，不得超出於政府之上，似一太上政府；亦不得獨立於整個政府統系之外，而別成一政府，致一國有雙重政府；亦不得在整個政府系統之內，使軍事機關居於優越的特殊地位，致政府的其他機關完全無權。我們知道政治需要相當程度的統一，要求統一起來。最先從中央政府本身統一起。如何而使中央政府始能行統一起來？最基本的要件，自然需要政府是整個的一個政府；而不是分出多門的多重政府。要使政府不變為多重，則首須將軍事機關好好安排在整個政府統系之內，如果軍事機關超出政府統系之上，則必演成太上政府，致政府反居於次要的地位，自不能算是正常的統一。如果軍事機關獨立於政府統系以外，似另一政府，彼此爭權，互相衝突，自不能算是統一。如果軍事機關雖在政府統系之內，而居於特殊優越的地位，則其他政府機關必變成附庸，也不能算是好的統一。通常所說狹義的政府，多半指行政機關而言。軍事機關宜在整個行政機關統系之內，才能完成健全的政治規模；也只有在此整個行政機關之內，並與其他機關居於平等的地位，才能建立健全的國防制度。不過還有兩點，須加以補說。以上所說統一政府辦法，是就平時

制立論。至於戰時，自可於政府統系之外，設立統帥機關，如大本營或軍事委員會之類，但其權力仍須受政府的節制，以免釀成多重政府。這是一點。還有一點，則為軍事的參謀機關與訓練機關，如參謀本部及訓練總監部，可直隸於國家元首，不受政潮的影響，但仍須兼受政府的監督，以保持統一。

總之，統一的政府，必須是一重政府，而不是多重政府。在一重政府之下，始能建立健全的國防制度，以保證政治與軍事的分明。只有政治與軍事分明，才能建立民主的政治規模，並增進實際的政治效率。

(五)司法與行政的分明——司法須與行政分明，是自有民主憲政以來的一個根本原則。要確實保障人權，必須遵守此原則。要完成民主政治，亦必須遵守此原則。要樹立法律成權，更必須遵守此原則。如何而後始能遵守此原則？最通常，最要緊的辦法，只有實行司法獨立制度。所謂司法獨立制度，是將司法機關，即法院，獨立設置於行政機關之外，由有法律特則保障的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司法案件，行政機關不得加以絲毫干涉的一種制度。此種制度，我國自清季開始仿行以來，雖稍有成效，但其根基，迄未鞏固，究其原因，不外後述四端：第一是司法與行政不分的傳統習慣。我國曾經實行君主專制已兩千餘年。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無論大小官，幾乎都有司法權而兼行政權。這種司法與行政集權的傳統習慣，尙遺留到現在。有些行政機關，可依據法令，公然兼理司法案件。有些行政機關雖無法令根據，也自由處理司法案件。又有些行政機關，利用權勢，干涉法院的審判。凡此種種，司空見慣，行政機關既不以為不法，而司法機關也真可如何！這是由於傳統習慣打壞了司法獨立制度。

第二，是軍紀的不飭與軍法的濫用。中國結語說：一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這是我國從前一般人對於軍紀的印象。近數十年來，雖軍紀日有進步，但尙難免有少數不肖分子，以為一握槍在手，便可肆行無忌。國家本為整飭軍紀，設有軍法。不過軍法並不能完全適用於軍人，而軍人或反利用軍法來制我非軍人，致破壞了司法的獨立。非軍人也受軍國審判，非軍法案件也由軍法法庭管理，普通法院不得過問。或以為不如此，便不能便宜行事，而不知人權保障與司法獨立，均因之破壞了。這是由於不飾軍紀與濫用軍法，而打壞了司法獨立制度。

第三，是黨派活動侵入法院，使法官失去公正的態度。法官欲保持獨立審判，必須能保持公正的態度。行政機關與軍事機關的干涉，固足使法官失去公正的態度，而黨派活動侵入法院，尤足使法官失去公正的態度。在任何一黨派勢力控制下的法院，決難依法審理不利於該黨派的案件。對於任何一黨派的法官，也極難依法審理不利於該黨派的案件。所以欲保持獨立審判，必須法院與法官超出於黨派活動以外。但是近年的事實，却不盡如此，這更不是司法獨立制度因黨派活動而大受打擊嗎？

第四，是任意秘密逮捕拘禁，並處罰人民的秘密機關。一個國家如用秘密機關來專門對付敵國敵軍，則古今中外有行之者，此可存而不論。但如用秘密機關來對人民，而可任其秘密逮捕拘禁，並處罰，則不惟推翻了司法獨立制度，而且也不成為一種政治規模。民主的政治規模，以一切公開為原則。即法院審判，亦以公開為原則。而今秘密機關，則以一切秘密為原則，是顯然與民主的政治規模相違了。所以真正實行民主政治

的國家，不可設立任意逮捕拘禁並處罰人民的秘密機關，或秘密法庭。以秘密法庭對內，只能造亂，不能求治。故欲求治，必須不用秘密法庭來對付人民。

我們明白了阻礙司法獨立制度的重大原因以後，便可知欲恢復並完成司法獨立制度，必須嚴格實行以下幾種辦法：（一）從速完成法院組織，專理司法案件，絕對禁止行政機關受理或干涉司法案件。（二）軍法須嚴格適用於軍人，非軍人及非軍法案件，軍事法庭不得受理，須統歸普通法院管轄。（三）法院以內應限制任何黨派活動，已有黨籍的法官，對於同黨黨員的案件應實行迴避。（四）不得設有秘密法庭，或類似秘密法庭的機關，以秘密處罰人民及有政治關係的人民。（五）嚴格實行提審制度，凡無意或有意擅捕誤捕，或逮捕不依法定手續，或逮捕後不依法定期限提審，均應詳定處罪辦法，並許受害人得依法提出損害賠償。（六）嚴格實行法官保障制度。以上六種辦法，如能完全實行，自可完成司法獨立制度，足以保

萬竹樓隨筆（十四）

舜生

湘綺以民國三年應袁召至北京，任清史館館長，袁於其去京之前，則連電促行，詞旨謙抑，及其既至，則亦泛泛視之，此於是年十一月湘綺至漢口所作別袁一書可見，書云：「前上啓事，未承鈞諭，緣設立史館，本意收集館員，以備咨訪，乃承賜以月俸，遂成利達，按時支領，又不時待，紛紛問索，遂至以印領抵借券，不勝其辱，是以陳情辭職，非畏避事也。到館後日食加於家食，身體日健，方頗鴻施，若欲停止兩月經費，得回餘金，實廣夏一區，幸諸員共聽教令，方為廉雅。若此市道，開日斷生，若叔孫通知不如，豈不為天下笑乎。前擬將印暫存夏內史處，又嫌以外干內，因暫送敝門人楊度家，恭候詢問，必能代陳委曲，聞運於小吏前由漢口還湘，待終廬下，奉啓申謝，無任悚愧。」

障司法與行政分明了。不然，便不足稱為民主的政治規模。

總說起來，一切政治，以確定規模為先務。政治規模確定了，然後始易於增進政治效率；否則便難於增進政治效率。欲確定一種政治規模，又須先行分別專制與民主。專制有專制的規模，民主有民主的規模，不可混雜。今後中國的政治規模，必須為民主的政治規模，已為確定的趨向，不容我們再有所遷移。我們要確定民主的政治規模，第一須實行財政公開與用人公開，使公事與私事分明；第二須實行多黨制度與超黨派的文官制度，使政府與黨派分明；第三須實行議會制度與輿論制度，使官意與民意分明；第四須實行健全的國防制度，使政治與軍事分明；第五須實行健全的司法獨立制度，使司法與行政分明。以上五項，雖不足以盡民主政治的內容，然一切民主的政治規模，則不可缺少一項。我們可以說，以上五項，是一切民主政治規模共有的基本要件，所以本篇特別提出來加以說明。

王 之 反 對 黨

論英國之政黨政治

十八世紀政論家孟德斯鳩論英憲成功之原因，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分立，互為制衡，互相牽制，政府之權力以分，無可肆虐，而人民之權利以保，不虞侵犯，此論不確，久已為人否認。英之立法行政二權，在昔固曾一度分離，今已合而為一，集於內閣之手，效能大增，而未嘗有專制之虞，今日所僅存之制衡，惟於政府黨外，常有一反對黨之存在，國內從者以千百萬計，議員隸屬此黨者，以數十百計，而有其正式之發言人為之領袖，勢力與政府相埒，政府而措置失當，其勢力且甚易超過政府，隨時可以取而代之。故真正足以制衡在朝之內閣者，不在孟氏所謂之三權分立，而在有一在野之預備內閣。反對黨與政府黨之對峙，實英憲主要精神之所在。

此之謂政黨政治。政黨之一名詞，世人早熟聞之矣，自有民主政治以來，即有政黨政治，亦可謂唯有政黨政治，民主政治始能運用，二者已結不解之緣。蒲萊士(P. M. Taylor)有言：「在自由之大國，政黨不可或無，如其無之，代議政治將不知如何運用」。蓋政黨之作用，在使政見相同之人，在以協力以持其主張，而使之實現，可以共同維持其所提之候選人，而使之獲選。蒲萊士所謂「彼等對於千百萬之投票人之混然者，所以條理而整齊之」是也，故政黨復有組織與教育民衆之作用，而其作用之尤要者，在使政府隨時受有力與有組織之批評監督。政黨最先出現於英國，除一黨專政之德義諸國之所謂政黨，非吾人

之所謂政黨者外，亦惟在英，政黨之地位最見重要。英憲之精要所在，為閣員之向衆院負責，易辭言之，亦即責任內閣制是也。政黨制與內閣制同時產生，亦可謂有政黨制始可以有內閣制，苟無政黨，國會中將無可恃之力量，以為內閣後盾，使之安於其位，反之亦將無可畏之力量，以為內閣牽制，使之慎於職守。有團結一致且足代表多數之在朝黨，內閣始能握持大權，放手辦事，亦唯另有一勢均力敵地醜德齊之反對黨，始能付內閣以大權，而不虞其無可制。人常謂內閣代表衆院，衆院代表全國，實則非也。內閣真能代表者不及衆院全體之三或之二，衆院真能代表者，不過全國人民之二或之一而有奇，有時且不及全國之半焉。人常謂內閣之使命，受之全民，殊不知全民之中常有將近半數之人，非但不願維護之，且日思有以推翻之也。然而二百五十年來，行之無弊，人民安之若素者何哉。一言以蔽之曰，少數黨有組織，有保障，然後多數黨有顧忌有節制。當政者熟知一部分人民噴有煩言常思祛之，少數黨虎視眈眈，常思代起，故能戰戰兢兢，不敢過為已甚，不敢不適時採取黨外之意見，以事調和折中。惟其如此，故黨與黨間，能相抵相讓，相生相勉，而制衡之功效易見，衆院之職責得盡。

所謂衆院之職責者何也。白芝浩(Whitehead)以為衆議院之職責有三。一曰表見民意，一曰教育民衆，一曰，使國人踴躍非此無由聽到之諸種議論。衆院藉責問及辯論政府之政策，以行

其職權。特有諸責難也，政府措施，無可逃人耳目，其有不當，立可暴之於衆。民主政體，建立於輿論之上，輿論稍有改變，民情稍有不滿，其起也忽微，而其終也可以於下次普選令國人別用一番人。見微知著，履霜堅冰，使政府不敢不慎，不敢稍怠。故英之國會雖號稱權力至高無上，英之內閣雖亦有權其權權過重者，然而未嘗敢濫用其權，倒行逆施者，蓋其權出自人民，而以輿情爲最終之歸趨焉。

雖然，輿論之爲物，不可捉摸，由何指示其方向，由何顯出其力量耶，則恃政黨。而所謂衆院之職責，亦惟待院內外有不同之政黨，始可以行之也。巴淦Ernest Barker嘗謂：「今英國之政治制度，可謂以五個P字築成之。輿論Public opinion，政黨Party，議會Parliament，論壇Platform，報紙Press，五字是也。此種制度，吾人名之曰民主政治，或代議政治。亦可稱之曰，角力式之論爭。政黨爲其角力之人，輿論爲其觀衆，而國會論壇報紙，乃其角力之場所也」。在朝黨與在野黨角逐於議場之中，其一擁護政府，其一反對政府，其一爲某種政策辯護，其一則抨擊此種政策。行政上苟有任何缺點，政策上苟有任何弱點，政府苟有任何過失，無不盡量揭發，立刻舉以示之國人，以待其判斷是非，行其最後黜陟之權。白芝浩所舉之衆院三種職權，由是得行。民意以各種不同之方法，經各種不同之方式表見之，蓋各有所見，不能僅有一種意見也。任何問題，均有正反二面，提出於國人之前，供其選擇，此種政治教育乃爲真切之教育。提出某種主張之人固有權要求實行其主張，而反對之者亦有權發言，而能必其言之得聞於衆，而不受阻遏也。反對黨要求政府公開陳述其政策，且公開發表其施行之結果，而國會者，從而強制政府以光明之態度，合理之言詞，爲己

辯護，同時亦復強制反對黨於消極批評之餘，提出積極之對策，苟衆議以爲可取也，其起而行之，付之實施。必如是，政黨間之鬥爭，始能遵循合於常軌，以和平之方法出之，以理智之態度行之，各有其約束，各有其責任。此說可於三方面證之，一爲反對黨領袖之地位，一爲政府黨與反對黨之關係，一爲反對政府之權力。

英國之內閣，出於歷史之長成，非由法律之創設，在昔相且無法律上之地位，反對黨領袖之地位亦然。自法律或衆院之規章視之，固無正式職責之可言，然而王之反對黨者，王之後備政府也，反對黨領袖者王之後備宰相也。反對黨領袖與當政之首相，分庭抗禮，在議場上各據一席，而面相對，各有其從者拱衛於後，張其聲勢。在衆院中首相與各部長各有其辦公室，而反對黨領袖亦有之。國王召開國會，反對黨領袖且與首相並肩往見焉。一九三七年國會制定之國務大臣法，重訂閣臣薪額外，且開創新例，與反對黨領袖年俸二千鎊，其重要庶可想見。驟視之，政府竟肯撥款國庫，酬其政敵，使日從事於批評，幾難令人置信。實則反對者爲民主政治之一必要部分，而反對黨者與政府本身之地位相若，同爲構成英國憲法之重要部分。若有有力之批評，始能有良好之政治。國家與反對黨領袖以厚俸，又何足異。抑自反對黨領袖，得享國家厚遇之一點上，更可見其責任之重大。此一席者，確自有其責任。蓋英憲假定，苟政府而隨時解職以去，另一政府隨時可由反對黨組成，以代替執政柄，不患無人接替，致陷國務於停頓。不負責任之反對，非民主政治之所欲有。反對黨固日以反對爲能事，然其反對有責任，政府果不勝其掣掣而去，應即能起而代之，與國人相見，爲積極之建樹。反對黨敢負此責任，亦願負此責任

，故縱其代起之希望尙屬渺茫，亦必從事限制政府行動之過當，喚起公眾對危險政策之批評，使政府務為合理之措施。

反對黨與政府黨為敵對之兩黨，相爭而不相得，然政府之與反對黨相處也，務尊重其地位，謀相互之協調。故在衆院之議事與立法，輒復見兩黨之相商與合作，其協調也，與其謂商得對方同意，而得政策上之妥協，毋寧謂商得對方同意，以安排議事之日程，定期在議場交綏，以作激烈之爭辯。衆院時間，由政府分配，每週議事日程，例由政府黨政府者 Government Party 先期擬訂，送經首相核准後，征徵反對黨同意，而由省相在衆院宣布。反對黨可以要求在某日辯論某案，政府在可能範圍以內，終謀有以如其所請，苟是日事冗，或適逢是案有關之主管部長無暇，亦可據實以告，與之另訂一日期。有時政府黨要求太過，盡攪衆院時間為己有，欲於短時間內，通過過多議案，致無時間，予反對黨以從容論辯之機，反對黨可以抗議，抗議無效，可以故意將演詞延長，或故意逐條反覆討論，不肯放過，以事阻撓，俾強政府讓步，或強政府接受其所提之若干修正案。又有時焉，反對黨對政府某種政策太不滿意，認為忍無可忍，必須予以譏彈，則可向政府要求，撥出一日，俾提不信任政府之案，政府亦必盡力為抽出時間，使能如期提出。此事看來，又似滑稽，不信任案者，將盡暴露政府之缺失，亦足損其威望，政府奈何肯為安排時間，甘受打擊。然既認反對黨為憲法中之一必要部分，有其合法之地位，有其應盡之職責，則遇事商量，接受其要求，使有充分發言之機會，又何難釋之可言。衆院之習慣與議事之法規，務在使政府黨與反對黨雙方意見之流行，俾各盡其本分。有一運用其權利，至於抹殺對方，則議會政治亦且隨之告終矣。此外，有關王室又外交國防之事，首相例必商之反對黨領袖，得其諒解，或取得協作，亦所以尊對方也。

但選舉反對，俾卒能逐去政府。老邱 Randolph Churchill (今首相邱吉爾之父)之言曰，「反對黨之能事為反對，而非擁護政府」。二者之言皆然，然已陳腐，反對黨真正之作用無此簡單。以政府黨在衆院之擁有多數，以黨紀之日益加嚴，反對黨欲於衆院內以辯論投票之結果，逐去政府，幾已為不可能之事。政府之倒祇能出於二途，不出於黨內分裂，即出於競選失敗。反對黨固望政府內部分裂，常謀有以激動其黨員，使來相從，然外侮之迫，益堅內部團結，政府黨知所以尊重黨內諸領袖之意見，容納黨內各派人之主張，鮮能望其真個分裂也。故反對黨祇能轉注其目光於下次普選，日謀動搖國人對政府之信仰，使能於改選時，轉變其態度。選民之態度，由來分為擁護與反對政府之兩大集團，雙方勢力幾於相等，反對黨雖以得票較少之故，屈居在野，然分析近五十年來投票之結果，朝黨野黨之起伏，常僅由於選民中有百分之十，或僅百分之七八，改換其意向，因而使然。以二百萬票之差，可以使當政者另換一批人，可見反對黨所當轉變者，微殊匪鉅，於普選中，擊敗政府，獲得政柄，並非難事。雙方既熟知此情，故其活動之對象，同為此若干羈移之選民，競欲博其歡心，不敢激其反感，因而競選之時，雙方政策皆力求溫和中庸，平易近人，原來守舊之黨可以忽變而為甚形進步，原來左傾之黨亦可以忽變而為甚形審慎，令人驚異。實際上，兩方之距離不遠，其差異，為程度之淺深，而非根本之懸殊。縱以工黨之出現，其主義政綱，似已與其他較舊之兩大政黨，為根本之抵牾，然其徒從非

畫出同一階級，而其活動之對象，亦為全體人民，而非限於，某一階級，故其主張未嘗過分激烈，其行動亦自出之權衡。信哉，哈爾德爵士 Sir William Harcourt 之言曰，「吾真非智社實主義者，然多為自由思想者。」任何黨派苟欲取得政權，其言行便不能過於偏激，英之民族性實使之然也。

反對黨之目的，既在鼓勵轉移之選民，並不如鐵石之言，奢望在衆院立即推倒政府，惟望此轉移之選民，於下屆普選時，能傾向之。故在議場中，反對黨所能盡力者，為暴露政府之弱點，減損其在國人前之威望，政府知其用意所在也，亦惟盡力有以自衛，有以自見。茲事之進行，匪僅在議場辯論之中，雙方可以在報章論戰，可以在講壇相訐，重以無線電之發明，大英廣播公司，雖為政府機關，各黨皆可利用播音以動國人。其結果，為不斷之各種政治宣傳，任何問題正反兩方面之意見，選民皆能聽到，可以各盡理智，有所抉擇，謂之政黨領導與論也可，謂之輿論領導政黨，亦無不可。輿論稍有轉變，政府無不為迅速之適應。是可見若英之政黨政治者，政府雖能卒如其願，以行其夙昔之主張，然反對黨之存在，保護少數派意見之見，有其正當發洩之途徑。反對黨之作用，豈僅在攻擊政府而已哉，實強使政府不得不隨輿論之趨向，改正其態度與政策。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反對黨之批評，實為政府政策之一端，而密繫之於國內輿論之他一端。反對黨於求獲選民之維持也，實強政府置其政策於國人公意之上而毋違。兩黨固對峙，然其權，同出於一源，故國以國人為競爭之對象，以國人為最終之裁判，而國人貴矣，此之謂民主，此之謂民主政治。

二、

責任內閣制，藉政黨制而運行，抑苟求其運行順利，需藏有兩大政黨，而勿過之。必須如蒲萊士所謂「此兩大黨者，力足以互相對抗，但必有其一，力又足以在衆院獨佔優勢，而後可也。」為力量集中，責任顯明計，當權之政黨，應力足以獨任國事之重，不必乞援於他黨，反之，一旦去職，其為之繼者，亦應獨力肩荷鉅難，而不虞踟躕。由是言之，國應祇有兩黨，始能勢力相若，更迭柄政，亦始能必有其一在衆院獲佔大多數之議席。一國而分成過多之黨派，議席分散，將無一勢力能單獨組閣，結果所屆，各黨聯合組閣之下，必為政府之脆弱無能，政局之動盪不穩，豈但政策紛更無定，責任含混不清，人民投票亦將徬徨四顧，不知適從，若法國者，即其顯例。英雖未嘗無第三黨，然勢均力敵，足相抗衡者，始終祇兩大黨耳。

是為英國政黨政治成功之一因。而屬於制度上者，猶有更重要之原因，是為精神的因素。英國政黨相處，最足稱道者，為其有容。政黨間政見儘可刺謬，而能互相容忍。阿格〇爾稱英之政黨，愈願承認他黨同樣有存在之權利，亦同樣有出而極政之資格。陸威爾 Lowell 曰，「王之反對黨一名詞，實十九世紀英人對政治最偉大不朽之貢獻。此一名詞者，蓋認在野黨一樣忠於王室，隨時可令入主國政。……承認反對黨為合法團體。可由政治常軌奪政權，實為政黨政治成功之主要條件，亦即民主政治成功之主要條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曾言，「若政治信仰之類者，殊不必求其齊一，亦不當求其齊一，而宜許人作合法之競爭。大眾之情緒，應能容忍意見之紛歧，而不激動怒氣。民主政治若欲成功，若欲持久，則需要有容忍之精神，而無過多之憤恨，與過多之愛好強力。」英之政黨政治有焉。

有此精神，故政黨能和平相處，曾不難以強力攫奪政權，而願以合法手段解決紛歧。此種根據合法程序所作之政治討論，巴淦認為其影響所及，可以產生三種結果。第一產生折衷之方法。夫政治之爲物，本無絕對之真理，見仁見智，各有所據，惟折衷可以調和而糅合之亦惟折衷可以不盡抹殺對方之意見。第二產生平等合作之習慣，參加政治活動者，固可堅持其信念，而欲說服他人，恆能相從，然只堅持其信念至某種程度而不過之，苟多數意見以爲非也，亦必欣然服從。服從多數，雖未必謂多數所見必是，然「計算人頭非惟較訴諸武力省事，亦惟於計算人頭之頃，始知在任何討論場合中，武力並非最有效之工具，最有效者，乃在言論之力量。」巴淦謂之「計算人頭，而不打破人頭，」將此信服之力「深入人之腦際，而非打擊其外殼，」有味乎其言哉。第三以能折衷與合作也，故更能養成集體之運用心智。英國政黨經世代之黨爭，長成政治之習慣，促進黨內之紀律，訂定國會之章法，以供各黨之共守，集各黨各派於一堂，相與議論國事，制定決議案，是即集體之運用心智，而大有造於國家人民者也。故巴淦亦以爲「英國民族如對人類有所貢獻，則其貢獻即爲良好之自治政府制度」而此特容忍之美德以得之也。

惟英國政黨所以能互相容忍之原因，由於傳統之守法習慣者半，由於主義之根本契合者半。曷謂傳統之守法習慣。英國判例法與司法獨立之歷史，遠早於議會制度。遠在中世紀，即有巡迴法官調解法官及陪審制度之設。聽兩造之對質，而判斷其曲直，所判決，即爲前例，爲後此法官之所援據。法官由其來以公正著稱，爲人民所信服，人民間權利義務有衝突，可控制新辯論於法庭之前，以理由求直，不以強力求勝。法律制

度發達之結果，一爲養成人民守法之精神，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下人人低頭。二爲保護人民之權利，權利所在，必據理力爭，愛好自由之氣質由是養成。三爲保障訴訟兩造，各有其發言之機會，不能抹殺對方之一面之詞。四爲實愛古昔之法律及權利，凡國有變故，敵對之雙方，必就以前傳統遵守前例爲號召，取改革與前例而折衷之，其變動遂能不出之以激劇，而趨於穩健。國會成立以前，造法之權在法官，人民對國王之權利恃法官保護之，國會成立以後，國會遂爲最高法院，有最終判決之權，而人民之權利更多得一重保障。以國會誕生之初，原爲一司法機關，隨後演變而爲立法機關也。故其制定之法律，如其早年所作之司法裁判，有最終拘束之力，而昔日法院培育長成之守法習慣，亦遂與之俱來，爲代議士所共守，根據前例，根據習慣，根據一定之議事程序，作集體之政治討論。議士之地位有如法官，須憑理智，須依法律，定爭議之是非曲直，又如律師，須憑伸辯，須據事實，以期駁倒對方，而亦許對方作同樣之答辯。英國國會於開始組織之時，其議員多爲律師，及十六世紀之末，其議員多爲曾任調解法官者，皆具有法律之智識與經驗，故於作政治辯論之時，均具有出庭辯護及尊重對方之精神焉。

曷謂主義之根本契合。此中含義蓋有兩層，一爲各黨主義政策，祇爲程度上之差異，而不爲根本上之背離，一爲各黨不作階級意識之鬥爭。英國政黨之特點，爲反對黨儘有，而信仰行爲不反動，決非革命之黨。戴雪（Dicey）有言，「必差異甚異，始應有政黨之分，然其差異甚關重要，而不關根本，又必要之條件也。」夫「革命」與「不革命」之間，雖無顯著之界限可分，然政黨之活動，必限於輿論許可之範圍，其所爭執，當

不涉及生死之問題，則庶幾之。當法國大革命之狂潮中有一派政治家公然宣於衆曰，「秉政者當負責任，不勝任者死。」以生死科其責任，政權遞嬗，無和平可言矣。羅素有言，「惟社會各方面對政體有根本之契合，自由討論始爲可能之事，否則且用力以爭之矣。」英國二百五十年來，政黨相爭，未嘗訴之武力，蓋恃有此。自由黨與保守黨，差異甚異之兩大政黨也，然其差異，僅及政策方面而不及根本。舉凡根本制度，如政治上應保全王位及實行議會制度也，社會上尊重各階級已得之權利也，經濟上以資本主義爲基礎也，兩黨信守均相若也。故雖交互相起伏，雙方均能泰然相讓也。裴二福 Lord Balfour 所謂政黨角逐，雖互有勝負，「不對他方作要害之打擊」是也。自有工黨之起，浸浸取自由黨之地位而有之，議者或慮政黨間之差別已及根本，工黨非自由黨之比也，不復能認資本主義之經濟組織爲當然也。故拉斯基 Mr. Lasker 以爲「兩黨意見，相差過遠，不復能恃昔日之方法，使之接近。將來能否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覓得一共同之立場，以事融合調和，遂爲議會政治能否存在之條件。」然過去工黨兩度當國，舉止行爲，未嘗稍涉「革命」，一蓋工黨實行社會主義之步驟，主緩和之改進，不主激烈之破壞，主婉勸以動人，不主流血以殺人，麥唐諾 Mr. Macdonald 公開承認工黨爲漸進之黨，非革命之黨，費邊社會主義者 Fabian socialists 以靜待時機，遲緩戰勝爲信念爲策略。其精神，其態度，與英國傳統之政治作風，固仍契合無間也。傳統之政治作風使之然，抑環境亦使之不得不然。英人持重，每當一新事物新思想之起，固不予以深閉固拒，亦難遽爲鼓勵，則例，提倡之者務求其能合於國情，不肯成例，始可望逐漸爲人採納。作政治之宣傳，不勝過於驚世駭俗，主張過激，怯者

且爲之却走也。工黨之崛起，固可使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集會於兩大旗幟之下，狀似對立，然前文有言，普選之結果，決於二百萬猶移之選民，政黨競選，仍以全體選民爲其活動之對象，而不能訴之一階級之利害。以全體選民爲對象，則其趨異自難及於根本，蓋競選之目的，在勸誘原無成見之份子，使來相從，必兩黨間之界限勿過刻深，始能便猶移份子儘量當前之問題，抉擇從違而不自覺其有重大轉變，而過爲凜凜也。在英勞工及其家屬，佔全體選民之三分之二，然自工黨參加競選以來，從未得其所投選票在百分之三十七以上，其非爲階級意識之政黨明矣。勞工運動雖是新興之運動，然領導之者，並未放棄英國民族法律上與政治上之傳統觀念，工黨固恃工人階級爲之基礎，然非祇是代表此一單獨階級之政黨，其份子分布達於各階級之間，其行動，亦務依照傳統之方法，在法條範圍以內爭取權利。他黨對之亦自無所用其震驚駭懼，長其一修要害之打擊，「因而不能容其妥協也。」

論英國政黨政治竟，吾不禁重有感焉。其談人民地位，在獨裁國家與民主國家之不同也。在獨裁國家，只有一黨一階級，藉其暴力，壓迫羣衆，虔對一時，以維其私利。其於人民，束縛馳驟，視若牛馬。在民主國家，至少有兩三大黨派，以和平之手段，以勸導之方式，期動民衆，以獲政權。斯兩三大黨派之主張，固相立異，然其服役之對象，同爲全體人民，其起伏進退，一遵民意，而民亦遂真爲國之主人矣。一黨專政者，假定黨之所見，無一不足，黨之所爲，無一不善，黨之神聖，不容非議。民主憲政則異於是，假定當政之黨亦可以有過舉失策，其是否有過，則藉計算人頭以多數之意見表決之。故在獨裁國家，一黨之外，不容有異己者之存在，民主國家，則當

政治家常受全國輿論之監督，不稍予以假借。反對黨諸領袖，在國會中，自坐於衆政諸公之對面，作毫不留情之批評攻擊，斯實自由之象徵哉。其一許對方統治，即因對方許其反對也。以二者之協作，遂能各導其黨羽以入於憲政之正軌，獨裁國家之反對黨領袖，則在集中營中討生活也。此兩種國家中之人民，一爲自由之公民，一則爲只許服從之奴隸。爲造成服從之性格也。故「獨裁政治必常與一種信仰相聯繫，納粹主義也，法西斯主義也，皆是。孩提之童未有思想能力之時，即有一串之信念，灌輸於其腦中，不憚反覆以教之使其歷久而彌堅。受教者，如鸚鵡之學語，非有理性之啓發也。受教之結果則只知因執成見，憎嫉偏激。以爲己黨所有之一切，莫不神聖，而他黨之一切無不醜惡。當兩種相反之信仰，以此方式教誨之時，則造成者爲彼此仇恨之兩種軍隊，而非爲彼此可

以討論之兩黨也。此類中毒欲狂之政黨不能相聚於國會，蓋彼此相見，不願作和平之論辯，而將作生死之決鬥矣。」（引自索之言。）獨裁國家以壓力強人服從，其權力無限制，人民會葬起革命外，唯有甘受箝束。民主國家以公意辨是非，政府之權力，受輿論之制裁，受反對黨之牽制，人民不滿政府，隨時可令下台。狡黠權力，可以爲善，可以爲惡，羅素曰：「世界前途之希望，惟在權力能受馴服，能被納入軌道，俾不服役於任何狂熱之黨團，但服役於全體人類，蓋科學已造成不可避免之事勢，即人類非全體生存而全體消滅是也，」誠痛切乎其言哉。英之憲政，爲世楷模，英人亦既自認，如對人類有所貢獻，則爲其良好之自由政體，吾國而欲實現民主憲政也，其亦知所取法乎。

萬竹樓隨筆（十五）

舜生

袁世凱稱帝，湘綺實不贊成，其列名勸進，係他人所盜竊，非湘綺意也，先是籌安議起，袁氏以湘綺國老，懼持異議，乃囑楊度致書，徵示以意，湘綺答哲子函，有「總統爲人民公僕，不可使僕爲帝」之語，其不贊成可知。又湘綺有上袁氏一書，措辭更婉而語，書曰：「前上一牋，知荷鑒察，籌安參議，禮宜躬與，天氣尚寒，當候春暖。三殿掃飾，事已通知，外間傳言，四國忠告，想鴻謨專斷，不爲沈也。但有其實，不必有其名，四海樂推，曾何加於毫末，廣詢民意，轉生異論也。若必欲籌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國體，且國亦無體，征禪同揆，唐宋篡弑，未嘗不治，羣言淆亂，何足問乎？國運在遠，未知近議所由發生，及明意之所左右，然聞羣疑，當據一得，輒因細使，肅函上聞。」惜袁氏終不能悟，自誤亦以誤國也。

論身體自由與法律威信

周鯨文

「保障人權」在中國不知曉了多少年，而人權仍未得到確切的保障。三年前我們目擊國內情況，曾倡言人權運動，一時海外各地響應之聲勢如風起雲湧。可見人權是獲國人看得如何尊重，而要求保障人權者又何等迫切。說起來，人權範圍至廣，我會擇其基本重要者歸納為十二項，今日政府明令保障之人民身體自由權，不過是其中重要的一種而已。

人權學說在十七八世紀，盛行於歐美。美國憲法的開頭幾句就是根據人權學說而來。今日一般淺陋而昧於世勢的人們，多以爲談人權者有復古守殘之嫌。實際說來，今日談人權，論其內容非但不同於十七八世紀的學說，而且是根據今日社會人類的需要，規定了其新的內容。關於這一問題，我曾發表過幾篇文章。簡單的說，人權固不必堅持舊時天賦之說，而應認爲社會人羣共同承認並保證人之所以爲人而又能以爲人的基本條件。人之能成爲一個真正的「人」——不是奴隸，不是活的工具——他必須有其爲人的必要的條件，這些條件羅列起來就是基本人權。

民國建立已卅餘年，對外抗戰已到第八年頭，我國今日且列爲四大民主強國之一，而才開始保障一部人權，意味起來，實在令人「感慨系之」。老實說，這些權利，中國人民早就應該享受的。近世人對現代國家有一種共同瞭解，即沒有人權保障的國家有則被稱爲地理上之名詞，有則被稱爲匪徒的結合，如今日之德意日法而勢力統制的國家。前者支離滅裂其同意意無從集中，後者恃其武力，抹殺一切，而兩者之對於人權都是

盡其蹂躪能事。這種現象都是會從地球上被文明人類消滅的，而且爲期又不曾太遠。

中國這個民國，是從專制的廢墟走向民主之路的，今日尚掙扎於「革命尚未成功」的階段。中華民國人民作人的權利，就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掙扎了卅餘年之久，而且尚摸不到頭緒。遠的且不去講，惟抗戰以來，國人全部瞭解，保障人權就是增強抗戰力量。這是基於正義與正義雙重的動機與要求。所幸政府已開始瞭解這一點。卅一年立法院通過保障人權案（一），最近經將主席提議，國防最高委員會制訂「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國府於七月十五日明令公布，並定於八月一日開始施行。這種消息，對渴待解放的中國人民說，其動聽性與重要性，實超過同時轟動的消息，如歐洲開第二戰場，盟機大轟炸日本的本土。這一法令果能認真執行當可解除多少人的痛苦，免去多少人的冤枉，減去多少人的恐怖。熟悉國事的人，或執法的國家官吏，想能不見或聽到，多少無辜的老百姓，不明不白的被軍，警，憲，保甲逮捕，無案情，不審判，拘押幾年，找不到伸冤求釋的對象，真是一牢門一入深似海，「冤枉清白不明」。這種現象是繼續不斷的，人民變成豬狗不如，國事還堪過問嗎？熟悉國事的人，或政府負責的官吏，想能不見或聽到，多少清白的青年，無故失踪了，多少過去負責軍政責任的人，「非依據普通法或特別法令」（刑律，強盜，行劫，戰時軍律，海陸空軍刑法，懲治漢奸盜匪貪污刑罰法等）及防衛國家總動員法令等）而被逮捕拘禁，這種現象是繼續不

得的，是非不明，賞罰不中，國家前途豈能希望長治久安嗎！我們看見的，聽到的，想當局更能看見和聽到，我們認為對國家危險的，想當局更能熟思而有所作為。最近幾月如十二中全會厲行法治的宣言，全國行政會議重申法治精神的議決案，「守法運動」，「放寬言論」尺度，「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這一串好消息不能不認為政府有改革更張的動向。人民也自然以欣快而謹慎的心情接受說：果能朝着這個動向認真作去，國家前途庶幾有望。

最近國府所頒布的「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如果真能上下認真執行，確對國家有無上好處，非但培植國力，亦且安定人心，使人民身體不致失其主宰，人心不致永遠恐怖。抗戰到了今日，正是需要人力，也更需要人心，心齊而力自齊，人民都拿出力量來，才是最後勝利與建國的真正基礎。

但是結至今日，我們只看見了政府頒布的法令，還待見諸實行。以我們過去的經驗，看見了政府許多法令，有的未能認真執行。今日頒布的保障人民身體自由法令，其關係至大且重，非同一般行政法令或特別法令可比。國力的培植，人民的安寧，社會的明瞭，人間的是非，取決於人民身體自由者特多，故政府明令頒布之後，國人欣快異常，如去重負，輿論界不斷贊揚，外國輿論也刮目相待：「各方均認為此係保障基本民權之具體步驟，因而更可證明中國有民主化之誠意。」（見大公報七月廿日倫敦專電），這一法令所引起的外中各方的注意，實在不小。

在這時，我們才特別提出法律的威信問題。法律的尊嚴性是建立在威信之上。法令要有威，就是古語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不認人不分親疏貴賤，英國傳統的法治精

神（Rule of Law）就是說明凡屬公民不分貴賤一律在法前平等。孫子治兵之始，先斬了玩忽軍令的娘子軍隊長——吳王的愛妃，以明法令的森嚴。這是說明，有法於此，全國上下無論其為達官或小民均不敢輕視侵犯，這法者則有其應得之罪。這樣法才有威，也才能維持文明社會的秩序與人類的道德生活。法令不但要有一「威」，而且還須有一「信」，且其一「威」多是由其一「信」而生。昔衛鞅為秦變法，而首先立信。傳說當他在新法未布之前，「恐民不信，不即奉行，乃取三丈之木，立於咸陽市之南門，使吏守之。令曰：有能徙此木於北門者，予以十金。百姓觀者甚衆，皆中懷疑怪，莫測其意，無敢徙者。鞅曰：民莫肯徙者，豈嫌金少耶？復令添至五十金，衆人愈疑。有一人獨出曰：秦法素無重賞，今忽有此令，必有計議，縱不能得五十金，豈無薄賞，遂荷其木，竟至北門立之，百姓從而觀者如堵。吏奔告衛鞅，鞅召其人至，獎之曰：「爾真良民也，能從吾令，遂取五十金與之曰：吾終不失信於爾民也」。後乃頒布新法，秦國大治。

今日吾國，法令如毛，而求其上下遵守，有威有信者，不可多得。其原因多為有權勢者玩忽法令，敗法，毀法，人民雖則畏法守法，面目觀權貴官吏之毀法行為，對法令漸生蔑視怠慢之心。故在貪污法下，貪污之案件層出不窮，有則並未盡科以應得之罪，在懲罰漢奸法下，漢奸並不因之減少。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欲糾正此中弊害必從建立法律威信開始。其辦法即是不輕易頒布法令，頒布之前必先求民之意向所歸，詳審情勢，益求合理，通乎人情，秉之大公，行之毫不牽強；既頒之後，必求貫徹執行，不因人廢法，於是官有遵守，民有信從。如此事事皆有準繩，人心有所趨向，社會秩序方得安定。而於

職期中求進行政效率，振奮軍心，鼓勵民氣，亦均有所本。

惟我所主張的法律威信，非同於嚴法主義，後者以爲施行嚴法苛刑便可使「國家民安」，其傾向在於威服萬民，便於治者，其方式多係由上而下頒布嚴刻的法令，強迫人民服從。而法律威信之建立乃法律本身應乎客觀環境要求，使人民樂於衷心接受服從。其一威一則出之於社會入羣樂於接受之共同規律，其「信」一則由於法前無欺。這種法律是社會的，是人民的，其方式多係由下而上衆意所歸的法令，這種法律執行起來，只要當權者不破壞，不阻梗，牠是不經而行的。

中國今日頒布了「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使全國人民額手稱慶，使外國明達輿論預祝爲「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之誠意」。這種法令雖係由於蔣主席提議制訂經國府公布，牠本身還可說是由下而上的產物。回首民國過去歷史，要求保障人權的呼聲和行動是不斷的起落於中國每個角落，這一要求可說是有其貫通性的。即以今日中國民主運動而論，何者不以人權爲其根本內容，我們無論如何須承認這是中國政治鬥爭中的一些進步。由此，我們也可得一結論：自由是人民奮鬥的結果，而不是由上的恩賜和贈與。

「保障人民身體自由」的法令，早已有了其社會的基礎。人民要求身體自由，爲身體自由鬥爭，人民也要盡力維護最近新布的法令，作爲牠萬千的擁護者。還要從社會各方面打擊違法越範之徒，務必協助政府保持這種法令的威信與其尊貴性。同時，人民也希望政府以頒布此令的明達見識，鐵面無私的執行這種法律，絕不使人民見欺失望，務使國境之內無一人的身體非法的失去自由。這就可以建立法令的信實無欺觀念，從此法令在官民心目中是有其威信與尊貴性，而不是具文。

我們相信政府頒布這種法令之初，不但俯慰國內外輿論，而且可能有一「與民更始」的成份，我們不妨預祝其爲中國政治進步的轉捩點，在我們渴望中國政治進步中，竭誠擁護「保障人民身體自由」法令下，我們願向社會訴說，更願向政府建議下列幾項，相信牠可確立這種法令的威信，並可一新國人耳目受其惠者爲萬千中國的人民，而得令譽者則爲政府。

第一，簡化法律與執法機關，認真辦理，明示天下：自茲以後，中國人民身體再無被非法侵害之虞，即有不幸事件發生，被害人民也有申冤追求責任及補償辦法。

簡化法律，意即管制人民身體自由之法，首先要明簡化，使人民及執法者易於明瞭，範圍要清楚，不可拖泥帶水，任人隨便解釋，隨便引用。法令明瞭，執法者的責任也就明瞭，何者爲犯法，何者爲越權，至易判斷，免致作奸犯之官吏，挾法以威脅人民，人民也可恃法與之抗爭。次之要簡單化，萬不可一「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一面增設法令使人民身體自由受更多的限制。致使政府美意，無從實現，而人民反遭其苦。國府令示：「凡有搜查審判職權之機關，其依據普通法或特別法令（如刑法，強制執行法，戰時軍律，陸海空軍刑法，懲罰漢奸盜匪及汚煙毒治罪及妨害國家總動員法令等），不得逮捕拘禁，處罰或審判人民」。第一，我們以爲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法，以普通法爲上，特別法令究有過事繁重之嫌與過猶不及之弊，應盡量避免。第二，即是不待不用特別法令，亦以愈少愈佳，更不應在指明上述各特別法令下加一「等」字，此一「等」字將爲苛吏及不肖之徒運用無窮，流毒至深，苟隨處均爲特別法令，隨執政者之意而行，人民身體自由終將受害，何能談及保障人權。

全國一切政治犯，希冀一新國人耳目。

依吾人見解，在全國對日作戰的今日，國人目標已有所回歸，政治意識亦非彼此相左太甚而不可諒解者，同時危害國家之行動自爲有良心有知見之人所不肯爲。在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今日，在抗戰神聖的領域內，國人實不必彼此顧忌太深，致有傷情感，而誤共同救國的大任。日寇轟打我們的砲彈應爲中國人團結和好的媒介，吾人何不乘國難期間，洗清舊日恩怨，重修和好。這正是民族團結，黨派諒解，政治意見和協惟一的良好時機。這個時機是稍縱即逝的。甚望當局及全國人士善用這一轉瞬即逝的千載良機，於公於私，均有好處，而建國之大業順利前進，有賴於此者更多。

當政府以保障人身自由，示大信於天下之時，我們願當局對政治犯以一寧人負我，我不負人——之磊落胸襟，而將他們完全釋放，給他們以救國的機會，給中國政治史劃一時代，使史書大書曰：「中華民國某月日，國民政府頒布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清查監獄，並釋放一切政治犯」。這是何等輝煌的政治。不但可使國人互相慶祝說：「我國今日走上合理的軌道了」。外國同情中國的朋友說：「中國真有實行民主政治的誠意了」。而且可以使蔣主席勳議的保障人民身體自由的法令，因政治犯的釋放，得竟其全功。否則，法令如彼，而非法被逮捕之人仍深鎖牢門，中外人士必皆疑慮該項法令的威信性及中國政治的民主性，同時頑固官吏及據勢的不肖之徒必啓玩忽法令之心，政府本以此法令保障人權，昭信於天下，但若不貫徹作去，補救過去的不合理的措施，防範將來的弊害，其給與人民的印像和創傷將更壞，而法令前途與因之而起的後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總之，我們認爲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用意至美，具有「與民更始」的意向，惟欲求其功效，必須確定法律威信，貫徹執行，首先要作到的，即法令頒布之日，人民身體即確切得到保障，非法的事件不許發生，而違法越軌侵害人民的機關，其負責人應懲以應得之罪。自今以後，人民身體不能再受非法的侵害。此乃專爲將來。然止於此處，仍非保障人民身體自由法令的原意。必也追溯往事，務使國境內，過去因受非法侵害而失去身體自由的國民，即使不能追索補償損失，至低亦得趕速清算，合法處理。這就是清查並釋放無罪坐獄廣大的一羣。同時爲了完成這項法令的全功，爲了昭信中外，爲了奠定民主政治真實基本，和調解政治恩怨及平服來日糾紛應即釋放一切政治犯。

我們願見政府保障人權的法令，其實行爲近代中國政治劃一時代，我們也希望牠真能走入民間爲民主政治的基礎。但古有明訓：「畫虎不成反類犬」。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我們的輿論界及社會領袖應盡全力支持政府這種法令，大家護法，大家監督法令的執行。設使有一人，在國法保護之下，失去身體自由，非但政府應引爲憾事，也是我們的羞恥。我們也應大聲疾呼，爲過去無罪被囚禁廣大的一羣人們的自由，呼籲，控訴與聲冤。設若有一人蒙冤，或被法令遺忘，非但政府應引爲憾事，也是我們的羞恥。我們以爲，國民在法令保護之下，若再平視自身權利被傷害而不鬥爭，則不配爲現代國家的國民。我們更望政府當局以最大決心，徹底執行這種法令，並令所屬迅速清查舊案，釋放無罪被囚的人民，而以磊落的胸襟，釋放一切政治犯，以竟政府保障人權法令的全功。我們以爲，政府若令而不行，或行而不果，以致失信於民，則將影響政府全部行政號令和設施，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明達如我當局想已早見及此了。

八月四日

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公布以後

陳一清

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頒布「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定期八月一日起施行採納輿情，足矯時弊，試略論之。

一、本辦法之由來 憲政實施協進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建議請政府提前實施提審制度，本年五月，奉會長核示：「查提審法頒訂於二十四年，彼時正值內外多故，未能即付施行，迨抗戰已起，國內各地均入軍事狀態之中，防止敵諜漢奸，一切處置，必須嚴密；加以戰時交通及通信諸端，均甚困難，按時提審，事所難能。故在目前澈底實行提審法，委屬窒礙孔多，且恐影響軍事，自宜從緩。惟近年以來，因戰時措施，法令較繁，各地維持治安與檢查非法各種機構，亦相隨增多，其間若干下級人員，濫用職權，捕押人民，久禁不放，此種情形，亦屬常有，自有切實整肅改善之必要。茲特令由行政院司法部軍事委員會，會同商討改善辦法，其主要原則：（子）各地何種與何級軍警機關或行政機關有逮捕人犯之權，應預為嚴肅規定，凡無逮捕權之下級機關，不得濫行拘捕，任意扣押。其因執行職務或奉令拘捕者，應限定呈報該管上級與送請審訊之期間，不得隱匿不報；私行久禁。（五）被逮捕之人民，除證據確鑿，應依法定程序處斷外，其因誤會嫌疑而被捕者，各逮捕機關，必須迅速處理，不得久延不決。各院會乃根據以上二項原則，並斟酌戰時實際情況，另擬實施條款，呈送國防最高委員會核定公布，于本年八月一日起施行，此即本辦法產生之由來。

二、本辦法之特色 本辦法共有八條，歸納為四個要點：

（一）除依法有檢察審判職權之機關外，不得逮捕拘禁處罰或審問人民。上述有權逮捕之機關名稱，應由司法及軍法主管官署每年二月八月會同通告。此為事前防止其濫權，凡是在通告以外之機關，即無權逮捕之機關。這可以使被逮捕者立刻可以知道逮捕者是否有權。不必等到被逮捕後方才展轉知悉。（二）依法逮捕人民經訊問後，認為誤行逮捕或嫌疑不足，立即釋放，不再取保。不屬管轄範圍者，應於二日內移送有管轄權的機關。受囑託逮捕者，應於二日內移送囑託機關。此為事後約束，其處置誤捕或嫌疑不足時立即釋放，不再取保，用意甚佳。因人民無辜被捕，受損已大，而又因取保多耗經濟與時間，徒滋胥吏上下其手，無益於事情，可謂功德無量。至自身若無權管轄或係囑託執行，均應在二日內移送，也是以救濟人民動輒被拘經年累月得不到合法審判之弊。（三）執行逮捕時，應將拘票及逮捕原因示知本人，其本人或親屬，亦得請求示知逮捕原因與拘票，並得向執行逮捕或上級機關請求移送有管轄的機關辦理。此為界予人民以救濟之權，也是一種事前防範，因為合法逮捕，當然有拘票或逮捕原因可以提示，荷無拘票或逮捕原因可以提示，則被捕者當然可以拒絕受捕，且要求提示之權擴大至於親屬，也是過去若干法令所未有，我們認為這一點精神不但注意于被捕以後之依法處理，尤側重於被捕以前之手續嚴嚴。（四）各機關逮捕人民後，無論作何處置，皆應每週詳報呈報上級機關一次，司法及軍法主管官署，並應每月各就所轄機關加以調查，如有違法情形，應即予以糾正，至執行人員有

違反本辦法行爲，應按其情節受懲戒，或刑事處分。此爲規定監督執行逮捕拘禁的上級機關以考核監督的職責。綜上所述，簡明周密，允稱良法，茲就本辦法本身細心體會，值得贊揚評述如此。

三、守法與護法 大公報於本辦法施行之日，爲文以誌其所感，其首段說：「我們恭讀國民政府頒布的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後，一方面爲人民慶幸，同時也爲國家抱憾，保障人民身體自由，本是起碼的人權，事實上中華民國長了三十多歲，這一點實在還成問題。這保障人權的問題被提出，固然是全國人士所熱心關切，而其具體化，實由蔣主席所認真發動。由這一點，我們可以體會得到領袖對於保障人權的重視。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中華民國的法律早已具備，現在更頒布了八條辦法，一句話，希望政府認真實行。保障人民身體自由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要素，我們既僑于民主國家之列，自然要認真實行保障人權。請一些官吏們覺悟，不要以爲糟蹋幾個小百姓不要緊，那會使我們愧對民主，影響國格。」末段說：「國民政府所頒布的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法良意美，足矯時弊。而保障人權應爲全國人民所擁護，我們認爲老百姓不但要守法，更要護法，反抗違法，反抗非法，是護法，更是積極守法。現在政府頒布了這項適合需要的良法，我們除希望政府官吏嚴格守法之外，更願喚起人民反抗非法以護法」，我們認爲大公報的議論是十分對的，希望政府當局與人民合作，官民兩方，都要本着守法精神，堅持護法態度，然後法信可立，涉威可樹。我們於護法之餘，應如何乘其舊而開其新，樂其始而勉其終，敢貢所懷如下：

四、與民更始清理積因 我們不敢說在過去人民的身體自

由毫無保障，但從上述政府令文中可以看出若干下級人員濫用職權，拘押人民，久禁不放，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現在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施行以後，常常聽得有人閒談，某項某不知犯何條，又不知被那個機關逮捕，經年累月，不知下落，真所謂「黑天冤枉」。六辦法既公布出來以後，同樣的不幸事件，也許不會再有了。不但不應再有此等的事件，即對於以往濫用職權的官吏們發未放的無辜人民這筆「黑天冤枉」帳，總會有個報銷，交代清楚。我們爲護法熱忱所激動，援引大公報說過的話，以作與濫用職權的官吏們對話的資料：請一些濫用職權的官吏們覺悟，不要以爲糟蹋幾個老百姓不要緊，不要以爲本辦法同中華民國刑法是一樣的白紙黑字，中華民國刑法本備具有保障人民身體自由的條文，如濫職罪中規定，公務員假職務上之權力與機會，以妨害人民身體自由者，爲加重的妨害自由罪，然而在事實上刑法上條文又幾乎不能適用到那些濫權的官吏頭上去，於是人民身體的自由遂失其保障。本辦法是由蔣主席認真發動的，南山可移，而此法威信決不可破，我們不是可誇的民主國家，自然更要認真保障人權；不是鬧起門來講民主的非法的行爲。來響影國格，趁着本辦法施行時候，爲反抗非法，積極護法起見，你們所逮捕的無辜人民，總要有個報銷交代清楚呵！

五、誰是本辦法的執行機關？ 六辦法既已施行，自然要有執行之機關，否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但是要甚麼機關爲本法之執行機關？此執行之機關必是國家應設之機關，依法面有檢察審判職權之機關；又必是依法而有逮捕拘禁處罰或審問人民各職權之機關；是即本辦法第一條所具備各職權之機關，

亦應行查明通告之機關。合乎此項資格之機關所以必須查明者，即不容隨便認定，而應查明在法上之根據如何耳。苟無法律之根據，或根據不其適合，均不得謂爲合法應行通告之機關。然則行政院，軍事委員會分別實或司法行政部執行總監部查明通告，是司法行政部與軍法執行總監部負起查明通告之責，頗非易事，所以遲之又久者蓋事非經辦不知難也。依我看來，司法行政部軍法執行總監部不能隨便認定，至少要顧慮下列兩項法令。

(1) 司法機關管轄之範圍 司法機關審理一切訴訟事件，爲司法固有之職權，不過在非常時期，政府所頒布各種特別刑事法令，在特種刑事事件訴訟條例公布前，對於非軍人而犯特種刑事者，則歸軍事審判。自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一〇五次常務會議決定：「現行法令由軍事審判之刑事案件，除軍人爲被告者外，普通人民而犯特種刑事者，改歸司法機關，按照特別審判程序辦理。」國民政府于三十三年一月公布特種刑事事件訴訟條例，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施行，其大旨依法律規定適用特種刑事事件訴訟程序之案件，及本條例施行前依法令規定由軍事或軍法機關審理之案件，除軍人爲被告者外，依本條例之規定審理之，本條例未規定者，仍適用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有關之法令。上項案件，由地方法院或縣司法機關審理之，但係危害民國，漢奸，偽軍及妨害軍機之案件，由高等法院或分院審理之。此等案件，改歸司法機關辦理之，不用刑事訴訟所定之通常程序，而另定特別程序者，無非力求簡單迅速結案爲最大目的，是特種刑事法令繁多，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公布，與仍司法警察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二〇八條，左

列各員于其管轄區域內爲司法警察官，有協助檢察官偵察犯罪之權：(一)縣長市長；(二)警察廳長警察局長或公安局局長；(三)憲兵隊長官。前項司法警察官應將偵查之結果移送該管檢察官，如接受被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認爲有羈押之必要時，應于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檢察官。但檢察官命其移送者，應即時移送。然此限于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又須在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管轄之檢察官，至若逮捕拘禁，爲羈押的，被動的，而非自動的，逕行的，換言之，捕禁人民之權，係兼司法警察官之身分而取得，並非各員本職而有此職權也。此外三十二年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要點之四，則歸普通司法之特種刑事事件，仍應由軍警機關負責檢舉緝捕，並應由司法行政部與軍警機關會訂改進辦法，以加強緝捕工作。所謂檢舉者，犯罪事實未明瞭以前也，所謂緝捕者，犯罪事實既肯定以後也。則歸普通司法之特種刑事案件，而仍由軍警機關負責檢舉緝捕者，亦協助主管之司法機關爲一定之行爲也。似即本辦法第三條受各檢察官審判官之依法囑託逮捕人民者，應于二日內移送囑託機關辦理之類是。

本文草擬以後，始於八月三十日報載有權逮捕人民之機關，茲照錄如下，並加以說明：

甲、依照普通或特別法令有權逮捕人民的機關：(一)最高法院檢察署，(二)高等法院及各分院，(三)地方法院(四)縣司法處或設治局司法處，(五)兼理司法之縣政府或設治局。

乙、依照特別法令及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第五條規定的範圍，得逮捕或核准逮捕人民的機關，(一)軍法執行總監部，(二)戰區司令官官部，(三)衛戍司令

憲兵亦有逮捕人民之權，且不于二十四小時移送于該管檢察官，殊嫌未合法律之正條。

總之，人民身體自由載諸約法。人民不得自由者，有加害人為之也。應如何保障人身自由不得加害？宜以加害人為對象，嚴厲制裁，根絕其加害行為，方為正面的保障。如以人民為對象，如何可以逮捕人民云云，此種側面保障尙覺不夠。就法言法，此次政府通告有權逮捕人民之機關丁項之（三）其有無權逮捕機關所逮捕之人犯，並應立將人犯移交有權機關，依

法核辦。該辦法施行後，如發現無權逮捕機關逮捕人犯者，依該辦法第七條之規定辦理。換言之，以前無權逮捕機關所逮捕之人犯，雖屬犯加重的妨害自由罪可以從寬免議；以後無權逮捕者多半黑天冤枉，縱然于移交後該管管轄機關不難昭雪，但對於確認觸犯妨害自由罪之機關，可以不究，而對於莫須有之被捕人民，不肯輕手發落，何其待違法機關之厚，而待被捕民之薄耶？

萬竹樓隨筆（十六）

舜生

國民參政會原為一研討政治問題之機構，但中西醫之爭亦往往於會中引起軒然大波，此事自表面視之，似極可笑，然中西思想之不同，實以中西醫學在根柢上之差異最足以說明之。政爭之激結仍在思想，然有時不便為正面之衝突，乃假中西醫之爭一發洩之，其心情非多數人所能了解，即爭者之兩造，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五十年前，古文家桐城吳楚甫先生（汝綸）即厭薄中醫而提倡西醫，曾於與吳季白一書中具體表示其意見，茲特轉錄一通於後，不知和中醫者讀此又作何感想也。書云：

「余近還京後想益調攝強固，是否尚服西藥？每恨執事文學精進，而醫學近庸，但守越人安越之見。不知近日五洲醫學之盛，視吾中國含混謬誤之舊說，早已一錢不值。近今西醫書之譯刻者不少，執事曾不一過目，願讀焉惟素問靈樞經要金匱千金外臺等編橫亙於胸而不能去，何不求精進若是？平心察之，凡所謂陰陽五行之說，果有把握乎？寸口脈候視五臟，果明確乎？本草藥性，果考驗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臟，果不謬乎？人死生亦大矣，果可以游移不自信之術嘗試否乎？以上所言，吾將礪樹以收腐爛，未可以客氣遊詞爭勝，願聞所以應敵之說。」（按吳先生此書寫於光緒二十年癸巳，去今五十二年矣。）

論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大選之勝敗

殺生

美國共和民主兩大政黨，已前後提出其政綱與正副總統候選人，現正厲兵秣馬，從事競選運動，期於十一月七日全國大選日，獲得多數人民之投票，而出而登計主持美國大政。美國歷史上，總統之競選，常改變國家之政策路線，如一八六〇年，林肯當選總統。南北內戰隨之發生，因林肯主張「國家不能在一半奴隸一半自由之情況下生存」當時與林肯競選者為道格拉斯，主張調解南北對奴隸問題之糾紛，如彼落選，內戰或不至爆發也。現今美國已一躍而為世界最大強國，戰中戰後之世界大局，依賴美國之政策甚多，美國之政策路線，應為世人所應注目，是吾人對美國此次大選不可不加以注意。然則，此次大選，民主黨獲勝耶？抑共和黨獲勝耶？杜威當選為總統，抑羅斯福連任第四屆總統耶？本文即擬從兩黨之政綱與人選。對此問題有所論斷。

在入正文之前，吾人對美國大選，首先發生兩大感想：第一、環顧目前世界戰局，諸曼第之役，業已結束，英美軍開始深入法國心臟，現離巴黎僅數十里，東戰場之蘇軍，則傾其全力，影響西戰場，現已越過華沙，西向疾趨柏林；南戰場意境之盟軍，亦已佔領佛羅倫薩，再向北進，有與蘇軍與法境盟軍會師之可能；至太平洋方面美國特種艦隊，正游弋於小笠原附近，同樣直搗日本本土，值茲戰事達最後決定階段之時，而美國仍照常舉行競選，吾人對美國無一日放鬆其憲政生活，固不待不表傾佩之意。然以此與吾國尚有人焉認為戰時不能全盤實施憲政相比，誠不勝感慨系之矣。

第二、美國為民主國家，在政治傳統上為兩黨制。（小黨如社會黨共產黨，僅能改變兩黨之平衡與影響其立場而已。）共和民主兩黨中之一，如在大選時，獲得勝利，即可出而組織政府，實施其政綱，為人民謀福利，如失敗，則以旁觀者清之地位，自由批評政府之政績，以取得人民同情，俾在下次競選時，再次決勝負於投票之戰場。前者稱為在朝黨，後者稱為在野黨，而最後之決擇權，則操之於人民，此項政制即為民主政治，顯與獨裁政制大不相同，蓋在獨裁政制下，只有執政黨，而無在野黨，其政權之獲得，不由人民之授予，而出於威力，壓迫與利誘之運用成功，決不容如美國之共和黨，以在野黨之地位，提出其政綱與人選，於人民之前，聽人民之公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作改組政府之企圖。

茲先述共和民主兩黨之歷史。美國自創國以後，政治上分為兩黨，一為民主黨，一為惠格黨（Whig），前者思想較為進步，且勢力較大，後者則為一極端保守之黨。但此項政治上之傳統，因奴隸制度問題，發生一極大之變化，當時南北意見分歧，北方主張完全廢除奴隸制度，堅持奴隸制度不能在新加入合眾國之領土內存在，南方則認為奴隸制度乃州權問題，應由各州人民自由決定。北方之民主黨與反奴隸制度之惠格黨聯合，組織一新黨，稱為共和黨，一八六〇年當選為總統之林肯，即為該黨之人物。南方宜古脫離合眾國，另組新聯邦，林肯堅持不讓南方脫離，遂發生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之內戰。該次內戰，一方面因為解放黑奴，另方面則為聯邦與州權問題。

社會安全辦法，包括老年，失業，殘廢者，兒童及盲人。(五)設立職業介紹所，(六)規定聯邦銀行存款，保險水災，預防土壤，並防止證券市場之弊病，(七)保持農場與家庭之抵押品取贖權，並為農產品求取有利價格，(八)實行發展水電與開拓礦產之有效計劃，(九)發現與生產與就業促進繁榮之途徑。對戰後問題，民主黨並提出下列計劃：繼續使退伍男女軍人獲得充分權利，尤其顧到殘廢軍人，保證一切自衛國防服務者之就業與經濟安全，並用一切實際措施，向農人作價格保證與收穫物保險：(一)使農業工業勞工立於同等地位，(二)獎勵獨立小農，(三)協助各家庭購置小農場，(四)發展農村電氣事業，(五)在復員期間給工人以適當補償，(六)額外制定人道主義之勞工社會與農村之法律，(七)提高小規模實業成功之機會，(八)儘早放鬆戰時控制，使各種稅法適應平時經濟，並使機構簡單化，戰時賦稅應儘速減低或撤消，(九)鼓勵人民冒險投資於新事業，開發美國西部和其他部份之天然資源，(十)信仰私人企業，但應使其不受獨佔加迭爾或任何私人或官方獨斷力之支配。若以兩黨之對內主張比較而觀之，兩黨雖均宣告致力於爭取戰爭之勝利，但共和黨認為應避免採取非戰事必要之一切戰時控制。兩黨雖均主張戰後實施經濟與就業計劃，但共和黨認為戰後應取消戰時控制，民主黨則僅言儘早放鬆而已。兩黨雖均力謀美國繁榮之途徑，但共和黨主張採取保護關稅，民主黨主張在睦鄰政策下推行其貿易政策。兩黨雖均希望美國政治鞏固，但共和黨強調各州之主權，民主黨主張加強政府力量，為國家社會謀福利。兩黨雖均維護私人自由企業，但共和黨主張政府不應與之競爭，而民主黨則主張應以政府力量，剷除獨佔加迭爾等之壟斷。要之，共和黨

之政綱，較為保守，民主黨之政綱較為前進，換詞言之，共和黨仍囿於資本主義之一隅，民主黨則富於統制與計劃思想，至少已接受國家社會主義若干優良原則矣。

共和黨政綱之主要中心，在內政方面，歷年來攻擊最力者，亦為羅斯福之內政政策，至外交政策問題，則不但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成為競選時之主要爭點，且共和黨對羅斯福之外交政策，亦素少嚴厲批評之辭。但此次大選情形，或與以前不同，因美國現居世界領導地位，雖欲置國際問題於不顧，已不可得矣。民主黨此次以其外交政策為競選之強牌，殆即有見於此。從表面上言之，兩黨在外交政策上之意見，頗為接近，共和黨主張：(一)藉有組織之國際合作，以獲致世界安全，而非參加世界國家，(二)應用和平勢力，以阻止軍事侵略，(三)繼續與聯合國國家合作，以保證世界和平，(四)預諾於戰爭停止後儘速使美軍返國，(五)美國負責參加國際戰後合作機構，(六)非經美參院三分之二之同意，不與任何國成立協議或條約。民主黨則主張：(一)同其他國家合作，建立以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礎之國際組織，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不論大小，均得參加，以便防止侵略，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二)訂立一切必需而有效之協定條約，以便各國能維持適當兵力，應付防止戰爭之需要，使任何國家都無法備戰，並使各國在必要時可使用此種兵力，可以從事共同行動，上述國際組織，應有在必要時可使用武力防止侵略維持和平之力量，贊成維持國際法庭，美國將為其會員國，該法庭應適當運用外交，和解，仲裁以及其他類似方法，以解決國際糾紛。民主黨在政綱中又保證擁護大西洋憲章與四大自由。若以兩黨之對外主張比較而觀之，兩黨雖均主張參加國際合作機構，以阻

止侵略者之再起，共和黨主張不參加「世界國家」，民主黨亦主張不喪失國家主權，認為「人類可無須喪失各國之主權，即能建立持久和平」，但共和黨仍未全脫孤立主義，珠港事變前狹隘之國家主義政策，亦尚未絕跡，是故斷斷於不參加「世界國家」與夫「美軍返國」，而對於如何防止及抵抗軍事侵略，惟言「應用和平勢力」不免近於含糊之感。民主黨對外政策，則「天下一家」之精神，較為濃厚，羅斯福於接受競選後播講曰：「吾人均知『天下一家』一語已真實至何種程度」，即代表此種新世界觀也，至防止及抵抗軍事侵略，亦較為具體，曰：「使任何國無法備戰，曰國際使用武力共同行動。共和黨堅持非經參院三分之二通過不得簽訂國際條約，表面上觀之，為遵守憲法，實際上言之，徒使行政當局在外交方面不敢大刀闊斧，免蹈威爾遜之覆轍，並使各國有見於美國政治之微妙，不敢完全相信，民主黨贊成開放巴力斯坦，使猶太得以建立自由民主共和國，並贊成制定法律給予阿拉斯加夏威夷等以充分之自治，則其見地與魄力，更有非共和黨所能企及者矣。」

再論兩黨所提出之人選。共和黨之杜威氏，現任美國最繁榮之紐約州之州長，紐約州州長升而為全國總統，美國歷史上不乏其例。杜氏近年來所發表之言論，主旨在攻擊羅斯福之內政，至外交政策，亦曰美國無法孤立，美英蘇中應合作，建立國際和平機構，與羅斯福所主張者，在原則上無大差異，但彼對德黑蘭會議，從未提及，並曾表示該會議將延長戰爭，從可知孤立主義與保守主義之幽靈，始終在杜氏腦中盤旋也。彼為人果敢剛毅，以剷除社會惡勢力，聞名全美。彼曾表示，不接受當選總統，而願繼續為紐約州服務，此亦所以終於出山者，或因共和黨當局懸於該黨中飽與羅斯福作對手者，除威爾基

外，惟杜氏而已。

布瑞克氏則為俄亥俄州州長，為人溫和而謹慎，曾告人曰，彼非社會改革家，對羅斯福之集權作風反對最烈，在全國代表大會中曰：「吾人之目的在擊收今日威脅美國之極權新政哲學」。彼之思想，對內問題只知維護州權，即屬全國性之失業問題，彼亦認為應由各州負責，對外問題則立於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中間，一方面主張美國應居世界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則主張美國不應從屬於國際權威，不要太上政府，不要獨裁的世界，不要國際警察，不要軍事聯盟。

民主黨之羅斯福氏，則其言行早為吾人所熟知，至杜魯門氏，現任參院調查委員會主席，以前曾以調查鐵路案，聞名全美。彼目前之職務，則在提高作戰力量，其言曰：「調查委員會之目的在提高作戰至最大限度。如吾人進行戰時計劃十分有效，戰後即無須有各種調查之要求，因此發生劇變，使美國匆忙走入下坡路，在二十年內又捲入另一次戰爭」。對外問題，因曾任法官，故以法官之眼光論之曰：「法庭判決，倘無武力作後盾，決不能執行」，換言之，彼主張設立世界警察，以制止國際間之犯罪。副總統候選人一席，華萊士呼聲甚高，但終由杜魯門獲選。華氏思想急進，態度坦直，故其政治命運一如共和黨之威爾基。有人謂華氏之落選，表示羅斯福逐漸右傾，以余觀之，右傾兩字，似覺太重，羅氏以後更為老練穩健，或則有之。

以兩黨之人選，比較而觀之，吾人得如下之觀感：共和黨之人選，思想較為保守，言論較為曖昧，且誠如羅斯福所批評者，「一班無經驗未成熟之生手」。杜威與布瑞克，雖對州治政績卓著，但能否應付全國局面，尚在不可知之數，至於能

否主持作戰大任，則更屬疑問矣。因杜威氏終未與此次戰爭成任何一次戰爭發生關係也。至民主黨之人選，羅斯福氏歷年來應付無論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之能力，已為世人所共見，今後更能駕輕就熟，可斷言焉。杜魯門氏，不但富有一種應付各種困難之無畏精神，且行政經驗與能力，亦不下於杜布爾氏。

總而言之，吾人對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俱無偏見，對杜威，布瑞克羅斯福杜魯門四氏，亦無恩怨可言。但平心而論，共和黨之政綱，缺乏一種宏大氣象，其人選，亦皆屬經驗不足之生手，至民主黨之政綱，則較為進步，明朗與積極，且其人選

亦較為老成練達。羅斯福氏競選失敗之可能性有二，一為「四任太多」二為「衆叛親離」。但彼有最強之一點，即戰時不換總統，不換總司令，由熟手繼續負責，更能早日獲得戰爭之勝利，與更好之和平協定。杜威氏競選成功之可能性則僅有一，即使美國人民相信彼等於戰後更能給予美國較大之繁榮與較多之工作機會。如是言之，在十一月之選，若戰事尚難決定，美國人民又能認識客觀之大局，選其冷靜之理智，則民主黨與羅斯福當選之機會似多。

(八月十二日)

萬竹樓隨筆 (十七)

舜生

宋遜初先生不以詩名，頃讀黃安蔡寄國君「四十年來聞見錄」，錄有先生五律一首，蓋癸丑元旦偕友人自漢陽赴黃州舟中作也。詩曰：「曉色侵江白，輕舟發漢陽，潮聲隨岸遠，山勢送人忙。大地風雲變，長途霜雪降，悠悠此行役，何處是瀟湘？」時去宋被刺之時不及百日也。

輓聯為文學中小道，然必落落大方，音節鏗亮，又恰如死者之身分，始為出色當行之作，余前記章太炎輓宋遜初一聯，揚哲子輓梁任公一聯，均屬此類。茲再舉三例如下：王壬秋輓曾文正聯云：「平生以簞子孟張叔大自期，異地不同功，擬定僅傳方面略。經術在紀河間阮儀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憾禮堂遺。」太炎輓中山先生聯云：「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繼初曲，江表豈曾忘髮許？南國是吾家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與人盟秦！」羅癭公輓黃遠生聯云「早知平等冤親何必分明問仇者？熱計苟全性命，願將慈魯祝來生！」均着墨不多，又無一不耐人尋味也。

確保世界永久安全之關鍵

孫寶毅

古人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人今日討論世界安全機構之際，若將以往之安全機構，作一檢討，當有裨益，換言之，從其所以失敗之教訓中，可以見出吾人今後應取之途徑也。

歷史止第一次稍具規模之安全機構，為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所之神聖同盟與四國同盟。當時，歐洲正在久亂之後，拿破崙雖率師擊退，但英俄普奧等戰勝國，亦已精疲力盡矣，法外長塔立蘭氏遂乘機運用其巧妙手腕，在維也納會議中提出正統與補償兩原則。在前者原則之下，歐洲各國王室得以恢復其舊有王位，其結果為民主思想之沒落，與反動勢力之高漲；在後者原則之下，在某方面受損失，得從他方面求得補償，其結果為各國不顧各民族之願望，亦不顧地理與政情，任意割裂土地，以求滿足各自之野心。在此種虛偽的和平之下，其所組織之安全機構，不能產生良好之效果，必矣。神聖同盟為俄皇亞歷山大所發起，傾向自由主義，且富於宗教感，雖所有信仰基督教之國家咸相繼加入，但其不著邊際與夫在實際上不能發生大作用，不已昭然與天下後世共見耶？四國同盟為奧相梅特涅氏所發起，雖較神聖同盟切於實際，且有實力為其後盾，但梅氏為一頭腦頑固，手段毒辣之貴族，其一生之事業為反對革命與反對自由平等，四國同盟之目的，不外操縱列邦，壓制民氣，阻遏自由思想之傳播，維持專制主義之淫威而已，此種安全機構之不合於時代潮流亦不已昭然與天下後世共見耶？維也納會議所下之惡因，終於爆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

大戰，而戰後所產生之國際聯盟，自神聖同盟與四國同盟為進步，且其範圍在初時亦不局限於歐洲，世人遂寄以無窮希望，並譽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完備之世界安全機構。凡批評國際聯盟之不足，以保障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以及阻止戰爭之發生者，甚而目之為邪說惑衆，於此可見當時信賴國際聯盟之程度為如何矣。國際聯盟之組織，根據威爾遜所起草之聯盟章，其設立之機關有三，一曰大會，由會員國各派代表組成，凡重要議案，須經全體同意，始可通過。二曰行政院，或稱理事會，為聯盟最有權力之機關，由九國代表組成，其美法日英五強永佔一席，其餘四席由大會互選其他會員國充任，三曰秘書處，為聯盟常設機關，處理日常事務。此外又有若干附屬機關，如國際法庭，國際勞工局及衛生局等。國際聯盟之任務，其重要者，當為維持國際和平，會員國應互相尊重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倘發生爭執事件，應付諸仲裁或調解，會員國如不服從裁判，或不願遵守新諸戰爭，全體會員國應即對其斷絕商業財政關係，行政院應籌議共同制裁之方略。其次之任務為禁止秘密外交，會員國間一切條約，今後應送交秘書處註冊公布，凡有不當或妨礙和平之條約，大會應勸告會員國重行考慮。此外又規定縮減軍備，限制軍器之製造，與設立國際勞工會議於國際勞工局，以謀勞工生活之改善。關於戰敗國之殖民地，因其君民尚不能自立，故擬設委任統治，以示對殖民地之公平處理，受託之先進國，須將治理情形按期報告國聯。由上觀之，國際聯盟之宗旨，組織與規章，不可謂不完備矣，但自一九二〇年成立於日內瓦後，

不及二十年之久，世界第一次大戰又告爆發。其原因一方面固由於國聯之為世界安全機構，仍有其本身之缺點在，另一方面則應歸咎於各國之尚未確切認識如何維持世界安全之道也。

上次大戰後世界安全機構。所以失敗之原因，世人論者頗多，歸納言之，約有以下各點：一、戰勝國對於和平，毫無準備，一、戰勝國對於和平原則，意見不能獲得一致，三、國際聯盟約章之附入和平條約，實屬大錯，蓋國聯之組織以正義為主旨，而和約則由戰勝國以武力強迫戰敗國接受者，兩者性質顯然不同，四、美國不參加國聯，使國聯威信大減，國聯約章由美總統威爾遜起草，但彼未得國內同意，以致引起黨派爭論，結果美參院否決美國參加，且三國保障條約，美亦退出，英則無力單獨負責，遂使法國此後斷斷不休於安全問題，五、不允蘇聯在初期參加國聯，為蘇聯始終懷疑英法美組織反蘇運動之主因，六、和平條約不應以德國全國為談判對手，若英法美分別與普魯士，巴伐利亞，撒遜等邦談判，則德國不致統一而強大，七、對德條約不嚴，一九一四年大戰，德既為首，理應自食其報，且在戰中俄之布勒斯里外夫斯克條約，與對羅馬尼亞之布加勒斯特條約，亦苛刻非凡，協約國自可以之為先例，而遺報於德國之身，八、德國賠款太重使其財政不能支持，使尋而造成以後之世界經濟條，九、英法美未監視德國工業與戰爭潛力，使德國得以秘密從事擴張軍備，十、英法美軍隊未佔領柏林，使德人無戰敗之深切感覺，十一、國聯約章中規定一切重要決定，須大會全體通過，此使小國得以從中發生作用，而侵略國亦得以利用小國，為所欲為，十二、因美蘇之未加入國聯使國聯成為歐洲化，其影響不及於其他洲，十三、國聯行政院給予強國以常任理事之特權，使少數強國，如英法，得以把

持一切，十四、國聯本身無武力，不能執行維持和平之任務，雖約章十六條明白規定對侵略國施行軍事制裁，但奈英法等強國不執行何。十五、上次大戰後之世界安全機關，只注重於政治方面，不注意及經濟財政等方面。

以上十五點中，雖有不可盡信者，但此次盟國顯在極力避免重蹈前車之覆轍。舉例以言之，此次在戰爭期中，即準備和平一也，力謀對和平原則之同意二也，世界安全機構與和約之分開三也，美國當局避免引起黨派爭論，先求全國之一致四也，蘇聯表示戰後合作一如戰時之合作，以及英美對蘇感情之日篤五也，盟國決心不讓侵略國再起，羅斯福，主張佔領德日六也，盟國召開國際貨幣會議七也。至德國是否分割為數部，工業是否監視，賠款之數目與方法如何，新世界安全機構之約章如何，以及國際武力如何，雖現尚有不可確之數，但盟國必將重視過去之教訓，乃可斷言者也。

新世界安全機構，果能避免過去所犯之錯誤，但今後之世界安全，即可永保於不墜耶？以余個人而論，對此問題，雖非過分悲觀，亦非過分樂觀，蓋地球上之國家，既有強弱與貧富之分別，則強弱，富強窮之現象，勢所不能免。是故，世界安全之能否永保，不在世界安全機構之如何完備，不在國際武力之如何雄厚，更不在使侵略國之永能翻身，而在於強富之國之能否友好合作及善自約束，與夫貧弱之國之能否自具爭氣及發奮圖強。倘強富之國能在開明的自私自利之下，同時替世界全體着想，而貧弱之國能在國際平等之口號下，不斷增強其國力修明其內政，提高其人民生活程度，如是之後，世界永久安全，庶幾可保矣。換詞言之，強富之國應覺悟：強富為一種責任，非為一種權利，以權力與財力剝削貧弱者，只顧自身之強

富，而不顧鄰國之貧弱，其結果每爲國際間之不安定，與慘酷爭戰發生；至貧弱之國則感覺悟：貧弱乃世界之禍根，惟國力充沛，民生富裕，政治安定，使侵略國不敢染指，野心家無法煽動，然後有國際平等，領土完整與夫政治獨立之可言。簡而言之，世界永久安全之關鍵，在強國之友好合作，自我約束，並負起提高世界一般水準之責任，與夫弱國之努力上進，健全內部，以求國際政治之普遍穩定，民主原則之真正發展。

八月二十一日起在華府舉行之戰後世界安全機構會議，其討論結果能否產生今後之世界永久安全，皆視乎能否把握以上兩關鍵而定。美英蘇中四國所提出計劃，迄今尙在磋商之中，故吾人無法以此標準，加以論斷。但吾人今日可得而論者，約有以下數點：

第一，美總統羅斯福氏曾於今年六月十五日發表關於世界安全機構之談話，美方此次所提出之計劃，當以羅氏之原則爲根據。羅氏之言曰：「和平與安全之維持，必須爲所有愛好和平國家聯合之工作，因此吾人取一包容所有此等國家之國際組織之計劃。此組織旨在維持和平與安全，經由國際合作，協助建立維持各國間和平而友好之關係所須之安定與福利條件。同時，吾人以此一組織應爲一具有充分代表之團體，並爲一能通過，考慮與處理世界各問題所不可少之機構，該機構，自有提倡與推行國際合作之責。此一組織應設有一行政院，每年由各國全權代表中選任委員，其中應包括四個主要國家，以及相當數量之其他國家。行政院負責仲裁國際糾紛，並應付和平之威脅或破壞和平之事件。此外應有一國之法庭，處理司法上之糾紛。吾並不擬議成立一具有自身之警衛力量以及其他鎮壓力量之超級國家。吾人是在覓取有效之協定與安排，俾各國各

按其能力維持相當之兵力，以及防止戰爭準備之需要，並於必要時，以此等武力，從事聯合行動。上述種種，自當前敵人戰敗後，及阻止彼等再度製造戰爭之有效佈置完成後，始有實現之可能。藉此以外，和平而進步的世界之希望，依存於各大小國家之誠意與力量，彼等爲維持和平與安全，負盡力從事合作之責。」

據紐約時報記者所傳，美國此次所提出之計劃中，藉建議設立一類似以前國聯之新世界安全機構外，（該機構包括一由全體國家組織之大會，一由英美蘇中四國主持之行政院，及一秘書處及國際法庭），又有一重要之點，即建議國際聯合行動，以武力阻止侵略，該項武力之數量及類型，由大國商得一一般之協議，並由大國交予行政院聽其處置，如美國參議院通過該項協議後，則以後只須美國代表之同意與行政院中大多數代表之議決，即可使用此項武力，無須送回美國會批准。吾人據羅氏之談話，與紐約時報記者之報導，可知此項武力平日仍由各國保養，新國聯於必要時始可予以使用，實仍介於國際武力與國家武力之間之一種力耳。

第二，英首相邱吉爾氏曾於去年三月一日與今年五月二十四日發表關於世界機構之意見，英方此次所提出之計劃，大部分當以邱氏之原則爲原則。邱氏於去年三月之言曰：「吾人可以想像，在包括或代表聯合國國家，最後並包括或代表一切國家之世界機構中，應產生歐洲委員會及亞洲委員會。歐洲委員會應成爲一真正有效之聯盟，以一切有關之最強大力量爲其機構之後盾，有法庭處理一切糾紛，有國家或國際或兩者均具之兵力，準備執行此等決定，防止侵略之重行發生，以及未來戰爭之準備。此委員會必須包括全部歐洲，而歐洲社會之一切

主要支派，遲早亦須參加。至於其權益應獲保障之大小，小國應如何處理，余以為在大國以外，應有若干國家之集團或邦聯，由彼等自行選舉之代表發揚彼等之意見。余深信此等一切必可與英美蘇三國之永久利益相洽，因如無彼等之贊成與一致之協議與參加，此一切皆無法完成。」

邱氏於今年五月之言曰：「大西洋憲章是主要之指路標，但絕未限制盟國對於德國之前途應採何種辦法。（中略）如領土之變更，可使歐洲之和平更鞏固，更永久，則德國斷不至得到任何保證彼之領土不至於變更。吾人根據過去之經驗，此次將採較諸以前所想像者更為良好之辦法，使吾人子孫不再見破壞人類一切價值之世界大戰。吾人之目的，在建立世界秩序之組織，將付予一切必須之權力，以避免未來戰爭之發生。為避免戰爭起見，應成立一世界執行委員會，內包括此次戰爭獲勝之最大國家，彼等為維持和平計，應保留最少限度之軍備，為保持和平起見，另外又須成立一世界會議。世界會議與世界執行委員會之關係，吾尚不能明說。（中略）吾人須裝吾人之世界組織并確保其在規定範圍以內，擁有最大之軍事力量。」

據紐約時報記者所傳，英國此次所提出之計劃中，建議成立一「聯合國軍事參謀委員會」，商議各國交付世界安全機構武力之派額，與壓制任何侵略之軍事計劃。英國認為新世界安全聯盟應為「自由結合之獨立國家之機構」，該機構應「簡單而具有彈性」，並應以四大國家之信心與誠意為基礎，而不以保護一切國家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之特別決定為基礎。

第三、蘇聯之計劃，據紐約時報記者所傳，其大綱如次：（一）新安全機構之行政權，應授之於莫斯科宣言之四簽字國，四國中任何國均可否決對一可能之敵人宣佈經濟或軍事制裁

之提議，如此可保護四國之主權，並使該國不致用以進攻四國中任何國。（二）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組織全體大會，每一國家均可派員參加國際軍事航空隊該隊應由該國國家人士自動投效，混合組成，執行行政院所作之決定，諸小國亦可在行政院獲得數席，惟無權否決全體大會之行動計劃。（三）建立國際軍事航空隊，惟四大國仍應有其自身之武力，（四）維持和平之責任不應由所有各國分別負擔，而應授之於有以武力維持和平之意志與力量之國家，（五）世界安全組織應集力最於維護和平，力避牽涉其他問題。

第四、中國所提出之計劃，據云以舊國聯盟約之各要點為根據並建議成立國際警察。

綜合以上所述四國計劃之概要觀之，可見四國關於世界安全機構之意見，其相同之處甚多，世界安全惟有四國之友好合作維持之，一也，強國之應負領導責任，二也，侵略國之應使其不能再起，三也，世界機構之須獲得於必要時用以聯合行動之武力，四也，各國主權之應完整與平等，五也，大小國家之俱應參加世界安全機構，六也，舊國聯盟之組織，尚有可參攷之處，七也。所大不相同者，英美認為世界安全機構自身具有警備力量，在今日不切實際，但蘇聯則主張成立國際軍事航空隊。中國則主張設立國際警察，其他小異之處，或尚不在少數，然而欲求四國間得一廣大程度之協議，似非難事也。

總而言之，此次會議後所產生之世界安全機構，與上次大戰後之國際聯盟比，或無驚人進步之處，但有一主要之特點，即強國之責任與作用加重是矣。英代表賈德幹氏在會議席上曾將此趨勢表而出之曰：「除非大國有一致之目標，且願負起並忠實履行責任，則無一維持和平之機構，不論其建立之如何完好，皆不能發生實際作用」。余願弱國贊助小國，亦奮起而奮鬥，惟，則世界之永久和平與安全，庶幾可以確保矣。（八月二十八日）

戴高樂所以興起的原因和其前途

抱貞譯

正像自然一樣，任何國家的政治生命，難免真空。法國寫三共和之後，留出一塊空地，其當的國家革命，就想乘虛而入。但貝當沒有成功。換句話說，法國議會民主政治崩潰之後，接踵而來的，是貝當的偽全體主義政權的失敗。所留出一塊空地，現在由所謂神秘的戴高樂派填入了。戴高樂的前途，現尚不可斷言，不過法國國內和國外，對他的看法，顯然有些不同。在法國國外的人士看來，他曾和吉羅德站在一處，是法國反抗德國的領袖之一。但在法國國內戰鬥的人士看來，他是法國再生的領袖。神秘的戴高樂派控制了所有各種政治色彩的地帶報紙，而與德國和維琪爭鬥的祕密組織，差不多都擁護他。

從一九四〇年六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之間，法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中，戴高樂這個名字，可以說是法國生存和再生的惟一的記號。自第二帝國崩潰之後，一個人物能在政治舞台的中心，獨占一切，這是第一次。另一方面則為貝當。最近三年來，所有法國現在和將來的大問題，都不能和這兩個人的名字分開。法國人的政治的兩極，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不抵抗，都圍繞在他們的左右，在休戰時期中的法國政治，可以說就是這兩個神秘人物的發展史和興衰史。

在法國政治史上，個人因素和其力量的重居主要地位，我們只有從法國民主危機的廣泛政治背景中，求得一個答案。危機的原因，自一九三四年二月後，很明顯的表露於各次社會和政治的騷動中。雖然，法國民主制度有許多弱點，但是確有充分的彈性力量，以抵禦三十年來中的震盪。終於在軍事的災難

下，崩潰了。這次崩潰是徹頭徹尾的，所以法國民主政治的恢復，並不是一日之內可以成功的。舊體制的盟日，傳統的政黨制度完全粉碎了，過去政治上的分野，其意義也虛無了。所有社會和政治的團體，其內部亦因戰爭問題，分裂或解體了，維持休戰政權的，大多是右派，但其間亦有左派和雷諾派之分。激烈社會主義者，亦如如此。喬治斯和貝當主義繼續抗戰，但聯黨和貝林則擁護貝當的國民革命。舊時的聯繫，破裂了，新的聯繫逐漸把戰鬥的法國人集合起來，但其性質為非政治的。直到一九四二年，屬於舊時政黨戰鬥份子，才企圖按照舊時政黨的分野，重新組織起來，即使如此，亦是不出於戴高樂運動的廣大範圍之內。同時，戴高樂運動亦漸漸定形。

重新組織的政治團體，我們若以地下報章所登載的文字來判斷，我們可以見出他們有一個特質，就是缺少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性和自信心。舊時的政黨，已經失敗，並且每一個政黨對於軍事崩潰，都應負一部分的責任，這種觀念在法國人中間十分濃厚。所以對於想把政黨制度重新組織的企圖，都一概加以一種「罪惡的觀念」。這是產生一個「強大人物」的理想背景。再者，人民自身的政治懦弱，亦往往希望有一個領袖出現。拿破崙第一的興起和其帝國的建立，是由於法國經過革命後，政治能力枯竭之故。至於拿破崙第三的興起，則是寄托於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間法國人民受到許多無益的社會衝突的挫折後所產生的希望上面。在另一方面，布蘭格（Blanc）的失敗，則成為一幕滑稽戲，因為當時法國民主政治

，不但強有力，且自信，不希望有一個領袖。

在法國人的眼中看來，何以所有的光明應該圍繞在戴高樂的身上，其原因之一是由於戰鬥法國的缺乏領袖人才，同時是由於人民譴責維琪的屈膝和每日的悲慘之故，戴高樂遂成爲所有法國的德性的代表。戴氏過去的政治紀錄，沒有染上第三共和的敗行。而戴氏的軍事紀錄，又可以反證老將領們的低能和凡庸。他所著的「未來的軍隊」一書，確是在五年以前預見了法國之役的情形。在軍事專家看來，戴高樂並不是最早和惟一提倡現代機械化戰爭的人，一般銜學之士或許還可指出戴氏主張少數和純粹職業軍隊的錯誤。但是法國的羣衆，並不都是專家，也並不都是銜學之士。在他們看來，戴高樂是「荒野的呼聲」，不見知於世的先知先覺。至於吉羅德將軍，因爲他過去特殊的勇氣，個性和愛國的紀錄，法國人對他另有一種看法。在軍事方面說，他是屬於貝當和魏剛的「舊派」。

但這不過是戴高樂所以神祕的原因之一而已。此外還有一個事實，就是戴高樂得到法國許多方面的擁護，而吉羅德則只想留在保守的極端的右翼的小圈子內。吉氏的所以衰落，其原因或在於此。戴高樂的擁護者，有火十字團，有天主教職工會，有激烈派，社會主義黨和共產黨。

這些互相衝突的黨團，如何會承認戴高樂爲他們的領袖呢？共同的因素是抵抗敵人。但是這種解釋，決不能令人滿意。戴氏的力量，至少有一部份是由於他的政治上的含糊，各黨各派都可以利用他，作各種不同和絕對矛盾的解釋。他的火十字團的擁護者，認爲「未來的軍隊」書中的政治信條，仍舊是有

效的，就是反對議會民主政治，贊成全體主義的保皇黨的政權。至於左派的胸中，則認爲戴氏最近曾一再保證效忠於共和，及一八七五年的憲法。究竟那一種解釋是對的呢？從最近戴氏的言行中，實在找不出一個肯定的答覆。他効忠於共和的保證，有人認爲只是一種遁詞而已。他雖譴責貝當的獨裁，但他自身對於戰鬥法國却保持着一種嚴格的私人控制權，並且某種偏僻的儀式，確是近於領袖制。必有一天，法國本土上的事實上的壓迫和實際上的政治，會來廓清這些矛盾的現象。

曾有一位記者說，突尼斯那裏的法國人「喜歡戴高樂好像和一位不知底細的姑娘講戀愛一樣」。這種描寫亦可以適用於法國本土。在法國大多數的羣衆看來，戴高樂仍舊是法國抵抗德國的記號，但在比較冷靜和感情淡薄的政治觀察者看來，則對戴高樂和全體主義的傾向，頗感不安。我們亦不可忽略一種奇特的國家主義者的自我中心主義的趨勢。但是我們不要以爲，阻遏目前這種神祕的發展，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或培養一個和他對立的荒唐人物。對這種神祕發展的惟一有效的答覆，只是一個解放的和自由的法國的健全的政治經驗。這種神祕的所以產生，乃是由於軍事上的暫時的崩潰，以及認爲法國民主政治不是上品的感覺之故。所以法國的民主勢力，第一步必須要恢復勇氣和自信，這工作需要時間機會和堅忍。但是如果一旦完成了，任何獨立的戴高樂派就無容身之地，而戴高樂一旦和極端矛盾的主義離開，他也只能在法國歷史上保持一個光榮和高尚的地位而已。（英國經濟學人五月二十二日）

聚興誠銀行

營業要目

儲蓄	匯兌	放款	存款
----	----	----	----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設重慶
分行遍設
森林路
各地

四川省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肆仟萬元
本行宗旨

一：發展社會經濟	二：調濟全川金融	三：扶持特產運銷	四：促進生產建設
存款	放款	貼現	兌兌
代理公庫	儲蓄	信託	倉庫

總行 分行 支行 辦事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內江 自流井 白縣 南充 樂山 眉山 洛順 富順 榮昌 等處

電話掛號 總分 支 號六六九零為均

民憲半月刊（第八期）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人 左舜生
發行人 鄭振文
發行所 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信義街卅九號
定閱處 本社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 重慶桂林昆明貴陽等地各大書店 成都祠堂街華西書局及其他各書局

本刊零售每冊國幣十五元

預 定			時 間	冊 數	收 費
全 年	半 年	三 個 月	全 年	二 四 冊	三 百 二 十 元
			半 年	十 二 冊	一 百 七 十 元
			三 個 月	六 冊	八 十 五 元

不通匯兌之處，一元的郵票可以代現。不收寄費，加快或掛號照加。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四一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字第三五七號 東川郵政管理局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國通商銀行

我國首創第一家銀行
服務社會達四十九年

總分支行處

重慶 自流井 成都 安遠 涼州 陽林
重慶 寶成 西平 蘭洛 桂衡

地址：重慶第一模範市場五十五號
電話：四一七〇七 四一八〇八

大同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銀行部

重慶	蘭州	西安
大馬路	中正路	東大街
昆明	貴陽	衡陽
護國路	中山路	剛直路
桂林	柳州	天水
桂東路	培新路	網常路

儲信部

重慶 中一路

電話掛號除昆明（3588）外餘均（7041）

中央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廠蓉 廠渝

重慶南岸	銅元局	電報掛號	一六三五
成都南校場外	白土地廟	電報掛號	〇九一四

總公司重慶南岸銅元局電報掛號一六三五

製造：化學藥品
配製：製劑處方
產品：葡萄糖（注射用）、乳糖（注射用）、葡萄糖酸鈣（注射用）、次硝酸鈣、次碳酸鈣、次炭酸鈣、硝酸銀、氧化鋅、鋁酸、鋁酸鋅、甘汞（氯化低汞）、昇汞（氯化高汞）、白降汞（含銀氯化高汞）
出品繁多不能盡錄

備有詳細出品目錄函索即寄

營業部	重慶民權路十八號	電話掛號	41711
辦事處	成都四十二號信箱	電報掛號	0914

中元造紙廠

自製化學木漿
精造上等紙張

（製造廠）四川宜賓中元新村

郵政信箱 一、二、三、四

（重慶辦事處）中正路一四〇號

電話掛號 六一六一
電話號碼 四一五五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本期定價國幣拾伍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史料叢書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七輯 民憲半月刊(一)

全二冊定價：精裝 新臺幣五〇〇元 平裝 新臺幣四五〇元

發行人：潘

編者：陳

執行校印：朱

印行者：國

振 正 文 史
球 茂 原 館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二一五七
郵撥帳號：一五一九五二一三號

承印者：長 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五〇巷四弄二十一號
電話：(〇二)三〇四〇四八八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00-6415-3 (一套：精裝)
ISBN 957-00-6418-8 (一套：平裝)
ISBN 957-00-6416-1 (精裝)
ISBN 957-00-6419-6 (平裝)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七輯, 民憲半月刊／陳
正茂編. — 初版. — 臺北市：國史館, 民
84
冊；公分.— (民國史料叢書)
ISBN 957-00-6415-3 (一套：精裝). — ISBN
957-00-6418-8 (一套：平裝)

1. 中國青年黨

576.23

84011688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Vol. VII

The Democracy Bi-Weekly

Edited by
Cheng-mao Chen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95

ISBN 957-00-6416-1

